

# 中国人民解放军

## 全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著

51113

军事科学出版社

本卷主编 莫 阳 张要先 沈宗洪 李绍群 仲兆良  
参加编写人员 梅 琪 张 剑 陈伏成 徐凤舜 蒋凤波  
郑功仁 刘 孚 张光彩 姚 杰 胡兰芝  
朱兆谋 刘 冰 涂克明 李荣耀 赵 平  
魏德松 沈 澄 秦镇清 周宏雁 裴代元  
周德翔 傅国祯 华国富 陈 剑 刘国语  
曾 诚 洪 明 赵 欣 林中和 刘大奎  
徐占权 王 贵 齐德学 罗 援 周志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出版人:刘庆忠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版次: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本卷印张:42.25

印次: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本卷字数:515千字

印数:1-1200册

书号:ISBN 7-80137-315-4/E·216

定价:1800.00元(全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

##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是中共中央军委赋予军事科学院的一项重要科研任务。编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曲折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揭示战争规律，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承担这项任务的军事历史研究部，在军事科学院党委的领导下，自50年代末开始，就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电及其他资料，为编撰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十年动乱使这项工作陷入停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编史工作。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力求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面貌，使这部战史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军事科学院宋时轮、郭化若、舒同、郑文翰、谭知耕、石一宸、韩双亭、王诚汉、姜思毅等领导同志先后不断给予指导。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很难避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史；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战史；第三卷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战史。各卷正文之后，附有各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要图、重要战役战斗经过要图以及敌我双方的序列表、我军战绩统计表、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等图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以及军内外党史、军战史专家、学者和参加过历次革命战争的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解军事历史研究部**

## 绪 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军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旧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制度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日甚一日地侵入，逐步地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从1840年至1910年这段时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占或“租借”了中国大片领土，取得在中国驻军、筑路、开矿、传教等特权，控制中国的海关、外贸、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等经济命脉，大量地向中国输出商品

和掠夺原料，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经济上濒于破产。它们同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并给中国反动政府提供大量军火和军事顾问，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中国人民陷于饥寒交迫和受奴役的悲惨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以及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但是，因为没有新型的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

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等封建军阀所篡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遭受屈辱的境况仍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华权益，竞相支持实行封建割据的各系军阀，造成各军阀之间的长期对立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历史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7月，中国

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

屡遭挫折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参加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含有明确反帝反封建内容的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从此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此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一起，帮助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被派去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官。先后有多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校学习。

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其中“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声势最大。在此期间，共产党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平息了广州商团叛乱，讨伐了陈炯明等反动军阀，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部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其中多数的军由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许多基层军官系共产党员，成为由我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部队。此时，革命阵营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也加紧进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中山舰事件”，借机强迫以周恩来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同年5月，蒋介石又提出了一个旨在进一步打



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一味妥协退让，蒋介石遂在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和参加下，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由广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湘鄂粤赣等省强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支援下，采取长驱直进和首先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迅速消灭和击溃了盘踞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封建军阀吴佩孚和统治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的封建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流域中、下游广大地区，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进一步同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勾结起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1927年3月，蒋介石在江西、安徽等地制造了许多起反革命流血事件，接着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同蒋介石一起镇压共产党。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反革命阴谋缺乏警惕。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

反动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工农运动则横加指责、压制，甚至解除工人武装；致使党和工农群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下，失去有效的反抗，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得到了惨痛的教训，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走上了独立组织革命军队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的，同一般的战争相比，具有许多特殊的规律。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创立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科学——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它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成为我军建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和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过程，贯穿于我军全部战争史和国防建设史。

1927年秋，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方组织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举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开展了

游击战争。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幼小的红军怎样才能生存、发展和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各地红军都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毅然改变了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开始创建新型的革命军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红军也相继创建了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

随着战争的发展，各地红军先后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逐步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在中央苏区打破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中，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都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运用自己的经验，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在此期间，红军的革命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消灭了大量敌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武装。到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约30万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全面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军事原则，实行了一套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主力红军被迫退出南方各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转危为安。接着，党中央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这一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则降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不懈的努力，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日军大举进攻、平津失守、京沪危急和大片国土沦丧的紧要关头，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接连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条件，总结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条件和全面抗战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战术，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我军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阔的解放区战场，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不断地粉碎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



进攻，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我军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发表的一系列军事著作，不仅指导我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利用“和平谈判”作掩护，进行内战准备，企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一面通过谈判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一面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军，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由抗日战争以游击战为主向解放战争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多次打败蒋介石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挑衅，做好了迎击敌人全面进攻的充分准备。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适时为我军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时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提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明确指出，“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sup>①</sup>1946年9月，毛泽东及时总结了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为中央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系统地阐述了人民解放军

---

<sup>①</sup> 引自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3页。

的基本作战原则。我军运用这些原则，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947年7月，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12月，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我军在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下，进行了多种样式和各种规模的歼灭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1948年9月，我军开始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敌人的重兵集团。接着，强渡长江，攻占南京，实施大规模战略追击。经过四年多作战，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800多万人，推翻了蒋家王朝，解放了大陆全部国土。其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容十分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的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理原则，过去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后仍然是我军反侵略战争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指导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是加强我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我军战争历史，对于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于加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1
第一节 北伐战争失败后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1
第二节 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	
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	5
一、南昌起义	5
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
三、广州起义	11
四、其他地区的起义	13
第三节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反“进剿”	
反“会剿”的胜利	18
一、井冈山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工农革命军	
击破赣敌第一次“进剿”	18
二、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击破赣敌第二、	
三、四次“进剿”	20
三、反对湘赣两省敌军第一次“会剿”和	
“八月失败”	23
四、击破湘赣两省敌军第二次“会剿”	
井冈山根据地的恢复	25
五、平江起义和红五军主力转到井冈山。	

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反对湘赣两省敌军 第三次“会剿” .....	28
第四节 赣南、闽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	30
一、大柏地、长汀战斗的胜利。红四军割据 赣南、闽西战略计划的制定 .....	31
二、赣南苏区的建立和闽西地区 游击战争的发展 .....	33
三、反对赣闽粤三省敌军第一次“会剿” 和进军东江 .....	35
四、古田会议的召开和无产阶级建军 路线的确立 .....	37
五、赣西南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	38
六、反对赣闽粤三省敌军第二次“会剿”。 水南战斗的胜利 .....	39
第五节 湘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	43
一、湘鄂边地区 .....	43
二、洪湖地区 .....	46
三、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巴（东） 兴（山）（秭）归地区 .....	50
第六节 鄂豫皖边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	51
一、鄂东北地区 .....	51
二、豫东南地区 .....	53
三、粉碎敌人对鄂豫边界的三次“会剿” .....	54
四、皖西地区 .....	56
五、鄂豫皖苏区的建立 .....	57
六、蕲（春）黄（梅）广（济）地区 .....	59
第七节 其他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	60



一、湘赣、湘鄂赣边界地区·····	60
二、赣东北、闽北地区·····	63
三、广西左右江地区·····	64
四、广东东江地区·····	66
五、海南岛地区·····	67
六、川东地区·····	68
七、苏中（南）通海（门）如（皋） 泰（兴）地区·····	69
八、浙南地区·····	70
<b>本章小结</b> ·····	72
<b>第二章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b>	
<b>第一、二、三次反“围剿”</b> ·····	78
<b>第一节 1930年夏季的形势</b> ·····	78
<b>第二节 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b> ·····	82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82
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84
<b>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b> ·····	89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红军诱敌 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	89
二、敌人开始进攻。红军实行退却·····	91
三、红军转入反攻，打破敌人“围剿”·····	94
四、敌人转取守势。红军转入进攻·····	97
<b>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b> ·····	99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	99
二、敌人开始进攻。红军诱敌深入的战略 方针重新确定·····	101

三、红军转入反攻，打破敌人“围剿” .....	104
四、敌人转取守势。红军转入进攻 .....	107
第五节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 .....	109
一、敌人突然发起进攻，红军主力	
仓促回师集中 .....	109
二、红军转入反攻，打破敌人“围剿” .....	111
三、敌人转取守势。红军转入进攻 .....	116
第六节 湘鄂西苏区红军反“围剿” .....	118
一、洪湖苏区红军反“围剿” .....	118
二、红三军主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	
和鄂西北 .....	121
三、红九师同红三军主力会合，出击襄北 .....	123
第七节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	
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作战 .....	126
一、第一次反“围剿”。双桥镇战斗 .....	126
二、第二次反“围剿” .....	131
三、红四军南下蕲（春）黄（梅）	
广（济）作战 .....	132
第八节 红四方面军发动进攻作战。敌人对鄂豫皖	
苏区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 .....	136
一、黄安战役 .....	136
二、商（城）潢（川）战役 .....	138
三、苏家埠战役 .....	139
四、潢（川）光（山）战役 .....	142
第九节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红军反	
“围剿” .....	144
一、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	144

二、湘鄂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	147
三、赣东北苏区红军反“围剿” .....	148
本章小结 .....	150
<b>第三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和</b>	
<b>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b> .....	155
<b>第一节 1931年秋后的形势。王明“左”倾</b>	
<b>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b> .....	155
一、1931年秋后的形势 .....	155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	157
<b>第二节 中央红军1932年的六次进攻战役</b> .....	160
一、赣州战役 .....	161
二、漳州战役 .....	162
三、南雄、水口战役 .....	164
四、乐安、宜黄战役 .....	166
五、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	168
六、金溪、资溪战役 .....	170
<b>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b> .....	171
一、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向苏区内部退却 .....	171
二、黄陂战斗 .....	173
三、草台岗战斗 .....	176
四、东方军入闽作战 .....	178
<b>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b> .....	180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 .....	180
二、在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下，红军	
的进攻作战 .....	182
三、在军事保守主义方针下，红军进行	

阵地防御战·····	189
四、在逃跑主义方针下，红军仓促实行 战略转移·····	190
第五节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红军 的反“围剿”·····	191
一、湘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191
二、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194
三、闽浙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195
第六节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界地区·····	198
一、第四次反“围剿”前的情况·····	198
二、第四次反“围剿”·····	199
三、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界地区·····	202
第七节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红二十五军 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205
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	205
二、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210
第八节 川陕苏区的创建。红四方面军 反三路围攻·····	214
一、川陕苏区的创建·····	214
二、粉碎敌人三路围攻·····	215
三、仪（陇）南（部）、昔（山）渠（县）、 宣（汉）达（县）战役·····	218
第九节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	220
一、敌我双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220
二、敌军发起进攻，红军收紧阵地·····	222
三、红军转入反攻，粉碎敌军围攻·····	224



第十节 陕甘边、陕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 红军的反“围剿” .....	227
一、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	227
二、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反“围剿” .....	230
三、西北军委的成立和西北红军的反“围剿” .....	233
本章小结 .....	235
<b>第四章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南方红军游击战争 的坚持 .....</b>	<b>239</b>
第一节 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先后开始长征 .....	239
一、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同红三军会师 .....	240
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占领遵义 .....	243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边陲甘苏区 .....	247
第二节 遵义会议。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 .....	250
一、遵义会议。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 地位的确立 .....	250
二、四渡赤水河，威逼贵阳 .....	252
三、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 .....	258
第三节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央红军与 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	260
一、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 .....	260
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	262
三、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	263
第四节 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 陕甘苏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	267
一、党中央同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的斗争 .....	267
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	273

三、红一方面军主力同红十五军团会师。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277
四、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280
第五节 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反“围剿”。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和北上甘南·····	284
一、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反“围剿”·····	284
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288
三、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	293
第六节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的坚持·····	295
一、赣粤边游击区·····	297
二、闽赣边游击区·····	298
三、闽西游击区·····	299
四、闽粤边游击区·····	300
五、皖浙赣边游击区·····	301
六、浙南游击区·····	302
七、闽北游击区·····	303
八、闽东游击区·····	304
九、鄂豫皖边游击区·····	306
十、鄂豫边游击区·····	307
十一、湘鄂赣边游击区·····	308
十二、湘赣边游击区·····	309
十三、湘南游击区·····	310
十四、琼崖游击区·····	311
本章小结·····	313
第五章 发展陕甘苏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316

第一节	1935年冬季的形势和党的方针·····	316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东征·····	321
一、	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作战部署·····	321
二、	突破敌军黄河防线，占领晋西有利阵地·····	323
三、	发展胜利，分兵南下北上作战·····	325
四、	左右两路军向中间靠拢。红一方面军 回师西渡·····	328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西征·····	333
一、	战前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作战方针·····	333
二、	西方野战军西征的第一阶段作战·····	335
三、	西方野战军西征的第二阶段作战·····	337
四、	东线开展游击战争。对国民党军队统战 工作取得进展·····	340
第四节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山城堡战役·····	342
一、	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的制定。三大主力 红军胜利会师·····	342
二、	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 计划被迫中止·····	348
三、	红军主力向东转移，取得山城堡战役 的胜利·····	354
第五节	西路军转战甘西北·····	357
一、	西路军组成和平（番）大（靖）古（浪） 凉（州）战役·····	357
二、	西进临泽、高台地区·····	362
三、	西路军的失败·····	367
第六节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前后红军的行动·····	369
一、	党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红军主力南下	

支援友军抗击“讨逆军”的进攻·····	369
二、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红军进行对日抗战 的直接准备·····	372
三、南方红军游击队停止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377
第七节 东北三省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378
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	378
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	380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385
本章小结·····	390
 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	 393
 附件： 一、重要战役战斗敌我战斗序列表（1—72） 二、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三、重要战役战斗经过要图（1—74）	

# 第一章

## 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 第一节 北伐战争失败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参见附图 1、附表 1)

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部破裂，北伐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面临着由革命高潮进入低潮的极其严重的形势。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从而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继续前进。

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逐步建立起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为社会基础的新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也暂时依附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只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这时，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政党，只有共产党。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逐步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命脉，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军，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在全国范围内，反革命力量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新军阀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极端野蛮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就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万人以上。共产党

员由6万余人减少到1万余人，党的许多组织被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曾经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遭到严重的摧残。一时间，反革命气焰嚣张，革命处于低潮。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北伐战争时期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在发展。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新旧军阀的重重剥削与压迫之下，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迫切地要求变革。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国内大资产阶级的排挤打击下，也逐渐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感到不满。这一切说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基础是不稳固的，中国革命的因素依然存在，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对立和混战，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当时，除继续盘踞山东、直隶<sup>①</sup>及察哈尔、热河两个特别区和东北三省的旧军阀张作霖以外，新军阀主要有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集团、李宗仁集团，控制西北的冯玉祥集团，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集团，和实际上控制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集团。他们在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同时，其内部也展开了互相争夺地盘和权力的复杂斗争。1927年秋，爆发了李宗仁集团对唐生智集团的战争。此后，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接连发生。军阀混战的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促使人民走向革命，同时也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发展。

北伐战争的影响和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能够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虽然遭到重大损失，但党中央和党的许多地方组织保存下来了。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但大部分是经过严重阶级斗争锻炼的革命骨干。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时期，培养了一

---

<sup>①</sup> 旧省名，今名河北。

批军事干部，并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到1927年7月，我党能够掌握的军队主要有：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扩编成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大部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一军第十师中的1个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sup>①</sup>，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其他一些武装。还有以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在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和广州等城市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打击后，有一部分革命群众和相当数量的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斗争。这就使中国革命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党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上述形势下，全党同志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改变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和政策，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早在1926年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就提出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主张。1927年3月，毛泽东又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sup>②</sup>。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立三、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等联名向党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蔡和森等提出了“以暴动对付暴动”<sup>③</sup>的主张。在湖南则有平江、浏阳两县农军围攻长沙，反击反革命屠杀政策的英勇行动。上述这些，虽然一直为陈独秀所压抑，但它为北伐战争失败后，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7月4日，毛泽东在党中央讨论形势和党的政策的会议上指出：农民自卫军必须保留，必要时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接着，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

---

① 该团又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

② 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31页。

③ 参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迫害共产党，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通告，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的任务。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我党所掌握的主要部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8月3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在农民运动发达的这几个省份，以农会为中心，团结广大农民和各种社会力量，举行暴动，以动摇军阀政权，并争取在湖南和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国民党屠杀和镇压的严峻形势下，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会议决定派最积极、最坚强和富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去各地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并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限制农民运动，和不重视掌握枪杆子的错误，强调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发言，特别是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对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促使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八七会议”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旗帜，实现了党的指导方针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对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没有解决好。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坚持了“八七会议”的方针，但却



发展了从“八七会议”以来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估计为“不断高涨”，提出要汇合城乡暴动，“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sup>①</sup>，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

1928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党中央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进一步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着重地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正确地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对已经产生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提出了某些指导性意见。但是，对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仍认识不足，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放在城市。

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党中央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中国武装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全党的英勇斗争中，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许多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同志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地得到了正确的解决。

## 第二节 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

1927年8月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我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领导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通过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 一、南昌起义

(参见附图2，附表2、3)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曾准备集合我党能够掌握的武装，联合武

---

<sup>①</sup> 参见1927年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南下广东，支援当地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时，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清党”，随即向党中央建议，集中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东去。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二方面军之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师一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之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第二十军；第五方面军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等部，共2万余人。

从7月26日起，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十两师和第二十军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之线向南昌集中，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第五方面军朱培德部之第三军位于樟树镇（今清江）、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二方面军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第六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南昌附近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五十三团，共3000余人。这个情况表明，我在南昌占绝对优势，有把握在敌援兵赶到以前，迅速歼灭敌人，取得起义的胜利。

中共前委原定7月30日夜举行起义。在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30日赶到南昌，以没有成功把握和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为由，反对起义。前委经过两天的争论，排除了张国焘的阻挠，确定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开始起义。按照前委的作战计划，起义部队对南昌守敌发起全面进攻，至天明，全部肃清敌人，共缴获各种枪5000余枝。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

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举行起义，第二天开到南昌集中。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根据中央的决定，仍沿用“左派国民党”旗帜来号召革命，并采取了下列措施：一、以“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历数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种种罪行，表示了今后继续奋斗的决心。二、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武汉和南京国民党反动当局相对抗。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刘伯承兼任参谋长。四、起义部队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无战斗部队），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领起义军南进，先攻占广东的东江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并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再攻取广州。

8月3日，起义军未经整顿，即开始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到达进贤时，率部脱离起义军东去。起义军各部队因减员较多，在临川休整三天，然后继续南进，先头部队于25日进到瑞金以北的壬田附近地区。

这时，国民党驻守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琛，调钱大钧部9000人从赣州进到会昌、瑞金，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壬田，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零都（今于都）前进，企图堵击我军。

我军先头部队迅速击溃壬田之敌3个团，乘胜于26日占领瑞金。28日至30日，我军以一部兵力占领会昌西北的洛口，阻击黄绍竑部，集中主力1万余人，猛攻会昌钱大钧部，经激烈战斗，虽歼敌大部，但我军也伤亡1700余人，战斗力受到削弱。

起义军经一个月的行军战斗，减员近万人。中共前委和参谋团分

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改道经福建长汀，再沿汀江、韩江进入东江地区。9月上旬，我军击退敌黄绍竑部的进攻，由会昌经瑞金进至长汀，稍作整顿后，主力经上杭进入广东，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我军占领潮、汕前后，李济琮令钱大钧残部牵制三河坝的我第二十五师；以黄绍竑部经丰顺（今丰良镇）进击潮安；以3个师和潮、梅警备部队共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经汤坑（今丰顺）进击揭阳，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中共前委和参谋团决定：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主力6500余人于27日集中揭阳，向汤坑推进，迎击由河源来犯之敌。

9月28日，我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同敌东路军遭遇。经3昼夜激战，我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退出战斗。10月3日在普宁之流沙同由汕头退出的革委会会合，继续向海陆丰撤退，经过葵潭附近时被敌截为两段，部队大部溃散，余部1200余人进到海陆丰，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给敌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5日进到饶平，同由潮、汕撤出之第三师一部会合。此后，朱德、陈毅率领这两支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转战到粤北地区，保存了南昌起义军近800人的骨干，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经验证明，夺取广东，再行北伐的战略方针，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这是起义军失败的基本原因。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部队，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光辉的8月1日，成了我军的建军节<sup>①</sup>。

---

<sup>①</sup>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此决定。从此，“八一”成为我军建军节。

## 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参见附图 3、4)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秋收起义作了具体布置，并把起义的重点置于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省。为了加强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担任省委书记。

1927年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从18日起，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和省委委员一致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并认为，起义只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有军队作骨干。毛泽东等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认为不能按照中央的原定计划在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地区同时发动起义，而应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一个地区发动起义。省委经过反复讨论，于30日决定，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七县（镇）的起义。根据这一决定，毛泽东被派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起义。此后，省委又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军会师长沙，夺取省城。

这时，由我党掌握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在修水休整，由罗荣桓率领的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一部也集结在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在铜鼓休整；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集中到安源，同安源矿工武装会合。这些武装可以作为起义的骨干。

9月初，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

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研究制定了边界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前委把在边界地区的革命武装共5000余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原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一团由警卫团（大部）、平江工农义勇队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前委计划：在当地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一团夺取平江，第二团夺取萍乡、醴陵，第三团夺取浏阳，达成上述任务后，三路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起义军和长沙市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9月9日，湖南省委组织一部分群众，开始破坏长沙至岳阳段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按计划举行起义。

第一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长寿街之敌地方武装。当先头部队刚同长寿街之敌接触，主力进到金坪时，突遭前不久由余洒度收编的土匪武装从后方来的袭击，被打散两个营，损失人枪各200余。经收容，转向第三团靠拢。第三团由铜鼓出发，接连攻占浏阳东北的白沙镇、东门市，歼敌靖卫团<sup>①</sup>一部。14日，敌军地方武装约两个营由达浒反扑东门市，我第三团被迫撤至上坪。第二团由安源出发，攻克萍乡之老关，在起义农民的配合下，攻占醴陵县城，歼敌一部。14日，长沙之敌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团两个营向醴陵反扑，我第二团转攻浏阳，在农民自卫军配合下，于15日拂晓袭占浏阳城，但由于戒备疏忽，遭到由醴陵追来之敌的突然袭击，损失大部。

鉴于三路进攻部队均受挫，毛泽东于9月17日下午果断地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之文家市集中。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全部、第一团余部和第二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

---

<sup>①</sup> 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泽东召开前委会议，分析敌我形势，讨论行动方针。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地。

9月20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这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此后，起义部队继续向南转移，10月3日进到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人，同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取得了联系，并把一部分伤员安置在茅坪。接着，经湖南酃县的水口转至江西遂川县境，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依据实际情况，毅然改变了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率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实行打土豪、分粮分资财，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 三、广州起义

(参见附图5)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桂系李宗仁部对唐生智集团的战争爆发。11月中旬，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争夺广东的矛盾激化，张

发奎部集中主力于西江地区，对付拟从梧州进袭广州的黄绍竑部，另一部兵力准备对付可能从汕头向广州前进的陈铭枢部，李福林第五军分驻于韶关、江门等地。广州地区只有第四军军部、1个炮兵团，新组成的新编第二师第三团和警察武装。

这时，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各地秋收起义虽然大部分受到了挫折，但仍有不少地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顽强地坚持着斗争。广东海陆丰起义军民，占领了海丰、陆丰全县，广州工农运动也有所恢复。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一直为我党所掌握；第四军警卫团团长是共产党员，许多士兵也倾向革命。但是，广州外围的敌情还很严重，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

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战争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形势，实行总暴动政策，要求各地再次组织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要求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起义，建立广东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1月26日决定立即组织由我党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接着，省委即着手组织工人赤卫队，在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官兵中进行准备起义的动员；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指挥，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敌察觉，张发奎准备解散教导团，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情况下，广东省委决定把起义提前到11日举行。

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的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



分别向广州敌人发起突然攻击，首先消灭了驻沙河之敌炮兵团等部，接着攻占了公安局，并控制了城北制高点观音山。市郊的芳村、西村等地农民也同时起义，配合市内起义军民的作战。经过10多小时的战斗，除敌人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等以外，市内的敌军大部被歼。当天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

起义后，叶挺于当日晚提出迅速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省委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使起义军失去了及早避开优势敌人打击的时机。

12日，由外地回援之敌约3个师，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与陆战队的支援和市内残存敌人的配合下，从南、西、北三面向广州市疯狂反扑。起义军民在敌我众寡悬殊、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遭受严重损失，张太雷不幸牺牲。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于13日被迫撤出广州，后由叶庸、袁裕（即袁国平）收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少数人员撤往北江地区，加入了南昌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起义军民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巨大鼓舞。广州起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按照外国经验，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 四、其他地区的起义

（参见附图6）

在1927年秋至1928年6月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还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一些地区领导了一系列的起义，其中不少起义保存了一部分人

员，开展了游击战争，后来逐步发展成几支较大的红军。

**洪湖地区<sup>①</sup>农民起义** 1927年9月，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分别领导沔阳、公安农民举行起义，组成游击队，一度占领县城，后在敌人反扑下，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活动。此后，监利、石首、华容、南县、江陵、荆门、当阳、天门、汉川等县农民也举行起义，分别组成几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1928年初，由中央派往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的中共湘西北特委主要成员周逸群、贺龙等路过洪湖地区，参加了洪湖地区年关斗争的领导工作，并集中当地3支游击队共500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在长江两岸积极打击敌人，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斗争局面。周、贺离开后，各县游击队继续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黄麻农民起义** 1927年9月，中共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委分别领导数千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因缺乏经验，均未成功。11月14日，黄麻区特委乘李宗仁、唐生智两派军阀混战之际，再次领导黄麻两县农民和农军2万余人起义，攻占黄安城，继而成立黄安农民政府，并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共3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不久，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黄安，鄂东军固守县城，遭受严重损失，潘忠汝不幸牺牲。随后，起义武装72人转移到黄陂以北的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海陆丰农民起义** 1927年9月7日至16日，中共广东东江地区党组织为接应南昌起义军南进东江的行动，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军和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占领了两县城。不久，在敌反扑下，转入农村坚持斗争。10月底，东江党组织乘粤桂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由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军以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全境。11月，

---

<sup>①</sup> 洪湖地区，泛指洪湖附近各县的广大地区。

在彭湃的领导下，成立两县苏维埃政府，开始分配土地。1928年1月初，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到达海陆丰地区后，加强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

**海南岛农民起义** 1927年9月23日开始，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和工农讨逆军<sup>①</sup>总司令冯平等领导琼山、定安、文昌、琼东、乐会（琼、乐两县今合并为琼海县）、万宁、儋县、临高等八县农民武装编成的工农讨逆军举行起义。起义中，杨善集牺牲。随后，工农讨逆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东、西、中三路军，分别向东部、东北部和北部以及南部出击，攻占了陵水、藤桥、三亚等城镇，成立了陵水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夏，在优势敌人进攻下，我军受到严重损失，冯平等领导人牺牲，部队仅剩下百余人，由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转移到母瑞山坚持游击战争。

**确山农民起义** 1927年10月8日，中共河南确山县委在刘店领导农民起义，成立农民革命军，马尚德（后名杨靖宇）任总指挥。起义后，敌人分三路向刘店进攻。农民革命军主动转移到刘店以东、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28年春，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农民革命军突围，一部转移到大别山区，一部留在当地坚持秘密斗争。

**鄂北农民起义** 1927年11月12日，中共鄂北特委领导枣阳农民和农民武装起义。围攻枣阳县城受挫后，组成游击队，在枣阳西部和南部开展游击活动。在枣阳起义的推动下，鄂北的钟祥、南漳、襄阳、光化等县农民也于1928年春相继起义，因缺乏经验很快失败，少数人员转入秘密斗争。

**赣西、赣南农民起义** 1927年11月，中共赣西特委万安行动委员会，组织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举行武装起义，进攻万安、泰和两城未克。1928年1月9日，在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等领导下，第五纵队和起义农民，攻占了万安县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

<sup>①</sup>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南岛的共产党组织曾经把一些县的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讨逆军，并成立指挥部。

后在优势敌军的反扑下，起义武装一部西渡赣江，一部撤到吉安东固等地坚持斗争。在万安起义影响下，从1月到4月，赣西南地区的峡江、永丰、吉安、零都、赣县、南康、信丰、寻乌等县的部分地区也举行了农民起义。此后，赣西、赣南起义武装先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第十五纵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湘东农民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湖南平江县委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留下来的平江、浏阳、岳阳三县游击武装合编成工农革命军游击大队，罗纳川任队长，余本健任党代表，在平江、浏阳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中共醴陵县委也组织了“工农军”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2月，平江、醴陵两县委以游击武装为骨干，动员数万群众攻打县城，遭受严重损失，罗纳川牺牲。此后，游击武装重新转入农村坚持游击战争。

**弋横农民起义** 1928年1月2日，由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人组成了中共江西弋阳、横峰、上饶、铅山、贵溪五县工作委员会。接着领导弋阳、横峰两县的农民万余人举行起义，并组织攻打横峰县城。受挫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连；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弋横起义的影响下，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的部分乡村也举行了起义。

**湘南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转战到湘南宜章，在中共宜章县委的帮助下，智取了宜章县城。接着，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坪石地区击溃来犯之敌独立第三师。在此期间，朱德和陈毅与中共湘南特委取得联系，决定发动湘南起义。随即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协助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军，夺取了这几个县的政权。湘南特委当即将湘南农军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安仁、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的部分农民，也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起义。从3月下旬起，湘粤两省敌人陆续调集7个师，向湘南起义军民反扑；加之中共湘南

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起义军不能在湘南立足。4月初，起义武装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桑植起义** 1928年2月底，周逸群、贺龙到达湖南桑植。中共湘西北特委决定，由贺龙出面召集了亲族和旧部的武装约3000人，组成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4月初，敌人向桑植进攻。新组成的工农革命军来不及整顿和改造，经梨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几次战斗，大部溃散。周逸群转到洪湖地区，贺龙收集失散人员，在桑植、鹤峰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闽西农民起义** 1928年3月4日，福建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领导后田农民举行起义。3月8日，中共平和县委领导长乐附近各乡农民近千人举行起义。6月25日，上杭县委领导蛟洋农民举行起义。29日，永定县委负责人张鼎丞等领导湖雷和东乡农民举行起义。8月，根据福建省委指示，龙岩、上杭、永定三县党委，将三县起义的农民武装集中到永定溪南，合编为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并组成了闽西暴动总指挥部，坚持闽西地区的武装斗争，但不久遭到了严重挫折。

**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武装起义方针，在陕西组织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主要的是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1927年10月15日，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陕西国民党军第十一旅一部在清涧起义，坚持三个月，到1928年1月失败。4月下旬，在陕军第三旅进行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唐澍，率领该旅1000余人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高塘镇，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司令。5月上旬，在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农民共万余人举行起义。从6月起，敌人出动3个旅至2个师的兵力，“进剿”起义军民。起义军在向洛南方向转移时，唐澍不幸牺牲，部队被打散。

**通海如泰地区农民起义** 1928年4月底5月初，中共江苏江北特委领导泰兴、如皋、靖江、海门、南通等县农民数万人举行起义，不

久在敌人反扑下，归于失败。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安徽阜阳、河北玉田、山东阳谷、浙江永康等地，领导了军队或农民起义，都遭到失败，有的保存下少数人员转入秘密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遍及12个省140多个县。在起义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给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给残酷镇压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回击，在起义中创建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群众领袖，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sup>①</sup>

### 第三节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反 “进剿”、反“会剿”的胜利

#### 一、井冈山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工农 革命军击破赣敌第一次“进剿”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等县。这个地区处于湘赣两省边界，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我们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这里有党的组织基础，受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较大，群众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尚保存

<sup>①</sup> 引自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536页。

着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各有60枝枪的农民自卫军。这里地势险要，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力量。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大多数卷入了这场混战，井冈山地区仅有战斗力很弱的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sup>①</sup>。前委和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工农革命军，于11月和次年1月，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建立了两县党的组织、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同时，帮助永新、宁冈、莲花、酃县恢复与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以适应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要严格执行“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本质，密切了军民关系。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使这两支部队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

1928年1月中旬，赣敌第二十七师以第八十一团和第七十九团的1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七十九团的1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新城，是当时宁冈的县城。敌人占据此点，对我坚持井冈山地区

---

<sup>①</sup> 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都是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前委决定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该敌。2月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经过充分准备，18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两团在赤卫队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对新城之敌发起突然进攻，经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次战斗，我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1个营，俘敌近300人，打破了敌之第一次“进剿”。战后，我军根据毛泽东的规定，对俘虏采取了不打不杀、医治伤兵、愿留者留、愿走者发给路费释放的政策。这对瓦解敌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我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到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

## 二、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击破赣敌 第二、三、四次“进剿”

(参见附图7)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前委改组为不能过问地方工作的中共第一师委员会，改任毛泽东为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与湘南起义军一起割据湘南。工农革命军离开以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随即被江西敌人占领。

从3月下旬起，广东和湖南的敌人陆续集中约7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郴县夹击我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朱德、陈毅为保存有生力量，率领部队和农军分两路从未阳、郴县向井冈山转移。这时，毛泽东已率部进至酃县以南地区，即以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亲率第一团进至汝城，阻击敌人追击部队。4月中旬，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先后率部到达宁冈砦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不久又缩



编为两个师，辖6个团和1个教导大队，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5月下旬，因给养困难，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师的番号撤销，军直辖4个团，即以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的第二十八团，以宜章农军编成的第二十九团，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的第三十一团，以袁文才、王佐部队编成的第三十二团，全军共6000余人。6月，按党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

井冈山会师，使具有北伐战争优良传统的两支精锐武装聚集到了一起，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第四军成立时，湘敌除在株洲、衡阳、宜章一带驻有重兵外，其第八军第一师占据着茶陵、酃县，赣敌第二十七师占据着永新、吉安、遂川等地。4月下旬，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第八十一团，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第四军军委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兵力分散之赣敌，以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4月底，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歼敌第八十一团大部，继于永新城附近击溃敌第七十九团1个营，迫使永新守敌逃往吉安，胜利地击破了赣敌的第二次“进剿”。

5月2日，毛泽东就第四军坚持井冈山斗争方针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提出：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军队，以促进湘赣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军委采取了对内加强军队的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方针，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这一方针对第四军取得反“进剿”和反“会剿”的胜利，巩固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重大意义。

5月中旬，赣敌第二十七师和第七、第九师各1个团共5个团，对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第二十七师师部率第七十九

团和第二十七团1个营进占永新城，主力近4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这时，朱德率第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1个营位于永新城西35公里处的小西江区，在得悉敌军主力已南渡禾水河，永新兵力的比较空虚的情报后，决心以第四军主力由小西江区东进，沿禾水河北岸大道奔袭永新城，首先歼灭敌军第二十七师师部，尔后协同我宁冈的部队，击破敌人的“进剿”。

我小西江地区的部队，根据上述决心向永新城急进，途中，在草市坳与由永新城西进澧田的敌第七十九团遭遇。我第二十八团即从正面发起攻击，第三十一团的1个营向敌侧后迂回，经过近两小时激战，将该敌全部歼灭。继而，我军又乘敌不备攻进永新城，再歼敌第二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七团1个营，击伤敌师长杨如轩。龙源口地区之敌4个团仓皇向吉安撤退。这一仗，我军以4个营的兵力歼灭敌1个师部、1个团另1个营，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枪300多枝（挺）、银元20余担，以及大量弹药和一部分被服、医药，胜利地击破了赣敌第三次“进剿”。

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的茅坪召开。会上，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再次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强调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第四军军委书记一职，由陈毅接任。此后，根据地内分田运动逐步展开，各项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

6月中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鉴于湘敌较强，赣敌较弱的情况，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sup>①</sup>的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

这时，江西敌军又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以第九师

---

<sup>①</sup> 参见1928年6月16日《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

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四次“进剿”。湘敌第八军第二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面对这种形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我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同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袭扰进犯永新之敌。赣敌进占永新城后，以3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于22日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23日上午，我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控制新七溪岭要地，打退左路之敌1个团的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我第二十八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之敌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至午后，将敌击溃，接着转入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直插龙源口，切断左路敌军的退路，进而协同我第二十九团等部将左路敌军歼灭于龙源口地区，乘胜进占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赣敌第四次“进剿”。这次反“进剿”，我军歼灭敌人1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缴获步枪400多枝，重机枪1挺，根据地人民赞扬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sup>①</sup>。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这是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 三、反对湘赣两省敌军第一次 “会剿”和“八月失败”

1928年6月，敌人在湖南的兵力约有10个军，其中4个多军驻在湘南和湘东的茶陵、酃县地区；在江西的兵力约有3个军，其中驻在赣西的不到1个军。湘赣两省敌军正在酝酿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会剿”。

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在盲动主义影响下，认为湖南反动势力十分

---

<sup>①</sup> “两只羊”，指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及他们的部队。

动摇、更加削弱，制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为实现此计划，于6月下旬两次写信和派人到井冈山，要红四军主力立即毫不犹豫地以郴县为中心的湘南发展。6月30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举行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湖南省委这一指示。湖南省委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湖南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其他条件也对我不利，红军主力不宜到湘南去，而应坚持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7月4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将会议的意见和决定报告了湖南省委，建议省委重新讨论和决定红四军的行动方针。

6月底，湘赣两省敌军约定，于7月7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7月4日，湘敌第八军第一、第二两师提前出动，由茶陵、酃县侵占宁冈砦市，接着进占新城。红四军军委决定以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由新城进占永新之敌，军部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威胁敌人后方，以调动进入永新之敌回援，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即将来犯之赣敌，以打破敌之“会剿”。

7月13日，我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攻克酃县。14日，进占永新之湘敌即经莲花撤回茶陵。红四军军委鉴于我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决定率部返回永新，会同第三十一团对赣敌作战。这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导扬部队向湘南冒进，军委也未能加以阻止。7月17日，军部和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即由酃县沔渡出发，开往湘南。

在湘敌撤回茶陵后，由吉安、安福地区来犯的赣敌第三军5个团和第六军6个团于7月15日进占了永新城。这时，毛泽东指挥第三十一团、永新赤卫队、暴动队，以四面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将敌11个团困在永新城及其附近15公里内达25天之久。后来，敌发觉我军主力已去湘南，遂发起进攻。我第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即从永

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随后，敌人进占莲花、宁冈。不久，赣敌发生内讧，第六军6个团仓皇退去，第三军5个团也退到永新城内。至此，湘赣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基本破产。

红四军军部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进入湘南后，于7月24日进攻郴县，击溃敌人第十六军两个团。当日黄昏，在敌反扑下，被迫撤出郴县。此时，第二十九团自由行动，跑回宜章家乡。军部率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余部约百人，向桂东转移。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考虑到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并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境地；井冈山根据地的现有军事力量又难以击破敌人新的进攻，决定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桂东迎还主力，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8月23日，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在桂东同第二十八团会合。毛泽东、朱德、陈毅即率领部队返回井冈山根据地。

在此期间，赣敌乘我主力还在湘南，由永新向我根据地进犯。我留守根据地的部队，撤向山区坚持斗争。根据地内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占领，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等横行无忌，地主豪绅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白色恐怖布满城乡，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湘南和湘赣边界两方面的失败，即“八月失败”，完全在于湖南省委不明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冒进湘南所造成的结果。

#### 四、击破湘赣两省敌军第二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恢复

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乘我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30日上午，湘敌第八军第一师在赣敌一部的策应下，向我井冈山上之黄洋界阵地发起猛攻。守卫在黄洋界的我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一部，凭借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顽强作战，打退了

敌人多次进攻。下午，正当敌人重新组织进攻时，我军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射击敌人在源头集结的部队。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已经回山，不敢再战，当夜撤回酃县。赣敌随之停止行动，据守各县城。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词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就是描述这个战斗的情景。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四军主力返回，打破敌人第二次“会剿”，恢复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9月8日，红四军军部率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返抵井冈山南麓之黄坳。这时，赣敌第十四旅仍占领宁冈新城和永新，自上犹尾追我主力的赣敌独立第七师5个营进占遂川，赣敌第二十一旅和第三十五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湘敌第八军3个师全部部署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为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首长决定仍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进占遂川的赣敌独立第七师。

9月13日，红四军主力4个营，对遂川之敌发起进攻，歼其一部，余敌退守赣州。24日，泰和敌军第二十一旅1个团，配合退至赣州的独立第七师部队，向遂川反攻。我军主动撤出遂川转兵北上，于10月1日，出敌不意攻击宁冈新城的赣敌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歼其1个营，余敌退向永新。刚进至遂川的敌第二十一旅1个团，绕道泰和增援永新。我军又挥师南下，于10月13日再攻遂川，敌弃城逃跑。11月2日，泰和敌军第二十一旅两个团和赣州敌军独立第七师主力，又向遂川进犯。我军再次主动撤出遂川，于11月9日，对再占新城之敌第二十七团发起猛攻，将该敌重创于新城和龙源口地区。此后，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敌军的第二次“会剿”即被打破。

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红四军利用根据地内作战的有利条件，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连战皆捷，共俘敌约500人，缴枪400余枝，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原有地区。在此期间，原湘军第八军的营

长毕占云和张威各率湘军一部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10月4日至6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sup>①</sup>的决议。决议在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状况之后，阐明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决议还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1928年4月至7月4个月所取得的胜利，“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边界第二届特委，谭震林为书记。11月6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11月14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军委，朱德为书记。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除向党中央报告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割据地区的组织状况之外，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报告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

报告还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报告还就土地问题、政权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等，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 五、平江起义和红五军主力转到井冈山。

### 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反对湘赣两省敌军第三次“会剿”

（参见附表4、5）

1928年7月，驻湖南平江等地的国民党军一部，在我党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即平江起义。

1928年春，我党在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中秘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该师第一团团长沙德怀也在这时参加了共产党。不久，独立第五师从南县调到平江地区担负“清乡”任务。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恢复湘鄂赣边特委，并向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必要时举行起义。7月中旬，敌人发现该师第三团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下令立即逮捕。在此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22日在平江城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镇的第三团第三营一部，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随营学校，也先后起义，并赶到平江同第一团会合。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共2000余人，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平江起义，对湖南反动统治阶级，是一个重大打击，同时壮大了红军力量，推动了平江以至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

平江起义后，红五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但在平江长寿街、黄金洞和万载大桥等地作战失



利，部队减到700多人，缩编为5个大队。10月，红五军和湘鄂赣边一些县的游击队合编为3个纵队，总兵力近1000人。这时，湘鄂赣三省敌人举行“会剿”。红五军在突出敌人包围圈后，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指示精神，以黄公略率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游击战争，主力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同红四军会师。

在红五军到达井冈山根据地以前，湘赣两省敌人就开始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初，敌人计划以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由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敌情，而且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前委从1928年11月开始，就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反“会剿”的准备。1929年1月上旬，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传达、讨论了党的“六大”决议，同时进一步讨论了反“会剿”的方针和部署。会议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sup>①</sup>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先求打破敌之封锁，解决经济困难，在敌“会剿”开始后，则在外线作战，配合内线部队打破敌之“会剿”，以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军直、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离开井冈山，经大汾、营前、崇义向赣南出击。敌人发觉红军这一行动后，以进到遂川和资兴的第一路、第五路共两个旅和驻赣州的第十五旅等部追击红四军主力；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共约3个旅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

---

<sup>①</sup> 参见1929年1月14日《湘赣边特委给湖南省委信》。

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以优势兵力对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阵地发起猛攻。我坚守井冈山的军民与敌激战四昼夜，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1月30日我黄洋界、八面山阵地相继失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滕代远按照边界特委的决定，率红五军主力突破敌之封锁线，开往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和红五军一部则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游击战争，继续反对敌人的“清剿”。到2月底，蒋桂两派军阀战争已揭开序幕，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部队大部撤走。我坚持井冈山地区斗争的军民乘机反攻，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本地区。湘赣两省敌军的第三次“会剿”又告破产。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率领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打破了敌人的多次“进剿”和“会剿”，有效地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规律，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

#### 第四节 赣南、闽西地区红军 游击战争的发展

赣南、闽西地区，包括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南部共30多个县，这里山峦重迭，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回旋区域广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这里党和群众基础较好，赣西、赣南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和第十五纵队，已发展成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并建立了小块的秘密苏区；闽西起义建立的游击队还在坚持斗争。这一切，为发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一、大柏地、长汀战斗的胜利。红四军 割据赣南、闽西战略计划的制定

(参见附图8)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在大庾遭到赣敌第二十一、第十五旅等部的袭击。为了摆脱险境，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北出赣州计划，率领部队沿赣粤、赣闽边界挺进，于2月9日到达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区。这时，尾追我军之赣敌第十五旅两个团由澄江进到瑞金。红四军前委决定乘该旅态势孤立，在大柏地附近地区歼灭该敌。红四军各部按照前委作战部署，以大部兵力在敌必经之大柏地附近谷地两侧，荫蔽占领有利阵地，以一营兵力于隘前警戒。10日，敌进至大柏地以南隘前南侧时，与我警戒分队接触，我警戒分队边打边退，将敌诱至大柏地附近。次日晨，我军主力向大柏地之敌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歼灭该旅大部，俘虏团长以下800多人，缴枪800余枝。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使赣南的党和群众受到巨大鼓舞。战后，红四军挥师北上，经宁都到达吉安之东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胜利会合。

这时，井冈山主要阵地已失，红五军主力已向外线转移，原定的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会剿”的计划，已无实现可能。同时，赣敌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分由雩都、永新进逼东固。在此情况下，红四军前委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于25日率部离开东固，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1日进到福建长汀西南的四都。

盘踞长汀之敌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急以1个团于长汀城南之

长岭寨山地设防，另以1个团于13日由长汀进攻四都。我军积极迎击该敌，在四都以北渔溪附近歼敌一部，迫使残敌退守长岭寨。14日，我军进攻长岭寨，以一部兵力从左翼迂回敌之侧后，主力从正面攻击，经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缴获步枪500枝、迫击炮3门和大批资材。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闽西人民的斗争热情。

在此期间，蒋桂战争<sup>①</sup>已经揭开序幕。蒋介石为从桂系军阀手中夺取湖南、湖北两省地盘，抽调驻赣之正规军大部进至九江一带。红四军前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3月20日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此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红四军、红五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应“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计划，并且强调指出：“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长汀战斗后，红四军进行了整编，以原第二十八团、特务营、第三十一团为基础，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在瑞金同由安远赶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

4月3日，红四军前委接到党中央2月7日指示信。4月5日，前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央2月7日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报告在分析南方数省敌我形势时指出：粤湘两省敌军强大，湘省更因我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闽浙三省敌军最弱，我党的盲动主义错误较少，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尤以江西西部、南部、东北及西北部发展革命的

---

<sup>①</sup> 蒋桂战争，指蒋介石同李宗仁之间于1929年4月发生的军阀战争。

条件为最好，建立了或正在建立红军游击队和小块根据地，这就造成了对南昌包围的形势。报告还全面叙述了红四军三年来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同时向党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红四军前委提出的这一战略计划，其基本精神是要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

## 二、赣南苏区的建立和闽西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

（参见附图 9，附表 6）

红四军前委为了实现“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于 4 月 11 日在雩都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协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恢复和发展以井冈山根据地为基础的湘赣边苏区；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则在瑞金、雩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等县，执行消灭地主武装、发动和组织群众等任务。红四军在赣南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斗争，先后攻占兴国、宁都两城，歼敌数百人，兴国、雩都、宁都等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相继建立，其他一些县、区群众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赣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5月，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随即以3个旅分由赣州、泰和、临川向零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于赣南地区。此时，原驻龙岩地区之敌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和驻漳州地区之敌暂编第一师大部，正在潮汕地区同粤军作战，闽西敌军力量薄弱。红四军前委为了避开赣敌进攻锋芒，决定立即挺进闽西，发展闽西的游击战争，创建苏区。

5月中旬，红四军从瑞金出发，经濯田、新泉、庙前等地，于22日进至龙岩以西之小池。23日，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一举攻占该城，歼敌两个营大部，俘敌200余人。当日，我军撤出龙岩，于26日进占永定。

在红四军转向永定后，敌军重占龙岩。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从坎市出发，再次攻打龙岩，敌军弃城逃跑。

6月初，敌第一混成旅主力回援闽西。红四军随即撤出龙岩、永定，向西及西北转移，先在上杭以东的白砂歼敌第二混成旅残部1个团，继占上杭东北的旧县、南阳等地，使长汀、连城、上杭、永定、龙岩五县边界地区全部成了红色区域。10日，我军主力集结新泉、才溪进行休整。17日，前委决定奔袭刚返回龙岩之敌第一混成旅。19日拂晓，我军乘敌不备，在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突然从南、西、北三面向龙岩城发动猛攻，迅速突入城内，激战到下午2时左右，除旅长陈国辉只身逃脱外，敌第一混成旅2000多人全部被歼。我军第三次占领龙岩。

在红四军连续胜利的鼓舞下，闽西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闽西苏区基本建立起来。闽西特委领导的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为正规红军，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6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但由于领导者的认识不一致，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会后，毛泽

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 三、反对赣闽粤三省敌军第一次 “会剿”和进军东江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受到很大威胁。6月间，蒋介石命令驻赣闽粤三省正规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举行“会剿”，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会剿”军总指挥。其部署是：闽军暂编第一师主力从漳州向龙岩进攻，粤军第七旅从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赣军第十二师和第七师第二十一旅从长汀向新泉、古田担任主攻。

三省敌军由于派系不同，行动很不协调，容易为我所乘；闽西的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可以有力地支援我军作战。据此，红四军前委于6月下旬决定：采取“诱敌入赤色区，击破一面”<sup>①</sup>的方针，并以较弱的闽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打破敌之“会剿”。

7月下旬，赣敌第十二师两个团进至长汀，第二十一旅由长汀到了河田，闽敌暂编第一师一部进抵龙岩以南的适中。这时，红四军前委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认为在闽西无法打破“会剿”，遂改变原定方针，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8月2日，东进部队由白沙出发，于8日攻占漳平，歼敌一部。中旬，向闽中大田、德化前进，准备渡过闽江，到赣浙皖边界游击。

闽中地区，敌人地方反动武装力量较强，我党在这里没有群众工作基础，红军不易筹措给养，加以天气炎热多雨，部队病员日增。8月下旬，红四军前委放弃到赣浙皖边界游击的计划，决定返回闽西苏区。

在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苏区后，闽敌暂编第一师随即以其第一旅进占漳平，第二旅进占龙岩。8月29日，红四军主力在回归途中于溪

<sup>①</sup> 参见红四军代表1930年5月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作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南歼敌近1个团，次日进占漳平再歼敌1个营，驻龙岩之敌闻风而逃。在此期间，第一、第四两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这样，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会剿”，就被打破了。

为了巩固与扩大苏区，红四军前委决定攻打上杭。9月21日拂晓，我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对上杭之敌发起猛攻，迅速突入城内，全歼守敌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旅2000余人。接着，我军攻占武平，永定守敌弃城逃走。

在上杭，红四军召开了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三天，仍无结果。

是年秋，国民党各派军阀内部矛盾重新激化。9月，原粤系军阀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反蒋，并率所部第四师经湘西向广西开进，准备联合桂系军阀李宗仁所部，进攻依附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部，夺取广东。

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接到党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据此，前委决定：留第四纵队在闽西苏区；军部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开向广东东江地区作战。10月19日和20日，我军由上杭、武平出发，在闽粤边界的石下坝、松源等地击破敌人拦阻，于25日乘虚占领梅县。26日，三河坝、松口之敌三个团向梅县反扑，我军撤到梅县东南的南坑、马图山区荫蔽待机。31日拂晓，我军再次进攻梅县，敌两个团顽强据守，我军屡攻不克，被迫撤出战斗。此后，前委判断敌人将向东江地区增兵，不宜继续在东江地区作战，遂决定撤回赣南苏区。11月上旬，全军到达寻乌、安远地区，23日转至闽西长汀。

红四军主力在东江行动中，减员较大。闽西苏区也遭到一定损失。实践证明，中央关于红四军挺进东江、向潮梅发展的指示，是不切实际的。



## 四、古田会议的召开和无产阶级 建军路线的确立

红四军党内在建军原则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29年10月22日，红四军前委收到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在信中，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四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些指示，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接着，前委根据党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

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为委员。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规定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决议详细列举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方法，并号召大家起来彻底加以肃清。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做了。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五、赣西南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离开赣南转战闽西后，江西敌军除了以四个团兵力在赣闽边界监视红四军外，以第三十四旅第六十七团在靖卫团配合下，对赣西南地区<sup>①</sup>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和东固等苏区，实施“进剿”和“清乡”。赣西、赣南特委领导红军和革命群众，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战术，利用赣西南区域广大和群众基础良好的有利条件，打击分散“进剿”之敌军，对靖卫团则实行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政策。苏区斗争仍然坚持党和群众组织及政权不公开的“秘密割据”形式。由于指导正确，红军不仅给了“进剿”的敌军以沉重打击，而且组织了若干支游击队，苏区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并与一些靖卫团建立了联系。

9月至10月，赣西南地区的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赣江东岸广大地区积极开展对靖卫团的进攻；赣西游击第一、第二大队合编为赣西游击队第三纵队，在赣江西岸安福、吉安、峡江边界游击。经过两个月战斗，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已发展到近2000人1100余枝枪，赣西游击队第三纵队与敌军起义的1个骑兵连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游击队，合编为新的赣西游击第一大队；安福、吉安、峡江边界游击队，合编为新的赣西游击第二大队；此外，赣西又组织了农民赤卫军第一至第九纵队，赣南也开始组织游击队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九纵队。

11月开始，赣西南红军和游击队发起了攻势作战。11月15日，吉安八乡靖卫团100余人枪，在总指挥罗炳辉（共产党员）率领下起义，

<sup>①</sup> 这时的赣西南地区，是指赣西特委领导的以吉安为中心的邻近数县和赣南特委领导的赣南数县。

先是编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不久编入独立第四团。11月下旬，第四团攻克了万安城，歼灭靖卫团一部；12月10日，第二团和第三团取得了峡江里赫战斗胜利，击溃敌军1个营，缴枪130余枝，俘敌100余人。同时，赣西游击第一大队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

1930年1月，赣西特委遵照中央指示，在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支持下，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和湘赣苏区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六军（不久改称为红军第三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后由陈毅、蔡会文相继接任）。在此期间，赣西赤卫军各纵队开始把武装骨干编成特务队，后一部编为红军第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赣南游击队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九纵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来编为红军第二十二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

## 六、反对赣闽粤三省敌军第二次 “会剿”。水南战斗的胜利

（参见附图10）

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军以14个团，对闽西苏区举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就地各个击破敌人，并准备以闽敌或赣敌为主要作战对象。据此，前委和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在小池准备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进，筹措给养。1月5日，当朱德率部进到庙前时，敌人的“会剿”已经开始。赣敌分别从长汀、上杭进到上杭以北的涂坊、旧县，准备进攻新泉、庙前；闽敌由龙岩、坎市进到龙岩以西的小池、灌阳地区，准备进攻古田；粤敌已推进到永定、武平地区。1月6日，我军主力到达连城，敌人跟踪向连城进攻，隔断了我军主力同前委和第二纵队的联系。为威胁敌“会剿”主力军赣敌第十二师后方，调动敌人回援赣

南，我军主力于9日由连城出发，经宁化于16日占领广昌。前委和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在小池地区给闽敌以打击后，即从古田地区北进，经连城以东的姑田和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县境，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于1月下旬在广昌的东韶同主力会合。

红四军离开闽西后，闽西特委为巩固和发展闽西的斗争，将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武平和长汀南乡等赤卫队，依次编为红军第一至第五团。不久，福建敌人发生内讧，进攻闽西苏区的福建敌军纷纷后撤。进入福建的江西敌军也因后方受到我军威胁，留少数兵力驻守长汀、上杭等城，主力撤回江西境内。粤敌亦相继撤走。闽西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城。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为主席。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将5个团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红四军西进赣南时，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敌军第七师已调往皖北，江西全境敌人只有第十二师、第十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1个旅。而这时赣西、赣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已大为增强。红五军主力在赣西吉安、泰和地区；红六军在吉安、泰和段的赣江两岸积极活动。

红四军前委为了进一步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2月7日在吉安东南的陂头召开赣西、赣南特委和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赣南特委代表未赶到；红五军军委委托红六军代表兼代）。会议认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猛烈扩大苏区和革命武装力量，深入土地革命，为夺取江西全省而斗争。在军事行动上，会议根据赣西地区的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会后，红四军由藤田地区经水南向吉安推进，准备首先夺取吉水。

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令驻吉安之第五十师第一四八旅加强防御，并从湖北调独立第十五旅到江西，

令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主力和第五十二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十二师集中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动进攻。独立第十五旅经南昌、樟树镇，于2月20日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之线。红四军前委根据这一情况，果断地放弃原定计划，立即率部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sup>①</sup>，尔后消灭之。敌独立第十五旅发现我军后撤，随即兵分三路，向我军进逼。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进至值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

面对这个情况，红四军前委决心乘该旅兵力分散，态势孤立之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该敌。24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之侧后，牵制右路、中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进至水南之左路敌军，经半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次日拂晓，我军以一部兵力插入敌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敌，经一天激战，歼其大部，残敌逃往吉安。水南、值夏、富滩之战，我军歼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共俘敌1600余人。此次战斗，我军后退一步，待敌弱点暴露后，集中兵力先打敌之一路，而后转移兵力再打敌之另外两路，迅速歼灭敌之大部。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3月15日，赣西南特委组成，刘士奇为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曾山为主席。

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水南地区休整十余日后，经东固到兴国。红六军第二纵队留兴国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于16日围攻赣州。敌第十二师1个团和地主武装共数千人顽强固守，我军为避免陷入被动，遂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南康地区。此后红四军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傍着发展”<sup>②</sup>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至6月上旬共消灭敌正规军与靖卫团1000多人，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

---

① 参见1930年5月红四军代表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作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② 参见1930年3月18日《前委通告第三号》。

群众，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使寻乌、安远、雩都等县苏区连成一片。6月初，红四军进入闽西，占领武平、长汀城。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毛泽东根据新的斗争经验并针对红四军内存在的问题，于1930年1月5日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了林彪等人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的悲观思想，和不承认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不愿用艰苦的工作去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那种“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强调，必须树立“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这封信，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后，转战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在当地党、革命武装和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下，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苦努力，打破敌人多次进攻和“会剿”，消灭敌人1.2万余人，创建了地域广阔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些胜利，为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实现从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为尔后形成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五节 湘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参见附图11)

湘鄂西地区主要指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地区。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领导了多次农民起义，开展了游击战争。经过近三年的艰苦斗争，创建了红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二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创建了包括湘鄂边、洪湖、襄枣宜、巴兴归四个地区的湘鄂西苏区。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区之一。

### 一、湘鄂边地区

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山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较弱，地方武装和“神兵”（迷信武装）很多，其中有的人受过革命的影响，有的还是贺龙的亲友或旧部。1928年4月，桑植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被敌打散后，贺龙收集失散部队共300余人，在桑植、鹤峰两县边界进行游击活动，逐步扩大到1500余人。7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湘西北特委改组为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后改称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为书记；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8月下旬，红四军根据湖南省委的要求，东进石门，支援石门南乡的农民起义。9月上、中旬，红四军连遭敌人第十四军和石门团防<sup>①</sup>的袭击，部队又大部溃散，退回鹤峰东南的堰垭地区。

在堰垭，湘西前委认真总结了武装斗争连遭挫折的教训，认识到：利用个人关系集合起来的武装，还不是真正的革命武装，如不加以彻底改造，就不可能巩固，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石门失败，主要是孤军冒进的结果。据此，前委首先着手进一步整顿部队，清除了投机分子，建立了基层党、团组织，加强了基层领导骨干。经

<sup>①</sup> 团防，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过整顿，全军剩下91人，72枝枪，但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随后，前委即率红四军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鄂西咸丰、利川、建始地区游击。1929年1月上旬，乘驻鹤峰之敌正规军调走之机，攻占鹤峰县城和太平镇等地，消灭了一股团防。此后，在前委的领导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农民群众反对地主剥削的斗争蓬勃展开，农民警卫队（群众武装）也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红四军也发展到1000余人。从1月起，红四军集中在堰垭、红土坪地区进行整训，学习中共“六大”决议和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建军经验，开展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整顿部队中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部队整训期间，前委收到了中央1月6日来信。中央在信中要求红四军把部队分成数十人一队的队伍，分散游击；并要求贺龙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前委认真讨论了中央来信，认为根据湘鄂边的实际情况，不宜分散游击，也不同意贺龙离开部队，并把上述意见报告了中央。前委还研究了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认为必须加强农民运动和群众武装的建设，以巩固根据地的政权；要以“警卫队担负后方防守，红军担任前方作战”；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红军必须以“避免〔开〕大的敌人，夺取团防武装”为主要作战目标；要集中力量，“全力解决某一方面的敌人”<sup>①</sup>，依托山区，逐步向平原发展。

1929年3月，红四军在农民警卫队的配合下，击溃了鹤峰、桑植、五峰三县团防共3000余人的进攻，歼其一部。6月，乘虚再占桑植县城，并将县城周围的反动武装大部消灭或击溃。至此，桑植、鹤峰两县的苏维埃区域连成了一片，湘鄂边苏区初步建成。

7月初，敌湖南第一警备军第三团一部由永顺进攻桑植，并以大庸、桑植团防在桑植东南和东北方向策应。红四军首长决定，以少数

---

<sup>①</sup> 参见1929年3月8日《湘鄂西前委报告》。



兵力阻击桑植、大庸团防，主力集中澧水东岸地区，诱敌渡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而消灭之。部署是：第二团于澧水东岸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军主力荫蔽占领县城北侧高地，待机出击。当该敌由南岔渡过澧水，进至吴家坡一线时，我第一、第四两团和军部特务连突然出击，将敌压迫到澧水岸边，歼其大部，残敌与桑植和大庸团防仓皇撤退。

7月中旬，敌湖南警备第一军以第三团主力和第一、第二团各一部，在大庸、桑植、慈利团防的配合下，分五路再次进犯桑植。红四军首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方针，在桑植城及附近地区求歼该敌。为了便于我军攻击，前委动员军民拆除了桑植东、北、西三而城墙。14日，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敌军主力，集中主力在桑植城东部黄金塔、大泉寺地区，首先击溃桑植、慈利团防的进攻，尔后立即撤出战斗，准备歼灭可能由赤溪渡过澧水进犯桑植之敌第三团等部，并作出以下部署：以一部兵力位于城南的西界、茅岩地区，准备断敌退路；主力埋伏于城北八斗溪、梅家山、白家冲地区，待机歼敌。15日晨，敌先头1个营由桑植西南的赤溪渡过澧水，9时许进占桑植城，主力随后分批渡河前进。我军乘敌兵力分散，集中4个团发起反击，首歼城内之敌大部；接着奋起直追，将敌压迫到澧水岸边，战至下午4时，敌大部投降，一部溺死于水中。这次战斗，红四军共歼敌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取得了建军以来的最大胜利。

南岔、赤溪两战胜利后，湘鄂边苏区得到了初步巩固，红四军扩编为5个团另1个特务营，近4000人。

9月下旬，驻桃源之敌第一五四旅和桑植、慈利的团防向桑植进攻。红四军在反击中受挫，被迫撤离桑植城，向北转移。10月11日在樟耳坪遭敌袭击，伤亡300余人。此后，红四军转向鄂西发展，12月攻占长阳县城，协助长阳县委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一支武装；随后消灭了长阳、巴东、建始、恩施等县边界的一些团防，扩大了湘鄂边苏区。

1930年2月，湘鄂西前委根据中央军事部关于“湘西红军如果在鄂西更便利发展，或武汉更混乱时，可与鄂西红军会〔合〕由公安石首等处向长江下游推进，向汉川、汉阳发展”<sup>①</sup>的指示和鄂西特委的要求，率领红四军东进，寻机同洪湖地区的红六军会师。从2月到5月，红四军先后三次东进，经过四个月的艰苦转战，打破敌人的追堵，终于在7月上旬进至公安，同红六军会师。

湘鄂边区游击战争的几次大起大落表明：在中国，要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有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还要有一套适应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中共湘鄂西前委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使革命战争从挫折走向胜利。在湘鄂边成长起来的红四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

## 二、洪湖地区

洪湖地区位于武汉、沙市之间，湖泊、河流交错，物产丰富，群众条件较好。1928年初年关斗争结束后，洪湖地区的游击队分赴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军阀李宗仁打败唐生智，占据湖北、湖南后，不断对洪湖地区举行“清乡”，中共鄂中、鄂西两特委相继被破坏，游击队的数量和活动区域越来越小，处境十分困难。周逸群从湘鄂边到达洪湖地区后，集中石首、公安、华容、鄂中游击队全部100多人枪，于5月20日乘敌不备，袭击沔阳东南的峰口，全歼当地团防。不久，在敌第十八军1个营会同沔阳、监利、潜江团防的围攻下，游击队分散在石首、华容、监利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6月下旬，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西特委在宜昌重新组成，周逸群为书记。不久，鄂中特委合并于鄂西特委，原属南华安特委领导的南县、华容、安乡三县也划归鄂西特委领导。新的鄂西特委由城市转到农村，扎根于农民群众之中，建立秘密农会，发展党的组织和群

<sup>①</sup> 参见1929年11月23日《中央军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

众武装，镇压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敌大举“清乡”时，则以“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若干小块的秘密苏区已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建立，游击武装也有所发展。

1929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在白露湖畔的沙岗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决议，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决定在工作基础较好的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发展游击战争。会后，特委集中各县游击队编为游击大队，在监利、江陵境内积极进行以打击团防为主的游击活动，17天内打了21次胜仗，初步打开了局面。3月下旬，游击大队根据特委规定的“分散游击，集中指导”<sup>①</sup>的原则，所属两个中队分赴石首、监利游击，先后攻克石首县城和监利东北的毛家口，歼敌第五十师两个连和团防一部，缴枪200余枝。

6月下旬，监利、江陵两县团防联合进攻江陵沙岗。我游击大队集中全力，将敌击退，毙敌80余人。在我军连续胜利的影响和我党兵运工作同志的鼓动下，驻新堤（今洪湖）之敌江防大队60名士兵起义，加入了我游击大队。

经过沙岗会议后4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洪湖西岸、白露湖畔、石首的江北部分和华容东山四小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建军经验，总队建立了政治部，中队以上各级设立了党代表，中队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鄂西特委总结了过去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游击战争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指导原则，明确规定：当敌内部矛盾激化时，我游击队应积极向外发展；当军阀战争停止，敌之正规军协同团防“清乡”时，我游击队应保存实力，荫蔽在群众中，伺机袭击敌之弱点，避免同敌人打硬仗。上述作战原则的确立，对发展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sup>①</sup> 参见周逸群1929年8月《鄂西农村工作》。

8月，敌人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各一部开始对洪湖地区“清剿”。游击总队利用敌人行动不协调的弱点，在石首歼敌1个连。9月，敌人新编第一师和第五十师各一部大举“清剿”监、沔地区。鄂西特委决定由段德昌率第一、第三两大队留洪湖沿岸地区，周逸群率第二大队到江陵、石首、华容地区，均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利用河湖港汊，进行游击活动。11月24日，石首团防和藕池商团300余人向石首的小河口进攻。我第二大队与赤卫队乘敌登岸后大肆抢劫、建制混乱之机，勇猛出击，全歼该敌。与此同时，第一、第三两大队先在监利以东的聂家岭击溃敌军1个团，继克沔阳西南的三官殿，歼敌1个连，缴枪100余枝。此后，游击总队集中兵力向江陵发展，连克敌军据点数处，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至此，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的大部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都成了苏区，原来几块被分割的苏区已基本连成了一片，游击总队自身也得到迅速扩大，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

12月下旬，中共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任务与各项工作方针，特别是讨论了游击战争和红军工作。大会通过的《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游击战争，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红军是目前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红军的每一兵士，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党和红军必须“在游击当中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渐渐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并要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忠勇的工农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中〔的〕质量。”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决议案提出：“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我们不应冒险去攻”；“敌人大部队向着我们进攻，他们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应当去冲突，应绕到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敌情不明，我们也要慎重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的，我们不应冒险去打，但绝不是无目的的逃跑主义；有解决可能的反动武装，一定要解决”；“要在集中指导下分散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

打击敌人”。大会还提出，要积极组织群众武装，要对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需要。这次大会，对发展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和苏区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继而又改编为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由旷继勋接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

1930年初，蒋介石集团同冯玉祥、阎锡山两集团之间正在酝酿大战，鄂西地区敌军有所减少。鄂西红军以夺取苏区内的敌占城镇，巩固和发展苏区为目的，展开进攻作战，至4月，基本解放了苏区内的敌占城镇，建立了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华容、石首6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已发展到近20万人，苏区外的游击区域已发展到17个县境。在此形势下，鄂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鄂西联县政府。洪湖苏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的建立，标志着苏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红四军东进期间，红六军曾计划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的机会，向公安、松滋发展，迎接红四军；后来根据湖北省委下达的进攻武汉的命令，5月连续攻占沔阳、汉川县城和仙桃、系马口等地。当前锋到达武汉附近的蔡甸（今汉阳）时，发现武汉敌人防守甚严，完全没有攻占的可能，便主动回师洪湖地区。6月，红六军渡过长江，首先攻占石首县城，7月1日继占公安县城（今南平），7月4日同东进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起来的。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建立游击战争的坚实基础，制定了适合洪湖地区条件的游击战术，开创了在湖泊水网地区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的范例，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

### 三、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和 巴(东)兴(山)(秭)归地区

湖北北部的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多为丘陵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迷信武装和土匪为害甚重，群众易于发动。枣阳起义后，中共鄂北特委把部分农民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在襄枣宜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28年5月，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赤卫队发展到500余人，并在襄枣宜边界建立了一块游击根据地。

9月，敌人第十七军一部进攻我襄枣宜游击根据地。鄂北总队和赤卫队多次对敌反击，未能获胜。不久，领导者错误地解散了部队，掩埋了枪枝，只留下赤卫队同敌人周旋。结果，赤卫队到12月间也失败了。

武装斗争失败后，中共鄂北地区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同志，一部分被派到敌人团防中做兵运工作；一部分深入到襄枣宜三县边界的农民群众中，领导反苛捐杂税、反土匪的斗争，并在斗争中重建革命武装。1930年4月，组成了鄂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重新开展鄂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同年5月，中共鄂北特委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鄂北地区敌人兵力减少的机会，领导第十三大队相继攻占襄枣宜边界和钟祥北部大片地区，消灭了一些反动武装，缴枪数百枝，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枪。7月，扩编为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张香山任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区乡赤卫队也普遍组织起来，拥有几百枝枪。襄(阳)东、宜(城)东、枣阳、枣(阳)南四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襄枣宜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湖北省西部的巴东、兴山、秭归地区属于山区，社会情况和襄枣宜地区大致相同。1928年3月，中共巴东县委领导群众反抗国民党巴东县政府征收军饷，并组成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袭占巴东县城，成立了巴东县人民委员会。5月，巴东游击队遭到长江南岸反动“神兵”

和团防的反扑，放弃巴东县城，退到江北。此后，游击队虽曾打退敌之追击，并毙敌100余人，缴枪80余枝，给了向我“进剿”之敌独立第五师1个团和江南团防以打击，但不久，就在敌人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

1929年冬，新成立的中共巴兴归县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重新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县委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一举歼灭了罗溪团防，缴枪30余枝。群众纷纷参军，游击队扩编为鄂西游击大队。此后，游击大队在巴东的江北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30年3月初，鄂西游击大队袭占兴山县城，全歼城内团防；继在兴山、秭归边界地区打击团防和反动“神兵”，部队发展到200余人。6月，游击大队整编为红军独立第四十九师，刘子泉任师长（后为黄大鹏）。同时，巴兴归苏维埃政府成立，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建立起来，巴兴归苏区初步建成。

襄枣宜和巴兴归地区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两地区的党组织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深入发动群众，使游击战争得到恢复和发展对洪湖和湘鄂边的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 第六节 鄂豫皖边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参见附图12）

鄂豫皖边地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域辽阔，地形险要，大别山横贯其间，物产比较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该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红枪会”、“大刀会”等迷信武装则较普遍。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建立起红军第一军和鄂豫皖苏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区之一。

### 一、鄂东北地区

1928年1月至4月，由黄麻起义武装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

军，在黄冈、罗田、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和民团<sup>①</sup>，但在敌第十八军和地主武装的“清剿”下，处境十分困难。

第七军和中共当地组织的领导人，从4个月的游击中，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较稳固的立足点。1928年5月，第七军和地方党领导人在黄安清水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部队展开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的光裕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地区，积极创造以柴山保<sup>②</sup>为中心的根据地，并据以逐步恢复黄麻起义地区的工作。这次会议，是鄂豫皖边区红军革命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后，第七军即进入柴山保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组建具有政权性质的农民委员会。同时，第七军在河南湾、天台山、韩家老屋等地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并争取了哗变的国民党军队1个连的半数参加我军。7月，拥有20万人口的柴山保苏区初步建成。部队发展到120余人，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

1928年10月，中共鄂东特委组成，王秀松任书记。鄂东特委纠正了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的错误，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sup>③</sup>，巩固与扩大现有割据区域，在东起皖西英山（今属湖北省）、霍山，西至信阳以南的武胜关，依托大别山造成武装割据局面的方针，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根据上述方针，红三十一师两个大队即由柴山保到黄麻起义老区恢复工作，先后击溃和消灭了4个民团，击退了由麻城进攻之敌1个营。到年底，黄麻两县的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大部重新为我控制，柴山保苏区向西向北也有所扩大。

1929年2月下旬，敌人第十八军两个团自黄安、麻城北上，进攻

① 民团，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② 柴山保，原属河南省光山县的一个地区，今新县陈店乡。

③ 参见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何玉琳1929年5月7日《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柴山保苏区。红三十一师沿黄、麻两县边界向敌侧后进击，消灭了一些“清乡团”<sup>①</sup>；接着，利用蒋桂战争爆发，敌人第十八军调出鄂豫边界的机会，协同赤卫队消灭了数股民团。在两个多月中，红三十一师共缴枪170余枝，部队发展到近400人，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专做群众工作的宣传队。

1929年4月至6月，鄂东特委两次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师委联席会议，将鄂东特委改组成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通过了关于形势与任务、关于扩大游击战争、关于加强政权建设等决议。其中《关于扩大游击战争决议案》规定：红军要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要加强红军和赤卫队的政治工作，使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是一个武装士兵，而且是一个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要纠正部队中的散漫倾向和盲动情绪，等等。这两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发展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 二、豫东南地区

1928年夏，中共商城县委根据河南省委和豫东南特委的指示，在商城南部成立南邑区委，进行起义的准备。不久，商城县委遭敌破坏，南邑区委改归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随即在商城南部、罗田北部、麻城东北部地区成立特别区委。1929年5月初，特委派红十一军军长兼第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等一批干部到商南参加领导起义。吴光浩在途中不幸牺牲，部分干部到达商南，并参加了起义。

5月6日，在特别区委领导下，商南起义开始。打入敌人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团结一部分进步团丁，同我党领导的秘密农民武装一起，解除了了家埠、李家集、吴家店、白沙河等地部分民团的武装，

---

<sup>①</sup> 清乡团，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一夜之间，控制了商南和、乐两区。9日，起义武装到斑竹园集中，组成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辖第九十七、第九十八两团，共100余人枪。

红三十二师成立后，先后消灭李家集、南溪等地的残余反动武装，打退了商城民团的进攻，给了双河、赵家河等地民团以歼灭性的打击，进而向东占领了安徽六安金家寨，新成立了一支游击队，还争取了国民党军1个连起义，组成了第一〇〇团。6月中旬，商南地区和红三十二师划归重建的中共商城县委领导。此后，红三十二师打退了周围反动武装的多次进攻，自身也发展到300多人，以南溪和吴家店为中心的纵横各约六七十里的豫东南苏区初步建成。

### 三、粉碎敌人对鄂豫边界的三次“会剿”

1929年6月下旬，敌人开始对红三十一师和柴山保苏区举行“会剿”。其部署：独立第四旅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向北进攻，驻光山、潢川的暂编第二旅1个营和反动“红枪会”数千人在北面堵截，驻麻城、黄土岗的第十三师补充团及部分民团在东面策应，企图围歼红三十一师于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地区。进攻开始后，南路之敌很快占领黄安的七里、紫云等区，北路之敌进入柴山保地区。中共鄂东北特委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以群众武装广泛袭扰东、南两面敌军，红三十一师由副军长兼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首先反击战斗力较弱的北路之敌。7月上旬，红三十一师在万余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占白沙关，歼敌地方武装数百人。接着，向敌暂编第二旅一部展开反击，连续作战5次，击毙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枪40余枝，迫使该敌回窜原防。南路之敌也在当地群众不断袭扰下，龟缩于七里坪、河口、黄安、麻城等据点。敌人第一次“会剿”即被打破。

不久，敌人又以第十三师为主力，协同暂编第二旅、第五十六师一部和罗田、麻城、商城、光山、罗山等县民团，对柴山保、豫东南

两苏区举行第二次“会剿”，企图首先消灭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师主力，然后分区“清乡”，彻底摧毁这两个苏区。8月10日，敌人第十三师两个团及罗田、麻城民团，由麻城进攻豫东南苏区。红三十二师及赤卫队抓住敌军分散冒进的弱点，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先在苏区内部抗击敌人，歼敌一部，缴枪50多枝；随后，红三十二师主力从敌间隙中向光山、麻城两县边界转移，而以赤卫队继续坚持原地斗争。与此同时，敌人第十三师两个旅从黄安、麻城等地进攻柴山保苏区，至下旬，占领了苏区大部地区。红三十一师在歼敌100余人后，向外线转移；赤卫队则在内线坚持斗争。9月上旬，红三十一师同红三十二师在麻城、光山边界会合，接着，围攻新集（今新县）。当进攻豫东南苏区之敌进到新集附近时，红三十二师随即返回豫东南苏区，接连攻克吴家店、南溪、丁家埠等地，消灭民团一部，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苏区。红三十一师则向南出击，先后攻克黄陂河口、夏店，黄安八里湾，麻城谢店等地，消灭了当地民团。在内线坚持斗争的赤卫队，对敌不断袭扰和严密封锁，使敌陷于的困难境地，只得于下旬退出苏区。敌人这次“会剿”又被粉碎。在这次反对敌人“会剿”的过程中，红军巧妙地运用了避强击弱，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法，把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反映了红军的作战指导与战斗能力的迅速提高。

10月，敌人又组织对柴山保苏区的第三次“会剿”。敌第四十八师两个团由罗山、光山向南进攻，进达宣化店、陡沙河、二道河等地后，继向苏区中心推进；敌第十三师1个团由黄陂、黄安、麻城向北进攻，占领了七里坪等地。我军仍以赤卫队在内线与敌周旋，红三十一师向外线新集东北地区转移，伺机打击敌人。这时，蒋介石、冯玉祥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第四十八师和第十三师随即被调离苏区，敌人第三次“会剿”便告流产。红三十一师乘机向苏区西、南两面之敌据点出击，先后攻克河口镇、夏店、小河溪、汪洋店等地，消灭或击溃了这些地方的民团，缴枪100余枝，并争取了驻黄陂六指店的国

民党军1个连投诚。与此同时，红三十二师先向皖西扩展，消灭了多股民团，后于12月25日袭占商城，歼敌300余人。在连续粉碎敌人三次“会剿”的斗争中，鄂豫边、豫东南两个苏区和红三十一、红三十二师两支红军都有很大发展。

11月20日，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两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反对敌人三次“会剿”的经验，深入地讨论了鄂豫边党和红军的斗争任务和各种方针、政策，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指出：鄂豫边区的党今后必须继续以主要力量发展游击战争，坚决肃清民团，进一步扩大红军和武装农民，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和扩大苏区。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对红军和赤卫队的建设和作战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决议根据鄂豫边红军的实践经验，和中央推荐的毛泽东、朱德红军的游击战术，提出了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即：“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大会选出了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徐朋人为书记。12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为主席；成立了鄂豫边军事委员会，徐向前为主席。这样，由鄂东北和豫东南组成的鄂豫边苏区即正式形成。到1929年底，鄂豫边苏区共拥有人口达60多万，红军发展到1200余人。

#### 四、皖西地区

早在1927年10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就着手在皖西六安、霍山地区进行农民起义的准备。到1929年秋，两县农会会员已发展到5000余人，编成了几支公开和半公开的游击队，共有枪百余枝；两县西部“大刀会”中的基本群众也已为我党所掌握。11月8日，六安独山、两河

口地区农民首先举行起义。起义武装在击溃独山之敌“自卫团”<sup>①</sup>和从南岳庙来援的民团百余人后，控制了独山镇。在这次起义的推动下，六安的金家寨、徐家集地区和霍山的漫水河地区，也相继举行起义，分别组成了游击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由豫东南苏区东进的红三十二师，应霍山县委的要求，打击燕子河、流波碓等地民团，支援起义武装。

从11月下旬起，驻六安、霍山之敌独立第一旅两个团向起义武装反扑，疯狂屠杀人民，摧残革命力量。为了对付敌之进攻，保卫起义的成果，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于1930年1月20日，集中各区的起义武装，成立了红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共200余人。

在六霍起义的影响下，潜山清水寨（今属岳西县）的群众于1930年2月2日举行起义，组成了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王小亭任师长兼政委，共100余人枪。4月，英山金家铺、霍山东北地区和六安徐家集地区的农民也相继起义，组成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同时，红三十三师在红三十二师两个团和独立师的配合下，一度袭占英山，两次攻克霍山县城，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到5月间，红三十三师发展到300余人，拥有30万人口的皖西苏区初步建成。

## 五、鄂豫皖苏区的建立

遵照中共中央1930年2月和3月的指示，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于4月在黄安箭厂河（今属河南省新县）举行会议，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苏区和皖西苏区的工作，郭述申任书记；同时组成红军第一军军部和党的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徐向前任副军长；原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原第三十二师一部同部分游击队合编为军属独立旅，全军共2100人。此外，原第三十三

<sup>①</sup> 自卫团，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

师1个连同六、霍部分游击队合编为中央独立第一师，约400人枪；原潜山工农革命军独立师改编为中央独立第二师，200余人枪。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的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为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创造了条件。

蒋冯阎中原混战爆发后，驻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敌军纷纷北调，苏区周围除新调来的川军第二十军分散驻守于鄂东地区外，其余各据点大多为反动地方部队和民团驻守。红一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分头在皖西和平汉路沿线发动攻势。

6月中旬，军部率第二、第三师在皖西发动进攻，收复流波碓、麻埠等地，第三次攻克霍山城，歼灭民团1000余人，并歼灭由六安向我反扑之敌新编第五旅700余人。7月上、中旬，在英山北部歼敌独立第二旅1000余人，占领英山城。经过这几次胜利的战斗，第二师发展到1200余人，第三师发展到400余人。随后，两师在军部率领下，西进平汉线，准备同第一师会合。

6月中旬，第一师向平汉铁路南段发动进攻，袭占杨家寨车站，歼敌第二十军2个连，缴枪120余枝。26日，敌人第二十军两个团分别由广水、花园进到郑家店、小河溪，企图对我第一师进行报复。29日，我第一师在孝感游击队的配合下，将进入我杨平口伏击圈之敌1个团1000余人全部歼灭，缴枪800余枝。7月28日晚，第一师从青山口西进，奔袭平汉铁路南段由蒋介石嫡系教导第三师第五团驻守的花园镇车站，29日晨，我第一师乘敌不备分路向车站和镇内发起进攻，很快将敌团部和步兵营、机枪营歼灭于横街、后街和车站。敌炮兵营依托镇西北角的坚固房屋顽抗。我军一面准备火攻，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敌士兵将其副团长打死向我投诚。此次战斗持续3个小时，我军取得歼敌1400余人，缴获迫击炮5门、重机枪8挺、长短枪800余枝的重大胜利。战后，红一师扩编为2个步兵团，1个机炮混成团，共约

3000人。

8月上旬，第一师越过平汉路西进，一度侵占云梦城。继返路东，于8月23日同军部及第二、第三师在四姑墩会合。随后，3个师在军部指挥下，转战在黄陂、孝感北部，先后歼敌新编第二十五师和独立第十四旅各一个团的大部。红一军在6月到8月的进攻作战中，共歼敌7000余人，自身发展到5000余人，苏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 六、蕲(春)黄(梅)广(济)地区

1929年9月，在中共大冶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黄梅、广济两县委抽调共产党员11人，组成鄂东游击队。10月，广济县委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一度占领县城（今梅川镇），组成了广济游击大队。此后，鄂东游击队和广济游击大队在秘密赤卫队的配合下，先后打垮了黄梅、广济边境黄泥塘、王家埠、大河铺、童司牌、周国镇等地的团防，缴枪50多枝，自身发展到60多人。同时，广济四乡、黄梅南部都建立了特务队和赤卫队，黄梅北部、东部和蕲春境内的秘密农会也有了发展。

1930年2月，敌人开始在蕲黄广三县境内“清乡”。我鄂东游击队和广济游击大队南渡长江，活动于瑞昌、阳新地区。6月，鄂东游击队和广济游击大队同原在阳新地区的红八军第五纵队部分留守人员合编为红军第八军第四纵队，在阳新活动的赣北游击队也同时改编为第八军的第五纵队。鄂东游击队和广济游击大队向江南转移后，由黄梅、广济两县委分别掌握的特务队和赤卫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游击活动，积极打击土豪劣绅和团防，不断取得胜利。此后，黄梅县特务队扩编为黄梅第四中队。6月，国民党军1个连在武穴（今广济县城）附近的莲花垸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黄梅第五中队。国民党军驻蕲春的部队70余人哗变，加入了红军。在此前后，蕲春的党组织也领导了两次农民起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基础上，

黄梅、广济两县的县、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蕲黄广游击根据地初步建成。

7月初，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阳新、大冶地区北渡长江，在大金铺同黄广游击武装会合，黄梅第四、第五中队随即分别编入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嗣后，这两个纵队继续在蕲黄广地区游击，并在赤卫队4000多人配合下，再度攻克广济城，缴枪200余枝。不久，这两个纵队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边区的各级组织，多次领导农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依托大别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不断粉碎敌人的“会剿”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建成了拥有100多万人口的鄂豫皖苏区，革命武装也由若干游击队发展成为5000余人的红军第一军，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第七节 其他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

(参见附图13)

### 一、湘赣、湘鄂赣边界地区

湘赣边界苏区，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3月下旬，湘赣边界的红军和赤卫队利用蒋桂军阀忙于混战，边界的敌军有所减少之际，收复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不久，湘赣边界特委从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赤卫队中抽调200多人枪，同红五军1个大队和第三十二团合编为红军独立第五团（后一部改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独立第五团番号撤销）。5月初，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从赣南回到宁冈。中旬，湘敌第一五五旅由茶陵，赣敌第三十五旅由永新，再次向边界红军举行“会剿”。我红五军主力退往酃



县，此后在罗霄山脉南段积极活动，给了汝城、仁化、南雄等地之敌地方武装以打击，并筹得了相当数量的弹药和给养。7月初，我军由罗霄山脉南段回到边界，先攻克遂川城，继收复宁冈县。8月6日，永新守敌两个团向宁冈进犯，彭德怀、滕代远随即率领红五军主力转往湘鄂赣边区，留下部分部队，在湘赣特委领导下，协同各县赤卫队在湘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11月红五军主力转往井冈山地区后，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200多人枪，留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敌人“会剿”红五军的10多个团也大部调离湘鄂赣地区，仅留下4个团分散“驻剿”。红五军第二纵队利用这一时机，在浏阳东乡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在这同时，平江赤卫队也在东南乡建立了苏维埃割据区域。

1929年2月间，驻守平江、浏阳地区的敌军，对平江、浏阳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发动进攻。红五军第二纵队遵照湖南省委关于“保存实力徐图发展”<sup>①</sup>的指示，跳出敌之包围圈，在浏阳、铜鼓、修水边界山区游击。4月中旬，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决定，集中部分赤卫队，同红五军第二纵队合编为湘鄂赣边区红军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共600多人枪，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分别在平江东北乡，浏阳、铜鼓、万载三县交界的大围山，以及修水、铜鼓交界的山区活动；采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和“打圈子”<sup>②</sup>等战术，坚持游击战争。

同年8月下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部转到湘鄂赣苏区后，于9月2日同湘鄂赣特委在铜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乘蒋冯战争和新的粤桂战争即将爆发之机，相对集中红军，向北开辟鄂东南苏区，向南争取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同时决定，湘鄂赣苏区红军支队编入红五军，

<sup>①</sup> 参见中共湖南省委1929年2月24日通告第三号。

<sup>②</sup> 参见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委员潘心源1929年7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

仍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黄公略任副军长，辖五个纵队，共3000余人。此后，红五军以第五纵队北进到鄂东南地区，第四纵队南进到湘赣苏区，其余3个纵队留在湘东北和赣西北地区，积极打击当地反动武装，扩大苏区。

10月，红五军第四纵队由湘鄂赣边界到达湘赣苏区，协助当地红军和赤卫队收复了宁冈、永新。12月初，红五军军部率领第一、第三两纵队也从湘鄂赣苏区转到了湘赣苏区，会同第四纵队，展开新的攻势，全部收复了莲花、宁冈、永新三县，打击了茶陵、攸县、泰和、遂川等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并会同赣西和赣南的红军，将湘赣苏区同赣西苏区、赣南苏区基本连成了一片。

1930年3月初，红五军军部率领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再次转往湘鄂赣苏区，途中取得了安福、分宜、袁州（今宜春）县城和潞口镇等战斗的胜利，缴枪约1000枝。

与此同时，留在湘鄂赣苏区的第二纵队，先后取得了万载县黄茅、浏阳县文家市、达浒、古港、平江县献钟等战斗的胜利，缴枪500余枝；活动在鄂东南地区的第五纵队，也取得了攻克通山、大冶、阳新、崇阳等地的胜利，缴枪200余枝，促进了鄂东南苏区的建立。这个期间，吴德峰、程子华领导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一部在大冶起义，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到1930年4月下旬，红五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后，红五军于5月6日，攻克平江城，歼灭守敌1个团大部，俘敌营长以下官兵400多人，缴获长短枪700多枝，重机枪11挺。15日，攻克修水城，歼灭守敌1个营，缴枪300多枝。随后，进至鄂东南，在大冶、阳新边境击溃敌军5个团，占领大冶。至此，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这一广大地区内，除部分城镇外，都已成为苏区。在此期间，红五军抽出1000多枝枪，加强湘鄂赣苏区各县赤卫队，帮助组建了湘鄂赣苏区红军独立师。6

月上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东南苏区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八军，由何长工代军长，邓乾元任政委。6月13日，红五军、红八军协同进攻黄石港，击溃敌人1个团，缴枪300余枝。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战争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

## 二、赣东北、闽北地区

1928年5月，由弋横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连，在优势敌军“进剿”下，撤至弋阳、横峰、德兴交界的磨盘山区坚持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到冬季，工农革命军扩大为两个连，改称红军，以弋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初步建成。1929年4月，赣东北苏区的红军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到7月，独立第一团先后打破敌军四次“进剿”，巩固了苏区。8月，贵溪、余江、万年的党组织，在红军的支援下，发动了几万人的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我军在贵溪成立了第七连。10月，我军集中全部兵力4个连进攻周坊，全歼守敌1个连，缴枪60余枝（挺），振奋了起义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接着，我军又在德兴梅溪坂击溃敌军1个营。至此，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成为较巩固的苏区，并同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苏区连成了一片。1929年10月1日，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为主席，苏区发展到纵横各约200里。

1930年2月，红军独立第一团扩编为6个连和1个机关枪队，周建屏任团长。接着，利用江西敌军大部集中赣南对付红四军的时机，积极向外发展。5月5日，奔袭乐平秧坂，击溃守敌1个连和1个靖卫团，歼敌一部，缴枪120余枝，使乐平、万年东部地区成为苏区。独立第一团发展到2000余人。

在赣东北地区红军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闽北崇安县的党组织，于1928年10月，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崇安东北乡的上梅、下梅等地领

导了农民起义，崇安北乡的岚谷、坑口、长涧源等村农民纷纷起来响应，起义地区纵横各达百余里。随后，党领导由起义武装组成的游击队，在崇安以北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逐步扩展到浦城、建阳等县，同赣东北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夹信江相呼应。1930年1月，闽北游击武装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团，陈耿任团长，到3月，发展到1200余人。

同年7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

### 三、广西左右江地区

1929年6月，蒋介石打败桂系军阀之后，任命原桂系将领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俞、李两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拥护我党主张，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应俞、李的要求，党中央派邓小平等共产党员到了广西。邓小平和省委代理书记雷经天等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采取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恢复与发展了各地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韦拔群领导的右江东兰、凤山农军也得到了俞、李的承认，还获得了一部分武器装备。同时，经俞、李同意，共产党员张云逸担任了警备第四大队长兼教导队副队长，俞作豫担任了警备第五大队长，还有其他一些共产党员在俞、李部队和广西省政府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同年9月，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作出了加紧开展农民运动，武装农民，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士兵运动，成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决定。会议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广西省委改为广西特委，雷经天为书记。

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宣布反对蒋介石。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因部下叛变而失败，俞出走香港，李率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的龙州。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和广西特委即率领我党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等将近2000人，由南宁撤向右江，同右江工农运动

结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到达百色、恩隆（今田东县）地区后，于10月28日解除了驻在这个地区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接着收缴了右江各县民团的武器，迅速控制了右江各县。

邓小平在布置了右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于11月上旬启程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途中经过龙州，又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李明瑞毅然同意参加起义，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于百色正式宣布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此后，右江地区很快开始分配土地，陆续建立了百色、恩隆、隆安、东兰、凤山等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则改编为赤卫军。经过这些工作，右江苏区初步建成。

1930年2月1日，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宣布起义，编为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辖两个纵队，共1000余人；李明瑞任第七、第八军总指挥。同时，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

不久，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第七、第八两军攻打南宁。由上海刚刚回到龙州的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红七军未来得及停止进攻，以致连遭失利，被迫退出右江沿岸各城镇，向苏区腹地东兰、凤山地区转移。这时，红八军也遭到敌之进攻，大部损失，一部转到右江后编入红七军。俞作豫被捕英勇就义。

红七军于2月中旬退到东兰、凤山苏区后，为避开敌人进攻和解决给养问题，军部率第一、第二纵队离开右江苏区向东游击，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地区坚持斗争。4月，红七军主力经河池、思恩、宜北（思、宜两县今合并为环江），进至黔桂边境，4月底攻占贵州南部的榕江县城，毙伤俘敌500余人，缴获一些武器装备，筹得了一批经费。5月初，因面临桂系和黔系敌军夹击的不利形势，即向右江回

师。

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期间，坚持内线斗争的第三纵队和赤卫军，在韦拔群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经过三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敌人退出恩隆、奉议（今田阳）等县城，右江苏区得到部分恢复。6月初，红七军主力回到右江苏区后，接着收复了百色县城，击溃敌人1个团，缴枪300余枝，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此后，红七军进行了整训和补充，右江苏区内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也有所加强。

#### 四、广东东江地区

1928年1月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要海陆丰苏区的工农革命军誓死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并实行“积极进攻的策略”，以完成全东江的割据，进而配合其他地区的斗争，“造成向广州包围的形势，再在政治中心举行第二次的大暴动，夺取全省的政权”<sup>①</sup>。这个指示显然是错误的。东江特委遵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主力和第四师全部，分向紫金、普宁、惠来进攻，致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并陷于被动。

2月下旬，粤敌集中约9个团的兵力，由普宁、惠阳、紫金3个方向进攻海陆丰苏区；另以3艘兵舰和部分海军陆战队在汕尾、捷胜沿海巡逻，随时准备登陆。

敌人进攻开始后，中共东江特委仍未接受教训，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主力继续进攻紫金，以留守海丰的4个连，反攻在汕尾登陆的敌海军陆战队；第四师以一部兵力继续进攻普宁，主力返回陆丰阻止敌北路军的进攻。执行的结果，两个师损失过半，被迫向惠来方向转移，海陆丰苏区全部被敌占领。在此情况下，特委又命令第二师攻普宁，第四师攻潮阳，致使部队再次遭受惨重损失。此后，部队又连遭失利，余部被迫退入五华、丰顺之间的莲花山。至年底，东江特委根据广东

<sup>①</sup> 参见1928年1月《广东目前政治状况和工作计划省委决议草案》。

省委的指示，将不会本地语言的干部、战士和伤病员转移出东江地区，而以其余人员组成暴动队，随特委和各县党组织活动，继续同“清剿”之敌进行斗争。至此，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的番号即行撤销。海陆丰苏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中共东江特委执行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盲动主义的方针，不顾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实行错误的进攻路线；在作战指导上又屡次分兵，遭敌各个击破。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占据海陆丰地区之敌正规军相继调走。中共东江特委迅速将分散活动的武装集中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谋求恢复海陆丰苏区。8月至9月，先后取得鹅埠、赤石、黄羌三次战斗的胜利，重新打开了海陆丰斗争的局面。

从10月起东江特委对全区的革命武装陆续进行了整编，先后编成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团。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和工作，终于在五华、丰顺、揭阳交界的八乡山和惠来北部的大南山建立了两小块苏区。

1930年5月，东江地区红军合编为第十一军，古大存任军长，并代理政治委员。红十一军成立后，在党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多次分兵进攻揭阳、丰顺、潮安等城镇，遭受重大损失。此后，东江特委收集余部，在东江地区继续坚持战斗，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

## 五、海南岛地区

海南岛的工农革命军，自1928年秋转到定安南部母瑞山地区以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斗争。1929年秋，特委以在母瑞山地区坚持斗争的130多人为基础，组成了琼崖红军独立团，扩大游击活动。

1929年9月，设在海口的中共琼崖特委被敌破坏，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在定安主持召开了各县委联席会议，讨论了党的斗争方针和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各县委立即撤回农村，在农村领导红军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同时选举产生了琼崖临时特委，冯白驹为书记。从此，

海南岛的红军游击战争又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正在这时，蒋介石为了反击张发奎、李宗仁联合进攻广东，将其驻海南岛的第十旅调走。中共琼崖临时特委和各县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加紧恢复革命力量。党和红军在文昌、定安、琼东边界地区，陵水西部，澄迈南部，临高东南部，陆续建立了几块苏区和游击根据地。

1930年4月，临时特委在母瑞山召开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组成琼崖特委，并决定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扩大红军，扩大苏区和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等任务。会后，在特委领导下，红军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发动“五月攻势”，消灭了许多敌人，拔除了许多据点，红军很快壮大起来，是年8月，编为红军第一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杨学哲任政治委员。但不久，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向海口市进攻，遭受很大损失，后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1932年秋，在敌人“围剿”下，我琼崖红军独立师被敌各个击破，仅剩下20余人转入荫蔽斗争。但是，中共琼崖党组织，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并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 六、川东地区

党的“八七会议”后，四川党组织就在川东地区发动群众，并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组成武装小组，准备武装起义。1929年4月27日，万源的固军坝、白羊庙，宣汉的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武装小组和铁矿坝工人武装小组，梁山（今梁平）、开江的部分工会和农会会员，汇集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举行起义，组成了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共300余人枪，李家俊为司令，雷玉书为副司令。

游击军第一路组成后，袭击白羊庙，击溃敌人1个连，俘敌区长及反动劣绅多人；接着占领了固军坝。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和工作，



党和红军在万源、宣汉边界以固军坝为中心的地区的逐步建立起一块游击根据地。

不久，敌军3个营围攻我川东游击军，我军在群众武装配合下，先对进犯之敌进行了英勇的抗击，随后转移到外线，在宣汉、万源、城口三县边界开展游击活动。11月初，川东游击军转回内线，突然袭击白羊庙，击溃守敌1个营。此后，游击军收复了白羊庙、固军坝等地，粉碎了敌之围攻，游击军第一路扩大到1000余人。11月中旬，敌人以1个团兵力再次围攻我川东游击军。这时，我党发动驻宣汉城南天生桥的敌军两个连起义，起义武装编入游击军第一路。此后，我军在宣汉城西的王家场、明月场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威胁敌军后方，迫使敌人从固军坝撤退，敌之第二次围攻又告结束。

与此同时，我党又发动驻涪陵之敌第二十军两个连起义，组成了川东游击军第二路，赵启明任司令，李鸣珂任前委书记。此后，该部在长江南岸进行游击活动，同第一路遥相呼应。

1930年春，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在敌军的进攻下，遭到失败。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也被敌占领。

在此期间，达县、梁山、万县、开江边界的革命斗争又蓬勃发展起来。7月26日，中共梁山县党组织根据四川省委和川东军委的决定，发动虎城场、南岳场及其周围群众举行起义，一举击溃当地驻军1个团，组成了拥有600人、300余枝枪的游击队。随后，游击队在忠县与当地党组织掌握的梁山另两支武装会合，组成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共1000余人，李光华为司令、王维舟为副司令。

## 七、苏中(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

通海如泰起义失败后，当地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于1929年2月，在南通东五区组织了四支武装小队，成立了南通东乡苏维埃政府。接着，在东五区和中五区逐步建立起一块游击根据地。同年冬，游击

队发展到近500人。海门、启东党组织也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组织了游击武装。

在这同时，泰兴、如皋以及靖江、泰县等县的党组织，组织了若干武装小组。6月，如泰地区的游击队集中组成如泰红军，后扩编为1个大队。在南到长江边，北到通扬运河，东到镇涛区，西到季家市、黄桥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秋，南通特委改为通海特委，李超时任书记。在特委领导下，通海如泰东西两个游击区的军民，粉碎了南通、海门、如皋、泰县、泰兴、靖江六县反动武装的“包剿”，红军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1930年2月，通海特委召开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发展游击战争、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和整顿红军游击队等任务，还参照毛泽东、朱德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制定了游击战争行动大纲，对各县的游击行动作了部署。会后，各县游击队统一整编，通海地区的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如泰地区的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两个支队编成后，积极作战，各取得了一些胜利，并争取了黄桥等地的国民党军80多人起义加入红军。同年4月，两个支队合编成为红军第十四军，何昆任军长，李超时兼政治委员。

红十四军成立后，根据中共通海特委和军部的决定，在万余群众的配合下，于4月中旬进攻如皋西南老虎庄未克，何昆不幸牺牲；下旬，进攻顾高庄又未克。但特委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于7月下旬又决定进攻敌人“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黄桥，结果再次遭受失利。

## 八、浙南地区

1928年6月，浙江南部的永嘉、瑞安、平阳等县，在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一些小规模农民起义，形成了一支武装，坚持斗争至年底，在敌人“进剿”下失败。1929年5月，中共温州中心县委又在永嘉楠溪一带建立农民革命武装，恢复浙南的武装斗

争。

1929年冬，党中央派胡公冕到永嘉，与温州中心县委一起，组织了浙南红军总指挥部，将各地的农民武装集中组成红军，胡公冕任总指挥。不久，红军进攻丽水城受挫，又遭到敌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的接连围攻，受到严重损失而被迫分散。

1930年春，党中央派金贯真回浙南组织特委，组建红军第十三军。浙南特委组成后，立即召开各地党的负责人会议，进行广泛动员，组织发展赤卫队，收集原浙南红军人员，恢复红军。5月18日，浙南特委书记金贯真在温州被捕牺牲。继而，胡公冕也离开浙南回上海报告工作。红军在陈文杰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是年夏，浙南特委按照中央的计划和指示，将浙南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编为红军第十三军，由浙南特委军事委员陈文杰领导，全军辖3个团。红十三军的建立，给浙南人民极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委和红十三军领导，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深刻观念，热衷于攻打城镇，结果又遭挫折。1930年秋，陈文杰牺牲，红军也受到严重损失，剩下的少数人员分散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上述地区的游击战争，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许多地区的党和红军，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学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打破了敌人多次“进剿”，壮大了自己，巩固和发展了苏区。有些地区的党和红军，虽然在当时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命令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以致迭遭失败，但是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骨干，仍顽强地坚持斗争，为后来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总之，上述地区的游击战争，无论是胜利或是暂时失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均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 本章小结

1927年8月至1930年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阶段。经过三年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红军从无到有，从若干小游击队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打破了敌人多次的“进剿”和“会剿”，共消灭敌军7万余人。在这一阶段，我们的党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问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认识，因此起义的指导方针，基本上是仿照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北伐战争的经验，走先取城市后占农村的道路。历史证明，党中央关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计划先取潮安、汕头，后取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的决策；湖南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广州起义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的意图，都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全党和各地起义武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毛泽东于秋收起义受挫后，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毅然放弃了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工

农革命军队，为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他各地区的党经过实践和探索，也先后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这样，就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提出的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1928年秋冬，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中，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因此，“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并将继续发展。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为割据地区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政策。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取守势，对力量比较弱的敌人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期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逐渐地推进。不论任何时期，都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巩固地向前发展，等等。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初，在赣南、闽西和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新局面下，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又一光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必须要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和用“红色政权

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批评了希望用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理论。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至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不能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不能战胜敌人的围攻，不能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党领导的起义武装，一部分是北伐军，一部分是农民武装。这些革命武装主要的成分是农民，阶级基础很好，革命热情很高，但是也有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使红军适应当时严重的斗争环境和担负起革命所赋予的艰巨任务，各地区的党和红军从起义之后就逐步开始了对军队的改造和建设。

在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时，起义军几次遭到失利，部队思想非常混乱。在向井冈山地区艰苦转战途中，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即在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在部队各级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同时，针对旧式雇佣军队的影响严重存在的情况，开始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这是新型革命军队建设的开端。在井冈山时期，适应“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并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时强调加强政治教育，使红军“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

战”<sup>①</sup>；此外，还制定了瓦解敌军政策。到古田会议时，毛泽东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主持通过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中心的一系列决议，使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系统化，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鲜明地体现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特别是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为红军建设制定了一条正确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建军问题以至建党问题而取得的创造性经验，是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

### 三、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进剿”和“会剿”

红军诞生时，人数很少，装备很差，物资补给很困难，战斗力一般较弱，并且一开始就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强大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规定红军在战争开始阶段，既不能同敌人打正规战，也不能沿袭历史上任何战争的成规。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的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是探索新的战略战术的先导者。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在总结井冈山地区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sup>①</sup> 引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页。

即著名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科学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总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是，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真正做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至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十六字诀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

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游击战争。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同时，红军还必须帮助建立与发展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同敌人作战时，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各地区的经验均证明，只有发挥红军、赤卫队和广大群众的整体力量，才能打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

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当强敌跟踪，则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不和敌人打硬仗。这些都是红军和游击队经常采用的战法。也只有如此，才能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各地红军的全部武器和部分兵员，基本上都是依靠战斗中的缴获和俘虏补充的。

袭击、伏击是红军和游击队的主要战术手段，其要旨是出敌不意，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新城战斗，红四军奔袭永新城，歼敌1个师部，都是袭击战术的成功范例。湘鄂西红四军的赤溪战斗、南岔战斗，鄂豫皖红一军的杨平口战斗等，则都是运用伏击战术歼灭了敌人。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在这个时期中，红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但也进行了一些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运动战成分逐渐增加，并取得了一些经验。这就为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打破敌人大规模“围剿”准备了条件。

## 第二章

###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 第一节 1930年夏季的形势

(参见附表7)

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革命和革命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新形势。

国民党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利，混战连年不断。1930年5月又爆发了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这次战争是反蒋派同蒋介石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战，全国各派军阀几乎全被牵动，在广袤的中原战场上，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00多万人，战线绵延数千里，时间持续半年之久，双方死伤约30万人，军费支出约5万万元。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分裂和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无疑给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尽调湘鄂赣诸省驻军开赴津浦、陇海、平汉诸线”<sup>①</sup>，而用来对付红军的正规部队，在江西战场上，只有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和独立第十四旅大部；在湘鄂西战场上，只有新编第三师和独立第十四旅一部；在鄂豫皖边战场上，只有川军第二十军和新编第五旅等部。除此之外，均为地方武装和当地

<sup>①</sup> 参见中国国民党1930年7月31日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

民团。我各地红军乘敌人采取战略守势之际，广泛地发起攻势作战，取得许多胜利。

各派军阀的不断混战，特别是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战祸所及，人民群众背乡离井，颠沛流离，挣扎在死亡线上，从而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基础更加脆弱。

相反，我党我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声望不断提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很大发展。到1930年夏，红军经过近三年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各地红军根据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普遍进行了整编。部队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日益加强，组织编制更加适应新的形势，武器装备有了改善，战术技术有所提高。红军的发展和整编，为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与红军大发展的同时，苏区也有了很大发展。遍及11个省100多个县境的小块的、分散的、流动性很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发展成为联成片的、范围较大的、比较稳固的苏区。在苏区内，普遍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武装，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经济建设也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由于土地革命的逐步深入，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也大大提高了。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使红军战争有了广阔的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各苏区和红军发展的具体情况是：

江西（包括赣西南、赣东北）及其邻近的湘鄂赣、闽西等地区的红军已发展到11个军，共4万余人。1930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六军（不久改称第三军）和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开始时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

记，共2万余人。此后，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在红一军团组建的同时，活动在湘鄂赣地区的红军第五军和第八军，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组成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湘鄂赣独立师和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军第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全军共1万余人。在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组建后，赣东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十军，共2000余人；赣南地区组建了红军第三十五军，共3000余人；闽西地区由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二十、第二十一军合编为红军新十二军，约5000人。与红军发展的同时，苏维埃区域也得到很大发展。1930年2月，中共赣南、赣西、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3月组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辖30余县苏维埃政权，辖区“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sup>①</sup>。1930年夏，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由中共赣东北特委统一领导。苏区拥有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乐平、万年、贵溪、余江等八县苏维埃政权。湘鄂赣苏区已发展到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西北的修水、铜鼓、万载，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广大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内，除部分城镇外，都已成为苏区。这时江西苏区的面积包括赣西南、赣东北、赣西北，已“占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sup>②</sup>。闽西地区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辖上杭、龙岩、永定、连城、长汀、平和六县苏维埃政权，并拥有龙岩、永定两座县城。后来这个地区同赣西南的赣南部分合并为中央苏区。

湘鄂西地区的红军第二军（由红四军改称）和红军第六军于7月中旬在湖北江陵县普济观合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1万余人。苏区也有了较大发展。湘鄂边苏

---

<sup>①②</sup> 参见中共赣西南特委1930年10月7日给中央的报告。

区和洪湖苏区合组成湘鄂西苏区。不久，中共鄂西特委和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统一领导两区的党政工作。其中，洪湖苏区拥有江陵、潜江、沔阳、监利、石首、华容等县苏维埃政权，苏区范围东起新堤（今洪湖），西至沙市（不含），南迄华容，北到潜江的广大地区；游击区东至武汉近郊，西至公安县境，南至洞庭湖北岸，北至襄河以北汉川、天门一带。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苏区和红军第四十九师，鄂北的襄（阳）、枣（阳）、宜（城）苏区和红军第二十六师也组建起来。

鄂豫皖边地区的红军，于1930年4月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共6000余人。不久，活动在鄂东南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军第八军一部，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共1800人。原中共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成了统一领导上述三地区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鄂豫皖边苏维埃政府。鄂豫皖边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发展到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山、光山、商城、固始、霍丘、六安、霍山、英山以及蕲春、黄梅、广济广大地区。

广西右江地区和红军第七军（6000余人），广东东江地区和红军第十一军（2500余人），浙南地区和红军第十三军（约2000人），苏中通海如泰地区和红军第十四军（1300余人），琼崖苏区和琼崖红军独立师（3000余人），川东游击区和川东游击军（1000余人），都取得了胜利和发展。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许多地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逐渐活跃起来，我党在群众中的指导作用和政治影响逐步提高与扩大。

综观当时敌我情况，尽管革命势力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红军和根据地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远没有改变。各派军阀虽然混战不止，有时异常激烈，给我以

可乘之机，然而，当革命势力发展到触及其根本利益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将得到暂时妥协，并联合起来对付革命势力。而且，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越是发展，反革命势力越要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对付革命势力，敌人对苏区和红军的大规模“围剿”必将来临。因此，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正确地分析和估量当前的形势，还应当预见即将出现的新情况，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和策略，以便在敌人大规模“围剿”到来的时候，使党和红军有所准备，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当时党中央的领导者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错误地估计形势，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一度使革命和革命战争遇到挫折，并且丧失了有利形势下寻求更大发展的宝贵时机。

## 第二节 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党内盲动主义思想错误的继续和发展。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以李立三（政治局常委）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1930年2月，党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定为准备全国性武装起义的中心策略。从这时起，李立三等连续发表文章，不断提出“左”的错误观点和主张，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

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在革命形势的问题上，过分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而革命高潮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在革命任务的问题上，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提出要“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并将此作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把“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作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指责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进而“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为了实现这个“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李立三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其主要表现为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此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还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组成领导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计划规定各地红军以如下任务：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sup>①</sup>；湘鄂赣边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sup>②</sup>；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sup>③</sup>；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sup>④</sup>。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另外，令右江地区的红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sup>⑤</sup>。

<sup>①②③④</sup> 参见1930年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

<sup>⑤</sup> 参见中共中央1930年6月16日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信。

## 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参见附图14, 附表7)

各地红军按照上述计划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令, 相继开始了进攻作战。

毛泽东不赞成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 并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地处理了红一军团的作战行动。1930年6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红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长汀出发, 但没有直接去打南昌, 而是经广昌, 绕兴国, 于7月24日攻占樟树镇(今清江县城), 歼敌第十八师一部。这时, 敌人第十八师1个旅守南昌, 1个旅位临川地区, 1个旅有由吉安以北阜田地区经新干渡赣江犯樟树镇之势。毛泽东、朱德认为此时我军不宜进攻南昌, 遂率部西渡赣江, 于30日进到南昌对岸的万寿宫、生米街地区。8月1日, 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 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 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随后, 红一军团即转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 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 从而使红一军团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红三军团按照前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切断武长路<sup>①</sup>”的指示, 于6月中旬由湖北大冶地区向西南进击, 相继占领通山、崇阳等城, 7月4日攻占岳阳, 击溃敌人1个旅, 歼敌两个营。接着, 转兵南进前出到平江地区。7月下旬, 湖南敌人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其主力南下衡阳、宝庆地区, 追击张桂联军, 而以约7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红三军团集结地区进逼, 以解除红军对长沙的威胁。我军乘该敌态势孤立之机, 将其击溃, 并乘胜追击, 于27日攻占长沙。此役共俘敌4000余人, 缴获各种枪约3000枝(挺), 火炮20余门, 电台9部。军团首

---

<sup>①</sup> 武长路, 指湖北省武昌市至湖南省长沙市的铁路。



长根据党中央占据长沙，进而夺取武汉，并影响全国起义的指示精神，未作撤离长沙的准备，以致当由湘桂边境回师的何键部主力反扑时，我军被迫于8月6日转移，人员、物资遭受不少损失。红三军团撤出长沙后，何键即集中兵力，分三路追击。红三军团退到平江以东长寿街地区转入防御。

红一军团为了消灭敌人，援助红三军团，决定由江西安义、奉新地区西进，于8月18日进抵万载县的黄茅。这时，追击红三军团之敌何键部第三纵队（4个团）进到浏阳东南文家市和孙家墩等地，立足未稳，且对我第一军团已经迫近的情况毫无所知。红一军团前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歼灭该敌，尔后会同红三军团消灭追击之敌主力，相机攻取长沙。20日，红一军团主力采取奔袭战术，一举歼灭文家市地区敌人第三纵队3个团又1个营，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俘敌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1500余枝（挺）。23日，红一军团同由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在浏阳东北永和市胜利会师。接着，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三军团，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在战略上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对于实现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展更大的战局，具有重要意义。

红一方面军组成后，按照总前委“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sup>①</sup>，于8月29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鉴于长沙守敌较多，工事坚固，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sup>②</sup>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从8月底到9月11日，敌人除在9月3日以第三十一师由猴子石等地出击，被我军歼灭两个多团外，其主力始终没

<sup>①</sup> 参见1930年8月24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sup>②</sup> 参见1930年8月31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有脱离坚固阵地，其间我军亦曾两度攻击长沙，均未奏效。总前委随即决定，全军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到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转入休整、筹款和做群众工作。此时，一部分干部依据中央8月初指令红军夺取南昌、南浔路，截断长江，争取武汉的指示，提出立即去攻南昌、九江。总前委在株洲、袁州（今宜春）等地连续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求歼守敌新编第十三师等部，以第三军团（不含留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的第十六军）占领清江（今临江镇）等地，截断赣江，阻击援敌，保障第一军团进攻吉安的侧翼安全；完成上述任务后，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然后再打南昌、九江。9月29日，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到达袁州，带来了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的指示。总前委又举行会议，经毛泽东等的多方说服，周以栗终于同意了总前委的上述决策。这样，第一、第三军团即于9月底由袁州地区分别向吉安、清江开进。

10月4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对吉安之敌发起攻击，一度突入城内，由于兵力不集中，遭敌反击撤出。当晚，敌人乘船逃向南昌，我军进占吉安城，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随即在吉安附近地区休整、扩军和做群众工作。

这时，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淦、清江等地之敌亦纷纷撤走，赣西南苏区扩展到30多个县境。苏区群众踊跃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约4万人（不含第十六军）。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接着，以李文林为首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组成。

10月14日，红一军团按原定计划移师北进，于下旬进到新余地区，同红三军团靠拢。这时总前委又进一步决定停止执行进攻南昌、九江的原计划，将部队部署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开展群众工作和筹措给养，因而避免了损失。这对下一步顺利转

入反对敌人第一次“围剿”作战，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二军团组成后，前委决定利用军阀混战，鄂西敌人兵力薄弱的时机，首先集中兵力拔除洪湖苏区内的白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尔后有依托地逐次向襄河<sup>①</sup>两岸的潜江、天门、京山、钟祥地区和沙市西北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从7月下旬起的一个多月中，红二军团主力攻克潜江等城镇，使洪湖苏区联成一片。此后，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行动委员会先是强令红二军团进攻敌人有坚固设防的沙市，使部队伤亡1000余人。继又命令红二军团进逼武汉，会同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夺取湖北全省政权。红二军团进军途中，第六军途经监历时，适值江南反动武装大举“清乡”，应群众请求遂南渡长江，打击“清乡”之敌，连克石首、藕池等城镇，毙敌数百人，扩大了长江南岸苏区。

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苏区，接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红二军团根据党中央关于以主力出岳阳，截断武长路，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分由天门地区和石首地区返回洪湖苏区集结。同时，为巩固后方根据地，于23日攻克监利城，歼敌新编第三师教导团及监利保安团等部共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枝（挺），迫击炮5门。此后，特委和前委考虑到岳阳方向敌军兵力较大，遂决定改出常德，配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并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在邓随军行动期间，由周逸群代理书记；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

10月中旬，红二军团开始渡江南征，攻占了邻近苏区的南县、华容等城镇，歼敌新编第十一师等部1000余人。后来远离苏区，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石门之间地区作战，在敌军连续围攻下，损失很大，被迫于12月9日撤回松滋的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

1930年8月上旬，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

<sup>①</sup> 襄河，即汉江在襄樊市以下的别称。

京汉铁路孝感至信阳段，以及豫东南、鄂东北地区，“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暴动”<sup>①</sup>。9月中旬，红一军根据总的暴动计划，由四姑墩出发，沿京汉路东侧北上豫南作战。下旬，先攻广水，未克；继攻信阳，占领车站，歼敌1个营，旋遭敌援兵反击，被迫撤出。这两次战斗，均未达到预期目的，部队却遭到不小伤亡。与此同时，鄂豫皖苏区也因红一军的离开，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皖西苏区几乎全陷敌手。

红一军首长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在撤出信阳车站后，立即改变行动方向，率领部队撤离交通干线，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的东北方向进击，袭占正阳县陡沟镇，消灭民团数百人。接着南渡淮河，于10月上旬先后袭占光山、罗山两县城，共歼敌1个多团。下旬，红一军移驻罗山潘新店地区。

其他苏区的红军，在1930年6月以后，也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进攻了一些城镇或打了一些硬仗，有的还脱离苏区进行远征，因而多数部队受到了损失，有的甚至失败。右江苏区的红七军以第二十一师一部坚持苏区斗争（后在强敌进攻下失败，师长韦拔群牺牲），主力转战桂湘粤三省边界地区，屡遭重大伤亡，于12月缩编成两个团，后向湘赣苏区转移。赣东北苏区红十军、东江苏区红十一军、湘东红军独立师等，没有贸然进攻中心城市，就地转入了艰苦斗争，因而损失较少，有的部队还得到发展。蕲黄广苏区红十五军在强攻黄梅县城等战斗失利后，即向鄂豫皖苏区转移。闽西苏区红军两次挺进东江，失利后退回。川东游击军第三路脱离根据地远征至石柱县境，大部被敌人打散，司令李光华牺牲，一部在副司令王维舟率领下，突围回到梁山、达县、大竹三县边界，坚持斗争。通海如泰地区红十四军、浙南温（州）台（州）地区红十三军都在优势敌军进攻下遭到失败。

<sup>①</sup> 参见1931年1月8日关于鄂豫边情况的综合报告（此报告原件没有署名，编者判断为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向中央的报告）。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撤销了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和工作，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虽然不到四个月，却使革命力量受到不小的损失，并且丧失了有利形势下争取更大发展的时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主要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命令弱小的红军去进攻敌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毫无胜利把握的决战，使革命和革命战争遭到挫折。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上台，就不断地指责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毛泽东既维护了党的组织纪律，又在行动上避免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攻中心城市可能遭致的损失，使他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后来的红一方面军，不但避免了损失，而且得到了发展。其他各地红军的领导者也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

####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红军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

（参见附图15，附表8、9）

1930年冬，红军和苏区在清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又获得一些新的发展。红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能力不断增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苏维埃政权日趋巩固，政治影响日益扩大。10月间，

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战争的胜利之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从此，红军的战争便进入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新阶段。

还在1930年8月下旬，即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以后，蒋介石就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接着，向各苏区周围陆续调集军队。其中用于“围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有：原在江西的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从湖南调来的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从陇海路方面调来的第五十师、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另外，在武汉休整的蒋光鼐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也准备进入江西参战。航空第一、第三、第五队位南昌、樟树镇机场支援作战。以上各部，统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10月20日前后，新调来的军队大部进入江西境内。

11月2日，鲁涤平将已到达江西的部队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限定于5日前在下列各地集中：第一纵队第十八师位樟树镇，第二十四师位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十三师位临川；第二纵队第五十师位万寿宫，独立第十四旅位靖安；第三纵队第七十七师位上高，新编第五师位高安；总预备队第八师位南昌。敌人的企图是消灭红一方面军于清江（今临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此外，湖南军阀何键令第十九师进驻袁州，配合鲁涤平所部的行动。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查明敌人准备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情况后，同江西省行委就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讨论中，有一种意见主张仍按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

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0月30日，总前委在罗坊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方针，并决定主力红军全部东渡赣江，在苏区幅员较大、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又好、且便于尔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11月1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

罗坊会议以后，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军民紧张地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军队和地方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在干部、战士和人民中进行政治动员，说明诱敌深入方针的必要性，解除群众特别是干部中的种种顾虑，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地对付敌人“围剿”，树立必胜的信心。红一方面军总部按照罗坊会议的决定，以第三军留在赣江西岸监视敌人，率领主力于11月5日前后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崇仁、宜黄、永丰、新淦之间地区转移，并向樟树镇、临川方向进逼；另以刚由赣南归建的第二十二军担任吉安城防，准备掩护江西省党政机关转移。在苏区内建立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构和各种战勤组织。在敌人可能进占的地区，组织人民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肃清暗藏的敌人，纯洁内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苏区的党政军民结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为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二、敌人开始进攻。红军实行退却

（参见附图16，附表8、9）

1930年11月5日，敌人开始进攻。7日，各路敌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由于我军已先期转移，

敌人扑空。

鲁涤平发觉我军主力东渡赣江后，深恐我军夺取樟树镇、临川，急忙调整部署：第三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第一、第二纵队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求我军主力作战。

敌人大规模进攻开始后，我军即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迷惑敌人，主力于11月中旬分别从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以保存军力，待机破敌。

11月18日至20日，各路敌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一次扑空。此后，敌人即在上述各地进行“清剿”，为继续进攻苏区的中心区作准备。

12月1日，我军以第二十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并协同群众在东固附近各山头构筑假工事，以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苏区中部黄陂（宁都西北30公里）、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7日，红二十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引起内部矛盾激化，该军少数领导人将部队拉到赣江以西，以致龙冈以西和西北地区仅有少数群众武装活动。我军主力为避免暴露，于15日移至平田、砍柴冈、安福圩地区隐蔽集中。在此期间，红军抓紧休整、训练，并将第二十二军缩编为第六十四师。

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集其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会议，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蒋介石认为，赣南为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因此，急电催调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进入江西参战，并将原在赣州的第三十四旅划归其指挥，另调福建的第五十六师、第四十九师、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地区推进，堵截我军。这样，连同原有的部队，总兵力已达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为了加强指挥，蒋介石设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其部署如下：朱绍良第六路



军第二十四师由蛟湖向东韶、洛口、宁都进攻，第八师由黄陂（宜黄以南30公里）、南丰之线向广昌、宁都、零都进攻，归该路军指挥的第五十六师经建宁向石城推进，第四十九师和暂编第二旅向瑞金、会昌推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由永丰分经古县、白沙进攻东固，第五十师由乐安分经招携、藤田进攻龙冈、东固，新编第五师由吉安经富田进攻东固，第七十七师以主力防守吉安，以部分兵力向安福方向“清剿”，新编第十三师位临川、崇仁维持后方交通，独立第十四旅北开武宁县担任“清剿”；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经萍乡分向万安、泰和前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仍防守赣州。

12月16日，各路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19日，新编第五师（后改为第二十八师）进占东固。20日，第十八师进到东固，第五十师进到招携，第六十师进到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第六十一师进到泰和。21日，第二十四师进到草台岗，第八师进到新丰市、三坑。敌人在进攻过程中，不断遭到我军小部队和人民武装的袭扰、阻击，后方运输又常为我所阻断，加之苏区人民实行坚壁清野，补给困难。因此，敌人进占上述各地后，未能继续前进。这就给了我军主力以更多的时间进行反攻的临战准备。

为了不失时机地转入反攻，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21日集中到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同时，派出第十二军之第三十五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约溪地区，严密监视西面敌人的行动，并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面。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待机地域，抓紧进行政治鼓动和临战训练。总前委在小布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会场上贴着表达反“围剿”战略思想的大字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作了动员讲话，深刻地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强了苏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方面军总部还根据过去作战

经验以及当时部队在战术、技术和战斗动作上存在的问题，颁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地规定了作战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以及战场纪律、战场救护、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等等。各部队依据这个教材，分别对各种人员进行了训练。

### 三、红军转入反攻，打破敌人“围剿”

（参见附图16，附表8、10）

敌人经过几天整补以后，又继续向苏区中心区推进。12月24日至28日，第二十八师进到因富，第十八师先头1个旅进到南垄，第五十师进到源头，准备继续向小布进攻；第二十四师经东韶进到洛口，第八师进到广昌，先头进到广昌西南的头陂；第六十师由万安开向赣州，准备从赣州转向北进，配合泰和的第六十一师进犯兴国。这时，已经深入到苏区腹地的敌军，在我军民的不断阻击和袭扰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部队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已暴露出来。我军实施反攻作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总前委分析了当面的敌情，认为：进攻之敌虽达十万之众，但均非蒋介石嫡系，这些敌军又分成许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间隔距离相当大，有利于红军各个击破；在这些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的主力军，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1.4万人，红军有4万人，一次打敌1个师，占绝对优势；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阵线打开一缺口后，东西诸敌便被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个集团，有利于我军机动歼敌。

依据当时敌军进展情况，方面军首长决心首先消灭最接近红军集中地的第五十师。12月25日和2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两次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待敌脱离源头阵地，进入我预设阵地时，出其不意地歼灭该敌

于运动中。但因源头之敌未敢出动或刚一出来又缩了回去，红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撤回原集结地待机。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其已经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麻田地区之红军实施总攻。其部署：第五十师位源头东西之线，第二十四师位洛口，加筑工事，严密戒备；第八师限于30日占领吴家坊、田头之线，准备由东向西进攻；第十八师经龙冈进占五门岭，第二十八师经约溪进占南坑圩，均限30日到达，准备由西向东进攻。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率领师部和第五十二、第五十三旅，在由因富向约溪前进的第二十八师1个旅的配合下，于29日进占龙冈。该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龙冈地区的人民条件和阵地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这就给了我军以歼灭该敌的极好机会。

**龙冈战斗** 红一方面军首长于12月28日下午得到敌人第十八师主力向龙冈推进的情报后，当即决定：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政卫团占领黄陂附近地区的阵地，在当地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牵制源头之敌第五十师、洛口之敌第二十四师和头陂之敌第八师，集中主力于29日分两路秘密西开，求歼敌人第十八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29日下午，方面军首长在向龙冈前进的途中，查明了敌人第十八师师部率两个旅已经进到龙冈的情况，随即确定攻击龙冈的作战部署如下：左路第三军于30日晨占领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继向龙冈攻击前进，第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指挥第六十四师）于30日拂晓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兵力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冈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龙冈之敌侧背；右路第三军团、第四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兵力到还铺附近，向龙冈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而以一部兵力向下固、潭头警戒。在约溪地区的第三十五师，于30日午前插至南垄、龙冈间，配合第十二军主力攻

击龙冈，并向南垄警戒。总司令部于30日进到小别附近指挥。

12月30日晨，敌人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为先头，师部及第五十三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上午9时许，该敌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红三军先头第七师的迎头痛击。敌人逐步展开两个团，向我猛攻，均被击退。到下午3时许，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向我猛攻，又被击退。此时，红十二军已沿龙冈南侧占领了表湖及其附近各山头，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已沿龙冈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完全截断了龙冈敌人同东固、因富等地敌人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冈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红三军团主力已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红三十五师也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军从西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道路。这样，敌人第十八师主力被我四面包围。下午4时左右，我军发起总攻。敌人向西北突围未逞，随即溃散，到处窜逃。赤卫军、少先队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冲杀，一起搜索敌人。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我军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

我军迅速歼敌第十八师主力，取得初战胜利后，深入苏区的其他敌军纷纷收缩：第二十八师向东固、因富撤退，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向富田撤退，第五十师向东韶撤退，第二十四师向头陂撤退。

**东韶战斗** 龙冈战斗之后，我军乘胜于1931年1月1日挥师东向，追歼敌人第五十师。部署是：第十二军任中路，经南团、琳池由西向东攻击东韶；第三军团任左路，经头陂（在东韶以北偏西）由北向南攻击东韶；第三军任右路，到达田营后，以主力牵制敌人第二十四师，以一部兵力迂回东韶以东，向东韶攻击；第四军为总预备队，随第十二军之后跟进；总司令部位第四军之后，进到龙坛指挥。

1月3日，我中路军和左路军相继进抵东韶附近，随即向敌第五十

师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到午后3时许，分别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我右路军担任迂回的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敌人乘隙向东和东北方向逃跑。我军奋起追击，歼其一部，连同东韶战斗共歼该师1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2000余件。残敌逃向临川。

东韶战斗后，敌人更形慌乱。第二十八师和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仓惶由东固、因富、富田撤回吉安，第八师、第二十四师由头陂撤回南丰。此时，第五十六师仍在建宁及泰宁、将乐、顺昌地区，第四十九师仍在龙岩、永定，暂编第二旅只进到永安，均未进入江西。泰和的第六十一师，在由赣州北进的第六十师配合下，虽乘红军主力向东韶追歼第五十师之际，于1月3日占领兴国，但已无法挽救整个“围剿”的败局。敌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 四、敌人转取守势。红军转入进攻

第一次“围剿”被打破后，敌军在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入防御。

红一方面军首长为了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缩小敌人的力量，恢复、巩固和扩大苏区，并准备再次打破敌人“围剿”，决定乘胜转入攻势作战。部署是：第三军（欠第七师）位招携、古县地区，向乐安、永丰进逼；第三军团位洛口、苦竹、白舍地区，向南丰、宜黄进逼；第四军位广昌、头陂、康都地区，向建宁、黎川发展；第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指挥第六十四师）位宁都、石城、固村地区，向宁化发展，并积极恢复瑞金、雩都的工作；第三军之第七师、第十二军之第三十五师组成西路军，位兴国以东、以西地区，积极袭扰敌人第十九路军。各地赤卫军也积极打击当面敌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到3月中旬，我军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摧毁了三都、七堡、山

寮、古龙冈等地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准备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场。在此期间，恢复了地方部队，苏区边境各县、区都建立了赤卫营、赤卫连、特务队、独立营等，共拥有5000多枝枪（不包括赣江以西地区），筹措了比较充足的作战经费和给养。这些，都为粉碎敌人下一次“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是在红军实行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进行的第一个战略性战役。这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广大人民支援下，在邻近苏区红军配合下，共毙伤俘敌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人心，取得了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重要经验。

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主要在于我军实行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红一方面军在敌人部署“围剿”时，适时地转入反“围剿”准备，苏区党政军民实行总动员，当敌人大举进攻时，我军避免同敌人过早决战，而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迟滞、袭扰、牵制、削弱敌人，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当敌人深入苏区、弱点充分暴露时，我则抓住战机，择其要害，集中兵力打敌一路，尔后转移兵力打敌另一路，各个歼击敌人。敌人在检讨这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时，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的优长是：“凭借苏区组织，从事作战准备”<sup>①</sup>，“确保主动，避免于不利之态势下作战”<sup>②</sup>，“乘虚蹈隙，机动集中兵力，先后各个击破我第九路军第十八、第五十两师，以致第一次围剿作战失利”<sup>③</sup>。

---

①②③ 参见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一），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13、第115页。

##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

###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

(参见附图17, 附表11、12)

1931年2月, 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 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确定: 这次“围剿”, “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sup>①</sup>, 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 并实行经济封锁; 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 一部由南面协剿, 并依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之原则”<sup>②</sup>, 将红军“严密封锁, 逐渐紧缩包围圈”<sup>③</sup>, 以期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 摧毁中央苏区。为此, 蒋介石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以及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师一部(四个团)到江西参加“围剿”, 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军队, 总兵力达20万人。

3月下旬, 敌军分别在下列各地集中完毕: 第十九路军(蔡廷锴代总指挥)以第六十一师1个团协同第三十四旅防守零都、赣州, 总指挥部率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主力集中于兴国地区; 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率第四十七师位吉安, 第四十三师位吉水, 第五十四师位永丰, 第二十八师位泰和, 另以第七十七师位万安、泰和及吉安至安福之间地区担任“清剿”;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率第二十五师位宜黄, 第二十七师位乐安, 另以骑兵第一师位宜黄、临川、樟树镇地区维护后方; 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率第五师一部、第二十四师、第八师位南丰及附近地区, 第五十六师由建宁出安远汛(今福建省建宁县安远), 另以新编第十三师位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维护后方; 第五十二师位

<sup>①</sup> 参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编辑之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二十五)。

<sup>②③</sup> 参见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一), 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 第125页。

清江（今临江）新淦、峡江、阜田一带，维护赣江交通和担任当地“清剿”；航空第一、第三、第五队位南昌、樟树镇、吉安机场，支援“围剿”军作战。此外，蒋介石、何应钦还命令：驻福建的新编第四旅出宁化，新编第二师卢兴邦旅出连城、长汀，第四十九师出上杭、武平，驻广东的第六十二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基本情况是：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接受；我军数量虽减到3万余人，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也得到了加强；潜伏在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大部被肃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被拔除，苏区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我军。

1931年1月上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代表项英到达中央苏区，根据中央的决定，于1月15日撤消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1年3月，中央苏区党政军民，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分的反“围剿”准备。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由苏区北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陆续南移到广昌、宁都、石城地区。20日前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的通令和动员教育材料，方面军首长发出了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红军各级领导机关按照通令、训令的要求，分别召开了政治工作、参谋、军官、副官、军医等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政治动员、作战指挥、军事训练、给养补给、伤员收容和救护等方面工作。各部队抓紧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和临战前的战术及技术训练。与此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召开了地方



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和规定。会议确定建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并把中央苏区划分为十个游击区，明确区分了任务。会议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此外，我军还以很大力量进行了筹储粮款的工作。以上准备，为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2月和3月党中央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陆续发出一些指示和训令，虽然承认诱敌深入“也是可采用的战略”，但其中心思想则是要红军先发制人去进攻敌人的主力，或在敌人开始“围剿”时就同他决战。并且提出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同时，党中央还派出代表团于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代表团的一些人，对于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非议，这就给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增加了新的困难。

## 二、敌人开始进攻。红军诱敌 深入的战略方针重新确定

（参见附图17，附表11、12）

1931年4月1日，敌人分四路大举进攻。第十九路军主力两个师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前进；第五路军主力3个半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主力两个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第六路军主力两个半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至23日，敌人第十九路军之第

六十一师主力和第六十师进到江背洞、龙冈头；第五路军之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进到富田，第四十三师进到水南，第五十四师进到严坊；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师进到招携，第二十五师进到界上、横石；第六路军之第八师和第五师一部进到广昌及其周围地区，第二十四师进到广昌、南丰之间地区。

敌军在进攻中，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5里、10里或20里，每前进一步，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大部队随后推进；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在政治上，每到一地，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又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我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与上述三个手段相配合，还多方派遣特工人员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我军民关系，扰乱我后方。

在此期间，苏区党政军民针对敌人的进攻和破坏手段，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主力红军派出一部分力量配合地方武装积极地阻击和袭扰敌人。

在苏区军民紧张地进行反“围剿”准备和作战的同时，由于对反“围剿”方针有分歧，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多次举行扩大会议，反复进行讨论。讨论中，出现过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20万敌军严密包围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将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战，把敌人引出苏区，以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另一种意见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指出，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均非蒋介石的嫡系，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帮助，地形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等。同时指出，我军数

量虽少，技术装备虽弱，但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红军好”<sup>①</sup>，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第二群众好”<sup>②</sup>，得到了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是地势好”<sup>③</sup>，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是能够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粉碎敌人“围剿”的。苏区中央局经过充分的讨论，终于再次肯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艰苦奋斗，持久作战”<sup>④</sup>。

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反攻作战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时，有的主张先打蔡廷锴军，有的主张先打朱绍良军，毛泽东则主张先打王金钰军。他指出：在各路敌军中，蔡廷锴军、孙连仲军、朱绍良军为最强或较强，先打蔡或先打朱都没有必胜的把握；新调来的王金钰军，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心虚胆怯，我军在运动战中首歼王金钰军一部有较大的把握。而且打王以后，可就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苏区，征集资材，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则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按毛泽东的意见，第一仗求歼由富田出动之敌王金钰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

在苏区中央局关于反“围剿”战略方针和作战方向确定后，红一方面军首长为便于了解敌情，掌握战机，即率领主力于4月20日从宁都、广昌、石城地区向退却终点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集中。不久，方面军主力又西移东固附近地区隐蔽集中，总部驻敖上。此后，由于富田之敌迟迟不脱离其阵地，部队中出现了要求快打的急躁思想。方面军首长深入进行说服教育，克服了一切要求快打的急躁情绪，坚决按照预定的计划，等待敌人脱离阵地时将其歼灭于运动中；

①②③ 参见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1931年9月3日向中央作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

④ 参见1931年7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向中央的报告。

并组织领导各部队在深谷丛林里加紧进行临战训练。

### 三、红军转入反攻，打破敌人“围剿”

(参见附图18，附表11、12)

从1931年5月10日起，各路敌军继续向苏区中心区推进。第五路军之右翼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于13日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进犯，15日分别进至桥头江和择龙坑之线；中路第四十三师于10日进到大源坑，一部于15日进占潭头；左翼第五十四师于13日进占百富、沙溪。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各一部于11日进占崇贤、方太后，继向城冈圩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之第二十七师于10日进占大金竹，15日进占小树岭，继向南团前进，第二十五师于10日进占肖田，16日进占东韶，17日续占洛口；第六路军之第五师一部和第八师在进占头陂、白水（今赤水）后，即在这一带“清剿”，第五十六师在进至安远汛后，也以一部兵力进入江西“协剿”。

**富田战斗**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山区持重待机20余日，终于等到了敌人第五路军右翼部队脱离富田坚固阵地的极好时机。

5月14日和15日，红一方面军首长相继下达了歼击由富田出犯之敌的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敌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1个旅于运动中。部署是：第三军团（并指挥第三十五军）为左路军，经江树头、固陂圩迂回到富田侧后进行攻击；第三军（欠第七师）为中路军，沿东固至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第四军（并指挥第六十四师）、第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为右路军，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隘口，尔后继向富田攻击前进；第三军第七师和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之第一〇三团位于枫边、城冈圩以及方太、崇贤附近地区，阻击敌人第十九路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团位于潭头一带，协同地方部队一部，阻击敌人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对其他各

路敌军，都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予以牵制。

5月15日拂晓，我军各部开始行动。为了确保打好第一仗，毛泽东于当晚赶到红三军，同黄公略军长一起，找向导调查道路，在东固至中洞大道的南侧找到了一条小路，随即确定第三军主力改由这条小路前进，从沿大道东犯之敌右侧实施攻击。这一改变，对于歼灭敌人第二十八师起了重要的作用。

16日拂晓前，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由敖上沿通向中洞的大道西进时，前卫特务连同沿中洞至东固大道东犯之敌第二十八师先头遭遇，并阻止了敌人的前进。近午时分，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的南侧，乘敌第二十八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迅速被歼大部。与此同时，我右路第四军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四十七师1个旅大部。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于16日进占固陂，歼灭敌人第二十八师的兵站后，当夜进占富田。

这一仗，我军歼敌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一部，缴获各种枪5000余枝（挺），火炮30余门，并俘获包括100瓦特电台在内的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的全部人员和器材，为后来中央苏区同党中央建立电讯联系提供了条件。

**白沙战斗** 富田战斗结束后，敌人第二十八师的残部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仓皇逃向水南；大源坑、潭头方面之敌第四十三师，也在红十二军的进攻下，向水南逃窜。我军主力乘胜于5月17日上午由富田向水南追击。敌人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但原先架设的便桥已为我赤卫军拆除，河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逃窜。红三、红四军立即向白沙猛追，红三军团亦直插白沙河附近。5月19日，我军在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全歼敌人第四十七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余敌逃向永丰。与此同时，红十二军攻占沙溪，敌人第五十四师星夜逃回永丰；南面第十九路军也由城冈圩撤回兴国，随后又

全部撤回赣州。第二仗，我军又缴获各种枪4000余枝（挺），山炮2门。

**中村战斗** 当我军集中力量同敌第五路军作战时，敌人第二十六路军奉命经南团出小布，绕道向我军侧后进攻。5月20日，敌第二十七师进到南团及其附近，当晚又受命经中村向沙溪增援第五十四师。这时白沙战斗已经结束，我军正按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扩张战果。21日午后，前锋进至中村附近，即与敌人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旅的先头部队接触。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歼灭进到中村之敌，乘势直下南团。部署是：第三军团和第四军攻击中村；第三、第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准备尔后参加攻击南团。22日上午，我军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于当日13时占领中村，歼敌第二十七师近1个旅，余敌窜回乐安。当晚，我军追至南团，敌人第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第三仗，我军又缴获各种枪3000余枝（挺）。

**广昌战斗** 我军进到南团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即留驻龙冈，另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此后，在临时总前委指挥下，我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这时，敌人第六路军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并自5月23日开始，按第八、第二十四、第五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临时总前委决定乘敌第五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部署是：以第三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追击北逃之敌第八、第二十四师；以第四军为左翼，第十二军为右翼，担任攻击广昌；第三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27日晨，我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五师凭坚顽抗。我军激战终日，于当晚9时攻克该城，歼敌一部，取得了第四仗的胜利。余敌向南丰逃窜。

**建宁战斗** 我军攻占广昌后，敌人第五十六师约7000人，自安远汛以南之中沙仓皇撤回建宁。临时总前委随即以红四军第十师北上，配合红三军继续追击敌人第二十四、第八师和第五师残部；红四军主力

在广昌休整；方面军总部率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主力继续向建宁前进，求歼敌人第五十六师。5月31日，红三军团出敌意外地攻占建宁城，歼敌3个多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500余枝（挺）和大批药品，取得了第五仗的胜利。

我军在半个月中，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横扫700余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之“围剿”。

#### 四、敌人转取守势。红军转入进攻

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敌军退向赣州、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入防御。在敌人第二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并积极部署向湖南进兵；北方的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所部也在伺机南进。

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新发展和江西敌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进攻。预定整个攻势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促使两广军阀加速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江西南部地区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赣江西岸地区发展，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进攻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扩大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按照第一期计划，我军主力于6月上旬分别进至宜黄以南、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赣闽边境地区，开展工作；第三十五军调瑞金，维护闽赣交通。此外，临时总前委还指令闽西新十二军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求得与江西苏区打通联系。

6月下旬，临时总前委发现蒋介石有对北方诸军阀妥协，对两广

军阀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先向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迹象。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红一方面军首长根据临时总前委决定，留第三军第九师和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监视敌人，率领第三军团、第四军主力和第十二军，分别移驻闽西北的建宁、光泽、顺昌之间地区和闽西及闽赣边的归化（今明溪）、永安、连城、长汀、石城之间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方面军总部驻建宁指挥。为准备对付可能提前到来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临时总前委又决定派第三军主力提前到赣南的雩都、会昌地区开展工作。

7月上旬，敌人第三次“围剿”开始，我军的攻势作战不得不停止。在为时一个月的攻势作战期间，我军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扩大和巩固了苏区；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和给养；总结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经验和表扬英雄模范人物，进行了休整、训练，分别组建了第一、第三两军团的火炮连，扩编了无线电队，加强了医疗单位建设，还将建宁战斗的俘虏兵3000余人经过教育陆续补充部队；同时，以赣南苏区的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为基础，组成了第四、第五独立师。这些，为打破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次反“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先打弱敌，各个击破，半个月连打五仗，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在红军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反“围剿”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先发制人地进攻，或“分兵退敌”，或放弃苏区等主张，都是错误的。



## 第五节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

### 一、敌人突然发起进攻，红军主力仓促回师集中

(参见附图19，附表13、14)

敌人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很快于1931年6月组织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蒋介石把他的嫡系第十四、第十一、第六、第九、第十师共10万人调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均驻南昌，并聘请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

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清剿”。其部署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八军之第十一、第十四师）、第三军团（第五、第八、第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我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吉安，指挥第一军团（第十九路军、第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和“清剿”。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另以第十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军，位于临川，策应各方作战；第七十七、第二十八师和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位吉安、泰和、万安、赣州等地，担任“清剿”，维护后方，并拦阻我军西渡赣江；第二十三、第七十九师（由原新编第十三

师改编)和骑兵第一师位南城、黎川、宜黄、临川、樟树镇一带,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第四十九、第五十六师和新编第四旅位闽赣边境,防堵我军东进。此外,还从河南抽调第五十三师开江西,准备在吉安待机。

6月下旬,蒋介石把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的红三军第九师和红四军第十二师误认为我军主力,下令迅速对之发起进攻,并将第十师改随左翼集团军行动。7月1日起,各路“围剿”军开始行动。左翼集团军之第一、第二两路进击军,由南城以北地区出发,5日进占黎川,6日,第一路进击军向樟村、康都前进,第二路进击军向大洋源前进,第十师主力进驻黎川,一部进占德胜关。敌第三军团在掩护第一、第二两路进击军进占黎川后,也由南城、南丰地区出发,进占新丰市及其南北地区。敌第四军团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集结于临川、南城之间地区。13日,第一、第二两路进击军进占广昌;19日,又分别进占宁都县固村和宁都县城。随后,向西推进。在左翼集团军向苏区长驱直进的同时,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由吉安、吉水向富田、东固、崇贤前进,第三路进击军由永丰向沙溪、莲塘前进,第二军团由乐安、宜黄向招携、宁都前进。

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预见到敌人必将举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经过第二次“围剿”那样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那么快,以致当敌开始进攻时,我军各部还处于分散状态。同时,部队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这就给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6月30日,临时总前委最后判明敌人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情况,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以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第三军第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人前进;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

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中心区回师，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之“围剿”。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在苏区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领导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并命令由粤桂边境转移到赣江西岸活动的第七军东渡赣江，同红军主力会合。

7月1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相继从各自工作区域出发，紧急行军，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于22日前到达雩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第三军主力、第三十五军、第七军会合。随后，稍经整顿，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于28日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在此期间，担任迟滞敌军前进的一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赤卫军、少先队，不断阻击与袭扰敌人，苏区人民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敌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的集中，并为红军主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 二、红军转入反攻，打破敌人“围剿”

（参见附图20，附表13、14）

敌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20余日，一直找不到我军主力。7月底，敌人发现我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判断我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以其主力分路向西向南急进，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边而消灭之。敌第一军团由富田、东固南进，于7月31日占领白石、崇贤；第一路进击军由黄陂经古龙冈、银坑转向兴国前进，第四军团由南城经宁都随第一路进击军之后跟进；第二路进击军由古龙冈经龙冈、东固向富田前进；第三路进击军由沙溪向良村、莲塘前进；第二军团由大金竹、脑百岭经小布向宁都前进；第三军团分向龙冈、黄陂、广昌前进；第十师由黎川进驻广昌。

我军主力在高兴圩地区进行了整理和转入反攻的政治动员。7月

31日，方面军总部得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的防守兵力也较薄弱。据此，方面军首长决心“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先以我军主力由高兴圩秘密北移，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苏区敌之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发觉，其主力回头北向时，我军再乘敌疲惫，寻机打其可打者。

7月31日晚我军开始向富田前进，当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人第二路进击军两个师已先我到达富田。方面军首长随即改变计划，率领部队于8月4日折返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这时，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其中富田地区之敌第二路进击军，崇贤、东固地区之敌第一军团，以及兴国地区之敌第一路进击军和第四军团，战斗力都较强，而正向良村、莲塘前进之敌第三路进击军的战斗力较弱，易为我军歼击。根据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以第三十五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独立第四、第五师协同地方武装将敌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和第四军团向万安、良口方向牵引，将敌第一军团牵制在崇贤、东固之间地区；集中我军主力以中间突破手段，求歼向莲塘急进之敌第三路进击军，尔后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莲塘战斗** 8月5日晚，我军主力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中，沿着崇山峻岭秘密东进。敌人对我军这一行动没有察觉，其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在红三十五军等部的牵引下，正在扑向赣江边。这就为我军歼敌第三路进击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6日，我军主力到达莲塘、官田地区，红三军团警戒部队同进至莲塘附近之敌第三路进击军前卫第四十七师第二旅接触。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求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当晚，红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接近，于7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上午9

时，将敌第二旅及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毙敌旅长谭子钧，取得初战胜利。敌人第四十七师余部向龙冈撤退。

**良村战斗** 我军歼灭莲塘之敌后，不顾疲劳，继续向良村急进，途中同由良村向莲塘增援之敌第五十四师第一六〇旅遭遇，迅速歼其一个团，毙敌旅长张奎诏。残敌向良村溃逃，我军衔尾猛追，直逼良村。刚由城冈撤回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喘息未定，就陷入我军包围中，我军就势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歼敌一部，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等，余敌逃向龙冈。

莲塘、良村两仗，我军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3100余枝（挺），迫击炮14门，马200余匹。

**黄陂战斗** 良村战斗后，红一方面军首长以第三军佯攻龙冈，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围歼刚从君埠、南陵等地缩回黄陂之敌第八师。8月11日晨，我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方面军首长确定以第四军、第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第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天中午，第四军和第十二军主力冒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迅速歼敌两个团。第三军团和第七军也从东面发起攻击。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分向洛口、宁都突围。我军乘胜追击10多公里，又歼敌一部。前后共歼敌第八师约4个团，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3000余枝（挺），迫击炮11门。

我军从8月7日至11日，连打三个胜仗，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随后，我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息整理。

这三个战斗，我军是在敌人不明我之主力行踪或者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莲塘、良村两仗结束后，蒋介石、何应钦才得知我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并估计我军可能北出临川。于是从8月9日起，令其第一、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向东，企图协同由广昌向西的第十师，寻歼我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12日至15

日，敌军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了我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

这时，是我军从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节。面对这一严重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一面令各部队在大山里隐蔽休息，作好夜行军准备；一面分析敌情，研究行动计划。针对敌人最怕我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以第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方面军主力秘密西返兴国境内隐蔽休整，待机歼敌。

8月15日，我军主力2万余人，利用夜暗，从正在东进的敌人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一个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红十二军主力则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以一部兵力攻占乐安县城。蒋介石误认为红十二军为我军主力，并判断我军将进攻宜黄，夺取临川。因此，急调第十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等部对红十二军主力追击。红十二军主力同敌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牵住了敌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走崎岖难走的路，进一步疲惫了敌人。就这样把敌人一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8月底，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随即下令以第一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

红一方面军首长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于9月初率领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这时，敌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除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八师等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以外，其余部队也受尽了苏区军民的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的困苦，“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敌再次西进的先头部队第一军团进到兴国、高兴圩地区，同原在兴国的第四军团会合后，停止了前进。和敌军情况相反，我军三战

三捷之后，又经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敌被动、我主动的形势愈益明显。与此同时，两广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其退却部署为：第一军团、第四军团由兴国、高兴圩地区撤向泰和、吉安；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第三军团第五师以及第五十三师等部，分别由大金竹、上固、龙冈、东固地区撤向吉安、富田；第二军团全部缩回宁都；第三军团第八师残部、第二十四师以及第二十三师，由黄陂、头陂地区撤向广昌。

**老营盘战斗** 9月6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兴国地区敌人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方面军首长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部署为：第三军、独立第五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退路；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第三十五军，分别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攻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第七军牵制兴国之敌。

9月7日，敌人第四军团正沿黄土坳、老营盘之线北撤，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迅速出击，首先攻占黄土坳，切断了敌人先头独立旅同其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从北、南、西三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从拂晓打到下午2时许，终将该旅全部歼灭，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枝（挺），迫击炮10门。敌人第四军团其余部队慌忙缩回墩坵、长迳口固守。

**高兴圩战斗** 9月7日，红三军团、红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地区之敌第一军团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红七军则向兴国之敌第五十二师压迫，保障我军主力在高兴圩的作战。攻击高兴圩的我军各部经过两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终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打成对峙。我军为争取主动，即撤出战斗，主力转

移到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待机，而以红三军及独立第五师位于老营盘阻敌北撤。高兴圩之敌因伤亡较大，且对我军情况不明，也就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顿。

**方石岭战斗** 9月13日，敌人改变退却路线，第四军团余部和第一军团第五十二师经崇贤、东固向吉安撤退；第一军团主力先掩护上述部队北撤，尔后经兴国向赣州撤退。

我军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集中全力对北撤之敌实施追击。9月15日拂晓，我追击部队赶到，迅速抢占了方石岭，截住了敌人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1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激战至上午9时，全歼该敌，俘敌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500余枝（挺），马200余匹。敌人第四军团已经到达东固的部队匆忙经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敌军也纷纷撤到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至此，敌人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反“围剿”中，我主力红军连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共歼敌17个团，3万余人。

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飞机袭击，不幸牺牲。

### 三、敌人转取守势。红军转入进攻

（参见附图21）

敌人第三次“围剿”被打破以后，被迫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守势，盘踞在苏区内一些土围子里的以及苏区周围的地主武装更加动摇恐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内战政策所激起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以及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也在继续发展。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很多：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情况仍然远未改变；我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急需休整、补



充，苏区屡遭敌人严重摧残，经济困难，赣南苏区同闽西苏区尚未完全连接起来；苏区内还残存着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严重地阻碍着群众的发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这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改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依据上述情况，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部队则与敌人主力脱离接触，由兴国以北地区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较弱而我党有一定工作基础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地区发展。其主要任务，一是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给养，以加强与扩大自己；一是逐次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及群众武装，以巩固与发展苏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还决定，整个计划分为两步：首先做好石城、长汀、零都、会昌4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工作。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指出：用较长时间去争取上列20县400万群众，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继续粉碎敌人新的“围剿”，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

遵照上述计划，我军各部于1931年9月下旬进到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分散开展工作。11月下旬以后，又向外扩展到零都、石城北部、广昌西部和宁化、连城之间，以及寻乌、安远等地区。

这个旨在扩大与加强红军、巩固与发展苏区的计划，只执行了四个月，就被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所终止。我军在这四个月中，攻占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拔除了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几百处，消灭了大量反动武装，使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两部分完全连成一片，并扩展到近30个县境；在新占领或新收复的地区内，分配或重新分配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党、团组织，恢复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全苏区动员了1.2万名群

众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是在敌人突然发动进攻、我军主力分散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同前两次反“围剿”相比，情况严重得多，战斗也激烈得多。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坚持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主力红军一部协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阻滞、打击敌人，主力迅速收拢，千里回师，完成战略集中，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敌人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首长运用隐蔽、佯动、声东击西等手段，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灵活机动地率领红军主力往返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五天内连打三个胜仗，从被动中夺取了主动；接着又在敌人退却时，乘胜追击、截击敌人于运动中，再次取得重大成果，从而获得比前两次反“围剿”作战更大的胜利和更丰富的经验。经过这次反“围剿”，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

## 第六节 湘鄂西苏区红军反“围剿”

### 一、洪湖苏区红军反“围剿”

（参见附图22、23）

1930年10月，洪湖苏区发展到拥有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华容、南县等七座县城及沿长江两岸大片乡村，纵横达数百里，苏区内的各项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红二军团南征后，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为了坚持洪湖苏区的斗争，将各县枪枝分别集中，组成脱离生产的赤色警卫大队（即游击队），作为对敌斗争的基干力量，并在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部之下，设立了江左、江右两个指挥部，分别指挥由江北诸县赤色警卫大队组成的江左军和由江南诸县赤色警卫大队组成的江右军，将苏区群众分别编成不脱产的赤色教导军和赤色守

备队<sup>①</sup>、少先队、儿童团等，为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同年11月，蒋介石命令其第十军军长、“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指挥4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战法，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洪湖区。“围剿”预计分三期：第一期以江北的潜江、沔阳、监利地区为重点；第二期以江南地区为重点；第三期向湘鄂边苏区进攻。从11月上旬起，敌人陆续向洪湖苏区进逼，至12月下旬，敌进占南县、华容、监利、潜江、沔阳等县城。

在敌人向洪湖苏区进逼期间，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进行了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决定：（一）利用洪湖地区复杂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二）集中江左军、江右军和赤教军打击、迟滞敌人；（三）要求红二军团回师保卫苏区；（四）将红二军团的一部分伤病员和战斗中被敌隔断后回到洪湖的部队约1000人，组成新六军（不久改编为独立团），由段德昌任军长，作为洪湖苏区反“围剿”的骨干力量。

1931年1月1日，敌人以第四十八师第一四三、第一四四旅及新编第三旅、第十军特务团、湖北警备旅、新编第二旅等部，分自潜江、岳口、仙桃、新堤、监利等地出动，发起第一期“围剿”，企图首先歼灭我江左军于柳家集、瞿家湾地区，尔后向西扩展“围剿”。我江左军在赤教军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运用夜袭、伏击、围困等战术打击敌人。随后，留少数兵力在苏区内坚持斗争；大部兵力分别转到苏区外的沙湖及其以东地区、汉川的刁汊湖地区、江陵县境内的白露湖一带继续打击敌人。1月中旬，敌人占领我监利、沔阳、

<sup>①</sup> 赤色教导军，由18至30岁男性青壮年编成，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支援和配合地方武装作战。赤色守备队，由30岁以上男性及青壮年妇女编成，平时站岗放哨，战时担任战勤工作。

潜江地区。

与此同时，在华容地区活动的我独立团及江右军，为配合江北军民反“围剿”作战，先在鲢鱼须歼敌1个营，继在华容附近歼敌两个连，并收复华容城。接着，独立团北渡长江，于2月初在胡家场、拖茅铺两地歼敌各一部，收复了石首北区。不久，独立团返回江南。

3月1日，敌人向洪湖苏区江南地区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二期“围剿”。其第四十八师1个多旅分自公安、郝穴向藕池、石首进攻，新编第十一师主力自安乡向高基庙进攻，一部自南县向华容进攻。苏区的藕池、石首等地相继失陷。在此情况下，中共湘鄂西特委在石首县东部的调弦口举行会议，确定组织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力争保住江南苏区，恢复江北苏区，并准备开辟洞庭特区，作为坚持江南斗争的新的依托。会后，独立团和特委机关先后北渡长江，打击侵入监、沔、潜地区之敌。江右军一部进入洞庭湖西岸，建立洞庭特区；一部掩护群众撤至华容以东的东山地区。

3月下旬，敌人进占焦山河、调弦口等集镇。4月初，敌人第四十八师第一四二旅、第十九师、新编第十一师和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等部，分自调弦口、万庾、华容、岳阳等地向我东山地区合围。我江右军一部及华容游击队在三葑寺、松板桥等地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中旬，除少数游击队坚持斗争外，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干部转移到江北，东山地区被敌占领。敌人“围剿”告一段落。

这个期间，北渡的独立团在江左军的配合下，积极作战，四次攻占朱河，歼敌新编第二旅第二团大部；两次攻占峰口，歼敌1个营，击溃敌新编第三旅1个团。江北苏区大部恢复。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湘鄂西特委于4月对全区武装进行整编；独立团扩建为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辖第二十六团），组成湘鄂西警卫团，并组建了教导团、沔汉独立团，江左各县组编了警卫营。整编后，部队经短期休

整，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4月中、下旬，先后在老新口歼敌新编第三旅两个营，击溃其两个团，收复了龙湾、熊口、汉河口、大丰口等地。

这时，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又趋尖锐，徐源泉部相继调往长沙，其第三期“围剿”未能按预定计划实行。我红九师乘机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于6月初接连在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等地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至此，江北苏区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开展攻势，东山地区得到了恢复，洞庭特区的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不久，江右军开赴江北，改编为红九师第二十五团。

在此期间，党中央派夏曦到洪湖苏区，3月，组成了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王明“左”倾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开始逐步贯彻。随后，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临时省委相继组成。5月间，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周逸群，在岳阳县的贾家凉亭附近遭敌伏击，不幸牺牲。

1931年9月初，敌人第十九师、新编第十一师、新编第七旅等部，向洪湖苏区的江南地区发动新的“围剿”（当时洪湖人民称作第三次“围剿”），重点是“围剿”华容以东山区。我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二十五团，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击后，突围转至江北。不久，这个地区又组成了江南游击大队，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到年底，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 二、红三军主力转战荆(门) 当(阳)远(安)和鄂西北

（参见附图22）

1930年12月中旬，中共红二军团前委在松滋、公安之间的杨林市地区举行会议，讨论湘鄂西特委要求红二军团返回洪湖的两次来信，研究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军团主力暂不返回洪湖苏区，而以刘家场为中

心，“选择阵地，以待敌至”<sup>①</sup>。不久，遭到优势敌军进攻，战斗失利，被迫于下旬转移到湘鄂边的鹤峰山区。随后，在鹤峰五里坪收编了原来活动在川东石柱、涪陵地区，后来投向湘鄂边苏区的覃伯卿（中共党员）、甘占元部约3000人，分散编入部队。接着，中共红二军团前委决定依托五峰、鹤峰，进攻石门，创建武陵山苏区。1931年1月初，红二军团东进，一度占领石门，但在优势敌人追堵下，再次遭受挫折，被迫转移到五峰、长阳、巴东、建始等地游击。随后，除派红六军第十七师到松滋、公安一带筹粮外，主力在长阳县的枝柘坪休整。

这时，敌人正向洪湖苏区进行第二期“围剿”。中共湘鄂西特委再次写信要求红二军团回援洪湖苏区。3月间，中共红二军团前委在枝柘坪举行会议，决定：开辟荆（门）、当（阳）、远（安）苏区，支援洪湖苏区反“围剿”作战。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并以邓中夏、贺龙等组成中共红军第三军前敌委员会，原第二、第六军分别改为第七、第八师。同时，将湘鄂边独立团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将长阳独立第五十师编为该县游击大队，坚持湘鄂边区斗争。

1931年4月初，红三军主力自五峰地区北上，4日在野三关、三尖观歼敌1个团，乘胜占领巴东。接着，北渡长江，连克兴山、秭归。中旬，继续东进，再占远安、荆门，并攻打当阳。宜昌、沙市敌人闻警来援，红三军主力与之激战后，撤向远安以北的马良坪地区。5月11日，敌人集中第五十一师等部共10余团兵力，分路合击马良坪。我军与敌激战竟日，当晚向北突围。这样，开辟荆当远支援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计划未能实现。

红三军突围后，主力经保康进至谷城以西的石花街地区休整。鉴于我军长期转战和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前委决定在房县、均县、保

<sup>①</sup> 参见邓中夏1931年1月2日关于南渡后战争概况及今后行动原则给中央的报告。

康、南漳地区创建鄂西北苏区，尔后向南发展，东与襄枣宜，南与洪湖联系起来，造成鄂西、鄂北统一的苏区。部队经过短期休整后，首先北上攻占了均县，歼敌第六十九师1个营的大部。继于6月14日翻越武当山南下，18日占领房县。接着，组成中共鄂西北分特委，以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以房县为中心拥有20余万人口的鄂西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7月初，原在马良坪突围中被敌隔断的红八师第二十二团闻讯赶来，同军主力会师。从7月底至8月下旬，红三军主力在鄂西北苏区人民的支援下，击退了敌人正规军1个旅和惯匪几千人的多次进攻，使鄂西北苏区渐趋巩固。

### 三、红九师同红三军主力会合，出击襄北

（参见附图23，附表15、16）

1931年夏，洪湖地区发生了大水灾，敌人乘机决堤水淹苏区，企图困死我军民。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为减轻苏区人民的负担和打破敌人的围困，于8月初决定，以红九师主力向襄河以北出击，开辟京山、天门地区；留第二十五团在苏区内坚持斗争。同时确定军委委员万涛随红九师主力行动，准备在红九师同红三军主力会合后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然后率部南返洪湖苏区。

8月13日，红九师主力由监利、潜江边境地区开始北上，17日攻克沙洋，歼敌新编第三旅旅部及其第二团全部。在增编了第二十七团后，继续北进，经荆门至仙居，仍未得到红三军主力消息，乃东渡襄河进到襄枣宜苏区活动。留在苏区内的第二十五团于8月中、下旬，先后攻占了直路河、莲花寺、杨家场等地敌人据点，共歼敌1个营，迫使潜江之敌弃城逃跑。我遂恢复了潜江革命政权。

中共红三军前委得知红九师正沿襄河北上，即决定军主力南下同红九师会合，返回洪湖苏区；另以教导团及当地游击队组成红二十五师，留在鄂西北苏区坚持斗争。

9月中旬，红三军主力南移，28日在刘猴集同由襄枣宜赶来的红九师主力会合。接着，万涛接任了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随后，全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襄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支援人民渡灾。

10月8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等人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无理指责红九师攻占沙洋后北出接应红三军主力的行动是“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的脱离苏区”；红三军主力从鄂西北苏区南下及在襄北的行动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立三路线。红三军返抵洪湖苏区后，他们撤销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职务，改由夏曦接任；同时撤销了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为5个团，直属军委指挥，使军部闲置一边。夏曦的错误做法，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等领导人与之据理力争，并在11月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座谈会和扩大会上，对上述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不久，接到中央指示，其中虽然肯定了红三军主力从鄂西北苏区南下和红九师接应红三军主力南下行动的正确性，批评了取消各师师部等错误，并决定恢复第七、第九师番号，另辖一个独立团；但又认为中央分局的领导及其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并批评分局没有“有力的给那些反中央分局正确领导的活动与企图以严重的打击”，还提出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这就给分局主要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提供了依据，进而造成肃反扩大化，以致许多忠于革命的好干部被无辜杀害。

11月上旬，敌第四十一师等部向洪湖苏区进犯。红三军转至外线，先在荆门南部的后港、拾回桥歼敌两个营，继克皂市，俘敌800余人，稳定了洪湖苏区的形势。随后红三军重返洪湖苏区。

**龙王集战斗** 12月下旬，敌人第十军特务团进占龙王集、陈家河，其第四十八师工兵营进占皂市，掩护应城至皂市的交通运输。1932年1



月19日，红三军第九师由泗港再渡襄河，20日冒雨袭占皂市，守敌逃向应城。21日，红九师乘胜分别包围龙王集、陈家河之敌。应城敌人以工兵营回援，被我大部歼灭于龙王集附近。龙王集之敌两个营经我军三昼夜围攻，在向田店突围时大部被歼。陈家河之敌1个营在我政治争取下于25日拂晓全部投降。当日，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配合下，伏击西援之敌第十二旅于下毛家畈、周家湾地区，全歼该旅旅部和两个团。龙王集地区的这几次战斗，我军共俘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4000人，缴迫击炮20余门，轻重机枪60余挺，长短枪3000余枝。

与此同时，红三军第七师在汉川地区先后攻克黄陵矶和侏儒山，歼敌1个营。

**文家墩战斗** 1932年1月底，敌人再次调集第三十四师等部，向洪湖苏区进攻。我独立团等部英勇抗击，第九师、第七师迅速返回苏区。至2月中旬，我军共歼敌1个多营，击溃敌两个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3月初，敌人调集10多个团的兵力，对洪湖苏区实行分区“清剿”。5日，敌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由皂市出动，进至文家墩、李家场等地。红三军首长即令第九师和汉川独立团分自渔薪河、蒋家场向文家墩秘密开进，求歼该敌；第七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阻敌增援。6日中午，红九师、汉川独立团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阵，激战至7日下午，全歼该敌，俘敌旅长韩昌峻以下官兵2000余人。与此同时，红七师及红九师一部击溃了敌人第四十四师第一三一旅的增援，逼退了进占泗港、张截港之敌，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清剿”。

随着作战的胜利，洪湖苏区和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苏区除原有各县外，新建了川阳、天汉、天潜、荆当、荆南、钟祥、京山、应城、云孝等县的苏维埃政权。洪湖苏区扩展到襄北广大地区。红三军发展到3个师8个团，共1.5万余人。洪湖苏区各县警卫营或连，区、乡游击队，共有枪2800余枝。

在此期间，湘鄂西苏区的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以及鄂西北等

苏区的军民，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坚持了游击战争，打了一些胜仗，武装力量也有所发展。这几块苏区，除鄂西北在红二十五师撤返洪湖后被敌占领外，其余都基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他们的实践证明：红军只有依托苏区作战，才能取得胜利。洪湖苏区的独立团和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远离洪湖苏区的情况下，利用湖区的自然条件，依靠群众的支援，采取游击战术，打破了敌人多次进攻和“围剿”，巩固了苏区，发展壮大红军，为我军创造了依托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红二军团（红三军）主力在无苏区作依托的转战中，屡战不利；但到初步建立起鄂西北苏区，就逐步取得主动；回到洪湖苏区后，连获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重大胜利，使红军和洪湖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 第七节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

### 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作战

#### 一、第一次反“围剿”。双桥镇战斗

(参见附图24)

1930年11月上旬，蒋介石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奉命调集7个师又4个旅，近10万人的兵力，由豫鄂皖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统一指挥，组织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围剿”计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完成“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以主力攻占苏区内的交通要道及城镇；第三步，分区实行“清剿”。参加“围剿”的各部随即开始向鄂豫皖苏区周围集结。

这时，红一军军部率第一、第二师正由罗山潘新店地区南下作战。中旬，强攻姚家集、黄安未克；下旬，乘敌立足未稳，在谢店歼

敌第十三师1个营。继以奔袭手段，在新洲全歼敌第二十六师第二混成旅。战后，主动撤离新洲。12月1日，转到罗田以西的但店地区休整。

12月上旬，敌人开始了对鄂豫边苏区的“围剿”。其第十三、第四十四师和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由麻城、宋埠、黄陂向北推进；第三十、第三十一师由商城、罗山向南推进；第三十四师、新编第十二师、新编第二旅等由平汉线向东推进；皖西的第四十六师、警备第二旅和英山的新编第五旅从东面防堵。

这时，鄂豫边苏区内仅有地方部队6个教导队和6个县的特务队，共300余枝枪，另有半脱产的补充军约2万人。在敌“围剿”突然开始的紧急情况下，党中央特派员曾中生，在七里坪召开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邻近各县负责人的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以曾中生为首的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在罗山、孝感、黄陂地区，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以及光山地区，分别建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指挥部，指挥地方部队、补充军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尽速同红一军取得联系，以便集中主力“突攻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创造新的局面”<sup>①</sup>。会后，党政军和广大群众，投入紧张的反“围剿”作战。这时，原在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经皖西、豫南转到了鄂豫边苏区的黄麻地区，并即参加了反“围剿”作战。12月16日，红十五军一举突入河口镇，歼敌第四十四师一部。接着北上七里坪，阻击由光山、罗山出动的敌第三十、第三十一师，激战两昼夜，予敌以杀伤后，向商（城）南转移，准备会合红一军，在外线打击敌人。红十五军在转移途中，于1931年1月4日袭占麻城以北的福田河，歼灭当地反动武装数百人，缴获弹药、物资一部。随后继续北上，进抵

<sup>①</sup> 参见曾中生1931年2月10日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商（城）南。

在此期间，红一军主力在但店听取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传达，军首长决定停止南下，回师北上，经商（城）南转向皖西，打击皖西之敌。1930年12月6日，红一军主力在商（城）南同第三师会合。中旬，红一军在金家寨、苏家埠等地歼敌第四十六师3个营，一度包围六安，威逼霍山，皖西苏区大部恢复。

**东西香火岭战斗**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和李鸣钟得悉六安被围，霍山告急，遂以第四十六师和警备第二旅防守六安、霍山，第三十师第八十九旅由商城进占金家寨，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旅进占叶家集，企图合击红一军。在此情况下，红一军于12月21日将主力撤至麻埠地区，准备相机歼敌一路。29日，敌第四十六师和警备第二旅1个团由霍山、苏家埠、韩摆渡分三路向麻埠地区进攻。30日，红一军主力在当地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配合下，在东、西香火岭迎击进攻之敌。红二师第四团首先在西香火岭将右路之敌第四十六师第二七一团击溃，在追击中与红六团协同作战，全歼该团于石婆店。接着，红一师主力与红二师第四团在东香火岭歼中路之敌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八旅先头1个团，并在追击中歼该旅另1个团于同兴寺。在此期间，敌左路军第四十六师第一三七旅和警备第二旅1个团，乘隙进至麻埠外围，其一部突入镇内，遭我反击后溃退。此战，我军歼敌3个团，击溃敌1个多旅，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缴枪1700余枝（挺）。随后，红一军以第三师（仅辖第七团）留皖西活动，军部率第一、第二师于1931年1月3日西返，途中在商城以东的四顾墩歼灭正由金家寨退往商城之敌第三十师第八十九旅1个团。

此时，深入鄂豫边苏区的敌军，在我广大军民游击战争和坚壁清野面前，一筹莫展。当获悉红一军主力西返时，随即向城镇据点收缩。至此，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即被打破。在东西线作战的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共歼灭敌军4个团又4个营，击溃敌军

4个团又1个营，总计毙伤俘敌5000余人（包括一部分民团），缴枪约4000枝（挺）。

1月中旬，红一军同红十五军会师于商（城）南长竹园，随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合编为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原红一军第一师与红十五军第一团合编为第十师，原红一军第二师与红十五军第三团合编为第十一师，另将在皖西地区活动的第三师改编为军属独立团，全军共1.25万余人。

红四军整编后，乘敌处于守势之机，转入攻势作战。1月下旬至2月上旬，红四军先后在麻城以北磨角楼和光山南部新集等战斗中，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活动于皖西地区的独立团也积极出击，连获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1100余人，于2月初奉中央指示，扩编为中央教导第二师。2月15日，派到敌人第四十六师工作的共产党员魏孟贤（时任营长）等在六安县城成功地领导了两个营起义，并乘机摧毁了敌人两个旅部、1个团部及县政府，击毙敌旅长、团长多人。随后，起义部队撤至皖西苏区，编入中央教导第二师。

在红军和苏区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于2月初举行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总结了鄂豫皖苏区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了国民党军阀的“包剿”是当前革命的主要威胁，必须动员苏区广大群众参加反“包剿”的革命战争；而在粉碎敌人的“包剿”之后，必须有阵地地向敌人进攻，发展苏区，争取把东至六安、霍山、潜山，西迄应山、枣阳，北起罗山、固始、霍丘，南抵蕲春、广济、黄梅的广大地区，建设成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

**双桥镇战斗** 特委扩大会议后，红四军乘敌继续处于守势的有利

时机，以“诱敌出阵而消灭之”<sup>①</sup>为目的，向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3月2日袭占李家寨车站，击毁敌军兵车一列，歼敌新编第十二师第一旅一部，击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量军用物资。5日，继袭柳林车站和再次攻占李家寨车站，歼敌新编第十二师1个营，击溃敌两个团。严重威胁敌军驻守的豫南重镇信阳。

信阳告急，敌人急调第六师、第三十一师、第二十路军各1个旅由信阳、罗山向南，第三十一师主力和第三十四师分由广水、孝感向北，企图夹击我军。3月8日，南面之敌第三十四师进到广水以东的双桥镇，第三十一师主力沿铁路进至广水以北地区，北面之敌尚在信阳以南地区徘徊。各路敌军中，第三十四师比较孤立，且距我军集中地较近。红四军首长决定以1个团在三里城监视北面之敌，集中主力5个团连夜自大新店、三里城秘密南下，在罗山独立团等地方部队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奔袭进占双桥镇之敌第三十四师。9日拂晓，我军开始攻击，经7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枪6000余枝（挺），炮14门。这是鄂豫皖红军取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活动于皖西地区的中央教导第二师，也于3月中、下旬先后攻下金家铺、英山城，歼敌新编第五旅大部，并将侵入麻埠之敌第四十六师1个团和民团等3000余人击溃，共俘敌1500余人，缴枪1400余枝（挺）。经过这些胜利，中央教导第二师迅速发展到了3500余人。与此同时，以原鄂豫边的6个教导队为基础，扩编为军委警卫团；从补充军中选拔一部分骨干组成各县独立团。

---

<sup>①</sup> 参见旷继勋1931年4月15日关于部队合编后的情况与行动方针给中央的报告。

## 二、第二次反“围剿”

(参见附图25)

1931年3月中旬,敌人开始组织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企图以“追堵兼施”的战法,在5月底以前逐步肃清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其部署:第三十、第三十一两师主力和第三十三师组成“追剿”部队,分自光山、龙升镇(罗山南)以及黄安、宋埠出发,以七里坪为目标,寻求我军主力作战;第五十三师位罗山以东竹竿铺、寨河集地区,第三十一师混成旅位潢川,第三十师混成旅位商城,新编第二十五师位固始、方集、叶家集地区,第四十六师(附暂编第二旅)位六安、霍山地区,第十三师位麻城、黄陂、罗田地区,第四十四师位小河溪、花园、孝感地区,第六师第十六旅位平汉路信阳、武胜关地区,分别组成各线“堵剿”部队,配合“追剿”部队的作战,并在各该地区进行“清剿”。前后参加“围剿”的兵力累计有10余万人。

这时,鄂豫皖苏区主力红军已发展到1.5万余人,原中央教导第二师已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原军委警卫团则同光山、罗山、黄安3个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

4月上旬,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围剿”。皖西之敌第四十六师等部,乘我主力在商(城)南之际,向皖西苏区进犯,其第一三六旅、第一三七旅(附保安团)于4月15日占领麻埠,并准备进攻金家寨;第一三八旅以1个团驻守霍山,1个团经诸佛庵、石婆店进驻独山。

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决定以警卫师和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等部在七里坪地区监视和牵制西面敌之“追剿”部队,集中红四军主力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4月20日,军部率第十师主力、第十一师自商(城)南东进,同原在皖西的第十二师会合。25日,红四军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以第十二师牵制麻埠之敌,集中第十、第十一师各两

个团一举攻占独山镇，全歼守敌1个多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枝（挺），迫使麻埠之敌仓惶缩回霍山。

在红四军主力开赴皖西作战之际，敌人“追剿”部队第三十、第三十一两师主力从光山、罗山出动，第三十三师从黄安出动，南北对进，于4月24日至30日先后占领新集和七里坪等地。我警卫师、第二十八团和群众武装不断予以袭扰，迫使这些敌人于5月2日回撤罗山、光山。接着，敌人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三十师主力、第三十一师向商城、潢川之间地区集结，企图协同皖西敌军，合击我军主力于金家寨、麻埠地区；以第五十三、第十三师分自光山、麻城出动，在泼皮河、新集、中途店、福田河至滕家堡之线堵截我军。

当敌将“围剿”重点转向皖西时，红四军主力迅速西进，于5月9日到达新集以北的浒湾地区，接着击退了由泼皮河向新集进犯之敌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七旅，毙伤俘敌近1000人。此后，红四军主力转而向南，于5月28日攻占黄安东南的桃花镇，歼敌第四十四师1个营大部，并在十里铺伏击歼灭该师由黄安南援之第一三二旅近两个团。

红四军在一个多月的反“围剿”作战中，运用集中兵力寻歼弱敌的战法，灵活机动地转战于皖西和鄂豫边地区，使得敌人到处扑空，又到处挨打，饥饿疲困，损失严重，被迫于5月底全面收缩兵力，转为守势。敌人第二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 三、红四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作战

(参见附图26)

1931年3月下旬和4月上旬，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出的沈泽民和张国焘、陈昌浩等先后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决定，撤销了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另成



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为书记。不久，红四军领导干部也作了部分调整：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原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调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警卫师改编为第十三师。至此，红四军共4个师，近2万人。

1931年6月，蒋介石开始调集兵力，组织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军多集结在平汉线上，处于守势。根据这一形势，曾中生等人多次向鄂豫皖军委建议：以一部兵力留置豫南，会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运用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求得肃清商城、光山之间地区的地主武装；集中主力南下，“打下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发展，以配合中央苏区”<sup>①</sup>。经过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在多数人赞同下，张国焘等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7月上旬，鄂豫皖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举行会议。会议在讨论红四军主力南下的具体作战方向时，张国焘等人主张红四军主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相机攻占安庆，威胁南京，支援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曾中生等主张红四军主力攻占英山后，直出蕲春、黄梅、广济，恢复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并相机直捣武穴，以威胁长江航运，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支援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张国焘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按他自己的主张作出了决定。

7月中旬，红四军集中5个团开始由豫南地区南下。这时，徐向前已调任红四军军长，原军长旷继勋调任第十三师师长。8月1日，红四军主力攻克英山，歼灭守敌第五十七师1个团，俘团长以下官兵1800余人。这时，红四军首长再次分析了当面情况，认为如出潜山、太湖，攻安庆，要通过近200公里的白区，我军只能集中4个团作战，没有取胜的可能；英山至武穴只有120公里，中间经过的蕲黄广地区原

<sup>①</sup> 参见徐向前、曾中生1931年8月20日关于红四军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

为苏区，敌人力量又较弱，利于我军作战。因此，决定暂缓执行东进计划，改以第十二师1个多团留置英山维护后方交通和开展群众工作，军部率第十、第十一两师主力共4个团继续南进。8月3日，部队出动。红四军首长同时将上述决定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红四军主力进到蕲春县境后，了解到武穴地区洪水泛滥，不便行动，又决定先取蕲水（今浠水）、罗田，开展群众工作，尔后视机出武穴（今广济县城）或东进。据此，红四军主力于8日占蕲水，12日克罗田。不久，又以两个团自罗田南下，于19日拂晓袭占蕲春北部的漕河镇（今蕲春县城），全歼守敌新编第八旅，俘敌旅长王光宗以下官兵1600余人。接着，进占广济（今梅川），威逼蕲春、武穴、黄梅，同湘鄂赣苏区红军形成夹江呼应之势。

敌“武汉行营”得悉鄂东告急，即令武汉警备旅主力由蕲春增援武穴，并令第十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领第一二一旅及第四十八师第一四二旅，由鄂西进到鄂东堵击我军。8月24日，这两个旅分经兰溪、团风进占蕲水，并继续东进，企图遮断红四军后路。30日，蕲水之敌4个团进到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力分自广济、英山向洗马畈急进，乘敌不备，从南北两个方向一举突入敌阵，迅速将敌分割包围，经数小时激战，歼敌3个团大部，余敌1个多团乘夜逃窜，被我军包围于洗马畈东北的叶家湾。这时，红四军接到张国焘于8月间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名义给红四军领导人的信，武断地指责红四军主力南下蕲、黄、广是“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并强令红四军主力“火速”返回鄂豫边待命，“不能有丝毫的停留”。红四军主力不得不立即从叶家湾撤围北返。

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一个月，连克4座县城，歼敌近7个团，俘敌5000余人，缴各种枪4000余枝（挺），迫击炮28门；组织了800余人的地方部队，恢复和扩大了英山、罗田、蕲春、太湖之间的苏区；解决了部队的物资、给养的困难，减轻了老区人民的负担；较好地支

援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这一切证明，红四军主力在打下英山后继续南进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9月4日，红四军主力返抵鸡鸣河进行短期休整后，继续北移，9月13日到达皖西的麻埠。当日，陈昌浩带着分局的决定到了军部，宣布由他接替军政治委员的职务。随后，部队移驻白雀园。张国焘借肃反之名，在红四军中大肆捕人、杀人。但是广大红四军指战员，坚信共产党，忠于革命事业。就在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期间，红四军和地方部队仍不断向外出击，同敌人英勇作战，仅10月3日在潢川的仁和集战斗，就歼敌第十二师两个团，缴获各种枪1000余枝（挺）。苏区的广大群众，也在战争胜利的鼓舞下，踊跃加入红军，使红军迅速扩大。10月间，红军第二十五军于麻埠组成，由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第七十三师（由红四军第十二师改编。第十三师改称第十二师，仍属第四军建制）；同时，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也进行了整顿和扩编，县独立团扩编到20多个，并建立了区游击队若干支，全区赤卫军组成了15个师，17岁以下青少年组成了少年先锋队。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第二十五军，共约3万人。

1930年冬到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红军，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动作不协调等弱点，采取正确的作战原则，取得了两次反“围剿”和两次主动进攻作战的胜利。当敌人对苏区发动“围剿”时，红军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牵制、袭击敌人的主力，集中主力“突攻敌人的弱点”，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按照“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进攻”的原则，适时地组织进攻作战。在这一年的作战中，鄂豫皖红军共歼敌22个团又9个营，巩固和扩大了苏区，新建立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山）罗（田）蕲（春）太

(湖)苏区；主力红军由原来的7个团7000余人发展到12个团约3万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方面军的组成，是鄂豫皖红军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它对于尔后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展更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 第八节 红四方面军发动进攻作战。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

1931年9月，蒋介石在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又着手筹划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到11月，集结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军已增加到15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4个师，鄂东地区7个师，皖西地区4个师。另外，在河南的第四师和南京警卫师准备调武汉，第二十路军准备集结信阳，随时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因此敌人这次“围剿”的行动迟迟未能开始，仍处于分散防守的状态。

在此情况下，鄂豫皖军委决定乘敌新的“围剿”尚未准备就绪之际，主动向敌进攻，以破坏敌之“围剿”计划。红四方面军根据上述决定，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未能实现。

### 一、黄安战役

(参见附图27，附表17、18)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以巩固和扩大苏区，打乱南线敌人的“围剿”部署为目的，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豫东南和皖西之敌，集中方面军主力和黄安独立团共8个团的兵力，发起黄安战役。

黄安，是敌人伸向鄂豫皖苏区内的一个大据点，由第六十九师两个

旅共4个团防守，其师部率第二〇六旅驻守城内，第二〇七旅位城垣外围。配属该师的第三十师第二七〇团分驻城南的桃花镇和西南的高桥河，担任维护黄安、宋埠间及黄安、黄陂间的交通。第三十师主力位宋埠，第三十一师位麻城，第三十三师位黄陂，均可随时应援黄安。

依据上述情况，红四方面军首长确定：第一步，扫清黄安外围据点，切断黄安之敌同邻近敌军的联系；第二步，加紧对黄安之敌的围困，并打击可能增援之敌；第三步，攻歼黄安守敌。

11月10日晚，我军各部开始扫清敌外围据点的作战。第十二师和第十师第三十团于14日、20日先后攻占东王家、下徐家两据点，全歼守敌两个营和地主武装一部共1200余人；第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于18日、20日先后攻占桃花镇、高桥河两据点，全歼守敌第二七〇团。至此，我军完成了黄安战役的第一步任务。

22日、23日，红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接连击退城内敌人向桃花镇的两次反扑。27日占领东、西两关，随即加紧进行攻城准备，并对守敌展开政治攻势。12月7日，敌第三十师两个旅共4个团自宋埠北援，红十一师以1个团从正面节节阻击该敌。9日晨，敌人进至嶂山脚下十里铺时，红十一师主力乘敌立足未稳，从两翼猛烈反击，歼其1个团，余敌逃回宋埠。18日，敌第三十三师及第三十师第九十旅共6个团分自歧亭、宋埠再次北援，20日猛攻我嶂山阵地。红十一师和红十师第三十团、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采取两翼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术，向敌展开反击，激战至21日晨，将敌全部击溃，俘敌800余人，我军胜利实现战役第二步任务。

这时，被围41天的黄安守敌粮弹俱缺，外援无望，十分动摇。我军随即进入攻城作战。22日10时，我黄安独立团在“列宁号”飞机（1930年2月被我缴获的国民党飞机，后命名为“列宁号”）的支援下，攻占了城东北制高点课子山，歼敌一部。22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守敌发起总攻，红三十五团迅速突破城垣，冲进城区。敌师长赵冠英

见固守无望，即令部队向南突围，自己则化装成士兵，率手枪队从西门逃跑。向南突围之敌迅速为我第三十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二团全歼于倒水河两岸，由西门逃出的赵冠英则于23日在通往河口的大道上被赤卫军活捉。至此，黄安战役胜利结束。

黄安战役，是红四方面军组成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我军以8个团的兵力，经43天作战，全歼守敌第六十九师和第三十师1个团，击溃和歼灭援敌5个旅，共毙伤敌军5000余人，俘敌近1万人，缴获各种枪7000余枝（挺），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一胜利，使得鄂豫皖苏区更加巩固和扩大；同时，丰富了红军围城打援的作战经验。

## 二、商(城)潢(川)战役

(参见附图27)

黄安战役期间，敌人在豫东南地区的分布如下：第十二师位于潢川、北亚港地区，第二师和独立第三十三旅位于傅流店、杜傅店、江家集一线，第五十八师位于商城、河凤桥地区，第四十五师位于固始地区。

中共鄂豫皖军委和红四方面军首长为了打击北线之敌，夺取商城，向北扩大苏区，把鄂豫边同皖西两块苏区连接起来，决定发起商潢战役。1932年1月中旬，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第四军主力从黄安地区向北开进，同时令在皖西地区的红二十五军西进，参加这一战役。鉴于商城之敌设防坚固，短期难以攻克，且蒋介石的嫡系第二师位于商城、潢川之间，对我军攻击商城的行动妨碍极大，方面军首长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人第二师，切断商、潢两城敌军的联系，尔后相机攻取县城。部署是：先以红四军第十一师攻歼北亚港之敌第十二师1个团，隔断敌第二师同第十二师主力的联系；尔后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由东面攻击，红四军第十二、第十师由西面攻击，分割围歼位于傅流店、杜傅店地区之敌第二师。

1月19日至22日，红十一师围攻北亚港之敌，歼其一部，并在红十师一部的配合下，击溃敌人第二师和第十二师先后共4个团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增援，占领北亚港。23日，红七十三师从东面，红十二师、红十师一部从西面向江家集、杜傅店、双椿树进逼。敌人第二师和独立第三十三旅乘我军尚未完成包围之际，逃回潢川。26日，河凤桥之敌第五十八师一部也被迫逃回商城。至此，我军控制了商潢公路，并切断了商城、固始之间敌军的联系，使商城之敌第五十八师完全陷于孤立状态。

这时，红四方面军首长考虑到，商城守敌兵力集中，工事坚固，不宜强攻，且潢川之敌可能南援，遂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法，以一部兵力围攻商城，吸引潢川之敌来援，主力隐蔽集结于商潢公路两侧，待机歼击援敌。

1月31日至2月2日，我军以正面阻击和两翼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战术，先后击溃了由潢川向商城增援之敌第二、第十二、第七十六师（新由信阳调来）和独立第三十三旅共19个团，歼其1个团，直逼潢川近郊。商城之敌第五十八师仓皇南逃麻城，我军进占商城。

商潢战役，我军共歼敌约5000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苏区。

### 三、苏家埠战役

（参见附图27、28，附表19、20）

商潢战役以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军继续处于守势。其中皖西之敌四个师又两个旅，分布于六安、霍山、合肥、潜山、蚌埠地区，防区辽阔，兵力薄弱，易被我各个歼灭。因此，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留第十二师于潢川、商城地区，牵制豫东南地区之敌，主力自固始向东南进发，会合先期返回皖西的第七十三师，求歼皖西之敌，向东扩大苏区。

3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十、第十一师同第七十三师在独山镇会合。此时，进一步了解到皖西敌军10余团从六安城至霍山城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其具体分布如下：第四十六师（辖第一三六、第一三七、第一三八旅，每旅两个团）师部率第一三七旅、警备第二旅各1个团及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三旅位六安；第一三七旅（欠1个团）位马家庵；警备第二旅（欠1个团）位韩摆渡；第一三八旅及第一三六旅（欠1个团）位苏家埠，第一三六旅另1个团位青山店；警备第一旅位霍山。敌二线兵力尚有第五十五师（欠1个旅）、第五十七师、第七师等部，分驻合肥、潜山、蚌埠等地，均距六安、霍山较远。依据上述情况，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以地方武装从西面袭扰迷惑敌人，总指挥部率3个师自两河口东渡淠河，求歼苏家埠地区的敌人。

3月21日晚，方面军主力渡过淠河。22日拂晓，红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围攻青山店。同日，红十师在击溃由苏家埠增援青山店之敌两个团后，包围苏家埠，红十一师直逼六安城郊。23日，红十一师和红十师重创六安出援之敌两个团，残敌分别逃入苏家埠、韩摆渡。至此，我军将敌第四十六师和警备第二旅主力共6个团分别包围于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等地，并歼其一部，夺得了战役的有利地位。

红四方面军首长鉴于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等地寨高壕深，强攻不易奏效，决定对其采取持久围困，吸引六安、霍山之敌出援予以各个歼灭。据此调整了部署：以第十师主力围困苏家埠之敌；第十一师1个团和六安独立团围困韩摆渡之敌；第十一师主力在六安西南之平头岗、樊通桥一线占领有利阵地，准备歼击六安出援之敌；第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围困青山店之敌，并相机歼灭可能由霍山出援之敌；第十师1个团为总预备队。

3月31日，敌人第四十六师师长岳盛璋指挥六安、霍山两地部队同



时出援，企图解救被围之敌。由六安出援之敌第一六三旅等部共4个团，其第一梯队两个团进至苏家埠以北之凉水井、桂家老坟时，遭到我战役预备队第十师1个团和第十一师主力的东西夹击，当即被歼1个团，另1个团窜入韩摆渡；其第二梯队仓皇退回六安。由霍山出援之敌警备第一旅进至十里铺时，也被红七十三师击溃，窜回霍山。青山店守敌第一三六旅1个团乘机突围，大部被我歼灭于途中，一部窜入苏家埠。

此后，我军一面继续围困敌人，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守敌；一面集中主力于机动位置，休整待机，并以地方部队监视六、霍之敌。方面军首长判断，在六、霍出援之敌被打垮后，敌如再援，最大可能来自合肥方向。因此，预先在戚家桥、樊通桥以东的陡拔河两岸地区勘察了地形，制定了打击合肥援敌的作战方案，进行了战场准备。

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经我军围困月余，粮食极缺，军心动摇，携械投降者日增。皖西之敌，经我军几次打击，已力竭智穷，频频向蒋介石告急。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4月下旬任命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指挥第七师5个团，第五十五师4个团，第五十七师2个团，警备第一旅2个团，以及新由潢川调来的第十二师2个团，共15个团2万余人，从合肥大举西援。红四方面军首长判断，援敌虽多，但道远师疲，建制杂乱，士气低落；我军兵力虽少，但预有准备，以逸待劳，士气高昂，加之地形有利，有歼灭援敌于运动中之可能。因此决定，以小部兵力会同赤卫军，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并监视六安之敌；第七十三师立即在樊通桥地区占领阵地，正面阻击援敌，并以1个营协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拔河以东地区诱敌西进；第十、第十一两师主力分置于第七十三师两翼，准备对援敌实施包围迂回。

5月1日，红七十三师1个营在陡拔河以东地区同援敌先头部队接触，并按预定计划，边打边向后撤。2日拂晓，敌先头第七师第十

九旅尾我西进，并渡过陡拔河，进到红七十三师阵地前，其后续部队尚在河东。我军乘敌半渡之际，猛烈反击。已过河之敌，被迫后撤。其后续部队仍在向西赶进，一时前退后拥，队形混乱。红七十三师乘机向敌第十九旅发起猛攻，敌纷纷涉水奔逃，该旅大部被歼。河东之敌急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高地，企图稳住阵脚。这时，红十一师主力和红十师主力迅速向敌两翼实施迂回。15时，红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渡过陡拔河，猛插敌之纵深，一举歼灭了敌总指挥部，活捉房式鼎；红十一师和红十师主力也迅速攻占婆山岭、老牛口高地，切断了敌之退路。至此，敌军10多个团全部被我军包围于陡拔河岸边，自相践踏，乱作一团。我军主力在地方部队、赤卫军及人民群众配合下，乘势从四面八方敌突击，到17时，敌2万余人除少数漏网外，均被歼灭。

在我军集中主要力量歼击合肥援敌期间，苏家埠、韩摆渡守敌曾数次突围，均未得逞。合肥援敌被歼后，苏家埠、韩摆渡之敌完全处于绝望中，5月8日，两地守敌全部向我缴械，战役胜利结束。

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敌3万余人，内俘敌总指挥兼师长房式鼎和5个旅长、11个团长以及营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长短枪1.2万余枝，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是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空前的大胜仗，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胜仗。

#### 四、潢(川)光(山)战役

(参见附图27)

苏家埠战役期间，敌人第二十路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师共6个旅集中到潢川城附近，并乘我军主力在皖西之际，以1个旅占领潢川以南的仁和集，1个旅占领潢川东南的双柳树，1个旅占领潢川、固始间的桃林铺。新编第二十师则分布于光山城及其以南的椿树

店、槐树店。以上各敌均修筑了碉堡工事，准备长期据守，并伺机向鄂豫皖苏区进犯。活动在潢川地区的我军第十二师曾给敌人以一定杀伤，但未能阻止住敌人前进的势头。

苏家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除以红二十五军军部率新组成的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各一部沿淠河北进外，主力于6月初西返商城地区，同第十二师会合。为了消灭仁和集、双柳树之敌，收复潢川、光山南部地区，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发起潢光战役。部署是：以第十师由商城直出光山以南之椿树店、槐树店，牵制光山之敌；第十二师进攻双柳树；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由方面军教导团改编）包围和歼击仁和集之敌，并吸引潢川之敌南援；第十一师进入潢川以南之璞塔集、彭店地区，歼灭可能由潢川来援之敌。

6月12日战役开始。红十师直出椿树店、槐树店，歼敌新编第二十师1个团大部，乘胜进逼光山；红十二师、红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包围了双柳树和仁和集之敌；红十一师则秘密进至璞塔集以南之杨集，准备歼击潢川出援之敌。

13日，红十二师向双柳树之敌发起攻击，一举突入寨内，歼敌两个营，余敌北逃，我军追至薛店一带，全歼该敌。同日，红十一师经整日激战，将由潢川南援之敌两个团和民团1000余人歼灭于璞塔集，活捉敌入第七十六师参谋长李亚光。16日拂晓，仁和集守敌约两个团突围西窜。红七十三师一部在少共国际团协同下，迅速攻入寨内，歼灭守敌约1个团，主力追击西逃之敌，将其全歼于谈楼地区，活捉其旅长李万林。

至此，潢光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8个团，毙伤俘敌近1万人，缴枪7000余枝（挺），收复了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南的大片地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潢光战役的同时，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由皖西向西南进攻，于6月30日攻占湖北的罗田，继克广济，歼敌第三

十三师一部。

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依托苏区，集中兵力，运用“围点打援”，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原则，连获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敌近40个团6万余人，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鄂豫皖红军和苏区得到很大发展。潢光战役结束时，主力红军已有2个军6个师，另有4个独立师和1个少共国际团，总数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也有不少发展，赤卫军等群众武装达20余万人；苏区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共350万人口的地区，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

## 第九节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 红军反“围剿”

### 一、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1930年12月上、中旬，敌第十九路军奉蒋介石的命令从萍乡经莲花、永新向万安、泰和地区集中，准备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湘赣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在敌必经的道路上，拆桥挖路，设置障碍，以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行军纵队，并配合红一方面军在赣江以西的部队，一度攻占安福、泰和两城。这些活动，迟滞了敌第十九路军的行动，支援了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

1931年1月，湘东红军独立师乘敌军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湘鄂赣红军之机，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东南进击，开展湘东南工作，并相机迎接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1月29日至2月6日，相继攻占酃县、资兴、永兴等城，歼敌第五十七旅一部和酃县保安团，击溃敌资兴保安团、永兴挨户团。随后，在追堵之敌逼近的情况下，于2月上旬返至莲花县境

内。中旬，湘东红军独立师改称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并新组建了第二团，全师3个团共1500余人。

3月，“围剿”湘鄂赣红军的敌人第五路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从萍乡、宜春向吉安、吉水、永丰地区开进，准备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此时，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已进到湘粤边境，正夺路北上。湘东南红军独立师依据红一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以第一、第二团北出至萍乡、宜春地区，迟滞敌人第五路军东进；以第三团出湘东南迎接红七军。第一、第二团北上后，在当地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游击战术袭扰过境之敌，迟滞了敌之行动；第三团南下，于3月14日同红七军直属队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在酃县十都圩会合，随即共同北返。途中，于24日在茶陵以东的将军山地区，将追击之敌湘军第十九师1个多团大部歼灭后，返抵莲花县境内休整。随后，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东进，与在永阳以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会合。

4月初，敌人在对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的同时，以3个多师的兵力在赣江以西进行“清剿”。其第七十七师先后占领吉安县的永阳镇、熬城等地。我湘东南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等部，为打破敌人的“清剿”，并配合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决定向敌第七十七师侧后进攻，首先歼灭永阳守敌，然后向吉安方向发展，威胁敌军后方。4月4日，我军集中兵力进攻永阳之敌，击溃敌第七十七师第二三〇旅，收复了永阳镇。接着，南下永新，同经遂川北进的红七军主力会合。尔后共同北出安福地区，于15日在安福西南廖塘桥、古田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阜田来援之敌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一部共700余人。接着，转至分宜、宜春地区打击敌人。

随着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赣江以西之敌转入守势。我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乘势向敌人兵力较薄弱的湘东南地区进攻。6月10日至16日，我军以避实击虚、忽北忽南的行动，连克茶

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城，歼敌一部。7月，红七军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先后调往中央苏区。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苏区中央局于7月将湘东南、湘南两特委和西路、南路、北路三个分委所辖的地区合并为湘赣省，并于8月1日成立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中共湘赣省临时省委<sup>①</sup>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统一了该区的领导；同时，将湘东南红军独立师改为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将西路地区的独立团改为独立第七团。为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对敌人新的“围剿”，独立第一师根据临时省委的决定，进入遂川地区活动。

在敌人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即将结束时，驻安福之敌第四十三师1个旅于9月16日进占永新城。我独立第一师奉命由遂川北返，在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采取封锁围困手段，迫使占领永新之敌向安福撤退，我军追至金田附近，歼其一部。29日，红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七团等部及当地地方部队一部，全歼刚进到永阳镇之敌第二十八师1个团，俘敌近1000人。此后，独立第一师向西开展攻势，于10月22日击溃敌第六十三师第一八八旅，收复了茶陵的洮水。接着，转向上犹、崇义地区开展工作，先占上犹，继克南康县的塘江，给敌人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和当地地主武装以打击，并组建了赣南独立团。独立第一师也扩大到2800余人。

11月初，敌人集中10个师及地主武装共约8万人，组织对湘赣苏区的“围剿”。以6个师在樟树至万安赣江一线，2个师在袁水流域，2个师在攸县、茶陵地区。敌企图首先以主力进占苏区内的城镇和交通线，进行割裂封锁；然后分区进行“清剿”。

中共湘赣省委在查明敌人企图后，决定组成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前委，统一指挥反“围剿”的军事行动；将独立第七团和由湘南游

<sup>①</sup> 1931年10月8日召开的湘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组成中共湘赣省委。

击队改编的红色警卫团合组成独立第三师，辖第七、第九团，共800余人；急调在上犹、塘江一带活动的独立第一师迅速北返；在全体军民中进行政治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11月中旬，敌人开始“围剿”。东面之敌第七十七师进占莲花地区，第十四师进占永新地区，第二十八师重占永阳地区；西面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由攸县、茶陵向苏区内推进。临时前委确定首先以广泛的游击战疲惫敌人，待我主力集中后再寻机歼敌。据此，各县武装在敌占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临时前委则率独立第三师不断袭扰、围困进占莲花之敌第七十七师。12月初，独立第三师等部在地方部队配合下，以伏击手段，在澧田以东全歼由永新出犯之敌第十四师1个营及永新县保安队。不久，独立第一师赶回永新的文竹，同独立第三师会合。随后，我军西进至莲花地区，迫使敌第七十七师于1932年3月2日撤回萍乡。至此，湘赣苏区的失地全部收复，敌人的“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在此期间，湘赣军区于1932年1月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2月，独立第一、第三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由独立第一师师部兼军部，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代军长，师政治委员王震代军政治委员。

## 二、湘鄂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1930年11月，敌人计划使用5至6个师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军进行“清剿”。红十六军乘敌“清剿”部署尚未就绪之际，主动出击，以一部兵力于12月11日占领修水城，继攻武宁未克。敌人第十五师、新编第三十一师、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第十师、第五十四师各一部，分自浏阳、平江、通城、崇阳、武宁等县城向修水、武宁之间地区合击红十六军。红十六军乘隙西移，于18日一举攻克通城，歼灭守敌第十师1个团及挨户团一部，俘敌1500余人，缴枪800余枝

（挺）。旋即转兵向南，先攻平江城，继攻浏阳县古港，均未攻克，于1931年1月19日进占万载县城。随后，分散在高安、宜丰和上高、铜鼓等地进行休整和筹款，同时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巩固和发展苏区。

2月，中共鄂东南特委决定，以原在阳新、大冶地区活动的红军第七团及沿江、赣北游击队组成红军独立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共2000余人。独立第三师成立后，曾在阳新县沿埠头战斗中，歼敌一部。

3月，红十六军主力乘敌调防之际，一度袭占铜鼓。5月，在宜丰县双丰歼敌两个连，在奉新县境内击溃敌1个团。6月又在浏阳之官渡击溃敌人第六十三师一部。随后，红十六军军部率第七师转至鄂东南，先在崇阳、修水间歼灭敌人崇阳保安团，继在通山县境内协同独立第三师歼敌1个团，在阳新击溃敌人第二十六师两个团，收复了木石港。在我军连续告捷的情况下，阳新的三溪口和大冶的花犹树、刘仁八等处之敌慌忙撤走，鄂东南苏区的失地大部恢复，独立第三师发展到3000余人。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李宗白任书记。

此后，红十六军、独立第三师及各县武装，在省委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结合小规模集中作战，打击“清剿”之敌。经过几个月的反“清剿”斗争，湘鄂赣苏区终于坚持下来，红军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 三、赣东北苏区红军反“围剿”

1930年11月，敌人在对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的同时，调集约4个师的兵力，组织对赣东北苏区红十军的“围剿”。敌第五师由鄱阳推进到万年，第五十五师由景德镇推进到乐平，第四师第十旅和浙江省防军教导团由屯溪推进到玉山、广丰、上饶等地，江西省保安第四团由南昌推进到贵溪，企图消灭我军于苏区中心葛



源地区。

这时，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达赣东北苏区，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撤销了赣东北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中共赣东北省委，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任军委会主席。省委和军委针对敌人即将发动“围剿”的情况，决定：以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广泛袭扰敌人，集中主力红军寻机歼敌。11月28日，红十军在万年县珠山桥击溃敌人第五师1个团。接着东进，于12月18日攻克上饶，将集中在该城的上饶、玉山、广丰、铅山、弋阳五县靖卫团全部歼灭。22日，又侵占河口（今铅山县城），全歼敌新编第十三师1个团，俘敌300余人。此后，红十军及地方部队又在弋阳、横峰地区同敌第五、第五十五师周旋月余。随着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敌人对赣东北苏区的“围剿”也被迫停止。红十军稍经整顿后，即展开攻势作战，于1931年2月相继攻占玉山、暖水、华埠等城镇，击溃敌2个团，全歼其1个营，把赣东北苏区扩展到浙江的开化和安徽的婺源（今属江西）境内。

3月中旬，敌人再次对赣东北苏区进行“围剿”。其第四师第十旅1个团从上饶进占葛源后，立即陷入我地方部队和赤卫军的围困之中，被迫向上饶方向撤退。由德兴以东地区返回的红十军，在上饶吴村之鸡腰山截击退却之敌，歼其两个连。随后转向贵溪、余江边境活动，于4月上旬先后歼敌第十八师补充旅和余江保安团各一部，俘敌300余人，缴各种枪200余枝（挺）。

为支援闽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红十军于4月下旬南渡信江，挺进闽北。27日，攻占铅山县石塘，歼敌一部。接着进入闽北，先后攻占长涧源、新阳。5月2日，攻占赤石街，歼敌一部。随后，在闽北独立团的配合下，给敌独立第三十二旅以多次打击，迫敌转入守势，从而恢复、巩固并扩大了闽北苏区，加强了闽北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也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经费困难。

在红十军挺进闽北期间，敌人第四师第十旅一部再次进占葛源。红十军留特务营协同闽北独立团坚持斗争，主力于5月5日向赣东北回师，7日从沙溪西渡信江，接着攻占葛源，6月上、中旬又在万年、贵溪县境内歼敌第五十五师一部，将进犯之敌全部击溃，巩固和发展了赣东北苏区。红十军在一连串胜利的战斗中发展到5000余人。

7月，敌人第五十五、第十八、第四师各一部，会同各县靖卫团、挨户团，开始对赣东北苏区红军进行新的“围剿”。10月，敌人又增调第九、第五十三、第七十九师参加“围剿”。敌人这次“围剿”，采取先在苏区周围构筑碉堡，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稳扎稳打逐步向苏区中心区推进，寻求同我军主力决战。

此时，王明“左”倾错误已经开始在赣东北党和红军中逐步贯彻。中共赣东北省委为“打通中央苏区的联系”，命令红军向敌兵力集中、且筑有堡垒的西南方向发展，实行“持久围攻”敌堡垒的战术。结果，红十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多次打击了敌人，但自身也遭到了不少伤亡，被迫于1932年3月退到葛源进行整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苏区大部被敌占领。

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的红军，接连打破了优势敌人的多次“围剿”，并主动出击，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壮大了自己，直接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 本章小结

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人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

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并在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以后,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接连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与发展。

经过约一年半的紧张战斗,红军累计歼灭敌人正规军20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并用缴获敌人的大量武器装备了自己;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中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都已拥有数百万人口、数十个县政权的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各苏区的地方武装也得到加强,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个阶段,红军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

### **一、“围剿”和反“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

在敌强我弱、革命根据地处于被分割和被包围的情况下,敌人对红军的“围剿”必然是长期的连续的进行,而且“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也一次比一次激烈。红军必须实行持久战略,准备长期地反复地同敌人的“围剿”作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最终打败敌人创造条件。毛泽东最早地认识和把握了“围剿”反复的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红军的行动,使红军始终保持主动,从不断战胜敌人的“围剿”中争得较快发展。

### **二、“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

在敌人进攻时,红军一般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这个方针,有利于主力红军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有利于动员和组织苏区内各种力量支援和参加战争;有利于造成敌人兵力分散,削减敌人优势,发挥我之优长。实行这个方针,一般包括反“围剿”准备,主力红军向苏区内退却和实施反攻三个阶段。反“围剿”准备阶段的主要问题,就是

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征集新兵，筹集资材，创造战场，组织苏区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准备参加和支援反“围剿”作战。在敌人“围剿”开始前或同时，红军主力应向苏区内退却，以诱敌深入，待机破敌。退却的终点，通常在苏区中部，有时在后部或前部，实施向心的退却。同时，以一部主力协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采取运动防御和广泛的游击战迟滞、袭扰敌人，以保障红军主力隐蔽集中，适时转入反攻。反攻是打破敌人“围剿”的决定性步骤。反攻开始攻击的目标，通常要选在敌人的要害又比较薄弱的部位。要坚持慎重初战的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sup>①</sup>

“诱敌深入”是反“围剿”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但在特定的条件下，红军也可乘敌人尚未部署就绪之际，集中兵力，以自己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红四方面军在1931年11月以后的四次进攻战役，挫败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打破敌人“围剿”以后，红军应乘胜开展有计划、有节制的进攻作战，拔除苏区内敌人的据点或消灭苏区外的分散孤立之敌，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征集资材，整训部队，为打破敌人的下次“围剿”准备条件。

### 三、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

红军在这个阶段的反“围剿”中，进行了几十次成功的战役、战斗，基本上都是打的运动战。运动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sup>②</sup>。实行运动战，首先要处理好“打”和“定”的

---

① 引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6—217页。

②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5页。

关系。红军在进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等情况下，都要走。当面的敌人兵力过大，或占领着巩固阵地，或邻近各部靠得很紧，不好打时也要准备走。有时战斗打成了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也要主动地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运动战要以打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敌为主要作战目标。为此，加强侦察，掌握敌情变化，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积极创造和及时捕捉有利战机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也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调动援敌于运动中予以歼灭。以打运动战为主，还必须配合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必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多种作战形式，战胜敌人。

#### 四、歼灭战是红军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

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sup>①</sup>这个阶段，由于红军歼灭了敌人几十个建制旅，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不仅鼓舞了我民心士气，还在敌人阵营中造成了恐慌；我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和俘虏的敌人士兵，壮大了自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也取得了较快发展。

实行歼灭战，在作战指导上，应力求把握以下要点：（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人大规模进攻时，我军通常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牵制其中的多路，集中红军主力打敌一路或一部，以形成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二）避强击弱。拣弱的打，除了寻歼战斗力较弱之敌外，一般说来，凡态势孤立、运动之中、立足未稳、饥疲困乏、疏于戒备以及由进攻转为退却之敌，都易于歼击。这就需要战场指挥员适时地抓住有利战机，果断定下决心。（三）采取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1页。

**包围迂回战术。**打歼灭战，必须采取四面、三面，至少两面包围的部署。通常是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向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之侧后发起攻击；同时，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四）**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速决是达成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实行速决战，除了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和方向，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实行穿插分割战术，将敌分割成数块予以各个歼灭；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作战手段；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连续战斗。

## 第三章

###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和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 第一节 1931年秋后的形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 一、1931年秋后的形势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首先占领我国东北三省，进而灭亡整个中国的侵略野心，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反动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1月，日军又挑起事端，向我国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上海军民的奋勇抗战，又由于蒋介石及其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归于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之下，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抗日反蒋运动。过去曾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分化。蒋介石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缓和其内部的矛盾，又一次施展以退为进的手法，于12月再次宣布“下野”。国民党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以及其他苏区红军在同一时期内取得的胜利，给了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苏区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境，并占有15座县城，随后又扩展到占有21座县城，形成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连成一片的、比较巩固的苏区。湘鄂西苏区基本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其中主要的洪湖苏区扩展到襄北广大地区，曾占有7座县城，拥有10余县的苏维埃政权，进入全盛时期。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余人，地方武装也有较大发展。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自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后，得到了空前发展。苏区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300余万人口的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4.5万余人，群众武装也得到很大发展。其他苏区和红军，除个别外，也都取得了许多胜利，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影响和威望，在全国人民中大大提高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奋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作战，支援和配合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及红军的战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27日召开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同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成立。中革军委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革军委实际指挥的主要是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红军）。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叶剑英任总参谋部



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其所属部队统称中央红军。

12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组织下，该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率领全军1.7万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后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不久由董振堂接任），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sup>①</sup>。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红军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及“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对革命力量的发展非常有利。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红军和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军和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

##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不相信中国革命战争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在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的同时，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其结果，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了严重危害。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取得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后，在一个时期内，主要是按照王明《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提出的政治纲领，继续在政治上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在组织上实行以积极拥护和执行

<sup>①</sup> 第十三军军长由军团副总指挥董振堂兼任，政治委员为邝朱权（不久由何长工接任），第十四军军长由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兼任，政治委员为黄火青；第十五军军长为黄中岳，政治委员为左权。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其“左”倾路线的干部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宗派主义。通过实行这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以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5月9日，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表的《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9月20日，党中央作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认为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指示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并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等冒险主张。他们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当时的反资产阶级、反富农的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出现在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分。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要求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低估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战略指导上，不注重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对比，盲目地实行进攻战略。

9月下旬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sup>①</sup>，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多次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12月4日，临时中央给红军的训令指出，争取一省数省

<sup>①</sup>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足半数。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王明，定于10月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在此情况下，于9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通称临时中央。

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6日，临时中央指令中央红军“首取赣州，迫吉安”，向北发展。不仅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总方针，而且下达了夺取中心城市的预先号令。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发展了上述错误。决议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决议认定“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这就把革命的胜利放到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基点上，完全否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自从这个包含着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就加紧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各地红军领导人所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最后，用他们的一套所谓“正规原则”，代替了正确原则。

王明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在战争实践中经历了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三个阶段。由于各革命根据地的战争进程不同，各阶段的起止时间、表现形式等也不尽一致。军事冒险主义阶段，大体上从临时中央1月9日决议发布起，到1933年11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结束为止，约两年时间。这个阶段突出表现为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其开始一段时间，要求当时装备技术条件不具备的红军，冒险攻打敌人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但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攻克后无力固守，特别是由于敌人大规模“围剿”即将到来，到1932年秋，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实际上停止了。从1932年秋后到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主要表现为“先发制人”，即以红军的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于其“围剿”开始之前。在敌强我弱的形

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企图以红军的进攻根本打破敌人的“围剿”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虽然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取得了胜利，但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又很快的到来了。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到新的地区开始了自己新的反“围剿”作战。当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王明军事战略表现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企图同敌人在根据地外决战。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这个阶段还提出并实行过“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在连连碰壁之后，从1933年11月开始，又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既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企图以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去赢得战争胜利。这个阶段的红军作战，主要是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消耗战。先是实行防御中的拼命主义，后又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把军事平均主义推到极点。10个月的单纯防御作战，始终处于被动地位。1934年10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仓忙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实行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影响最深，统治时间最长，因而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导下，各地红军战争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 第二节 中央红军1932年的六次进攻战役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次提出夺取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中央红军1932年的进攻作

战，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各次战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 一、赣州战役

（参见附图29，附表21、22）

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连接赣粤两省的军事要地，三面环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驻守赣州的敌军为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两个团3000余人），以及由赣南17个县地主武装组成的民团指挥部（共17个大队，5000余人枪）。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一带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个师，赣州以南的大庾、南雄、韶关一带有广东军阀的10多个团，赣州一旦遭到红军攻击，蒋粤两敌均能随时增援。

当时毛泽东不同意进攻赣州。但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赣州。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部署是：以第三军团和第四军为主作战军<sup>①</sup>，其中第三军团之第七军和第二师担任攻城，第一师位于沙石埠为预备队，第四军之第十三师位于塘江及其以北地区监视可能增援赣州之蒋军，并截击可能由赣州北逃之敌，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及第三军团之第三师分别位于南康、新城、杨眉寺及王母渡地区，阻击可能增援赣州之粤军。江西军区、闽西军区共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sup>②</sup>，以游击战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

2月4日至6日，主作战军各部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地区进抵赣州附近。赣州守敌立即缩短战线，拆毁城外工事，依城固守。我军占领赣州城近郊的白云山、天竺山等攻城出发阵地。支作战军各独立师分

①② 中央红军当时遂行作战任务时的编组。主作战军担任主要作战任务，支作战军担任次要的、支援性和辅助性的任务。

别在信丰、会昌、万安等地区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为增强对粤军的警戒，第三军主力奉命于2月17日由宁都、雩都地区开抵信丰一带。

2月23日，我军实施攻城，以坑道爆破炸开了东门附近的一段城墙，占领了城楼。但在敌军猛烈反扑下，我军占领城楼的部队大部伤亡，第一次攻城受挫。

蒋介石为解赣州之围，以其第十一、第十四两师约2万人增援赣州。29日，该敌由泰和地区进到赣州西北郊，并以一部进入城内。我中革军委仍于3月1日向部队发出“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增调原在石城以南地区整训的第五军团参战，并重新调整部署，增强攻城力量。

3月4日，我军再次以坑道爆破手段攻城，将东门附近城墙炸开宽约20丈的缺口，但因敌人预先在东门内赶筑了一道拱墙，凭险顽抗，我军攻击仍未得手。这时，援敌第十一师已有4个团进入城内，并在城西门与南门之间挖掘了三条出击坑道。3月7日凌晨2时，正当我攻城部队积极准备继续爆破攻城之际，城内敌军5个团出击，城外敌军一部由赣州城西南杨梅渡、南桥间渡过章水，从侧后配合。在敌突然袭击下，我攻城部队一时陷于被动地位。幸第五军团之第十五军及时增援，以大刀同敌人肉搏，始掩护我攻城部队撤出了战斗。

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很大伤亡，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宝贵时间。这是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 二、漳州战役

（参见附图30）

赣州战役后，敌军增强了赣江流域的兵力。而苏浙皖边、闽浙赣边及福建境内，敌军兵力却比较薄弱。

红军撤围赣州后，主力转移至赣州以东以南地区整训补充。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之江口圩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当时红军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汇合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革命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山区有利地势，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可是，苏区中央局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sup>①</sup>的方针。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于3月18日发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以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江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稍后，中革军委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打击福建敌军和侵入闽西苏区的粤军，巩固闽西，筹措经费。尔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在东西两路军已经分开，东路军已经入闽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已经进到闽南沿海的新情况，和闽南、闽西地区敌我形势，以及漳州地区的人民条件和漳州易攻难守的地形特点，于3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以东路军夺取漳州，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苏区中央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此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4月3日，第一、第五两军团分由长汀及信丰之新田出发，向龙岩、漳州前进。第一军团于10日拂晓乘敌不备，一举歼灭龙岩以西小

<sup>①</sup>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3月17日训令。

池之敌第四十九师一部，继在考塘地区歼灭该师约两个团，俘敌600余人，当日攻克龙岩城。4月14日，第五军团到达龙岩与第一军团会合。随后东路军即按预定计划进攻漳州。

漳州守敌系第四十九师第一四五、第一四六两旅。其主力配置在漳州外围天宝、南靖（今靖城）及其以北山区，依托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凭险固守；另一部兵力置于漳州市区。我东路军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决心：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部署是：第一军团之第四军在左主攻，第十五军在右助攻；第五军团之第三军位于南坪附近为预备队；第十三军位于龙岩，闽西军区之第十二军位于上杭、武平、永定，监视粤军的行动。19日晨，我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攻击，第四军首先突破了敌主阵地十二岭、风霜岭，主力向天宝方向扩展战果，一部由左向右横扫，协同第十五军作战；第十五军在第四军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榕子岭、笔架山；第三军自左翼投入战斗，向纵深发展。我全军协同作战，迅速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进击。在漳州以西茶铺地区击溃由漳州出援之敌一部后，于20日占领漳州。此战，我军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16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

漳州战役的胜利，对巩固闽西苏区，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均有重要作用。同时，缴获了大量物资，筹得了100万元以上的经费，对我军以后的作战也很有利。

在东路军入闽作战的同时，西路军于4月初西渡赣江，进入上犹、崇义地区。5月上旬，进至湘南，先后占领桂东、汝城，后来在蒋系与湘粤军阀重兵“会剿”下，被迫回师赣南。

### 三、南雄、水口战役

（参见附图31，附表23、24）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销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



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将所辖部队划分为九路（每路为一个“清剿”区），其第一路为粤军余汉谋所部19个团，部署在南雄和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

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6月下旬，第一、第五军团及第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红一军团在回师途中，第四军军长王良于6月13日在武平县西北大禾牺牲。

这时，粤军发现我军主力回师赣南，遂以一部继续扼守赣州、信丰，牵制我军，以第一师（附第二师第五团和第一军教导第二团）共6个团由南康向大庾地区集中，企图乘我军尚未会合之际，在蒋军、湘军各一部配合下，各个击破我军。7月2日，我第三军团主力，于大庾东北之池江附近，击溃该敌4个团，溃敌退据大庾。3日，我第一军团一部，进攻梅岭关，击溃守敌1个团，控制了梅岭关要隘。4日至7日，第三军团多次攻击大庾，均未成功。敌我形成对峙。

在此期间，蒋军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由上犹地区向大庾急进，粤军独立第三师和第五师由韶关兼程赶赴南雄，第四师亦由信丰向南雄集中，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我军主力。7月7日，韶关之敌到达南雄，信丰之敌进抵乌迳。8日，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3个军团，同时消灭由南雄出动和进抵乌迳之粤军。部署如下：第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分别位于中站、中坑附近，担任攻歼由南雄出击之敌；第三军团以一部兵力进至大、小梅岭关及仙人岭，牵制大庾之敌，主力移至中站东北高地为总预备队；第五军团及独立第三、独立第六师担任消灭乌迳之敌第四师的任务。

8日凌晨，第五军团由罗田、赤石向乌迳开进，先头进至黄坑附近时，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西窜，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当日

下午到达水口对岸藟过村，同敌人接触，迅速击溃了敌军两个团。当晚，敌退守水口及其附近高地布防。9日，粤军增援部队6个团由南雄城进抵水口，该处敌军增至10个团。对敌之增援，我未及时发现。第五军团仍按原定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正在这时，我独立第三、独立第六两师到达战场，同敌展开肉搏，始稳住战局。方面军总部得悉这一情况后，即令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十二军迅即转向水口方向会歼该敌。10日，第十二军、第一军团先后到达战场，重新部署后，对敌人发起总攻。当第三军团先头第七军赶到时，水口之敌10个团已被我军击溃，退入南雄。此时，蒋军第十四、第五十二两师，停止在大庾东北之青龙、杨眉寺地区；配合作战的湘军第十五师，退回桂东。战役至此结束。

南雄、水口战役，我军经过池江、梅岭关、大庾、水口等战斗，共击溃粤军15个团，打击了入赣粤军的嚣张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但是，我军由于没有及时掌握敌情变化，特别是由于兵力不集中，以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

#### 四、乐安、宜黄战役

（参见附图32，附表25、26）

南雄、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在信丰、南雄之间的坪田圩、界址圩、铁石圩、固陂地区休整补充，筹措给养。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的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的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sup>①</sup>并规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3个军团能乘机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7月21日，周恩来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会商后，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

<sup>①</sup> 参见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7月15日告前线红军战士书。

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因此决定先取万安，以求取得渡河点西渡赣江，然后同蒋军决战。

7月27日，我军由信丰、南雄边境地区北进，8月上旬陆续到达兴国及零都地区。

我军开始北进后，南康、新城之蒋军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于8月上旬分别进至遂川及其东南沙地地区，敌第二十八师亦集结万安。在此情况下，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认为，当时敌军主力摆在赣江以西，我军如按原计划渡江寻战，必将陷于不利地位；赣江以东敌军兵力比较薄弱，乐安、宜黄地区仅有敌1个师，比较好打。因此决定，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可利条件，如抚州（今临川）空虚亦可先下抚州。

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乐安、宜黄战役军事训令，决定以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为主作战军，首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夺取与威胁赣江、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以第十二军、新组成的第二十一军和第二十二军（分别由江西军区独立第三、第六师和独立第四、第五师编成）及江西军区、闽西军区各独立师、团为支作战军，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首长下达了进攻乐安的作战命令，以第一军团并指挥第三十一师、第二十二军之第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担任攻城；第三军团进至宜黄以南牌路港地区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攻城；第五军团位于乐安以南之望仙、南村附近为总预备队，准备打击敌增援部队。16日5时，第一军团以第三军袭击乐安未奏效。随后改为强攻，于17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第二十七师1个多旅，俘敌3000余人。

8月19日，我军续攻宜黄。宜黄守敌第二十七师约两个旅（4个

团欠1个营），以主力守城，一部据守城外工事。我军以第三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第一军团及第三十一师在城西北担任助攻，第五军团位于城西南龙源一带为总预备队。20日拂晓，第三军团首先对城南峨嵋山、北华山等敌人城外据点发起攻击，但未奏效。经调整部署后，再行攻击，于当夜歼灭守敌大部，残敌向北逃窜，我第三、第四军各一部尾敌追击，于22日将其大部歼灭于抚州以南之龙骨渡。宜黄战斗，我军共歼敌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与此同时，闽西军区独立第七师于19日占领宁化，第十二军于23日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一次成功的进攻战。我军两次正确地改变了西渡赣江北进同敌军主力决战的原定计划，先消灭乐、宜地区之敌。在战役中，能集中优势兵力，先歼乐安之敌，再转兵攻打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 五、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参见附图33)

1932年秋，敌人对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结束，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尚未准备就绪，继续采取守势。敌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分布是：乐安、南丰、抚州地区驻有8个师，峡江至万安线有6个师，赣南和闽西、闽南仍由粤军和第十九路军驻守，赣东北之余江、上饶、德兴地区有4个多师，赣闽边境之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地区只有新编第四旅和第二十四师、第五十六师各一部，兵力比较薄弱。

9月，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在蒋介石“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的方针。苏区中央局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于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这次会议，还对

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党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正确批评被指责为“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sup>①</sup>。结果毛泽东再次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不久，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会议精神，决定乘敌人新的围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出敌不意地击破敌人一方，消灭建宁、黎川、泰宁地区之敌，并于10月14日下达了战役计划。10月16日，我军由广昌地区出发东进，于18日至24日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广大地区，歼敌1个团。随后，敌人以第八师两个旅、第二十三师1个旅和第二十四师1个旅，分由南丰、南城向黎川反扑。我军为诱歼该敌，主动撤出黎川城，转移至黎川以南之团村、横村地区待机。10月23日，敌人第二十四师占领黎川。11月1日，我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军在南丰以东之沧浪、大洋源地区击溃敌人第八师两个团，敌退守石沟圩。次日，我军继攻石沟圩不克，便主动撤出战斗，转向东进，于11月3日再占黎川。黎川、石沟圩之敌撤回南城、南丰。建黎泰战役即告结束。

建黎泰战役，我军在敌仍取守势的情况下，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的方向，以较小的代价占领了建宁、黎川、泰宁广大地区，对以后的反“围剿”作战是有利的。但在我军占领这一地区后，中革军委不是让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巩固已占领地区，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要

<sup>①</sup> 参见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红军以进攻战略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粉碎敌人“围剿”于其大举进攻之前，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个决定显然是错误的。

## 六、金溪、资溪战役

(参见附图33)

建黎泰战役后，红一方面军接着发起了金资战役。

11月16日，我军分由黎川和邵武、光泽地区出发北进，17日击溃敌人第五师1个团，占领资溪，19日在金溪附近歼敌一部，占领金溪。敌人很快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七师分由南城、抚州向金溪合击，同时，调第二十三师由南丰向南城集结，以驻福建之敌一部进占邵武、光泽，进行策应。11月20日，第二十四师进至南城东北的礼西赵地区。21日，我第三军团及第三军主力向礼西赵之敌发起进攻，歼其1个团。22日，敌人第二十三师两个团赶到礼西赵增援，第二十七师也由抚州进到浒湾。我军由于兵力分散，以致在礼西赵与浒湾地区的作战都未能取得预期胜利。

不久，敌人将驻在赣江流域吉安、吉水、永丰地区的陈诚所部3个师调至抚河流域，连同原驻在该地区的军队共9个师，组成抚河方面“进剿”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1933年1月4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二十二军乘敌调整部署之际，消灭驻守黄狮渡之敌第五师第十三旅，俘敌1000余人。我第三十一师击溃敌人一部，占领金溪。敌人迅速增调3个主力师进至浒湾，并于7日以其中两个师向金溪进攻，1个师向黄狮渡进攻。驻南城之敌也以1个师向东北出击进行策应，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浒湾东南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以第一、第三两军团和第二十二军、第三十一师为右纵队，以第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由浒湾东进和南进之敌。8日，右纵队在金溪以西枫山埠地区击溃向金溪进

攻之敌第二十七、第九十两师，继以第二十二军沿抚河东岸追击逃敌，直至抚州对岸；左纵队将浒湾南进之敌第十四师阻于黄狮渡以西彭家渡、徐元一线，继在第三军团及第三军的配合下，将敌击溃，敌退南城。在此次战斗中，第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此后，敌军继续加紧准备新的“围剿”，我军则以战备姿态在金溪、浒湾、黄狮渡地区征集资材，继续准备同抚河流域敌人主力决战。历时近两个月的金资战役遂告结束。

红一方面军1932年的进攻作战，尽管由于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战役指挥员正确的战场指导，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取得了一些战役战斗的胜利。然而，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无论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巩固和发展红军与苏区的有利时机。

###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

#### 一、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 红一方面军向苏区内部退却

（参见附图34，附表27、28）

1932年底，敌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由蒋介石嫡系12个师组成的中路军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由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共6个师又1个旅编为左路军，蔡廷锴为总指挥，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又1个旅编为右路军，余汉谋为总指挥，这两路均为“清剿”军，担任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的行

动，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第三、第四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

敌中路军总兵力约70个团，16万人，组成3个纵队：罗卓英为第一纵队长，指挥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向宜黄、崇阴地区集中；吴奇伟为第二纵队长，指挥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二十七师（后任守备）、第九十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赵观涛为第三纵队长，指挥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第七十九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并以一部出资溪；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上述部队限1933年1月6日前集结完毕。1月底，蒋介石亲自到南昌组织这次“围剿”，准备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但敌人行动迟缓，到2月中旬尚未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金资战役以后，红一方面军以备战姿态集结于金溪、浒湾、黄狮渡地区。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不等敌人大举进攻布置完成，就集中一切力量，首先粉碎抚河敌人全部，然后各个击破增援敌人的指示，决定将闽浙赣苏区第十军、闽西苏区第十二军和赣南苏区第二十一军调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1月23日，第十军南渡信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随即同第三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和第二十一军也先后到达将乐以北和宜黄、乐安、崇仁地区。第十二军和第二十一军北调后，闽西和赣南地区分别成立了第十九军和第二十三军。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

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金溪以南地区两次准备以运动战歼敌第十四师和第九十师等部，均因敌军行动谨慎，未能达到目的。2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再次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



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敌人第八师主力约5个团部署在该城及其周围地区，1个团在里塔圩和新丰街防守。

2月9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南丰地区开进。11日，第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敌退集南丰城。新丰街之敌因归路被我截断，退至南城。12日晚，我第三、第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西北之敌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敌人主阵地。此时，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一面令南城第二十四师立即派队驰援南丰，抑留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朱德司令员和周恩来政治委员，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改以一部佯攻南丰，主力集结于南丰和里塔圩一线以西地域，待机打击援敌。

2月22日，我军得悉敌中路军以第一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迂回我军后方，而以第二纵队主力集中南城，1个师前出至新丰街，企图在第三纵队策应下，同我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敌人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于我不利，毅然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以第十一军伪装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敌人；方面军主力则陆续秘密转移到中央苏区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我军及时退却，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这对于随后胜利打破敌人“围剿”具有重大的意义。

## 二、黄陂战斗

（参见附图35，附表27、28）

我军主力由南丰附近地区主动撤退以后，敌军一时摸不清我军去向，以为我军主力退向黎川地区，一部退向广昌。同时，南丰守敌恐我军再次围攻，呼救仍急。

在此情况下，敌中路军为寻求我军主力决战，并解救南丰守敌，以第一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我军归路；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三纵队由金

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击我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为此，敌人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准备由乐安地区分经蛟湖、霍源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十一师会合。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人第一纵队同第二、第三两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且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向黄陂开进所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我军荫蔽集结，该路敌军又临近我军集中地，为我军歼灭该敌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因此，方面军首长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战歼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部署是：以第一军团（辖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4个师）、第三军团（辖第一、第二、第三3个师和第七军）、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荫蔽集结于金竹、大坪地区，待敌第五十二师进至蛟湖、桥头一线时，即突然对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歼灭该敌；以第五军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两师和第十五军）、第二十二军为右翼队，荫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地区，歼敌第五十九师，并保障左翼队翼侧安全；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独立第五师分别在永兴桥到杨坊之线和上下南源地区活动，积极钳制敌人，并保障右翼队翼侧安全；以第十二军为预备队，随第五军团跟进。2月25日，方面军首长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反“围剿”第一仗的完全胜利，给进攻之敌以迎头痛击；号召各部队利用战前或作战中的间隙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提高部队士气。26日，各部队先后进入预定地域，封锁消息，侦察敌情，进行临战准备。

2月26日，敌人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当晚分别到达太平圩、罗山街一带。27日，第五十二师按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四旅（欠第三〇九团）、师直属队、第三〇九团序列，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第五十九师按第一七七旅、师直属队、第一七五旅、独立团序列，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

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均较困难。当时细雨浓雾，10米之外人物难辨。敌人第五十二师因受我游击队袭扰，行动缓慢，加之误认我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因而疏于戒备，对荫蔽于行进道路南侧高地之我军主力毫无察觉。13时，敌第五十二师前卫进至桥头附近，我第一军团之第七师立即以一部兵力向蛟湖攻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与此同时，第七、第九两师主力向进至大龙坪之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猛攻，第十师、第十一师向进至小龙坪之敌后卫部队进攻，第二十一军也迅速赶至登仙桥附近地区，截断了敌人退路。经三小时激战，第一军团将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第一五四旅之第三〇九团等部歼灭，俘敌师长李明。取道大龙坪、坪口、跃龙坪向黄陂前进之敌第一五五旅第三一二团也在跃龙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敌前卫第一五五旅主力进到桥头附近后，从激烈枪声中得知大龙坪方向和黄陂方向发生了战斗，但因情况不明，且不断遭到我游击队的袭扰，被迫就地停止，占领阵地。18时，我第三军团赶到，随即将敌第一五五旅主力合围于桥头。28日8时，第三军团向桥头之敌发起猛攻，将敌逐次解决；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蛟湖之敌第一五四旅主力，在第一军团一部协同下，于11时全歼该敌。

我右翼队先头于27日11时30分到达黄陂、秀源一线，发现敌人第五十九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右翼队首长随即令第二十二军之第六十四师向霍源方向急进，先敌占领黄陂西北一带高地，第十五军在霍源以南占领阵地，求歼敌人第五十九师于黄陂、霍源地区。13时，第十五军同敌第五十九师之前卫第一七七旅接触，激战数小时，击溃了敌人。敌师长陈时骥在战斗打响后，一面令后卫第三五一团主力、独立团在西源及其以西地区转入防御，一面亲率第一七五旅主力向前增援。战至黄昏，敌我形成对峙。我右翼队首长决定以小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息，并调整部署，准备次日再攻。28日8时，我右翼队向敌第五十九师发动全线进攻。经激烈战斗和反复争夺，于19时

前稍相继攻占云峰山、军山，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并在第三军团一部配合下，于霍源地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敌师长见败局已定，即率残部数百人乘夜暗向蛟湖方向逃窜，企图同第五十二师会合，在逃至蛟湖附近时，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歼灭，于是仓皇转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上午，该敌行至登仙桥东北地区时，被我第一军团歼灭，师长陈时骥被活捉。留在西源的该师后卫第三五一团大部和独立团在敌第十一师接应下逃向河口。

这时，敌人第二、第三两纵队正由南城、南丰地区兼程西援，企图夹击我军。我军为争取主动，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准备继续歼灭来犯之敌。

### 三、草台岗战斗

（参见附图35，附表27、28）

黄陂战斗以后，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敌人仍然摸不清我军去向。3月中旬，陈诚鉴于黄陂地区作战失利，遂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如下：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及第三纵队第五、第九两师为后纵队，第三纵队第六师在抚州守备，第七十九师在宜黄地区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寻歼我军主力于广昌地区。16日，敌军前纵队到达新丰市、侯坊、草台岗一线，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获悉敌人向广昌进攻的意图后，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第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积极进行活动，吸引敌人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一面令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陈诚误认为第十一军是我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之第五师配属前纵队指挥。3月20日，敌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之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

第五十九师残部在第十一师后跟进，第九师进至东陂附近。这时敌人前后两纵队之间相距近50公里，后纵队力量又比较薄弱，再一次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战机。

红一方面军首长抓住这一时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敌人第十一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尔后相机各个歼灭其他进犯之敌。部署是：第五军团、第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其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嶂一带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其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人第九师同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20日黄昏，敌人第十一师陆续到达徐庄以南地区，第五十九师残部进抵雷公嶂附近，第九师在东陂担任掩护。第十一师因山路崎岖，地形复杂，夜间行军困难，便在霹雳山一带露营。不久，该敌前卫同我第五军团一部接触后，全师就地转入防御，以第三十二旅占领霹雳山、龙咀寨、黄柏山阵地，以第三十一旅两个团占领龙咀寨以北及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之线，师部和预备队1个团在徐庄。

20日夜，我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21日拂晓，我军发起进攻。左翼队以第三军团第一师进攻霹雳山之敌，第七军、第二师进攻黄柏山之敌，第一军团第十师、第十一师进攻草台岗、黄柏山、徐庄之敌，第二十一军向大公田、西岭进攻，牵制东陂之敌，并负责切断东陂之敌同敌第十一师的联系；右翼队以第五军团第十五军向龙咀寨之敌攻击，第三十九师向雷公嶂之敌攻击，第十二军进至东陂至侯坊大道东侧山地，钳制东陂之敌。10时，第三军团第一师突破霹雳山敌阵地，第三师随即在第一师方向投入战斗，迅速包围了徐家墩之敌。12时，第一军团第七、第九两师沿黄柏山北部向敌第十一师师部驻地徐庄发起猛烈进攻，迅速完成了对敌分割包围。经激烈战斗，我军左翼

队于13时攻占徐庄、徐家垅，歼敌第十一师师部及1个团，黄柏山守敌两个团在突围中亦大部被我歼灭。右翼队攻占了龙咀寨阵地，歼敌约两个团。至此，敌人第十一师大部被歼。

在我攻歼敌人第十一师时，敌人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的1个团在罗卓英督令下，曾积极进行援救，在雷公岷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了我军严重打击。第十一师被歼以后，敌中路军各部队纷纷后撤，敌人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

在敌人中路军向中央苏区“进剿”期间，蒋介石曾要其左路军和右路军积极策应中路军作战。但是，这两路敌军同蒋介石之间矛盾很深，都想保存实力，一直没有积极行动，加之苏区军民广泛开展袭敌扰敌活动，因而未能起到预期的配合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搬到中央苏区，并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周恩来、朱德在红军攻南丰不克，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适时定下了正确的决心，毅然采取退却步骤，即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在敌人多路进攻的情况下，红军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歼击敌之一路，黄陂、草台岗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 四、东方军入闽作战

(参见附图36)

1933年5月，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另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

员，在前方指挥作战。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同时，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后，第一军团辖第一、第二、第三师，第三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辖第十三师，第七军团（实际到10月才正式建立）辖第十九、第二十师。另外，福建军区第十九军改编为第三十四师，第十二军改编为独立第一团。赣南地区的第二十三军随后也改编为第二十二师。

6月1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了临时中央关于今后作战的指示。临时中央在这个指示中，提出了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通过主力红军的分离作战，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指示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作战计划，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然后集中方面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7月1日，中革军委下令，以第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随着战争的发展，第三军团第六师、第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七军团第二十师，以及第二十一师一部陆续编入东方军序列），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活动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的红一军团（欠第三师）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后来，第三师、第十四师也加入中央军序列），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

7月1日，东方军主力由广昌地区出发，于5日到达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了入闽作战。当时国民党驻福建部队主要是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七十八师和补充师），以及归第十九路军指挥的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和新编第二师、新编第四旅。

我东方军入闽以后，积极展开进攻。7月上旬，围攻泉上。9日，袭占归化（今明溪）。10日，于延洋歼灭增援泉上之敌5个连，在马屋附近击溃敌1个团。14日，占领清流城。19日，攻克泉上，歼敌1

个团。7月底，攻占朋口，歼守敌1个团的大部和援敌1个团。8月2日，连城守敌弃城逃跑，我军进占连城。东方军经一个月艰苦战斗，先后占领归化、清流、泉上和朋口、连城、新泉、白沙等地，俘敌3000余人，恢复和扩展了大片苏区。

8月中旬，东方军奉命向北开进。下旬，以一部兵力围攻将乐和顺昌；主力围攻延平，调动闽敌，求歼援敌于运动中。敌第十九路军应延平守军第五十六师的请求，由总指挥蔡廷锴率部增援。我军以少数兵力佯攻延平，集中主力准备歼击援敌。由于蔡廷锴行动谨慎，增援不积极，我军除在青州和尤溪口歼其1个多团外，未能歼灭更多的敌人。我军围攻将乐、顺昌也久战不克。不久，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东方军即奉命北上作战。

在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同时，我中央军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新淦之间打击敌人筑碉部队和破坏敌人封锁线，除在乌江地区歼敌第八十师第二三八旅3个团及师直属队外，未能阻止敌人构筑碉堡封锁线的活动。

东方军入闽作战，历时近三个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本身也受到削弱，中央军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活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纵观全局，主力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以后的反“围剿”作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

###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

（参见附图37，附表29、30）

1933年5月，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在南昌



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对其新占领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制订了“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sup>①</sup>等原则。

1933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火炮，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创办军官训练团。同时编印《剿匪手册》，着手制订“围剿”计划，调集和整编军队，加紧进行“围剿”的准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人。“围剿”开始时的部署是：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担负对中央苏区的主攻。其第一路军4个师又2个旅，配置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军6个师，配置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18个师和1个补充旅，以14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3个纵队，另4个师1个旅为守备队，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在北路军中，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其任务是：在第一、第二两路军的策应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总预备队3个师控制于抚州附近。此外，北路军总司令部还直接指挥两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

<sup>①</sup> 参见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二），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241页。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我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此外，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所部及归其指挥的共7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所部5个师又4个保安团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在分别“围剿”闽浙赣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同时，负有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和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

红一方面军在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面前，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但是，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很多。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内战的政策，日益引起全国人民以及敌军广大官兵的不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虽占很大优势，但各派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红军情况与敌军相反，中央苏区经过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和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高涨，苏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只要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去指导战争，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是有可能的。

## 二、在军事冒险主义方针 下，红军的进攻作战

（参见附图38，附表29、30）

1933年9月25日，敌人以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

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

当敌人向黎川发动进攻时，中革军委仓卒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以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sup>①</sup>。敌人于9月28日凌晨占领黎川城后，中革军委为求恢复黎川，命令东方军以一部赶到黎川西南，阻击黎川敌人向南推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红军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保障东方军对黎川地区之敌的进攻。

10月6日至7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的途中，于不预期遭遇战中歼灭了由黎川向洵口、飞鸢游击侦察之敌3个团，俘敌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9日进攻硝石之敌第二十四师，连攻数日未克。红军中央军也未能阻住南城敌人东援。13日，南城之敌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四等4个师进抵硝石，我东方军被迫于当晚撤出战斗。这样，红军在反“围剿”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

10月17日，敌南昌行营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同日，南城之敌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和黎川之敌两个师又1个旅进占了资溪桥。至此，敌人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宽的地区就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企图首先完成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我军攻击而消灭之。

中革军委无视这一情况，继续命令我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

---

<sup>①</sup> 转引自红一方面军1933年9月27日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

战斗”<sup>①</sup>。10月18日，又命令第一军团进到抚河以东，准备集中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三、第十九师等部，同敌人在资溪桥地区决战。22日，我军以第三、第十三、第十五师向资溪桥、潭头市发起攻击，以求牵动敌人；第三军团集结于石峡、洵口地区，第一军团主力集结于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的敌人。结果，进攻四天，既未能占领资溪桥和潭头市，也未能牵动敌人，我之主力却在敌人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十分疲惫。26日，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

中革军委10月28日决定正式组建红军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第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和第三十四师，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第九军团下辖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

此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以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敌。11月11日，第七军团在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和金溪、琅琊出击之敌的夹击，我第三军团立即赴援。敌人一面在八角亭东南抗击我第三军团，一面猛攻坚守八角亭附近高地的我第七军团。12日，我第三军团主力多次向敌阵地攻击，在敌人密集火力和飞机低空扫射下，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第七军团也在阵地被敌突破后，仓忙后撤。这一仗，我军伤亡共达1100余人。

11月15日，我中央军奉命以主力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之第十四师由见贤桥至棠阴敌人堡垒封锁线的间隙北出，以配合东方军的作战。敌人立即集中第五、第七纵队共10个师，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我军，企图断我归路，消灭我军于封锁线以北地区。我中央军折回至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日，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分别向我云盖山、大雄关阵地攻击。我军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继续向苏

<sup>①</sup> 参见中革军委1933年11月20日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

区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

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己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至此，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宣告破产。

### 三、在军事保守主义方针下， 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

（参见附图39、40，附表29、31）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想以此“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sup>①</sup>

正当我军按照上述指示布置防御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由宁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发生时，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sup>②</sup>但是党的临时中央拒不采纳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害怕我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苏区，又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① 参见中革军委1933年11月28日对各部任务及动作的指示。

②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0页。

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策略思想。他们没有采取积极行动配合第十九路军，而是将我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使我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为了保障其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于12月11日以第八纵队3个师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犯，同时以第五纵队4个师集中在三都、横店和黎川附近地区策应。12日，其第八纵队两个师进至团村地区，向我第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首长急令已奉命西调但尚在团村附近的第三军团和第三师、第三十四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且突击过早，仅击溃敌人一部，未能大量歼灭敌人。13日，中革军委决定按原定计划，将第三军团、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之第十四师西调，会合由陈毅指挥的西方军（1933年11月由江西地方部队组成）进攻永丰堡垒地区之敌。16日至20日，由黎川南出的敌人在侵占团村、东山、德胜关、黄土关后，即在东山至德胜关和东山经熊村、黄土关至光泽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对我军暂时改取守势。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担任。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国民党在镇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十九路军以后，随即将其入闽的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中革军委不但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要求我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从

1月下旬至3月下旬，第五军团在黎川以南之横村、樟村的阵地防御战；第一军团、第九军团和第三军团第四师对建宁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阵地反击战，在凤翔峰的阵地防御战；第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第一军团、第九军团协同第三军团对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阵地反击战；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对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反击战等，虽然部队打得非常勇敢顽强，但都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之进攻计划，反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仅3月中旬的三溪圩、三坑反击战，我军伤亡就达2200余人。

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4月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其中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等5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西岸进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等5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在河西跟进。敌人进攻正面共约5公里，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碉前进。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急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师，龙冈地区的第二十三师，协同原在广昌地区的第九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并且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面战”，“胜利或者死亡”<sup>①</sup>等错误口号。部署是：以第九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固守白舍以南碱水岩、罗家堡一线防御阵地，阻敌前进；集中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准备对敌实行“短促突击”。

广昌保卫战开始时，抚河东岸之敌向大罗山、延福嶂的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我军顽强抗击，使敌进攻受挫。抚河西岸之敌乘我军主力

<sup>①</sup> 引自1934年4月28日《战斗报》社论。

集中于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了我第九军团的阵地，于4月14日占领甘竹。19日，东岸之敌攻占了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我军向进占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经多次冲杀，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被迫撤退。20日，抚河西岸敌人由甘竹向长生桥进攻，抚河东岸敌人由大罗山、延福嶂向高州墩推进。当日黄昏，我军再次在抚河东岸向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反击，结果未能歼灭敌人。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我中革军委以第九军团第三师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在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第九军团第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又一次向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仍未奏效，被迫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是一次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5月中旬我军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6至7月间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都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敌人相继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苏区进一步缩小。

此后，敌人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了部署：以北路军直接指挥的6个师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4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先以4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9个师向宁都和驿前、石城推进；以东路军为主的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7月上旬，上述各路敌军发起了向中央苏区中心区的全面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我军已经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军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歼灭敌人。党中央虽然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但无结果。中革军委在7月间派出第七军团3个师6000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



队”的名义，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军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是，由于兵力小未能牵动敌人。此后，红军反“围剿”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sup>①</sup>并采取了六路分兵<sup>②</sup>、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8月5日，敌人北路军集中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我第三军团主力和第五军团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在6日的高虎脑、半桥防御战和14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担任防守的我军，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我军也因伤亡严重（伤亡2300余人，内干部600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在敌人北路军向驿前进攻的同时，其余各路敌人也向中央苏区中心区推进。9月1日至3日，我第一军团、第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虽然在温坊地区以运动战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敌，歼敌1个多旅，给了敌人东路军一个打击，但是已改变不了我军的被动局面。中革军委以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使我军陷人更加被动的境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

① 引自中央1935年1月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② 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对向苏区中心区多路进攻之敌，实行军事平均主义。以第三军团第六师和第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沙村地区，抵御敌人第八纵队的进攻；以第二十三师和江西独立团、营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人第六纵队的进攻；以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人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第三军团第四、第五两师和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人第三、第十纵队的进攻；以第一军团、第九军团及第二十四师在明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人东路军的进攻；以第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敌人南路军的进攻。这就形成了红军的“六路分兵”。

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狭小地区。

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由地方武装新组建的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

#### 四、在逃跑主义方针下，红军仓促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其围歼我军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包围圈，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sup>①</sup>。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为其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对于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党中央不仅没有在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也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根据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10月7日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先后将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八军团、第九军团和第五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持续了一年之久。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连续作战，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苏区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1页。

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竭尽全力支援了战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这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 第五节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 等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也进行了“围剿”。这些地区的红军，在中共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苏区人民支援下，英勇作战，消灭了许多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同时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危害，这三个地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最后也都归于失败。

### 一、湘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参见附图41)

湘赣苏区红军经过几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八军进行了扩编，并正式成立了军的领导机构，肖克任军长，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兼政委。湘赣军区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1.3万余人。

当敌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中革军委于1933年2月命令红八军北渡袁水，会同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军，打击袁水流域之敌，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作战。红八军于3月10日在新余以西地区两次强渡袁水都未成功。此后，红八军遂改变计划，沿袁水南岸向东进击。

3月中旬，敌人以湘军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三师为主力军，对湘赣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八军为保卫湘赣苏区，经中革军委批准，由袁水地区急速返回永新。接着，转至遂川地区寻机歼敌。4月7日，红八军在零田圩歼敌第二十八师1个加强营。这时，敌人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五师分别进占了莲花和永新，并且继续东进，企图围歼

红八军于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红八军迅速绕到永新县的牛田地区，使敌企图落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退出永新，据守宁冈和莲花。我湘赣军区随即组织地方部队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活动，积极袭扰、围困莲花之敌第六十三师。

5月初，莲花之敌4个多营到茶陵接运物资。6日，红八军、独立第十二师及茶陵独立团乘敌由茶陵返回时，在莲花县的界化陇和九渡冲之间地区设伏，歼灭该敌大部。7日，又给由莲花来援之敌两个多团以歼灭性打击。两仗共俘敌1000余人，缴枪近1000枝（挺）。28日，敌第十五师和第十九师各1个旅护送大批物资由茶陵前往莲花。29日，红八军和独立第十二师在莲花县棠市及其以南地区截击该敌，经半日激战，俘敌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枝和大批军用物资。至此，敌人对湘赣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

1933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派任弼时担任湘赣省委书记（不久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6月中旬，红八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改编为红十七师，并同由湘鄂赣苏区调来的红十八师（原为红十八军，来湘赣苏区后，缩编为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组成红六军团。当时没有成立军团领导机关，暂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

7月，中革军委发布了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纲领，规定红军应“首先迅速的给河西湘敌、闽西闽敌以打击，目的在消灭其实力，建立在抚河以东、赣江以西的两作战线，系辅助方面军的主力作战，以造成战略攻势和与敌决战的有利条件”。命令红六军团在9月底以前先在永新、宁冈、莲花和茶陵地区消灭敌人西路军第一纵队主力。红六军团根据这个指示，从7月底至10月中旬，在上述地区转战两个多月，不仅没有消灭敌人，反而消耗和疲惫了自己。

1933年11月，敌西路军以第一纵队3个师为主，对湘赣苏区发动了进攻。红六军团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经数日激战，歼敌近1000人，阻止了敌人的进攻。1934年1月，敌人再次发动进攻，占领

了梅花山，并继续向永新推进。这时，中革军委不顾湘赣苏区的实际情况，命令红六军团以第十七师迅速北渡袁水，会同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破坏南浔铁路，威胁南昌，以吸引赣江以东敌人，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红六军团随即以第十八师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以第十七师北渡袁水。2月3日，红十七师在奉新县黄沙打退了敌人两个旅的进攻，并于当晚同由九仙汤地区赶来的红十六师会合。接着，两师由黄沙向南浔铁路之马回岭地区开进，准备寻机破路。15日，到达瑞昌县的大坳、小坳。这时，敌人发觉红军的企图，急调重兵防堵和追击，两师的联系被敌切断。红十七师在修水、浏阳、通山等地转战一个多月，3月25日，返回湘赣苏区，在安福县之洋溪同红十八师会合。红十六师继续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

4月5日，敌人第十五师由永新向沙市进犯，红六军团在沙市、澧田大道以北地区设伏，当敌第十五师前卫第四十三旅进入我伏击地域时，我军迅速以一部阻击敌后续部队，集中主力对敌前卫旅之行军纵队猛烈突击，战约3小时，全歼该敌，毙伤俘敌旅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挺），给了深入苏区之敌以严重的打击。

沙市战斗后，中革军委要红六军团以阵地战来保卫苏区，打败敌之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湘赣省委根据上述指示，提出“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并动员军民，在永新花溪、石灰桥及其附近的狭小地区内修筑碉堡工事，准备以阵地战同敌人硬拼。

6月3日，敌人以第十六师的3个旅和第六十二师的1个旅，向我永新金华山阵地发起猛攻。红六军团同敌人展开了20多天的阵地争夺战。6月底，敌人又以第五十三师由安福、金田地区向永新东北的怀忠、桂林坊地区进攻。红六军团以第十八师在金华山坚守，第十七师转移到松山、神功山一带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第五十三师。后来，在敌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下，我军全部阵地先后被敌攻占。7月4日，红六军团转移到永新城东南的牛田和津洞地区，准备恢复和依托井冈

山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7月2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转移，同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取得联系。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向湘中转移。湘赣军区则率地方武装继续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

## 二、湘鄂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参见附图42）

1932年3月，湘鄂赣苏区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成立湘鄂赣军区，孔荷宠任总指挥，黄志竞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六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以及南路、东路、北路3个指挥部。至7月，全军区红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1.6万余人，枪6500余枝（挺）。湘鄂赣苏区大体上形成了以小源为中心的万（载）宜（春）萍（乡）浏（阳）苏区，以幽居为中心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苏区，以黄沙港为中心的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苏区，以龙港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等四块较大的苏区，此外还有若干小块苏区。这些苏区由于敌人的分割，互不相连。9月10日，敌人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先后占领龙港、燕夏和小源等地区。红十六军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收复了小源等部分被占领的苏区。

1933年1月，中革军委下令要湘鄂赣红军向东南方向行动，威胁南昌，以牵制即将“围剿”中央苏区之敌。红十六军和由独立第一、第二两师编成的红十八军等部，4月初由万载高村地区沿锦水北岸向东挺进，在宜丰县港口地区作战，歼敌近4个营，缴枪660余枝（挺）。

我军东进后，敌人第十六师等部由浏阳地区乘虚向小源苏区进攻，我军随即西返。4月中旬，红十六军等部在小源以西的株木桥，同进攻小源之敌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6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十六军改编为红十六师，红十八军改编为红十八师。随后红十八师调往湘赣苏区，归属红六军团建制。

1933年秋，蒋介石在以主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命令西路军何键以第二纵队3个师和第三纵队两个师又3个旅，发动对湘鄂赣苏区的“围剿”。

9月至11月，红十六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在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积极开展活动，以吸引湖南敌人，策应红六军团作战。但因力量太小，未能调动敌人。12月，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十六师向袁水下游进攻，以威胁樟树、南昌，配合红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日，红十六师由小源向东南方向行动。24日，乘虚占领清江镇（今临江）。26日，占领西山万寿宫，歼敌两个营，缴枪300余枝和大批军用物资。此后，红十六师迅速西返，于30日进到修铜宜奉苏区。红十六师这次行动，虽然歼灭了一些敌人，但自身也伤亡800余人，这主要是由于中革军委赋予红十六师力所不及的任务而造成的。

1934年2月初，红十六师同红十七师在奉新县之黄沙会合后，共同在湘鄂赣地区转战一个多月，继续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破坏南浔路，威胁南昌，吸引赣江以东敌人的任务。3月中旬，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红十六师返回幽居地区。

5月中旬，红十六师在修水县全丰地区同独立第三师会合。两部合编为新的红十六师。红十六师为恢复修铜宜奉苏区，主力由全丰地区向东折向南进，6月上旬进至宜丰、奉新边境时，被正在修铜宜奉地区“清剿”之敌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的6个团包围。我军同优势敌人浴血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少数人员突围出来，于8月间转移到平浏修铜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全丰地区活动的红十六师一部，也于6月上旬被敌包围，遭到重大损失。

### 三、闽浙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

（参见附图43）

1932年6月，敌人调集4个师另1个旅的兵力，准备对赣东北苏

区发动新的“围剿”。中共赣东北省委根据临时中央提出的以“坚决的进攻”粉碎敌人“围剿”的方针，要求红军在敌人进攻苏区以前，不断向敌人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配合红一方面军，以争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6月20日，赤色警卫师奉命南渡信江，进入余江、东乡地区作战，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并在信江南岸开辟新苏区。部队过河后，遭敌袭击，于24日被迫撤回苏区。

9月上旬，红十军南渡信江入闽作战，以求打通赣东北与闽北苏区的联系，并扩大闽北苏区。17日，红十军在闽北独立团配合下，攻占崇安县星村、赤石，20日攻克浦城。两仗歼敌约3个团，缴获长短枪480余枝，电台两部，筹款10万元。

9月中旬，敌人集中5个师的兵力开始对赣东北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赣东北省委根据敌人分路进攻的情况，决定集中红十军和赤色警卫师打击敌人第五师，以地方武装对付其他各路敌军，同时动员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和赤卫队支援作战。10月初，红十军由闽北回到赣东北苏区后，即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一起，以游击战不断袭扰和打击敌人。10月底，敌人第五师占领了苏区中心葛源，但在红军和人民群众的不断打击下，饥疲交困，疲于奔命，伤亡近1000人，被迫于11月上旬退出葛源和横峰城。接着，其他各路敌军也先后退出苏区。

12月11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赣东北省委改为闽浙赣省委，赣东北军委会改为闽浙赣军区总指挥部，唐在刚任总指挥，省委书记曾洪易兼政委。

1933年1月，中革军委命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同第三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军，归属红一方面军建制。红十军调离后，闽浙赣军区将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的红十军，王如痴任军长兼政委。

2月中旬，进攻闽浙赣苏区之敌主力3个师调往金溪地区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闽浙赣苏区红军同留在当地“清剿”之敌进行了多次战斗，保卫了以葛源为中心的苏区，挫败了敌人的



“清剿”。

1933年秋，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以浙赣闽边警备区之5个师和4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苏区。红十军与敌作战两个月，消灭敌军一部。11月下旬福建事变发生后，红十军根据红一方面军首长的指示，转到闽浙赣苏区东部执行扰乱敌人后方的任务，先后取得上饶罗桥、枫岭头和横峰姚盘山等战斗的胜利，歼敌两个多团，缴获了大批冬衣。

蒋介石镇压了第十九路军后，于1934年3月4日重新调整部署，以4个师和1个保安纵队，采取依托堡垒，逐步推进的战法，对闽浙赣苏区再次发动进攻。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决定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来阻止敌人的进攻。为此，动员了几万军民抢修碉堡，并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等错误口号。从3月中旬开始，红十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同敌人担任主要进攻的第二十一师在横峰至上饶一线展开了激烈的堡垒战、消耗战，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未能挡住敌人的进攻，闽浙赣苏区也日益缩小。

11月，红十军同由皖南转入闽浙赣苏区的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在葛源以北的重溪等地会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两部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

蒋介石为消灭闽浙赣苏区红军，又增调3个师和4个旅又1个保安纵队加紧“围剿”。红十军团奉命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浙皖边新苏区，以调动围攻闽浙赣苏区的敌人，并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这一行动。11月中、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先后出动。12月12日在歙县汤口会合。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皖南地区作战中连连受挫，被迫返回赣东北地区。15日，红十军团进至德兴县港头村时，遭敌袭击，部队被截成两段。先头部队约1000余人，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率领下，迅速突过了敌人封锁线，进入赣东北老苏区，随后组成挺进师，转战于闽浙边地区；军团主力

约2000人，没有突过敌人的封锁线，被七倍于己的敌人合围于怀玉山地区，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与此同时，坚持闽浙赣苏区斗争的红军也被迫分散转至外线活动。至此，闽浙赣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遂告失败。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曾取得过许多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党中央、中革军委错误的战略指导和给予这些地区红军力不胜任的任务，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这些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最后也遭到了失败。

## 第六节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 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界地区

#### 一、第四次反“围剿”前的情况

（参见附图44）

1932年3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不顾红军在连续作战后急需休整，和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剿”的实际情况，要求红军乘胜展开进攻，并强调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因此，命令红三军打下京山城，扩大新苏区。根据这一命令，红三军于3月中旬以一部兵力强攻京山，结果城未攻克，部队却遭到很大伤亡。在此期间，敌第十军军长徐源泉集中8个多旅的兵力于湘鄂西苏区边沿，3月底，以4个旅进占襄河以北地区的瓦庙集、梅家湾和卫家场一带村镇。红三军对该敌发起攻击，由于没有形成优势兵力，虽经激烈战斗，未能歼灭敌人，敌援兵赶到，我军被迫撤出战斗。5月下旬，红三军依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全力消灭进攻之敌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会同游击队阻击敌“清剿”我襄北<sup>①</sup>沔汉湖地区的

<sup>①</sup> 襄北，即襄河以北地区。

部队，主力将进到张家场地区之敌第四十四师3个团包围，经连日激战，未能解决战斗，后因皂市敌人增援，我军遂撤出战斗。瓦庙集、张家场战斗，共歼敌约3000人，我军却伤亡4000余人，这两仗都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6月初，川军第二十一军为策应襄北之敌的作战，以3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从潜江、老新口、监利一线分三路向洪湖苏区进犯。红三军主力急从襄北回师，以第七师前出下蚌湖地区，打击左路敌军侧背；第九师（欠第二十五团）进入东荆河以南苏区中心区域，求歼中路敌军；红军学校之学生队在陈沱子口，阻击右路敌军。

6月9日，第九师由襄北返回新沟咀地区，同原在该地的湘鄂西省军委警卫团会合后，连夜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准备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以逸待劳，歼灭进犯之敌。13日，进占老新口之敌第四师被我小分队诱至新沟咀西北地区，当其同我正面部队激战时，我荫蔽在新沟咀以东的3个骑兵连利用河堤遮蔽，迂回至敌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我正面部队也乘势举行反击。敌腹背受攻，慌乱溃逃。我军追至熊口一带，将其全歼，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挺）。第七师也在浩子口、下蚌湖一线堵截撤退之敌，歼敌第三师一部。

正当苏区军民与敌浴血奋战之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从5月起，在苏区的党和红军中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这次肃反，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采取了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使大批优秀干部被捕被杀，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 二、第四次反“围剿”

（参见附图45，附表32、33）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大约50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首先对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其左路军10余万人，

担任对湘鄂西苏区的“围剿”，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

7月6日，敌左路军下达“第一期进剿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先包围歼灭襄河北岸之我军，尔后转入襄河南岸作战。其部署：第十三师6个团、第四十四师6个团、第四十八师5个团和第四十一师1个团、独立第三十七旅3个团分别编为4个纵队，另以6个团为总预备队，向襄北苏区进攻；川军第二十一军10个团编为两个纵队，向襄南苏区进攻；第五十一师、第四十一师、第三十四师、第三十三师、第八十二师、新编第三旅、独立第三十八旅各一部，以及第二十一军的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等任务。

在敌人即将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前夕，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根据临时中央6月5日关于“湘鄂西红三军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四军<sup>①</sup>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的军事训令，命令红三军主力再次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寻求作战。7月2日，红三军以第八师再次围攻京山城，主力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7月15日，敌人开始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第四纵队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等渡口推进，企图控制渡口，阻止红三军南渡襄河；集中第一、二、三纵队分别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向京山地区合击红三军。根据上述情况，我军随即撤围京山，向西转移。敌人发现我军西移后，即集中兵力跟踪西进，寻我主力决战。红三军为改变不利态势，随即掉头东进，以一部撤至襄河南岸。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地区活动。因敌人兵力强大，红三军主力被迫于26日转至荆门东南地区。8月3日，在潜江县熊口地区同红三军其余部队和军委警卫师（由军委警卫团和鄂西北独立团编成）

<sup>①</sup> 红四军，指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

会合。至此，敌人基本控制了襄北地区。

8月上旬，敌人制订了以摧毁洪湖苏区中心区为目的的“第二期进剿计划”，并调整部署：以第三纵队（第三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独立第三十八旅、第十军特务团）、第四纵队（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七旅、新编第三旅）为左翼军，由岳口进攻洪湖苏区中心区；第一纵队（第十三师）、第二纵队（第四十四师）留于襄北地区担任“清乡”，并作为左翼军总预备队；川军第二十一军两个纵队为右翼军，位于东荆河西岸担任堵截任务；海军一部封锁长江，以防我军南渡。

这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命令红军在苏区内构筑碉堡，准备固守。同时，为了牵动敌军，并取得粮食和物资，命令红三军以第七、第八两师向沙市、草市进攻。8月13日，第八师顺利袭入草市，歼敌500余人，缴枪数百枝；第七师进攻沙市失利，被迫退出战斗，撤回龙湾、熊口地区。

8月20日，敌人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直接威胁着湘鄂西苏区首脑机关所在地瞿家湾。面对这种情况，红三军首长提出了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击破敌人“围剿”的正确意见。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这个意见，错误地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指挥第七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构筑碉堡，分兵把口，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红三军主力为另一路，由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指挥，深入敌后，先求给敌右翼军以打击，然后转到襄北打击敌人。

8月24日，敌人左翼军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南岸要点峰口和府场。我第七师等部仓促向进占府场等地之敌反击，结果受挫。这时敌人第四纵队一部进占渔阳镇。31日，该敌两个旅进攻新沟咀，第三纵队1个旅进攻杨林关。我军依托阵地进行防御，经一天激战，损失1个多团，师、团主要领导干部伤亡很大，被迫撤出战斗。9月3日，敌人第三、第四两纵队4个多旅攻占我柳关、瞿家湾、小沙口等阵

地，继向洪湖沿岸地区进攻。洪湖苏区除福田寺、太平桥和朱河周围四五十里地区外，其余全部失陷，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多人落入敌手，隐藏在湖区的数千枝枪和一些迫击炮也被敌人搜去，医院、兵工厂等全被焚毁。在此严重情况下，中央分局决定，留下省委机关及监利、沔阳两县警卫营和各区游击队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第七师和警卫师立即向西转移。

奉命转到敌后去牵动敌人的红三军主力，于8月22日从浩子口附近转到敌人第二十一军的侧后荆门地区，即同尾追之敌8个团周旋10余日，未能找到歼敌的机会，于9月中旬转到京山地区。这时，襄北的主要城镇已全部失陷，革命力量已被敌摧毁殆尽。我军主力重来后，敌人立即调集4个多旅，会同安陆、应城、京山、钟祥等地守军，对我进行追击和堵截。从9月底开始，我军时分时聚、忽东忽西，在旧口、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同追堵之敌周旋，多次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夏曦率湘鄂西中央分局、警卫部队和第七师撤离洪湖中心区域，先后转移到江陵地区和荆门地区活动。最后，转至襄北地区，同在该地区活动的红三军主力会合。不久，洪湖苏区便全部丧失。

敌人在大举进攻洪湖苏区的前后，对我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发动了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这些苏区也先后遭到了失败。

### 三、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界地区

（参见附图46）

1932年10月中旬，红三军从钟祥地区转移到大洪山区。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枣阳王店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洪湖苏区，绕道豫西南和陕西转往湘鄂边地区。

11月初，红三军从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南。接着，连续

冲破敌人的追、堵、拦、截，于11月中旬进入伏牛山区。下旬，在西峡口附近打退敌人第十五路军1个旅的追击，进入陕南，在武关歼敌1个营后，由洵阳、安康间渡过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在大昌镇歼敌川军1个营和保安团一部，接着抢渡长江，攻克巴东，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鹤峰地区。红三军在两个多月艰苦的行军作战过程中，又遭到第二次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损害，部队由出发时的1.4万余人减到9000人左右。

红三军到达湘鄂边时，正值四川军阀发生内讧，川军第二十一军全部西返。红三军乘虚于12月30日攻占鹤峰。次年1月，继占桑植。这时，湘西地方军阀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为保存实力，写信给我军，以让出一部地盘为条件，希望同我互不侵犯。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不知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却命令红军向该敌进攻，结果未能取胜，被迫撤出桑植，转往鹤峰毛坝地区。

2月 中央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鹤峰及其周围发展苏区，并将红三军部队缩编为第七、第九两师。3月，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会议，夏曦从极“左”的观点出发，认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9/10是“改组派”，“改造党已不能依靠旧的干部”<sup>①</sup>，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的决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4月至7月，红三军在鹤峰、建始、巴东、宣恩四县边界地区活动，以求建立以鹤峰为中心的苏区，但未能实现。7月下旬，红三军根据中央分局决定率第九师转移到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游击，开辟新苏区，留第七师在鹤峰地区坚持斗争。红三军两师分兵作战，对敌斗争未能取得有效成果。12月上旬，第七师同军部和第九师会合。

红三军集中以后，进至咸丰大村，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举行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12月下旬，红三军进入四川，

<sup>①</sup> 参见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

攻占黔江，歼敌1个团大部。后在敌反扑下转回咸丰、利川境内。1934年1月3日袭占利川。接着就在利川、咸丰、宣恩、万县边界地区与敌周旋，后来转至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县境内活动。由于我军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创造新苏区的计划又未实现，部队实力减至3000人左右。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日占领沿河，19日进驻枫香溪。中央分局随即在这里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在红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在黔东创建新苏区。接着，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夏曦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

会后，红三军重新建立起党、团组织，恢复了军政治部。同时，大力展开了创建苏区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停止了肃反运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沿河、酉阳、德江、印江等县的区、乡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起来。7月21日，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至9月，已发展成为包括松桃在内的5个县境、纵横100公里、人口10余万的黔东苏区。红三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补充了新战士1000余人，战斗力有所提高，地方部队也有很大发展。黔东苏区的建立，结束了红三军两年来无根据地作战的痛苦，并为以后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32年3月到1934年10月，红三军遭受严重损失，湘鄂西苏区也全部丧失，其根本原因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所造成的恶果。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初步纠正了夏曦等的错误。这样红三军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骨干，并创建了黔东苏区。



## 第七节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 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

(参见附图47，附表34、35)

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属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组织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移湖北广水），蒋介石自兼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其战斗编成及部署是：第一纵队辖第四十五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六师，集结于光山、潢川、固始地区；第二纵队辖第二师、第三师、第五十八师、第八十师，集结于信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辖第三十五师及骑兵第三旅，集结于信阳以南武胜关、广水地区；第四纵队辖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及1个特务旅，集结于麻城、宋埠、黄陂地区；第五纵队辖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集结于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辖第十师、第八十三师，集结于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为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右路军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由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李济琛兼任司令官，王均为副司令官，其战斗编成及部署是：第一纵队辖第四师，集结于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辖第一师、第七师、第十二师，集结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辖第三十二师，集结于霍山南部迄潜山地区；总预备队两个师，集结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师驻平汉路花园至孝感段两侧，第三十三师驻浠水，新编第二十师及第三十三旅驻光山，第三十八旅、第四十旅驻六安、霍山、正阳关等地，担任“驻剿”。另有3个航空队分驻汉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敌人这次“围剿”，以中路军之第二、第六两个纵队担任主攻。

在战略上，实行稳扎稳打，分进合击，在击破我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堵截。“围剿”预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攻占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军主力赶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地区，接着由北向南，将我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消灭之。蒋介石还在政治上，采取编组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外逃之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配合其军事进攻。

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胜利后，主力红军、地方部队都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空前扩大。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sup>①</sup>。中共鄂豫皖省委在2月17日的决议中则认为国民党军已成为“偏师”，今后敌人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当主力军。中共临时中央于6月5日向各苏区发出军事训令，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主力向西行动。必要时沿平汉路南下，威胁武汉。张国焘不顾实际情况，依照临时中央训令，坚持进攻战略，强令红军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平汉路，消灭罗山、信阳、广水一线的敌人；第二步沿平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威逼武汉。

红四方面军主力于6月中旬由潢川地区西进，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段出击。25日攻下鸡公山，歼敌1个团。方而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于6月27日和7月初两次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准备对付敌人的“围剿”。张国焘不同意这一正确意见，坚持实施不停顿地进攻，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夺取麻城，继续实现其威逼武汉的冒险计划。

8月上旬，正当我军主力围攻麻城之际，敌人开始了大举进攻，其中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第三、第六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中央1933年3月15日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

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右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及浍河一带。两路均已迫近苏区中心区域。蒋介石见其各纵队进展顺利，便改变其原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法，于8月7日命令各部疾速深入苏区中心，企图压迫我军于一隅而消灭之。10日，中路军第二纵队以第二师、第三师、第八十师由宣化店向黄陂站、七里坪急进；第六纵队以第十、第八十三师由茅店、夏店直扑河口镇，拨归其指挥的总预备队第八十九师由长轩岭直趋高桥河。黄安处于危急中。

直到这时，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已很疲惫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就敌。8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十二师、第十一师、第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开进，迎击敌人第六纵队，同时，以第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人第二纵队。11日至13日，我军主力与敌第六纵队对峙于黄安城西之冯寿二、冯秀驿地区。这时，敌人第二纵队已迫近七里坪，并派出1个旅经华家河向冯秀驿以北之观音堂进击，威胁我军主力翼侧。红四方面军首长鉴于再战不利，随即率领主力转向七里坪，求歼敌人第二纵队。13日下午，黄安被敌占领。

我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地区后，即在柳林河以东占领阵地。8月15日，当敌第二纵队向我阵地攻击时，我军乘敌仰攻之际，集中4个师实施反击，将敌击退，并歼其4个团的大部。17日，敌人第六纵队两个师由黄安地区北犯，企图协同第二纵队夹击我军。我军即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21日，第二纵队在得到第八十三师的加强后，由七里坪北上，配合被阻于浒湾以北之第一纵队，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这时，张国焘又令我军由檀树岗北上去打敌人第一纵队，保卫新集。27日，我军主力刚进到新集以北，敌人第二纵队4个师就由西而扑来，我军即在胡山寨地区进行阻击。经5天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迫使敌军转为防守。9月6日，敌人第一、第六纵队

从北面和南面向我军逼近，并同第二纵队一起，形成对我三面包围之势。在此情况下，红四方面军首长鉴于敌众我寡，相峙不利，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西北转移。敌人于9日占新集，14日占商城。

我军主力东移后，敌中路军立即以第二、第六纵队尾追，以第一纵队在商城、苏仙石一线截击，第五纵队则进占罗田、英山等地。与此同时，敌右路军大举进犯皖西苏区，相继占领独山、麻埠等地。当时在皖西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和地方部队，在北起麻埠、南至英山地区同敌右路军以及中路军的第五纵队多次展开激战，均未能阻住敌人。9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至金家寨地区，同红二十五军会合。方面军首长准备消灭进占麻埠之敌，因尾追之敌第二、第六纵队已逼近，遂放弃原定计划，决定南下英山，寻机歼敌。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了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并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临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将该电转给当时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毛朱王即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要其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充分地发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此后，周毛朱王就鄂豫皖苏区红军反“围剿”应采取的战略战术，于9月中下旬又两次致电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但这时张国焘已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sup>①</sup>，没有贯彻这些指示来挽救危局。

9月中旬，方面军主力进至燕子河地区。张国焘在这里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会上，一种意见认为，“围剿”之敌已深入根据地腹地，主张出潜山、太湖，转移到外线去，再伺机打回苏

<sup>①</sup> 参见中共鄂豫皖省委1933年1月5日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区。一种意见主张回黄、麻苏区。最后决定方面军主力先取英山，再回黄、麻。9月底，红四方面军由燕子河南下英山，寻战未果，遂于10月上旬经团陂、新洲返回黄安地区。

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西移后，急调部队追击堵截。10月8日，我军主力到达黄安以西河口附近时，即与西线之敌第一、第八十八师各一部遭遇。9日，敌人又从东、南、北三面逼近。这时，张国焘认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主力再在苏区进行战斗是无希望的，但同时又向中央报告“四方面军经过此次锻炼，战斗力更为坚强，击败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可有完全把握。”<sup>①</sup>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阪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留第二十七、第七十五师及各独立团在苏区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会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即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等4个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从此再未返回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所造成的。在反“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坚持实行进攻战略，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继续向敌人进攻。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他不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而是以我疲劳之师仓卒就敌，实行正面堵击，同敌人硬拼，使我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此外，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推行许多“左”的政策，搞肃反扩大化，以及不重视地方武装建设等等，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脱离群众，也是造成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

10月12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后，即向枣阳以南转移。敌人发现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后，立即部署6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进行追堵，企图围歼我军于襄（阳）枣

<sup>①</sup> 参见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932年10月9日给中央的电报。

（阳）宜（城）地区。19日至22日，红四方面军同追堵之敌在枣阳以南新集、土桥两次激战，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企图。但在敌人优势兵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关于在外线寻机歼敌，伺机打回苏区的决定没有得到实行。土桥战斗后，红四方面军向西北转移，经鄂北、豫西到达陕南，接着北出秦岭，于11月27日进入关中平原，到达西安以南和西南数十里的王曲镇、子午镇地区。12月2日进抵盩厔（今周至）以南之马召镇附近。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无计划无目的地向西退却普遍不满，加之前进道路为敌所阻，遂改向汉中前进。红四方面军主力再次翻越秦岭，于12月9日进抵城固西北的小河口，11日渡过汉水，到达城固、西乡地区，并准备就地创建新的苏区。这时，得悉四川各派军阀发生混战，川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同时那里的地形条件好，物产也比较丰富。据此，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首长乃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准备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苏区。

## 二、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重。敌人集中10余个师的兵力，疯狂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民继续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留在苏区的红军和地方部队分散各地，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因而未能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苏区遭到了严重摧残。

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了扭转危局，11月29日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30日，新的红二十五军组成，辖第七十四师（由原红二十七师改编）、第七十五师和特务营，共约7000人，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根据省委决定，次年1月上旬在麻城大畈组成了红军第二十八军（又称红八十二师），辖第二四四、第二四六团及1个特务营，约3000人，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

1933年3月4日，敌人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三旅和第一〇四旅各1个团进占郭家河。红二十五军乘敌立足未稳，于6日拂晓，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地区作战也取得一些胜利。3月28日，王平章政委在门坎山战斗中牺牲。4月初，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中共鄂豫皖省委为加强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力量，于4月8日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同时决定再组建红八十二师，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4月15日，新编成的红二十五军又于潘家河歼敌第十三师1个多团。18日和22日，红二十五军于杨泗寨再歼敌第三十师和第三十一师各一部。这些战斗，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计划，使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有所好转。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个师，1万余人。

这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接到了临时中央3月10日的军事指令。指令规定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并命令红二十五军第一步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第二步夺取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线的中间地段。中共鄂豫皖省委于4月14日发布的《通告第一〇六号》指出，一定要“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等城镇。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省委的指令，从5月2日开始围攻七里坪，连攻月余未克，减员近半，被迫于6月13日撤围。战后红二十五军由3个师缩编为两个师。

7月，敌人调集14个师又4个旅共10万余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从17日起，首先进攻鄂东北苏区。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单纯防御战略指导下，先后在光山陵牌石和黄安檀树岗进行阵地防御，未能击破敌之进攻，被迫于8月22日向皖西北地区转移。敌人为消灭我军主力于皖西北地区，以两个师封锁潢（川）麻（城）公路，阻止红军西进，集中7个多师的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皖西北苏区中心区合击。红二十五军从9月13日起，先后在

双河山、瓦屋基、汤家汇等地以阵地防御抗击敌之进攻，未能阻住敌人，被迫于23日撤出战斗。这时，红二十五军减员到约3000人。

9月27日，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的决定，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10月2日通过潢麻公路时，遭到了敌人的截击，主力突过封锁线，到达鄂东北地区，一部被阻于路东，返回皖西北地区。

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鄂东北地区后，继续遭到敌人4个师的进攻，经连续恶战，伤亡很大，最后剩下不足1000人，转至老君山、天台山地区，处境十分困难。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10月中旬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和会后的多次研究，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游击战为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方针，并于11月10日向临时中央作出了报告。此后，红二十五军采取往返回旋、时聚时分的战法，开展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鄂东北地区的小块苏区和地方部队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返回皖西北地区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部队，改编为第八十四师。10月11日，该师同原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的第八十二师合编为红二十八军，共23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组成后，在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的方针指导下，于11月初，在石门口的遭遇战中，歼敌独立第四十旅1个团，俘虏1000余人。12月中旬至1934年1月下旬，在固始南部和六安县境先后袭击敌人据点10多处，歼敌保安团4个连和民团多股。3月10日，在金家寨东南的古碑冲击溃敌独立第五旅1个团。12日，又在葛藤山反击战中击溃敌人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两个团），歼其一部，俘敌旅长刘书春。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到4月中旬，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9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敌人“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总兵力达到16个师又4个独立旅。

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之豹子岩会合。



17日，两部重新合编为红二十五军，辖第七十四师（3个营）、第七十五师（两个团），共30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此后，红二十五军往返活动于鄂东北、皖西北地区。6月上旬进到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

6月下旬，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三个月“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计划，确定以13个师（欠6个团）又3个旅担任分区“驻剿”，以两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剿”队，企图将我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7月初，敌人开始行动，以两个多师从东西两个方向进犯罗山西南朱堂店地区。红二十五军乘隙向东南转移，17日晨行抵长岭岗附近时，乘敌疏于戒备，一举将进占长岭岗之敌第一一五师全部击溃，并歼敌5个营。9月初，我军以远程奔袭攻克太湖县城，歼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战后，我军即在英山、太湖交界之陶家河一带分兵发动群众，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开辟了一块纵横15余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11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8日，在光山县斛山寨击溃尾追之敌约10个团，毙伤俘敌4000余人。随后，在花山寨同鄂东北道委会合。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商讨今后行动计划。会议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留一部分部队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外线转移，创建新的苏区。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从1932年11月至1934年11月，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的游击战争，同几十倍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消灭与牵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 第八节 川陕苏区的创建。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

### 一、川陕苏区的创建

四川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之一，军阀、封建地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四川军阀同蒋介石集团以及四川军阀内部各派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红四方面军准备进军的川北地区包括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阆中、仪陇、万源等10余县，纵横200余公里。川北人民在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暴虐统治下，生活极端痛苦，迫切要求革命。同这个地区紧相连接的川东地区，有我党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并有相当规模的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是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创建新苏区的有利条件。

当时盘踞川北的田頌尧第二十九军，共有5个师、3个路（每路两旅）和1个独立旅，其大部兵力正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军阀混战，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只有该军第一师的1个团和当地团防驻守。

1932年12月17日至1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由城固、西乡地区出发，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大巴山，先头部队于18日占领通江县北部边界的两河口。此时，方面军首长决定，乘敌人后方空虚，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地区。25日，方面军主力攻占通江城，歼灭守敌两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控制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29日，在通江城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的最高政权机关。

敌人第二十九军慌忙从嘉陵江沿岸抽调1个师又两个团进至巴中，两个团进至南江，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之际，向通江反攻。我军

先后于通江以西之恩歌嘴、清江渡和通江西北之大河口等地，击破敌之进攻，歼敌近3个团。1933年1月23日我军进占巴中，2月1日占领南江城。至此，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和大片地区，初步实现了进军川北的任务。随后，红四方面军抽出数千名干部、战士组成许多支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创建苏区的工作。

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委成立，袁克服任书记。2月中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熊国炳为主席，下设红江（通江北部和南江东部）、赤江（通江县改称）、赤北（通江县东北部）、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别区（包括陕南镇巴、西乡各一部地区）。

通南巴地区的开辟，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川陕苏区的初步形成。

## 二、粉碎敌人三路围攻

（参见附图48，附表36、37）

1933年1月21日，四川各派军阀接受蒋介石的调停，达成暂时妥协，停止在川西的混战，共同对付红四方面军。27日，蒋介石委任田頌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会同杨森的第二十军和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组织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围攻。田頌尧随即将其在川西参加混战的部队大部东调，于2月中旬发动了三路围攻，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驱逐之。田頌尧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决定如下部署：第一、第四师各两个旅，第五师1个旅，第二、第三路各两个旅，和独立旅等共22个团为左纵队，集结于旺苍坝地区，拟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切断我军退往陕南的道路；第二师两个旅和第五师1个旅共7个团为中央纵队，集结于龙山场及其以北地区，拟夺取巴中，尔后以一部协同左

纵队夺取南江；第三师及第一路两个旅共9个团为右纵队，集结于仪陇及其以北地区，向巴中以南开进，控制巴河两岸，协同中央纵队攻占巴中。上述3个纵队，左纵队担任主攻，中央纵队、右纵队担任助攻。其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是攻克南江、巴中，尔后分进合击，收复通江。杨森和刘存厚部则在营山、渠县和达县、万源地区配合第二十九军的行动。

红四方面军首长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以粉碎敌之围攻。部署是：第七十三师（欠第二一八团）位于南江及其以西三江坝地区，第十一师（欠第三十三团）位于南江西南之木门、长池地区，共同对付敌之左纵队；第十二师位于巴中及其东南之曾口场、兰草渡地区，对付敌之中央纵队和右纵队；第十师位于通江东南麻石场和东北洪口场、竹峪关一线，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位于通江西南的江口（今平昌）至得胜山地区，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保障我军主力侧后安全。第七十三师第二一八团配置在南江东北的碑坝地区，向陕南方向警戒。

2月18日，田頌尧部3个纵队向我军发起全线进攻。担任主攻的敌左纵队向三江坝、木门、长池地区发动猛攻。我第七十三师和第十一师分别在分水岭、侯家梁等地顽强抗击，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田頌尧急从右纵队抽调8个团加强左纵队，集中兵力再次向长池猛扑。我军在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于28日主动撤到八庙埡地区。敌人占领长池后，继续向八庙埡进犯。3月8日，我军乘敌向八庙埡前进之际，实施反击，歼敌1个团又1个营，随即撤出八庙埡。18日，我军又主动放弃南江城，逐步转移至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埡一线。敌中央纵队占领恩阳河后，在右纵队一部配合下，继续向巴中进攻。我军第十二师在南坎坡反击战中，毙伤敌1000余人后，于3月8日主动退出巴中城，撤至清江渡一线。此时，敌右纵队和杨森、刘存

厚各一部分别向得胜山、元山场、余家坪等地进犯，先后被我击退。

3月下旬到4月25日，战局呈对峙状态。

4月26日，敌人经补充后又在全线发动猛攻。其中央纵队、右纵队和左纵队的一部，分别从清江渡、曾口场、两河口一齐扑向通江城；左纵队主力由南江向东猛攻，企图将我军压迫到通江城以北地区包围歼灭之。29日，我军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平溪坝、鹰龙山、九子坡、竹峪关一线。5月中旬，敌人左纵队13个团进至空山坝以南地区，东面之敌川陕边防军认为有机可乘，也以8个团抢占了竹峪关，威胁着我军的左侧。

这时，我军战线已缩短，主力已集中，部队战斗情绪高涨；敌人则在进攻中连遭打击，伤亡逾万，其进至空山坝附近的左纵队13个团位置又较突出，且补给困难，士气沮丧，部队异常疲惫。红四方面军首长认为举行反攻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决定首先歼灭竹峪关之敌，以解除左翼威胁，尔后集中主力歼灭空山坝地区之敌。5月15日，第十师和第十一师主力对竹峪关之敌发起反击，一举将其击溃，乘胜追击30余公里，毙伤俘敌800余人。接着，我军集中4个师，反击空山坝之敌。部署是：第十一师由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第十师、第十二师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敌右翼；第七十三师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由正面出击。5月20日夜，我军先以1个团冒雨穿过空山坝西北的深山密林，插入敌之左侧后，21日拂晓突然向空山坝西南之敌猛攻，将敌部署打乱；我军主力随即向敌之正面和右翼猛攻，将敌13个团大部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之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激战至24日，全歼敌左纵队7个团，击溃其6个团，取得了反围攻作战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闻讯仓皇撤退。我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和广大地区。

田頌尧为阻止我军西进，急调后方留守部队5个团进至三江坝、

长池一线。6月10日，我军继向该敌进攻，至15日，歼敌一部，收复长池、木门，并直逼广元、苍溪两城。至此，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此役，总计俘敌1万余人，缴长短枪8000余枝，机关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这次反围攻战役的胜利，使川陕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均获得很大发展。

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根据木门军事会议的决定，以原有的4个师为主和地方武装一部扩编为4个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四军，王宏坤任军长，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第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第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王树声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这时川陕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张国焘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整编后，部队大力开展了军事、政治训练。这对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 三、仪(陇)南(部)、营(山)渠(县)、 宣(汉)达(县)战役

1933年7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重新组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这时刘湘同刘文辉之间的混战还未结束，直到8月间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红四方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8月中旬至10月底，适时地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

仪陇、南部地区，为田頌尧的势力范围。在三路围攻失败后，田頌尧将所部大部撤至嘉陵江以西，仪陇、南部和阆中地区仅留有3个团。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乘敌人兵力空虚之际，向西向南扩展根据地，同时夺取南部县境内的盐井，以解决根据地军民的食盐困难。8月12日，我军在仪陇以北的尹家铺击溃敌人1个团，随即迅速进至仪陇县城近郊，包围了仪陇县城及其附近各据点。经一周作战，在外围

歼敌1个多团。23日，攻占仪陇城，继歼敌两个营。接着，向南部以东之嘉陵江沿岸地区挺进，相继占领新政坝、洪山场等产盐区，胜利地达成了原定计划。此役，我军共歼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挺）。

营山、渠县及其以南地区，为敌人杨森第二十军所盘踞。该军辖6个混成旅，约2万人，第二混成旅配置在巴中县属的玉山场、鼎山场等地；第一混成旅配置在渠县城及其以北地区；第五混成旅配置在营山县城及其以南地区；第六混成旅配置在蓬安县城及其以北地区；第三、第四两混成旅在南充及岳池、广安一线，作为机动部队和巩固后方。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先消灭突出的玉山场、鼎山场之敌第二混成旅，尔后向南发展，相机消灭敌之主力。9月22日，我军以一部冒雨穿过荒僻的山径，插到玉山场、鼎山场之敌背后，23日攻占龙背场。玉山场之敌向南溃逃；鼎山场之敌处境孤立，迅速被我击破。我军随即向南发展进攻，先后在营山东北的佛楼寺、大庙场等地击破敌人的抵抗，10月3日攻克营山城，逼近渠县。6日，继占蓬安对岸之周口。敌人退守渠县、广安、岳池一线。此役，我军共俘敌2000余人，缴枪2500余枝（挺）。

宣汉、达县地区的敌人，为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刘存厚为防御我军进攻，将其主力13个团配置在万源至达县以西，长达150余公里的防线上，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红四方面军首长为继续发展胜利，决定以中间突破的战法，求歼该敌。以第九、第三十两军各一部为中路，实行主要突击；以第四军的5个团分为左右两路，在两翼实行辅助进攻。10月17日拂晓发起总攻。我中路部队在土地堡附近一举突破敌人阵地，歼敌一部，余敌纷纷南逃。19日至21日，我军相继攻占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此役，我军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枝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在这三次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利用上述三部敌军之间的深刻矛盾，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

法，因而在两个半月内，接连攻占了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五座县城，消灭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同活动于宣汉、达县、梁山（今梁平）地区的川东游击军胜利会师，川陕苏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联成了一片。这时，川陕苏区的版图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羌（今宁强）县境的广大地区。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至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利用客观的有利形势和敌人营垒内的各种矛盾，创建了川陕苏区。在敌人发动进攻时，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以顽强的防御和反击，逐步消耗和削弱敌人，适时转入反攻。在反攻时运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彻底粉碎了敌之三路围攻，并展开了攻势作战。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川陕苏区发展成为一个控制了八座县城、建立了20余县革命政权和拥有四五百万人口的新苏区。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

## 第九节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

### 一、敌我双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参见附表38、39）

1933年9月，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刘湘打败了刘文辉。四川形成了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10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四川大小军阀的军队，采取分进合击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组织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企图在三个月内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陕边境地区。其部署是：第一路邓锡侯第二十八军



18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第二路田頌尧第二十九军24个团，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第三路李家钰新编第六师和罗泽洲第二十三师共15个团，由南充向巴中方向进攻；第四路杨森第二十军12个团，由蓬安向通江方向进攻；第五路刘湘第二十一军24个团（由第三师师长王陵基任总指挥），由开江、大竹向宣汉、达县方向进攻；第六路刘邦俊第二十三军12个团（由刘存厚川陕边防军残部改编而成），以及盘踞城口、镇巴地区的土匪王三春等部6个团，共18个团，分别由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总计敌人从西北的广元起，向东南再折向东北的城口，沿苏区边缘的500余公里的弧线上，集中了110多个团共20余万人的兵力，形成了对我川陕苏区的包围态势。其中第五路为围攻的主力军。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以8个团分向开县、开江出击。11月1日于开县以西、开江以北地区，同先期发起进攻之敌第五路和第六路各一部遭遇，激战5日，杀伤敌军5000余人。中旬，我军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沿州河一线转入防御。这时，敌人第二路和第四路也分别由阆中、蓬安向苏区进犯。26日，我军对进至营山以北凤凰寨之敌第四路实施反击，歼敌约两个团，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以求先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为下一步反攻破敌创造条件。部署是：东线以第四军、第三十三军（各欠1个团）和第九军、第三十军（各欠1个师）共28个团，配置于万源、宣汉、达县地区，对付敌人第五、第六两路；西线以第三十一军（欠两个团）、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等共12个团，配置于广元至营山嘉陵江以东及渠县以北地区，钳制敌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以第三十一军第二七六团、第二七八团分别配置于旺苍坝以北三道河地区和通江碑坝地区，以第四军和第三十三军各1个团，分别配置在苏区北部边境的西乡、镇巴以南地区，警戒陕南之敌。

## 二、敌军发起进攻，红军收紧阵地

(参见附图49，附表38、39)

12月中旬，敌人发起了第一期总攻。16日，东线之敌第五、第六两路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达县、宣汉进攻。我军在三河场、曾家山和达县城东南给敌以重大杀伤后，分别撤出宣汉、达县两城，收紧阵地至庙坝、井溪坝、东升场、双河场、碑牌河、北山场一线，依山凭险构成集团工事，以顽强的阻击和阵前反击，多次挫败了敌之进攻。西线我军在分别给敌第一、二、三、四路以打击后，主动退出仪陇城，撤至旺苍坝、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兰草渡、江口（今平昌县城）一线，继续抗击敌人。

1934年1月中旬，东线我军为创造战机，再次主动后撤到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红灵台一线。其间我军乘敌向前推进之际，不断予以袭击，歼敌约3个团。到2月上旬，敌人第五路第四师、第三师分别进至东岳庙、石龙场和马渡关、花池山一线。第六路之郝耀庭部进至沿山场以东马鞍山地区。红四方面军抓住战机，立即集中3个师的兵力，对冒进突出之郝耀庭部和第三师之第七旅实行反击，并准备在反击得手后即转入反攻。2月10日夜，我军对马鞍山之敌发起攻击，歼敌郝耀庭部和第三师第七旅的大部，击毙郝耀庭，活捉第九旅旅长张邦本。敌第六路连忙以两个旅西移，巩固胡家场、毛坝场以南阵地；第三师也以位于马渡关以南大罗坪的1个旅向东延伸，巩固隘口附近的阵地，阻击我军前进。我军连攻两日未能突破敌人阵地，遂停止了反击。这时，西线中段的我军已从千佛岩、尹家铺撤至恩阳河、柳林铺地区。

在马鞍山反击战后，刘湘急调所部第一、第二两师及独立第一旅增援东线，并以第一师师长唐式遵接替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3月3日，刘湘下达第二期总攻令。4日，西线第一路向旺苍坝，第二路

向恩阳河，第三路向玉山场，第四路向鼎山场，同时发起进攻。我军利用有利阵地进行抗击，在大量消耗敌人后，先后主动退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城和木门等地。东线敌军第五路第四师和1个独立旅，于12日至14日连续猛攻我红灵台阵地，我军顽强抗击，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并在反击中歼敌1000余人。22日至23日，敌军集中5个旅猛攻我老鹰嘴、毛坪一线阵地，又被我军挫败。

4月初，敌人发起第三期总攻。我军再次收紧阵地，东线撤至刘坪、镇龙观、万源以南一线，西线退出江口、长池、南江，撤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4月23日，东线敌人1个师又3个旅连续向镇龙观、石窝场、高白寨一线猛犯。我军战至28日，将敌击退，仅在镇龙观附近即消灭敌4000余人。

刘湘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于5月增调所部教导师、暂编第二师和边防军的1个师参加作战。我军和苏区人民乘敌忙于调整部署之机，积极进行反攻准备。同时，方面军首长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伺机从西线进行反击，成功后即转入全线反攻。为了迷惑、调动敌人和进一步集中兵力，我军于6月中旬主动放弃了得胜山一带阵地，并以1个团向东出击，攻占了城口；21日又主动撤出了通江城。

刘湘为了最后消灭我军，于6月22日发起第四期总攻。东线敌军集中50多个团，向万源城至通江城一线的我军阵地猛攻。我军按预定计划，以一部兵力坚守东线阵地，而集中10余个团，于26日在西线贵民关、观光山之间的分水岭地区对敌第一路进行反击，连续突破敌人10余道阵地。28日，我军向敌主阵地马鹿寨反击，因敌凭险顽抗，未获进展，加上小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影响了我后续部队的运动和给养的供应，随即停止反击，部队撤至通江河以东，北起碑坝、南至鹰龙山一线，隔通江河与敌对峙。在此期间，东线我军主动将城口近郊的部队撤至万源附近，在万源至通江一线继续阻击敌人。

7月中旬，敌人以第五路为主，发起了以夺取万源为目的的全线猛

攻。16日，第五路8个旅进攻我万源城南之孔家山和城西的南天门等阵地，被我军击退。22日和27日，敌人又两次向大面山、甑子坪我军阵地猛攻，又被我击退。8月6日，敌人第五路在其他各路的配合下，再一次对我万源的东西两侧和正面阵地猛攻。我军顽强坚守阵地，又挫败了敌之进攻。

与此同时，西线我军在南起通江附近、北至小通江沿河一线上，也多次击退了敌人第一、二、三、四路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保卫万源的战斗。

### 三、红军转入反攻，粉碎敌军围攻

（参见附图50，附表38、39）

经过八个月的战斗，敌人遭到了重大的伤亡和消耗，士气更加低落；我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战场形势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我军举行反攻的时机已经来到。

这时敌人的分布是：西线方面，第一路位于贵民关至青浴口以北一线，第二路位于青浴口至新场坝一线，第三路位于洛阳坝至通江城北王坪寨一线，第四路及总预备队两个师位于通江城及其以东麻石场之间地区；东线方面，第五路的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王三春等部位于凤凰寨、白沙河、清花溪一线，第六路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师位于万源西南青龙观地区，第五路的独立第一旅、边防军1个师和第四师位于石窝场、镇龙关至麻石场一线。

红四方面军首长根据当面情况，认为青龙观守敌战斗力较弱，且因地势险峻面疏于防备，易为我军突破；同时，该敌处于敌主力军第五路战斗队形中间，从此处突破，利于割裂和震撼敌人整个阵地。因此决定，以青龙观为东线反攻的突破点，得手后继向纵深发展，求歼敌人第五路主力，争取全线胜利。部署是：第四军、第九军（各欠1个师）、第三十一军1个师共14个团为第一梯队，担任突击任务；第

三十军（欠1个师）和第三十三军1个师共8个团为第二梯队，协同第一梯队向敌纵深发展；第九军一部和第四军1个师坚守万源以东以南阵地，第三十一军（欠1个师）和第三十军1个师坚守通江以东以北和小通江沿河一线阵地，均待机转入反攻。

8月9日夜，东线反攻开始，第三十一军以第九十三师1个团乘黑夜穿山越涧，秘密进抵青龙观敌阵地前沿，攀上悬崖，突然袭占青龙观，接着打退敌人10多次反扑，巩固了阵地。10日拂晓，第九十三师主力向敌纵深发展，第九、第四军主力则从左右两翼发起进攻。至16日，我军先后攻占青龙观东南的清花溪、田家坝，青龙观西南的黑钵山、五龙台、石窝场，青龙观以南的石人坝、赵塘坝等地，击溃敌1个师又3个旅，并歼敌1个旅的大部于龙池山，第四军1个师已进至河口场、庙坪场地区。17日，我第二梯队8个团也进抵河口场地区。至此，我军已进至万源附近敌刘湘部主力的左侧后，造成了进一步围歼该敌的有利态势。这时，张国焘却不让我军主力向东迂回刘湘部主力，而强令我军主力向西迂回同我军处于平行位置的敌人第四师等部。结果我军向西一转，敌第四师等部立即从喜神滩、麻石场一带向南撤退，一直撤到了200公里以外的渠县东北的三汇镇。当我军回头向东寻求截击从万源附近撤退之敌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等师时，这些敌人已退至老鹰嘴、毛坝场一线，接着又撤至井溪坝、东升场、马家场至双龙场一线沿州河右岸占领阵地，与我军对峙。这样，我军在东线的反攻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西线敌人见东线第五、第六两路全线溃败，仓皇撤至贵民关至江口一线，企图依托小通江西岸山地阻止我军的进攻。8月下旬，我军以一部兵力牵制东线敌人，主力转向西线反攻。28日夜，第三十军和第四、第九两军的主力以及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由通江城以南渡过通江河后，从敌人第三、第四两路的接合部得胜山附近一举突破敌军阵地。敌人撤至南坳场、右坪口、同观寨一线顽抗。9月8日，我

军再次夜袭，突破右垭口敌阵地，并乘胜猛追，西线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军以第四军一部追击敌人第四路，进占兰草渡；第九军一部追击敌人第三路，直扑仪陇；第三十军和第九十三师于9月11日收复巴中。这时，张国焘要求红军向巴中以北的长池方向迂回，徐向前等认为，向长池方向实行浅纵深迂回，兜不住敌人，即果断地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九十三师实行大纵深的迂回。我军从巴中出发，昼夜兼程，经仪凤场、雪山场、九龙场直扑敌人第二、第一两路的后方黄木垭、旺苍坝。我军刚到黄木垭，敌人第二路两个旅及其他部队共10余个团正经长池、木门撤退下来。我军当即将其包围于黄木垭东南地区，经激战，全歼该敌。接着，相继收复南江，进占苍溪、阆中，直逼仪陇城郊。敌人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狼狈逃至嘉陵江以西，第四路逃至营山、渠县地区。至此，刘湘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即被彻底粉碎。我军在10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挺）、炮100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根据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在川甘边界扩大苏区的方针，经过三个月的整训补充，于1935年1月22日发起广（元）昭（化）战役，经八天进攻作战，虽歼敌一部，但广、昭两城未克，随即放弃原定战役计划，回师苏区。2月3日，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至2月中旬，占领了宁羌、西县（今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镇，歼敌陕军孙蔚如部4个多团，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四川军阀却乘机向川陕苏区进攻，先后占领万源、阆中、苍溪等城和嘉陵江东岸的大片地区。

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历时10个月，是入川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中，我军坚持“收紧阵地”的方针，依托有利地形，不断消耗和削弱敌人，逐步达成自己兵力的集中，最后抓住敌人弱点，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适时举行反攻。反

攻中对准备退却之敌，采取大纵深的迂回包围，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彻底粉碎了敌之围攻。这一仗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力量，锻炼和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取得了反围攻的宝贵经验，巩固了苏区。

## 第十节 陕甘边、陕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红军的反“围剿”

### 一、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从1930年起，刘志丹领导的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活动，到1931年下半年发展到300余人，在甘肃合水县的南梁地区组成了南梁游击队。在此期间，中共山西省委也于1931年3月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南段开展游击战争。后来这支游击队在敌人“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经月余转战，发展到300余人，改称陕北支队。同年10月，陕北支队南下同南梁游击队会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接连取得阳坡头伏击战、枸邑（今旬邑）奔袭战等战斗的胜利。5月，敌人组织“进剿”，陕甘游击队在反“进剿”中，半个月连打九仗，歼敌1400余人，给“进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游击队自身发展到1000余人。

从1932年6月到12月，陕甘游击队多次作战失利，部队只剩下200多人。12月，中共陕西省委依照中共临时中央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sup>①</sup>。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在省委领导下，即着手创建以照金（耀县西北部）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红二团为迅速打开建立苏区的局

<sup>①</sup> 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只编了第二团，没有设立军部和任命军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第二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

面，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当时对我妨碍较大的各地民团。从12月下旬起，先后消灭了耀县、宜君、枸邑、三原等地民团多股，并分兵做群众工作。在红二团的帮助下，淳化、枸邑、宜君、照金等地游击队先后建立起来。1932年上半年建立起来的三原县武字区等游击队也有所发展。1933年3月和5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便初步建成。

5月，陕西敌军4个团和枸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同官（今铜川）六县民团，分四路“进剿”照金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以游击队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红二团则转到外线作战。随后，红二团收编了国民党军1个连的兵变部队，并继续消灭了一些民团，部队扩大到近500人枪。

5月下旬，杜衡等错误决定红二团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新苏区。红二团渡过渭水，进入临潼、蓝田地区时，立即遭到敌人约两个旅的围追堵截，作战失利。最后剩下刘志丹等领导干部和战斗骨干六七十人，分散回到照金。

红二团南下后，陕西敌人多次以民团进攻照金苏区。我陕甘边区各游击队，特别是由三原武字区和辛字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渭北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6月，渭北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辖3个连，共120余人。陕甘边各游击队在第四团积极配合下，保住了照金苏区。7月，敌陕军驻耀县之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中共党员）在我党领导下宣布起义，组成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最后剩下约100人，进到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在此期间，中共耀县县委组织了耀县游击队。该队配合了骑兵团的起义。8月，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也转到了照金苏区。

8月14日，陕甘边特委于耀县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



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游击队等。会后，建立了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6个游击支队。照金苏区日趋巩固。

10月上旬，敌人又集中正规军和民团共6000余人，进攻照金苏区。临时总指挥部以游击队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以红四团等部转到外线寻机歼敌。10月2日，红四团等部袭占了张洪镇，俘敌100余人。17日攻占合水县城（今合水老城），歼敌正规军1个连和民团一部。随后，在转移途中于合水县毛家沟门击溃追敌1个团，俘敌100余人。坚持照金苏区斗争的游击队，积极打击进攻之敌，消灭了一些敌军。随后分路突围北上，于合水以南同红四团会合。照金苏区暂时被敌占领。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继续在庆阳、合水一带以及照金周围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也逐步开展起来。1932年3月中共延川县委领导的延川游击队成立，4月编为西北先锋队，11月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5月下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一支队成立后，即在安定（今子长县，县治设在瓦窑堡）、横山、靖边三县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高祁家洼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游击队第一支队，在绥（德）清（涧）和神（木）府（谷）地区分别建立第二和第三支队。同时决定在安定、绥清、神府等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会后，从8月至次年3月的八个月中，先后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支队，同时在清涧、绥德、神木、府谷及葭县、吴堡等地建立了一些红色村庄或小块游击根据地。

## 二、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反“围剿”

(参见附图51)

1933年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所属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位于陕甘两省边界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三路游击队和建立三个游击区，以扩大红军的回旋余地，和加强各游击队、各游击区之间的相互支援。

11月7日，红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sup>①</sup>，共500余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师部率第三团向东北行动，袭取甘泉，未克。后在洛河川的葡萄沟门击退由延安来犯之敌1个营。骑兵团向西北行动，首先奇袭新堡，全歼该堡民团，接着又袭击并歼灭了梨园堡、阎家洼子之敌两个新兵连和赵沟门的民团。后来，全师会合于东华池西北的二将川地区。1934年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纵横各70多公里的陕甘边新苏区初步建成。

与此同时，我三路游击队也分别在各自活动地区消灭民团多股，并发展了自己。

2月，敌人以驻陇东之警备第二旅的第五、第六团，庆阳、合水等县民团，驻靖边、定边、安边之陕西警备骑兵旅的第二、第三团，驻郿县(今富县)之第四十二师的1个团和驻延安之第八十六师一部，分路合击南梁，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摧毁陕甘边苏区。

红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政委杨森决定，以第三路游击队袭扰、牵制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转至外线，寻机打击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和庆阳、合水等县民团，以打破敌之“围剿”。3

<sup>①</sup> 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游击队及原红二团保存下来的部分骨干编成，骑兵团由红四团为主编成。

月初，红四十二师师部率第三团、骑兵团和 second 路游击队由南梁北上，直捣敌人骑兵旅第二团的后方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以南的三道川。接着，经蔺家砭、崖瑶、元城子、李家梁等战斗，歼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等部约4个连及民团一部。战后，红四十二师折转南下。4月11日，在西华池（今合水县城）全歼由庆阳出犯之敌警备第二旅第五团的团部和两个营共700余人。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战后，红四十二师为配合第三路游击队打击南线之敌，主力继续南下。5月上旬，在淳化三里塬遭遇战中消灭敌人陕西游击支队两个连。

这时，红四十二师得知敌以8个团的兵力开始新的“围剿”。鉴于敌军兵力较大，南线地形不利于我反“围剿”作战，决定北返南梁苏区，依托苏区有利条件，待机破敌。我军在转移中，于5月15日在五顷塬子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随后经和尚塬返回南梁苏区。6月20日，第三团和 second 路游击队一部北上，在保安（今志丹县）之马子川给来袭之敌第八十六师第五一二团第二营以沉重打击，歼其100余人，余敌退回保安。至此，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于9月和10月先后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第二团。10月20日，活动在陕西黄龙、白水、澄城三县之交的黄龙山一带的地方武装一部，在郭宝珊率领下起义，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治委员，归红四十二师领导。11月7日，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苏区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陕甘边苏区和红军、游击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在陕甘边红军反“围剿”的同时，陕北红军也进行着艰苦的斗争。1934年3月，敌人第八十六师配合民团，对我陕北苏区也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侵入我安（定）延（川）、绥（德）清（涧）、神（木）府（谷）、葭（县）吴（堡）边境的四块苏区，占领集镇，扼守要点，四出骚扰。我游击队同敌人展开积极斗争。

4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普遍组织群众武装，建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继续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使各小块苏区连成一片的决议。7月8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17日，第一、第二、第五游击支队和赤卫军一部，袭占安定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许多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红军家属。随后，谢子长等率领这3个游击支队和200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同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会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及陕北特委代表、陕北游击队队委等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陕甘边红军协助陕北发展红军和苏区，同时决定谢子长任红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会后，谢子长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及南下的陕北游击队、赤卫军北上陕北，于8月15日到达安定西区。8月18日至26日，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在谢子长的统一领导下，先后进攻安定以北的井吴家塌、清涧的张家屹台和河口镇之敌，给了敌人第八十六师第五一五团以严重打击，歼敌约两个连，保卫了安定和清涧以东的苏区。其他各地之敌也都由分散进攻改为集中固守。至此，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也告失败。战后，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甘边苏区。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苏区迅速扩大，各地游击队发展到20多支。9月，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三支队分别改编为第一团、第三团。不久，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团。各团在各自驻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月，第一、第二、第三团合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同时成立，马明方为主席。

### 三、西北军委的成立和西北红军的反“围剿”

(参见附图52)

1934年10月起，蒋介石增调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并纠集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四省军阀部队，共20多个团4万余人，组织以陕北苏区红军为重点的第二次“围剿”。敌人这次“围剿”，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针。其部署：第八十六师5个团由北向南，对府谷、神木、葭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地区“清剿”；第四十二师4个团由南向北，对宜君、中部、洛川、郃县、甘泉地区“清剿”；第三十五师7个团对甘肃合水、华池、庆阳地区“清剿”；第八十四师4个团为这次“围剿”主力军，负责“清剿”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延安、安定等陕北苏区的中心区域；晋绥军第七十一师主力陈兵黄河东岸，并以1个旅进至陕北的吴堡、绥德地区，支援第八十四师。此外，甘肃正宁、宁县一带还有蒋介石第六十一师的6个团。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在赤源县<sup>①</sup>周家岭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会议还决定：集中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主力，在陕北地区作战，先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区域之敌第八十四师，以求打通与陕甘边苏区的联系。从这时起，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统称西北红军。4月中旬，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率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开进途中，于4月22日在安定西北的寺儿畔歼敌第八十六师1个连。在此之前，红八十四师集中力量打击陕北苏区内的敌人孤立据点，取得安定南沟岔、清涧阎王砭和贺家湾三战的胜利，歼敌约3个连。5月1日，红四十二师同

<sup>①</sup> 赤源县，1934年新划县，辖区为原安定县的一部分。后撤销。

红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瓦窑堡与清涧之间相机消灭分散活动之敌。5月7日至9日，我军于吴家寨、马家坪地区歼敌第八十四师两个营又1个连，俘敌900余人，迫使敌人收缩据点，不敢小股出扰。驻安定城之敌也仓惶撤回瓦窑堡。5月20日，我军东进至清涧县无定河边，又歼张家屹台守敌第八十四师1个连。接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一面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城，迷惑敌人；一面星夜南下，于30日攻占延长县城，歼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枝。延川守敌惧怕被歼，弃城逃往清涧。6月13日，我军攻占敌人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歼敌200余人。接着打下了控制着陕甘边与陕北两根据地来往必经的敌坚固据点李家塌，全歼守敌，缴枪200余枝。27日，我军北上进攻靖边，28日凌晨，突击队袭占东南城角楼，接着主力分向各城门实施强攻，经激战，全歼守敌第八十六师1个营及县警队、保安队等约600人。保安之敌闻讯弃城逃窜。至此，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我军经过连续作战，先后占领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城，并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联系。随后，我军东进绥德，先后在三皇峁、高家塌歼敌370余人，缴枪300余枝。

与红军主力在陕北苏区作战的同时，红四十二师第一、第二团和骑兵团，在陕甘边苏区坚持斗争，消灭了宜川、澄城、郃阳（今合阳）、韩城等地民团多股，筹款1万余元。

1931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陕甘边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在20余县范围内建立了革命政权。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党和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 本章小结

1932年初至1934年下半年，从整体上说是红军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这个阶段，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加紧推行错误政治路线的同时，还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他们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完全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不承认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要充分地利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兵团和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他们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他们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继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最后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其结果，除陕甘苏区、川陕苏区外，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全部丧失，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惩罚，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面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 一、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速决战

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特点，规定了战争的长期性。红军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战斗，不断地打破优势敌人的“围剿”，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才能最后战胜敌人。这就要求红军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企图集中红军猛力一击，以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速决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决不是要求战役战斗上也要实行持

久战。相反，实现战略的持久战，只有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不断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渐地改变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把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作为红军战争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战争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相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极力推行进攻战略，企求速胜。他们不顾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命令各地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在这一军事战略指导下，他们命令中央红军攻打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命令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威胁武汉，命令还比较弱小的红军同敌人主力进行毫无胜利把握甚至不利于我的决战，企求很快地消灭敌人的主力，从根本上打破敌之“围剿”，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实行进攻战略的结果，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丧失了发展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利时机，使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面前，处于被动地位。

## 二、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反“围剿”作战是红军战争的主要形式。红军在优势敌人进攻和“围剿”面前，首要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因此，战略防御问题就成为红军战争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在战略防御中，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军事战略：一是积极防御，一是消极防御。

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是攻势防御，又称决战防御。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提出并大大丰富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为红军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下，反对敌人的“围剿”通常包括反“围剿”准备、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几个阶段。反“围剿”准备是反对敌人有计划“围剿”的一



个必要步骤，是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的重要条件。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在中央苏区叫“诱敌深入”，在川陕苏区称“收紧阵地”。战略反攻是在战略退却阶段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下，采取的一种带有决战性的行动。战略反攻是战略防御全过程中最精采最活跃的关键阶段。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的多次反“围剿”的胜利，都是在这种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取得的。战争实践证明，积极防御是红军反“围剿”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消极防御是单纯防御，又称专守防御，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在敌人大举“围剿”时，既不敢举行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又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在消极防御战略方针下，他们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消耗战代替歼灭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战术来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结果，导致了許多苏区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放弃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 三、实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分散兵力打消耗战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是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则。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变被动为主动。红军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一着。对于几乎一切都取之于敌的红军，只能实行歼灭战。只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有效地减杀敌人的优势，最充分地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歼灭战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同一意义。各地红军在以往的反“围剿”作战中，实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从而打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漂亮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缺乏战

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失掉自主能力，采取应付主义，实行分散兵力打消耗战的原则。他们实行军事平均主义，先是要求红军从根据地东西南北“全线出击”；继而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最后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把军事平均主义推到极点。由于兵力分散，进攻时不能大量地消灭敌人，防御时又易为敌人各个击破。其结果，只能是消耗战。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消耗可以很快得到补充，红军却遭到很大削弱，苏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濒临枯竭。

## 第四章

### 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南方 红军游击战争的坚持

#### 第一节 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和 红二十五军先后开始长征

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屡战失利，形势日趋严重，军力和民力、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我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湘赣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境也十分困难，敌人已深入苏区腹地，我军主力被迫退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希望。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也在敌人重兵围攻下，处境危殆。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我军如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作战，这样，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可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却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他们仅派出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开进，以吸引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另外，却仍命令中央红军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继续同敌人拼消耗。结果使红军继续遭受严重的损失。10月初，在敌人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

合。

## 一、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同红三军会师

（参见附图53，附表40、41）

1934年7月下旬，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按照中革军委要红六军团突围西移的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移行动，省委领导5个独立团和游击队，坚持湘赣苏区斗争。军政委员会决定，红六军团主力在敌人兵力比较单薄，空隙较大的湘军和粤军接合部，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桂东地区转移。

经过充分准备，红六军团于8月7日率第十七、第十八两师（6个团）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西征。接着又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到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在这里，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敌西路军总司令何健发现红六军团突围后，急令第一纵队第十五、第十六师由永新地区尾追，第十九师主力、第六十三师和湖南保安团沿衡阳、耒阳、郴县以及湘江一带防堵，湖南保安旅和第十九师一部赶至零陵、祁阳、东安筑堡堵截，湘东、湘南、湘西各县民团控制交通要道，协助其正规军作战。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争取先机，决定放弃在桂东暂时停留的原计划，乘敌围攻部署尚未就绪和敌人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西渡湘江，进至新化、溆浦地区。8月12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出发，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23日到达零陵东北地区，准备西渡湘江。这时，敌人9个团已封锁了湘江零陵至祁阳段，邵阳之敌和广西之敌共3个师，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开进，尾追我军之敌两个师已分别进到阳明山西南和常宁附近。在此情况下，红六军团遂又改变

计划，转至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区，用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先向东北进至白果市，又急转向南，经嘉禾西进道县，徒涉沱水（潇水上游），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旬，我军在灌阳县的文市附近，击退尾追的湘敌第十六师和桂敌第十九师共8个团的进攻，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城（今资源）。

9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新的训令，要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区行动，力求消灭敌人1个旅以下单独行动的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尔后转移到湘西北，并与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络。

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于9月11日进至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接着，继续西进，准备在绥宁地区打击湘敌，未能得手。这时，湘桂两省敌军主力已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止我军北进。我军遂即转兵向南，袭占通道城（今县溪镇）。19日，在靖县新厂给尾追之湘敌补充第二总队的两个团以歼灭性的打击后，于10月1日袭占贵州的旧州。

敌人为阻止红六军团同红三军会合，遂以入黔之湘军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和桂敌第十九师进至镇远、石阡间堵击，桂敌第二十四师、湘敌补充第一总队及黔敌一部尾追，企图围歼我军于石阡地区。10月7日，我军在向江口地区前进时，在石阡西南甘溪街同桂敌第十九师遭遇，一部被敌截断（后与红三军会合），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利用高山密林，同20多个团的敌军周旋。与此同时，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对红六军团的处境极为关切，亲自率红三军主力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10余天的艰苦转战，终于战胜种种困难，在石阡以南的马家坪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达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同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会师，胜利完成转移任务。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四川省西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第四、第六师共4个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缩编为3个团，约3300人。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这时，中央红军已从中央苏区突围，正沿粤赣边境向湘南前进。

“追剿”红六军团的湘、桂两省敌军迅速东调，参加围堵中央红军，留在湘西地区的敌军，只有新编第三十四师等部。

红二、红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并创建新苏区，于10月下旬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经酉阳占永顺。11月13日，敌新编第三十四师3个旅逼近永顺城。我军弃城北移，设伏于龙家寨以北十万坪谷地。16日，追敌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我军立即发起猛攻，经两小时激战，歼其大部，并乘胜追击，又在龙家寨附近击溃敌人另1个旅，共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此战，对打开湘西局面有重大意义。接着，我军重占永顺城，并先后占领了大庸、桑植等城。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12月初，当中央红军已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并继续向西转移时，红二、红六军团为策应其行动，以一部兵力在永顺、桑植、大庸地区，从事建立苏区的工作，主力向南进袭沅陵未克，即沿沅江东进，在桃源县以北的浯溪河歼灭新由湖北调来之敌独立第三十四旅1个团又两个营，并乘胜占领桃源，包围常德城。

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湘西以后，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旅，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县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县的一部，并在永顺、保靖、大庸、桑植等县建立了政权和地方武装。至1935年1月，湘鄂川黔苏区已初步建成。这一胜利，迫使敌人由“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中抽调3个师，由江西抽调1个师，驰援湘西，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 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占领遵义

(参见附图53, 附表42、43)

1934年10月,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 主力红军分别向雩都以北和瑞金、古城地区集中。10月10日晚,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 共8.6万余人, 开始长征, 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 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 中央红军由雩都南渡贡水。21日晚, 中革军委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 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 红九军团掩护左翼, 红八军团掩护右翼, 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 红五军团担任后卫, 从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于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此后, 继续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1个军团在后、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的甬道式的队形西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 携带大量笨重物资器材沿着山路行进, 拥挤不堪, 行动缓慢。直到11月8日, 才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15日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 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 削弱了红军的作战能力。

蒋介石为了围歼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 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 令粤军陈济棠以有力部队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 令桂军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扼要堵截。

11月19日，何键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两个师同第三路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

这时，各路敌军虽有25个多师，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只有湘军行动积极，而位于我军右侧和后面的蒋系薛岳、周浑元部行动迟缓，两广部队只在其边境防堵，并不主动进攻我军。从宜章至湘江广大地区，敌人防御力量薄弱，又属无堡垒区域，便于我军机动作战。我军如乘各路敌军调动，薛、周两路尚未靠拢之际，寻歼敌一路或一部，战局必将出现有利于我军的变化。而博古等人却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丧失了湘南歼敌的战机，使中央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路22日袭占道县，左路24日占领江华，随后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沱水，一部兵力西出永明（今江永）。白崇禧害怕我军攻取桂林，遂令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以阻止我军西进，并防止蒋军乘机进入广西。这样，兴安、全州一线敌兵力便较空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此时，何键也令其第一路两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我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我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各一部顺利地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及时赶到渡口。次日，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州向脚山铺地



区的我第二师发起进攻，桂敌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接着，两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我军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我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住优势之敌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壮烈牺牲；其他各部也遭受重大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

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断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下辖第一、第四、第五路及李觉之第十九师；第二兵团司令薛岳，下辖第二、第三路。同日，何键以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随我军追击，令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围歼我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同时，电请贵州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我军西进贵州。

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西进，于11日进至通道、下乡、长安堡（今通道县城附近）地区，一部占领了通道城。

这时，桂敌在我军左侧后跟追，第一、第二兵团则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赶筑工事，张网以待。而我军经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同五六倍于我的敌人作战，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可是，博古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仍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3日，他们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桂敌，

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次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转向沅江上游之泸溪、乾城、凤凰地区活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我军突破黔敌防线，并于15日占领黎平、老锦屏后，他们又命令红一、红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预置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到会的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的情况，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实现。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我军避免了覆没的危险。

在此之前，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1个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红八军团的建制撤销，部队编入红五军团。

依据党中央黎平会议决定的方针，中革军委于12月19日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敌和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西进。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继而进至黄平、余庆地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争取时间休整部队。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7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9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城。红一军团集结于桐梓、松坎地区；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分别集结于滥板凳、珠场（今珠藏）、湄潭地区，各以

一部兵力阻击敌人，主力进行休整，同时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在10多天内就有4000余人参加红军。

###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参见附图53，附表44、45）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红二十五军转移前进行了政治动员和整编，撤销了师一级组织，直辖3个步兵团和1个手枪团共2900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接着，在朱堂店突破敌人拦阻，从信阳以南的东双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金桥等地，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

蒋介石得悉红二十五军突围后，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5个支队共16个团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南阳、方城等地第四十军和老河口（今光化）第四十四师堵截；令开封之第六十师进到卢氏县朱阳关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乘我军远离苏区之际包围歼灭之。

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鉴于该区靠近平汉铁路，回旋余地狭小，难以建立苏区，决定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转移。为隐匿企图，红二十五军故作继续西进姿态，以一部佯攻枣阳，调敌西援。当各路敌人向枣阳地区进逼时，我军突然掉头向东，并在保安寨、歇马岭连续击退敌人第五、第二两支队的拦阻，继经泌阳以东转向北进，11月26日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击退敌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之进攻。当晚，我军乘风雨夜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继在拐河镇以北地区击退敌骑兵第五师、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追击后，进入伏牛山区。

这里，反动统治较严，地主围寨甚多，创建苏区比较困难，于是

红二十五军改向陕南前进，于12月上旬经河南卢氏，进至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并在三要司歼灭陕敌1个营，进抵雒南县的庾家河。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这里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苏区，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这时，敌人第六十师突然来袭，我军经半日恶战，歼其800余人，余敌退往卢氏。此后，我军抓住陕军杨虎城部忙于北攻陕北红军，南拒川陕边红四方面军，西面还要戒备蒋之嫡系部队，一时无力顾及陕东南的有利时机，展开在雒南、镇安、郧西、卢氏之间地区，大力进行开辟苏区的工作。

1935年1月，蒋介石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指挥4个旅又1个团，对红二十五军发动“围剿”。下旬，陕军第一二六旅、警二旅进至镇安城以东以南地区，向我军逼近。我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敌人，由山阳、郧西两县交界地区秘密转到柞水城以东，突然出现于敌人侧背。2月1日，我军在蔡玉窑歼敌1个多营，5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歼敌两个多营。中旬，蓝田、商县、山阳之敌1个旅又1个团分路向葛牌镇进犯。我军迅速转移到郧西地区，接着又转向西进，连克宁陕、佛坪两城。3月10日，在洋县华阳镇东南地区击溃追敌5个营，歼敌600余人。4月18日，攻克雒南城。至此，敌人第一次“围剿”即被打破。

红二十五军在反“围剿”作战的间隙和反“围剿”胜利后，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创建苏区的工作。至5月初在鄂陕边、豫陕边和华阳地区建立了五个县的党的工委和两个县的革命政权，组建了2000多人的地方武装，建立了鄂豫陕边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扩大到3700多人。

5月上旬，蒋介石又调集30多个团，由杨虎城指挥，向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其部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九十五师共12个团位于雒南城以东以北地区，由北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4个团，由郧西县的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和陕军第三十八军各一部共15个团，配置于安康、镇安、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我军。

5月中旬，敌人“围剿”开始后，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红军北上寻歼敌东北军一部，尔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争取再歼敌一两个师（旅），以打破敌之“围剿”。6月初，我军由郿西二天门出发，北进至商县地区，随后又向东转至庾家河，10日又掉头向东南疾进，13日包围商南城，接着攻占富水关、青山街，并以远程奔袭之战法，攻占敌人后方补给站荆紫关，缴获大批物资。此后，敌人4个师又1个旅分路扑来。我军为摆脱密集之敌，诱敌深入我根据地，寻机歼其一路，于25日回到根据地边沿黑山街。7月2日，以伏击战将追敌警一旅全歼于山阳以西的袁家沟口，俘敌旅长以下1400余人，缴枪1000余枝。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我军于13日经商县、蓝田县境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消灭了西安以南焦岱、引驾回等地民团。至此，敌人第二次“围剿”被迫停止。

这时，红二十五军得悉红一、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可能北上。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并同陕甘边红军会师，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留地方部队（后组成红七十四师）在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西安以南洋峪口出发，经鄂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县境西进。接着，攻占甘肃两当，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敌人西（安）兰（州）公路。8月17日，攻克隆德，歼守敌1个营的大部，20日在平凉城东又歼追敌1个多营，继在泾川以西四坡村再歼追敌1个团。在四坡村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此后，红二十五军继续转战于西兰公路附近的崇信、灵台地区，并继续调查主力红军的情况。这时敌军正在向我红二十五军周围集中。为争取主动，红二十五军于8月31日经平凉以东四十里铺渡过泾河，向东北急进，9月16日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同陕甘红军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五个省，转战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陕甘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

## 第二节 遵义会议。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

### 一、遵义会议。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又遭受了重大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坚持的路线的正确性，因而迫切要求改变路线，更换领导。一些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和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逐步改变了态度。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占遵义，把敌人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就为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博古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批评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们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我军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还指出：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是在广昌战役后，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与保卫老苏区。其次，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对博古、李德等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的领导方式，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中央苏区、湘

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等老根据地，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

这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不久，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展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 二、四渡赤水河，威逼贵阳

（参见附图54—57，附表46、47）

我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8个师，尾追我军进入贵州，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到乌江南岸；黔军以两个师向刀靶水、滥板凳，1个师向湄潭进攻；川军10多个旅40多个团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酉阳至铜仁一线筑堡，防止我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向贵州毕节地区开进；桂军两个师进到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泸州上游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1月19



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黔敌随即进占遵义、湄潭。川敌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调集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等地推进。24日，我右纵队红一军团击溃黔敌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至26日，占领赤水城东南之旺隆场、复兴场；中纵队红九军团攻占习水，红五军团进至三元场；左纵队红三军团进至土城东南之回龙场地区。这时，先我进入赤水城之川敌教导师第一旅和第五师第十三旅对旺隆场、复兴场之我军进行反扑；川敌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由东胜场进至温水，先头进至土城以东之木栏坝，尾随我军攻击，另两个旅随后跟进；川敌第一师第三旅主力正向叙永开进，另一部重占习水。

中革军委决定：乘敌薛岳部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敌新败的有利时机，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之川敌，集中主力歼川敌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共4个团于土城东北之风村坝、石羔咀、青岗坡地区，以保障我军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1月28日拂晓，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青岗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虽予敌以重创，但未能全歼该敌。此时，川敌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赤水城以南旺隆场地区的川敌两个旅也从西北向我侧背攻击。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一渡赤水** 1月29日拂晓前，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我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2月2日，我右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第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我军在继续西进中，一军团又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川敌截击；左纵队红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2月7日，龙云命令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第一、第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二渡赤水**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人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

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庄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五十九师主力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

队。11时许，第五十九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在进攻遵义的老城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 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3月5日以后，我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寻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

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令各路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第一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部为主要作战目标。15日，我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敌3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我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渡赤水** 我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令其所有部队再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我军于古蔺地区。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以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等地区。27日，我军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引敌北向，主力继续向南急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2日，我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

这时，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第九十九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以便随时逃跑。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在这次作战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

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 三、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

（参见附图58）

4月3日，我军在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赶进时，从息烽、扎佐之间东进，5日进至清水江西岸的高寨、羊场、白果坪地区。接着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向平越（今福泉）方向积极活动，同时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又错误判断我军将东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急令湘军3个师开往余庆、石阡堵截；令桂军1个军进至清水江以东的平越、牛场防堵；令已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第三、第一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第二纵队则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筑堡，防止我军再次北渡乌江。

我军乘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时，突然于4月8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接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使敌围歼我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蒋介石急令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掉头向西，在我军右侧沿黔滇公路向云南追击；令第三纵队尾追我军。由于往返奔波，这时敌军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更加低落。

4月18日，我军主力在白层、者坪地区渡过北盘江，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城。原留乌江以北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胜利完成任务，于4月4日在金沙以东之老木孔地区击溃黔敌5个团的进攻后，经毛坝场、瓢儿井和猫厂等地，进至黔西的水城地区，同

主力南北呼应。

蒋介石为阻止我军主力经平彝（今富源）北进同红九军团会师，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北经毕节入川，命令龙云、薛岳，以第三纵队尾追我军，川军1个师集中毕节机动；以第一、第二、第四等纵队和第五十三师经平彝向宣威、威宁推进，寻歼我军。

我军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以红九军团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追敌向北；主力以神速动作向西挺进，于4月27日攻占马龙，继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直逼昆明。

这时，昆明及其周围敌人兵力空虚，第二路军各纵队都远距我军三天以上路程。于是，龙云一面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第三纵队取捷径直开昆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我军北渡金沙江提供了有利条件。

4月29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在给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同时号召全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任务。

当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进至皎平渡。5月3日，中纵队之先遣队干部团一部赶到皎平渡，当晚偷渡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接着以一部兵力北进，在通安地区击溃敌之援兵，进至会理城下。与此同时，红一军团抢占了龙街渡口，但未夺得渡船，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所得渡船亦很少，加之这些渡口水流湍急或江面宽，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中革军委随即决定：除留第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渡江。6日，

追敌先头部队1个师进到团街附近，我后卫红五军团乘其不备发起攻击，阻止了敌之进攻，保障了主力渡江。5月9日，我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在此期间，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会泽，并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这时，尾追之敌全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会理地区只有川康边防军一个旅。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红九军团在蒙姑、巧家之间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之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下，以仅3万多人的兵力，经过3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取得了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消灭了大量敌人，摆脱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于川黔滇边地区的计划，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

### 第三节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央 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 一、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

（参见附图59，附表48、49）

1935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由陕南回师川北。这时，中革军委已决定暂缓执行在泸州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在川黔滇边地区机动作战。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行动，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为扫清渡江作战



障碍，红四方面军以第三十军和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向苍溪、仪陇之敌进攻，3月11日攻克苍溪，歼敌约5个团，俘敌3000余人。于是，北起广元（不含）、南至南部县城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仪陇城外，全部为我军控制。

嘉陵江西岸及其纵深地区，由川军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防守，其中有53个团布防在沿江一线，纵深兵力空虚，在涪江沿岸之绵阳、江油（今武都镇）地区仅有第二十八军军部和其主力一部驻守。在川甘边境的松潘、碧口及其以北地区，驻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之第一师。

红四方面军首长根据敌人防御正面宽大和后方空虚的情况，决定首先集中兵力，选择敌人薄弱部分，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消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其部署是：以第三十一、第三十、第九军为第一梯队，从苍溪以北鸳溪口至阆中地段突破敌人江防，向剑阁、剑门关方向发展进攻；第四军为第二梯队，以一部支援第一梯队作战，主力渡江后向梓潼方向发展。

为了胜利完成渡江作战任务，红四方面军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在川陕苏区的党、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3月28日，战役发起。第一梯队各部队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实施渡江作战。当夜，第三十军于塔子山附近首先渡江成功，歼敌1个营，并击溃思依场方向来援之敌1个旅；第三十一军于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要地火烧寺；第九军也于阆中以北胜利渡江。接着，第一梯队各军迅速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进攻，第二梯队第四军也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3月31日至4月3日，我军先后攻占了阆中、剑阁、南部、昭化及剑门关要隘，歼敌7个多团，余敌分向广元、盐亭方向撤退。至此，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此后，红四方面军为了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敌第二十八军军部

和三个旅，以第三十一军主力推进至三磊坝、羊模坝地区，包围广元；以第三十军一部西进青川、平武，迟滞胡宗南第一师南下；方面军主力分路向江油、梓潼地区进攻。4月10日，第九军过涪江，包围了江油之敌1个旅；接着第四军攻占了梓潼。敌人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慌忙率领所部主力，在飞机掩护下增援江油。我军随即以1个师继续围困江油，集中约4个师的兵力于江油以南地区打击援敌。打援部队经14日、15日战斗，将援敌全部击溃，歼其4个团，俘其3000余人，乘胜攻占中坝（今江油县治），继克彰明（今属江油县）。在此期间，第三十军克青川、平武，第四军一部于21日克北川城。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总计歼敌12个多团，约1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座城镇。

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在战前进行了充分准备，选择在敌人兵力薄弱、便于我军火力掩护和渡江后合围歼敌的地段，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人的江防，迅速向敌深远后方发展进攻，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法，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取得了战役的全胜。

## 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嘉陵江战役后，我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连同地方部队8万多人。这些对坚持与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肃南部发展，都是有利的。可是，张国焘只看到川陕苏区的困难和敌人将对川陕苏区举行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嘉陵江战役胜利所引起的有利变化，看不到在川陕苏区坚持斗争的战略意义，不经任何会议讨论，不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首长商量，也不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还在战役准备期间，他便借口前方需要兵力，逐步把川陕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西调。

在部队渡江之后，他率领后方机关撤离苏区，随主力渡江，仅留下300余人枪，由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等领导，坚持当地斗争。

在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以后，四川军阀和地主阶级随即对广大革命群众、地方干部、红军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进行血腥的屠杀，使苏区很快沦为白区。留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4月下旬，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新的苏区，命令刘湘组织13个旅以上的兵力，分由罗江和绵阳、三台地区向北，胡宗南所部由碧口、文县地区向南，举行新的围攻，企图歼灭我军于江油地区。5月初，各路敌军从南北两面向我军逼近，而此时新区的群众尚未发动，我军处境十分不利。为争取主动，并策应已经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进，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岷江地区转移，由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向懋功（今小金）地区前进。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先后占领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威州、理番（今理县）和松潘以南之镇江关、片口等地，控制了以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 三、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参见附图53）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放弃对会理之敌的围攻，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17日，在德昌以南击溃敌人川康边防军1个旅的拦阻，攻占德昌，歼敌一部。19日，以一部兵力监视西昌之敌，主力进抵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

这时，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又有天险大渡河。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成见。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都是陡峭的高

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曾在这里因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围歼我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声称要使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为此，他命令薛岳率其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追击，并以第三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西岸布防，阻止我军西进；同时，以川敌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我军北进，以第二十军主力及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训令强调指出：“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必须以极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并组织彝民游击队，以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当晚，我军继续北进。接着攻占泸沽、越嶲（今越西）、冕宁，进入了彝民聚居区。为了取得彝族人民的支持，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并争取了老伍家族中立，对受敌人利用同我对立的罗洪家族则向其耐心说明我党的政策。这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并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我军通过彝族区后，立即向大渡河急进。5月24日晚，先头部队

进至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敌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25日，我第一团第二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后续部队及时跟进，一举击溃防守北岸之川敌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从而在敌人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一军团一部虽在安顺场抢渡成功，但这里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只有四只小船，在几天内渡过河去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尾追之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sup>①</sup>

这时，川敌正以两个旅在大渡河左岸向泸定桥增援。我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第四团，于27日由安顺场出发后，为了抢在援敌到达前夺取泸定桥，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的口号下，沿着崎岖山路，边打边走，先后在猛虎岗、摩西（今摩西面）等地击破敌川康边防军的阻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扼川康要道，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敌为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欠1个营）。敌人在我军到达的前一天，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经过紧张的准备，我第四团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统一号令下，全团火器一齐开火，由第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敌岸冲去，在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火墙后，胜利占领大桥，冲进城内，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

<sup>①</sup> 泸定桥，原属西康省泸定县。泸定县今属四川省。

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后续部队紧跟入城，歼灭守敌一部，攻占泸定城。我军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第一师和干部团，也日夜兼程赶进，在击破敌人1个团的拦阻后，胜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由泸定桥顺利通过大渡河。这样，蒋介石处心积虑地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成泡影。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接着占领天全。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正向懋功急进，以接应中央红军。此时敌人第一、第二两纵队正由西昌北进，第五十三师已到冕宁，原驻天全的第二十军1个旅已调往荣经，受命调往芦山的第二十八军等部尚未到达。中革军委为了迅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决定以迅雷之势，突破敌人芦山、宝兴一线防御，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冰雪严寒的恶劣自然条件，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这时，红四方面军一部已攻占懋功，并前出至懋功东南的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欢欣鼓舞，纷纷举行联欢会，庆祝会师。

两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气焰，鼓舞了我党我军的胜利信心，为尔后发展革命战争，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师后，为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央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加强中央红军。同时，还互相参观慰问，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军队间的革命友谊。

## 第四节 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 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陕甘苏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 一、党中央同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的斗争

(参见附图53)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更加高涨。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和西北红军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的反“围剿”作战，都取得了一些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来几个苏区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蒋介石尽管还在竭力策划对红军新的进攻，但是由于他追堵围攻红军的数十万军队已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部队大量减员，士气日益低落，内部又不统一，其困难较之过去更多了。这些情况表明，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

当时，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属高山穷谷，人口稀少，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着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和建立根据地。因此，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地制定两大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在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电中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指出：红四方面军全部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

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张国焘、陈昌浩在17日给中央的复电中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要红军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利〔向〕南进攻。”党中央于6月18日复电张国焘时，进一步强调：“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并着重指出：以“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6月20日，张国焘又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即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主张。同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



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还严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会议通过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共12个团，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后方工作；主力共37个团于7月7日至13日分别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我军〕北向作战和发展。”

两河口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红一军团及红三十军一部经马塘、康猫寺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7月10日，红一军团部队攻占哈龙；16日，红一军团和三十军各一部攻占毛儿盖。这时，红三、红五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则由卓克基经芦花到达毛儿盖。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会后又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同时在杂谷脑召开干部会议，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谣言，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后来，张国焘还策动和纵容他的支持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陈昌浩于7月16日、18日连电中革军委，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

党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等人的要求，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2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另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此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8月4日至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举行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徐向前等出席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在阐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后，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并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决议还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执行中央路线，同夸大敌人力量，不敢大胆前进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会议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敌军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同胡部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并步步进逼，企图围歼我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依据上述情况，中革军委决定

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红军总部在8月3日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纵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前进。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闻天、毛泽东、陈昌浩、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实现6月28日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决定还指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以红军主力西进的错误主张，尖锐地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

“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8月24日，党中央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并明确指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今舟曲〕、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麦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从卓克基到阿坝，从毛儿盖到班佑，都要经过茫茫的草原。那里气候恶劣，忽而风雨冰雹，忽而浓雾弥漫，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人和骡马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红军指战员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发扬了吃苦耐劳、团结友爱的革命传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通过了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底以前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班佑以东之上、下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必须控制的要点，敌人有1个团的兵力在包座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据险防守。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后，又令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我军。

我右路军为开辟前进道路，决心以红四方而军之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以红一方而军第一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8月29日，我军向大戒寺和求吉寺发起攻击。30日，敌人第四十九师向大戒寺增援，我军撤向大戒寺东北，以诱敌前进。次日，当敌由大戒寺沿包座河两岸北进时，我第三十军主力奋起反击，当晚将其3个团分割歼灭。此时，困守大戒寺之敌被迫全部投降，求吉寺之敌也被全歼。战斗中，我第十师师长王友钧英勇牺牲。包座战斗，我军歼敌1个师约5000人，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 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参见附图53)

我右路军进至班佑、巴西地区后，蒋介石急令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绕道文县开往西固堵截我军，胡宗南则请求位于平武、广元、昭化一线的薛岳部先到南坪、松潘接防，然后北进。此时，东北军主力正在“围剿”陕甘红军，一部兵力分散在宝鸡西南的两当、徽县地区；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县广大地区敌人兵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这是我军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并指出：我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但张国焘却于9月3日再次提出同中央的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要“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并命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第五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又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扣留中央纵队。同日22时，张国焘命令<sup>①</sup>右路军暂停向罗达进，准备南下。与此同时（8日22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联名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应“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可是，张国焘竟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指示。9日，他致电左路军后梯队的倪志亮、周纯全称：“现天更冷，再北进部队必被拖垮。拟改道南打，一路由阿坝经绥靖、崇化、丹巴，一路经卓克基、懋功，以向邛、大、天、

<sup>①</sup> 红军分左、右两路军期间，左路军领导人发出的电报多以朱德、张国焘名义。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曾指出：“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芦、灌、绵、安进为目的。”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sup>①</sup>，企图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

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决定率领第一、第三军先行北上。9月9日24时，张国焘在电令右路军南下后又致电党中央，说北上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夏、洮、邛、大更好”，提出红军“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顽固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第一、第三军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同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同时致电右路军领导人：“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11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仍然置若罔闻，反诬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甘南为“逃跑”。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红四方面军中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说：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从而为维护红军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

<sup>①</sup> 参见1937年3月中共中央“延安会议”第二项议程纪录，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时的发言。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党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对目前全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红军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西北创造新的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还指出，张国焘之所以搞分裂，还因为他存在着军阀主义，不要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还深刻地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他离开党。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仅传达至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的工作。并由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李德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整编工作。

9月13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由俄界继续北上。14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力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的红四、红三十军开路，以便他们北上。“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

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张国焘仍然置之不理。

这时，甘南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敌人鲁大昌1个师，正是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16日，我军击溃鲁大昌部第六团，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我先头部队第四团以1个连在正面进攻，以两个连从敌阵地左翼攀登陡壁悬崖，突袭敌之侧背，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我军乘势占领哈达铺。

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红一军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下辖5个大队；红三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下辖4个大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蔡树藩为政治委员。在部队休整期间，党中央把进入甘肃后的胜利和各方面情况电告张国焘等，希望他们立即北进。张国焘根本不听，还是一意孤行。

9月23日，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东进间井镇，佯攻天水，调动敌人向天水集中，我军主力乘机向北急进，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了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会后，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并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之敌骑兵2000余人击溃。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了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刘少奇，以及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



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开始为实现党中央新的战略任务而斗争。

### 三、红一方面军主力同红十五军团会师。

####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参见附图60，附表50、51)

当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向甘南进军时，陕甘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敌人这次“围剿”，是从1935年7月开始部署的，蒋介石以东北军为主力，集中13个师又5个旅，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法，企图围歼西北红军于保安、安塞地区，彻底摧毁陕甘苏区。

此时，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已连成一片，红军主力已发展到5000余人。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敌军内部矛盾多，动作不协调等弱点，决定集中主力，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之“围剿”。8月1日，我军乘敌人部署尚未就绪之际，以打击态势比较孤立的晋绥军为目标，集中主力5个团，由清涧东北之袁家沟、花岩寺秘密北上，10日至12日在吴堡以北的慕家塬全歼守敌和援敌4个连。接着，以地方部队一部包围吴堡之定仙塬，主力在定仙塬东北地区设伏，全歼由枣林坪来援之晋绥军1个团2000余人。战后，晋绥军除留少数兵力守备宋家川至枣林坪和绥德至三十里铺两条碉堡线外，其主力全部东撤。我军即以一部南下麟县（今富县）、甘泉地区，牵制敌东北军；主力北上袭击横山之敌第八十六师，未能得手。

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反“围剿”的力量得到了增强。

9月26日，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此时，张学良部第六十七军1个师又两个团已进至延安，其

另两个师又1个团仍驻在洛川、酃县、甘泉地区，兵力比较分散。

红十五军团首长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主力求歼由延安回援之敌。9月28日，我地方部队包围甘泉，主力由永坪地区出发，于30日进至甘泉以北之大、小劳山荫蔽待机，另一部占领了劳山以北有利地形，准备切断援敌退路。10月1日，敌人第一一〇师主力由延安南援甘泉。当敌进至劳山地区时，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激战半日，歼敌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战马300余匹和大批武器、装备，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接着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对榆林桥守敌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之第二营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外围，经过逐街逐屋的争夺，至次日下午全歼该敌，俘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余人。劳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

正当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陕甘苏区的严重危机。党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立即纠正了这一错误，把刘志丹等释放出来，恢复其党内外的职务，从而稳定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局。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短期休整后，10月底经保安东进，于11月初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sup>①</sup>，任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第二、第

<sup>①</sup>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是实际上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第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警卫团。全军共1万余人。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敌人“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郿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方针，消灭我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0月28日，西线之敌第五十七军4个师由庆阳、合水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于11月1日占领太白镇；南线之敌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郿县。

据此，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之“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11月6日至7日，红一军团由甘泉以西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至郿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敌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紧围攻甘泉，以调动敌人东进。

11月19日，敌人第五十七军1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郿县前进，其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乘敌第一〇九师比较突出的有利时机，首歼该敌于直罗镇地区。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郿县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连绵，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大部队展开比较困难。11月20日下午4时，敌人第一〇九师进至直罗镇。我军当夜将其包围。次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战至下午2时，歼其大部。此时，东西两路援敌迫近直罗镇。我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一〇九师

残部和阻击由郿县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敌第五十七军另两个师。该敌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我军跟踪直追，在张家湾地区歼其1个团，余敌退回太白镇。由郿县出援之敌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郿县。被围之敌第一〇九师残部于当晚突围，24日上午被我全歼。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

直罗镇战役，我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团结一致，协同作战，抓住葫芦河这个便于粉碎敌人两线封锁计划，便于我军尔后发展的战略枢纽；选择了直罗镇这个为敌军必争，而地形和群众条件有利于我军的良好战场；在战役部署上，以少数兵力牵制其他敌人，集中10个团以上的优势兵力，歼灭立足未稳之敌3个团。一战获胜，迅速转移兵力再歼西而援敌，从而各个击破了敌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这样，红军长征之后即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胜利的出发点。

#### 四、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参见附图53)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诬蔑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并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煽动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宣扬“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左路军之先头纵队（第五军全部，第九、第三十一军各1个师）和右路军之第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不顾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至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

一方面军之第五、第三十二军，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另立“中央”，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通过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这种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政治原则性。

张国焘为了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于10月7日发出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8日起，各部队先后开始行动，至20日，攻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击溃川敌第二十军、第二十四军共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

绥崇丹懋战役后，川敌为阻止我军攻势，急以第二十四军约8个团防守金汤、汉源、雅安一线，第二十军约10个团防守芦山、宝兴至大碛碛一线，第四十五军约14个团防守邛崃、大邑、双河场、大川场一线，模范师9个团驻守天全，另由新津、绵竹、广汉地区抽调18个团西进名山、邛崃、雅安地区待机。

张国焘不顾绥崇丹懋战役引起的敌情变化，又于10月20日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全力南进，企图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建立根据地。24日，我军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至11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敌一部，前锋逼近邛崃县境。

这时，敌人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四十四军各一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连同原在当地的敌军共80

多个团，企图同我军决战，以阻止我军东进成都平原。同时，第四十一军 16 个团正向新津、洪雅地区赶进策应；薛岳部主力集结成都待命。

张国焘不顾敌情严重，仍令我军全力进攻名山、邛崃，企图与刘湘主力决战。11月13日，我军以15个团向朱家场、太和场之敌攻击，次日击溃敌人两个团，占领上述各地。16日，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接着打退敌人6个旅的反扑，并继续沿百丈通邛崃的大道进攻。19日，敌人又集中10多个旅，在飞机的掩护下，由东、南、北三面向百丈地区反扑。我军苦战7日，虽毙伤敌军1.5万余人，但自己也伤亡近万，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被迫撤至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御。

此后，川敌主力集中于雅安、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由成都、新津向洪雅地区推进；而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的藏族上层反动分子也竭力煽动与胁迫群众反对我军。我军在这一地区虽然经过很大努力，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组织、革命政权，但始终未能建立起根据地。同时，这一地区人少，粮缺，我数万大军补充日益困难，部队冬装更无法解决。党中央早先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警告，此时得到了证实。

1936年2月初，敌人经过周密准备之后，集中薛岳等部6个多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于是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康境内转进，夺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整补待机。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即告失败。

2月11日至23日，我军相继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地区向西北转移。时值严寒季节，广大指战员战胜了缺粮、缺氧、风雪、严寒等困难，翻过了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的折多山，至4月上旬，先后进占道孚、炉霍、瞻化（今新龙）、甘孜等地，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

地区，暂时避开了敌人的进攻。

红四方面军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减员很大。1936年1月10日，第三十三军编入第五军；4月初，红四方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减至4万余人。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南下部队十分关怀，经常告以全国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红军北上后的胜利等，希望他们迅速北上。党中央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后，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并公布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让全党了解事情的真相，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亦致电张国焘，劝其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从南下川康边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越来越不满，迫切要求北上同党中央会合。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敌我情况，制定了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并向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党中央采取了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正确地处理了党内矛盾，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实现了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的战略任务。实践证明，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方针则是完全错误的。

## 第五节 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反“围剿” 红二、红四方面军 会师和北上甘南

### 一、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反“围剿”

(参见附图61)

1934年冬，红二、红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湘鄂川黔苏区，震撼了湘鄂两省敌人的统治。湘鄂两省敌军集中80多个团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加紧部署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企图围歼我军于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地区。其部署：徐源泉纵队辖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张振汉纵队辖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陈耀汉纵队辖第五十八师、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辖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向大庸进攻；李觉纵队辖第四十九师、湖南保安团一部，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陶广纵队辖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四师，由沅陵分两路，右路经军大坪、四都坪向大庸进攻，左路经古丈向永顺进攻。同时，以陶广纵队一部及几个保安团防守沅陵及沅江沿岸，防止红军南进湘中；以鄂军第三十四师在渔洋关、五里坪、鹤峰、太平镇之线，阻止红军北渡长江。

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发现敌人即将进行“围剿”后，于12月下旬停止攻势行动，并率主力由常德、桃源地区回师大庸，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此时，我主力红军已发展到4个师11个团1.2万余人，地方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1935年1月11日，总指挥部制定了反“围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地



区，待机打击由沅陵北进之敌陶广纵队，尔后迅速转移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各路敌人，以粉碎敌之“围剿”，并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2月1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在关于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作战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决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

2月初，各路敌人开始进攻。红二、红六军团从正面迎击敌人，在近两个月中，先后在溪口、后坪、高粱坪等地进行的多次战斗，都没有能够大量歼灭敌人，自己却伤亡了3000多人，大庸、桑植相继失守。3月22日，湘鄂川黔省委向党中央报告，提出在情况不利时，红二、红六军团准备北渡长江，向南漳、兴山、远安地区转移。4月5日，中革军委复电指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向北转移问题，只有“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4月9日，敌人占领永顺城后，从四面向苏区中心区推进。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湘鄂川黔苏区，拟经陈家河、仓官峪（今仓关峪）、香溪北渡长江，向湖北之南漳、兴山、远安地区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

转移前，省委和军委分会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了党中央的遵义会议精神，并进行了转移的各项准备。

**陈家河、桃子溪战斗** 4月12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为了北渡长江，遂率红二、红六军团离开塔卧、龙家寨向北转移。这时，敌纵队司令兼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派第一七二旅由桑植出发，

沿澧水西进，企图与鹤峰等地的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切断红军向湖北转移的通路。13日，我军进至陈家河附近，同沿澧水西进之敌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的警戒分队遭遇，迅速将其歼灭。接着，我军抓住该敌刚到陈家河地区，立足未稳，态势孤立之机，于14日晨发起进攻，激战至黄昏，全歼该敌。由桑植向陈家河增援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大部进到两河口时，发觉第一七二旅已经被歼，即慌忙回窜。我军在回师塔卧途中，发现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大部正在桃子溪宿营，便向该敌发起突然袭击，经两个小时战斗，将其全歼，并乘胜于16日收复桑植城。

陈家河、桃子溪战斗后，各路敌军纷纷后撤。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即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在原地坚持斗争，乘胜发展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的战略反攻。

4月下旬，我军以一部兵力在苏区内牵制敌人，主力东进，向敌人后方兵力薄弱的江垭、石门方向发动攻势，威胁敌后方重地津市、澧县，迫使湘敌撤退，以恢复苏区。4月27日，我军攻占江垭，一部前出至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和北渡长江之势。湘敌慌忙抽兵回援慈利，防止我军东取津市、澧县，南攻常德、桃源；鄂敌则慌忙抽兵退守长阳、渔洋关，防止我军北渡长江。这时，尚在苏区的敌人只有第六十二师和新三十四师各一部，以及第十五师的1个旅和一些保安团。我军即于5月上旬返回永顺、桑植、龙山地区，寻机消灭苏区内的敌人。

5月中旬，中央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红二、红六军团打击湘敌，支援中央红军行动的任务已经完成，军委分会遂决定将对湘敌取攻势、对鄂敌取守势的方针，改为对鄂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方针，以主力北出鄂西，寻歼鄂军。

**忠堡战斗** 6月9日夜，我军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围鄂西的宣恩县城，主力隐蔽集结在城南10公里处，准备打击可能由来凤、李家

河增援之鄂敌。12日，鄂敌张振汉指挥约4个旅的兵力，编成3个支队，以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四旅又两个团为右支队，由李家河经三叶台西进；张振汉率第四十一师的第一二三旅为中支队，由李家河经老叉口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及第一二一旅为左支队，由来凤经三堡岭西进；分三路向宣恩增援。我总指挥部在敌人出动前便获悉了敌人这一计划，当即决定留1个团继续围攻宣恩，主力南下忠堡地区截击敌人。12日15时，红军经过65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忠堡东北的黄牛棚附近。这时，敌人右支队的主力已进至忠堡，中支队和左支队正向中堡前进。我军不待敌人靠拢，当即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攻击，迅速歼灭敌人右支队的后卫一部。13日，将敌左支队包围于忠堡以东的构皮岭山谷。次日晨，我军集中4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全歼该敌，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

战后，我军回师湘西，以一部兵力围困龙山，主力分散开展地方工作、扩大红军和整训部队。7月下旬，敌人集中10个团向龙山增援，我军在予敌人以重创后遂撤龙山之围，主力荫蔽集结于龙山以东地区待机。

在此期间，蒋介石为加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由江西调第八十五师入鄂归徐源泉指挥，另调第二十六路军的1个师接替第三十四师在鹤峰地区的防务，让鄂军集中作战。7月30日和8月1日，徐源泉先后命令第三十四师主力、第四十八师的1个旅分别由鹤峰以西的太平镇和宣恩以南的高罗南进到沙道沟，第八十五师经宣恩西南的小关南进到李家河，以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防止我军再入鄂西。

**板栗园战斗** 红二军团总指挥部鉴于敌第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各方面情况均不熟悉，从小关至李家河道路崎岖，山高林密，部队不易展开等情况，决定集中主力再入鄂西，以伏击或截击的战法，求歼

该敌于运动中。为迷惑敌人，我军由龙山以东的兴隆街向北，进至沙道沟附近。徐源泉判断我军将打击由太平镇、高罗南下的第三十四师和第四十八师的1个旅，急令他们停止前进，严加戒备。8月3日晨，敌第八十五师由小关向李家河前进。此时，我军突然由沙道沟附近向西南急进，于11时赶到敌人第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东南之利夫田谷地设伏。当敌第八十五师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区时，我军突然发起猛攻，将其切成数段，激战至午夜，全歼该敌，击毙敌师长谢彬。

板栗园战斗的胜利，迫使鄂敌纷纷后撤，湘敌也收缩兵力转入防御，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即告失败。我军在半年多反“围剿”作战中，共歼敌两个师、1个师部和1个旅，缴长短枪8000多枝，轻重机枪100多挺，火炮20多门；建立了慈桑、宣恩、龙山三县革命政权；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此后，我军抓住敌人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机，展开了进攻作战。8月中旬，我军主力由龙山地区回师桑植。20日，集中主力三个师向敌兵力较空虚的石门、澧县地区发动进攻，占领了石门、津市、澧县、临澧等城镇和广大地区，并在这个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筹措物资，扩大红军。在半个多月中，我军即扩大6000多名新战士，备齐了全军的冬装，筹集了大批物资和14万银元，为尔后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

### 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参见附图53，附表52、53）

1935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30个团，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方针，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企图将红二、红六军团压缩并消灭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地区。其部署是：以湘军何键部和鄂军徐源泉部在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一线筑堡固

守，从苏区的南、西、北三面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第二十六路军和樊崧甫纵队及汤恩伯纵队共9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从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逐段筑堡推进。同时，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9月初，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县，回到桑植地区，准备在内线寻机歼敌，以打破敌之“围剿”。但因敌军行动谨慎，我军多次寻战未成，而敌之堡垒封锁却越来越紧。同时，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地主武装和土匪的活动猖獗，我军物资补给也十分困难。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以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首先向南突破敌人澧水、沅水两道封锁线，进入湘中，然后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省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创建苏区。并决定：红十八师在斗争不利时，也向湘黔边境转移，同主力会合。

转移前，省委和军委分会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筹措了粮食，安置了伤病员。同时，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将地方部队编成第五、第十六师，分别编入红二、红六军团序列，使两军团各辖3个师，共1.7万余人。

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桑植县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20日黄昏，我军在大磨和溪口之间的澧水北岸张家湾附近打垮守敌一部，渡过澧水，继而渡过沅江。随后，分两路向湘中广大地区展开，至11月28日，分别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和新化、蓝田、锡矿山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筹措资材。

蒋介石发觉我军突围后，除留一部兵力对付我第十八师外，集中5个纵队共12个师又1个旅，分路追击，企图歼灭我军于沅江和资水之间地区。12月8日，李觉纵队3个师袭占溆浦，樊崧甫纵队4个师由东坪（今安化）向新化前进，陶广纵队两个师和郭汝栋纵队1个师

又1个旅沿沅江向南推进，汤恩伯纵队两个师经岳阳、长沙向邵阳急进。

我军为争取主动，决定退出湘中，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12月11日，我军由溆浦附近出发，向东南急进，故作东渡资水的姿态，以调动追敌向东。经过9天行军到达武冈以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时，突然掉头西进，转战于雪峰山区和湘黔边境，于1936年1月9日至12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进入黔东。

我主力转移后，留在苏区的红十八师，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同7个师又3个旅的敌人进行了一个月的艰苦战斗，于12月21日在龙山以南突出重围，进到黔江、酉阳地区，1936年1月11日到达江口，同主力胜利会合。

石阡、江口地区居民稀少，粮食困难，而敌人又从四面向我军进逼。在此情况下，我军委分会改变在该地区创建苏区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争取在贵阳西北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苏区。1月20日，我军开始西进，次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三师的封锁线后，即转兵向南，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以北击退敌人第九十九师的截击；接着西取洗马河，袭击龙里，前锋直逼贵阳。这时，敌主力全在我军东面和北面，贵阳敌人兵力薄弱，蒋介石急令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向贵阳收缩，同时调郝梦龄纵队向湄潭集中，准备南渡乌江截击我军。我军随即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急进，袭占修文、扎佐，造成经息烽北渡乌江之势，敌郝梦龄纵队慌忙在乌江北岸布防。我军又转向西急进，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并按照预定计划，展开于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着手创建苏区。在20多天内，扩大红军5000多人。

这时，敌人除以川军一部向赤水 and 川南的高县、叙永地区赶进，滇军一部进至昭通、宣威一线，防止我军北渡长江和西入云南外，还调集万耀煌、郝梦龄、樊崧甫3个纵队经遵义、三重堰等地，李觉、

郭汝栋两个纵队分别经织金、贵阳等地，向我军进逼。2月上旬，我军以主力进至打鼓新场（今金沙）和三重堰以北地区，寻歼敌人未成；而敌人万耀煌纵队一个师却乘虚于14日袭占黔西县城，接着进占大定。不久，敌人其他纵队也陆续赶到，我军被压缩于毕节狭小地区，继续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活动已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退出毕节地区，沿毕（节）威（宁）大道西进，然后折向东南，到安顺地区创建苏区。

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毕节地区西进乌蒙山区。敌人以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尾追，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分别由织金、大定向水城、威宁截击，企图在川滇两军配合下，围歼红军于毕（节）威（宁）大道或以北地区。红二、红六军团采取忽南忽北、时东时西，同敌人兜圈子的灵活战术，在乌蒙山区同敌人5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周旋了一个多月，转战1000多里，于3月下旬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

经过四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转入守势，进行整补。我军则仍拥有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同时，盘县、兴义地区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亦好。我军准备在这一带创建苏区。

3月30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接到了朱德和张国焘关于要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命令，遂于31日率部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滇中急进。红二军团于4月6日攻占寻甸，8日抢占普渡河；红六军团经白石岩、羊街、可朗等地向普渡河前进。

我军进入云南后，蒋介石任命龙云为“滇黔剿共军总司令”，指挥李觉、郭汝栋、樊崧甫和孙渡4个纵队继续进行“追剿”。4月8日，我军先头团刚渡过普渡河，敌孙渡纵队1个旅即赶到河边，封锁了渡口。企图待其他各路追军到达后，围歼我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

以南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围歼我军的计划，红二军团第五、第六师于9日由可朗折回六甲地区反击敌人孙渡纵队，经一天激战，击退其两个旅的进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接着，我两军团由普渡河南下富民以东，继又转向西进，准备在丽江、石鼓一带北渡金沙江。

此时，龙云急令孙、李、樊3个纵队尾追，郭纵队从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胜急进，先我控制金沙江北岸，企图前堵后追，将我军歼灭于金沙江南岸之鹤庆、丽江地区。

红二、红六军团不顾敌机的骚扰和轰炸，分两路日夜兼程前进。左路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今南华）、祥云、宾川；右路红六军团连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并于4月20日在宾川同红二军团会合。23日，我军占领鹤庆，继占丽江，进到金沙江边的石鼓镇，将追敌远远甩在后面。25日晚至27日，我军在石鼓、巨甸两处渡过了金沙江。

红二、红六军团渡江后，即沿玉龙山脉西麓金沙江东岸北进，4月30日到达中甸。在这里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由于红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得到了边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不少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5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经得荣、巴塘、白玉和定乡、稻城向甘孜前进。进军途中，广大指战员以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战胜了严寒、缺氧、缺粮等困难，胜利地翻越了几座大雪山。6月3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以南的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师；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同第三十军会师。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

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



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二、第六两军团的建制不变<sup>①</sup>，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而将红二军团的第五师改编为第三十二军的第九十六师。

### 三、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南

(参见附图53)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正在胜利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我党在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中的统战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对其他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于6月初发动了“两广事变”，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号，出兵湖南，反对蒋介石政府。蒋介石被迫将陕甘“剿共”主力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甘南地区敌人兵力比较薄弱。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乘胡宗南部南调之机，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张国焘虽然于6月6日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并于6月10日复电党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是他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6月19日，党中央再一次向张国焘指出，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采取各种手段，在红二方面军中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张国焘的这些反党活动，遭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在此期间，任弼时、

<sup>①</sup> 红二方面军组成后，第二、第六军团也曾用过第二、第六军的番号。

贺龙等，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从7月初起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左纵队经西青寺、阿坝，中纵队经查理寺、毛儿盖，右纵队经卓克基、马塘，向包座、班佑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于8月上旬胜利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这时，敌人新编第十四师布防于岷县、临潭、西固地区，第三军正由陕南向文县、武都、天水、西固地区前进，第三十七军也由秦安、天水、甘谷西移陇西、定西地区，企图构成西固至临潭、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我军北进。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及时告以全国和甘南的情况，以及部队在向甘南前进中应注意的问题。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岷(县)、洮(州)〔即临潭〕、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先机夺占岷县、临潭、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我军以第三十、第九、第五军为第一纵队，主力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县，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并向武都佯动；以第四、第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以主力向临洮方向发展，一部向夏河、临夏活动，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

8月5日至12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第一纵队于9日抢占了天险腊子口，继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00余人，并于26日攻占渭源。第二纵队于8月20日攻占洮州旧城，歼敌1个营，接着击退敌人马步芳部1个旅的进攻，攻占通渭。第三纵队经救济

寺、腊子口，于9月初进至哈达铺地区。至此，红二、红四两方面军胜利进入甘肃南部，控制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八座县城和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县的广大地区。这就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援下，从1935年春到1936年秋，先后转战在湘鄂川黔滇康甘等省，以坚决积极的战斗行动，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到达甘孜后，组成红二方面军，又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甘南，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第六节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的坚持

（参见附图62，附表54—56）

1934年秋，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长江南北各苏区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内的14个地区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极其艰难险阻的道路。他们在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和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适时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终于战胜了强大敌人的残酷“清剿”和种种反革命诡计，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

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另有伤病员3万余人。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地统治下去，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苏区军民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在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以阵地防御战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至1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从12月起，敌人以陈诚等指挥的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对中央苏区进行划区“清剿”，其余部队则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没有适时改变组织方式与活动方式，实现向游击战争的转变，反将许多小游击队编入各独立团，将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二十四师，继续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其结果，红二十四师等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接连发出指示，要苏区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活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使游击队在群众中站稳脚跟；缩小或取消庞大的机关，负责同志“随游击队行动”，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复党的组织，加强群众武装，并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党中央这些指示，对中央苏区乃至其他苏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苏区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随即决定将红二十四师等部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

转变。这时，中央苏区几乎全部被敌占领，红军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在分途突围过程中，苏区中央分局和红军都受到很大损失。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儿、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不久英勇就义。苏区中央分局和少数部队突围后，转至赣粤边、闽西等地区，会同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继续坚持斗争。从此，苏区中央分局与党中央和自己领导的其他地区均失去联系。

## 一、赣粤边游击区

1935年3月，项英、陈毅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等率领300余人的部队，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及赣粤边军分区的部队会合，共1000余人，开始在这一地区坚持游击战争。4月初，敌粤军3个师和江西一部分保安团共约4万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对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清剿”。敌人到处构筑碉堡封锁线，控制交通，阻止红军游击队进行机动；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离间人民群众同红军游击队的关系，并利用叛徒对红军游击队进行策反；强迫移民并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其他日用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江西省大庾县长岭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2月来电的精神和当面的敌情，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方针，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战术和各种斗争策略。并决定：蔡会文率领赣南军区部队到湘东南的桂东、汝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设法同湘赣省委及先期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达湘南地区的部队取得联系，其余部队分成四部份，分别进至大庾、南雄两县边界以帽子峰为中心的北山地区，大庾、信丰、南雄三县边界的油山地区，以信丰县上乐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区和信丰、南雄、虔南(今全南)、

龙南等县边界的南山区，依靠当地群众，同“清剿”之敌周旋；项英、陈毅在北山区指导各区工作，并设法同邻近游击区取得联系。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战，结合组织群众进行合法的和荫蔽的斗争，游击队初步站稳了脚跟，使敌人“清剿”计划落空。

10月间，敌人得知<sup>①</sup>项英、陈毅等我党高级负责人在赣粤边区活动，随即采取封山、烧山、搜山等手段，发动第二次大“清剿”，并强迫群众出山，进行移民并村，以隔断群众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苏区中央分局领导人等预先转移到信康赣区，一面领导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一面派党员干部随群众出山，组织群众同敌人斗争，并设法接济游击队，使敌人的“清剿”计划未能实现。在此期间，我地方组织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蔡会文、李乐天不幸牺牲，游击队减少到不足300人，派去湘东南活动的部队也同苏区中央分局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在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下，坚持斗争。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粤军他调，赣粤边的敌军仅剩下一些保安团。项英、陈毅随即将各区游击队适当集中起来，向当面之敌进击，先后攻克了大庾、信丰、南雄等县的许多墟镇，使赣粤边各小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游击队也扩大到500余人。

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以第四十六师于9月对我赣粤边游击区举行新的“清剿”。项英、陈毅率领游击队一面积极打击敌人，一面广泛开展争取白军士兵、保甲长等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挫败了敌之“清剿”，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 二、闽赣边游击区

1935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决定成立以赖昌祚为书记的瑞金

---

<sup>①</sup> 1935年5月，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带领敌军“清剿”红军，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特委，领导瑞金、西江、瑞西3个独立营和各区、乡游击队共千余人，就地开展斗争，配合红二十四师的作战行动。3月，敌人以两个多师的兵力，连续对我闽赣边区进行“清剿”。我各独立营和游击队经两月苦战，大部遭受损失，赖昌祚等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剩下30余人，由少共特委书记钟得胜率领，改称瑞金游击队，在大柏地一带山区坚持斗争。同年夏，闽赣边区之敌正规军先后调走，只剩下保安团等地方部队。我瑞金游击队一面深入群众，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公开的与荫蔽的斗争；一面寻找机会，以伏击、袭击等战术打击敌人。到1936年底，游击队扩大到50余人，并在瑞金周围地区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区委和支部。

与此同时，原属福建军区的汀瑞游击队和刘国兴率领的一支游击队，在长汀、瑞金、会昌一带坚持活动，并得到发展。

### 三、闽西游击区

1934年11月，敌人先后在漳平、平和、上杭、长汀地区集中了8个正规师，加上民团及土匪武装，共10余万人，采取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的手段，对闽西苏区大举“清剿”，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闽西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1935年春，闽西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八、独立第九团及明光独立营等部，先后汇集到龙岩、永定地区。不久，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红二十四师100余人，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达永定，同张鼎丞及独立第八、独立第九团等部队会合，两部共1500余人。

1935年4月，张鼎丞主持召开各部队负责人会议，根据2月间党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几个指示电的精神和闽西当面敌情，确定了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力量、锻炼部队、等待时机以开展新局面的方针和任务，并将闽西地区划分为4个作战分区，规定了各部队的活动区域和各项具体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郭

义为、方方等为委员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会后，各分区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作战和工作，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打破了敌人两次大“清剿”，并恢复了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各县武装交通队，除第一、第二两分区的部队曾受较大损失外，其他部队都得到了发展，还收容了原闽赣军区的失散人员100余名。

同年冬，闽西地区的敌军减少到5个师，情况有所缓和。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传到闽西地区后，军政委员会于1936年1月举行第二次会议，确定在闽西地区开展争取一切阶级、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加入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将闽西游击武装改称抗日讨蒋军，第一至第四作战分区所属部队依次改为第一、第五、第三、第七等支队，各县游击队改称为抗日义勇军。会后，各支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改变了一些过激的做法，从而取得了当地一部分地主以及区、乡、保长和民团的同情。与此同时，各支队坚决打击进犯之敌，先后消灭了敌正规军一个营和许多反动团匪，捣毁了几个反动区公所，游击区扩大到南靖、平和、大埔、蕉岭、武平、连城、宁洋等十余县的范围，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至8月，游击武装发展到近2000人，新成立了第二、第四两个支队。

“两广事变”爆发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兵力截击蒋军入粤部队，忽视了利用此一良机发展游击战争，以致到“两广事变”结束，粤军两个师来闽西接防时，我军因过于集中、疏于戒备，遭受一些损失。

#### 四、闽粤边游击区

1934年底，敌人先后调集了4个多师及地方民团一部“围剿”闽



粤边苏区。中共闽粤边特委<sup>①</sup>领导苏区人民和红军独立第三团，在福建的南靖、漳浦、平和、云霄、诏安、龙溪、海澄和广东省的饶平、潮安、澄海等县坚持斗争。至1935年5月，闽粤边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三团随即分散在漳浦、云霄边界的梁山和云霄、平和、诏安三县边界开展游击战争。至年底，红三团又重新建立了（南）靖（平）和（漳）浦游击根据地。在此期间，原属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潮（安）澄（海）饶（平）游击队转战到福建诏安地区，同红三团1个排合编为独立营，改归闽粤边特委领导，在云霄、平和、诏安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6年初，闽粤边特委根据当面敌人的动向及从报刊上了解到全国形势发展的趋势和党对时局的某些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并在闽粤边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军等群众抗日组织和武装，争取了许多壮丁队成为抗日自卫军，并在靖和浦、云和诏两游击区普遍建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即区游击队）。随后，又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军。9月，粤军1个师对闽粤边游击区进行“清剿”。闽粤边游击队在特委领导下，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打破了这一“清剿”。至年底，闽粤边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范围扩大到东至海岸，南至广东的潮安、澄海、饶平边界，北迄福建漳州城郊，西与闽西游击区接近的广大地区，红军游击队（包括人民抗日义勇军）发展到1300余人。

## 五、皖浙赣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向皖浙边挺进后，敌以5个多师的兵力，继续向闽浙赣苏区进行“围剿”。至1935年1月，苏区全部被敌占领。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红三十师及各游击队共千余人，受到很大损失。余部在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和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唐在刚率领

<sup>①</sup> 中共闽粤边特委成立于1934年8月，黄会聪任书记。

下，由葛源转移到德兴和弋阳交界的磨盘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同年5月，在优势敌军的残酷“清剿”下，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唐在刚等不幸牺牲，关英等人率余部转向皖浙赣三省交界的鄣公山，同在当地活动的皖南独立团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皖赣独立师一部和地方游击队共400余人，在彭泽、湖口、都昌、鄱阳（今波阳）、祁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皖赣独立师另一部，在同红十军团失散部队一部会合后，转到贵池、秋浦（今东至）、东流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此外，在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和开化、婺源、休宁地区各有一支游击队就地开展游击活动。

1935年底至1936年春，除鄣公山地区的皖南独立团外，其他地区的游击队都在敌人的进攻下遭受一些损失，先后转移到鄣公山地区。

4月，闽浙赣省委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巩固与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会议还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将皖浙赣边30余县游击区划分为五个特区，分别成立特委，各领导1个独立营坚持游击战争；以皖南独立团为基础，加上其他部队，组成800余人的皖浙赣独立团，在省委直接率领下，依托鄣公山，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会后，皖浙赣独立团袭占了浙江西部的开化、昌化（今昌化镇）两县城，摧毁了许多碉堡，消灭了一些反动民团，并在婺源的沱川月岭伏击歼敌正规军两个连。至1936年底，整个皖浙赣边游击武装发展到近3000人。

## 六、浙南游击区

1935年2月，红十军团突围出来的先头部队，组成挺进师，共500余人，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由闽浙赣苏区出发，于3月下旬进到闽浙边界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斗争，

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今属遂昌）5县边界地区建立了纵横1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并组织了一些地方游击队，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

9月中旬，敌人以7个师另4个保安团的兵力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挺进师决定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游击队，在内线与敌周旋，主力转至外线，在庆元、松溪、政和、福安、景宁（今属云和）等县境内打击敌人。至10月底，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全部被敌占领，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游击队损失约500人。在此期间，挺进师主力在寿宁县境同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委会合，组成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省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司令员，统一领导浙南、闽东两游击区的斗争。不久，临时省委同闽东特委分开，仍各自独立地领导游击战争。

1936年6月，浙南地区之敌正规军他调，在浙江只剩下4个保安团、15个保安大队和新成立的5个独立营。挺进师乘机广泛进击。至年底，恢复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并开辟了浙南、浙东游击根据地，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衢州、丽水、温州、临海等30余县的地区，部队又发展到1600余人。这期间，临时省委得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决议和其他文件，即在广大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对保甲长和壮丁队进行争取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七、闽北游击区

1934年10月，敌人陆续调集了4个师另两个旅和闽浙赣边地区的保安团一部，共10万余人，对闽北苏区大举“围剿”。至1935年1月，闽北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率领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军机关人员转移到武夷山区。2月上旬，闽北分区委为了统一指挥，决定将闽北地区的红五十八团、闽北独立团、西南独立团等部合编为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

长、卢文卿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共约2000人。独立师成立后，即在崇安、浦城和资溪、光泽、邵武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3月，敌人在叛徒李德胜<sup>①</sup>带领下，对闽北苏区大举“清剿”。为打破敌人的“清剿”，中共闽北分区委决定：部队仍采取分散活动方式，与敌周旋。并要各县成立游击司令部或指挥部，广泛开展游击活动。至8月，闽北分区委又以独立师一部挺进到闽东北的松溪、政和、迪口、古田一带开辟工作；独立师主力分散在崇安、建阳、邵武、光泽、资溪、广丰等县，依托武夷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1月，独立师主力在上饶县甘溪附近的伏击战中歼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枝；1936年2月在建阳县的界首镇附近歼敌新编第十一师500余人，并击伤其师长，从而停止了敌之追击。在此期间，挺进闽东北地区的独立师部队，曾在当地同情革命的道会武装的配合下，歼灭进攻之敌两个营，到1936年春，建立了以迪口为中心、纵横约5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

1936年2月，闽北独立师主力进至闽浙边界的洞宫山地区，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闽东独立师会合，两个游击区打通了联系。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闽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两地区的游击战争。会后，闽北独立师和闽东独立师仍分别在本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争。至年底，闽北游击区扩大到东起松溪、政和、古田，南至顺昌、将乐、泰宁，西至资溪、贵溪，北至信江的10余县地区，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

## 八、闽东游击区

1934年10月，中共闽东特委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留下的200余伤病员和闽东独立第二、第十三团为基础，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冯品泰任师长、叶飞任政治委员，辖3个团，共千余人。同年底，敌人

<sup>①</sup> 原红军闽北分区司令员。

开始调集新编第十师、第八十七师和第七十八师1个团，共8个团的兵力，在5个保安团的配合下，对闽东苏区大举进攻。至1935年春，闽东苏区全部被敌占领。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各县独立营、游击队大部损失，闽东独立师也遭受很大损失，中共闽东特委被敌破坏，形势非常严重。

1935年5月，叶飞、阮英平等人在福（安）寿（宁）之间的含溪召开会议，重建中共闽东特委，叶飞任书记。并提出了“坚持游击战争，恢复苏区，波浪式向外发展新地区”的方针。会后，独立师在特委率领下，先后取得桃坑、沙垵等战斗的胜利，共缴枪70多枝和大量军用物资，独立师发展到400余人，编为3个纵队，分别在宁德、罗源、古田，福安、福鼎、霞浦和福鼎、平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6年冬，闽东的革命武装得到迅速的发展，独立师已发展到4个纵队，共800余人，建立了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古（田）屏（南）宁（德）、（福）鼎平（阳）边等四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在此期间，闽东特委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共赴国难宣言》、《告国民党书》和《八一宣言》等文件，遂按照中央的精神，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东地区的发展。

在闽东游击战争开展的同时，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闽东特委领导的连江独立团在敌人“围剿”下失利，有20余人转至闽中地区，加强了闽中地区游击队的力量。5月，中共闽中特委成立，王于洁（即吴梅）任书记。闽中游击队在特委领导下，在福清、莆田、仙游、永泰、闽侯（今福州）、长乐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镇压地主恶霸，袭击分散民团和敌军，并在相思岭何庄桥伏击战中，歼敌一部，开辟了以常太和罗汉里为中心的莆、仙、永边及福、莆、永边两个游击根据地。1936年5月，闽中特委为适应新的形势，将分散的游击队合编为闽中

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吴德标任司令员，刘突军任政治委员。第二支队在特委的领导下，由山区转入平原沿海敌后地区开展斗争。先后取得长岭、何寨、蕉坪、瑄口等袭击战的胜利，共缴枪50余枝，打破了敌人“闽中共匪已消灭”的欺骗宣传，保护了革命群众的利益。

## 九、鄂豫皖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五路军、第十一路军以及东北军共56个团，约17万人的兵力，对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清剿”。敌人构筑碉堡封锁线，控制交通要道，实行白色恐怖，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游击队，摧毁苏区。

1935年2月，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等部合编为红二十八军，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未设军长），辖第八十二师（1个团另1个营）和手枪团，全军共1300余人。

红二十八军重建后，即在太湖、宿松、英山、霍山、潜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着手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久，在敌人第二十五路军、第十一路军的追堵下，遭受一些损失，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不幸牺牲。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主力依托大别山辗转游击。以徐成基为书记的皖西特委率领新建的第二四六团共200余人，在霍山、舒城、潜山、英山一带开辟游击根据地。此后，红二十八军主力在潜山县的界岭歼敌第十一路军1个营，在桃岭附近歼敌第二十五路军两个营，在随县的桃花山重创敌第二十五路军独立第五旅，在罗山县的杨店、光山县的王园先后歼敌东北军共3个营。与此同时，皖西特委率领第二四六团在霍山、舒城、潜山、英山一带建立了东西100余里、南北几十里的游击根据地，并扩大1个新兵连；鄂东北道委领导的部队也有所发展，并新建了1个独立团。

1936年2月，蒋介石又调集6个师，会同第十一路军、第二十五

路军等部，再次对鄂豫皖边游击区大举“清剿”。

在此情况下，高敬亭决定将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豫皖山区与平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至年底，红二十八军歼灭和击溃了敌人正规军近10个营，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和堡垒，解除了许多保安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被服，迫使敌军不得不撤回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据守。经过近一年的作战和工作，鄂豫皖边游击区扩大到几十个县的范围；红二十八军、各游击队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发展，并建立了许多秘密的群众游击小组。在此期间，红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方永乐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与此同时，豫东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在以何耀榜为书记的中共豫东南特委领导下，也逐步开展起来。

## 十、鄂豫边游击区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中共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1935年7月改称鄂豫边省委）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于1936年1月组成了一支7个人、3枝枪的游击队，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在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先后在信阳、确山等县消灭了几个反动联保主任和恶霸地主，部队发展到20余人、10余枝枪，并在信阳、确山两县边界建立了活动基点。3月27日，鄂豫边省委组织唐河、泌阳、桐柏等县100余名党员和革命群众，协同红军游击队，袭击了桐柏县平民庙会，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得17枝枪。在转移中，被敌包围，部队遭受损失，省委书记张星江不幸牺牲。

此后，仝中玉继任省委书记，领导鄂豫边区军民继续开展斗争，建立游击武装。5月，敌人调集驻豫南的国民党军四个营及保安团两个大队，向鄂豫边游击区发动进攻。鄂豫边省委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游击队分为三部分，分赴泌阳、确山和信阳县境活动。到8月份，信阳、确山、泌阳、唐河等县的党和群众组织先后建立起来，游击

队也重新得到了发展。

9月，鄂豫边区省委在泌阳县召开会议，检讨了游击队过去遭受损失的教训，并选举王国华为省委书记。会后，游击队深入群众，建立秘密的党和群众组织，并对土匪武装进行了争取工作。至1936年底，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渡过了艰苦时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十一、湘鄂赣边游击区

1934年夏，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严重损失后，余下的部队在以陈寿昌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以徐彦刚为司令员的湘鄂赣省军区领导下，于8月间转移到平江、浏阳、铜鼓边界地区坚持斗争。不久，省委为加强红十六师，巩固和发展以黄金洞为中心的平浏铜苏区，决定将在崇阳、通山一带活动的地方部队共700余人集中起来，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等率领，经临湘，向平江县黄金洞地区转移。沿途在岳阳县的新墙、平江县的新市（今属汨罗县）、伍公市、南江桥、虹桥等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至11月，部队发展到1100余人，全部编入红十六师，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政治委员，辖1个团另1个营。不久，陈寿昌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傅秋涛继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春，红十六师从黄金洞地区出发，向鄂南地区进击。先后在崇阳、修水之间的大源桥战斗中，击溃敌人1个团，俘敌200余人，缴枪300余枝，重机枪4挺；在崇阳的高视战斗中，俘敌400余人，缴枪200余枝，轻机枪36挺；在平江的虹桥战斗中，歼敌1个团，毙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400余枝；在崇阳、修水之间的三界尖战斗中，击溃敌人两个团，全歼其1个机枪营。至5月，红十六师发展到5000余人，辖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团，军区另有特务营。同时，以黄金洞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并扩大到纵横约50公里的范围。



同年7月上旬，敌人集中60余团兵力，乘我军正在平江北部的南江桥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和整训部队之际，突然发起进攻。7月中旬至11月，红十六师在同围追之敌战斗中，大部损失，徐彦刚不幸牺牲。余部共1000余人，在傅秋涛等率领下，突破敌之拦截，先后返回平江地区坚持斗争。

1936年3月，敌集中11个师及一部分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对湘鄂赣边游击区开始分区“清剿”。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军区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决定由军区参谋长严图阁（不久任军区司令员）率领红十六师挺进到南浔铁路以西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6年底，红十六师先后打下汨罗、文家市、宜春等城镇，捣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并在德安、瑞昌交界处伏击敌人海军陆战队1个团，将其击溃，毙其团长，缴枪300余枝。在此期间，省委和军区在游击区内建立了4个特委和军分区，每个特委和军分区率1个独立营坚持游击战争。至年底，我军还保存有黄金洞、九宫山、冷水坪等几小块游击根据地，并在游击区边缘建立了许多外围支点。

## 十二、湘赣边游击区

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时，留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的有5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共5000余人。这些部队在中共湘赣省委和军区的领导下，依托武功山，抗击敌人3个师又3个保安团的进攻，掩护红六军团突围。虎头岭一战，部队受到较大损失，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不幸牺牲，苏区全部被敌占领，各独立团和游击队被敌隔断，分散在苏区各县荫蔽活动。省委和军区直接掌握的1个独立团，同优势之敌苦战数月，至1935年3月，剩下不足50人。同年6月，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湘赣边区红军和游击队的处境更加险恶。

7月，原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联络40多个游击队干部，在莲花县棋盘山举行会议，组成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谭余保任书记，

成立了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任政治委员，曾开福任司令员，统一领导湘赣边区的党政军工作。这次会议，对于稳定湘赣边区的局势，继续坚持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会后，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收集失散的部队，编为6个大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将6个大队编为两个支队，分别在酃县、茶陵、攸县、醴陵地区和永新、莲花、萍乡、宜春、安福地区进行游击活动。至年底，建立了许多党和群众的组织，并在莲花、安福两县边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36年，湘赣边地区之敌正规军先后调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乘机适当集中部队，以奔袭、伏击等战术积极打击敌人，先后攻克安福、油田、官田等城镇，摧毁了敌人许多碉堡，缴获了保安团和地主武装的许多枪枝，部队得到较大发展。

### 十三、湘南游击区

红六军团西征途经湘南时，留下独立第四团，会同当地游击队，在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下坚持斗争。1934年11月，粤军3个师及湖南几个保安团向独立第四团及游击队进行“围剿”，红军和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委书记彭林昌不幸牺牲。

1935年3月，独立第四团团团长李宗保叛变投敌，在山上养伤的该团第一营营长李林获悉后，即以6名伤员为基础，组成了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在宜章的骑田岭一带山区继续坚持游击活动。部队曾发展到30余人。

1936年，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两次遭敌袭击，部队大部损失，仅剩李林等三人。他们继续坚持斗争，至年底，部队又重新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由刘后总、谢竹峰等领导的一支10余人的游击队，在耒阳、安仁、永兴、常宁等地坚持活动，部队曾发展到80余人。

## 十四、琼崖游击区

1932年冬，琼崖地区的红军独立师，在敌人进攻下遭到失败，苏区全部被敌占领，红军只剩下100余人，由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被围困在母瑞山区。此后，中共琼崖特委同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失掉了联系。1933年夏，特委书记冯白驹率领仅存的25人从母瑞山地区突围，转移到琼山县的云龙地区，同中共琼山县委几个负责同志会合后，将部队分为4个组，分别到琼崖地区各县恢复工作。从这时起，到1936年，各游击组以灵活的战术，多次打击了敌人小股部队；同时成立了以朱运泽（即朱克平）为司令员、王白伦为政治委员的琼崖红军游击司令部，并在琼山、澄迈、临高、儋县、乐万、琼东、文昌等地恢复了一些党的组织，部队也有所壮大。

从1934年秋至1936年底，留在南方各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挫败了优势敌人的连续“清剿”，钳制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扩大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党和红军优秀的领导人和指战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长期坚持并取得胜利，主要经验是：

**坚持党的领导** 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占领了我南方各苏区，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方各苏区的党组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党的领导机关受到削弱，甚至陷于瘫痪，同党中央和其他地区又失去了联系，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各游击区的党和红

军领导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积极恢复或重建党的组织，清除叛徒，纯洁内部，不断加强对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这就保证了游击战争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红军和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坚贞不屈地同敌人斗争到底。他们的斗争证明，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

**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 敌人占领我南方各苏区后，实行白色恐怖。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大部丧失，革命斗争情绪一般比较消沉。红军和游击队在优势敌人的长期包围、进攻下，失去了较巩固的后方，兵员补充、伤员安置、后勤供应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大力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他们组织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债抗抓丁的斗争，并根据群众的要求，镇压反动乡保长，为人民群众伸冤除害，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红军爱护人民，人民拥护红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游击队带路、送饭、送情报、安置伤病员，送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人民群众的热情援助，是红军和游击队克服各种困难，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的根本条件。

**采取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对敌斗争策略和战术** 红军游击战争所面临的敌人，是十分强大而狡猾的。它在地主武装配合下，以十几倍几十倍于我的兵力，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连续不断的“围剿”、“清剿”，采取烧山、封山、搜山、围困等手段，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游击队。许多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人，及时地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迅速改变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采取避强击弱和分散游击的方针，运用昼伏夜出、袭击、伏击、远程奔袭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挫败了强大敌人的一次又一次“清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许多地区的党组织，还根

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对敌斗争策略，对保甲长和壮丁队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对商人贩运物资采取保护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停止打土豪。这些政策和措施，取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对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 本章小结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挫折走向胜利。长征路上，党中央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长征的胜利，宣告了敌人围追堵截的破产，打开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骨干，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长征的胜利，在战略指导上主要经验是：

### 一、正确地选定战略转移的方向

战略退却是战略防御的继续，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战略退却的方向，是实施战略转移的首要问题。它通常是选择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和便于我军发展的地区，并且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予以修正。中央红军突围后，博古等人不顾敌人在我军前进道路上预置重兵的严重情况，仍主张向湘西进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使红军险遭覆灭。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遵义会议，党中央、中革军委确定了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的战略方

针，由于情况的变化，又决定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党中央、中革军委依据当面的军事、政治、地理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改变了原定计划，制定了北上抗日，把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全国的形势和人民要求抗战的意愿。主力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以陕甘苏区作依托，对于迅速发展革命力量，促使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利用西北军和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与蒋介石嫡系军队的矛盾，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都极为有利。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张国焘的南下川康边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使红军在川康边地区无法立足，而且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回师北上。经验和教训表明，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必须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根据敌情、地形和群众条件正确地加以选定。方向选对了可以使战略转移转危为安，反之将导致失败。

## 二、实行高度的机动作战

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红军突围后，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经常处于优势敌人的堵截追击之中，随时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必须实行机动作战，力求摆脱敌人，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的作战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长征初期，红军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行动呆板，处处被动，损失严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穿插迂回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以广泛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敌人甩在数百里之外，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要顺利地进进行战略转移，必须处理好走与打的关系，既要反对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又要避免同敌人进行决战。在战略转移中，红军

必须广泛地实施机动，适时地突进到围追堵截之敌的侧后，威胁敌人后方重地，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弱点，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迅速消灭敌人之一部，以打破敌人围歼红军的企图。在达成预期任务后，红军应迅速脱离敌人，不同敌人纠缠。红军还要抓紧行军与作战间隙休息、整顿和补充，进行群众工作和扩军工作，以保持部队的士气和连续作战能力。

### **三、发扬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我军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的重要因素。红军在长征中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很大的：优势敌人疯狂追击堵截，红军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沿途多崇山峻岭，气候恶劣，并有雪山草地，步履艰难；人烟稀少，补给极端困难。在这种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严峻险恶情况面前，红军没有被吓倒，而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依靠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坚定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高度发扬了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漫长的征途中，红军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共产党员置生死于度外，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带领群众斩关夺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事实证明，红军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英雄部队。它在强敌面前从容不迫，在困难面前傲然挺立，经过艰苦转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 第五章

# 发展陕甘苏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 第一节 1935年冬季的形势和党的方针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的前后，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日本政府继1934年4月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之后，又于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卖国政策，先后同日本签订了新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sup>①</sup>和《秦土协定》<sup>②</sup>，把河北、察哈尔<sup>③</sup>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接着，日寇又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sup>④</sup>五省脱离中国，实行由它控制的所谓“特殊化”。国民党政府竟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承认了冀察两省变相的“自治”。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

- 
- ① 何梅协定，是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协定。
  - ② 秦土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达成的协定。
  - ③ 察哈尔，旧省名，1952年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 ④ 绥远，旧省名，1954年撤销，其辖区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及呼和浩特市（原归绥）、包头市等地。



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斗争更加发展。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卖国政策，发动了一场英勇的爱国运动，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明确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口号。这个运动，冲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阻挠和压制，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从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面前，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一部分已经表现出抗日反蒋的趋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时虽然还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因他们分别代表着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时，美、英派同亲日派之间就加剧了暗斗或明争。这些新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富农和小地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也提供了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以便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独占中国的政策，也使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直接受到了打击，扩大了这些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则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对法西斯、维护和平的斗争，这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这些国际条件，又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反卖国贼的前列，是中国民族革命营垒的中坚力量。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并决定组织全国反日的民众运动和在东北地区开展游击战

争<sup>①</sup>；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933年1月17日，我党又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在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日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8月1日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号召全国同胞总动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此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正在进行长征；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虽受到一些损失，但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力量；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战争已从挫折转向恢复和发展；东北、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在蓬勃发展。

以上情况表明，1935年冬季，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使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我党我军开展新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的敌情仍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sup>②</sup>、西北军<sup>③</sup>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

---

① 参见中共中央1931年9月22日《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② 东北军，即张学良领导的原奉系军队改编的国民党军。

③ 西北军，指杨虎城为总指挥的第十七路军。

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敌人，正在加紧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敌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举行了近10天的会议，深入地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和战略方针。

会议着重地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或支持反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转变。

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有过多种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曾指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并详细阐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

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据此，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提出，红一方面军应分三步来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决议还提出：要使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发挥其削弱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要使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恢复到发展的形势，并在一切省分，特别是在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分，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一切游击队都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决议对于开展蒙、回两个少数民族武装斗争的工作，开展白军士兵革命运动，执行“抗日联军”策略等问题，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决议重申：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又要反对冒险主义和冒进政策。不论防御或进攻，基本地是打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阵地战；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实行战略上的一个拳头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反对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击溃战；指挥上要有通盘的计划，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并容许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代表中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以“一二九运动”为信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向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过渡的阶段。中共中央政治

局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给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从此，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和工作。

##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东征

###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作战部署

(参见附图63，附表57、58)

1935年12月，敌人为了阻止我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据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阻止我军向南发展；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据守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等县城和附近一些乡镇，阻止我军向西南发展，并隔断我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并岳秀第八十六师从榆林、靖边、安边、定边向南袭扰，企图夺占瓦窑堡、安塞、安定等地；高桂滋第八十四师据守绥德、米脂和清涧地区；阎锡山的正太护路军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孙楚率领晋绥军4个步兵旅，布防于吴堡、义合镇及其南北地区，并指挥晋绥军骑兵第四旅及并、高部队各一部“清剿”神木、府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在黄河东岸，阎锡山以3个旅另1个团的兵力，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地段筑碉守备，阻止我军东渡入晋。其中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两个团担任包括黑峪口、罗峪口等渡口在内的兴县、临县、离石三县河防，第二〇七旅两个团担任包括沟口、河口等渡口在内的石楼、中阳两县河防；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1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担任包括禹门口等渡口在内的大宁、吉县河防；另以第一〇一师第三旅两个团在柳林机动。此外，以6个旅另1个团的兵力，在太原、汾阳、临汾等地区防守，另有14个旅

驻守在长治、应县、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黄河东征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935年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随后，陕甘苏区的党政军民进行了东征作战的各项准备：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1935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南进击，给郿县、洛川出犯之东北军以打击，暂时制止了敌人的北犯。与此同时，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1200人，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和第七十八师、骑兵团，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八十六师以打击，并包围了横山。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陕甘苏区着手组建第二十九军<sup>①</sup>，并扩大和新建了6个独立营、10个基干游击队，以加强保卫后方的力量。同时，充实了东征部队的实力，到1936年1月中旬，红一、红十五军团共增至1.27万人。红一军团以第一团、第十三团为基础，加上新建的第三团，重建了第一师。第三，中央调集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了造船和划船民工，并组建了工兵连，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第五，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动员。方面军总部于193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率领第一、第十五军团集中于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进行临战训练，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以强渡江河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东征的任务和意义，消除了种种疑虑，树立了必胜的信心。第六，各部队指挥员现地勘察了渡河地点，拟制了渡河作战计划，还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规定，以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

---

<sup>①</sup> 红军第二十九军，1936年1月中下旬开始组建，军长萧劲光，政治委员朱理治，副军长谢嵩。

## 二、突破敌军黄河防线，占领 晋西有利阵地

(参见附图64，附表57、58)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部署是：第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第二师主力、第四师、第一师、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随后，从沟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乐坪、马花坪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留誉镇地区，并向南发展，同第十五军团打通联系。第十五军团（欠第八十一师）以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为先头，第七十五师主力、第七十八师随后，从河口实施渡河，另以小部队从舍峪里、辛关佯渡；主力渡河成功后，迅速强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方面军直属队随第十五军团之后渡河。

20日20时，渡河战斗开始。各军团突击队和先头团以勇猛果敢的动作，在预定的渡河点迅速突破敌军黄河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至23日，我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接着，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开始围攻石楼城，方面军主力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的休整，准备新的战斗。在此期间，山西游击队等共500余人从河口渡河，进至以义牒镇为中心的地区，担任维护交通、巩固占领区的任务。

阎锡山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进而驱逐我军至黄河以西，急调入

陕之晋绥军 4 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原在该地区的第七十一师等部，阻止我军北进，牵制我军东进；调驻长治、晋城的第六十六师到介休，驻太原的第七十二师主力（1 个旅另 1 个团）附从轩岗调来之第六十八师 1 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立第二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我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的第六十九师主力及驻防大宁、吉县的另 1 个旅分路北上，均向隰县前进，阻止我军南进，牵制我军东进。另调驻浑源、大同之第六十八师主力（两个旅）向岢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之骑兵军主力（两个旅）到崞县至忻县间，随时增援太原；调驻应县的独立第三旅到文水、交城地区，以拱卫太原的西南方。

红一方面军首长为打破敌军的防堵，建立作战根据地，于 24 日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二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

按照上述部署，红十五军团于 2 月 25 日 1 时先在石楼南端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敌约 1 个营；继以 3 个团向隰县急进，在隰县以北 15 公里处的预期遭遇战中，歼敌第六十九师先头部队 1 个营，击溃其另 1 个营。随后，军团主力转向东进，于 27 日进占水头镇，接着推进到大麦郊地区。

红一军团于 2 月 26 日下午从南北两面进攻关上村，当夜歼敌独立第二旅第四团。该旅旅部率第三团由石板上向汾阳溃逃，我军乘胜追击，于 27 日将该敌基本歼灭。军团主力随即推进到汾阳西南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编组为 4 个纵队，于 3 月 4 日开始，分路向我反击。其部署是：以第六十九师 3 个旅为第一纵队，由隰县



向北反击；第六十六师 3 个旅为第二纵队，由介休向西反击；第七十二师 1 个旅另 1 个团和第六十八师 1 个旅为第三纵队，由汾阳向西反击；第一〇一师 3 个旅和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各 1 个旅共 5 个旅为第四纵队，由中阳一带向南反击。

根据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心，以第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在关上村附近钳制敌人第四纵队，以第十五军团 1 个营在石口镇地区钳制敌人第一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军团的主力，歼击兑九峪及其附近之敌第二、第三两纵队。10日凌晨，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由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动，7 时向兑九峪之敌发起攻击，很快击溃敌之第一线部队。敌人主力依托阵地进行顽抗。接着，敌人第三纵队在第二纵队的配合下，向郭家掌我红一军团攻击，我两军团主力奋起还击，将敌两个纵队击溃。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即被粉碎。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和彭德怀于 3 月 10 日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布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和蒋介石、阎锡山媚外卖国的行径，宣布了先锋军东征的目的是准备对日作战，先锋军实行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政策，并向全国再次发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的号召。

在此期间，留在河西的红二十八军，乘入陕之晋绥军东撤之际，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要点，并配合地方武装，收复了陕北苏区的一部分被占地区。

### 三、发展胜利，分兵南下北上作战

（参见附图 64，附表 59、60）

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后，晋绥军第二、第三两纵队退至孝义、汾阳及其附近地区整顿；第一纵队一部退隰县，一部调回临汾；第四纵队主力仍在柳林、离石、中阳和关上村附近。蒋介石的

“中央军”一部，从3月上旬起陆续进入山西，其第二十五师已进抵灵石，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正经正太铁路向平遥、介休间开进，第十三军正准备从晋东南和风陵渡分路向侯马地区开进。这些敌军初到山西，行动比较谨慎。

红一方面军首长为了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决定以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第八十一师1个营，分别包围石楼和在石口镇、关上村附近地区钳制敌人第一、第四两纵队；以第一军团全部，并配属第八十一师（欠1个营）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以第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欠1个团）进至灵石以西地区，掩护第一军团南下。

3月16日，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由大麦郊及其以北地区出发，先头部队于17日突破敌汾河堡垒线，包围了霍县城，占领了该城以北之道美村和南关村。红十五军团主力于16日由双池镇以西地区出发，17日进至灵石以西地区，并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

这时，阎锡山为救援石楼和夺回被占领地区，集中4个纵队，从3月17日起重新向石楼方向反击。这样，其太原和晋南、晋西北的防守兵力便减弱了。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心以第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继续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以第十五军团主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地域，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县，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并与陕北的神府苏区打通联系；原在石楼及石口地区的第十五军团1个团又1个营、方面军直属队以及3月上旬成立的第三十军（600人，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和山西游击队等部队，担任钳制反击之敌，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这样，我军就形成了中路钳制晋绥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南下发展进攻的态势。

按照上述部署，右路军（即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于3月19日由霍县地区南进，迅速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

沃等县的广大乡村，破坏同蒲铁路100余公里，消灭敌人正规部队和民团各一部。自3月25日起，以第一师一部在霍县以北之退沙村迟滞北面之敌，第二师一部在侯马镇迟滞南面之敌，主力在临汾、洪洞、赵城各县机动，并派出一部兵力于4月1日攻占了襄陵县城。在此期间，还派出许多小分队，在上述六县各大村镇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材，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等。

左路军（即红十五军团主力）于3月18日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经南、北师屯，于22日进至岔口镇，作短暂的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25日，派出1个团附骑兵连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阎锡山急令加固太原城防工事，并调第六十八师1个旅驻守太原、忻县之间，加强守备，同时命令原在绥远的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南下，协同独立第三旅共4个团尾我左路军之后进击。我左路军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于26日从岔口镇出发，经娄烦镇于31日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歼敌两个营另炮兵1个连。随后，转到康宁镇一带休整、扩军和做群众工作。

中路军（即红十五军团之1个团又1个营、第三十军和山西游击队等）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广大地区钳制了反击之敌4个纵队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线的进攻行动。同时，继续控制着黄河渡口，保障了后方交通运输，并开展地方工作，扩大部队，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游击队，建立了地方党和政权机构，为下一步的作战准备了战场。

在河西方面，红二十八军于3月下旬由吴堡地区北上，进入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敌人，并在收复了神木、葭县（今佳县）的大部失地以后，以一部兵力向黄河沿岸活动，策应东岸红十五军团主力的行动。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北上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在晋西地区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

会的决议，进一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华北的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过去提“巩固向前发展”是对的，今天则是“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为此，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客观的形势好；战役上要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当前在山西已占区域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还决定要在“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提高红军干部政治、军事水平，加强政治工作等。晋西会议发展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使全党全军有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 四、左右两路军向中间靠拢。

##### 红一方面军回师西渡

(参见附图65，附表59、60)

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一面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于3月下旬将已调入山西的“中央军”第二十五师编为第五纵队，第三十二军两个师编为第六纵队，第十三军两个师编为第七纵队，参加对我军的进攻。其他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山西的“中央军”第九十西师、第九十五师、第二十一师和第一师、第二师、第六师的各1个旅，分别集结在同蒲铁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防止我军向晋东南发展。24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入晋“中央军”的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随后，敌人即开始组织对红军的反攻，企图首先夺取由我军控制的各渡口，封锁黄河，尔后分别围歼我各路军

于黄河以东地区。

3月26日，敌军第四纵队进至三交镇、留誉镇和东、西卫村，第一纵队3个团进至石楼，同石楼守敌第七十一师1个团会合。我军第二二四团主力和山西游击队分别撤至义牒镇和留誉、三交、小算镇之间地域，在军委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坚决抗击优势之敌的进攻，掩护后方笨重物件西渡。战至28日，胜利完成上述掩护任务，即转至永和北部地区活动。29日，敌军全部占领原由我军控制的晋西黄河各渡口。

红一方面军首长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根据当时黄河各渡口已被敌军占领的新情况，随即电令在神府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协同正由岚县向兴县前进的左路军，扫除罗峪口及其南北一段黄河封锁线；令右路军继续在临汾、洪洞、赵城地区扩大红军和做群众工作，并准备尔后向晋东南转进；令中路军继续在石楼、灵石、汾西、隰县、永和之间吕梁山区钳制敌人和做群众工作。

3月31日，红二十八军在罗峪口附近渡过黄河，尔后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约30公里的一段黄河封锁线。

4月初，敌人以第四纵队主力、第三纵队主力及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独立第三旅，向兴县以南地区集中，寻歼我左路军；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五纵队、第六纵队和第七纵队等部，分别从隰县、介休、运城等地区向临汾、侯马、赵城地区南北对进，寻歼我右路军。为了配合黄河东岸的行动，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出动，袭击我军后方。

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首长于4月3日决定，逐步收拢兵力，准备集中歼敌。具体部署是：右路军逐步向蒲县、大宁地区转移，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协同中路军深入开展这一区域的群众工作，并夺取永和关黄河渡口；左路军和红二十八军逐步向南转移，在临

县、离石、中阳地区扩军和做群众工作，尔后夺取三交镇以北黄河渡口；中路军以一部兵力在永和以西破坏敌人黄河沿岸据点，保证后方运输和转运伤员，主力在隰县、灵石间钳制敌人。此外，为了对付东北军、西北军的进攻，决定陕甘、陕北两省4月份扩充的新兵，全部补入第二十九军和拟组建的第三十一军（后未组建）。

按照上列部署，右路军于4月4日开始向西转移，9日，以第一师向南进击稷山，主力进至河津以北地区。这时，敌人第一、第七等纵队向稷山以北地区逼近。我右路军即于12日向北转移，15日，攻克吉县，全歼守敌，俘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枝。接着，以两个师绕过大宁，于17、18两日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据点；另两个师进至大宁、蒲县、隰县间阻敌北进。

左路军于4月4日开始由康宁镇地区南移至白文镇、寨上村、故县村一带，继续进行扩军和做群众工作。不久，红二十八军亦到达白文镇附近，同左路军会合，并随其行动。4月6日晚，左路军继续南移，7日在方山以南之圪洞镇歼敌1个连；8日，以一部兵力阻击尾追之敌，主力绕过离石县城，于11日在金罗镇附近击溃敌人两个营；12日，绕过中阳城向东南转移，在师庄、三角庄地区同敌第六十六师第一九六旅遭遇，经过激战，将敌击溃，全歼其1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14日，移至大麦郊进行休整。在休整中，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之第二二三团为基础，增编了第七十三师。

在左路军由金罗镇向东南转移时，红二十八军奉命歼击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在进攻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15日拂晓，该军撤出战斗，经石楼、永和之间向东南方向转移，于17日到达康城镇附近，同方面军总都会合。

至此，我军实现了集中的计划，打破了敌人分别围歼我左右两路军于南北两线的企图。

我左右两路军靠拢后，敌人也跟踪围攻过来，企图压迫我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之。4月中旬，敌军第四纵队主力在石楼、中阳、离石一带；第三纵队进到关上村地区；第二纵队重返兑九峪地区，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进到吴城镇，独立第三旅驻汾阳；第一纵队主力进到大宁，一部在临汾；第五纵队向隰县推进；第六纵队在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线；第七纵队向临汾、蒲县前进。敌人为了避免被我军各个击破，并防止我军向北、东、南三方突进，又采取堡垒主义推进的战法，以主力构筑从三交镇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至河津的弧形封锁线，以一部兵力在石楼、隰县、大宁、永和守城，以主力由南向北进击。陕西方面，在蒋介石的驱使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一〇五师于4月中旬进至郿县、甘泉构筑堡垒，西北军一部进至韩城、宜川之线，两军均准备继续北进，从西面封锁黄河。

红一方面军首长根据敌人即将对我大举进攻的情况，于4月22日决定我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是：“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西渡打杨虎城”。据此，采取了便于应付各种情况的部署：第一军团集结于桑壁镇及其以西地区，确保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及必要的回旋余地于我手中；第二十八军、第三十军在义泉镇以西吸引和迟滞敌人第五纵队；留1个支队（第二二四团1个营和第八十一师1个营）在虢香镇附近监视东北面敌人；方面军总部率领在大麦郊地区休整的第十五军团准备转至克城镇、午城镇之线（后未到达）。另请军委后方机关保证渡河的船只。方面军首长着重强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须选择十分有利的条件进行作战，极力避免无把握之战斗。

当我军按上列部署调动时，敌人第一、第五两纵队于4月25日开始在大宁、午城、隰县之线构筑堡垒，增加了我军机动的困难。于是，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我军以包围永和县城，警戒大宁、隰县、石楼三

方的姿态，向西靠拢，并以第三十军和由第十五军团两个营组成的支队从勐香镇出发，向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活动，迷惑敌人。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进一步分析了山西和陕西、甘肃的敌情之后，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指出：目前，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神府地区、三边<sup>①</sup>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

5月2日，方面军首长下达了渡河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暗，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当晚我军开始西渡，至5月5日全部渡完，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蒋、阎煞费苦心制定的围歼我军于黄河东岸的计划完全落空。

红一方面军东征，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历时75天的作战中，共消灭敌人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枝（挺），炮20余门，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我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sup>①</sup> 三边，指陕北的靖边、安边和定边。



###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西征

#### 一、战前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作战方针

(参见附图66, 附表61、62)

1936年5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开始放弃“反蒋”口号, 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 “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 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 蒋介石却无视我党提出的这一倡议, 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 仍企图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 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 以陈诚任总指挥, 调集16个师另3个旅, 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其部署: 以蒋军第十三军第四、第八十九师以及晋绥军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和1个炮兵团, 由军渡渡黄河入陕, 协同原在陕北的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 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 蒋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师和晋绥军的两个旅为预备队, 在山西境内集结待命。另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3个师、第一〇五师主力(两个旅)和西北军第四十二、第十七师主力由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韩城、宜川向北,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3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东北, 进攻陕甘苏区南部和中部。宁夏第十五路军司令马鸿逵, 以其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今下马关)等地, 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驻守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地区, 防堵我军西进; 另有晋绥军4个多师, 在黄河东岸的晋西和晋西北地区, 防备我军再次东渡。在上述敌军中, 反共坚决的蒋、阎军是进攻的主力军; 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我党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 其广大官兵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 倾向抗日, 不愿同我军作战; 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虽反共坚决, 但防区广大, 兵力分散, 是个较薄弱的方

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据此，赋予红一方面军和陕甘苏区的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的联系；东面坚持游击战争；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执行这三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准备条件。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之敌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吸引蒋军主力于自己方面，策应野战军西征。后来根据军委的决定，红二十八军改到石湾、绥德以南地区掩护运粮。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训练，总结东征作战的经验。在西征任务明确后及开进过程中，红军总政治部和西方野战军首长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针对西征作战区域多在回民聚居区的特点，以及部队中新战士较多，对远离根据地作战存在的一些顾虑，着重在部队中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对回民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同时，野战军组织进行了战场侦察和临战前的训练；成立了野战军后方勤务部，统一领导西征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

## 二、西方野战军西征的第一阶段作战

(参见附图67, 附表61、62)

5月20日前后, 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今吴旗)集结; 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和野战军直属队随右路军后跟进。

西方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军分布情况, 决定以红十五军团分两路首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和安边, 继向定边、盐池攻击, 尔后视情况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县城, 伪装进攻宁夏, 调动驻守庆阳至洪德城一带之敌第三十五师回援宁夏; 红一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歼回援宁夏之敌, 并迅速夺取曲子、环县、洪德城等要点。

5月27日, 红十五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28日, 右翼队第七十三师袭占了宁条梁, 左翼队第七十五师强攻安边未能得手。随后, 红十五军团首长改以第七十八师围困安边, 率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前进, 并派一部兵力前出到盐池、灵武地区进行侦察。野战军司令部率直属队及第八十一师进到宁条梁地区。

敌人发觉我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 立即调其第三十五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 遗防由东北军派队接替。这时, 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不要妨碍我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 一面致电彭德怀, 要红一军团立即由吴起镇进至元城镇, 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 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 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 并指出, 在执行此项任务时, “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 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sup>①</sup>

5月28日, 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出发, 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地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1936年5月26日23时致彭德怀电。

区。6月1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进抵曲子之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旅长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战斗和政治攻势，迫使敌旅长冶成章等150余人投降；第四师于马岭附近击溃敌第三十五师1个营，一部进占阜城。2日，敌人第三十五师调集6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营，向阜城反击。3日拂晓，我红一军团主力赶到，突然向敌发起猛攻，经3小时战斗，将敌大部歼灭，俘敌官兵1100余人。

此后，红一军团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并派1个团进取曲子西南的三岔，第一、第二两师乘胜北上，于4日进占环县，5日进占洪德城。红十五军团之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师，于4日进占定边西南的红柳沟。

这时，敌人第三十五师主力正向固原以北毛居井地区退却，安边、定边、盐池、惠安堡、韦州、豫旺县、豫旺堡、同心城等地仍由马鸿逵新七师或民团防守，东北军部队已按我党的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之线，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6月5日，西方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继续分两路向西发展进攻，“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部署是：左路军红一军团以第四师控制洪德城至阜城一线，开展群众工作，并准备在红二十九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及其以南扩大占领区域；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并在上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继续向西南推进，夺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同心城；第七十八师准备由安边撤围，尔后西进至红柳沟地区，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准备打击敌人出扰部队。第八十一师及骑兵团暂留在宁条梁、安边地区进行游击和做群众工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直属队由宁条梁地区逐步移至洪德城附近。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之间地区是西方

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并决定调红二十八军由石湾附近西进，配合执行此项任务。据此，西方野战军首长于10日下达命令，由红二十八军同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由红二十八军首长统一指挥，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城寨，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东与老根据地连接的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并控制有力一部，准备消灭敌之增援部队。

6月7日，左右两路军开始行动。至1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同心城，主力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主力于13日进至七营附近。这样，我军就切断了敌人第三十五师经七营、同心城大道向中宁、石空堡撤退的道路，打破了马鸿逵加强宁夏腹地防守力量的企图。在此期间，中路军主力红二十八军陆续到达宁条梁和安边附近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的红二十九军1个团也进到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活动。

至此，西方野战军已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的第一阶段任务。

### 三、西方野战军西征的第二阶段作战

（参见附图67，附表61、62）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首长提出下一步的基本任务为：“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部署是：左路军主力控制于七营、上新堡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打击敌人第三十五师出扰部队；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和三岔等要点。右路军主力攻占豫旺县城，得手后继攻韦州城，以一部兵力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之线，并向海原、中宁游击侦察；第七十八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

积、灵武游击与侦察，打击马鸿逵的出扰部队，掩护主力夺取豫旺县城。中路军主力夺取安边，以一部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游击；另以1个小团在宁条梁至横山间开展群众工作。

按照上述部署，各部首先在夺取敌占城寨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新的胜利。6月16日2时，第七十八师乘敌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守敌。17日，中路军留一部兵力继续围困安边，主力西进定边，准备协同第七十八师进攻盐池（此时第七十八师暂归中路军首长指挥）。21日3时，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攻占盐池，全歼守敌马鸿逵部骑兵两个连和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枝，战马200余匹。左路军一部于6月20日占领七营，缴获许多军用物资。右路军主力一部于21日黄昏攻占王家团庄，全歼守寨民团，缴获步枪数十枝，战马100余匹，另一部于27日2时攻占豫旺县城，歼敌两个连，俘敌280人，缴获长短枪180枝，战马150匹。

敌人在连遭失败以后，不断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和袭扰。在北线，横山之敌第八十六师一个团于6月24日向安边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我中路军即留一部兵力防守定边、盐池，主力回到安边，准备打击援敌。7月13日晨，由横山西援之敌进到安边附近，被我军击溃，退回堆子梁。在此前后，中路军一部两次攻击安边，均未奏效。野战军首长遂决定停止围攻安边。红二十八军即撤至安边以南休整，并准备打击出扰之敌；第七十八师集中于盐池，担任赤化工作；第八十一师担任定边赤化工作。至7月下旬，第七十八师调至豫旺县城，归还红十五军团建制；第八十一师调至甜水堡附近待命；盐池、定边防务由第二十八军接替。

在西北线，韦州之敌在得到马鸿逵派遣的骑兵两个团、步兵1个团的增强后，于7月5日以骑兵3个团又两个营南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我第十五军团将其击溃于红城水，毙伤敌300余人。

在南线，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

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7个师和第三十五师残部，自固原至庆阳一线北犯。6月中旬至7月初，攻占了我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继向曲子推进。随后，何柱国直接指挥东北军步、骑兵4个师和第三十五师残部，集结于固原、七营之间，准备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

我西方野战军本想避免同东北军作战，但何柱国却误认我军的克制态度为软弱，继续北犯。在此情况下，我西方野战军乃决定集中两军团主力给该敌以打击。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第四师主力及原留在环县、洪德城一带的第一师之第十三团集中于曲子地区，阻止东北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师北进；第一师主力和第二师，以一部兵力保持同七营以南之敌接触，主力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机出击；红十五军团主力集结于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待机出击。

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并指出：“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

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六师向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第二师一举将其击溃。此后，何柱国鉴于我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遂暂时停止进攻。

我西方野战军在打击敌之出扰和反击部队的前后，还抽出一部兵力，协同陕甘宁军区和红二十九军的部分部队，对盘踞和流窜在我占领区内的民团、土匪进行了连续的清剿，使新创建的苏区逐步得到巩固。

到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两个多月中，除杀伤大量敌人外，还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随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 四、东线开展游击战争。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取得进展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我军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游击战争同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36年6月初，陈诚指挥第十三军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和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等部，在原驻守陕北的第八十四、第八十六两师的接应下，从军渡西渡黄河入陕，向陕甘苏区东北部进攻。陈诚依旧采取堡垒主义推进政策，企图先肃清东线我军，尔后向西寻我主力作战。

红三十军根据军委的命令，于5月下旬进到吴堡附近地区后，以游击战术日夜袭击敌人的堡垒，打击敌军零散人员和抢粮部队，迟滞了敌军的渡河与进攻行动。

6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分三路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所在地瓦窑堡推进，于15日分别进至安塞以南和蟠龙、永坪等地。我中央军委一面调活动于韩城地区的红二十九军主力北上，协同独立第一、第二两团，游击于清涧、绥德地区，迟滞蒋军西进，掩护瓦窑堡；一面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劝其停止进攻，并调红三十军回延川，准备侧击由清涧或由永坪向瓦窑堡前进之敌。同时，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也作了必要时向西转移的部署。

东北军经我交涉，于6月18日和19日先后退出永坪、蟠龙。而蒋军第十三军两个团，却于20日由绥德向老君殿前进，从东北而威胁着瓦窑堡。我军当即调集红二十九军主力和红三十军等部进至南沟岔地区抗击该敌。正当我军调动之际，驻石湾之敌第八十六师两个营于21日黄昏乘虚袭入瓦窑堡。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安全撤出瓦窑堡，于7月10日前后逐次转移到保安(今志丹)。东北军1个师于6月23日进入瓦窑堡，西北军1个团于7月初进占延长。随后，我红三十军奉令移到新城堡地区，担负清剿附近民团、土匪，掩护运粮及开展地方工作等



任务；红二十九军主力协同陕北地方武装继续坚持东线的游击战争。

东线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之敌，使陈诚先肃清东线我军，再向西寻我主力作战的企图归于破灭。

这一时期，我党我军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许多胜利，在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成绩。还在1936年春，中共中央为争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即改变了反蒋的口号，并与其保持接触。与此同时，我党我军同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建立了联系，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并取得积极的成果。3月5日，党中央通报了我军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订立的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4月和5月，我党代表周恩来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设立了以周恩来、张浩（即林育英）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6月20日，党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下，我们的目标不是瓦解或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使之成为抗日的武装力量，成为红军的友军。在方法上，主要是靠耐心的政治工作去争取，是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同时并进；但对其中积极向我进攻的部队，也要给以打击，这样更有利于政治争取。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实际上也适用于对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为了全面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党中央和军委以及各军团、部队的领导人，分别向国民党各派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当面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发出了许多规劝性、倡议性的函电，或派代表商谈。经我进行工作，许多国民党军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中高级军官，逐步同情以至接受我党我军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我军在战场上，尽量避免直接同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根据当面敌军的政治态度，分别采取散发宣传品、阵前喊话、战场联欢和互相慰问等形式，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样，我军同这些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就有所缓和，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打击坚决反共的敌军，并为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西方野战军和陕甘苏区的红军，在党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胜利地进行了西征战役，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创建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新的根据地；东线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开展。这些，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准备了重要条件，并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第四节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山城堡战役

### 一、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的制定。

####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参见附图68，附表63、64）

1936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继3月间炮制伪“蒙古自治军政府”之后，又策动和协助伪蒙军对绥远发动了进攻。全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新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并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契机，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的影响更加扩大，党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更加接近我党；“两广事变”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求同

我党我军订立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等开始趋向抗日反蒋，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相继开始同我党我军商谈抗日问题。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政府也从它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更加趋向于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政策；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支持中国对日抗战。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抗日和主张联日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中间派愈益动摇，蒋介石有走向抗日的可能。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经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头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郑重地申明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愿望，明确表示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党中央决心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际，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党中央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1）我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sup>①</sup>，出兵绥远，

<sup>①</sup> 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是中共中央当时的主张。同年9月中旬，党中央为实现全国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了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政策。

以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日战争之实现。（2）在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分别攻击陇西和河州（即临夏），相机消灭毛炳文部和调动马步芳部队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凉州（即武威）、甘州（即张掖）、肃州（即酒泉）三州。（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5）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合组成抗日联军先锋队，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8月30日，党中央和军委为了紧密联合东北军，阻止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增调其嫡系胡宗南部进入甘肃，并为我党与蒋介石政府的谈判造成有利地位，对我军部署作了调整：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二、四方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建立并发展甘南苏区；红二方面军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

遵照党中央和军委的上述部署，红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于8月31日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随后，按照军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红一军团以第一师（欠第十三团）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红十五军团以步、骑兵各1个团组成特别支队，向靖远挺进，亦于14日占领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截至9月7日止，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广大地

区，并包围了岷县县城。红二方面军于9月11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19日，先后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这样红二、红四方面军就与红一方面军形成了夹西兰大道南北呼应，并可随时会师的有利态势。

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各个击破主力红军，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军，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遮断我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也隔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今舟曲）、武都地区的王均第三军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孙震第四十一军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到武都、西固一带，以上各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一四〇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的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固原及其以北地区的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待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同时，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部保卫陕甘宁苏区；同时从陕北派一游击支队南下，牵制胡宗南部之侧后。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之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南部边境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南北地区，策应与配合四方面

军。以上部署的重点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一、四方面军的联系，并不使其妨碍尔后两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中央强调指出：“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遵照中央和军委的上述指示，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6日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之敌骑兵第六师两个团的大部，红一军团特别支队于18日派1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于进占徽县、两当后，随即以红六军团向宝鸡方向前进。

可是，张国焘却于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随后，即督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

9月15至17日，中央军委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同志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即致电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就夺取宁夏和一、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明确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还指出：“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被〕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并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

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

但是，张国焘于21日到达漳县后，又违背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西北局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进，迅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黄河，进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22日，朱德将此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军委，并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原计划；一面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反对；一面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时停止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9月22日和26日，张国焘等<sup>①</sup>又连电党中央和军委，对中央、军委决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主张：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可接通内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党中央和军委于9月24日至27日接连复电指出：“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宁夏人口在1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并且尔后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党中央并于9月27日下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

经过党中央和军委的耐心说服，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

<sup>①</sup> 张国焘的这些电报，都以朱德名义联署。事实上，朱德一直反对张国焘违背中央方针、指示的行为。1936年7月14日，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据此，凡由朱、张联署的违背中央战略方针、指示的电报，在叙述时只提张国焘，以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

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即分五个纵队，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

为了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红一方面军于9月30日又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经硝河城南进，同先期占领界石铺等地的特别支队靠拢；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先头独立支队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

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红二方面军经党中央和军委批准，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经过艰苦的行军作战，至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之第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对于开展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 二、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

（参见附表63、64）

1936年10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向全军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其要点如下：（1）11月10日以前，全军主要是体息补充，抓紧训练，做好进攻宁夏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南线敌人尽量迟滞其前进。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主力应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及其周围地区休整，红二十八军以及新从东线西调的红二十九军集中于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察宁夏情况；红二方面军逐次转移到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迟滞其西进，尔后准备以主力或一部接替固原以北地区红一方面军防务；红四方面军以1个军进至靖远、中



卫地段，选择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即阿拉善左旗）之渡河点并加紧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筹粮和休整，派出几个支队同南线敌人保持接触，尽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2）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16日22时，中央军委电示红二方面军并致朱、张：“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取〕迟滞其前进方针”。

10月20日，敌人十几个师，乘我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我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22日，蒋介石亲自赶到西安督战。其部署：以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两个师为一路，王均第三军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为一路，均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第一军4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担任主要突击；王以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步兵约5个师、骑兵3个师以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为一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保障胡宗南军右翼安全。同时在西线和北线，以东北军第一一四师由兰州附近进抵一条城，以邓宝珊新编第一军一部固守靖远城，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担任中卫、中宁及其以东地段河防，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担任中卫、靖远段河防，均防堵我军渡黄河北进或西进。

10月22日，敌第三十七军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继续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三军和第二十五师攻占通渭，经会宁向郭城驿、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到打拉池与彭德怀会合。当日晚，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在红嘴子地区西渡黄河未成，准备另选渡口再渡。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对今后行动提出如下部署意见：“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

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尔后“五、四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个〕军向兰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

10月25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由靖远城西南之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成功。同日，朱、张、彭关于我军行动部署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提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四方面军布署，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sup>①</sup>

10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军总部和一、二、四方面军，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因此部署应如下：（1）以九军以外之1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眼并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1个军攻

<sup>①</sup> 引自朱德、张国焘、彭德怀1936年10月25日16时致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10月27日，彭德怀曾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揭露张国焘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的恶劣手段，申明：此电是“发后才给我看”，“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并指出：朱德等同志是拥护中央的。

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2)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3个军及二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3)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4)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10月26日1时半,中央军委电示朱、张、彭:“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同日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又指出:目前以打击胡敌、夺取定远营两着最为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夺占定远营,这是攻取宁夏的战略枢纽。四、五、三十一军及二方面军应以打击胡敌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取诱敌深入。

10月26日,徐、陈电告朱、张、彭:今17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并遵“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面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27日又“提议四方面军全部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对付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10月27日5时,朱、张电示徐、陈: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头卢塘、眼并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1个军向中卫延伸,1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入,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

停止其前进。

10月28日12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一、二、四方面军：“甲、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号七〔五〕时部署。乙、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朱、张二十七号五时电，正合紧靠作战争取胜利之目的，望各部坚决执行之。丙、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

这时，敌人胡宗南部先头已进至硝河城地区，正向海原、打拉池之间急进；其左翼毛炳文、王均两路，先头进至马家堡、蒋家大路之线，均向靖远前进。蒋介石判断红军经其“痛击”，正向西北撤退，于是命令各部乘势猛追。我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并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于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敌胡宗南部。28日19时15分，朱、张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该三个军，至少以三个团扼守一条山、大卢塘阵地对两马，指部<sup>①</sup>即率两个军以上兵力迅出中卫，先头精干一个师袭击中卫附近要点，以便接引主力进入中卫以东地区消灭马鸿逵部，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五军暂位三角城一带休整，将来可移到五佛寺、中卫间休整。四军即在郭城驿、打拉池线迟滞敌人。”

10月29日12时，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同日，前敌总指挥部下达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预先命令，要求第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协同一方面军一起打击北

---

<sup>①</sup> 指部，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进之敌。

10月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主力6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域，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地域，以上两部为突击集团，准备从东西两面求歼胡宗南部先头一至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主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钳制敌人毛炳文、王均两军，保障我突击集团的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转移到海原以北和西北地域，保障我突击集团左翼安全。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海打战役计划，通令全军坚决贯彻执行。同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张指出：“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命令布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

30日，张国焘却命令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第五军已经西渡黄河，因而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落实。31日，敌第二十五师已进抵靖远，向东湾子追击；第三、第三十七军正向打拉池方向进攻；第一军已进到古西安州南之张家塘；马鸿宾部也由海原西南之米家塘向我军进攻。这样，在海打地区求歼敌人的计划未能实现，红军主力由打拉池地区向东转移。途中，红一方面军一部31日在海原西北地区击溃堵截之敌第三十五师和骑六师各一部，俘获人、枪各1000余。

在这种情况下，前敌总指挥部为贯彻中央军委继续争取实现夺取宁夏的计划，又在11月初作了如下部署：集中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统归彭德怀指挥，在海原以北、同心城以西地区消灭胡宗南部一两个师；同时由红军总部电令河西方面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之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眼井堡、红水一带，乘胜向中卫、宁夏（今银川）方向相机进取，在不攻坚的条件下，消灭马敌。河东我军主力在麻春堡、关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歼胡宗南部，未达到目的，而敌人则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

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隔断了我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

### 三、红军主力向东转移，取得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参见附图69，附表65、66）

11月8日，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设想，其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继续在现地区作战，并以一部兵力佯示我军欲渡黄河，引敌北进宁夏。12月上旬以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第一步占领镇原、宁县、正宁、合水地域，第二步向东占领淳化、耀县、宜君、洛川、郿县地域，第三步继续向东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扩大苏区，扩大部队，解决给养；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爆发后，逐次向东发展，沿安边、横山、榆林到达神木、府谷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地区；于适当时机，南北两路分别在延长、延川地区，清涧、绥德地区，神木、府谷地区造船，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或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甘等省进行机动作战。其目的在扩大我党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同南京政府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计划还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指出：“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请朱、张、彭、贺、任慎重考虑见复。

11月12日，红军主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准备经毛居井以东地区南进。至15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分别移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和石堂岭附近地区待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移至豫旺堡东南、东北和以东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全部移至环县以西地区休整。

此时，敌人第三十七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我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我劝阻，前进缓慢；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之第一军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央军委根据上述敌情及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中央军委还规定：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红军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16日，我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这时，敌人粮食极为缺乏，胡宗南屡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令其急占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点，并继续向东打通榆林。17日，敌人第一军分三路向定边、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九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当日，敌人中路第二旅在萌城以西地区被我第四、第三十一军击溃，伤亡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

19日，我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歼敌人第一军之右路第七十八师。部署如下：第一军团荫蔽于山城堡以南之罗家沟至于家湾之间地区待机出击；第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东进，主力荫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待机出击；第三十一军荫蔽于山城堡以北之田家庄附近待机出击；第四军主力荫蔽于山城堡东南地区待机出击；第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各方；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人左路第一旅；第二方面军之第六军团以及第一方面军之第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一

线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东南之于家湾。

20日，敌人左路第一旅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跟进到大水坑；中路第二旅撤回豫旺县城整理，第四十三师接任中路，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并派出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在八里铺以南遭红一军团一部突然打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

我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发起歼灭敌右路第七十八师的战斗，尔后向北横扫敌之中路第四十三师等部，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第二师协同红十五军团向山城堡西北的哨马营方向进攻，截断敌之退路；红一军团之第一师和第四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进攻；第三十一军一部由山城堡以北向南进攻；第四军由山城堡东南向西北进攻。

21日，我军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当日黄昏，敌人开始向山城堡以北之曹家阳台一带山地撤退。我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至22日9时，将敌大部歼灭。

这一仗，我军歼敌1个多旅，给了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敌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甜水堡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敌之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三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我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山城堡战役胜利后，我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战备姿态，在环县、定边、盐池之间地区休整，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作准备。

为了适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新情况，从组织上保障红军的统一指挥，开展更大的局面，中央军委主席团于12月7日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命令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



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此以前，中央军委还任命了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前敌总政治委员。

1936年夏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领导全军战胜了国民党军30多个师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对挫败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增强我军团结，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 第五节 西路军转战甘西北

（参见附图70，附表67、68）

### 一、西路军组成和平（番）大（靖） 古（浪）凉（州）战役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迅速击破敌骑五师两个旅的阻击，占领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打拉牌一线，歼敌一部。10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张：“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

11月1日、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2日12时，毛、周致电徐、陈：“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

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22时，毛、周又致电朱、张、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4日8时，徐、陈根据河西情况向朱、张提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11月5日，张国焘复电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要留兵力守渡口。”“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1月6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3个军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前进，并准备于12、13日出动。张国焘当日即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称：“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和战略方针有极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7日，张国焘又电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平大古浪〔凉〕战役计划为〔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当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党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党中央和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任主席。

11月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率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共2.1万余人，由镇虏堡、打拉牌、锁罕堡一带分两路向西出动。

西路军西进作战，面临的主要敌人是：马家军阀部队，计有马步芳的骑兵第五师两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新由青海调来的马步芳新编第二军所属第一〇〇师之3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和两个警备旅等部队，共3万余人，另有青海和甘肃中部、西部地区的保安民团约9万人。

毛泽东、周恩来于11月11、12两日，先后致电西路军和红军总部领导人，请他们考虑：西路军“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2日，西路军领导人复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14日，张国焘在给西路军并中央军委的电中认为，西路军当面“来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并再次指令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毛泽东、周恩来亦于15日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你们向凉州进。”

11月中旬，西路军右路第三十军，绕过大靖，包围了土门子，迫使守敌350余人投降，又乘敌主力被我左路第九军吸引在古浪地区之机，先围凉州，继占四十里铺（今永丰）和永昌，一部兵力于21日进占山丹。随后，第五军进驻山丹，第三十军主力集中于永昌至四十里铺一线，西路军总指挥部也到达永昌。其间，第九军在袭占古浪之后，遭到敌人步、骑兵5个旅及民团的连续反击。我军据守城垣及外围阵地，顽强抗击三日，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亦伤亡甚大，于18日晚撤出古浪，转移到四十里铺。

在此期间，敌军毛炳文部于16日开始西渡黄河，拟向大靖前进。红军总部将此情况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并指示他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17日，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及红军总部报告了部队行动情况，并提出：“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

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再以五军出肃州”，“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中央领导人复电西路军说：“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指示他们，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部；部队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等。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西路军按照上述指示，停止西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驻永昌，第三十军主力驻在凉州西北的四十里铺，第九军移驻永昌东南的六坝，骑兵师及第三十军一部驻山丹，第五军正由永昌向山丹开进。22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出告指战员书，动员并号召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22日起，敌人首先以5个团围攻四十里铺我三十军阵地。我军同敌激战3日，毙伤敌2000余人，我军亦伤亡500余人。战后，我三十军主力撤至永昌东南的八坝，九军移至永昌休整。25日、26日，敌集中兵力进攻八坝，我军奋力拼杀，将敌人击退。

11月21日至24日，西路军领导人曾多次致电党中央、军委及红军总部反映：现全军人数共1.8万余人，部队疲劳，弹药、冬衣缺乏，但士气甚旺，马敌伤亡虽已5000以上，但能迅速补充，继续与我作战；当地地形不便打运动战，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我军战线甚长，人员、弹药有减无增等情况。并估计，毛炳文部主力26日、

27日可到凉州，我军若同马、毛两敌全力决战不利，马敌可能以一部速集甘州堵击，对此顾虑实大。因此，建议：西路军如在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至甘州、肃州间再战。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如取到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之敌，配合红军主力行动。

11月23日，中央领导人电告西路军：“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并告，毛炳文有东撤消息，指示他们应力避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一部的歼灭战，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25日和28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在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并指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在作战方面，应当“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不论敌多敌少，正而不使用主力”；“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总之，不打则已，打，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还指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

12月上旬，敌人又以一部兵力向永昌以西的水磨关迂回攻击，企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我军的联系；随后，又集中优势兵力，分别猛攻永昌、山丹两城，均被我军击退，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仅12月3日，我军即击溃进攻之敌6个团，毙伤敌约700人；6日，在山丹附近又击溃马彪、马朴两旅，歼敌500以上。敌人进攻在连遭挫折后，改取守势和以游击活动困扰我军。我西路军在永昌至山丹一线，初步巩固了现有阵地。

## 二、西进临泽、高台地区

12月6日，西路军领导人接连两次致电中央及军委，对目前形势、红军主力及西路军的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与具体的开展，打通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依据形势和敌我力量估计，红军主力在河右岸出击暂时难能站稳脚根，取得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利的条件下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甘北地区气候、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的关系均便利；蒋介石不能移大的兵力到甘北，“二马”<sup>①</sup>实力已受削弱，我西路军主力可单独钳制。

“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乘〕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浪〕、大〔靖〕、凉〔州〕、民〔勤〕进”。西路军拟以主力逼近凉州，迫使敌马元海主力后退，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红军主力。如红军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近。

6日24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进。”“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9日，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及军委报告说：“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旬〕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sup>②</sup>，以此带为根据〔地〕，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日〕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此后，西路军主力即在八坝、永昌一带相机击敌，争取休整扩红，以五军固守山丹，并准备进占东乐、甘州。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军委根据整个形势的变化，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也有过多次指示。14日，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

<sup>①</sup> 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部队。

<sup>②</sup> 抚、高，指抚彝、高台。抚彝系临泽的旧称。

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8日，军委主席团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并要他们试与诸马进行统战谈判。

这时，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在郑州指挥刘峙、顾祝同两集团，分别由潼关、天水两面向西安发动进攻。东北军、西北军拟以主力抗击潼关方向之敌；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红军主力打击位于同心城地区的顾祝同集团胡宗南部，并希望我西路军能以一部进出靖远，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20日，周恩来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并建议：

“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22日，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询他们对部队东返的意见。

12月23日12时，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军委复电提出：西路军如东进，存在着道路、气候和沿途敌情等许多困难，并认为，即令在20天内到兰州，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的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为此，“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并表示：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可东移，但要求：“（一）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突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二）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

24日24时，军委主席团再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sup>①</sup>，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

<sup>①</sup> 胡、毛、曾、关，指胡宗南军、毛炳文军、曾万钟军和关麟征师。

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并要他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

25日10时，西路军领导人电复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日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并提出：“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当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基本上获得和平解决。27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12月底，西路军顶风冒雪，从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马步芳集中骑、步兵约9个旅，对我实行追击、截击和堵击。我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克服冰雪严寒、缺少粮弹等困难，越过沙漠、戈壁滩地，且战且行。1937年元旦，先头第五军进占临泽县城（今蓼泉），继以主力袭占高台县城，守敌1400余人全部投降。1月2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军委，报告了当面敌情和我军情况，并提出：“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台〕、抚〔彝〕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

4日，我西路军总指挥部和第九军进抵甘州以西的甘浚堡，第三十军到达甘州西南的龙首堡，五军在抚彝、高台经过短期工作，已扩红600人，集粮万担。当日，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西路军抱最大决心，不怕牺牲，当照前电完成任务。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质用外力送下。



5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7日，军委复电西路军领导人时指出：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仅要你们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4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允送至安西，送至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即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同日，军委主席团还向西路军领导人通报了西安方面情况，说：蒋介石回南京后违反条约，不执行将蒋系军队撤出陕甘之计划，重新部署25个师于陕、甘，进占华县，集中天水等地。现张、杨与我三方面仍团结很紧，决心抗战。并指出：“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迫敌，消灭其一部，则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1月8日，马敌以两个团进犯西洞堡我三十军阵地，被击退。在此前后，我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在甘州西北约30公里处的倪家营子，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今临泽县城）。9日，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将第九、第三十军全部集中到沙和堡，准备消灭进攻之敌。1月中旬，敌人集中步、骑兵7个多旅于甘州以西，以一部兵力牵制我西路军主力，以约5个旅兵力，开始向孤立突出的高台我军发动进攻。我第五军主力发扬红军英勇顽强、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坚守阵地，浴血苦战，给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终因敌众我寡，加以收编的民团叛变，高台城于20日失陷，第五军主力两个团及

骑兵团、总部特务团共3000余人全部损失，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这期间，西路军总指挥部曾派骑兵师驰援，途中遭到敌人截击，大部损失。21日，敌人又集中力量围攻临泽城及其附近的我第五军直属队及另两个团，该部经过苦战，于当晚大部突围，向总指挥部靠近。

在此期间，军委主席团于1月16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通报了西安局势和绥远抗战胜利等情况，表彰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事迹。军委表示“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21日1时，西路军领导人电告军委主席团：“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取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达到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并称：“士气甚旺，沿途相机抗击。”毛泽东在接电后，于凌晨2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指国民党方面——编者注〕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24日，西路军领导人电告军委：西路军全人数1.4万余，内战斗部队不及2/5。并提出：“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当日24时，军委主席团即电复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

25日，军委主席团再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通报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唯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

西路军各部自1月21日起分别由临泽、倪家营子、沙和堡等地向南转移，准备绕经甘州以南地区东返，至24日全军进至西洞堡、龙首堡地区。马步芳发觉我军转移，即调集约5个旅向我堵击和追击，我三十军对追击之敌进行反击，取得击溃追敌一部，歼敌1个宪兵团、缴枪200余枝的战斗胜利。这时，西路军领导人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于28日晚率领全军返回倪家营子，决心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并争取休整。

### 三、西路军的失败

1937年1月31日和2月1日，敌马元海、马彪等步、骑兵4个旅，在炮火掩护下，分别由倪家营子的西面和东北面向我西路军发动进攻，均被击溃，敌伤亡600人，我亦伤亡400人。2月7日，西路军领导人在向军委的报告中提出：以目前情况和力量估计，西路军可单独在洪水（今民乐）、高台地区行动一月到两月，争取灭敌一部。“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联名电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邻地区寻机击破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并指出：目前“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马步芳在调整部署后，于2月15日命令马元海、马彪、马朴、韩

起功等部，对我西路军发动猛攻。16日，敌军主力及反动民团一部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发起总攻，我西路军据守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电庄，依托村寨顽强抗击，同敌人逐堡逐屯反复争夺，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无分男女老弱以至伤病人员，一起上阵，弹药缺乏，就用刀矛、木棍同敌人拼杀，给敌以重大杀伤，基本保持了原有阵地。从22日开始，敌人又集中兵力对倪家营子进行围攻。我西路军忍饥耐寒，英勇抗击五昼夜，毙伤敌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自身亦伤亡300余人。27日晚，我西路军全部突围向西北方向的东柳沟、西柳沟、南柳沟地区转移。

2月27日，中央及军委为支援西路军，一面决定以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下，准备西进增援；一面由周恩来等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3月上旬，西路军又在东西柳沟地区同围攻之敌血战五昼夜，我军伤亡700人。突围后，向祁连山转移。11日，在梨园堡至康龙寺一带同追敌三个骑兵旅及步兵两三个团血战，部队大部损失，第九军政委陈海松不幸牺牲。剩下不满3000人，于13日退入祁连山腹地。至此，西路军的西进行动即告失败。我援西军各部自3月5日起分别由崇信、淳化等地出动，至中旬进抵镇原、固原以南地区。因西路军已告失败，即按中央军委指示，就地停止待命。随后，便派人四出进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

西路军失败后，军政委员会于3月14日决定主要领导人离开部队返回陕甘宁苏区，将余部2000多人分成3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由西路军工委直接率领的1000余人的左支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经40余天艰苦的行军作战，剩下400余人，于4月底进抵甘肃、新疆交界处之星星峡。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派车队前往迎接，

后将他们接运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分批回到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其余两个支队大部损失，少数人陆续回到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被俘，后英勇就义于西宁。

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奋战了四个多月，毙伤俘敌共约2万人，给了马步芳、马步青所部以沉重的打击。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为革命后人所敬仰。

## 第六节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前后 红军的行动

### 一、党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红军主力南下支援友军抗击“讨 逆军”的进攻

（参见附图71）

1936年11月下旬，毛泽东依据全国形势的新发展，曾经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目前，“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sup>①</sup>为〔与〕我谈判。……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

<sup>①</sup> 二陈，指陈果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江苏省政府主席；立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主任。

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

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十余人，并发表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sup>①</sup>。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sup>②</sup>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全国广大人民、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分子，都反对扩大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国际和平阵线和在华有切身利益的美、英等国政府，也都支持中国停止内战，赞成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中共中央和军委先后于12月14日、19日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事变的意义和可能发展的前途。为避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和推动全国迅速实现抗日救国的局面，决定对“西安事变”实行下列基本方针：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并在“讨逆军”进攻时给以坚决打击，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在上述方针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① 参见1936年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通电。八项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②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事变”后，委为“讨逆军”总司令。

一系列建议，警告国民党当局切勿“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一面在全国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行动，把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与此同时，中央和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

当时“讨逆军”总司令为何应钦，所属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组成，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组成，拟由大水坑、甜水堡、同心城、靖远等地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

中共中央和军委经由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军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顾祝同军。

中央军委按照上述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准备以十天时间到达长武、邠县，再十天到达咸阳、兴平，尔后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担任对敌东集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协同东北军、西北军主力，给敌东集团军以打击；以第三十二、第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集中于大水坑附近，准备在敌第一军由大水坑、甜水堡地区南移时，协同在毛居并附近的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监视和牵制该敌，并配合在固原、隆德、静宁、兰州等地的东北军第五十一、第六十七军，积极钳制敌西集团军。此外，以红二十九军保卫定边、盐池；红三十军位于吴起镇、顺宁、保安地区，对安边、宁条梁、靖边警戒；第八十一师东调延安。

25日、26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蒋介石已

经接受抗日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讨逆军”的东集团军也已开始向潼关以东撤退。红军主力即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地监禁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等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从1937年1月初起，重新进逼西安。在此情况下，我党一面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促蒋履行诺言；一面按照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以红军主力进到西安以北淳化、三原、耀县地区，红十五军团进到西安东南商县地区，追击军进到天水东北崇信、泾川、灵台地区，新成立的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王平）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与此同时，我陕北地方部队接管了西北军在延安等地的边防，原陕北苏区大部恢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领导机关于1937年1月中旬由保安迁至延安。

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此后，红十五军团撤回庆阳地区，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的我军就地休整待命。

## 二、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红军进行对日抗战的直接准备

（参见附图72，附表69）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建议。其中要求国民党将下列五条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



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表示，如果国民党能确定上列国策，我党愿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些条件和保证的提出，是我党基于尽早实现团结抗日愿望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

2月中下旬，国民党举行的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但也原则地确定要通过谈判来谋求和平统一和国共合作，并表示要准备抗日。这就在实际上开始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至此，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此后，党中央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工作。193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提出了进一步促使国民党彻底转变、争取我党在抗日运动中的领导权、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以及重新教育干部等问题，并规定了明确的方针。5月上旬，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sup>①</sup>，会议批准了中央自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为了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毛泽东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并且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原则。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他在这篇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着重地批判了

<sup>①</sup> 当时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1937年5月2日开幕，14日闭幕。

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在上述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阐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及其形成和发展，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以争取民主为中心一环；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保持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并应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反对复活陈独秀的尾巴主义。依据党的基本任务，红军准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7月和8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深刻地剖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这些著述，对于提高全党全军的理论水平，统一思想，增强团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全党全军的任务，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为转变到对日抗战的新时期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第一，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和军事训练。**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我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产生了若干怀疑、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对国共合作可能产生的问题认识不足，盲目乐观，产生松懈麻痹情绪，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为了克服上述倾向，党中央、中

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在1936年12月以后，陆续发出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sup>①</sup>，对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作了详尽的解释。红军各部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从而保证了全军基本顺利地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与此同时，红军各部队还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

**第二，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增强党内军内的团结。**1937年3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它使党和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善战的献身精神，绝不容许把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曲解为反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党中央的决定得到全党全军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通过这一斗争和贯彻党内斗争的正确政策，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党中央和军委在部队中的威信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党全军的团结明显地增进。

**第三，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大量培养干部。**1937年1月，中国抗

---

<sup>①</sup> 参见1936年12月7日总政治部关于《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1937年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年3月6日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的问答》，1937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1937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等。

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原红军大学第三科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合并为抗大第二分校（也称庆阳步兵学校）。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了抗大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亲临学校讲演或授课。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的人才。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抗大共培训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sup>①</sup>。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第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五个区域，组织第二十七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师各一部以及各独立团、独立营、保安队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1937年5月、6月有计划的清剿，红军将原有的43股土匪大部肃清，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武装2100多人，从而减轻了苏区内的匪患，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

此外，红军各部还进行了扩军和组织调整工作。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总数已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枝（挺）。中央军委对红军的编制、序列、组织机构进行了初步的整编和调整，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

这个期间，陕甘宁苏区（后改为陕甘宁特区）的各方面建设也取得很大进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特区的范围，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邻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约12.96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约200万，共设置了36个县和一个特别区。特区加强了政权建设，取消了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各种苛捐杂税，采取了鼓励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增办了许多群众文化福利设施，使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复苏，红

<sup>①</sup> 含1936年6月至12月抗日红军大学培训的干部数。

军和人民的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苏区人民的支持下，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全军团结一致、斗志高昂，为出师抗日，作好了各种准备。

### 三、南方红军游击队停止反对国民党 统治的斗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则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在同中共中央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调集优势兵力，采取并村、烧林、搜山等手段，对我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企图利用和谈作掩护，彻底消灭留在南方各地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

在敌人大规模“清剿”面前，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群众，依托有利的地形，运用灵活多样的战术，抓住“清剿”的敌人兵力分散、情况不熟的弱点，不断地打击敌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游击区的党组织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再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不仅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而且在国民党“清剿”军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中一部分人士的同情。

经过半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终于挫败了敌人的“清剿”，保存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基本力量。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被迫停止了对红军和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并同意同游击队进行和平谈判。各游击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中，游击队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挫败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种种阴谋，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随后，国民党军撤出各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先后集中整训。至此，南方八省的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在各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共万余人，后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和海南人民自卫团独立大队，成为长江南北抗击日军侵略的中坚力量。这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1936年12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军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项指示，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内和平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从政治、思想、军事、组织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胜利地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 第七节 东北三省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就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同在我国东北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密切合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

### 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兴起

（参见附图73，附表7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盘踞在我国南满铁路沿线的部队，突然向驻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对我国东北三省进行武装侵略。国民党政府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十几万军队，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出东北三省，不足2万人的日本军队，在短短四个多月就占领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对东北人民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在此情况下，东北各阶层人民和滞留在东北地区的一部分爱国军

队，如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冯占海、唐聚伍、王德林、邓铁梅等部，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纷纷组成各种名义的抗日义勇军，展开对日作战，打击侵略者，很快就发展到30万人。这些武装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日军的打击下，至1933年大部溃散，余部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投降敌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的坚定立场。同日，中共满洲省委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后的形势，作出《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接着，按照中共中央9月22日关于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的指示，召开了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从1932年初开始，省委选派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及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到各抗日义勇军中去工作。同时，以较大力量组织领导城市的反日斗争和进行伪满军的策反工作，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至1933年初，相继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随后又成立了饶河、珠河等游击队。此外，党还掌握了由救国军王德林残部编成的抗日救国游击军、辽（宁）吉（林）边区军以及吉林反日工农义务队等部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东满等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攻占了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团山子、八棵树、马家大屯、东京城、二道河子和袭击杨本林子等上百次战斗，消灭日伪军数百人。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满洲省委看不到当时民族矛盾突出的客观情况，不适宜地提出与实行同关内各苏区一样的口号和政策，而没有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对不接受我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又没有采取争取、团结的正确政策。这样，党和游击队就未能得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支持，游击战争发展受到了一些影响。

## 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

(参见附图73, 附表71)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灭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 巩固和加强其殖民统治, 在频繁“讨伐”各游击武装的同时, 于1932年3月9日, 成立了以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sup>①</sup>的伪满洲国。此后, 日本侵略军在伪“满洲国”设立了5个军管区, 将伪满军队编成26个混成旅、7个骑兵旅、5个教导旅; 还组建了“治安维持会”、“清乡委员会”, 加紧推行“保甲制”、“连坐法”和“归屯并村”等措施, 企图隔绝人民群众同抗日武装的联系, 以配合其军事“讨伐”。

1933年5月,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月26日指示精神, 召开了扩大会议, 检查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工作, 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会后, 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按照省委部署, 逐步改变某些“左”的政策, 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团结和争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对敌, 开始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也得到了迅速扩大。在各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 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 南满地区:

南满游击队经过1933年夏季的作战, 实力发展到将近1000人, 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杨靖宇为师长兼政委, 辖第一、第二两团。同年10月27日, 独立师主力南渡辉发河后, 攻占了柳河县重镇三源浦、金川县凉水河子。随后, 又进行了进攻大兴川、八道江和破袭吉(林)海(龙)铁路等战斗。我军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 打破了敌人的大“讨伐”, 发展了磐石游击区, 开辟了辉发河以南的广大新区。1934年8月, 独立师袭击山城镇, 击毙日军大佐以下官兵28人。11月, 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辖

<sup>①</sup> 1934年4月, 在日本侵略军导演下, 溥仪由伪满洲国“执政”改称“皇帝”。



第一、第二师和1个教导团，共1600余人。此后，第一军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战法，在桓仁、集（辑）安、临江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日伪军。1935年8月20日，在柳河县黑石头附近伏击300余人的日伪军“讨伐”队，毙伤俘敌7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步枪40多枝。战后，伪军50余人反正，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 **东满地区：**

从1933年夏季开始，东满游击队先后进行了八道沟、东宁城战斗，歼日伪军200多人。1934年2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委，辖4个团，共700多人。同年夏，第二军独立师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先后攻克汪清县大甸子、大沙河和安图县城，共歼敌约400人。1935年春，我第二军独立师先在车厂子袭击日伪军“讨伐”队，后又进行了三岔口、哈尔巴岭车站战斗，共毙伤敌人200余名。5月30日，独立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辖4个团，共1000多人。

第二军成立后，以一部兵力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分三路向濛江（今靖宇县）、宁安、穆稜和敦化方向活动，进行了老黑山、太平沟、青沟子等战斗，打通了同第一、第五军的联系，并与第五军一部相配合，攻克额穆县城。留在原游击区坚持斗争的部队，也积极活动，一度攻占安图城。

#### **吉东之密山、勃利、穆稜地区：**

1933年4月，抗日救国游击军军部率第二团等部，由东满经宁安地区开往密山。7月，在密山黄泥河子同第一团会合。不久，第二团及骑兵营共约400人返回宁安；军部率第一团和游击支队共100余人，继续在密山、勃利地区活动。1934年秋，抗日救国游击军同密山游击队合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委（未到职），辖1个师，共3个团，230余人。整编后，第四军在密山、勃利、穆稜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积极打击敌人。1935年春，先后攻占了依兰

县阁凤楼，袭击了勃利县青山沟日军伐木场、土城子。经过这些战斗，第四军各团建立了骑兵队，其实力和活动区域有了较大发展。饶河游击队也编为该军第四团，全军共1600余人。10月，第四军第二团在大罗勒密地区同第三军第一团会合。随后，第四军第二团曾联合依兰县土龙山民众自卫军谢文东部和自卫军李华堂部，先后攻占刁翎、林口镇，歼敌一部，缴战马100余匹。接着，以一部兵力化装成敌军，智取了二道河子伪军据点，缴轻机枪两挺，步枪100余枝。1936年春，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 **吉东之绥宁（绥芬河、宁安）地区：**

1934年2月，周保中领导之辽吉边区军两个连在宁安县的平日坡同抗日自卫军和山林队会合，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及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接着，进行了平日坡、团山子、卧龙屯、石头河子、庙岭等战斗，共毙伤日伪军近百人，缴各种武器百余件。随后，绥宁反日同盟军为打破日伪军进攻和“讨伐”，将部队化整为零，分为东、西两路开展游击活动，取得了大甸子、新官地、岔沟等战斗胜利，打破了日伪军秋冬季两次“讨伐”。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宁安反日游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第二团等部合编为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辖第一、第二师，共7个团，约1000人。第五军在编组过程中，进行了10多次战斗，其中石门子伏击战和二道河子袭击战，即歼日军40余人。5月，第五军主力坚持宁安地区的斗争，以部分兵力组成东、西两个派遣队，分别向穆棱、额穆开辟新的游击区。至1936年初，东部派遣队经马路沟、亮子河等数十次战斗，开辟了穆棱、林口、勃利间新游击区，部队由70人增至140人；西部派遣队经靠山屯、青沟子等战斗后，又与第二军一部共同进行了官地、通沟岗子、黑石屯、额穆城等战斗，开辟了额穆、敦化间新游击区，部队增至200余人；坚持宁安地区斗争的部队取得了三道河子等战斗胜利。但第二师在

冬季反“讨伐”作战中损失较大。1936年1月全军进行整顿，总人数为650余人。

#### **吉东之虎林、饶河地区：**

1933年6月组成的饶河游击队，至1934年10月发展到近300人，建立了暴马顶子、大叶子沟、十八响、大佳河四个游击活动基地。1935年1月，日军向虎林、饶河游击区进行“讨伐”。我饶河游击队先将敌人诱至大旺砬子附近山峦地带，然后以滑雪队为先头，突然出击，经一日激战，毙伤日军100余人。2月10日，我游击队又夜袭了向暴马顶子进攻之伪满军，毙伤敌人60多名，粉碎了敌人的“讨伐”。5月初，我饶河游击队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四团，仍在虎林、饶河游击区独立活动。

#### **北满之哈东地区：**

1933年10月，中共珠河（今尚志）县委成立了一支50余人的珠河游击队。至1934年6月，先后进行了火烧沟、庙岭、三岔河等战斗，歼敌数百人。珠河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张寿篈（又名李兆麟）任总政委，辖3个总队，共450余人，在哈尔滨以东的中东铁路两侧开展游击活动。8月，在九站与蜜蜂（地名）之间多次截击敌人军用列车，毙伤敌人140余名。9月中旬，攻克五常县五常堡。战后，哈东支队越过牯牛河，胜利地进行了八家子、康家炉和攻占方城岗、阿城等战斗。10月，又在肖田地突围战中毙伤日伪军警100余人。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辖一个师（3个团）、1个保安营，1个少年连，在延寿、方正、五常和双城一带活动。3月，我第三军以第二、第三团在原地坚持斗争，军部率第一团东进至牡丹江沿岸，并联合谢文东、李华堂等部，先后攻克小罗勒密、半截街、新开道等地，6月进抵牡丹江西岸开展工作。在此期间，日伪军对我哈东游击区进行了残酷的“讨伐”，道北游击区遭受

了极大破坏，在该地区活动的第二、第三团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后军部返回，领导第二、第三团转向双城以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1935年秋，第三军经过整顿，扩编为6个团。接着，军部率第四、第五团东进到勃利地区。10月，同第一团会师后，首先取得了刁翎、八浪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与第四军第二团协同取得了大、小稗子沟战斗的胜利。此后，两部共同活动于依兰、方正、通河地区。同年冬，第三军主力转到汤原地区，同汤原游击队会合，在汤旺河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在我第三军主力东征期间，敌人加紧对我哈东游击区进行“讨伐”。同年11月，我第二团50余人，在五区春秋岭受到日军重重包围，经一日激战部队损失严重，团长王慧同、政委赵一曼（女）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

#### **北满之汤原、萝北地区：**

1933年11月，汤原游击队重新成立，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下，活动于汤原、萝北（当时县治在今肇兴）一带，至1935年春，在汤原北部以太平川为中心的地区的地区建立了游击活动基地，部队发展到300余人，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篈代理政治部主任，辖4个团，共700余人。

从1933年夏到1935年冬这两年半中，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各级组织和游击武装，开始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开展了反日统一战线工作，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游击队发展成6个军、6000余人，为进一步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宣告撤销，各地抗日武装分由陆续成立的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

###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参见附图74, 附表71、72)

1936年1月下旬, 活动在北满地区的抗日部队领导人在汤原县境内举行联席会议, 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精神, 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临时政府, 会后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赵尚志为总司令。2月2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此后, 东北地区的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抗日联军。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日益高涨。

1936年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 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 辖第一、第二师, 共约3000人。4月, 第一军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 经过杜家店、本溪车站等战斗, 打破了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扩大了游击区, 全军又有较大发展, 增编了第三师。

同年3月,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二军, 王德泰任军长, 魏拯民任政委, 辖第一、第二、第三师, 共3000余人。为打破日寇对游击区发动的大规模“讨伐”, 我第二军以第二师北上宁安与第五军打通联系, 主力从奶头山西进桦甸, 4月进入敦化县境, 在寒葱沟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乘胜攻克大莆柴河敌据点, 接着折向南进, 于5月攻克抚松县西岗屯和临江县西南岔两处伪军据点, 随后即同第一军胜利会合。北上宁安的第二师同第五军会合后, 主力协同第五军一部前往穆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一部返回汪清、琿春地区坚持斗争。

6月, 中共东满、南满两特委和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人在金川附近举行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 正式组成中共南满省委, 统一领导南满、东满的抗日斗争。会议选举魏拯民任书记, 并决定抗联第一、第

二军组成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第二军各师依次改为第四、第五、第六师。同时决定：以一部兵力远征热河、绥远地区，以求打通与关内红军和党中央的联系；以一部兵力在原游击区坚持斗争，策应远征部队的行动；第五师仍在绥宁地区活动。会后，杨靖宇即率第一军军部从金川地区出发，于6月下旬到达本溪县境同第一师会合，随即在赛马集伏击战斗中，毙伤俘日军顾问英俊及伪军头目邵本良以下1000余人。7月，第一师越过摩天岭西进，在辽阳地区受到敌人追堵，遂东返摩天岭，同尾追之日军激战终日，毙敌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名，但自己也伤亡很大，被迫返回宽甸地区休整。年底，第一军又以第三师改组成骑兵部队再次西征，被阻于辽河东岸，遂返回清原。此后，第一军即停止执行西征任务。两次西征虽未达成预期目的，但却扩大了抗日联军的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

第二军主力为掩护西征，首先袭击抚松县城，毙伤敌300余名；接着，袭击扫荡河，歼伪军300余名；活动于宁安一带的第五师联合第五军一部和部分抗日义勇军于9月中旬在代马沟伏击日军军用列车，毙伤日伪军120余人，战马60余匹，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同年冬，日军在抚松县西岗包围了我第二军军部和第四师。我军经10余小时苦战，突出重围，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不幸牺牲。1937年4月至6月，第二军第六师两次进入朝鲜作战，取得了炮台围和普天堡战斗的胜利。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抗联第一路军先后攻克抚松、辉南、金川等十几座城镇，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并在磐石、双阳、柳河、金川、临江等13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游击基地，全军发展到6000多人，严重地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在此期间，吉东和北满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有很大发展。1936年2月，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抗联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宋一夫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此后，第五军以少数部队在宁安地区坚持斗争，主力向穆稜、密山、依兰方向发展，在中东铁路沿线多次袭击敌

人军用列车，并进行了上马莲河、熏老婆沟等战斗。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宋一夫任书记。同月，第五军协同兄弟部队攻克了依兰县城，毙伤俘日伪军40余人。接着，以一部在勃利、依兰、方正地区和中东铁路沿线活动，一部向桦川、同江地区发展，开辟新区。在我军连续胜利的形势下，驻三道河子的伪森林警察大队150余人哗变，改编为第五军警卫旅，后扩编为第三师。至7月，全军发展到3000人。

1936年1月4日，抗联第四军协同第三军和李华堂部，在方正县境内的猪蹄河附近设伏，毙伤日伪军80多人，截获辎重大车91辆，战马300余匹。随后又与第三军协同袭击了石头河子，毙伤敌人70余名。3月，李延禄调往关内工作，由李延平继任军长。此后，第四军同兄弟部队一起，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讨伐”，部队扩编为4个师，约2000余人。

1936年11月，第四军第二师在饶河地区扩编为抗联第七军，陈荣久任军长，辖3个师，共700余人。1937年1月，第七军一部在饶河县小南河附近被敌包围，陈荣久在突围时不幸牺牲。战后，李学福继任军长。第七军分批转移到同江、富锦地区，成功地袭击了林子大屯、富士宫等处敌据点。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第七军发展到约1000人。

1936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为抗联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箴任政治部主任，辖4个师，共约2000人。不久，夏云杰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由戴洪滨继任军长。这时，日伪军3000人对我第六军举行“讨伐”。我第六军为争取主动，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留汤原地区坚持斗争。各师在转移中，冲破了敌军的堵截，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1937年3月，坚持汤原地区斗争的部队，夜袭汤原县城，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4月，第六军军部突围到达桦川、富锦一带，同第一师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1936年春、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汤旺河地区出发，开辟了木兰之蒙古山游击区。同年8月，改编为抗联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师，不久扩编为10个师，共6000余人。9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冯仲云任书记。11月，第三军军部为打破日伪军“讨伐”，率一部兵力向铁力、海伦、龙门远征。敌军发现我军意图后，立即调集重兵追堵。赵尚志在铁力地区布置工作后，又率部向逊河方向前进。途中进行了冰趟子、龙门等战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自己也遭受很大损失，到达逊河地区时，只剩下100余人。接着，在逊河附近又遭敌突然袭击，损失过半，余部返回汤原地区。在此期间，第三军其余部队在汤原、依兰、方正、宝清、富锦地区积极活动，取得了太平沟金矿、马连站、嘉荫河金矿等战斗的胜利，攻克了萝北、佛山等县城，打击了日伪军，配合了军主力的远征作战。

除了我党直接组织领导的以上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抗日武装，在我党的团结争取下，先后加入抗日联军的战斗序列。原依兰县土龙山民众自卫军改编为抗联第八军，谢文东任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吉林自卫军残部改编为抗联第九军，李华堂任军长，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东北反满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抗联第十军，汪雅臣任军长。另有勃利县驼腰子金矿工人反日义勇军改编为抗联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到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个军、1个独立师，共2万余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和曲折的道路。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其主要经验是：



必须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旧部、策反伪满军和在大、中城市组织反对日本统治的群众运动上，只用部分力量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武装。结果，东北军旧部组成的抗日武装很快溃散，自己组织的武装也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各地党组织从实践中提高了认识，相继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游击武装才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当时在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应当实行同关内苏区不同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但在初期，我们没有这样做，结果一些游击队遭受挫折。当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1933年1月26日指示的精神，逐步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积极组织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其它抗日武装，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游击战争就很快地出现了新局面，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

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各游击武装经常处于优势日伪军的“讨伐”之中。能否打破敌之“讨伐”，是游击战争能否坚持和发展的大问题。各地游击武装在反对敌之“讨伐”时，大多数能坚持游击战争的原则，以少数兵力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转到外线，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采取袭击、伏击、声东击西、打了就走等战术，出敌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讨伐”的胜利，并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少数游击武装采用集中兵力同敌人打正规战，或者不能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及时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结果都吃了亏。

## 本章小结

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是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军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基本战略方针，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建立了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关系，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作出了贡献。红军主力和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有了很大发展，打击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促进了全国性对日抗战的实现。这个阶段，主要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一、制定战略方针不但要考虑敌我双方当面的情况，而且要考虑全国形势的发展，着眼于战争的全局**

战略方针问题是关系战争全局，影响战争进程的头等重要问题。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会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积极地壮大抗日的力量，逐步地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的基本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全国形势的特点和苏区当面情况，从战争全局出发，提出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仅照顾到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而且考虑到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照顾到了全局。红一方面军遵照这个方针，高举团结抗日和反对卖国贼的旗帜，充分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弱点，首先东渡黄河，向山西进击；东征回师后，又进行了西征，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展。经过五个月的外线进攻，狠狠地打击了坚决反共的顽固势力，宣传了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红军，

开辟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甘宁根据地，改善了我党我军的战略地位，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新局面打下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 **二、军事打击与统战工作紧密结合，军事斗争服从于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任务**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作战必须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由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党的基本政治任务。这就要求红军既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打破他们的围困和进攻，又要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不懈的斗争。据此，红军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军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紧密地配合起来，实行军事打击配合政治争取的原则，区别当面敌军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对于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军事打击为主，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其一部；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争取，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对有抗日思想而又不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军队，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对其上层和下层同时开展统战工作，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争取同他们订立局部的停战协定或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当双方发生矛盾时，尽量协商解决，力求避免武装冲突，但对其中反共分子的挑衅，则给以适当的反击，以辅助政治争取；当他们为抗日救国而陷入困境时，则给以真诚的支援。红军这种鲜明的政治态度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政府走向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增强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

## **三、红军必须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为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协同一致地行动，坚决反对分裂主义**

“党指挥枪”是红军建军的基本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

是红军三大纪律首要的一条。因此，红军必须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服从全局的需要，协调一致地行动，绝对不允许背离党中央的指示而自行其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以后，党中央为联合东北军造成西北抗日的新局面，以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曾制定红军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而张国焘违背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坚持其分裂红军的错误，一再干扰和破坏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使红军兵力分散，丧失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在党中央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以后，三个方面军主力在中央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团结一致，协力作战，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进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友军，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实践证明，红军只有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在党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协同一致地行动，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 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这次战争，经历了创建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开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阶段；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连续粉碎敌人大规模“围剿”的阶段；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军事战略，革命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的阶段；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的阶段。在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连续粉碎了强大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围剿”，消灭了近百万敌人。同时，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纠正了王明“左”倾冒

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此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走向成熟，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党不但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锻炼出一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坚强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以几十万党员和几万干部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它不仅为抗日战争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而且为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基本经验是：

## 一、 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性质的战争，各有其不同特点。指导战争，必须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有着它自己的特点。1936年12月，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他从这些特点的相互关联上揭示了红军战争的特殊规律。他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表明中国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因而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两个特点，不仅基本上规定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应该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共产党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表明敌我力量对比是非常悬殊的。红军的敌人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稳定了政权的党，又拥有一支比红军大许多倍而且武器和军用物资比红军雄厚得多的军队，它还控制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枢纽和命脉，同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中国红军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之后，从游击队开始，红军的数量很少，武器很差，物资供应也很困难，革命根据地是分散的孤立的山区或偏僻的地区，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这两方面的情况，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也规定了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中国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毛泽东还指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

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规定了红军战争的指导路

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逐步地认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且应用于战争的实践，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不注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照搬一般战争、苏联内战和北伐战争的一套做法，曾经给革命战争造成了严重危害。

## 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必须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普遍规律。但是，武装夺取政权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不同。

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先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走先占城市，后取乡村的道路。在我国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也曾仿照过这些做法。然而，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统治阶级主要控制着中心城市，



广大农村其统治力量则比较薄弱。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只有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依靠广大农民的支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不断积蓄力量，才能生存、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

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开辟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指引着中国革命经过曲折走向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唯一正确的道路。历次“左”倾错误领导者，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照搬外国的革命经验，走依靠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用红军攻占中心城市，迅速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 **三、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不但需要 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而且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 军事路线**

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共产党的领导是最主要的条件。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主要靠自己路线的正确。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但为我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这条

军事路线有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人民军队。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人的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因此，红军必须实行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相结合，正规红军和赤卫队、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党犯过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在军事上形成了完整体系。在建军问题上，它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地打仗一项，把当时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在作战问题上，主张夺取中心城市，用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一套所谓的“正规”原则，代替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等，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只是在党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以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才重新胜利发展。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凡是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办事，革命和革命战争就发展，就胜利。反之，革命和革命战争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 **四、 进行中国革命战争，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红军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有了一整套适合中

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主要的是：

### (一) 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

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红军就遭到强大敌人的“围剿”。红军的作战，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在打破了敌人一次“围剿”之后，敌人便会很快地组织对红军的新的“围剿”。因此，“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就成为十年国内战争的一个规律。

“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主要是战争形式的反复。而它的内容则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开始时，是一个地方军阀的“进剿”，随后是几个地方军阀的联合“会剿”，最后则是蒋介石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不相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企图通过一两次决战，根本打破“围剿”，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致使红军在敌人“围剿”面前处于被动地位，给中国革命战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 (二) 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为了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为此，实行战略防御，是红军战争中的首要问题。战略防御有积极

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相反的方针。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消极防御是单纯防御，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红军的方针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下，对于敌人一次有计划的“围剿”，红军十分重视在敌人准备“围剿”的同时，进行充分的反“围剿”准备。当优势敌人发起“围剿”时，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以保存军力，准备反攻为目的的战略退却。当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时，红军则抓住战机转入反攻，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或一部。在打破敌之“围剿”，迫其转入防御时，红军适时转入进攻，扩大战果，为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 (三) 实行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项作战原则

为了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为此，战争指导者不论在任何复杂环境下，都必须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红军主力，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并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优势。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改变敌我进退、攻守和内外线的形势，才能保持战场主动权，也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地位。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

运动战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这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每一个根据地只有不大

的一支红军，并且处在没有广大兵员和充足械弹补充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红军基本上是无用的。红军作战基本地是运动战。红军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实践证明，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最能充分发挥红军作战的优长，能动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因为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弱小的红军只能在长期战争中，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但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能持久，只能速决。因为：红军的武器弹药没有来源；每个根据地只有一支不大的红军，打破一次“围剿”后，必须准备打破下一次新的“围剿”；敌人的每次“围剿”不仅兵力多，而队势又较密集，红军打其一部或一路如不能速决，则敌人将迅速靠拢，不仅不能消灭敌人，而且将陷于被动局面。要达成速决战，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诸如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等等。

歼灭战，是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打破敌人“围剿”的有效战法。对于几乎一切都取之于敌的红军，消耗战是不适用和无意义的。只有给敌以歼灭，给自己以补充，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才能争取战争最后胜利。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要达成歼灭战，人民的赞助，良好的阵地，好打之敌，出敌不意等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

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积极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否定红军正确的作战原则。他们实行军事平均主义，进攻时“全线出击”，防御时“分兵把口”，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以战役战斗的持久战达成战略上的速决战，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这种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给红军战争造成了严重危害。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国革命战争才重新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 一、重要战役战斗 敌我战斗序列表

# 全国主要军阀部队分布情况表

(1927年夏)

附表1(1)

项 目	国民 党 系																		
	第一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					第三集团军		第四集团军								
总 司 令	蒋介石			冯 玉 祥					阎锡山		唐生智								
总 兵 力	约40万			20余万					12万		10余万								
割 据 区 域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全部、安徽大部			绥远、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河南					山西		湖南、湖北、江西大部、安徽西部								
主 要 部 队	番 号	第一路军	第二路军	第三路军	第八路军	第一方面军	第二方面军	第三方面军	第四方面军	第五方面军	第六方面军	第七方面军	第八方面军	左路军	右路军	第一方面军	第二方面军	第五方面军	第六方面军
	主 官	何应钦	白崇禧	李宗仁	李济琛	孙良诚	靳云鹗	方振武	宋哲元	岳维峻	石敬亭	刘郁芬	刘镇华	商 震	徐永昌	唐生智	张发奎	朱培德	程 潜
	位 置	苏北海州	徐州以南	南京、芜湖	赣南、广东	郑州、开封	豫 中	襄 阳	固 原	豫 南	陕 南	甘 肃	豫 西	大 同	阳泉、娘子关	安庆以西	九江、南昌	临川、吉安	湘 东
附 注	各派军阀兵力总数和部队位置经常变化，本表所列只是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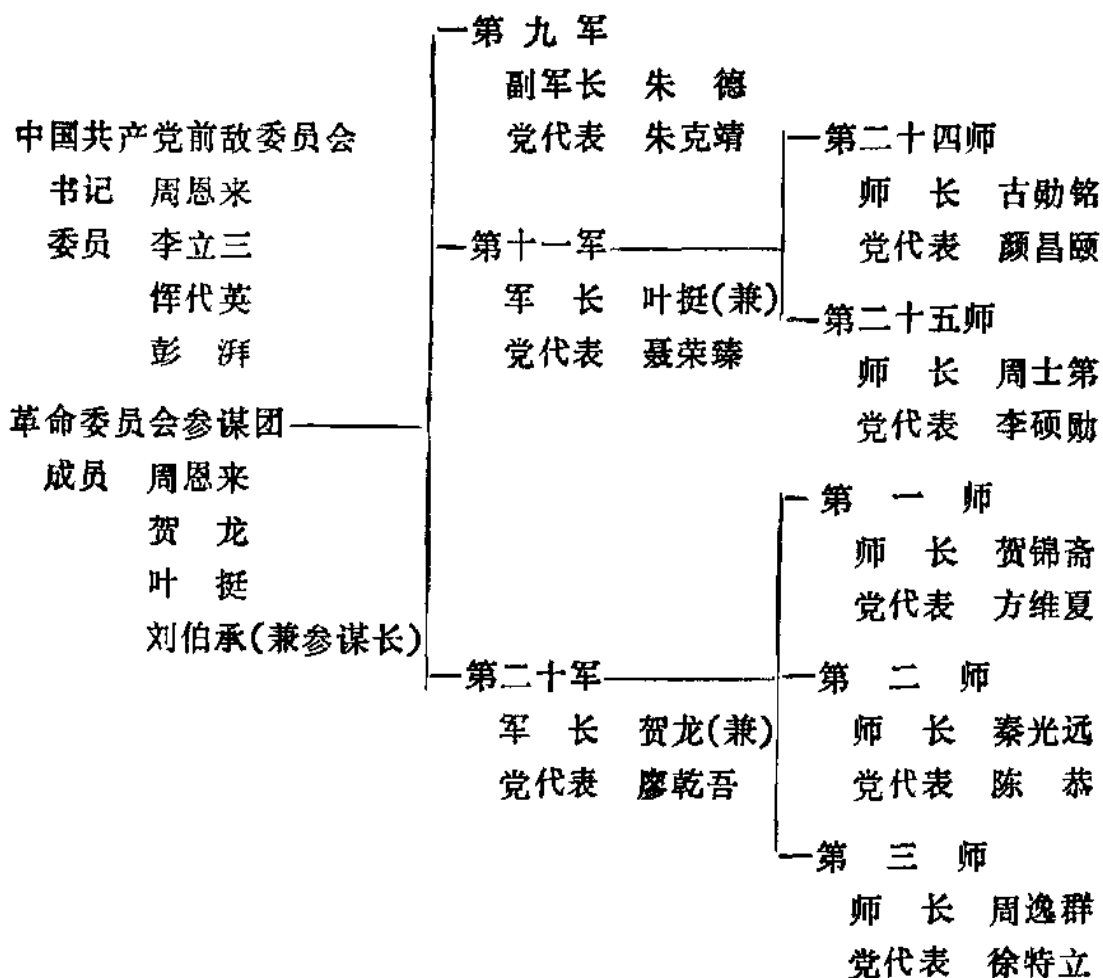
附表 1(2)

项 目	派 系		国 民 党 系			奉 系													
			川 军	黔 军	滇 军														
总 司 令						张作霖													
总 兵 力			20余万	约 3 万	约 2 万	40余万													
割 据 区 域			四川、鄂西、康东	贵州	云南	黑龙江、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													
主 要 部 队	番 号	第二十军	第二十一军	第二十二军	第二十三军	第二十四军	第二十八军	第二十九军	第三十三军	第三十五军	第三十八军	第三十九军	第一方面军团	第二方面军团	第三方面军团	第四方面军团	第五方面军团	第六方面军团	第七方面军团
	主 官	杨 森	刘 湘	赖 心 辉	刘 成 勋	刘 文 辉	邓 锡 侯	田 頌 尧	李  棨	周 西 成	龙  云	胡 若 愚	孙 传 芳	张 宗 昌	张 学 良	杨 宇 霆	张 作 相	吴 俊 升	褚 玉 璞
	位 置	川东、鄂西	重庆、川东	川黔边	新津、雅安等地	川南、康东	川西、康北	成都地区	湘西、鄂西	贵州	昆明	曲靖地区	济宁地区	徐州地区	保定、河间	宣化、万全	直隶	东北	鲁中
附 注																			

# 瑞金、会昌战斗我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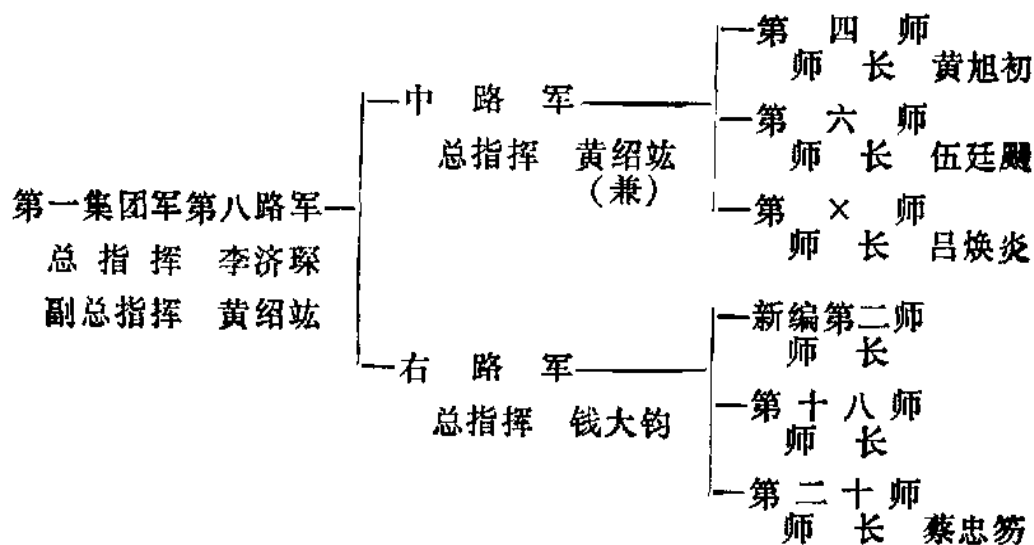
(1927年 8 月25日—30日)



# 瑞金、会昌战斗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 3

(1927年 8 月25日—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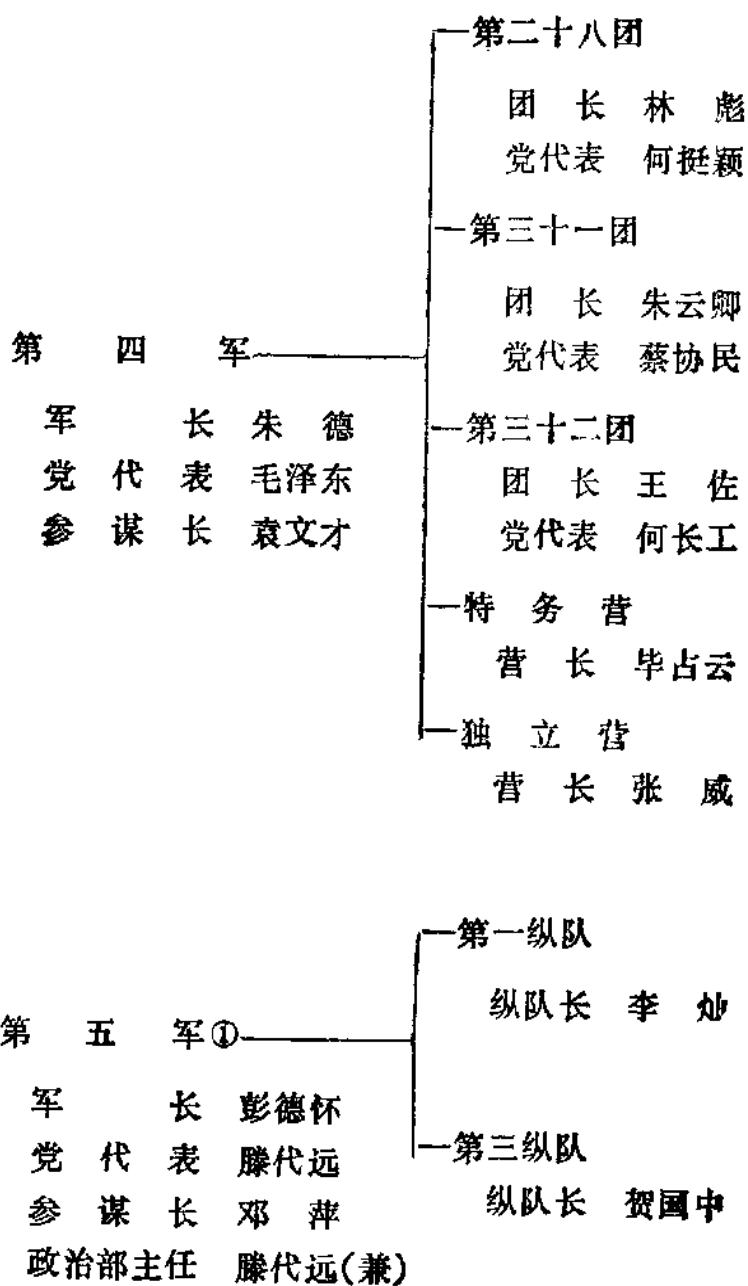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

## 第三次反“会剿”战斗序列表

(1929年1月)

附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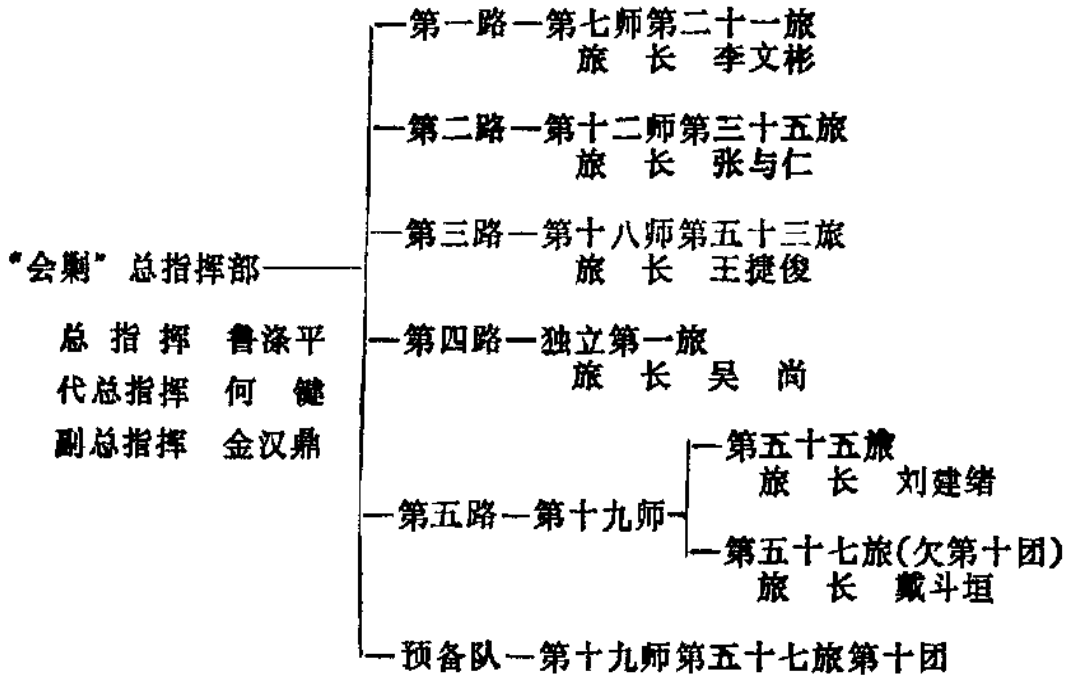


①第五军归第四军指挥。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三次反“会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 5

(1929年1月—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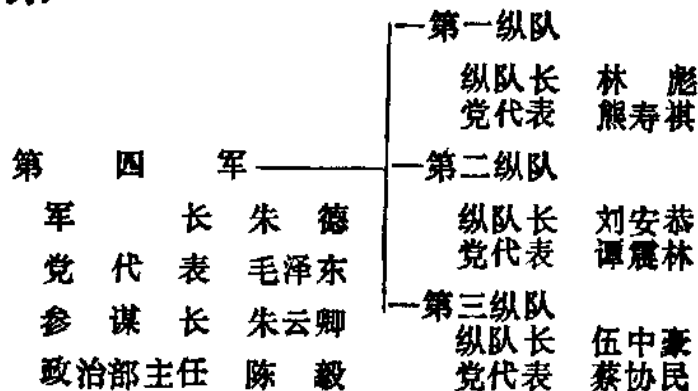


# 龙岩战斗时敌我双方战斗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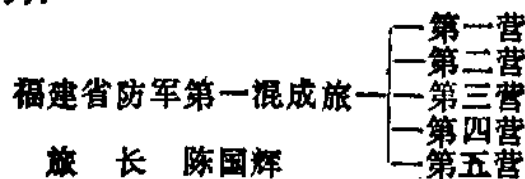
附表 6

(1929年5月—6月)

红军序列：



敌军序列：





附表7(2)

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总指挥 贺龙	政委 周逸群	参谋长 孙德清	政治部主任 柳克明	(1万余人)	第一军	第二军	军政委	贺朱勉之	龙(兼)	孙德清(后)					
						第一军	第六军	军政委	段德昌	段德昌(后)	柳克明(后)					
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师	李华	王光	许继	曹大	慕申	陈云	张小平	邓存	古存	古存	贺洋	施简	梁枢	杨哲	胡冕	李超时
工农红军第一军(鄂豫皖地区)	(1000余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鄂豫皖地区
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赣黄广地区)	(6000余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赣黄广地区
工农红军第七军(右江地区)	(1800余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
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东江地区)	(6000余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工农红军第十一军(2500余人)	(2500余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东江地区
工农红军新编第十二军②(闽西地区)	(约5000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闽西地区
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琼崖独立师)	(3000余人)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琼崖独立师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浙南地区)	(约2000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浙南地区
工农红军第十四军(通海如泰地区)	(1300余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通海如泰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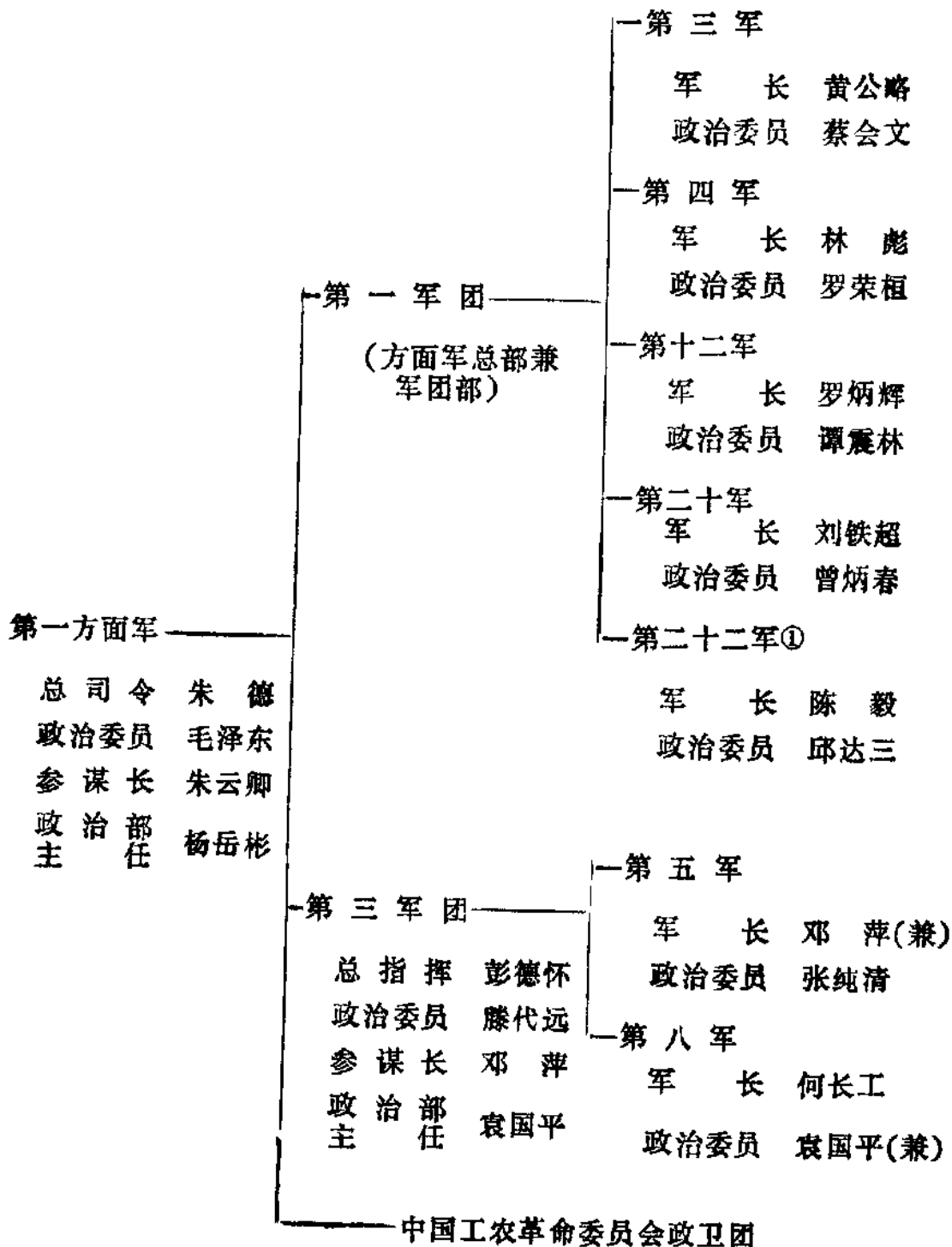
①各地红军于1930年6月开始先后进行整编，表内人数系整编时概数。

②新编第十二军系闽西地区红军第二十、第二十一军合编组成。

#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 战斗序列表

附表 8

(1930年11月—1931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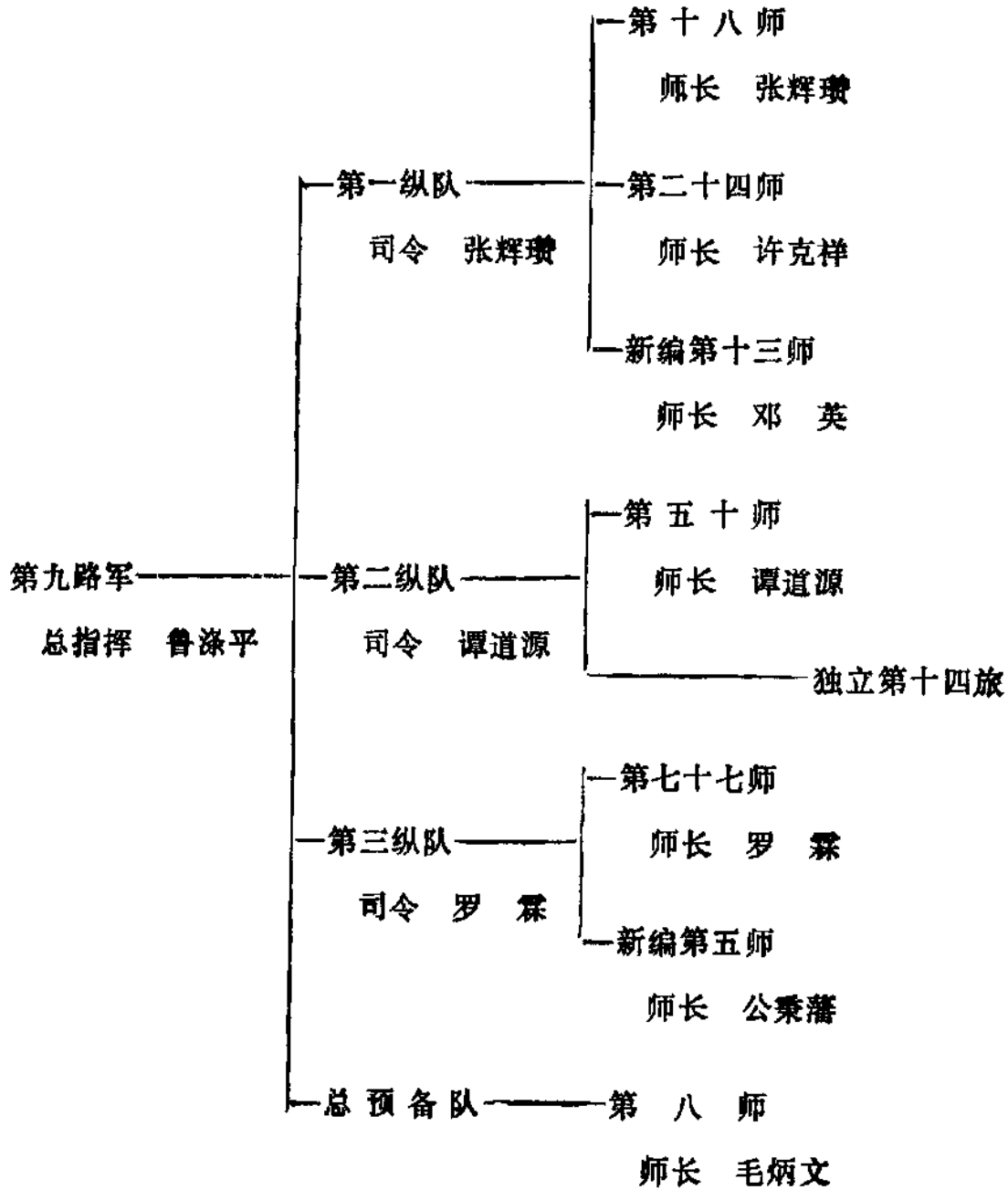


①第二十二军于1930年12月缩编为第六十四师，师长栗裕，政治委员高自立。

#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 敌军战斗序列表（一）

附表9

（1930年11月—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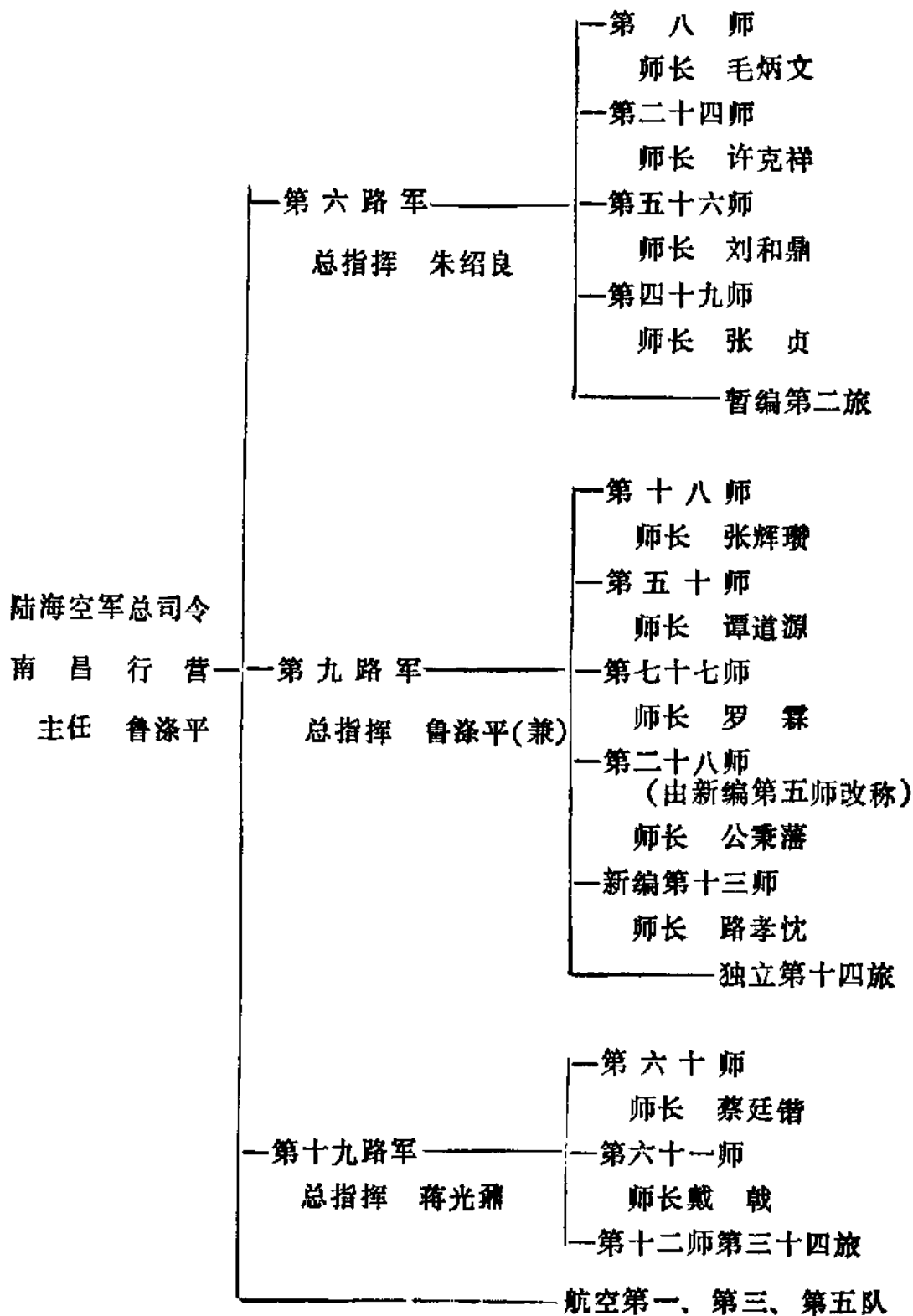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 敌军战斗序列表（二）

附表10

（1930年12月—1931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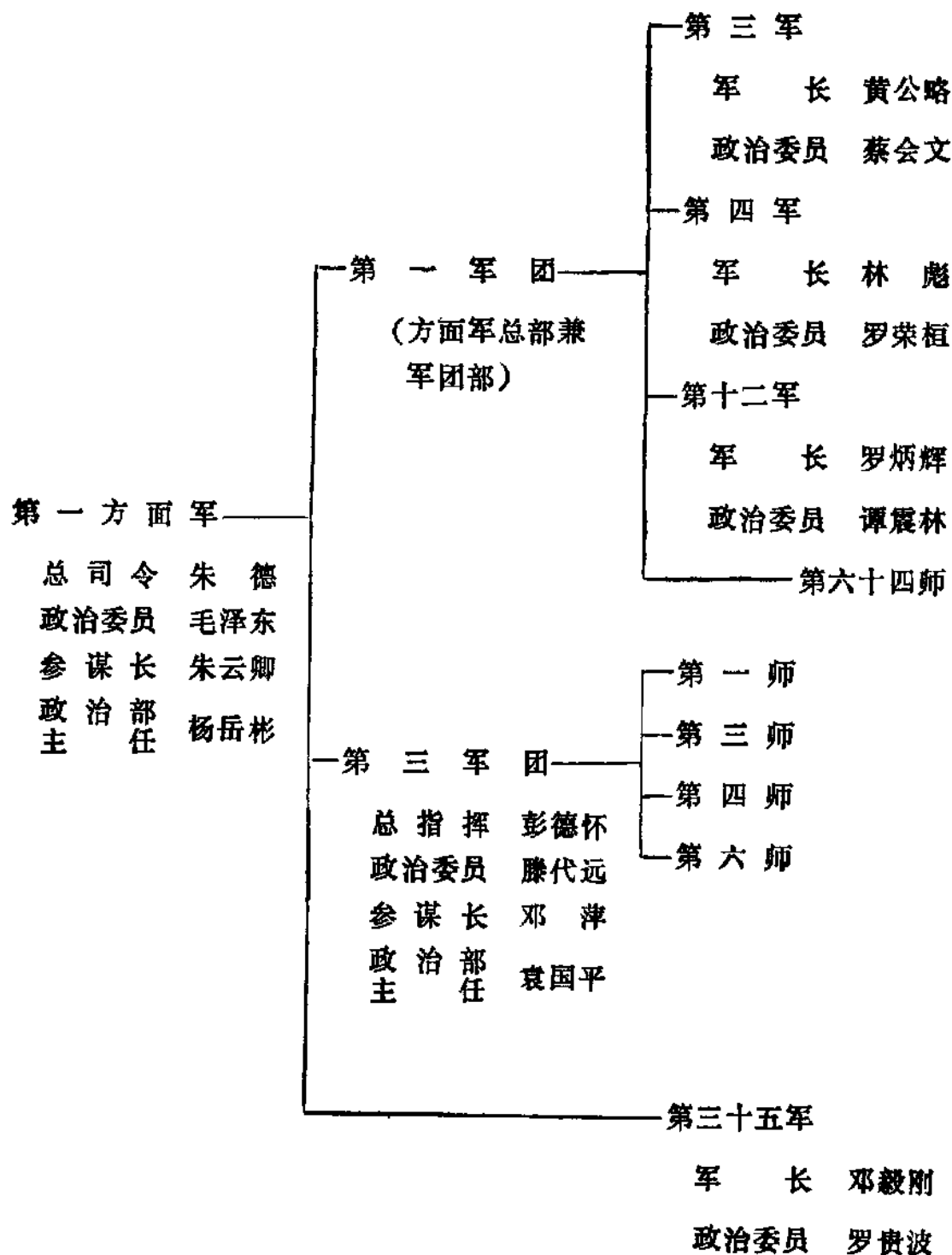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

附表11

## 战斗序列表

(1931年3月—5月)



#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 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12

(1931年3月—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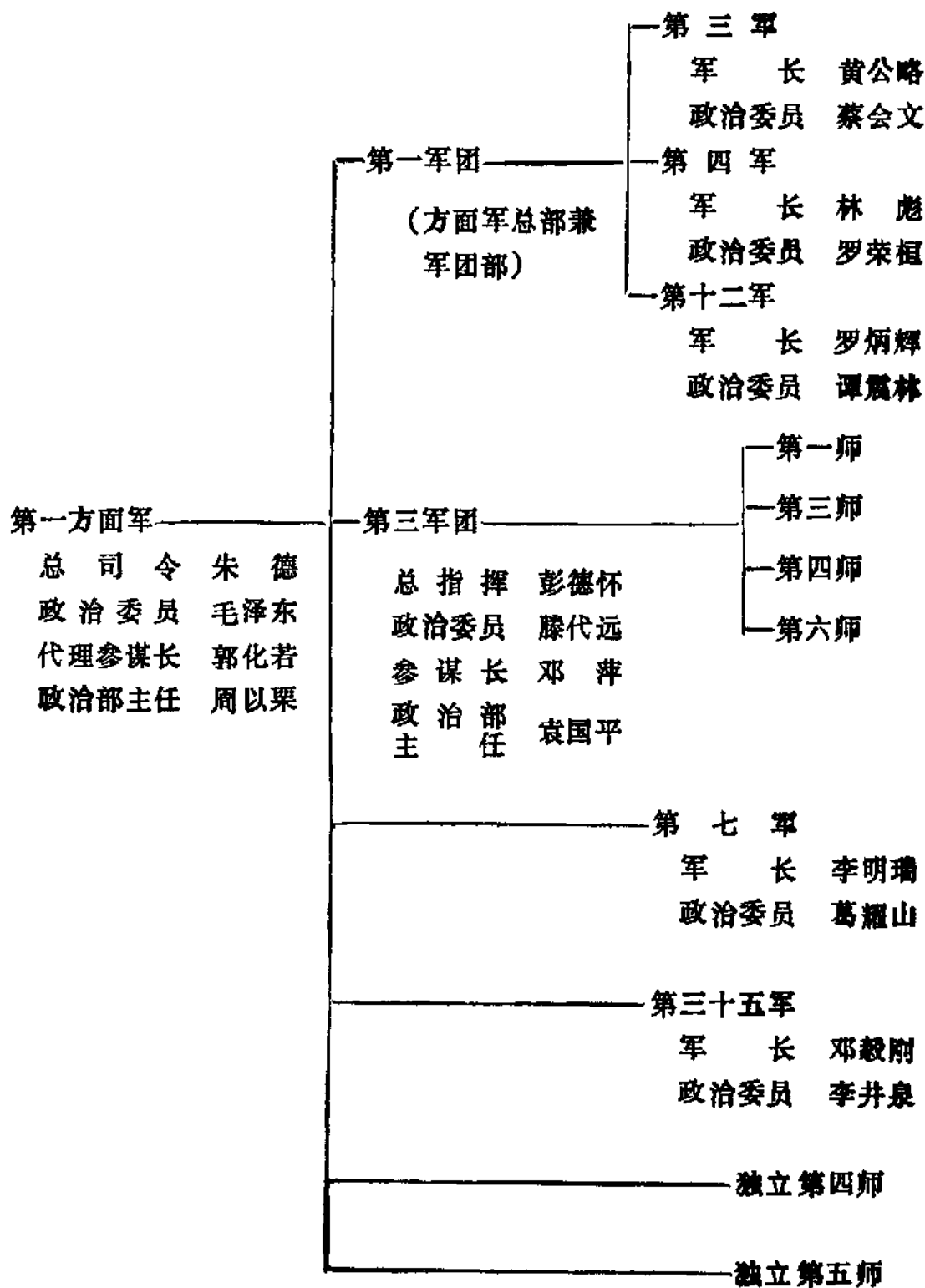
陆海空军总司令 南昌行营主任 何应钦	—第五路军— 总指挥 王金钰	—第二十八师	师长	公秉藩	
		—第四十三师	师长	郭华宗	
		—第四十七师	师长	王金钰 (兼)	
		—第五十四师	师长	郝梦龄	
		—第七十七师	师长	罗霖	
	—第六路军— 总指挥 朱绍良	—第五师(一部)	师长	胡祖玉	
		—第八师	师长	毛炳文	
		—第二十四师	师长	许克祥	
		—第五十六师	师长	刘和鼎	
		—新编第十三师	师长	路孝忱	
	—第十九路军— 总指挥 蔡廷锴 (代)	—第六十师	师长	蔡廷锴	
		—第六十一师	师长	戴戟	
		—第十二师	第三十四旅		
	—第二十六路军— 总指挥 孙连仲	—第二十五师	师长	孙连仲 (兼)	
		—第二十七师	师长	高树勋	
		—骑兵第一师	师长	关树人	
			—第五十二师	师长	韩德勤
			—第四十九师	师长	张贞
			—第六十二师	师长	香翰屏
		—新编第二师	卢兴邦旅		
		—新编第四旅			
—航空队—		—第一队			
		—第三队			
		—第五队			

#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

附表13

## 战斗序列表

(1931年7月—9月)



# 紅一方面軍第三次反“圍剿”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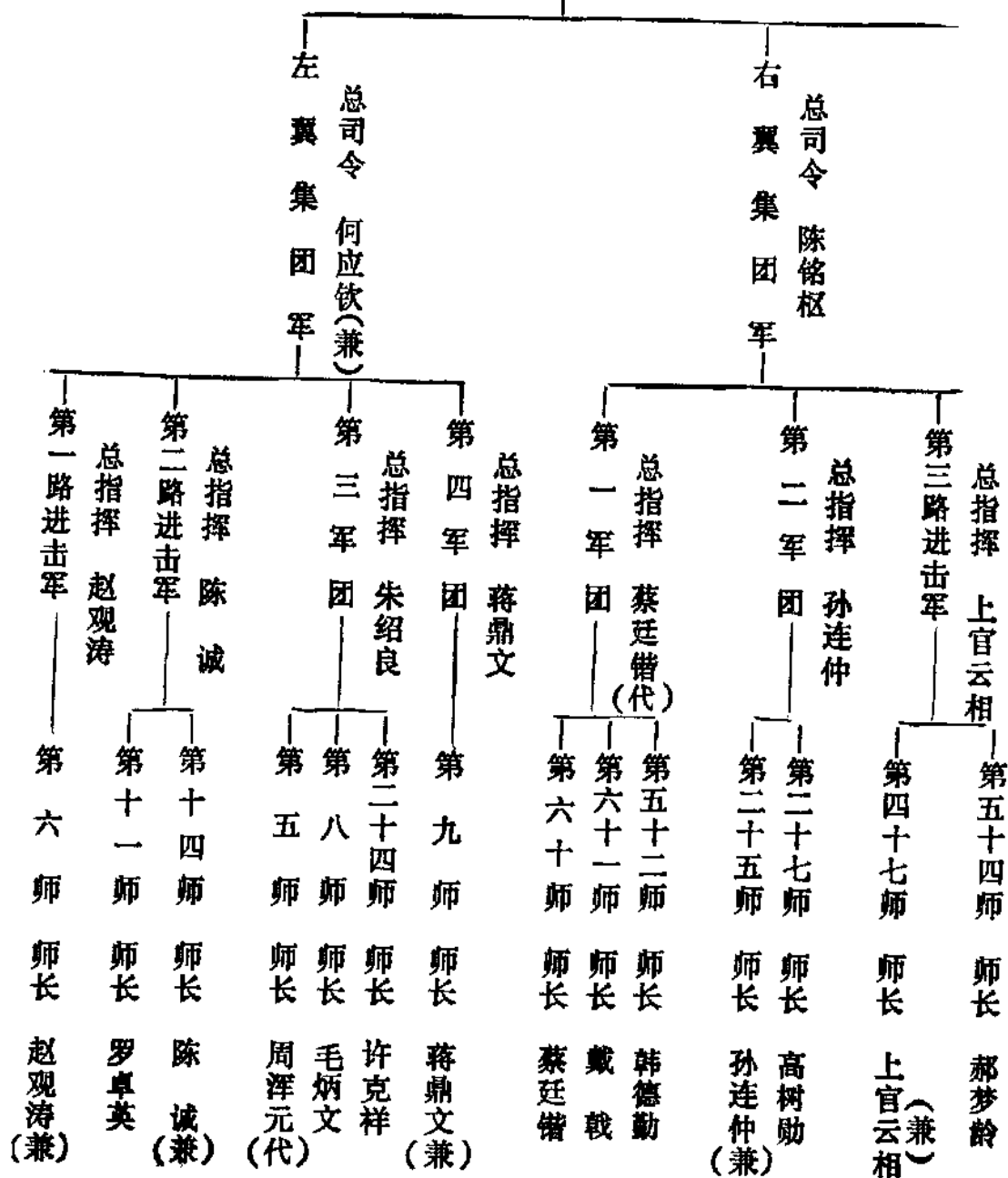
附表14(1)

## 敵軍戰鬥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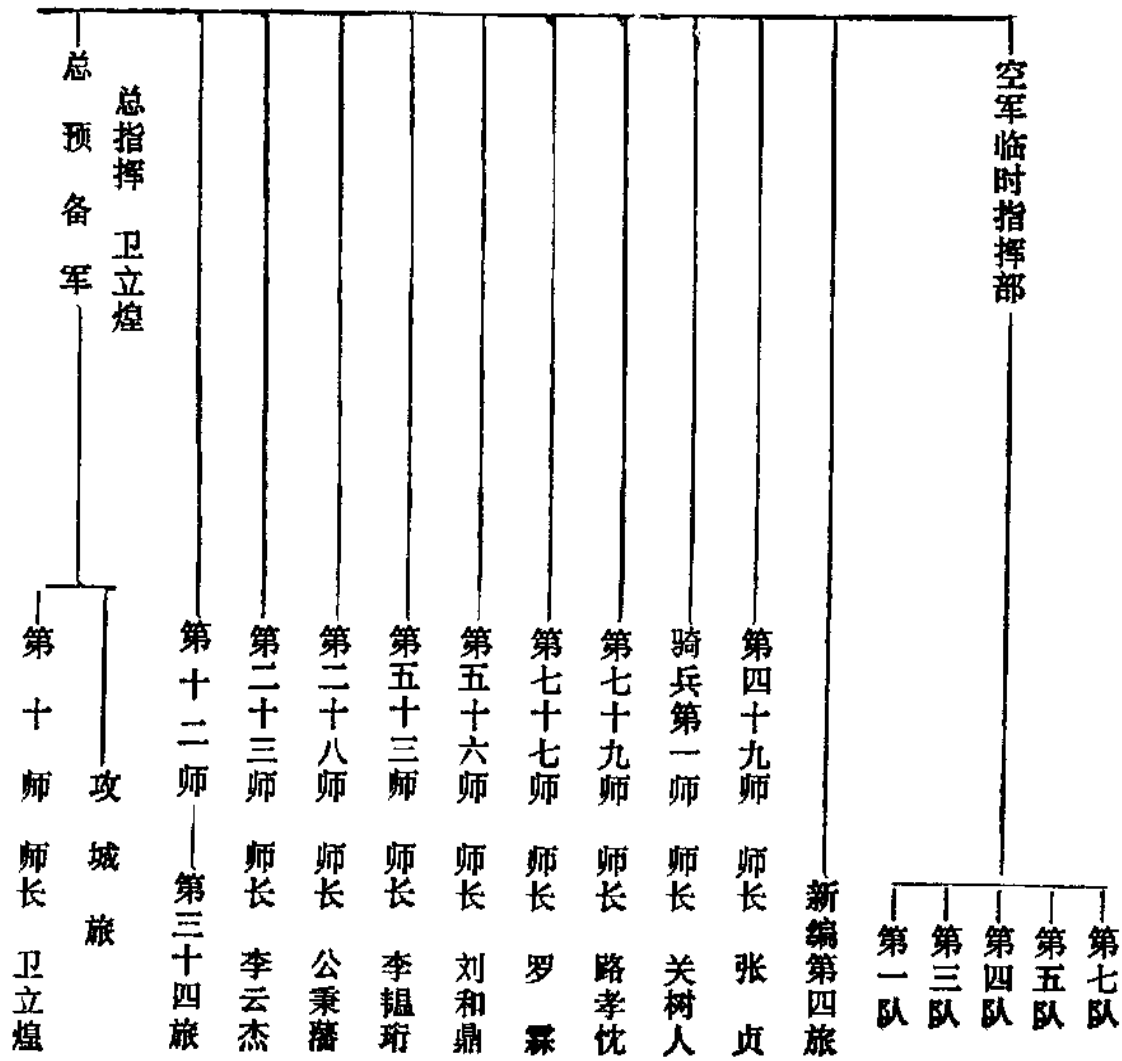
(1931年7月—9月)

### 「圍剿」軍

總司令 蔣介石  
前線總司令 何應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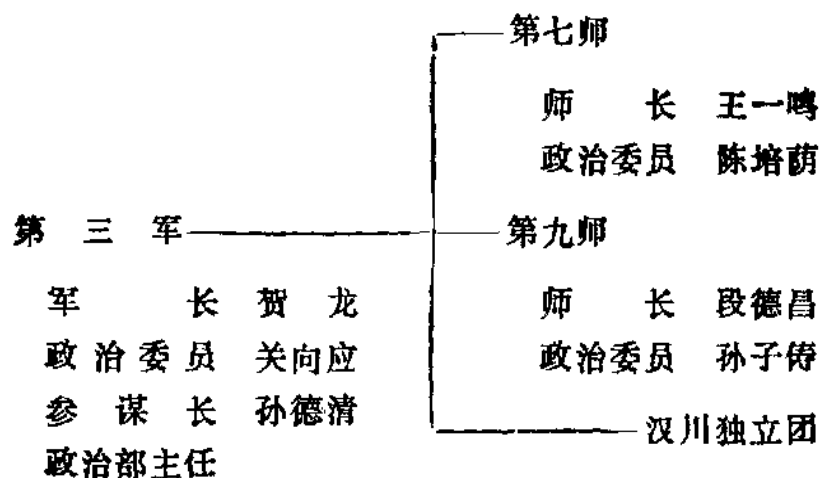
附表14(2)



## 湘鄂西苏区红三军文家墩战斗序列表

附表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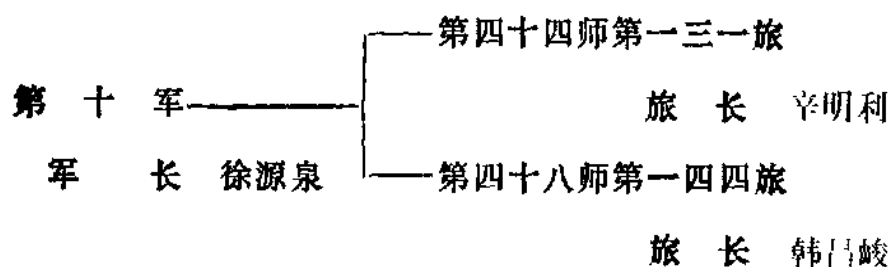
(1932年3月6日—7日)



## 湘鄂西苏区红三军文家墩战斗时 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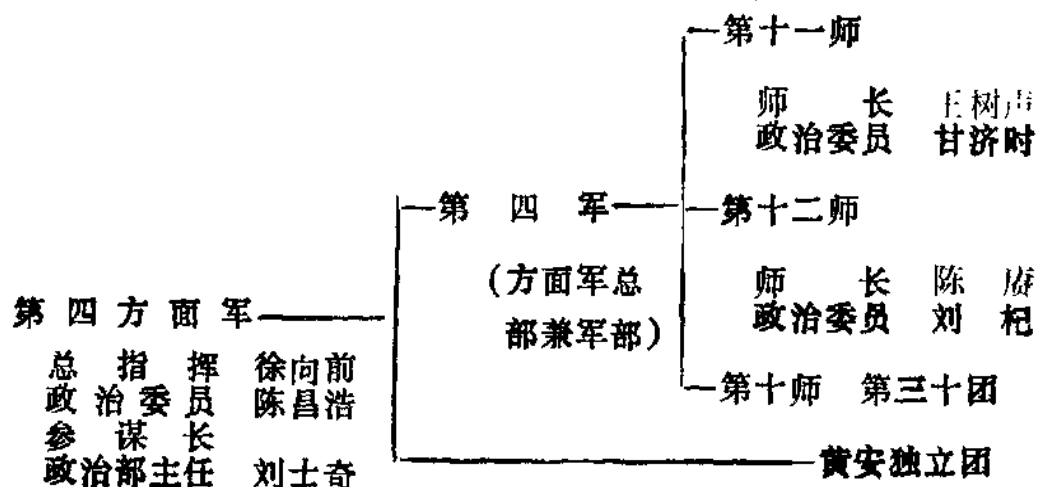
(1932年3月6日—7日)



## 红四方面军黄安战役战斗序列表

附表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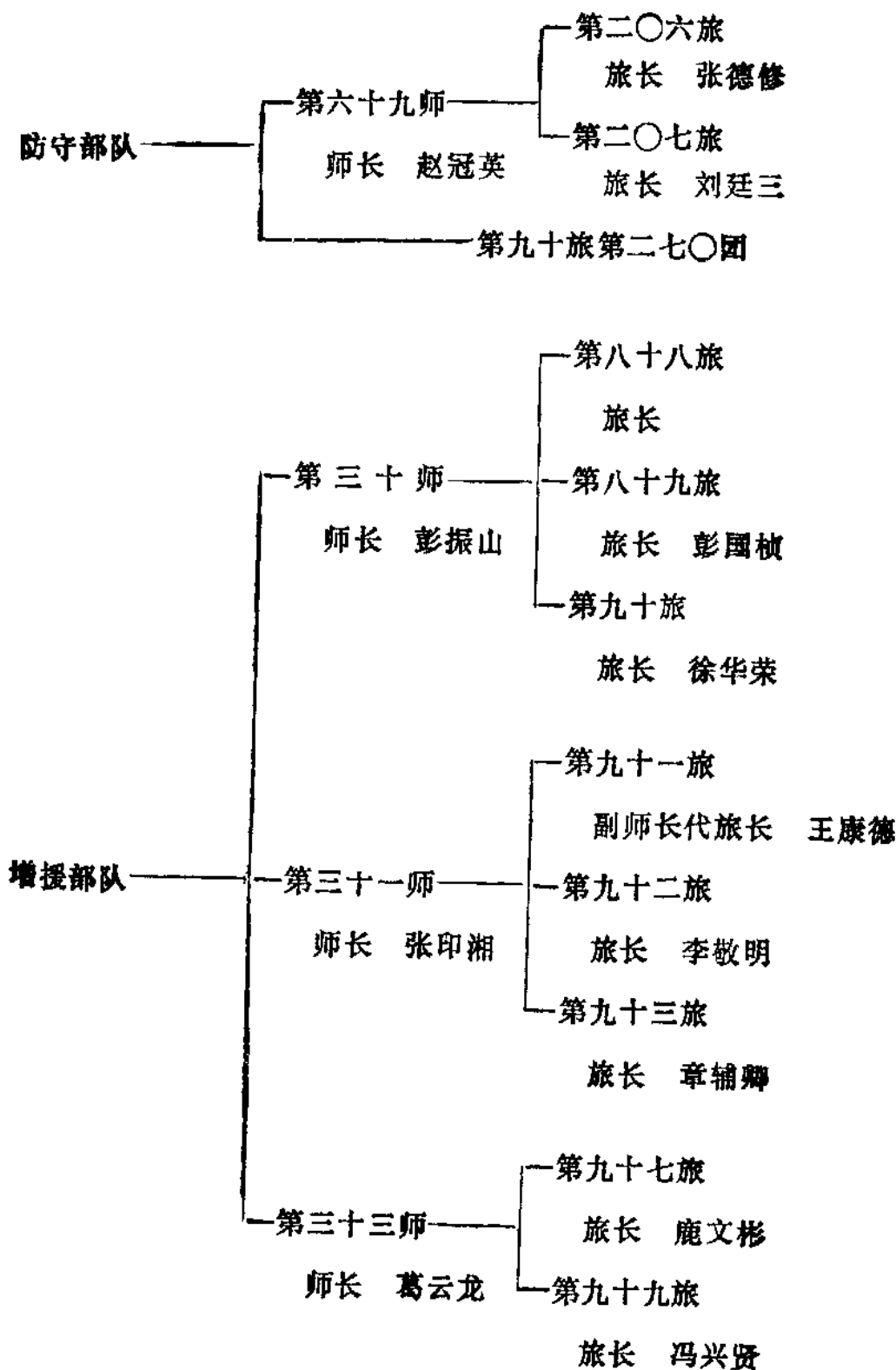
(1931年11月10日—12月23日)



# 红四方面军黄安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18

(1931年11月10日—12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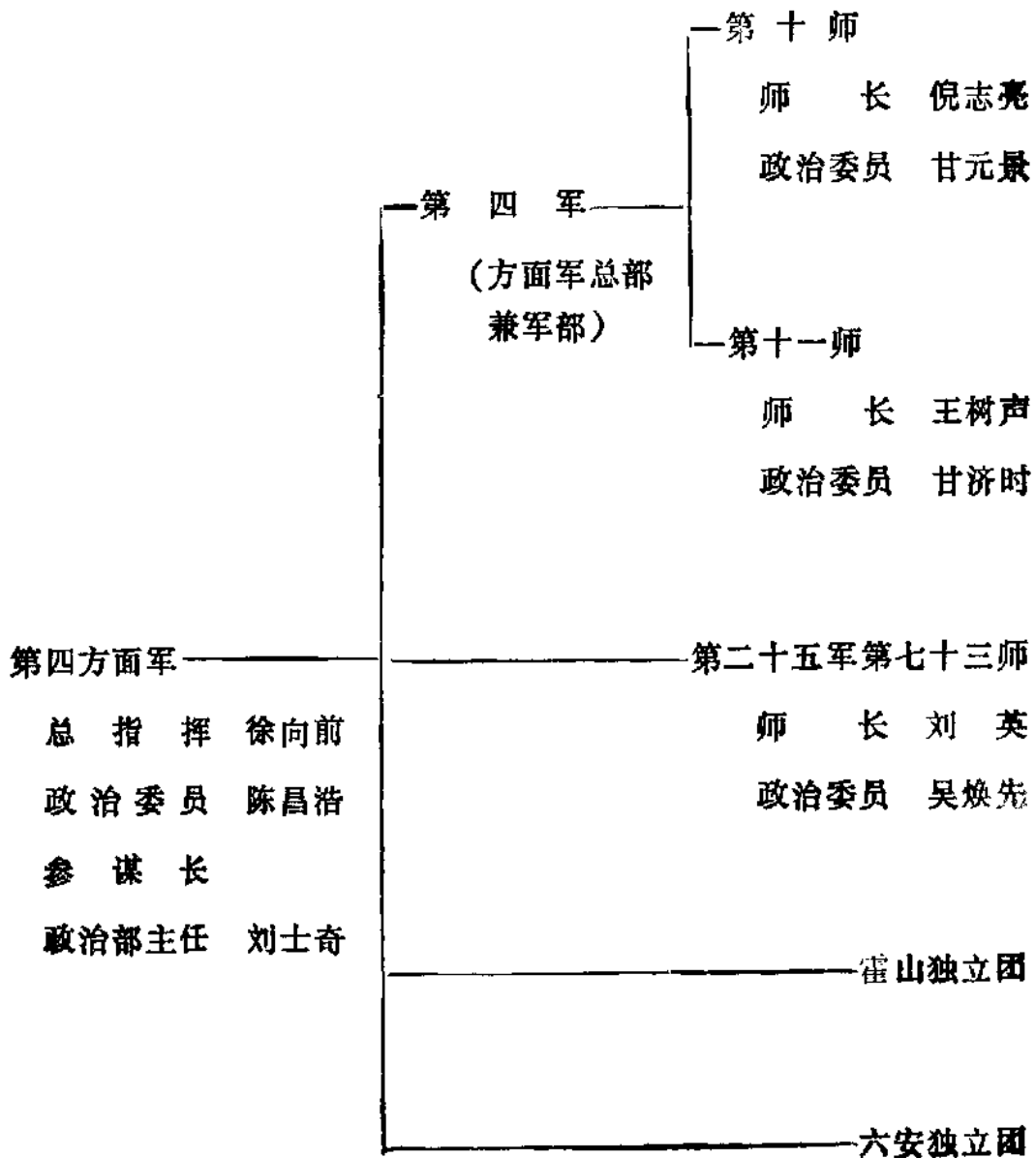




# 红四方面军苏家埠战役战斗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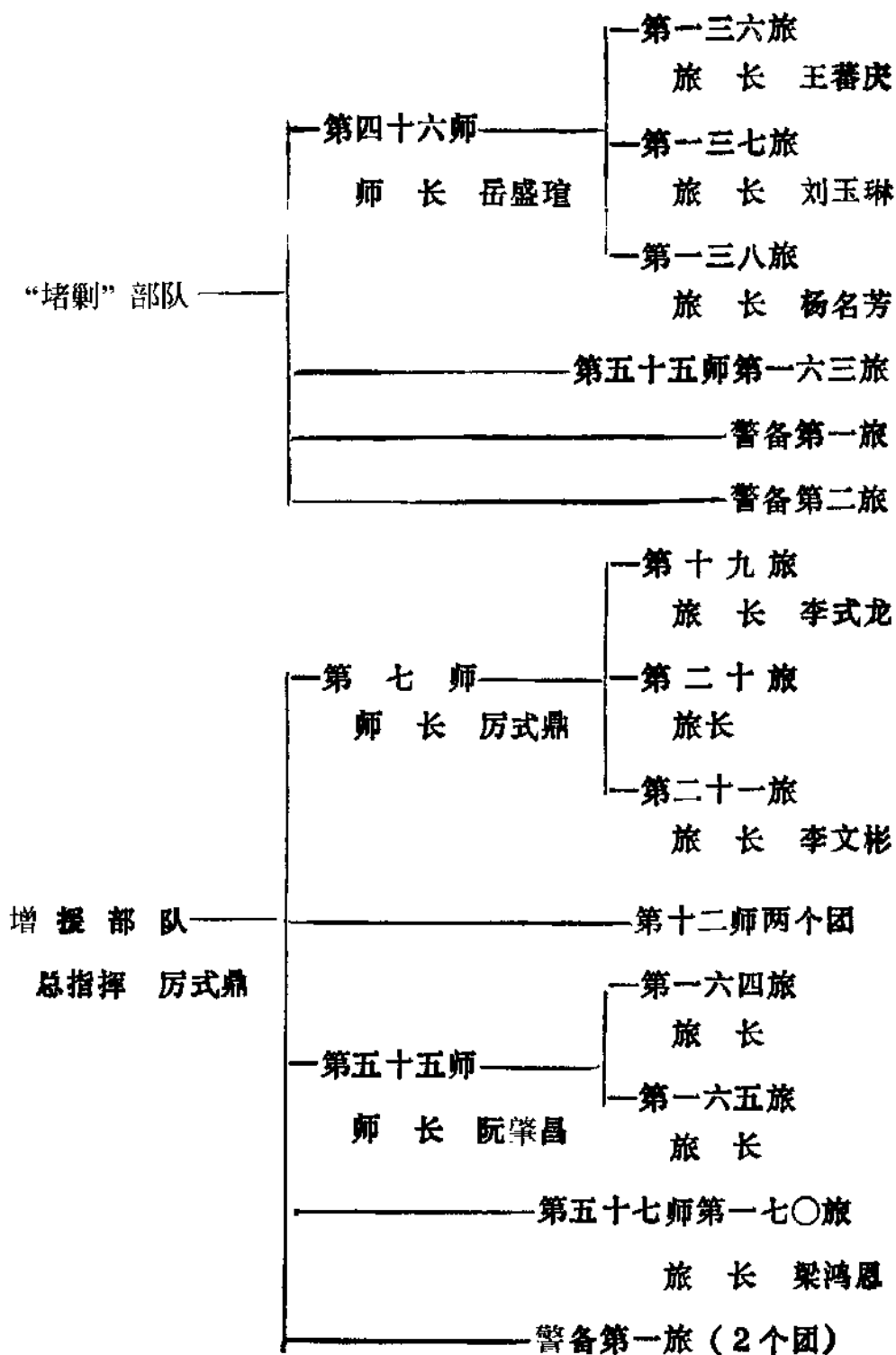
附表19

(1932年3月22日—5月8日)



# 红四方面军苏家埠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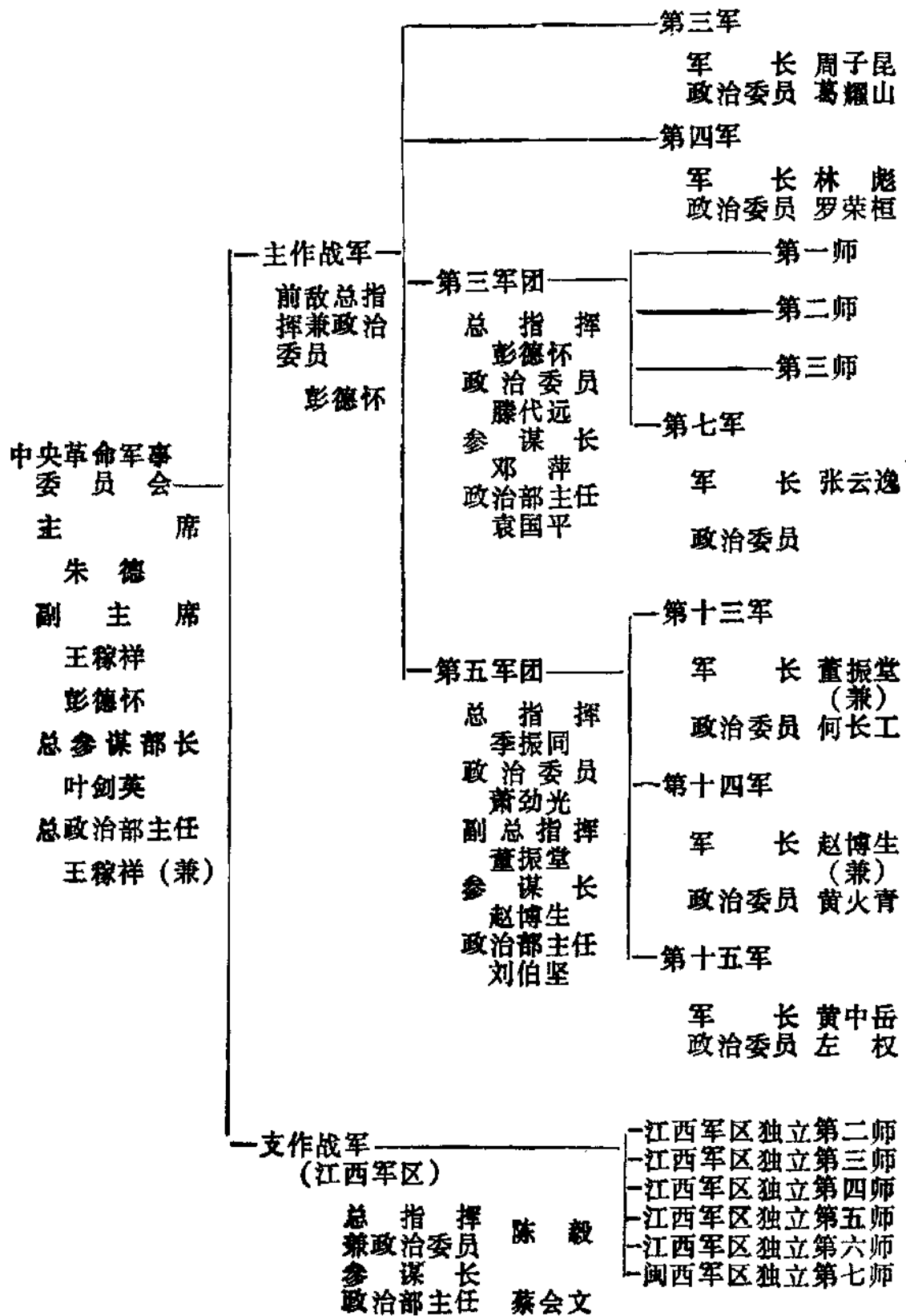
(1932年3月22日—5月8日)



# 中央红军赣州战役战斗序列表

附表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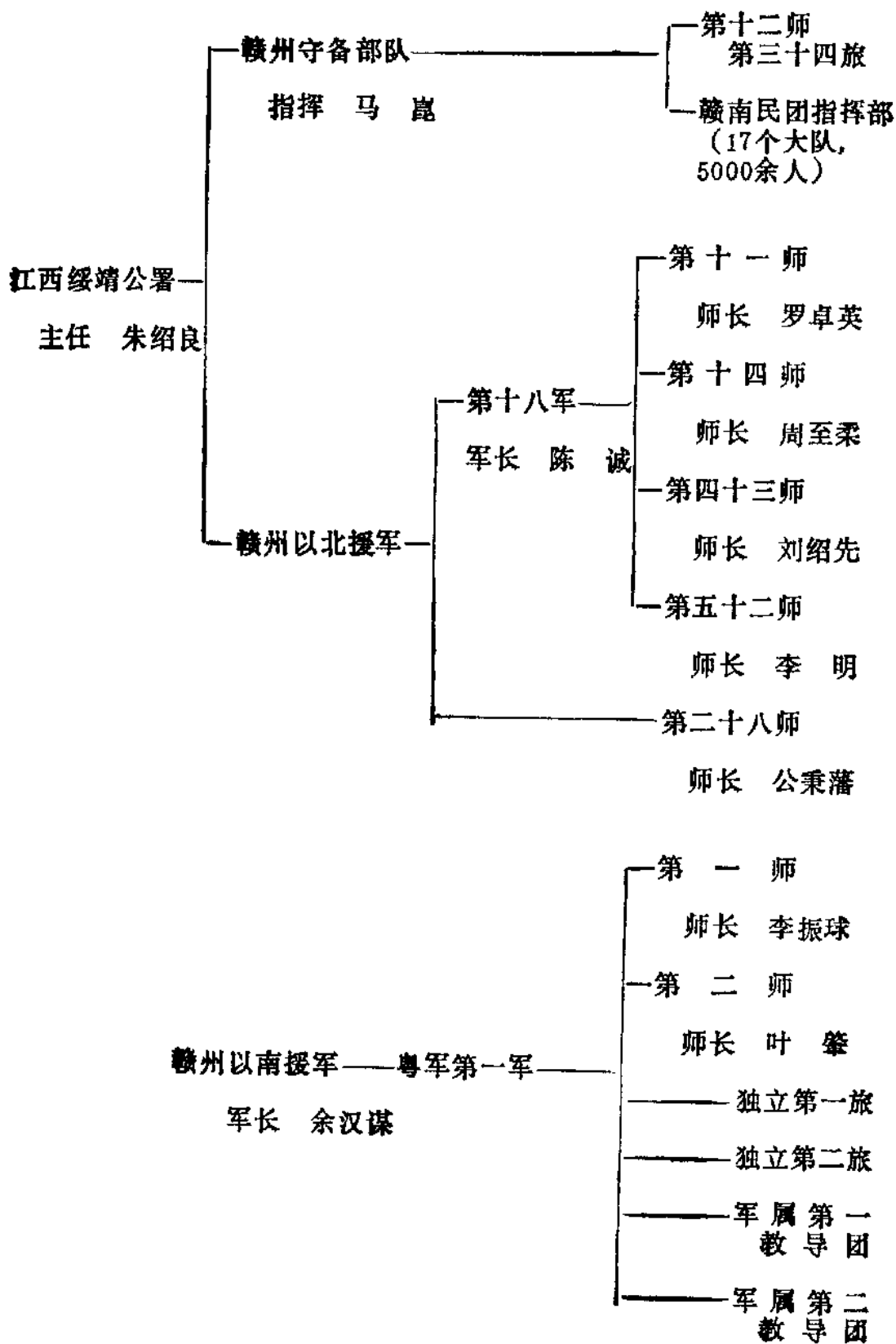
(1932年2月4日—3月7日)



# 中央红军赣州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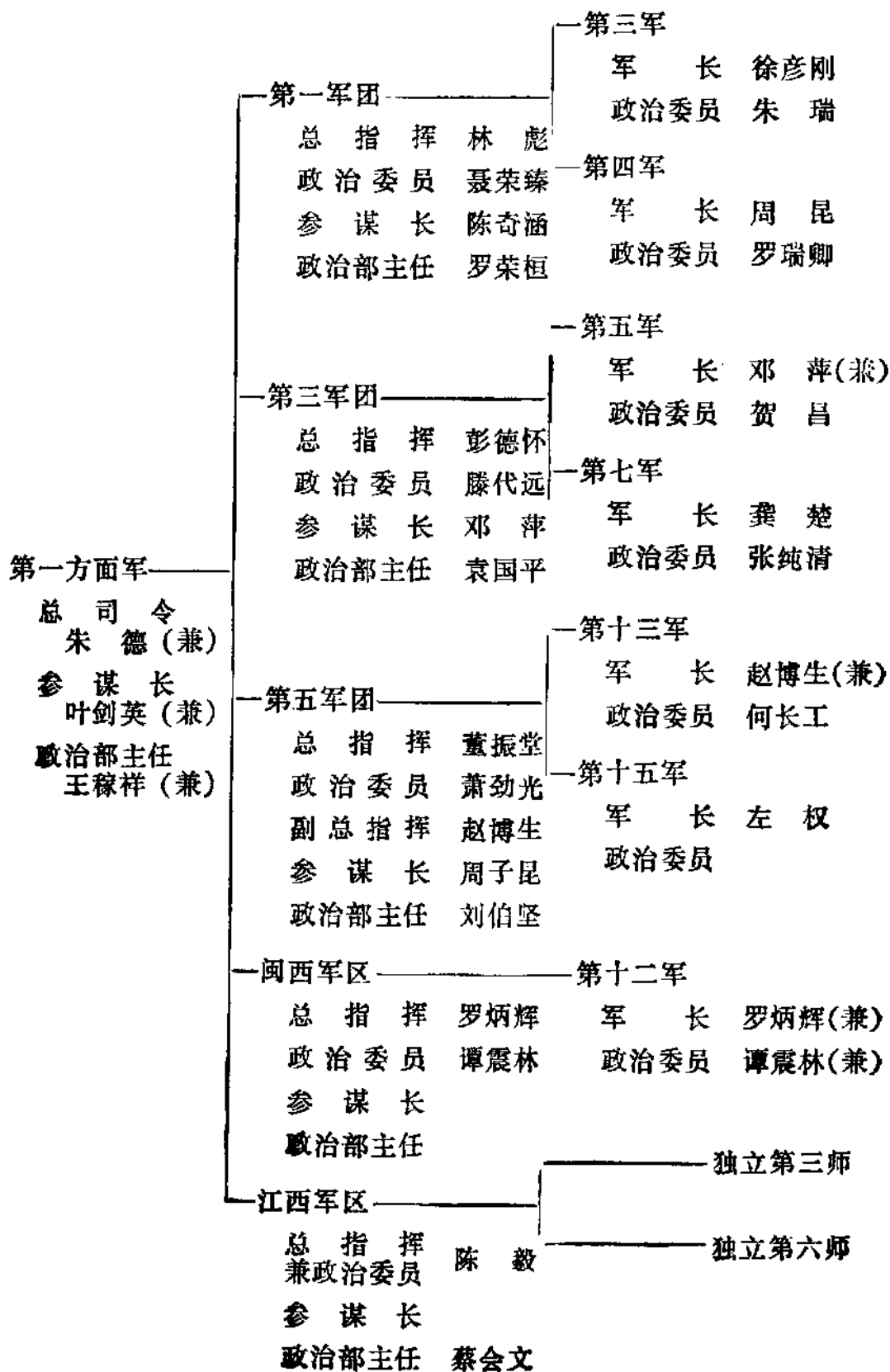
(1932年2月4日—3月7日)



# 红一方面军南雄、水口战役战斗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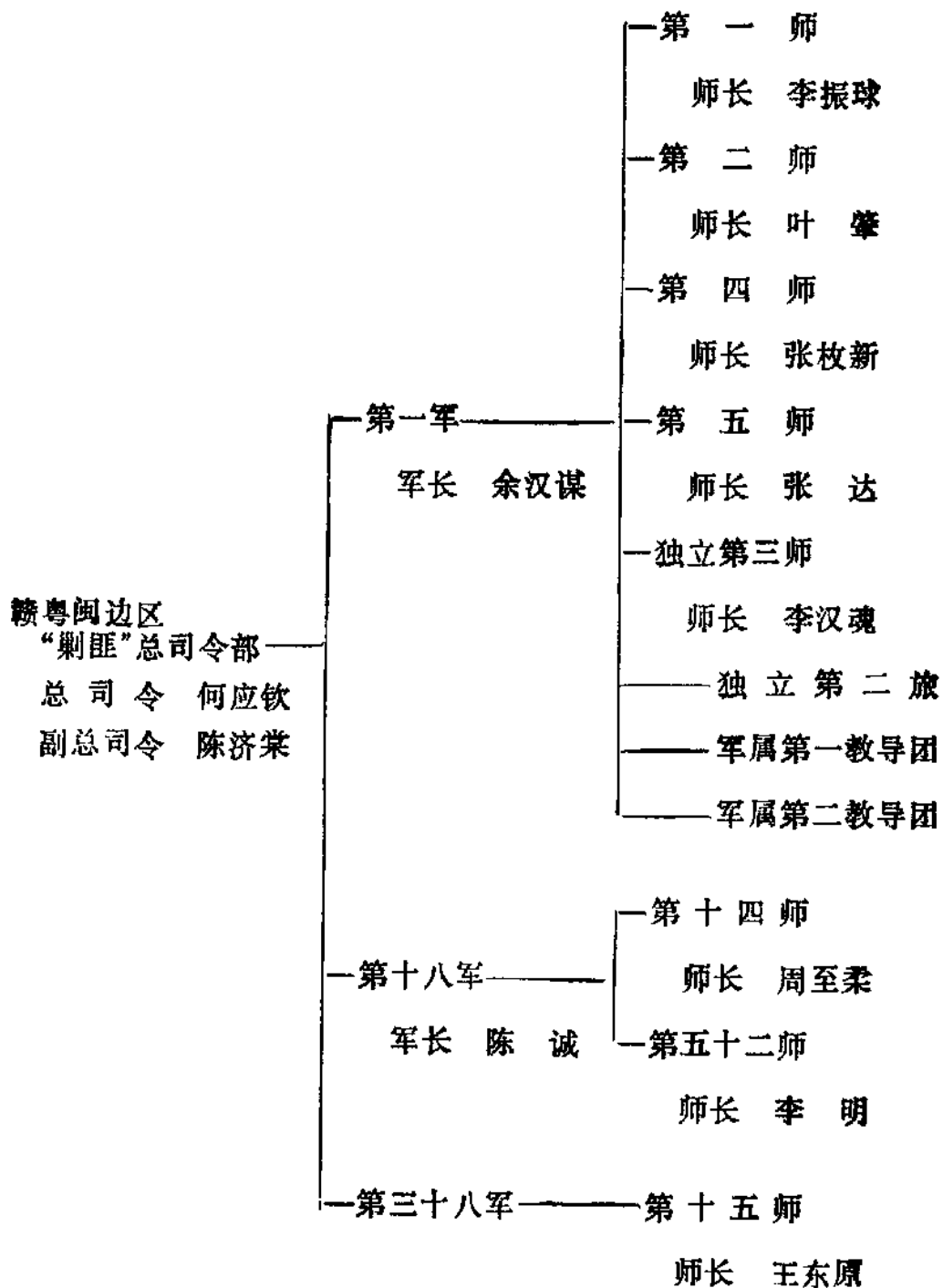
附表23

(1932年7月2日—10日)



# 红一方面军南雄、水口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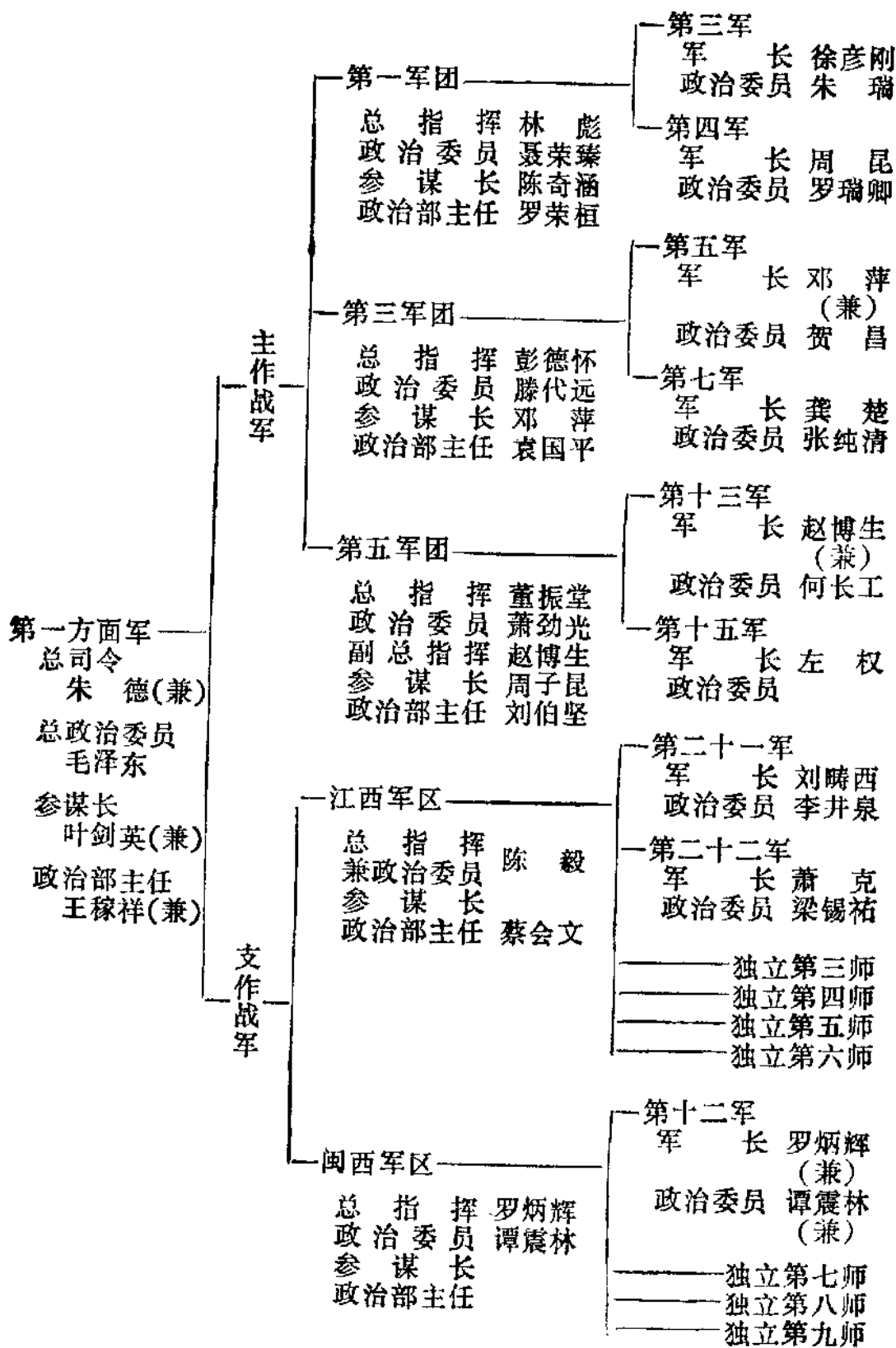
(1932年7月2日—10日)



# 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战斗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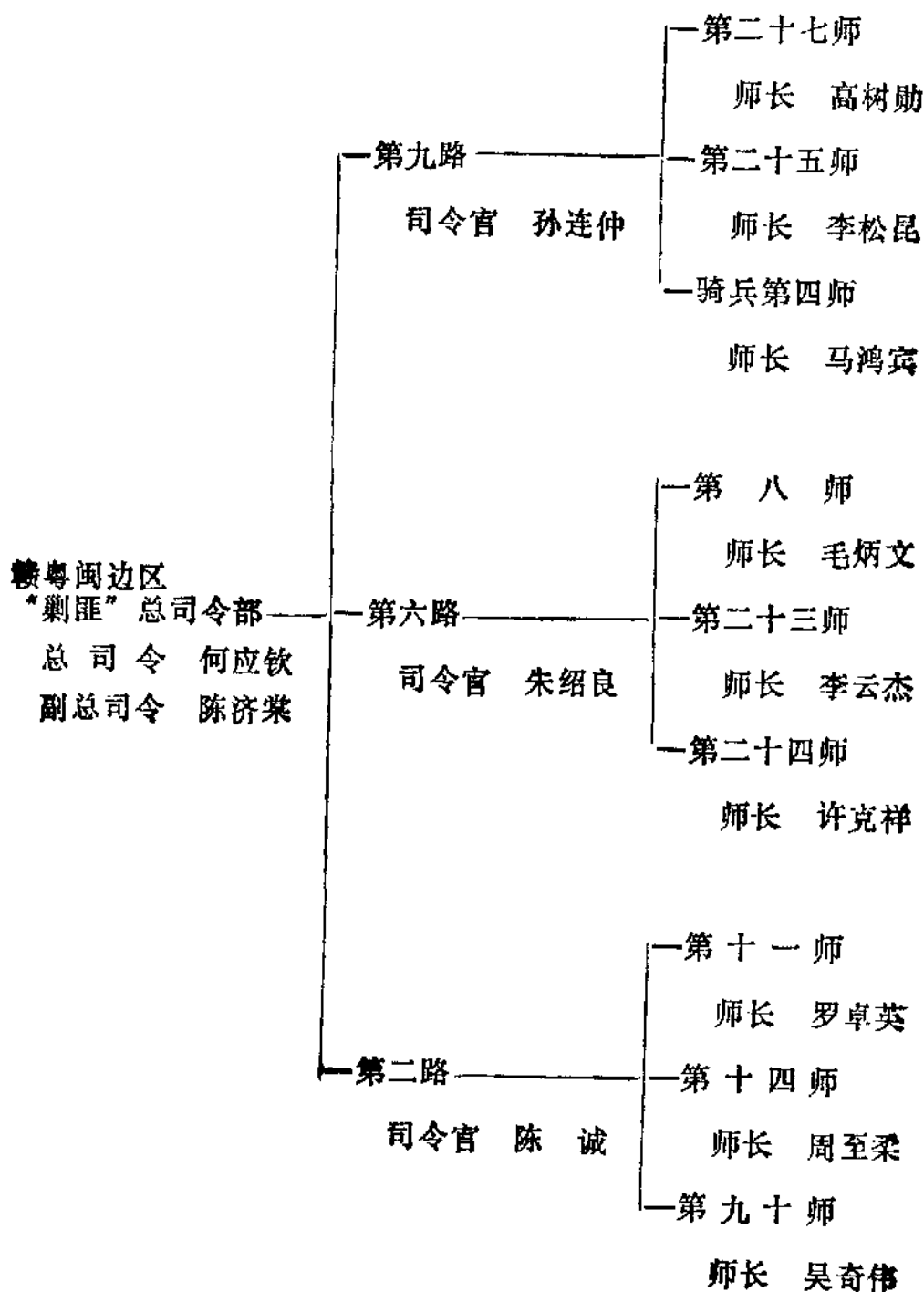
附表25

(1932年8月8日—9月5日)



# 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26

(1932年8月8日—9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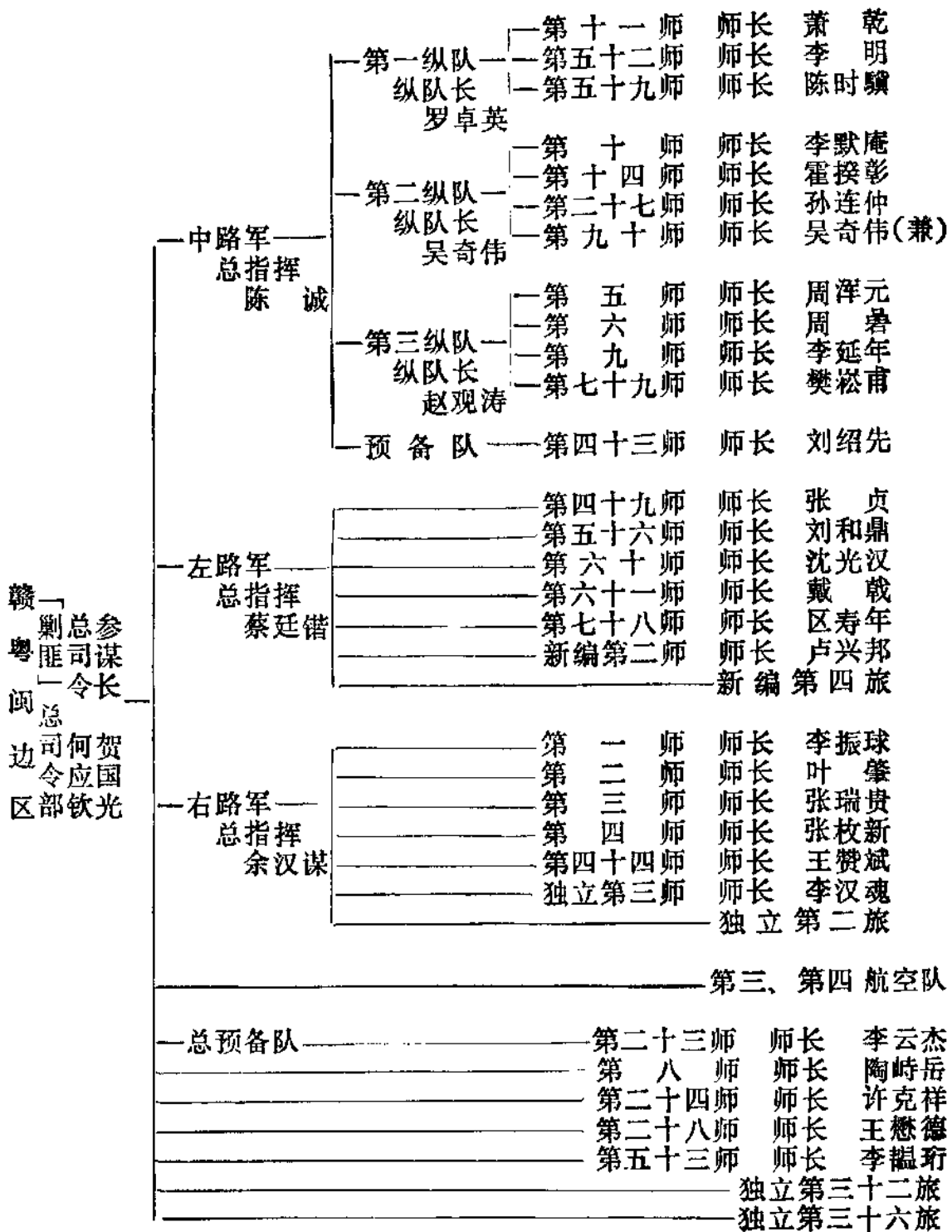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序列表 附表27

(1932年12月—1933年3月)

红一方面军	司令员 朱德(兼)	第一军团	军团长 林彪 政治委员 聂荣臻 参谋长 徐彦刚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七师 第九师 第十师 第十一师
	政治委员 周恩来	第三军团	军团长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滕代远 参谋长 邓萍 政治部主任 贺昌	第一师 第二师 第三师 第七军 政治委员 龚楚 张纯清
	参谋长 刘伯承(兼)	第五军团	军团长 董振堂 政治委员 朱瑞 参谋长 刘伯坚	第三十八师 第三十九师 第十五军 政治委员 左权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兼)	第十一军	军长 周建屏 政治委员 萧劲光	
		第十二军	军长 张宗逊 政治委员 黄甦	
		第二十一军	军长 寻淮洲 政治委员 李井泉	
		第二十二军	军长 罗炳辉 政治委员 蔡树藩	
		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		
		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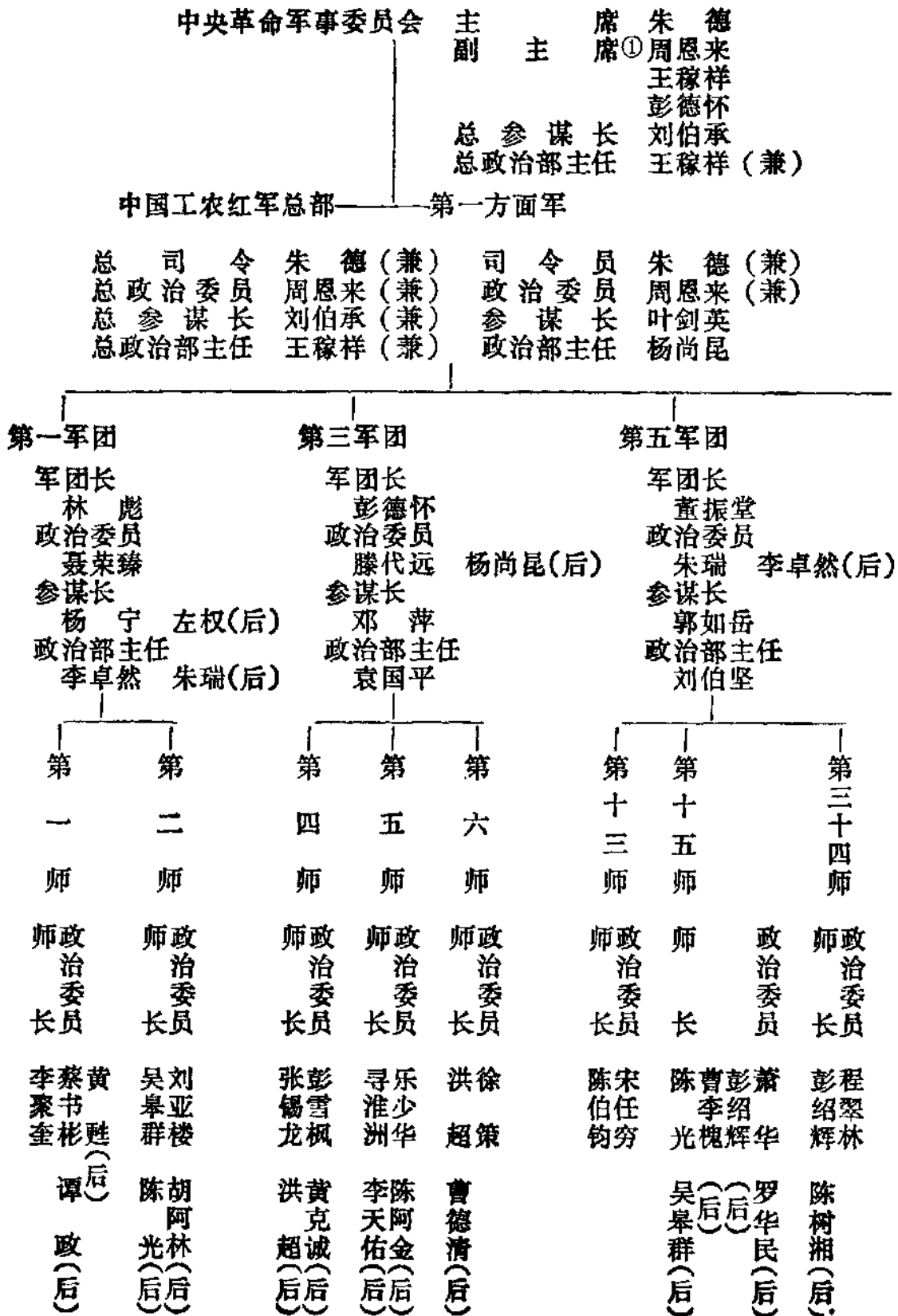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28

(1932年12月—1933年3月)



#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序列表 附表29(1)

(1933年9月—1934年10月)



(接上页第五军团后)

第七军团 (1933年10月成立)		第九军团 (1933年10月成立)		第八军团 (1934年9月成立)			
军团长 寻淮洲	政治委员 萧劲光	军团长 罗炳辉	政治委员 蔡树藩	军团长 周昆	政治委员 黄甦		
参谋长 郭如岳	乐少华(后)	参谋长 郭天民		参谋长 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 刘英(后)	粟裕(后)	政治部主任 蔡彬(后)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十九师	第二十师	第三师	第十四师 <sup>②</sup>	第二十一师	第二十三师	第二十二师	第二十四师
师长 周建屏	师长 吕振球	师长 张经武	师长 程子华	师长 周昆	师长 孙超群	师长 周子昆	师长 周建屏
政治委员 寻淮洲(后)	政治委员 粟开湘	政治委员 刘英	政治委员 朱良才	政治委员 黄甦(兼)	政治委员 李干辉	政治委员 黄开湘	政治委员 杨建英
		罗炳辉(后兼)	张宗逊(后)				

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先是王稼祥、彭德怀，1934年2月3日改组时，由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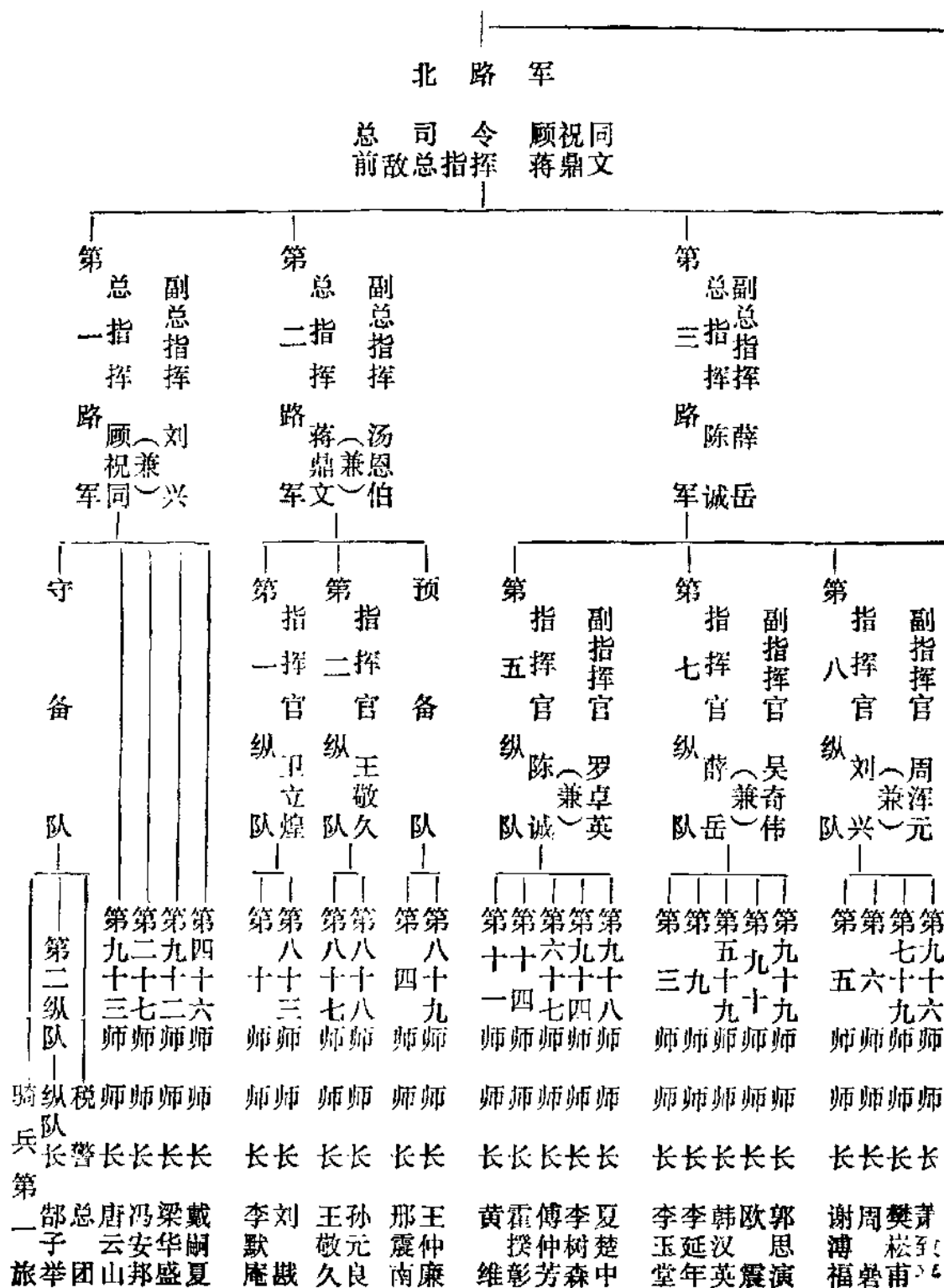
②第十四师于1934年春编散。

#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 附表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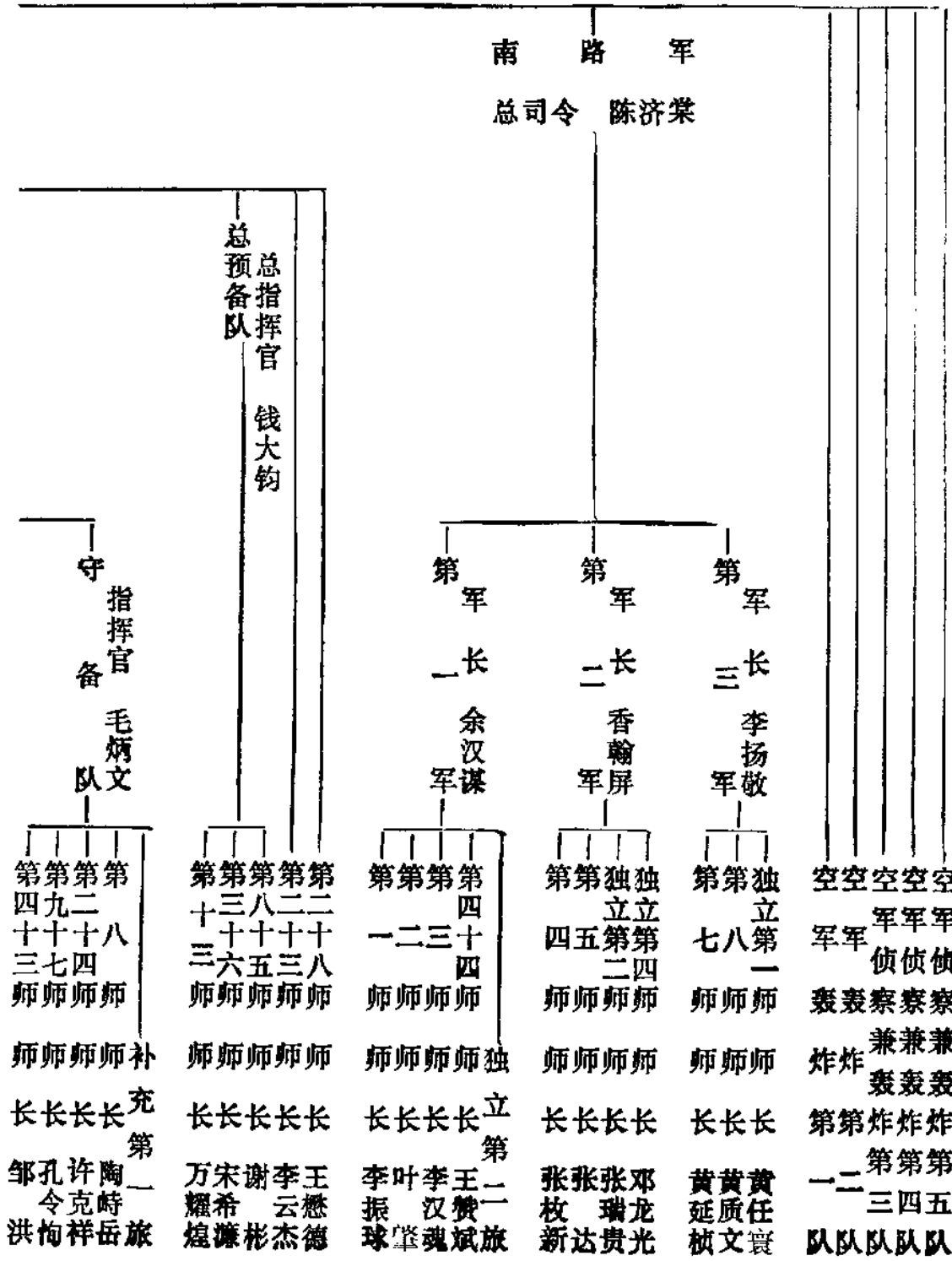
## 敌军战斗序列表(一)

(1933年9月—11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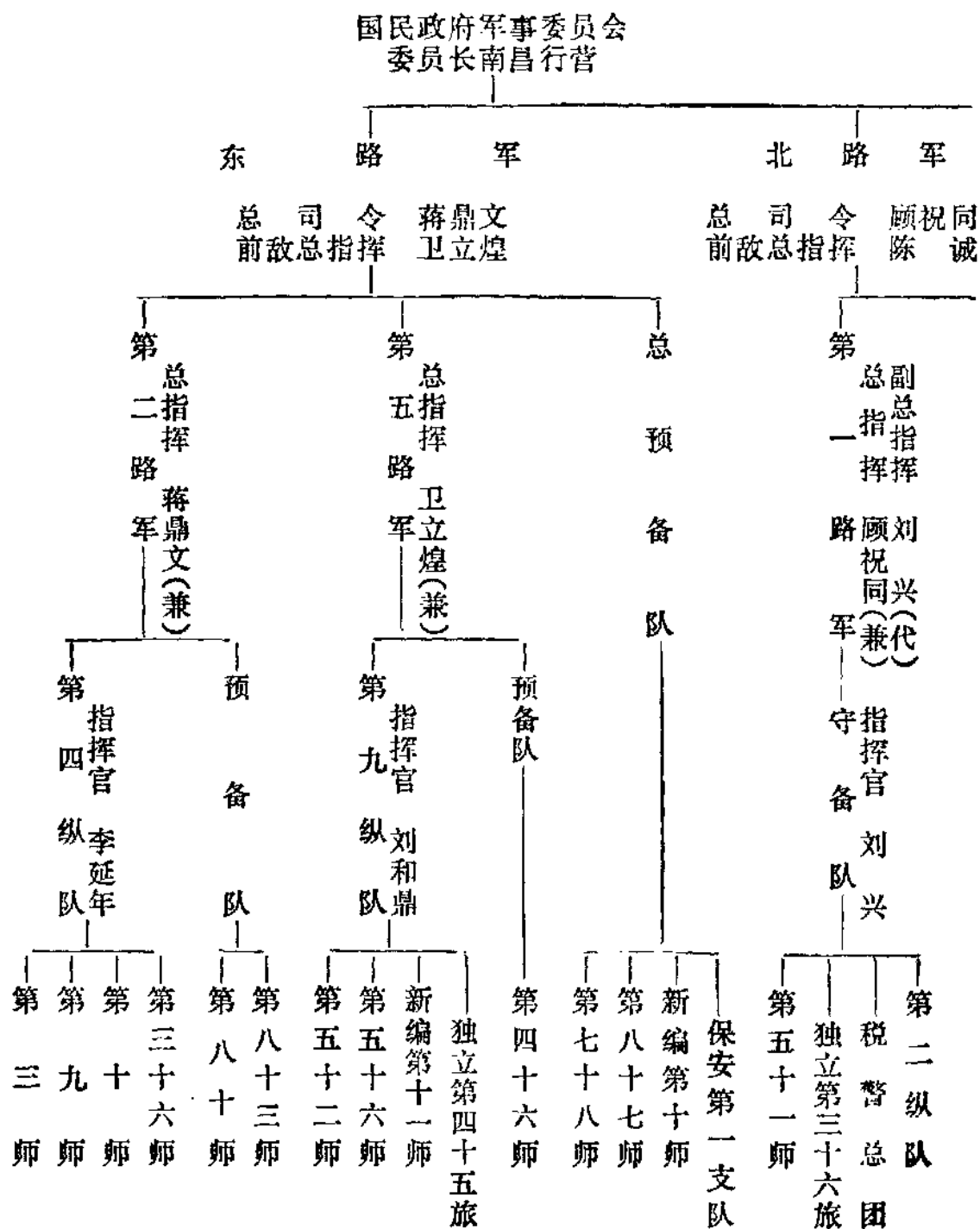
附表30 (2)



#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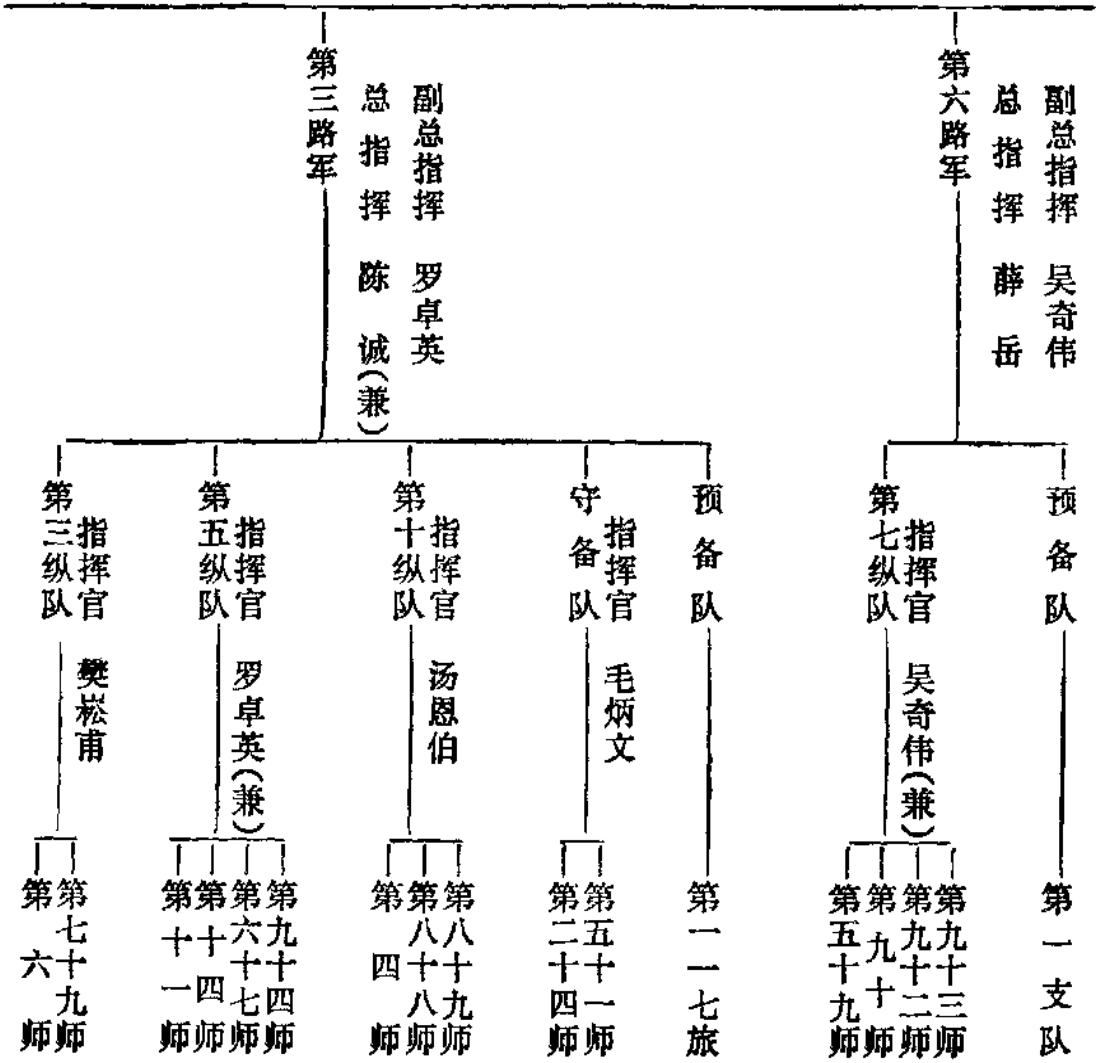
(1934年1月—10月)

附表31(1)



①1934年6月，敌东路军、北路军序列有部分调整。

附表31 (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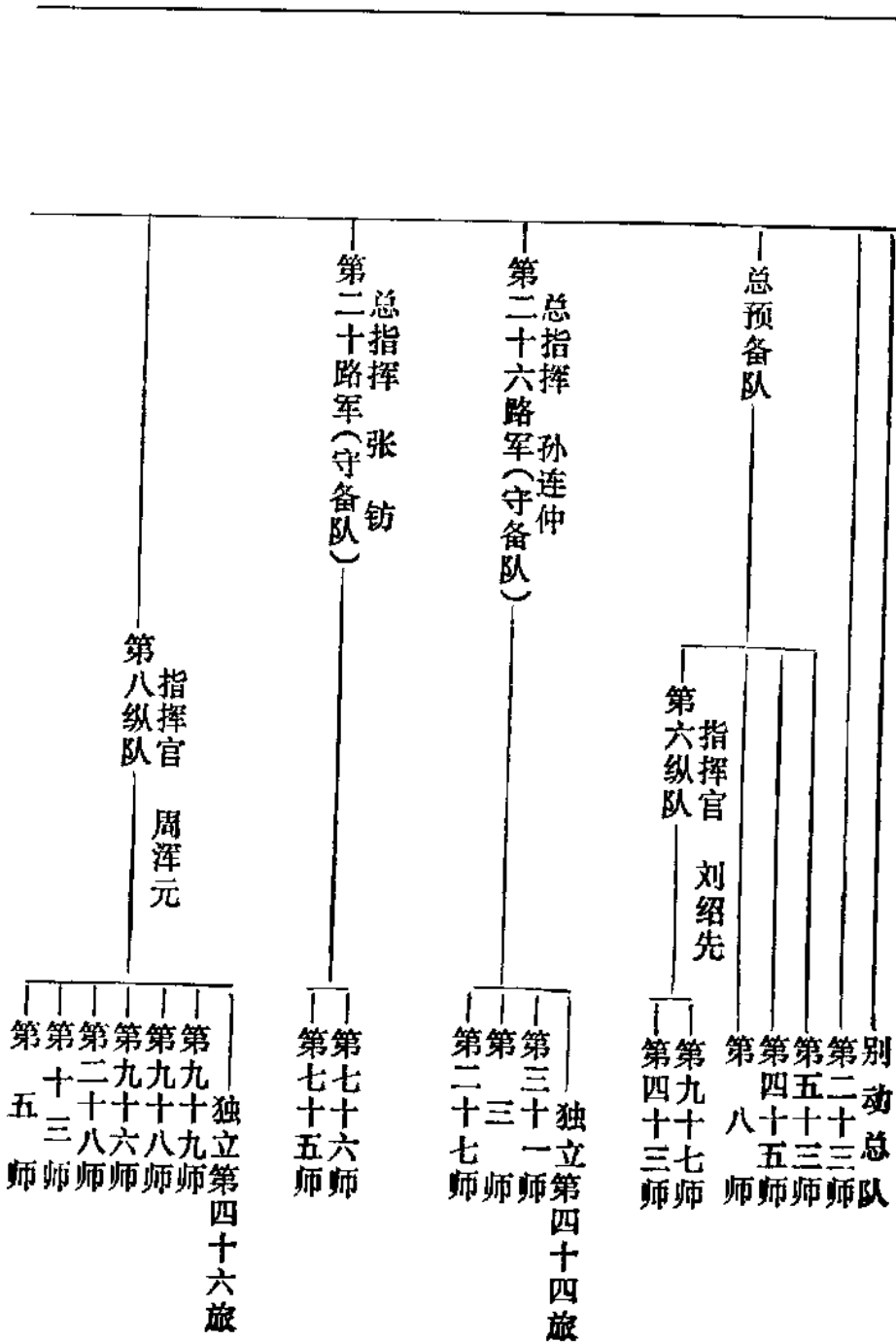




附表31 ( 3 )

空军 (同附表 30)

南路军 (同附表 30)



## 湘鄂西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序列表 附表32

(1932年7月—10月)

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三军 军长 贺龙 政治委员 关向应 参谋长 唐赤英 政治部主任 鲁易	—第七师	师长 王一鸣 政治委员 鲁易 (兼)	
	—第八师	师长 汤慕禹 政治委员 陈培荫	
	—第九师	师长 段德昌 政治委员 宋盘铭	
	—警卫师	师长 王主山 政治委员	罗统一 (后)
	—独立师 (九月组建)	师长 王炳南 政治委员 卢冬生	卢冬生 (后)

## 湘鄂西红三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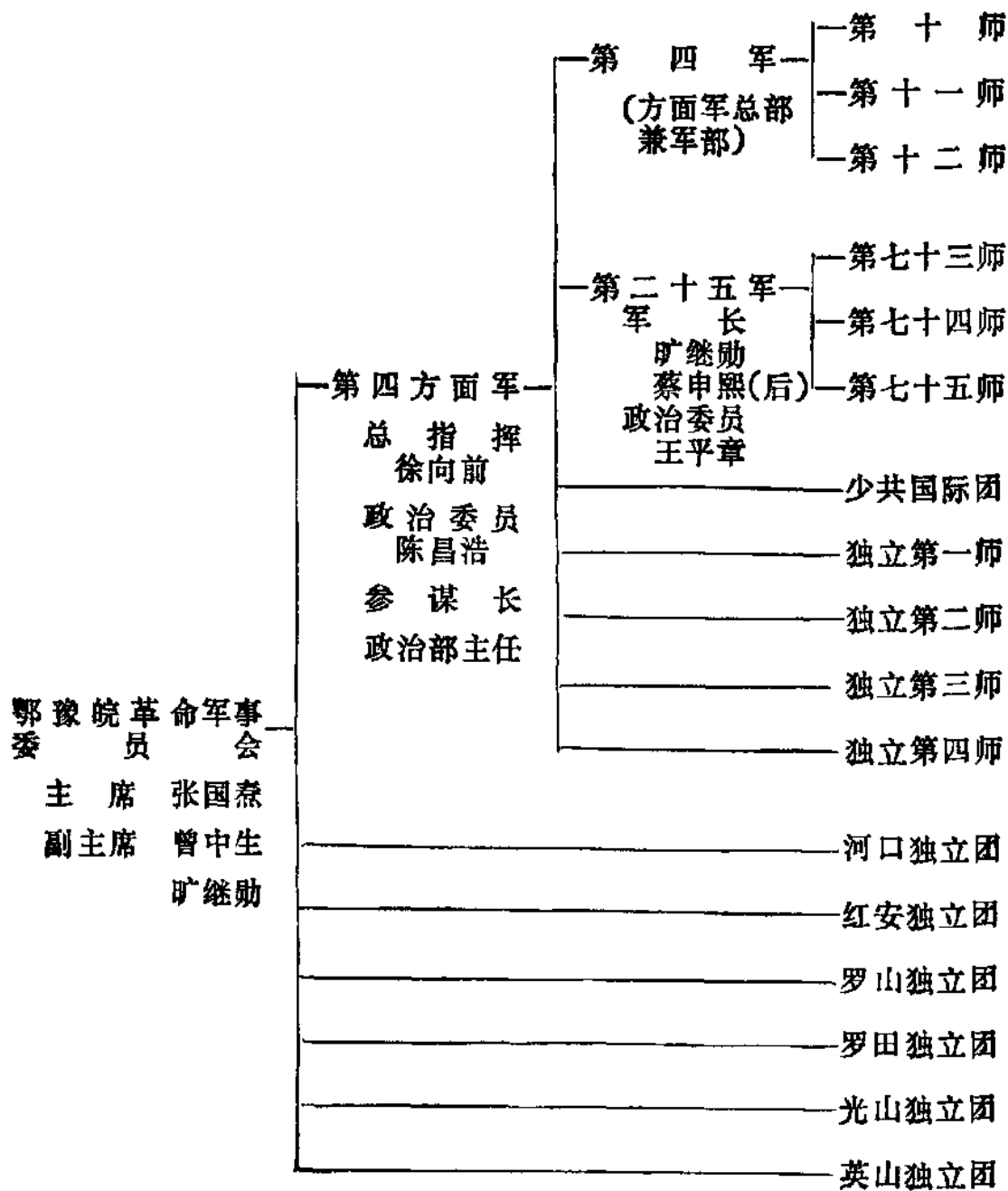
(1932年7月—10月)

附表33

豫鄂皖三省 “剿匪”军 左路军 司令官 何成濬 副司令官兼总指挥 徐源泉	—第十三师	师长 万耀煌
	—第十九师	师长 李觉
	—第三十三师	师长 冯兴贤
	—第三十四师	师长 张万信
	—第四十一师	师长 张振汉
	—第四十四师	师长 萧之楚
	—第四十八师	师长 徐源泉 (兼)
	—第五十一师	师长 范石生
	—第八十二师	师长 容景芳
		新编第三旅
		独立第三十四旅
		独立第三十七旅
		独立第三十八旅
	长江上游“剿匪” 总指挥部 (属川军第二十一军) 代总指挥 王陵基	—第三师
	—第四师	师长 范绍增
	—教导师	师长 潘文华

# 紅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序列表 附表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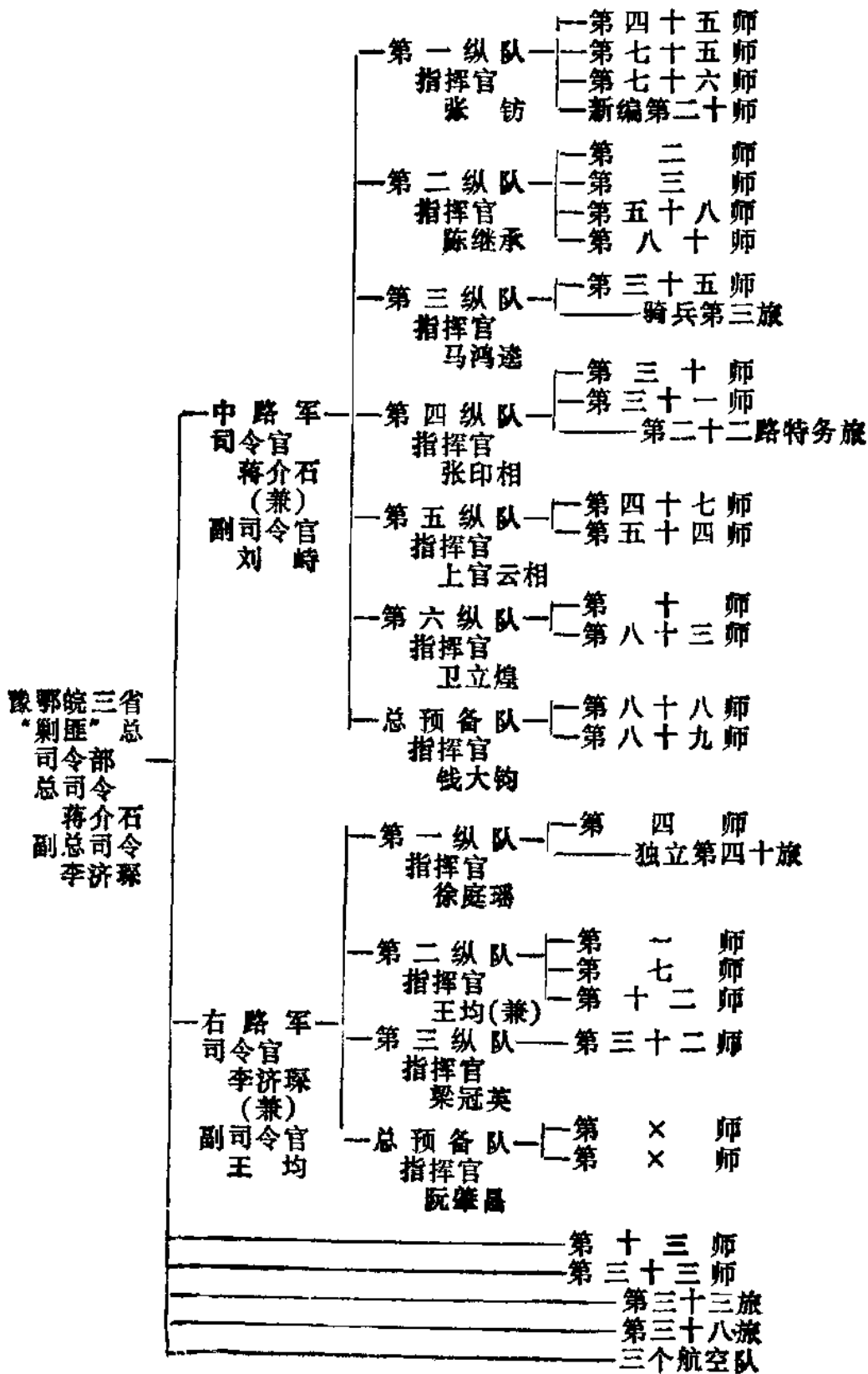
(1932年8月10日—10月10日)



# 紅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1932年8月10日—10月10日)

附表35



# 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战斗序列表

附表36

(1933年2月中旬—6月中旬)

##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张国焘

副主席 陈昌浩

徐向前

参谋长 曾中生

## 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

第十师  
师长 王宏坤  
政治委员 周纯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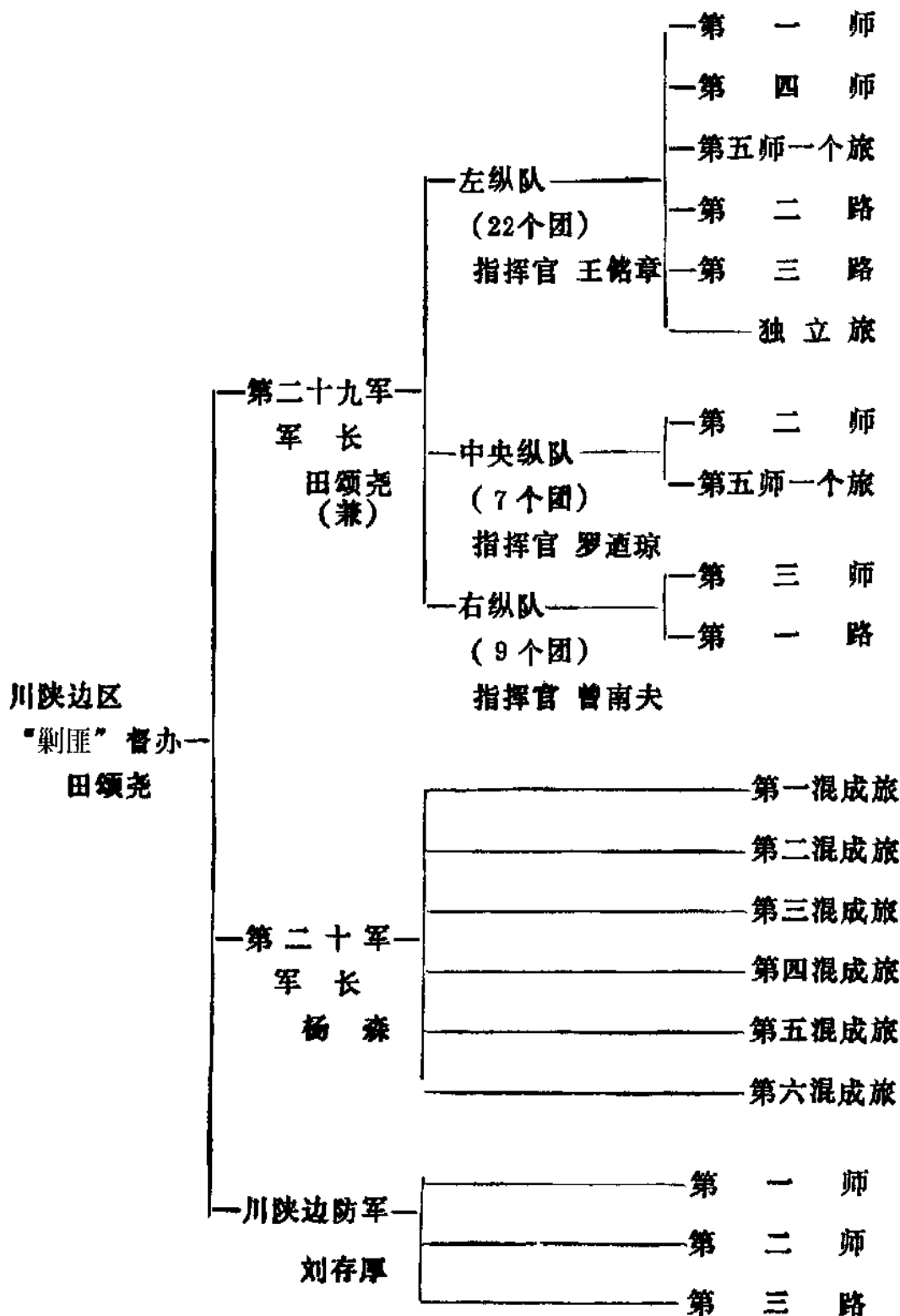
第十一师  
师长 倪志亮  
政治委员 李先念

第十二师  
师长 旷继勋  
政治委员 甘元景

第七十三师  
师长 王树声  
政治委员 张广才

# 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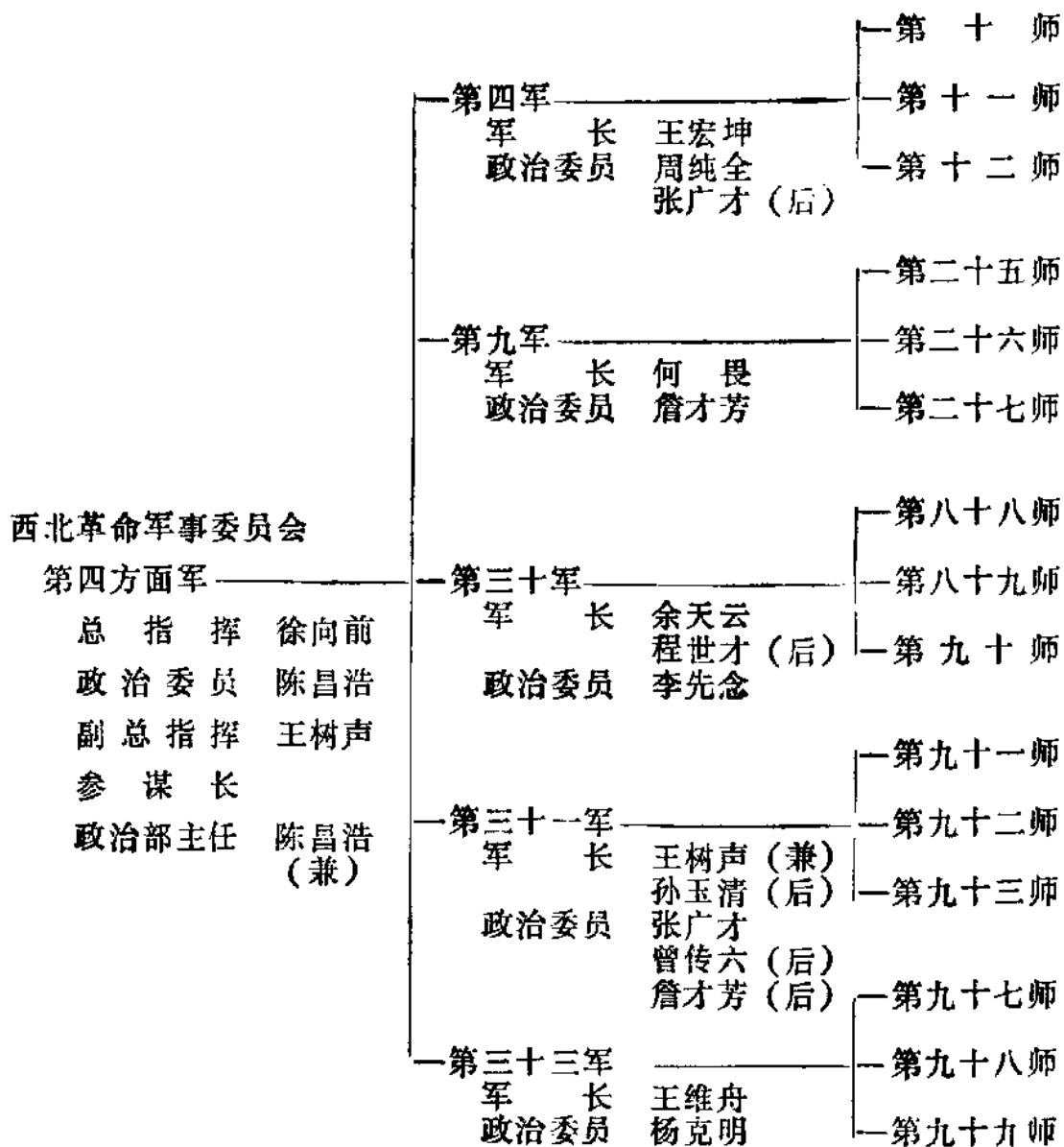
(1933年2月中旬—6月中旬)



#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斗序列表

附表38

(1933年11月1日—1934年9月22日)



#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39

(1933年11月1日—1934年9月22日)

四川“剿匪” 总司令部 总司令 刘 湘	第一路 (第二十八军18个团) 总指挥官 邓锡侯	— 第 一 旅 — 第 二 旅 — 第 四 旅 — 第 五 旅 — 第 X 旅
	第二路 (第二十九军24个团) 总指挥官 田頌尧	— 第 二 师 — 第 四 师 — 独 立 师 — 第 X 旅 — 第 X 旅
	第三路 (15个团) 总指挥官 李家钰 副总指挥官 罗泽州	— 新 编 第 六 师 — 第 二 十 三 师
	第四路 (第二十军12个团) 总指挥官 杨 森	— 第 一 混 成 旅 — 第 三 混 成 旅 — 第 四 混 成 旅 — 第 五 混 成 旅
	第五路 (第二十一军24个团, 后增至80余团) 总指挥官 王陵基 唐式遵 (后)	— 第 一 师 — 第 二 师 — 第 三 师 — 第 四 师 — 独 立 第 一 旅 — 独 立 第 二 旅 — 第 一 纵 队 — 独 立 第 二 团
	第六路 (第二十三军12个团) 总指挥官 刘邦俊	— 第 一 师 — 第 二 师 — 第 X 旅 — 第 X 旅
	— 预备队 总指挥官 潘文华	— 教 导 师 — 暂 编 第 二 师
	— 航空第一队 — 航空第二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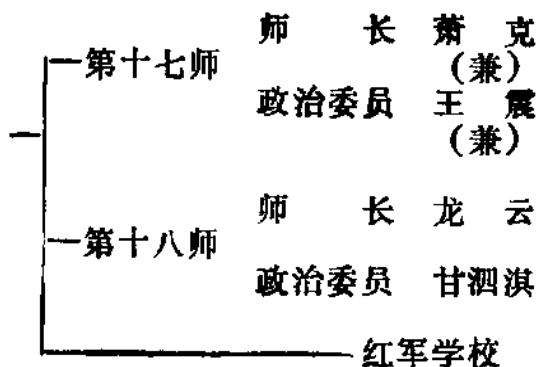
# 红六军团西征时战斗序列表

附表40

(1934年8月—10月)

第六军团  
军政委员会

主席 任弼时  
军团长 萧克  
政治委员 王震  
参谋长 李达  
政治部主任 张子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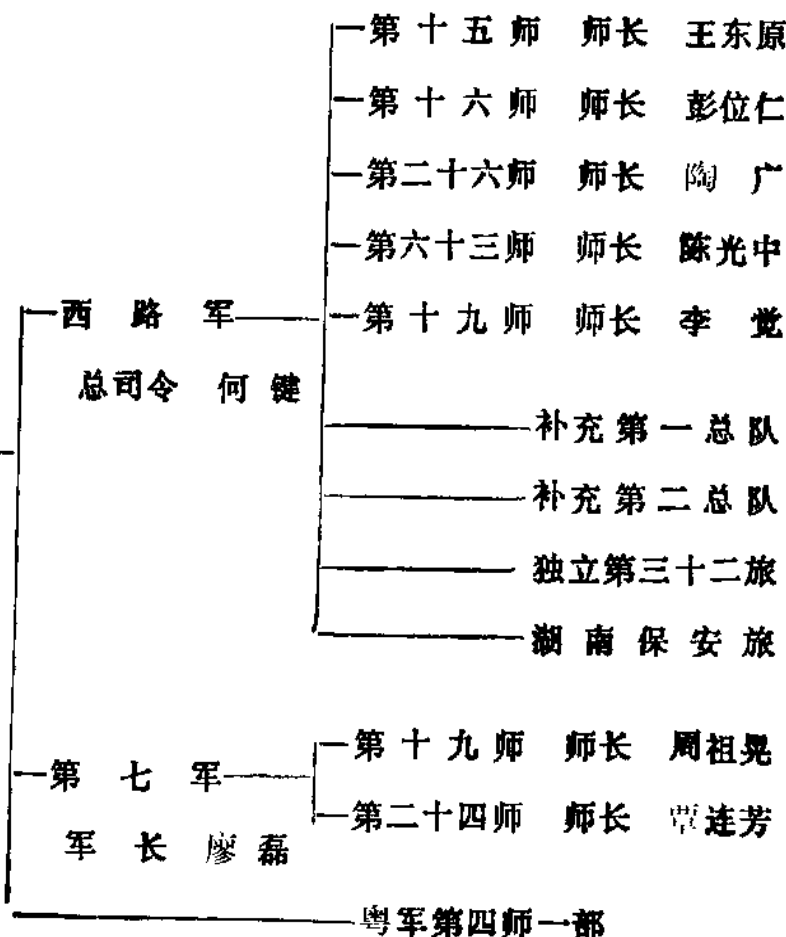


# 红六军团西征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41

(1934年年8月—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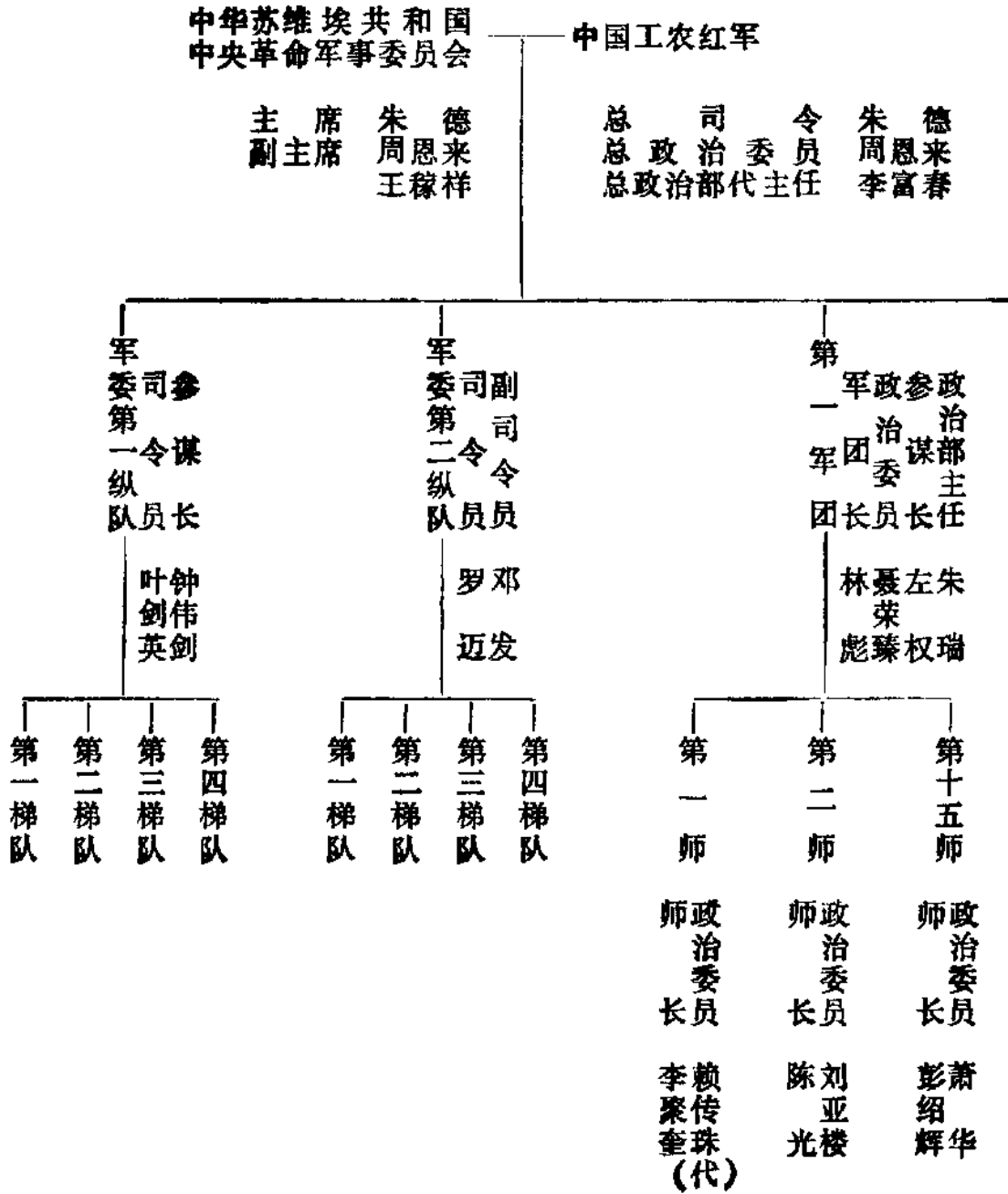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南昌行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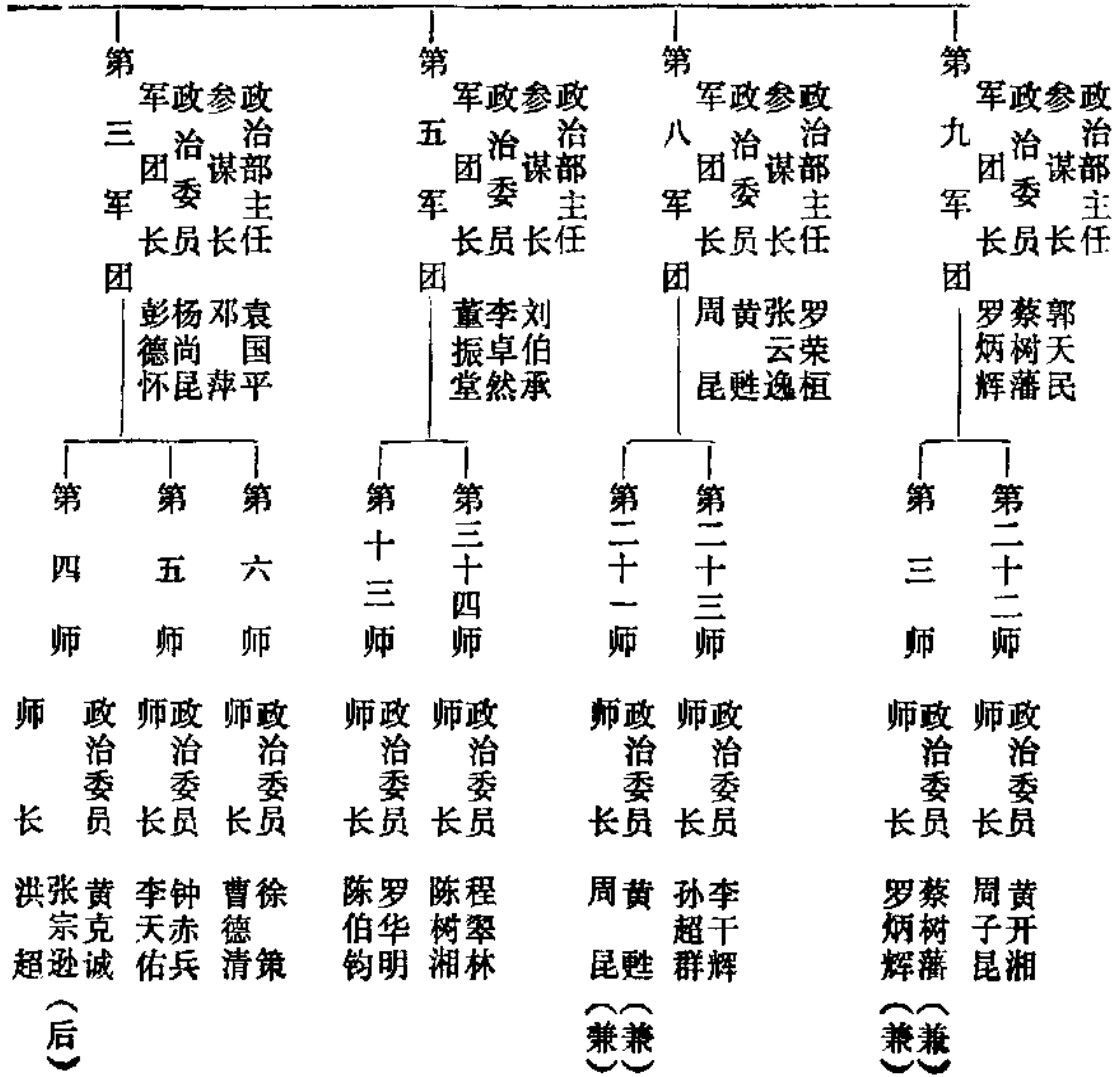
#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突破四道封锁线 附表42(1)

## 战斗序列表

(1934年10月10日—12月1日)



附表4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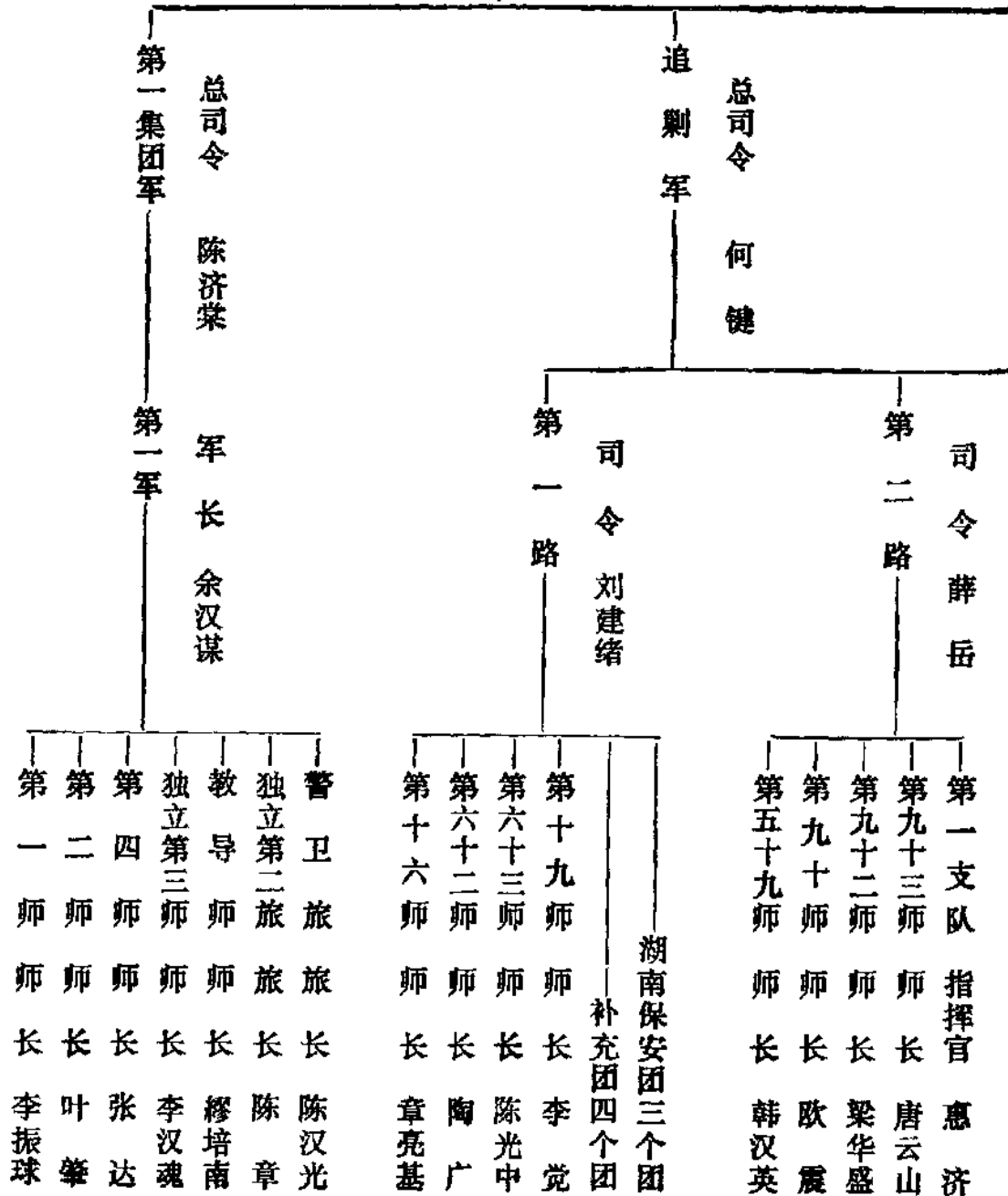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突破四道封锁 附表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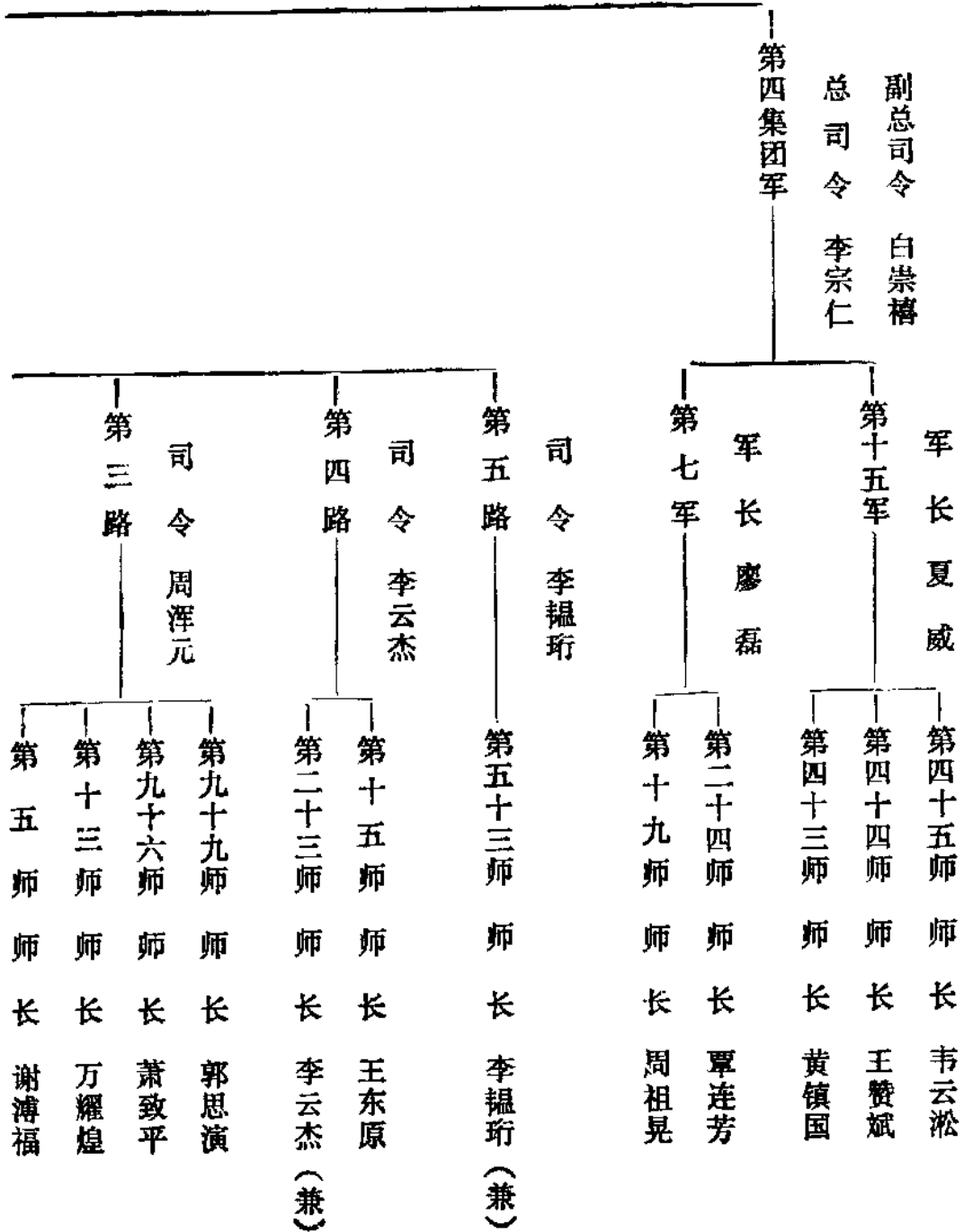
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1934年10月10日—12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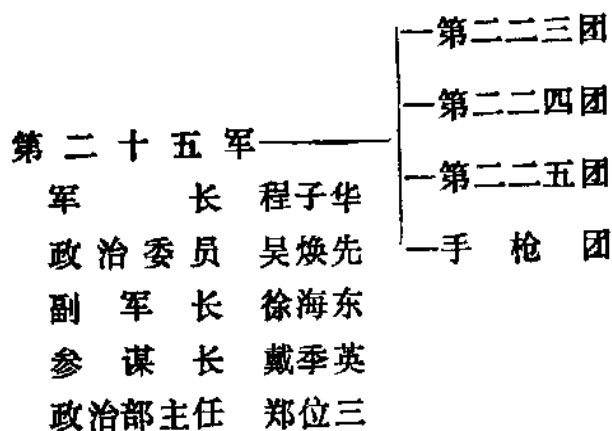
附表43 (2)



# 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战斗序列表

附表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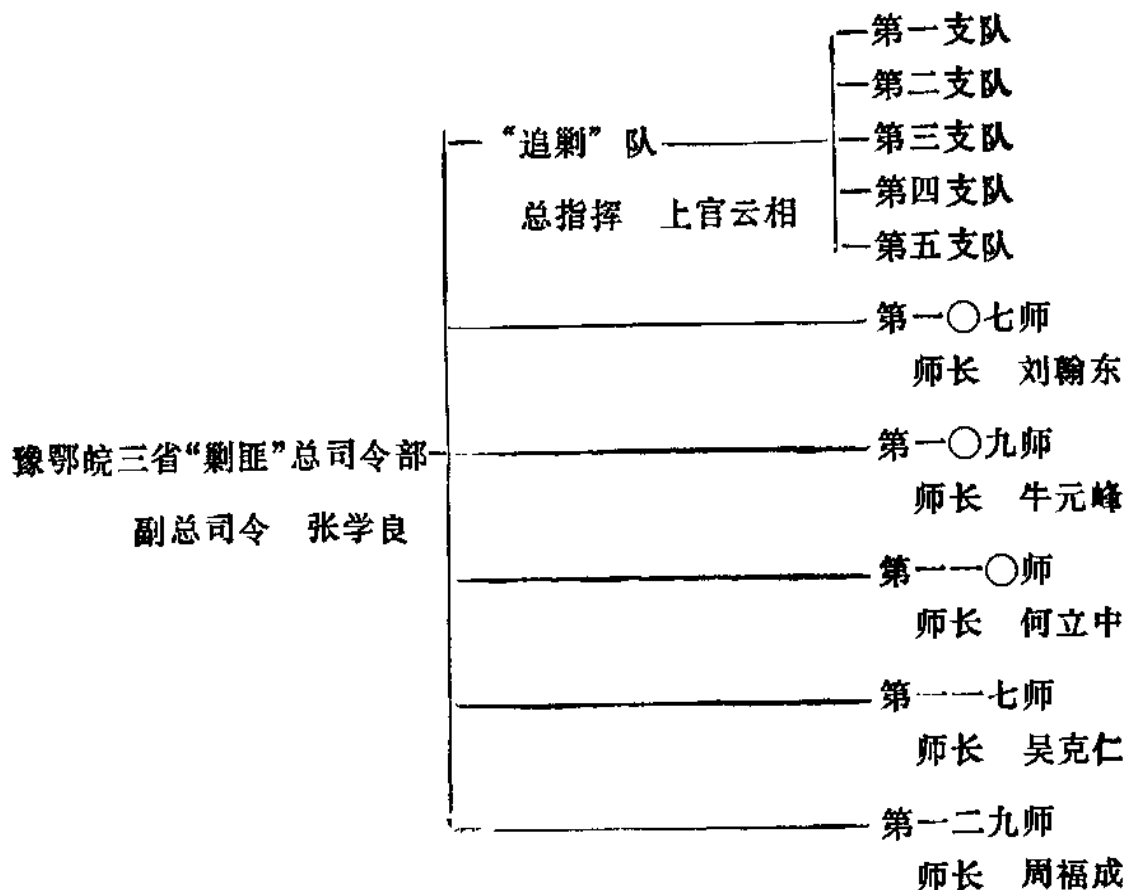
(1934年11月)



# 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 45

(1934年11月)



#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战斗序列表

附表46

(1935年1月19日—5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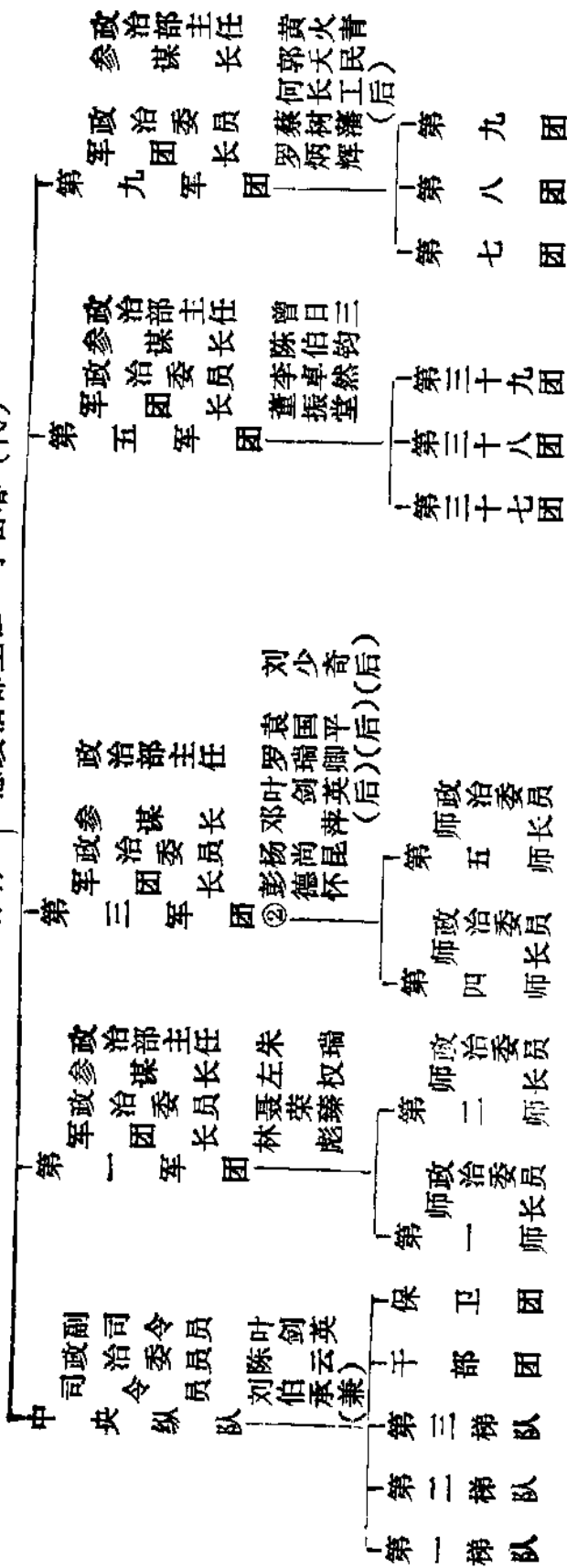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朱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①

司令员 朱德  
副司令员 周恩来  
政治委员 刘伯承  
参谋长 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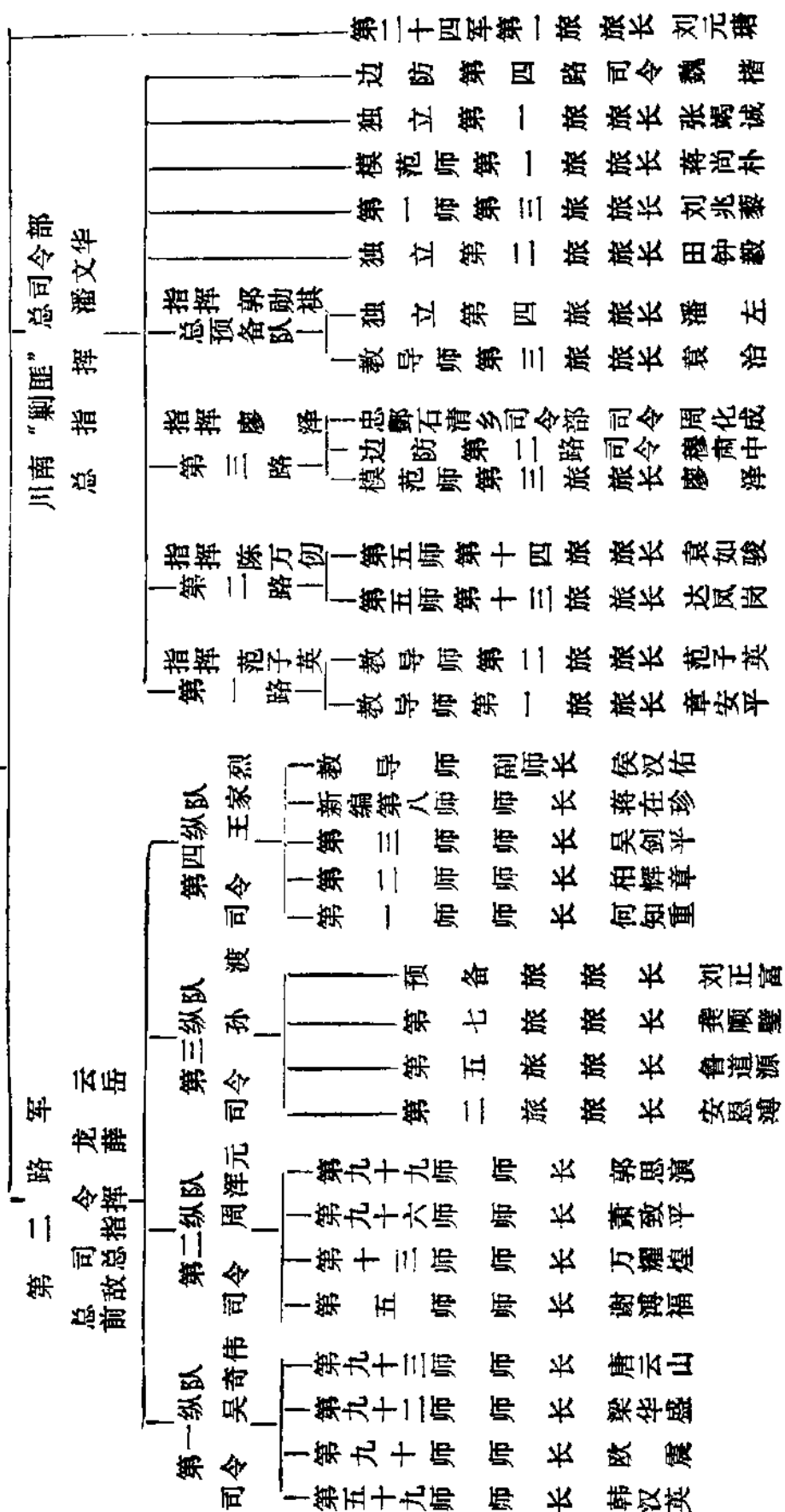
①当时实际指挥红军作战的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  
②2月初，第三军团之第四、第五师番号撤销，军团直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团。

#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47

(1935年1月19日—5月9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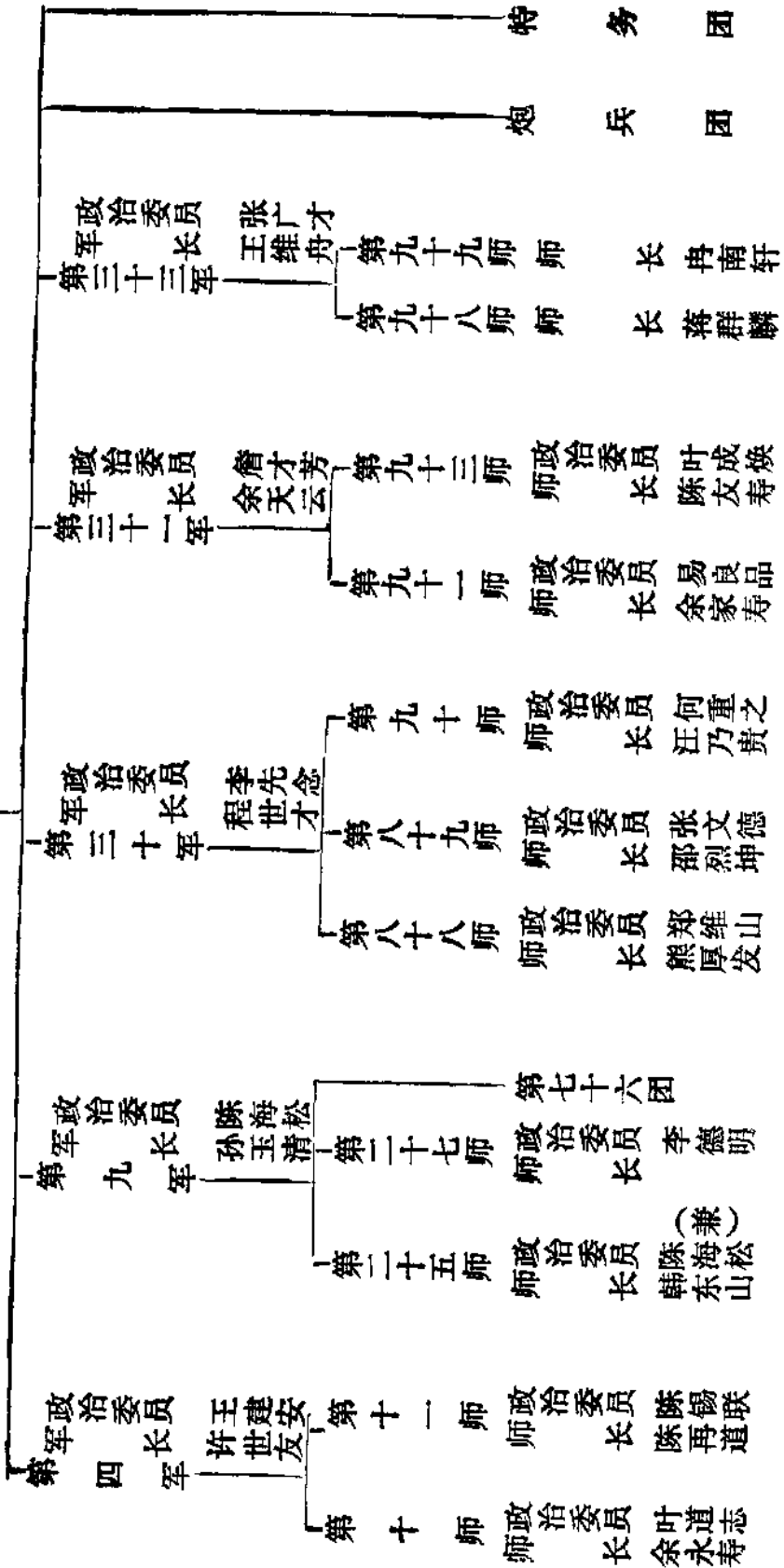


# 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战斗序列表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

附表48

##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方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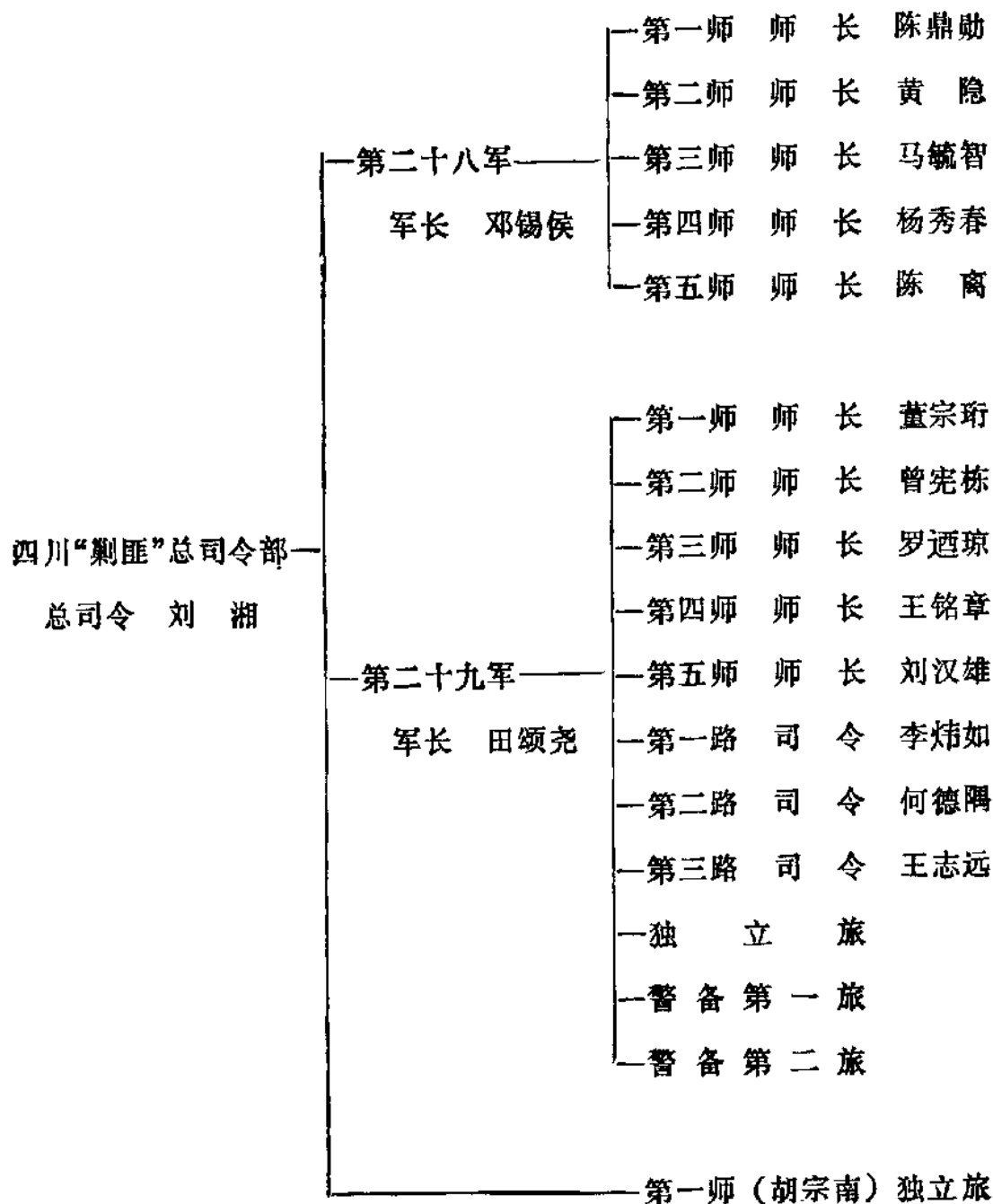
主席 张 国 焘  
副主席 陈 昌 浩  
总指挥 徐 向 前  
副总指挥 王 树 声  
政治委员 陈 昌 浩  
政治委员 徐 向 前



# 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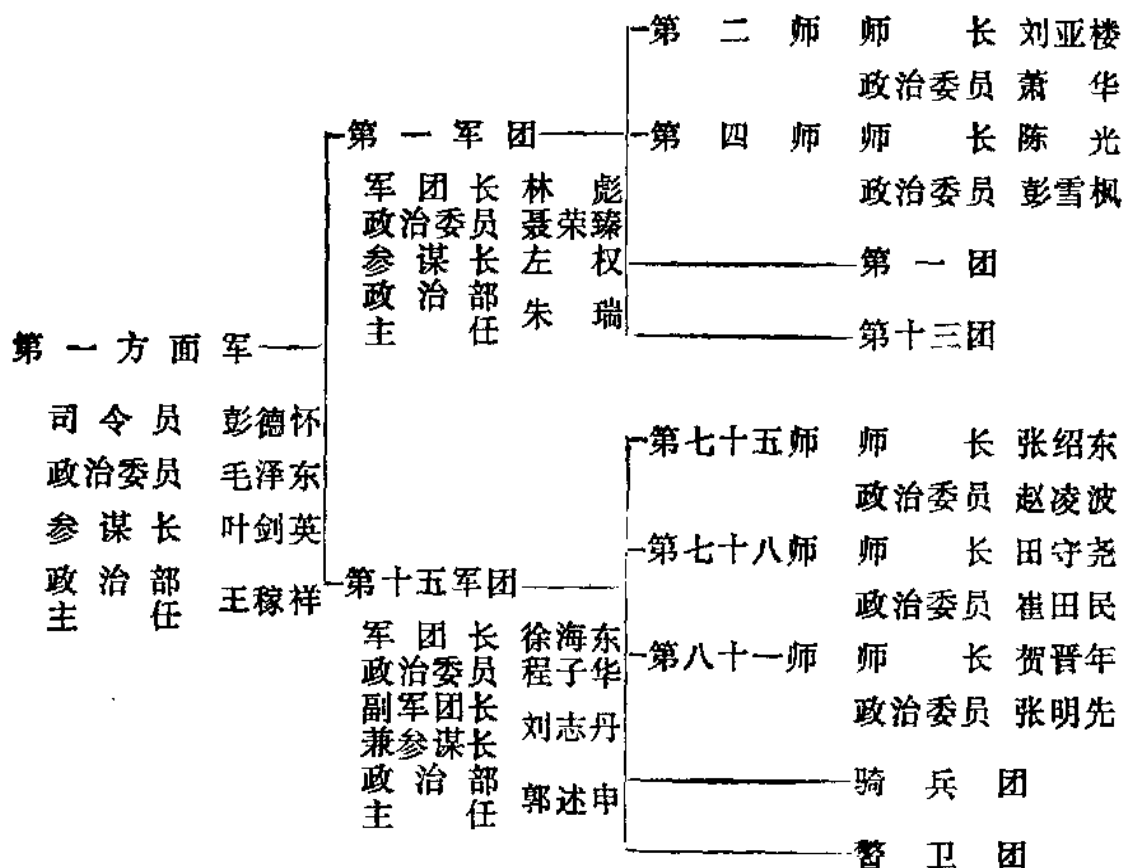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



# 红一方面军直罗镇战役战斗序列表

附表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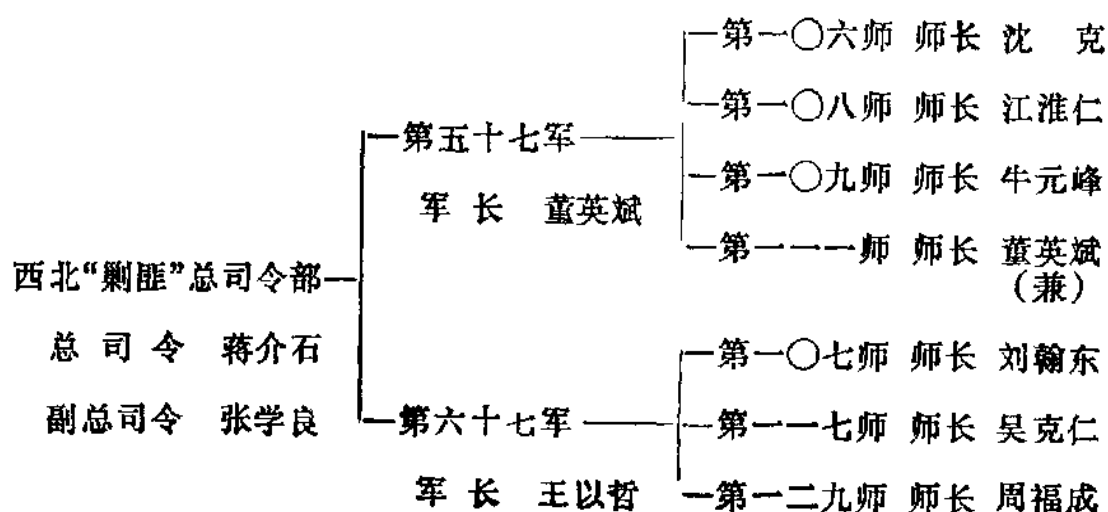
(1935年11月21日—24日)



# 红一方面军直罗镇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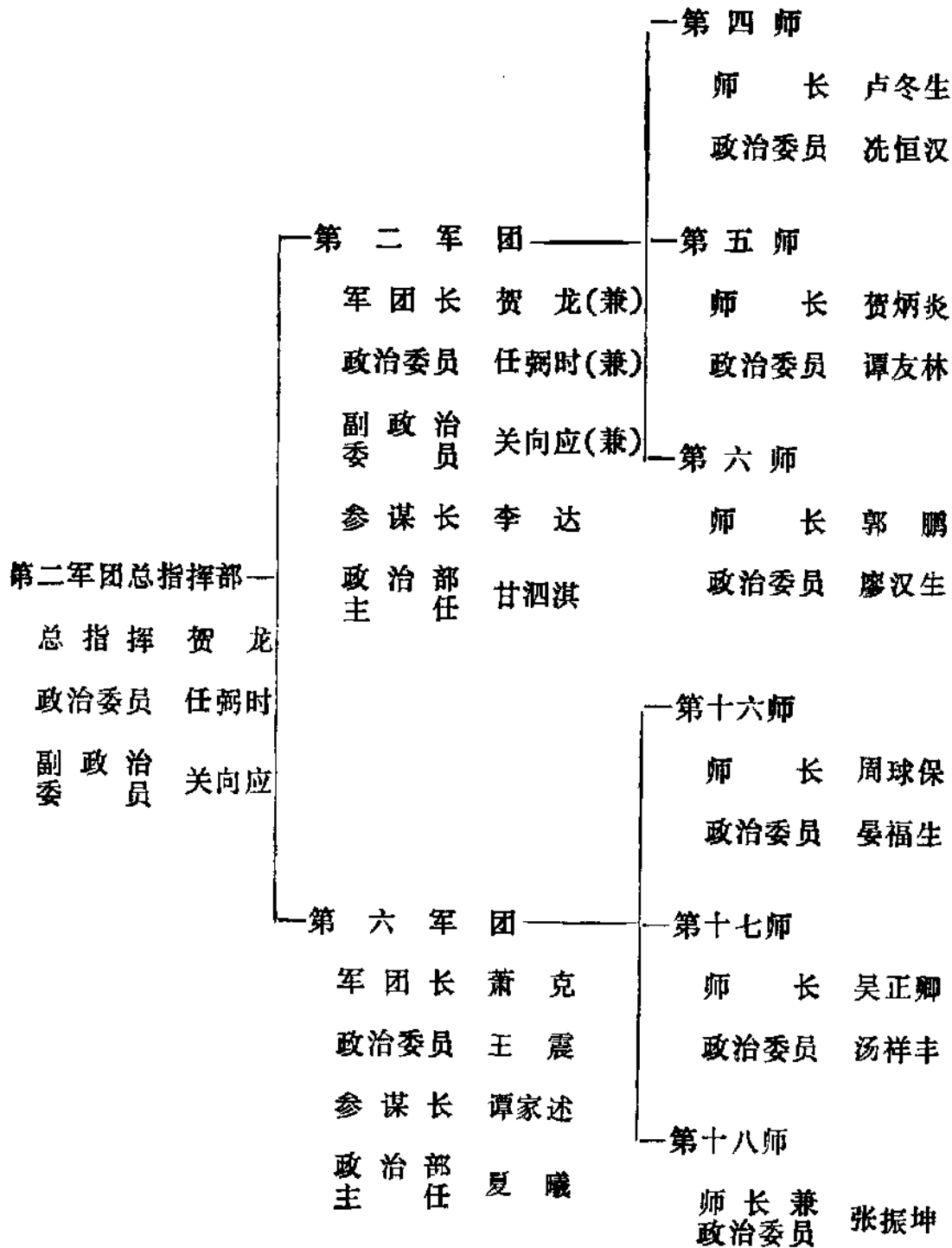
(1935年11月21日—24日)



#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时战斗序列表

附表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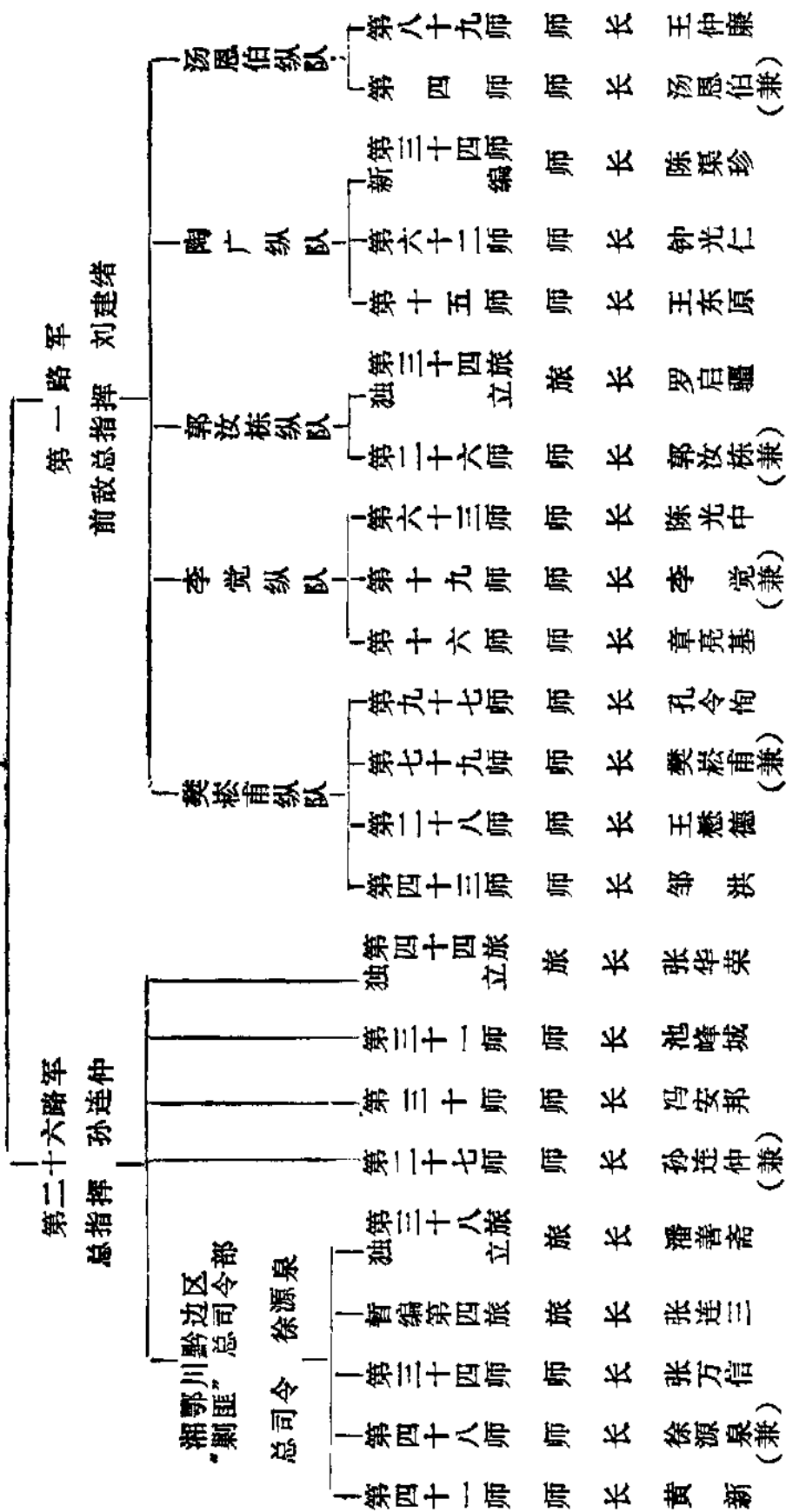
(1935年11月)



#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1935年11月)

附表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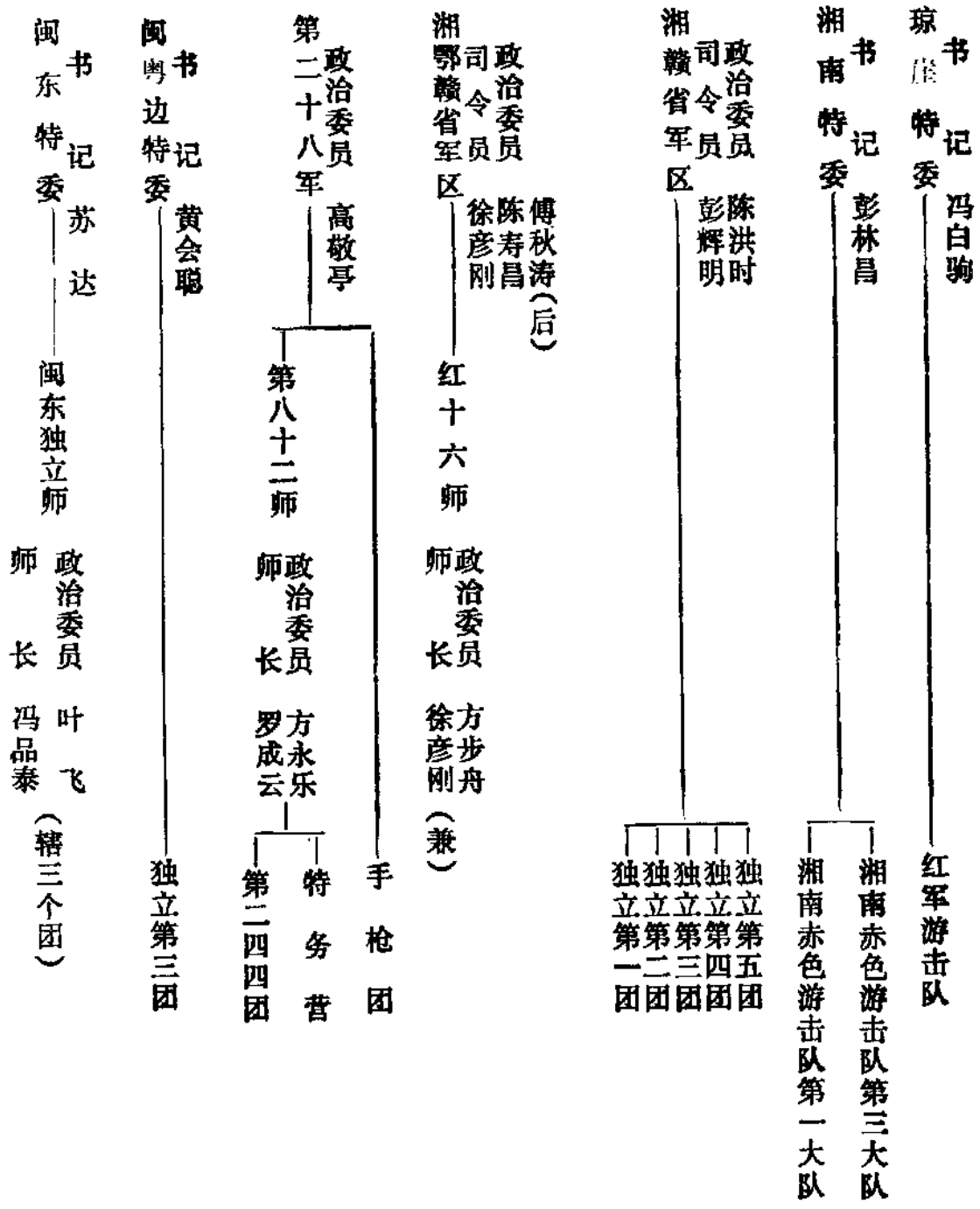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宣 宣 宣 行 行 行 报







附表54 (3)





#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初期敌军对 各苏区“清剿”指挥系统表

附表5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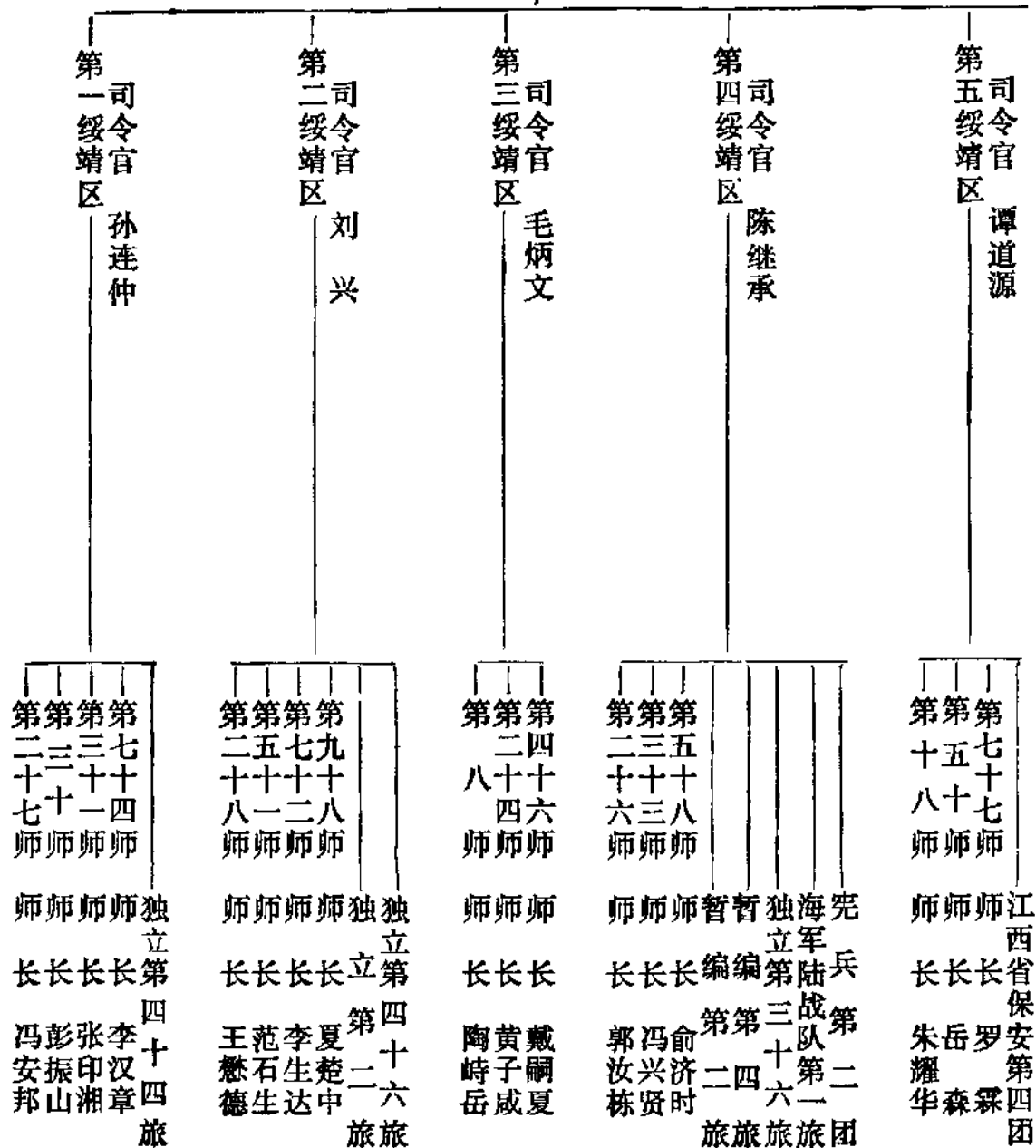
(1934年10月—1935年3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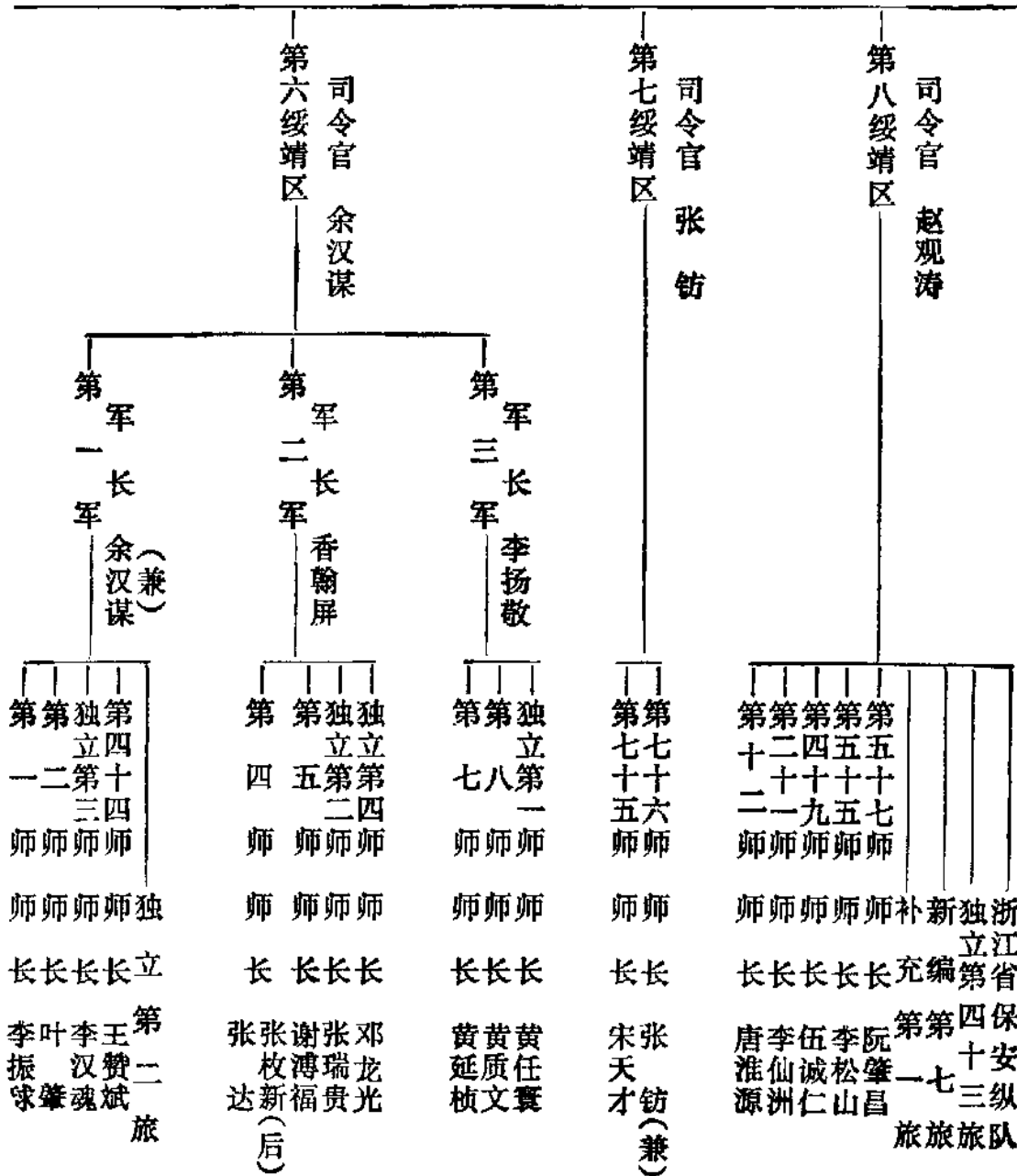
委员长 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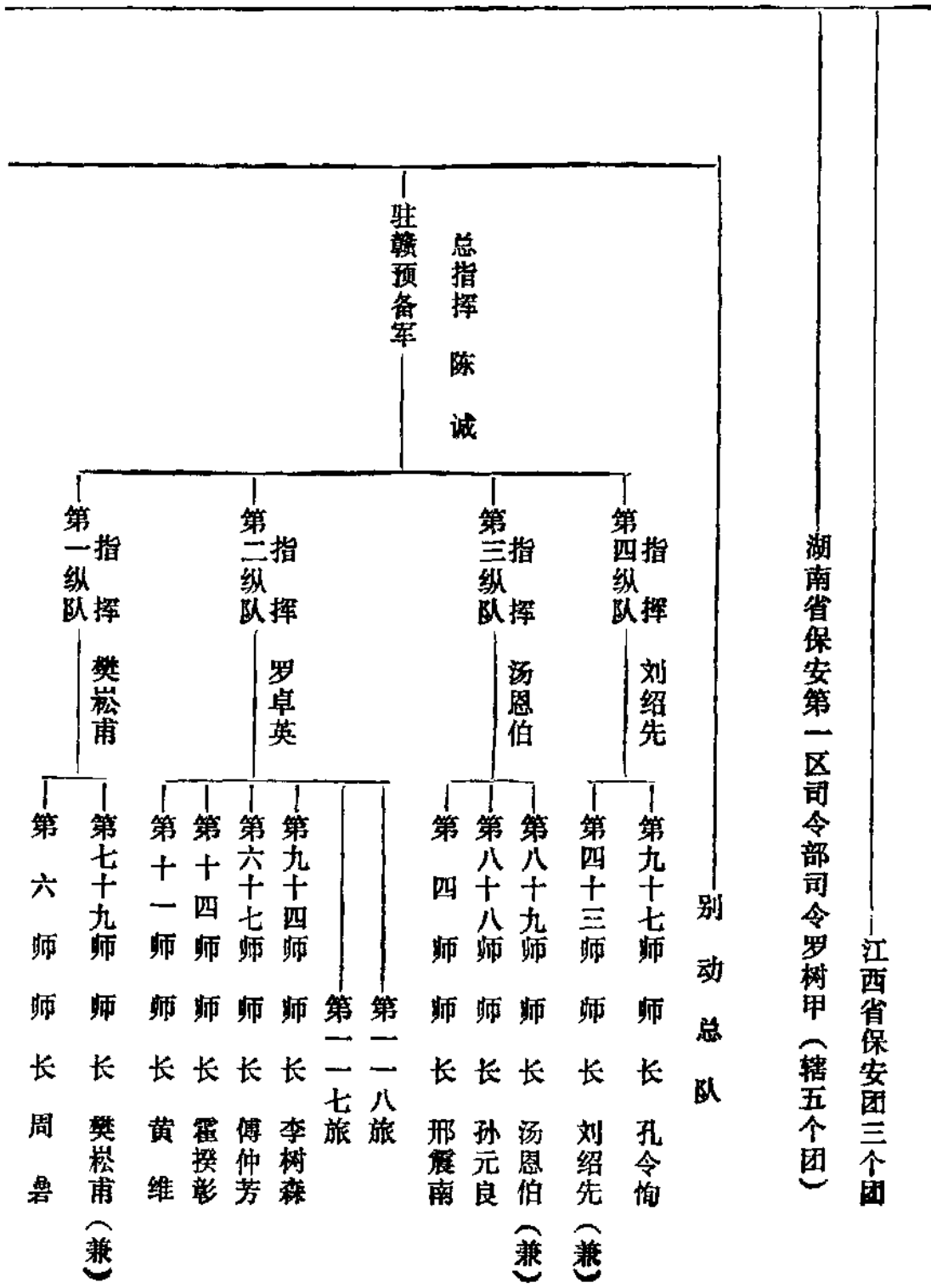
驻赣绥靖公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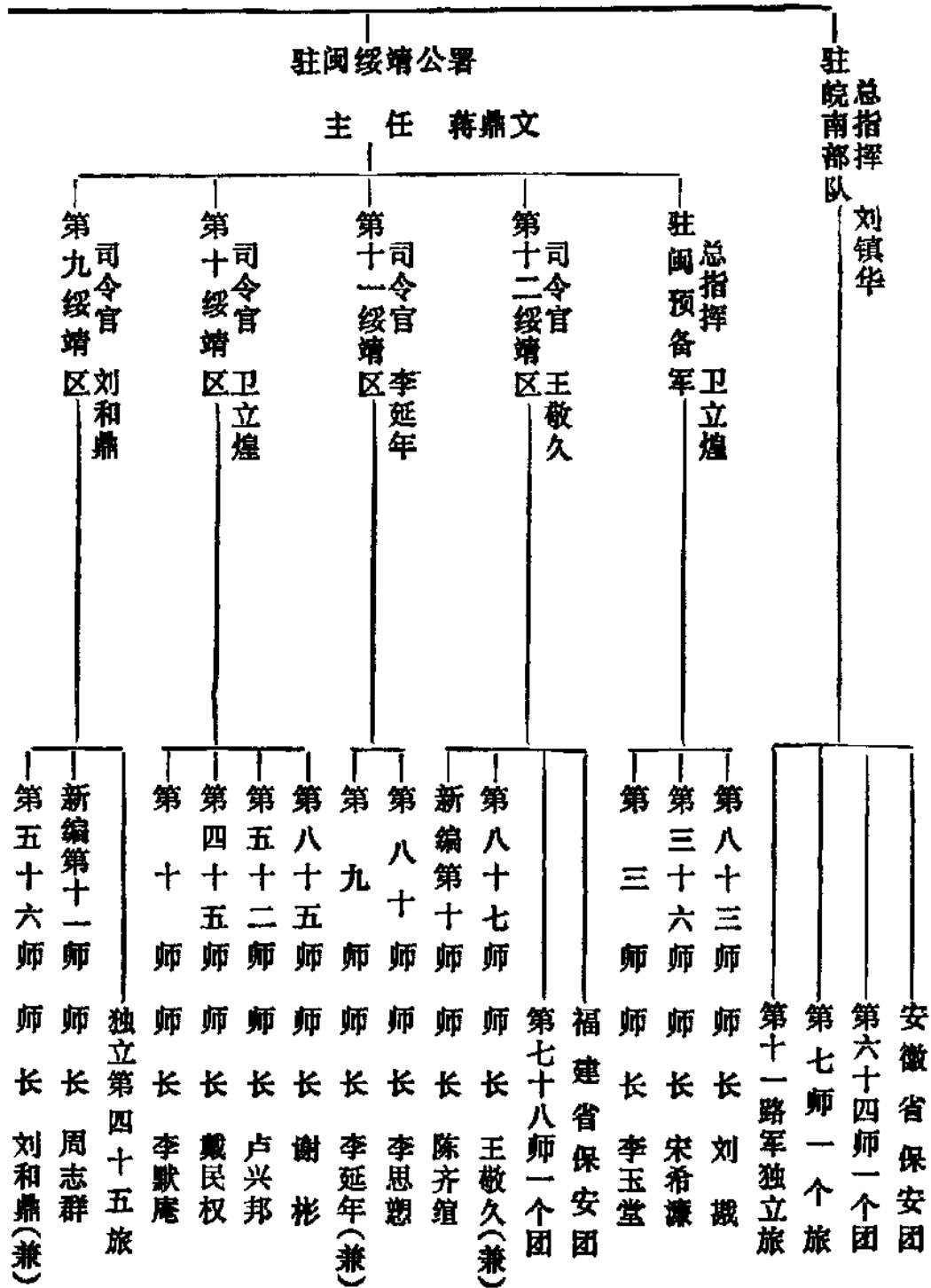
主任 顾祝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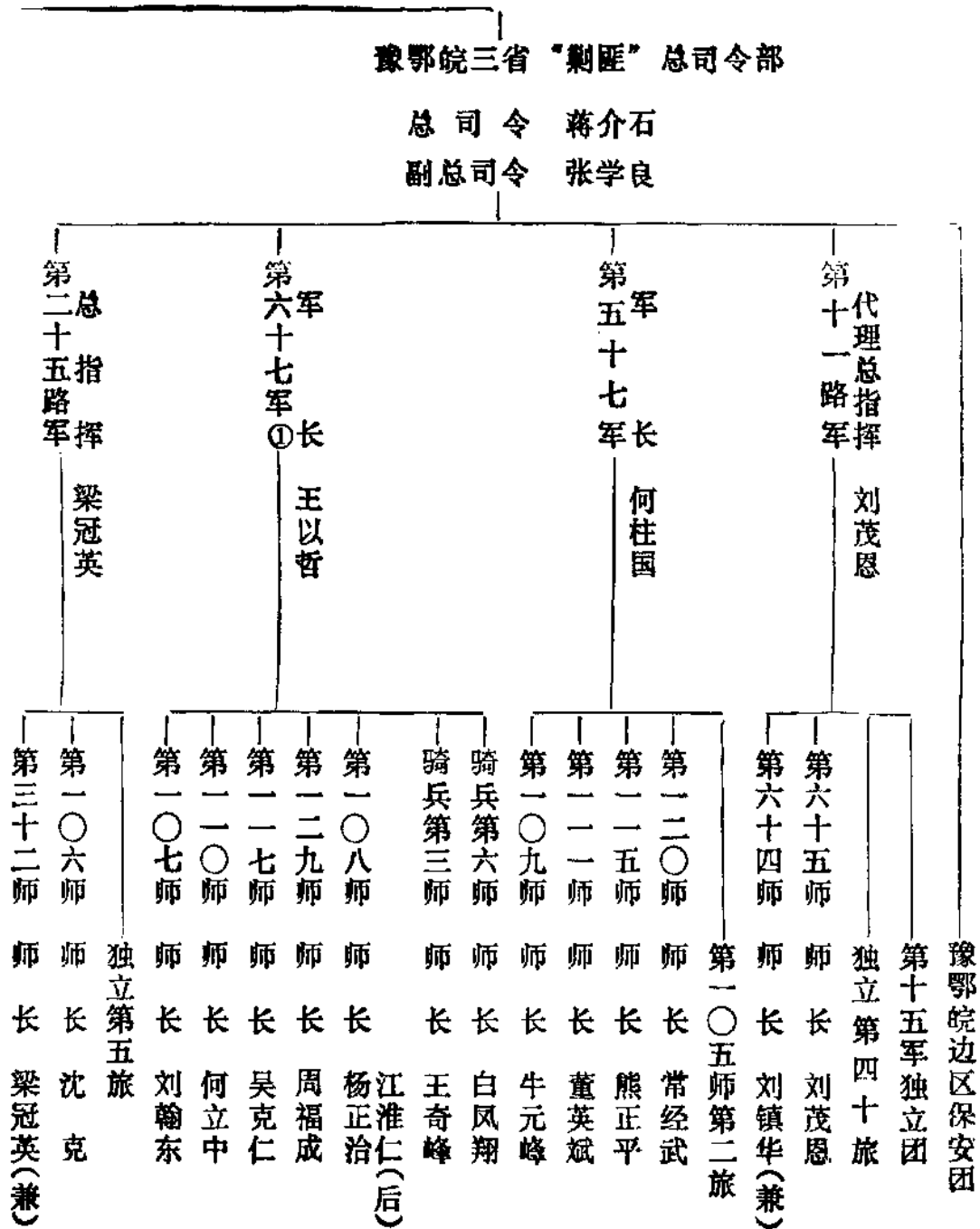


附表55 (2)









①1935年1月第六十七军主力调离，第一〇八师归第二十五路军指挥，骑兵第三师、第六师暂归第五十七军指挥。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概况表(二) (1935年4月—1936年12月) 附表5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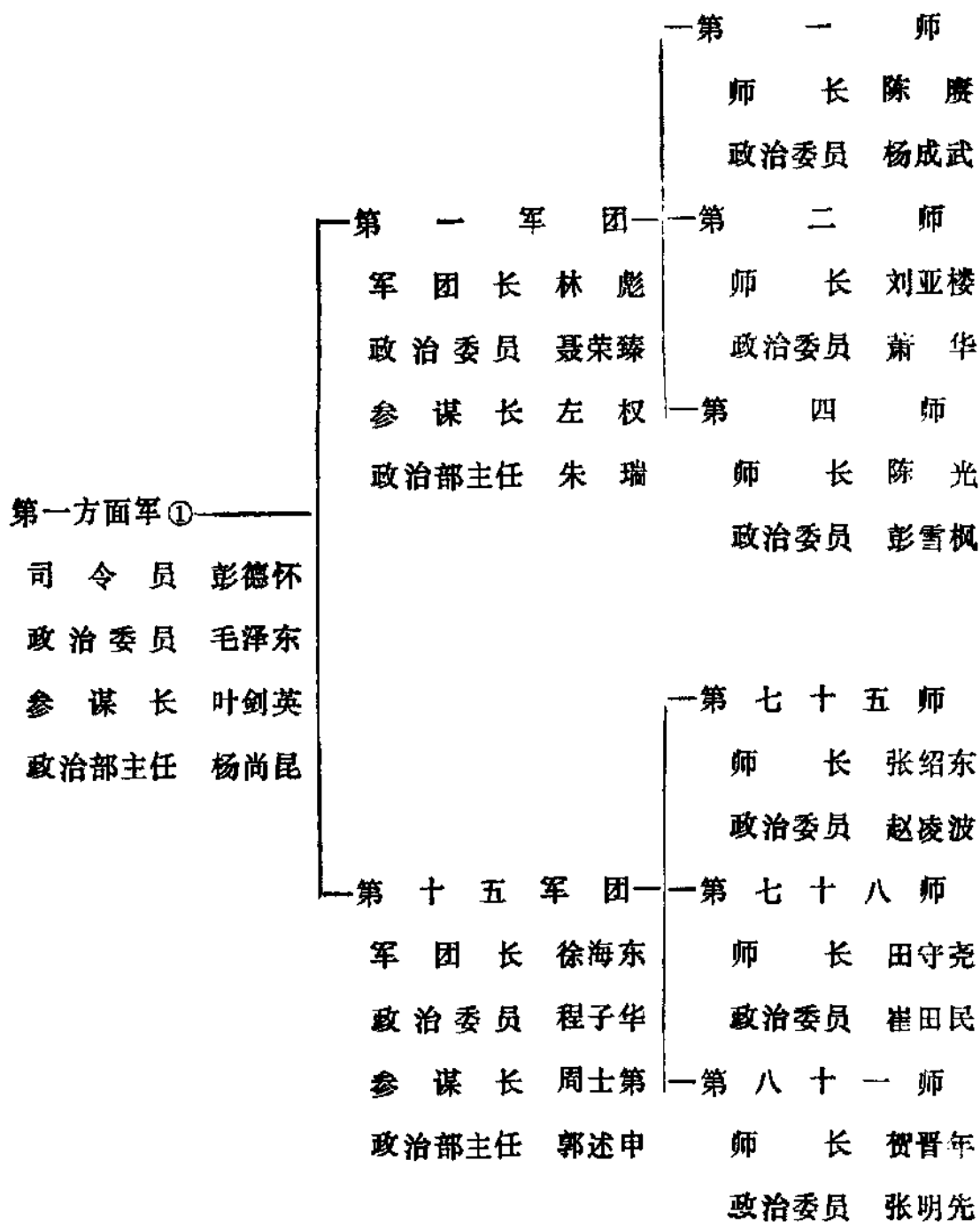
赣粤边游击区	领导人 项英 陈毅 李乐天	——	红军游击队
闽赣边游击区	领导人 钟得胜 彭胜标 刘国兴	——	瑞金、汀瑞、会昌红军游击队
闽西游击区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	红军独立第八、第九团等部
主席 张鼎丞			
副主席 邓子恢 谭震林			
闽粤边游击区	闽粤边特委书记 黄会聪 委员 何鸣 何敏 何浚等	——	红军独立第三团等部
皖浙赣边游击区	皖浙赣边省委书记 关英 委员 李步新等	——	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及游击队
浙南游击区	闽浙边临时省军区	——	挺进师
司令员 粟裕			
政治委员 刘英			
闽北游击区	闽赣省委	——	政治委员 刘英 (兼)
	书记 黄道	闽北军分区 司令员 吴先喜	政治委员 黄道 (兼)
		闽东北军分区 司令员 饶守坤	政治委员 王助
闽东游击区	书记 黄道	——	政治委员 叶飞 (兼)
	闽东特委 书记 叶飞	——	政治委员 叶飞 (兼)

附表56 (2)

鄂豫皖边游击区	红军第二十八军	第二四四团
	政治委员 高敬亭	——特务营
鄂豫边游击区	鄂豫边省委书记 张星江 仝中玉 (后) 王国华 (后)	——手枪团
		——鄂东北红军独立团
湘鄂赣边游击区	湘鄂赣军区	第十六师
	司令员 徐彦刚	——鄂东南军分区
	政治委员 傅秋涛	——修铜宜奉军分区
		——浏宜万军分区
		——平修铜军分区
湘赣边游击区	湘赣游击司令部 司令员 曾开福 政治委员 谭余保	——红军游击队第一、第二支队
湘南游击区	领导人 李林等	——红军游击队
琼崖游击区	琼崖特委书记 冯白驹	——红军游击队
		司令员 朱运泽 (即朱克平)
		政治委员 王白伦

#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战斗序列表（一） 附表57

（1936年2月20日——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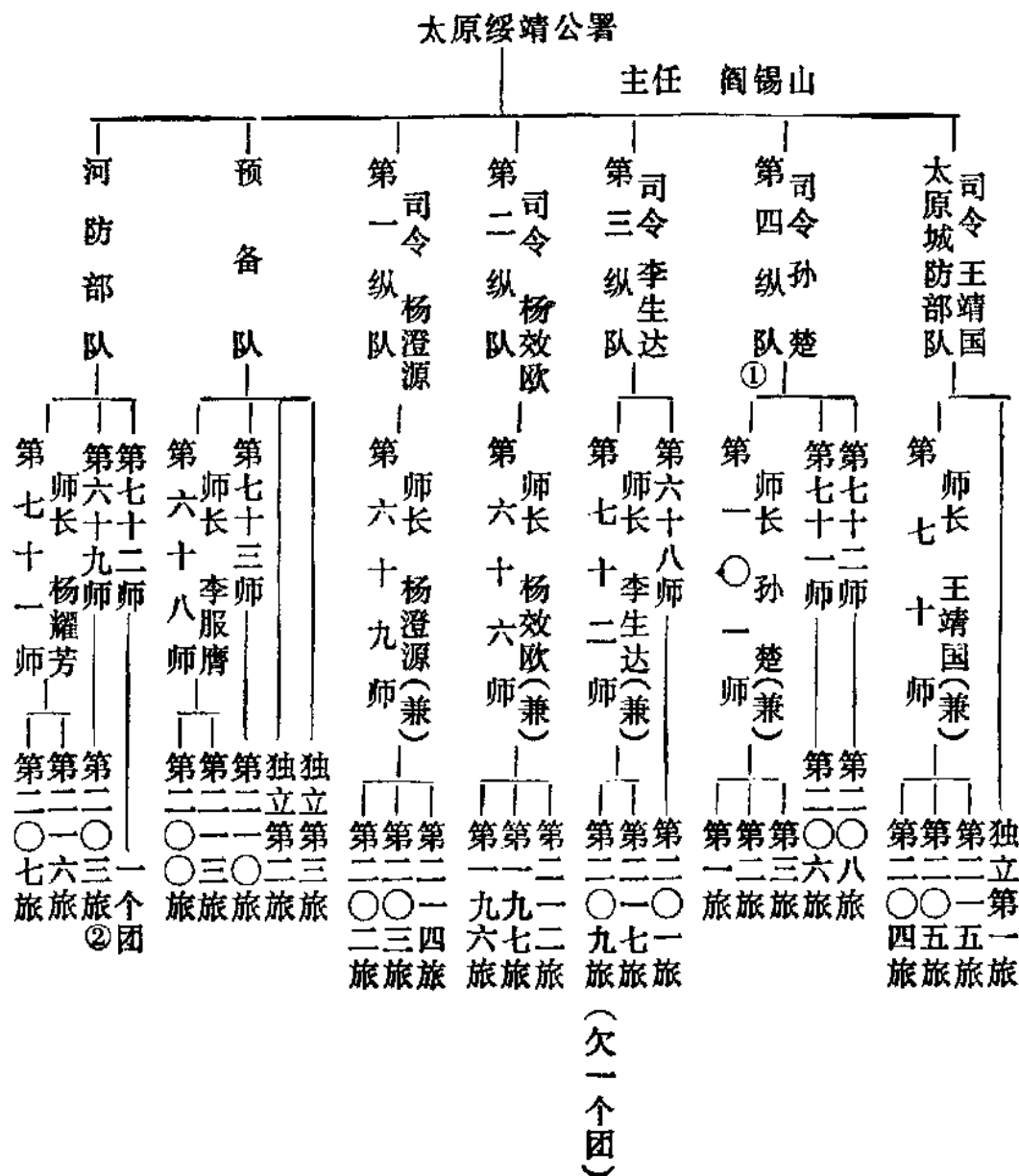
①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期间，曾使用“红军抗日先锋队”番号。



#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一）

附表58

（1936年2月20日—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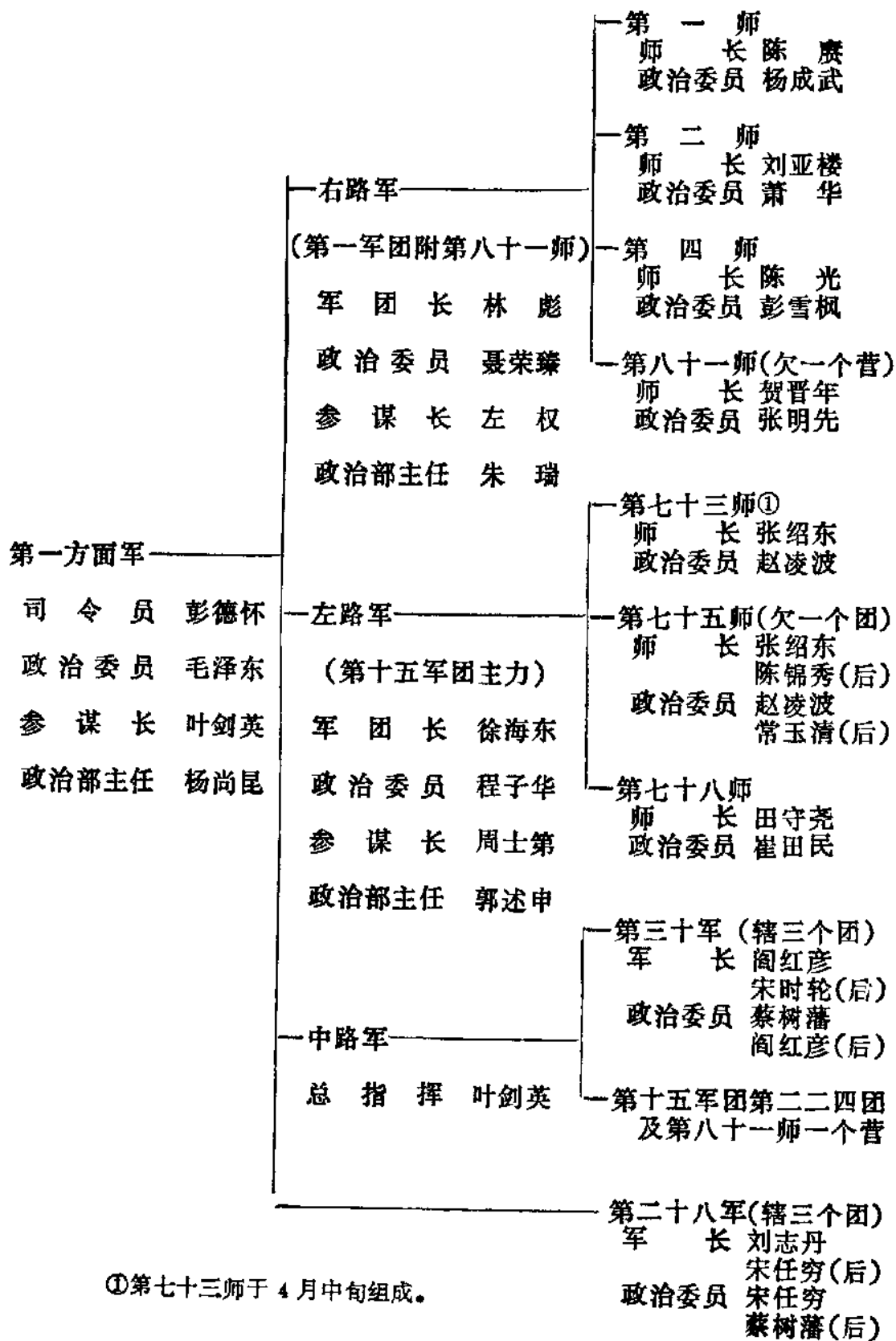


①1936年2月下旬，第一、第二、第二〇六、第二〇八旅由陕北撤回晋西，编入第四纵队。

②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后，第二〇三旅编入第一纵队。

#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战斗序列表（二） 附表59

（1936年3月16日—5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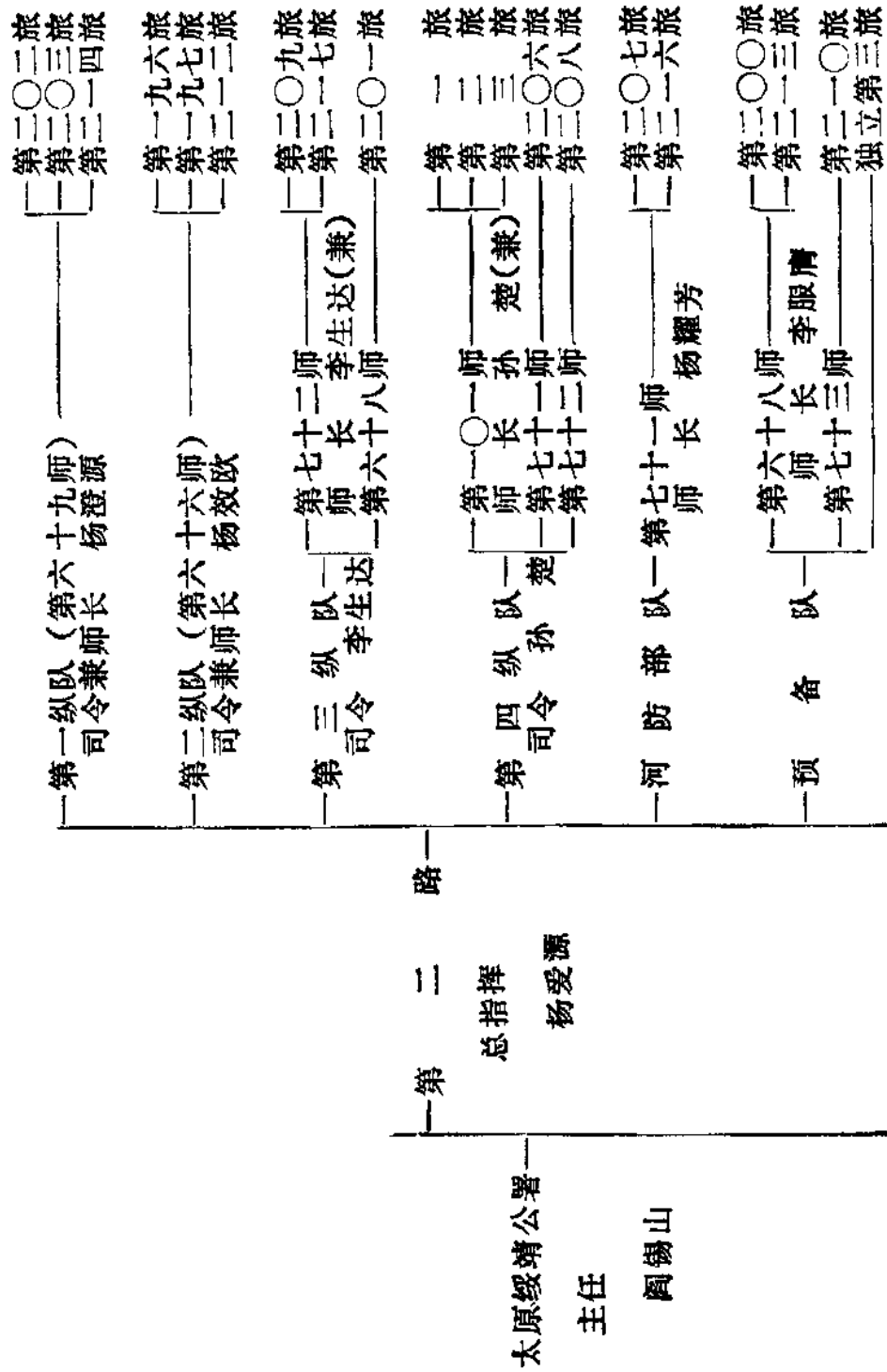


①第七十三师于4月中旬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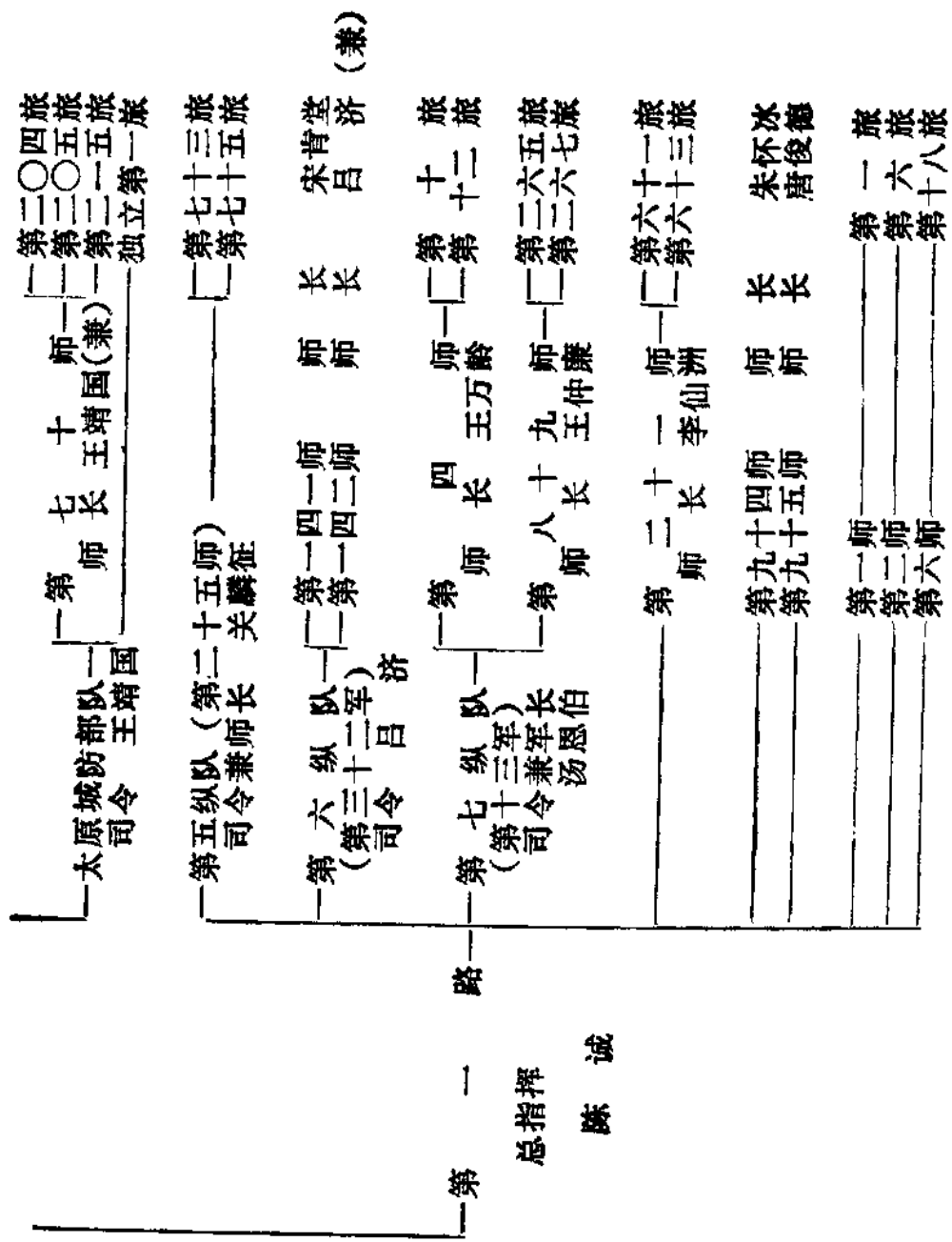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二)

附表60 (1)

(1936年3月16日—5月5日)



附表60 (2)



# 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战斗序列表

附表61 (1)

(1936年5月18日—7月31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①		第一军团		第一师政治委员	陈杨	贛勇
主席	毛泽东	代理军团长	左权	第二师政治委员	杨萧	志华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政治委员	聂荣臻	第四师政治委员	李天佑	克诚
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参谋长	左权	—— 骑兵第二团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	政治部主任	朱瑞	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	张绍漫	东
参谋长	聂鹤亭	第十五军团		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	陈常	秀清
政治部主任	刘晓	军团长	徐海东	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	韩先楚	田民
		政治委员	程子华	—— 骑兵第三团		
		参谋长	王首道			

①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附表61 (2)

第八十一师	师长 政治委员	文年生 李宗贵
	特务团	
	骑兵第一团	
第二十八军	军长 政治委员	宋时轮 宋任穷
第二十九军 1 个团		
陕甘宁独立师 <sup>①</sup>	师长 政治委员	姚黎 姚黎

①陕甘宁独立师系1936年7月组建，属陕甘宁省军事部，此时受西方野战军指挥。

# 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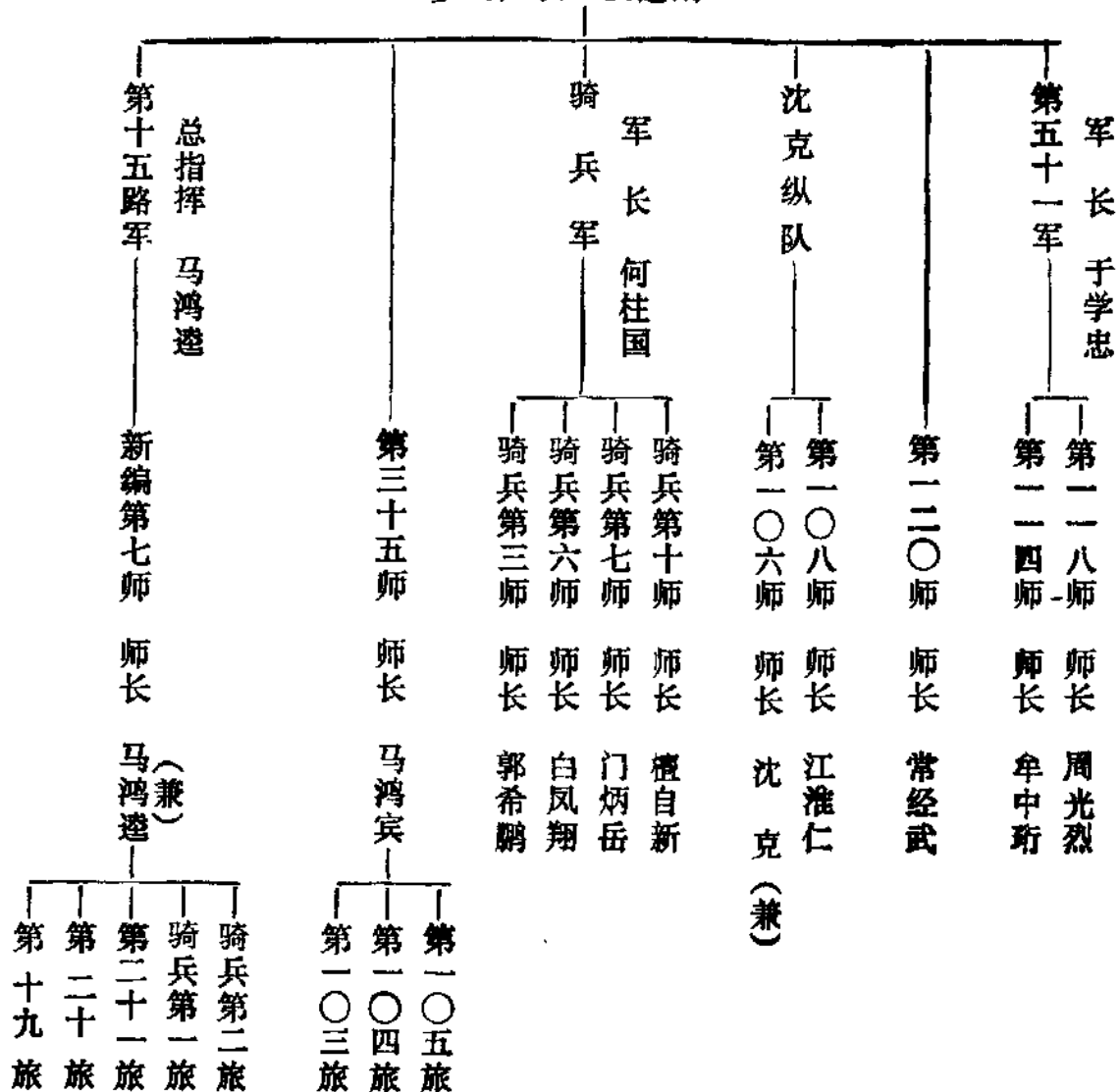
(1936年5月18日—7月31日)

##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总司令 蒋介石

副总司令 张学良

参谋长 晏道刚



#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时序列表 附表63(1)

(1936年10月7日—22日)

##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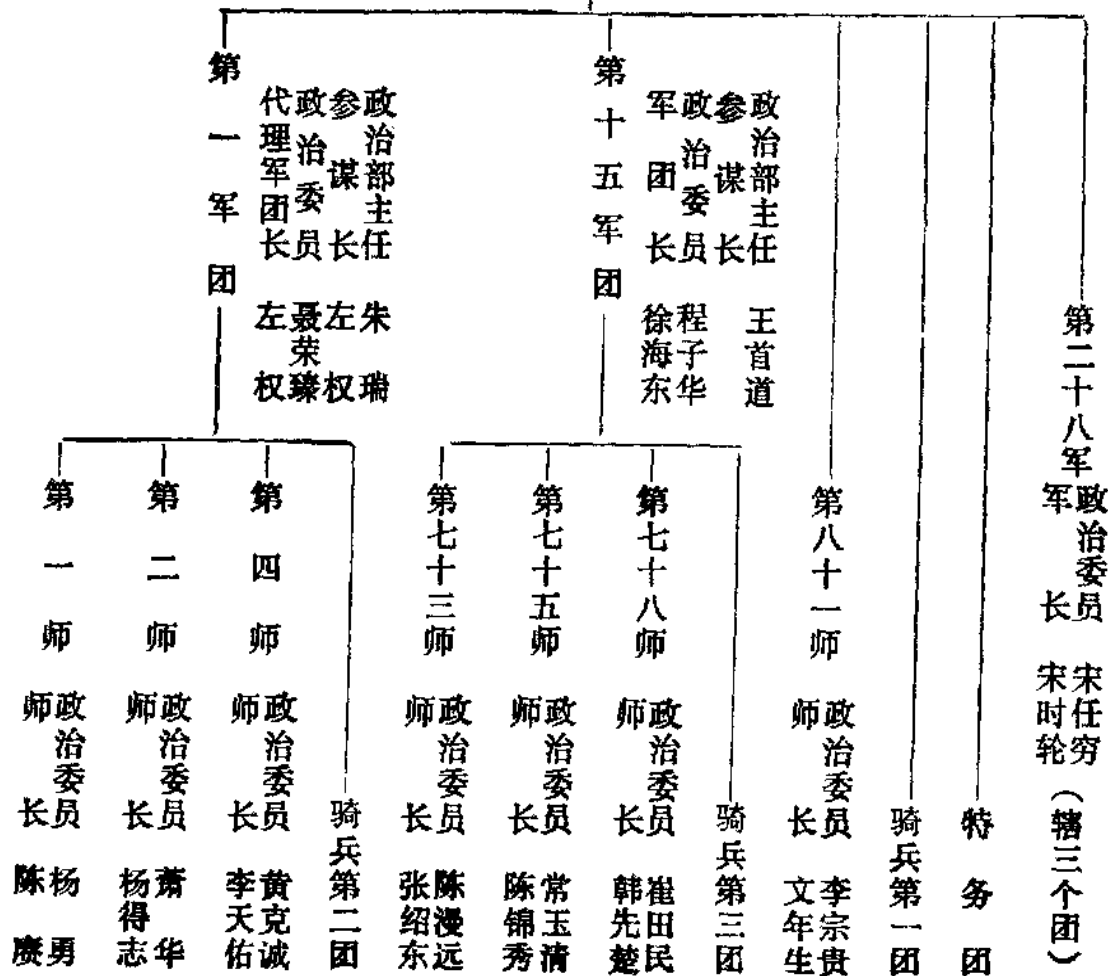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 中国工农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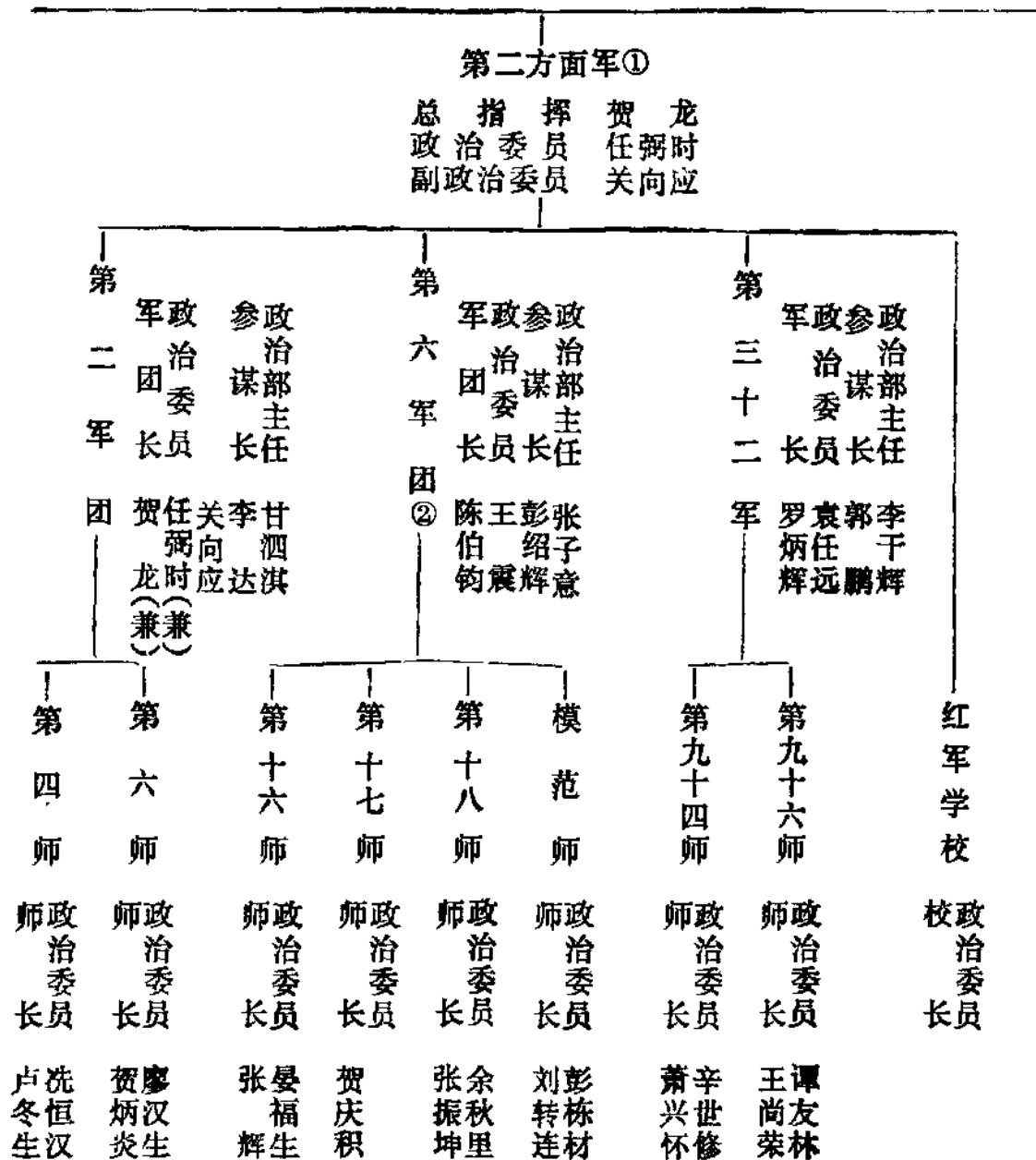
总司令 朱德  
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

## 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  
参谋长 聂鹤亭  
政治部主任 刘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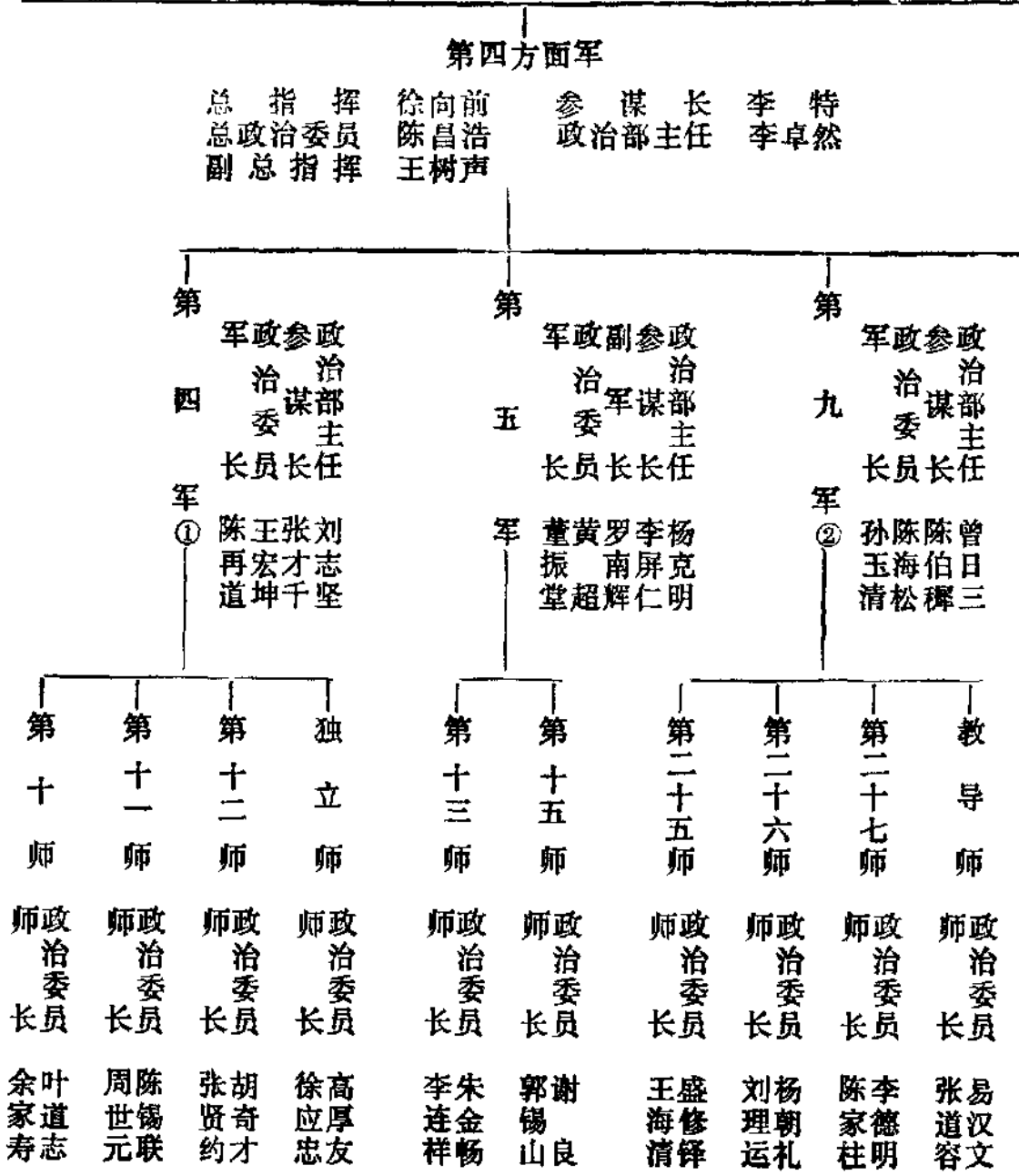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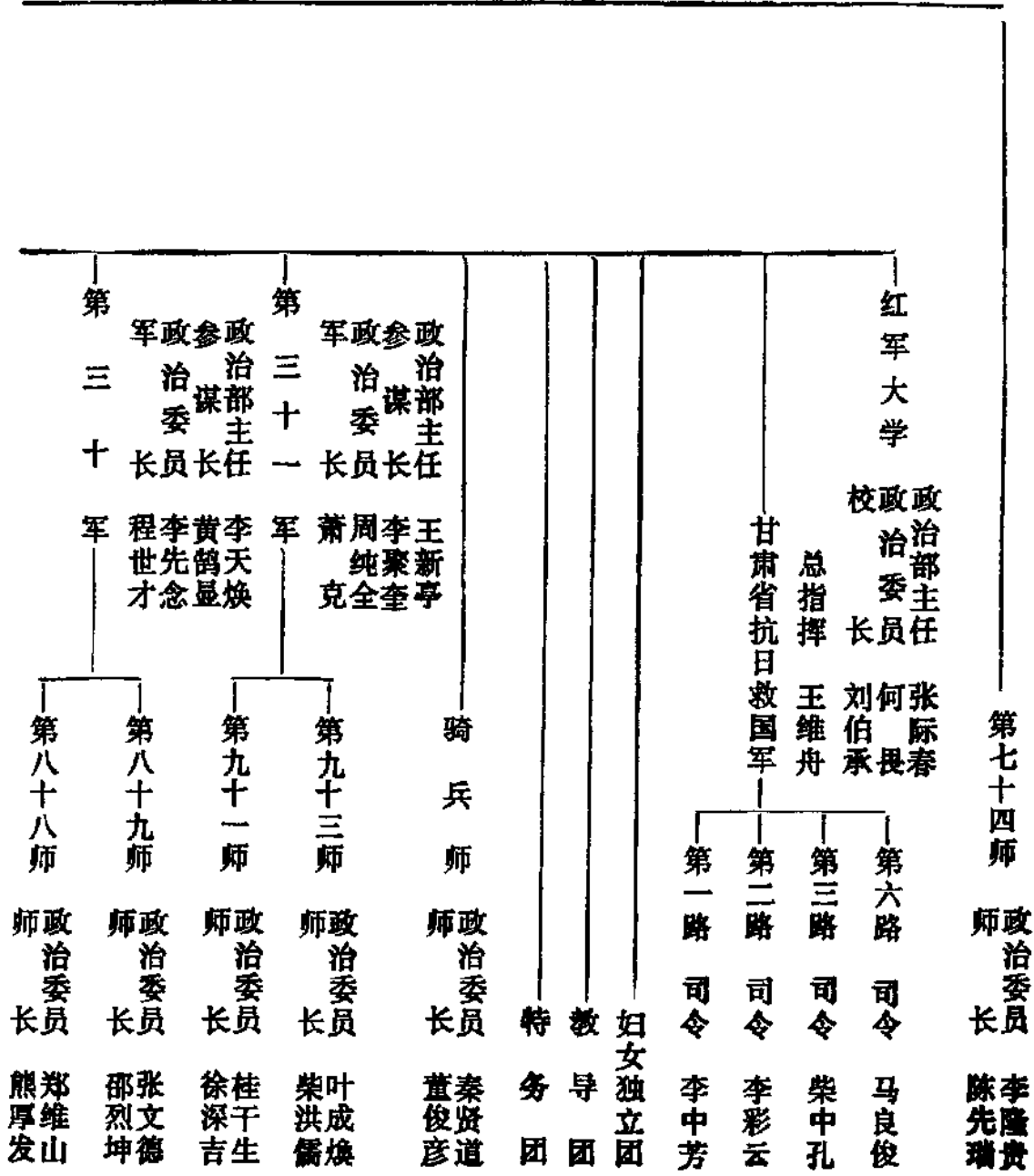


①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第二军团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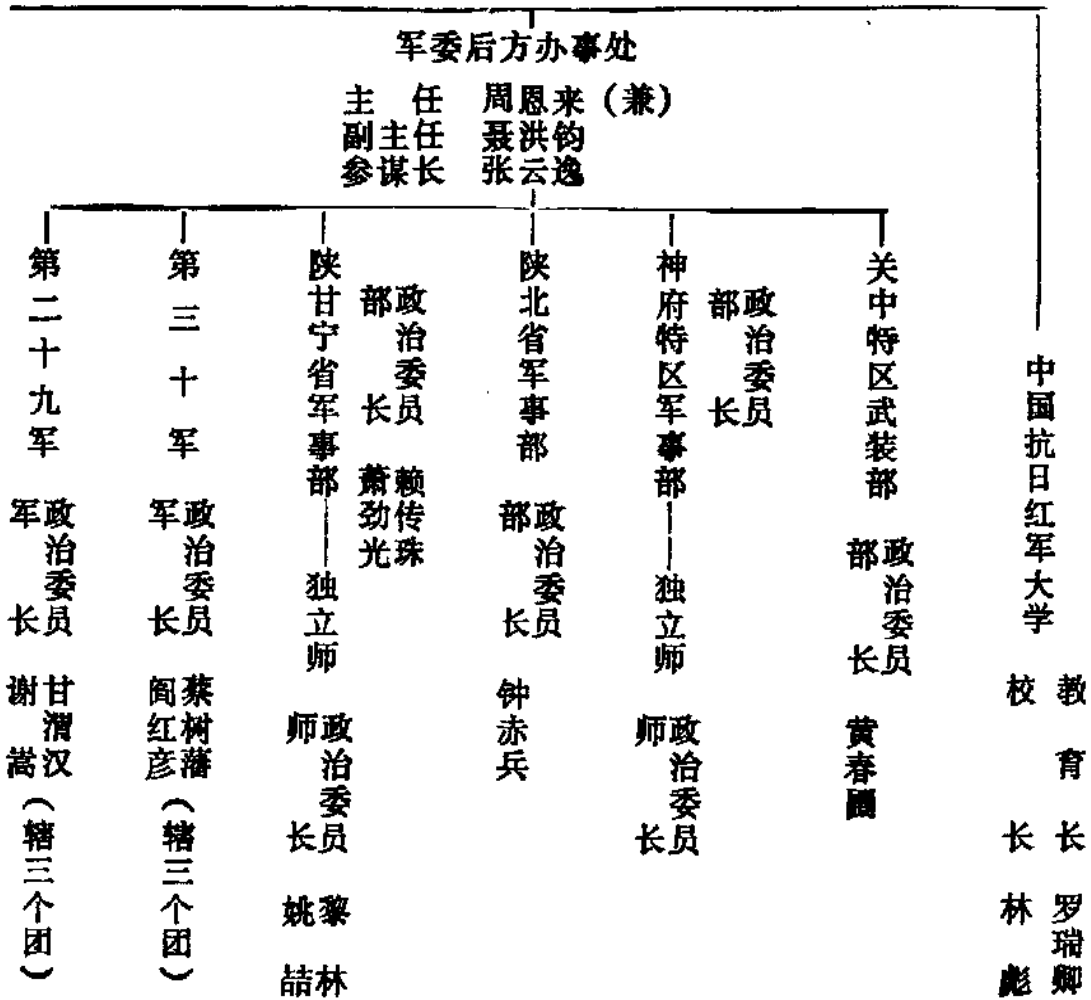
②第六军团所属各师均未编团。



①②第四、第九军所属各师均未编团。



附表63 (5)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时 附表64(1)

西北地区敌军序列表

(1936年10月)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总司令 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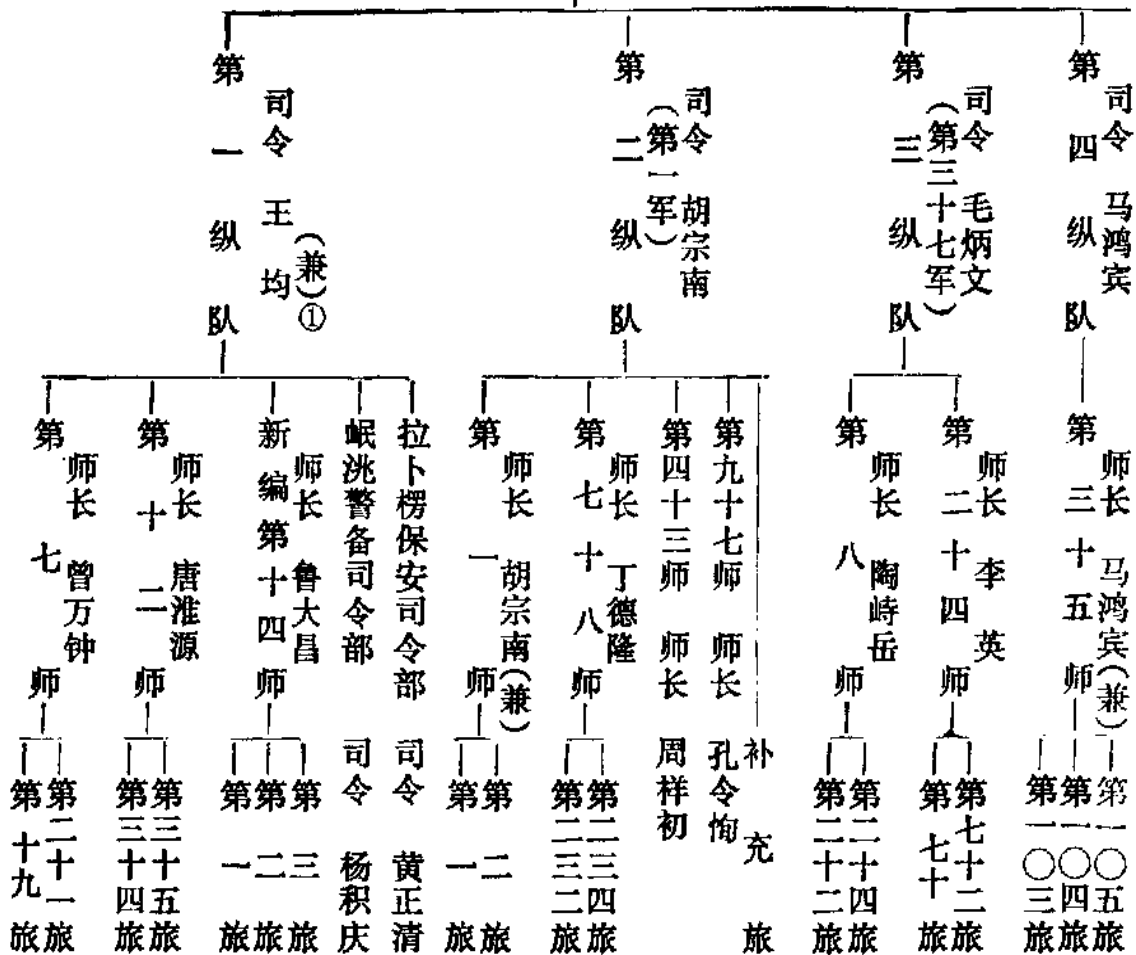
副总司令 张学良

参谋长 晏道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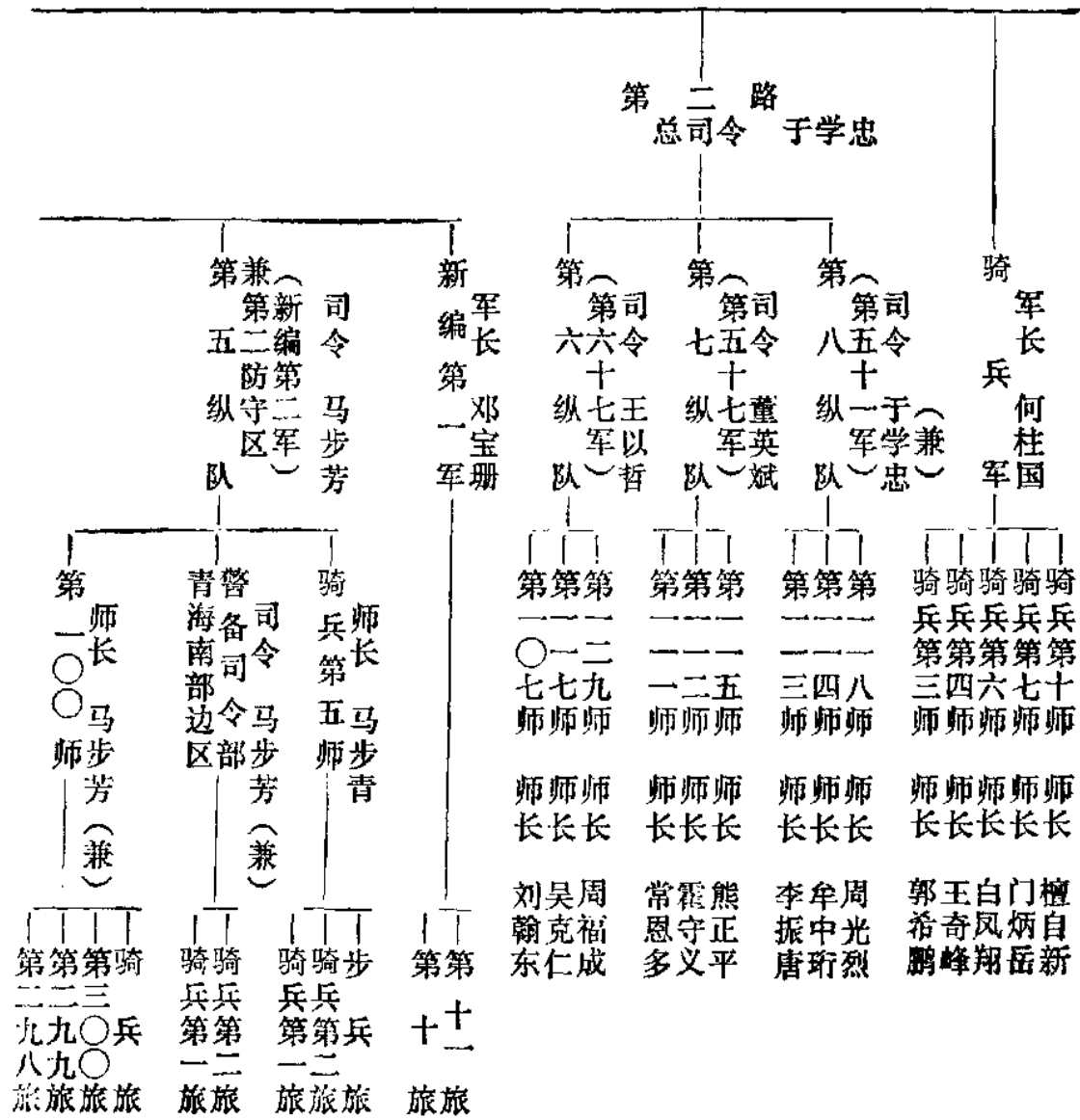
第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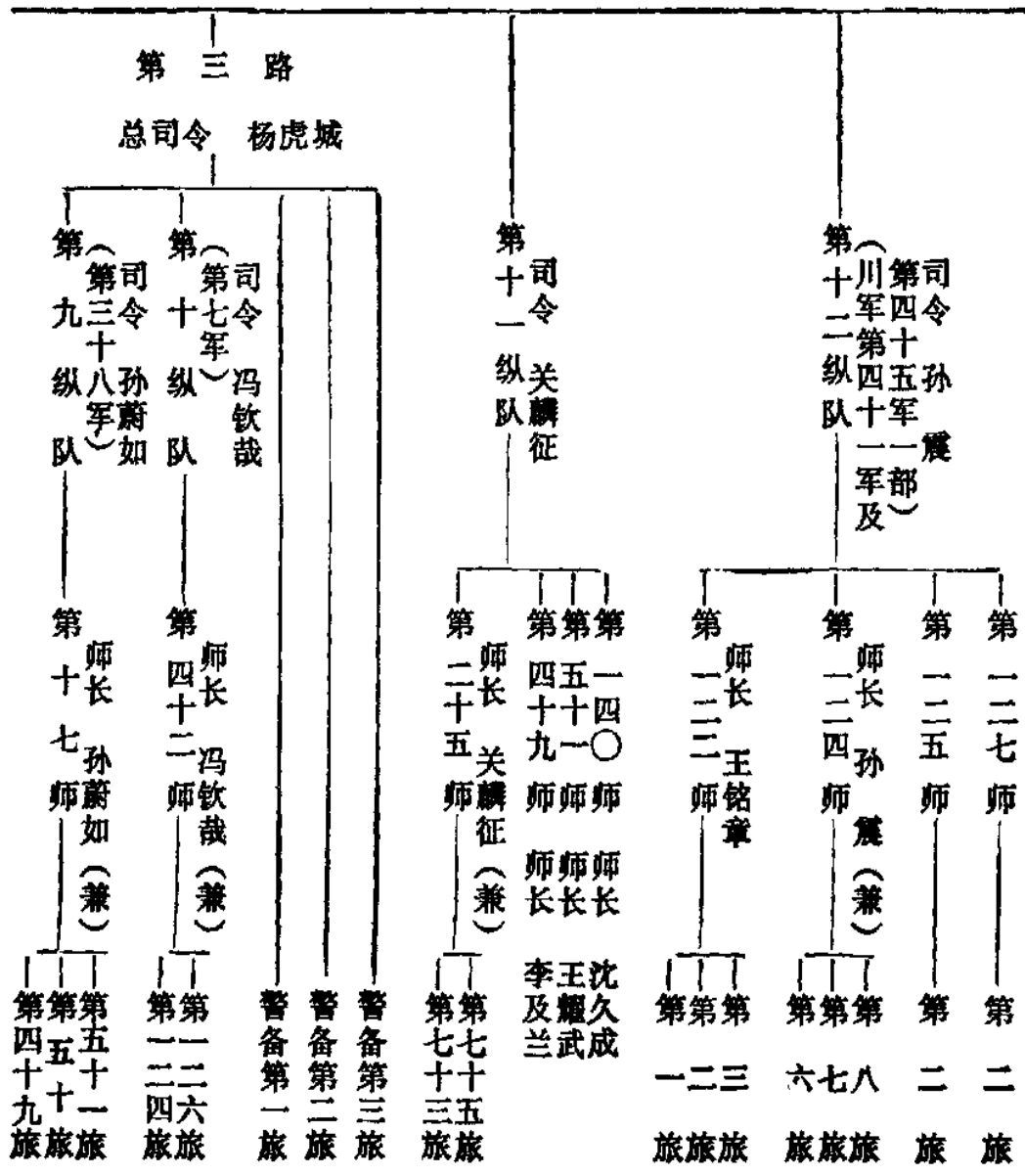
总司令 朱绍良

副总司令 王均



①王均又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该军辖第七、第十二师。





第三路  
总司令 杨虎城

司令 冯钦哉 (第七军)  
司令 孙蔚如 (第三十八军)  
第九纵队

第十七师 师长 孙蔚如 (兼)  
第四十二师 师长 冯钦哉 (兼)  
警备第一旅  
警备第二旅  
警备第三旅  
第五十一旅  
第五十旅  
第四十九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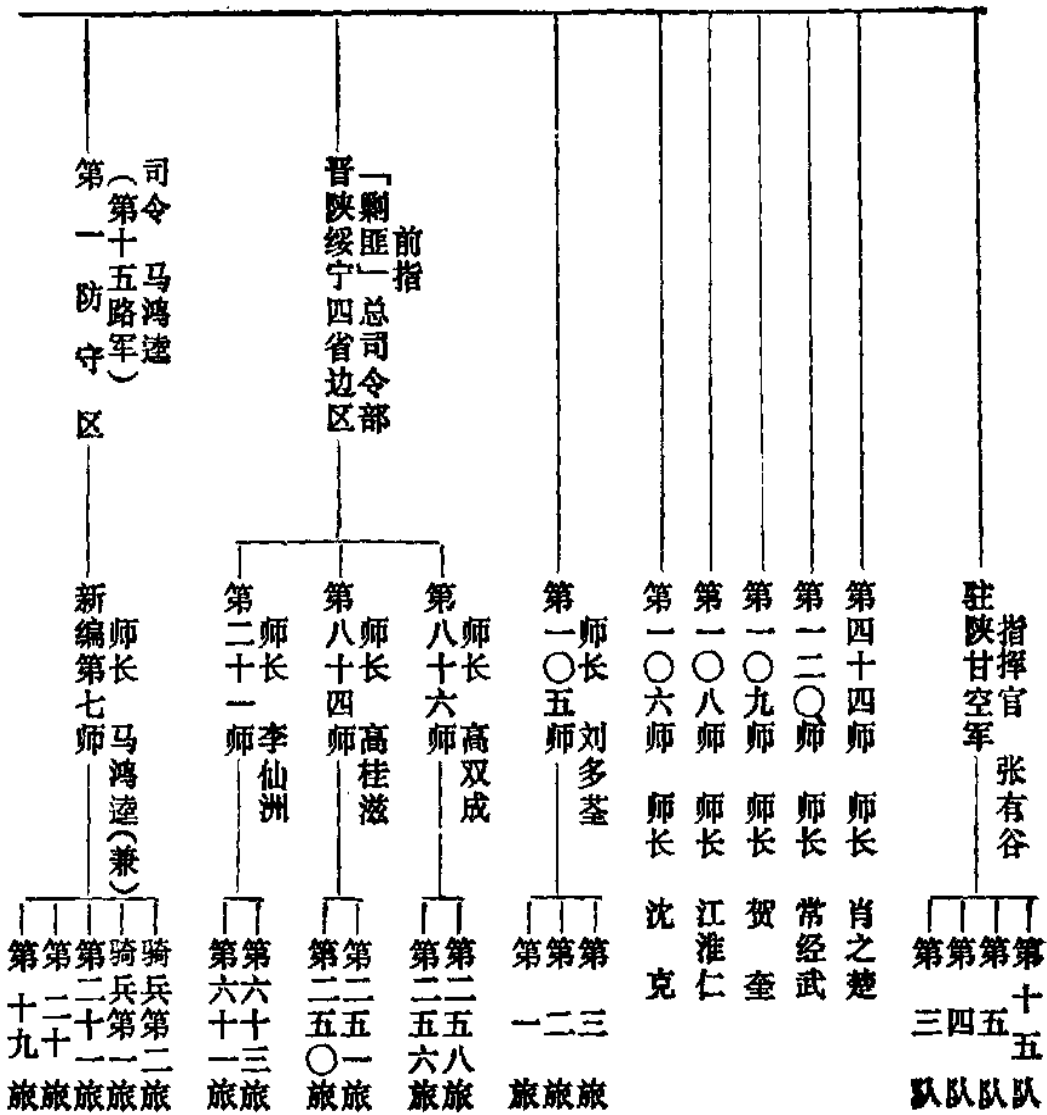
司令 关麟征  
第十一纵队

第二十五师 师长 关麟征 (兼)  
第四十九师 师长 李及兰  
第五十一师 师长 沈久成  
第五十一师 师长 王耀武  
第七十五旅  
第七十三旅

司令 孙震 (川军第四十五军一部)  
第十一纵队

第一二七师  
第一二五师  
第一二四师 师长 孙震 (兼)  
第一二二师 师长 王铭章  
第二旅  
第二旅  
第六旅  
第七旅  
第八旅  
第一旅  
第二旅  
第三旅

附表64 (4)





# 山城堡战役红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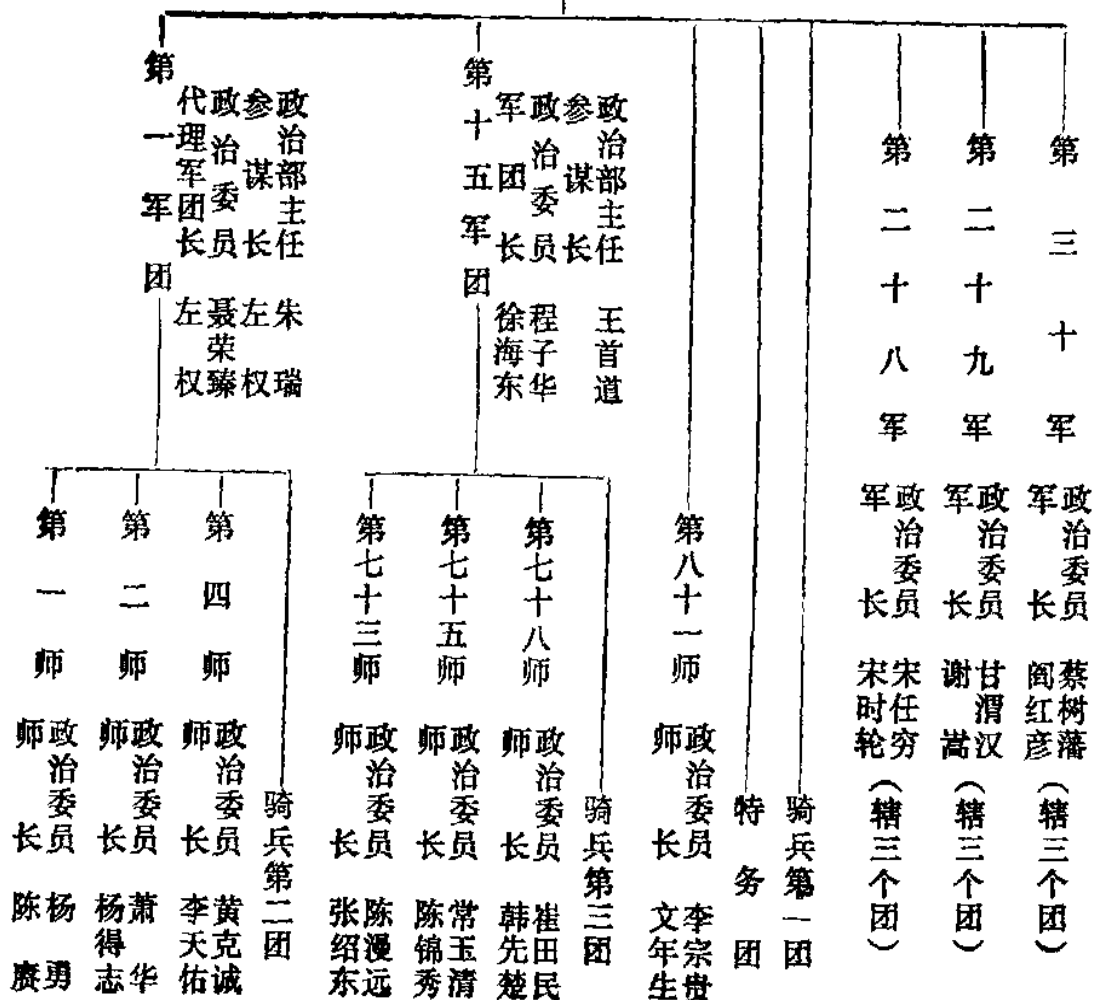
(1936年11月17日—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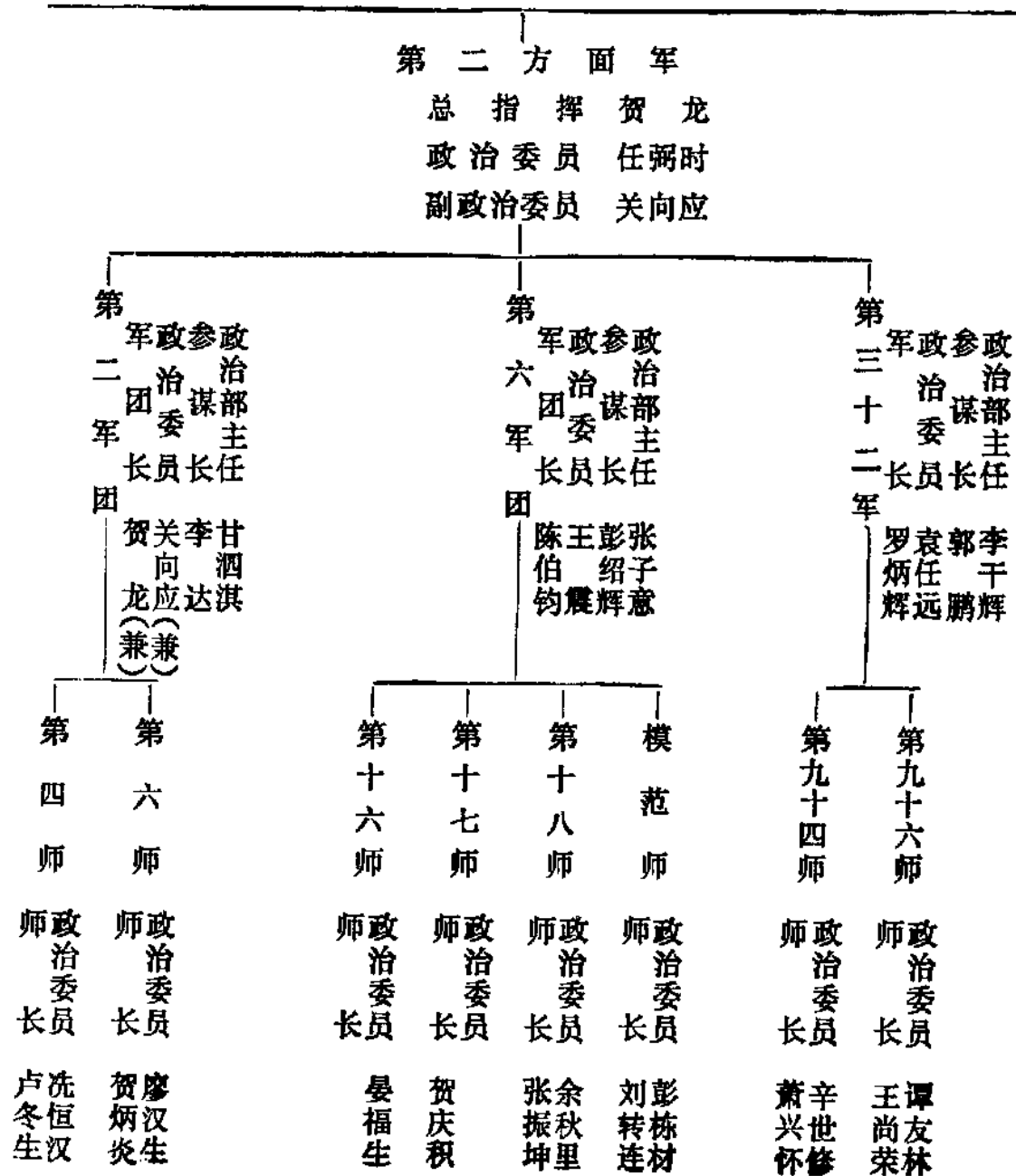
## 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总 指 挥 彭德怀  
兼政治委员  
参 谋 长 刘伯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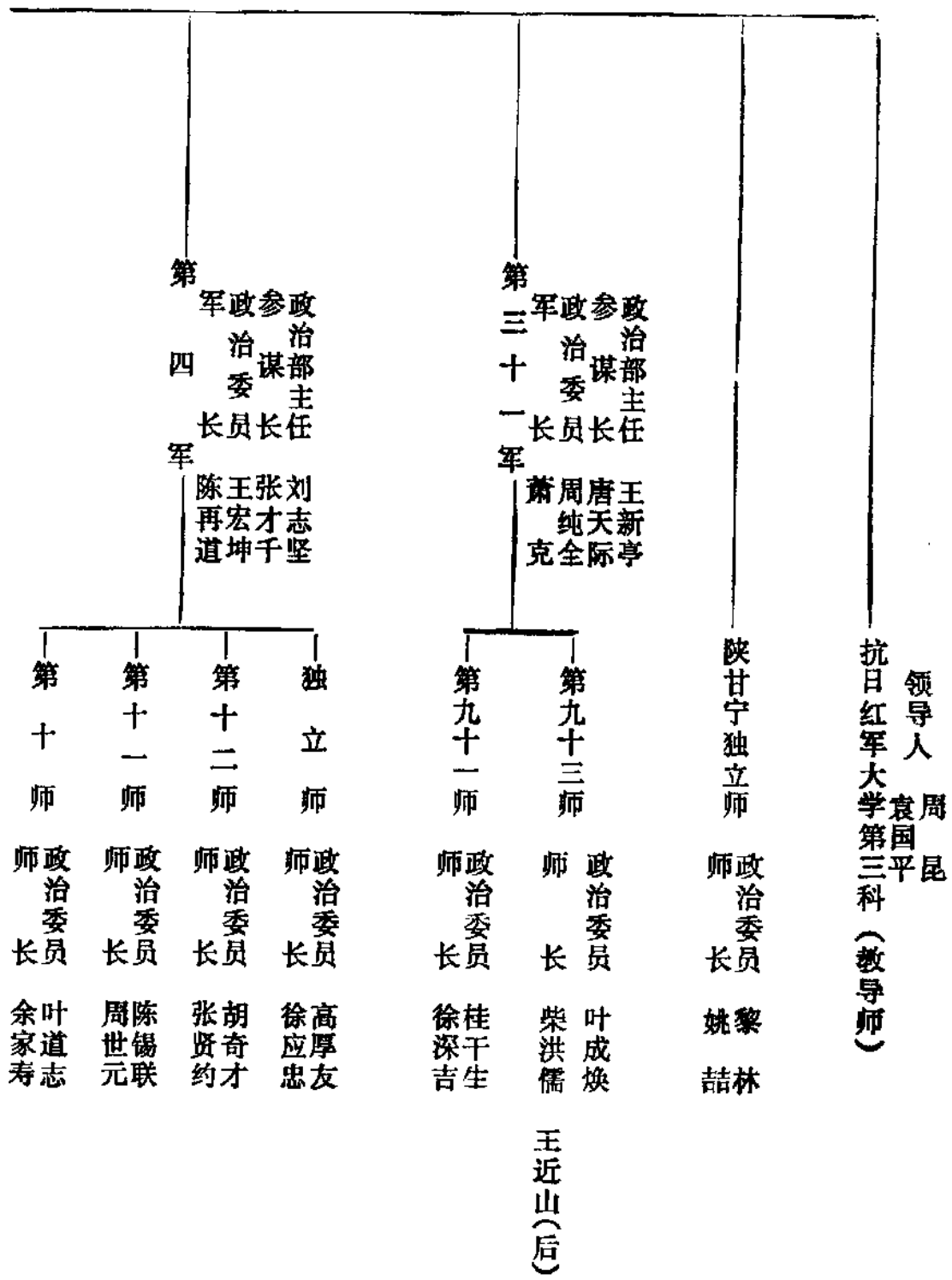
## 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司 令 员 兼 彭德怀  
政 治 委 员 聂鹤亭  
参 谋 长 刘 晓  
政 治 部 主 任





附表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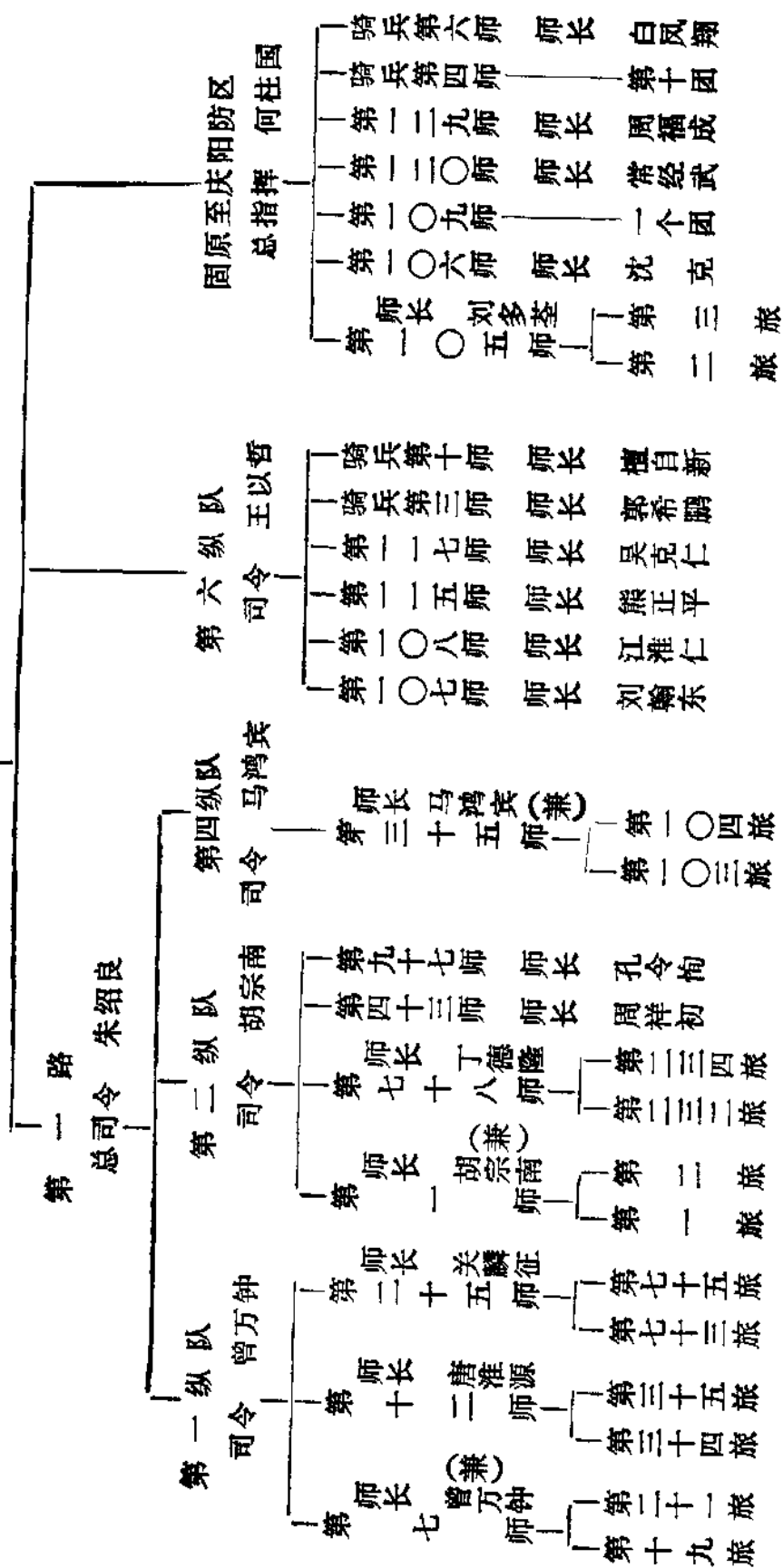


# 山城堡战役时敌军战斗序列表 (1936年11月17日—22日)

附表66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总司令 蒋介石 副总司令 张学良 参谋长 晏道刚



红军西路军及援西军战斗序列表 (1936年11月上旬—1937年3月上旬) 附表67(1)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①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张国焘		西路军 总指挥 徐向前 副总指挥 陈昌浩 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 政治部副主任 陈昌浩 政治部秘书 徐向前 政治部副秘书 陈昌浩	西路军 总指挥 徐向前 副总指挥 陈昌浩 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 政治部副主任 陈昌浩 政治部秘书 徐向前 政治部副秘书 陈昌浩	第五军政参政 政治部主任 董振堂 政治部副主任 黄季杨 政治部秘书 李屏仁 政治部副秘书 杨克明	第九军 政治部主任 清声 政治部副主任 玉树 政治部秘书 王(后兼) 政治部副秘书 陈海松 政治部副秘书 陈伯樨 政治部副秘书 李聚奎 政治部副秘书 (后) 曾日三	第三十军 政治部主任 程才 政治部副主任 李世先 政治部秘书 李念显 政治部副秘书 黄鹤天 政治部副秘书 李煥	第十三师 师长 李连祥 政治委员 叶崇本 政治委员 朱金杨 政治委员 郭锡山 政治委员 谢良 政治委员 骑兵团	第二十五师 师长 王海清 政治委员 杨朝礼	第二十七师 师长 陈家柱 政治委员 易汉文 政治委员 陈修坤 政治委员 骑兵团	第八十八师 师长 熊厚发 政治委员 郑维山	第八十九师 师长 邵烈 政治委员 张文德	骑兵师 师长 董俊彦 政治委员 秦贤道	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
--	--	--	--	--	---	--	---	-----------------------------	---	-----------------------------	----------------------------	---------------------------	---------------

附表67(2)

— 援 西 军 ③	— 第四军 政参 政治部 主任 长 员 长 任	陈再道 王宏坤 耿志坚 刘志坚	— 第十师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陈锡联 叶道志
	— 第二十八军 政参 政治部 主任 长 员	宋时轮 宋任穷	— 第十二师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张贤约 胡奇才
	— 第三十一军 政参 政治部 主任 长 员 长 任	萧克 周纯全 唐天新 王新亭	— 第九十一师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徐深吉 桂干生
	— 第三十二军 政参 政治部 主任 长 员 长 任	罗炳辉 袁任远 郭鹏 李干辉	— 第九十三师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王近山 叶成焕
			— 骑兵第一团		

①本表所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系1936年12月7日扩大组织后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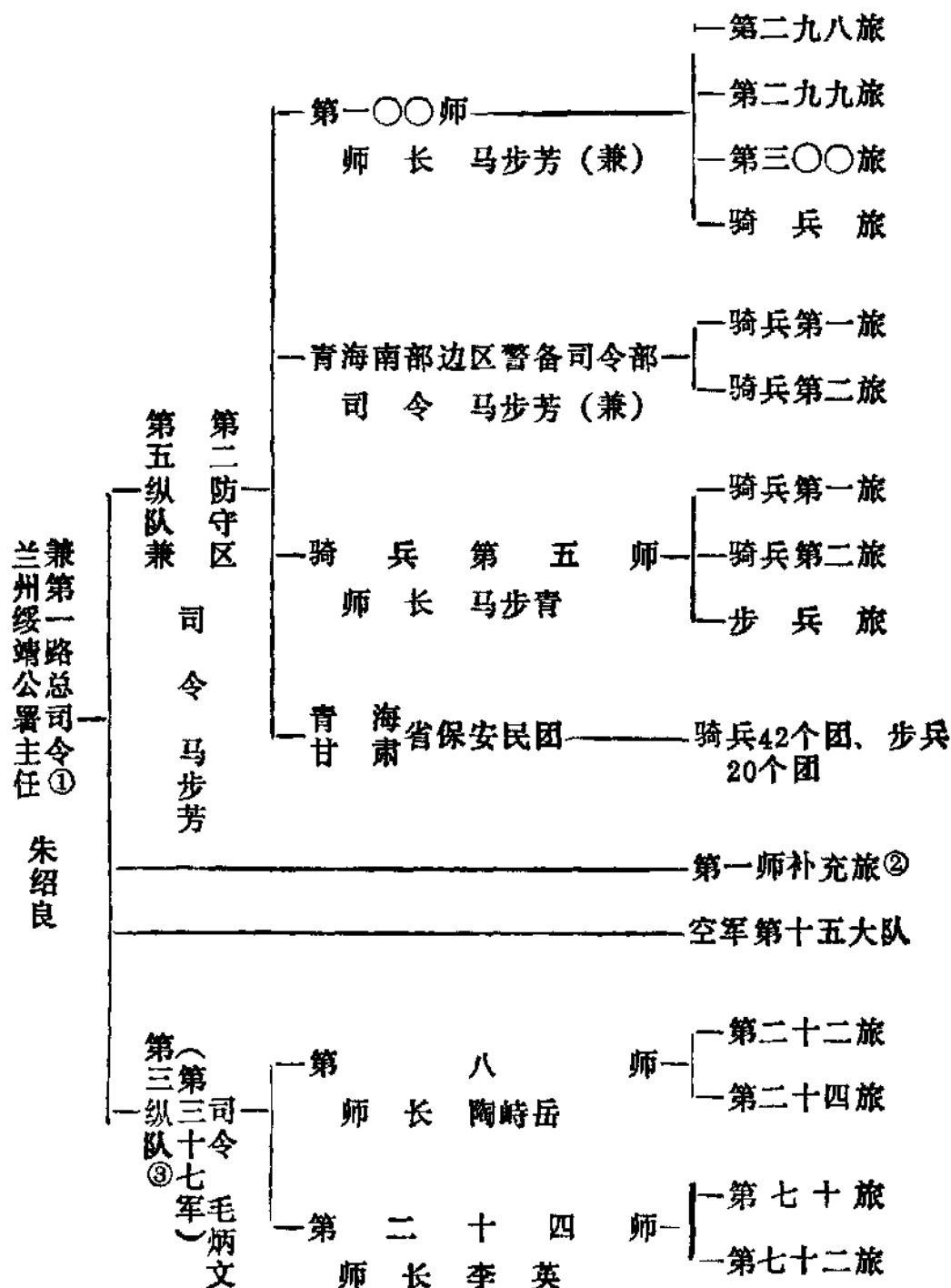
②在高台战斗中军长董振堂牺牲，由孙玉清继任；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牺牲，由谢良继任。不久，第五军余部缩编为一个师，编入第三十军序列。

③援西军系1937年2月下旬组建。

# 红军西路军西进期间敌军战斗序列表

附表68

(1936年11月—1937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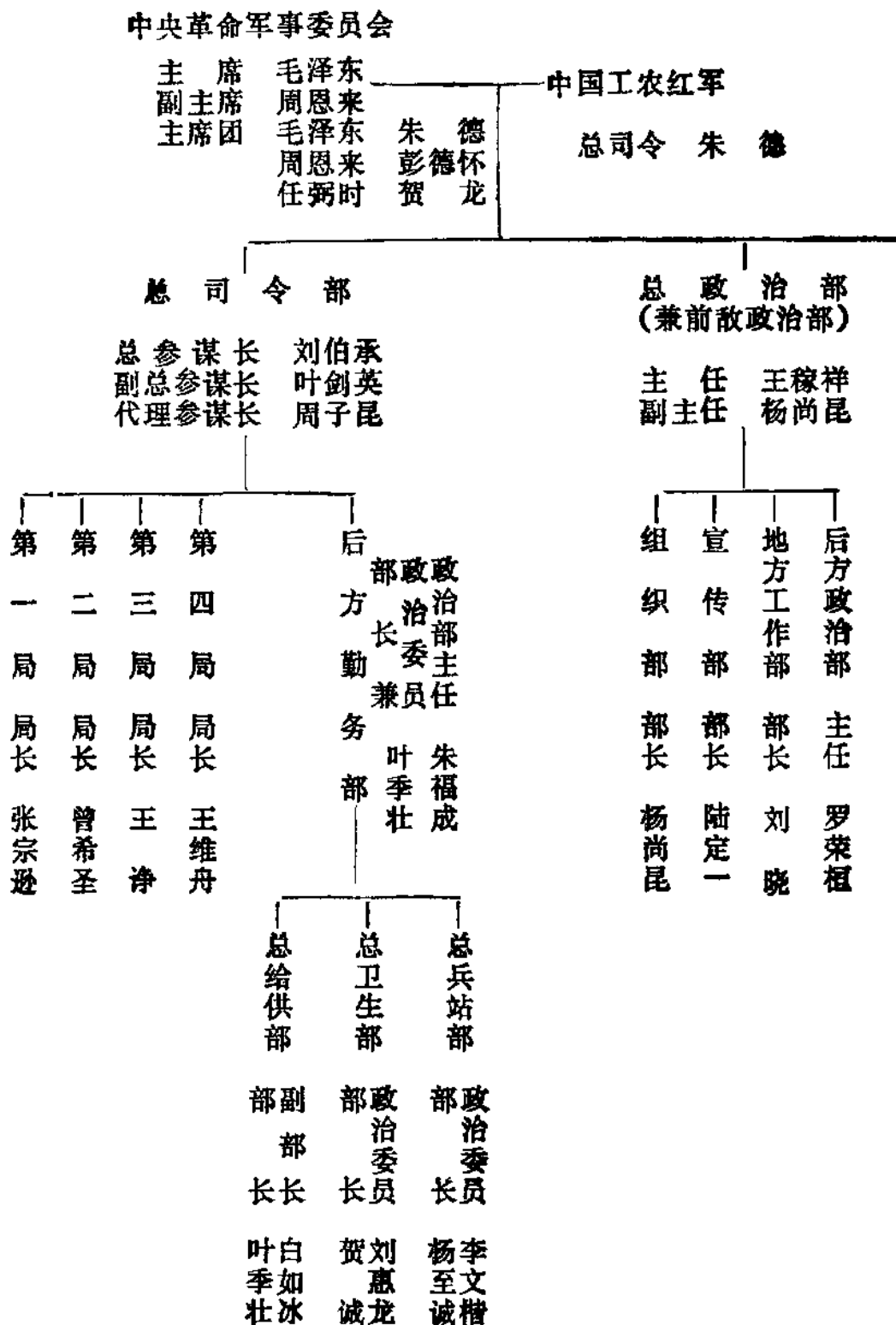
① “西安事变”后，西北“剿总”取消，第一路军、兰州绥靖公署丧失指挥职能，敌军对红军西路军的作战由马步芳指挥。

②③ “西安事变”后，第一师补充旅被东北军缴械，第三纵队返回河东。

#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 中国工农红军序列表

附表69 (1)

(1937年6月)





前 敌 总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彭德怀  
政 治 委 员 任弼时  
参 谋 长 左 权

第 二 方 面 军

总 指 挥 贺 龙  
政 治 委 员 关向应  
参 谋 长 周士第  
政 治 部 主 任 朱 瑞  
政 治 部 副 主 任 甘泗淇

第 一 军 团  
参 政 治 部 主 任 邓小平  
政 治 委 员 孙 毅  
代 理 军 团 长 聂 荣 臻  
陈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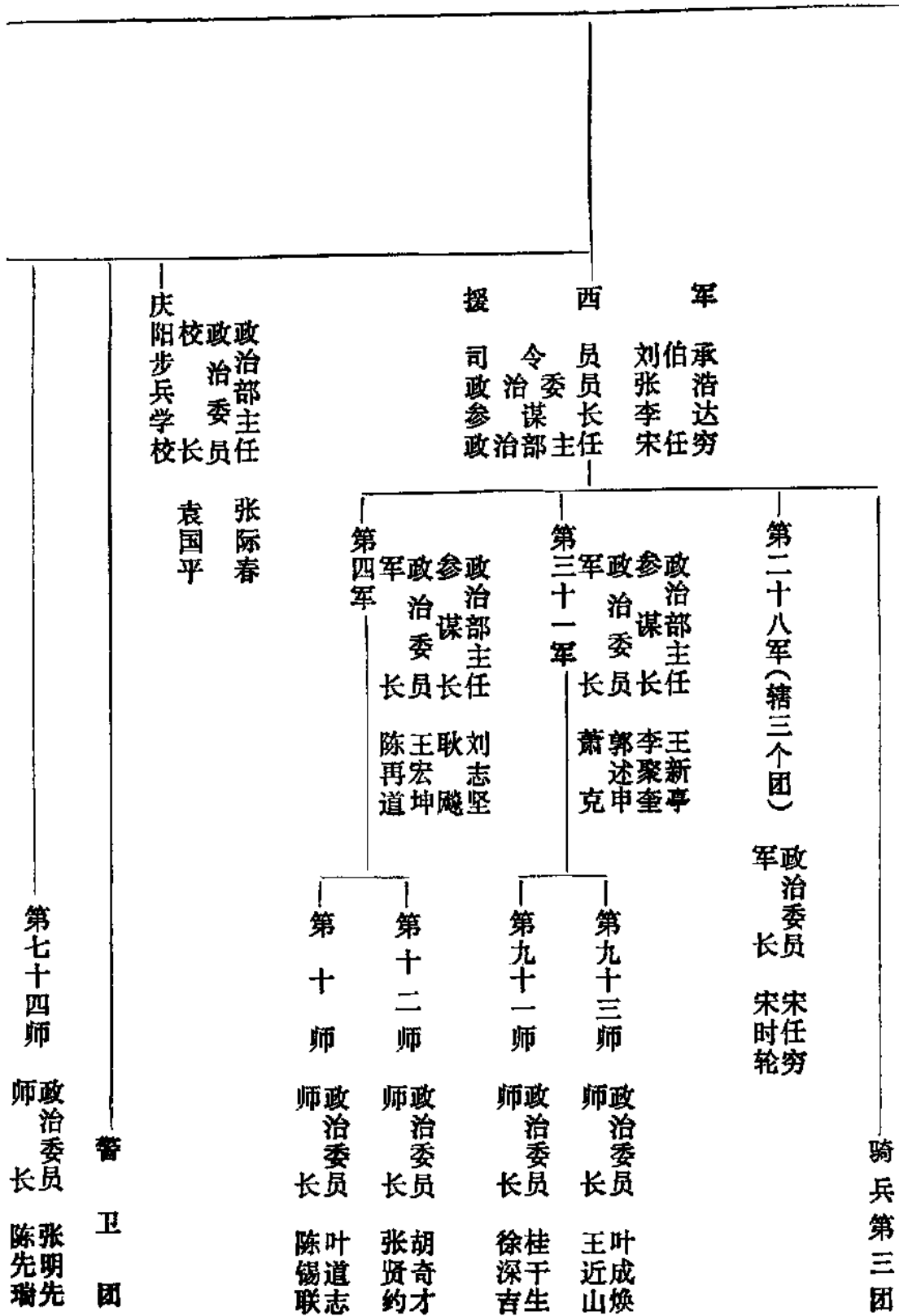
第 十 五 军 团  
参 政 治 部 主 任 王首道  
政 治 委 员 兰 国 清  
程 子 华  
徐 海 东

第 三 十 二 军 (辖三个团)  
政 治 委 员 袁任远  
罗炳辉  
参 政 治 部 主 任 李干辉  
郭 鹏  
第 六 军 团 (辖三个团)  
政 治 委 员 王 震  
陈 伯 钧  
参 政 治 部 主 任 张子意  
彭绍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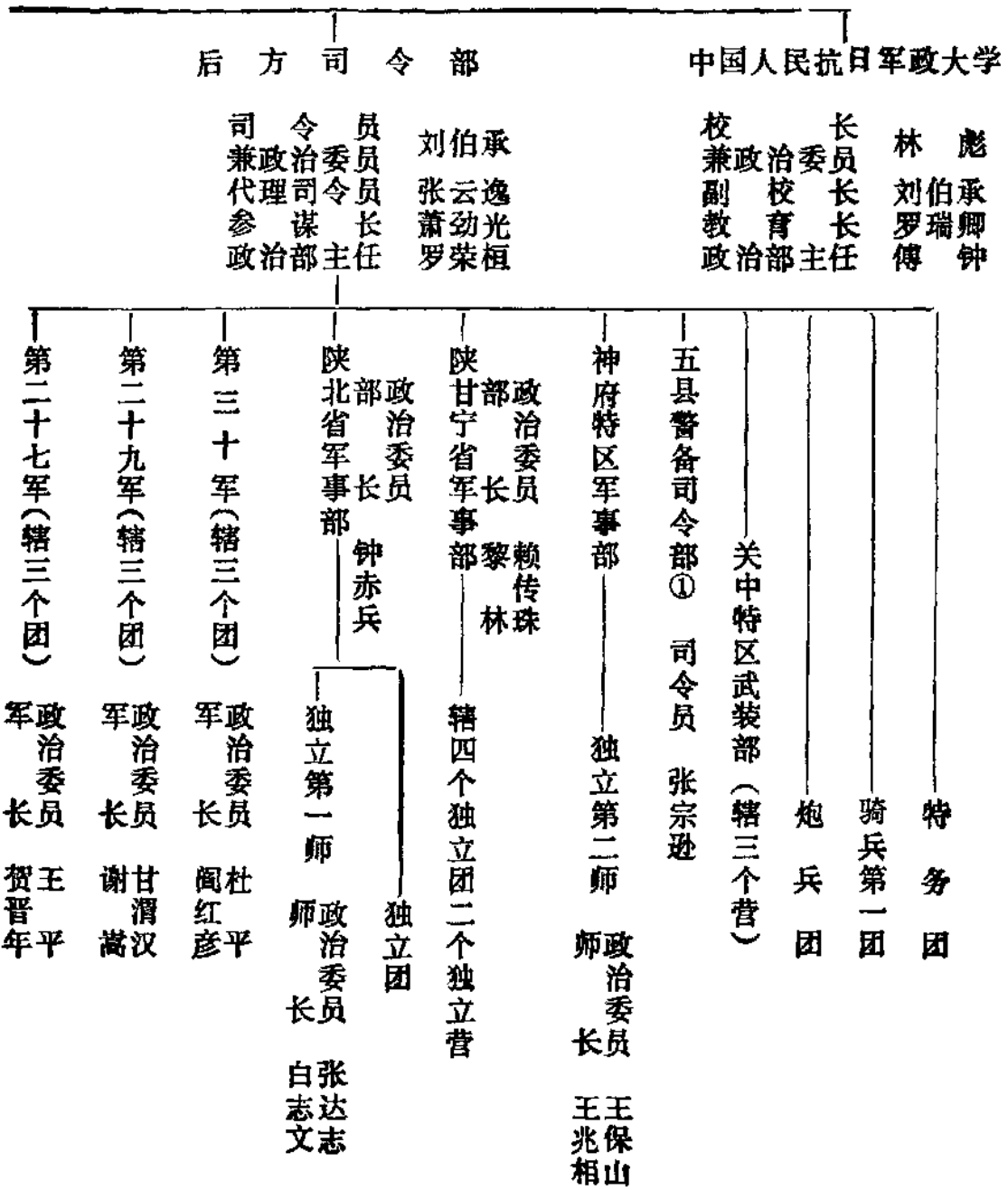
第 一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杨成武  
第 二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邓 华  
第 四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萧 华  
李 天 佑  
杨 勇  
骑 兵 第 二 团

第 七 十 三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赵 凌 波  
第 七 十 五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刘 幼 安  
第 七 十 八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崔 田 民  
田 守 尧

第 四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李 井 泉  
卢 冬 生  
第 六 师 政 治 委 员 长 贺 炳 炎  
廖 汉 生



附表69 (4)



①五县即：延安、延长、甘泉、鄜（富）县、宜川。

#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初期红色游击队概况表<sup>①</sup> 附表70

(1932年——1933年)

南满游击队	队长 孟浩民 袁德胜 (后)	— 第一大队 — 第二大队 — 第三大队 — 第四大队
政治委员	向初民 杨靖宇 (后)	
海龙游击队	队长 王仁斋	— 延吉游击队 — 和龙游击队 — 汪清游击队 — 琿春游击队
政治委员	刘三春	
东满游击队	负责人 童长荣	
珠河游击队	队长 赵尚志	
抗日救国游击军	军长 李延禄	— 第一团 — 第二团 — 第三团 — 骑兵营 — 游击支队 — 步兵营
政治委员	孟泾清	
饶河游击队	队长	
政治委员		
宁安游击队	队长 白殿贞	
汤原游击队	队长 戴洪宾	
政治委员	夏云杰	
巴彦游击队	队长 张甲洲	
海伦游击队	队长 孙玉山	
吉林反日工农义务队	队长 李荆璞	
辽吉边区军	负责人 周保中	

①各游击队均由中共满州省委所属各地党组织领导。

# 东北地区日伪军序列表

附表71 (1)

(1936年——1937年7月)

日本关东军

司令官 南次郎

植田谦吉 (后)

- 陆军第一师团
- 陆军第二师团①
- 陆军第四师团②
- 陆军第九师团③
- 陆军第十二师团
- 独立第一混成旅团
- 独立第十一混成旅团
- 独立第一守备旅
- 独立第二守备旅
- 独立第三守备旅
- 独立第四守备旅
- 独立第五守备旅
- 骑兵集团
- 骑兵第三旅团
- 关东军飞行集团

— 第二军管区  
司令官 吉兴  
日军顾问

- 骑兵第一旅
- 骑兵第二旅
- 骑兵第三旅
- 骑兵第四旅
- 混成第十旅
- 第二教导队

— 第一军管区  
司令官 于琛漱  
日军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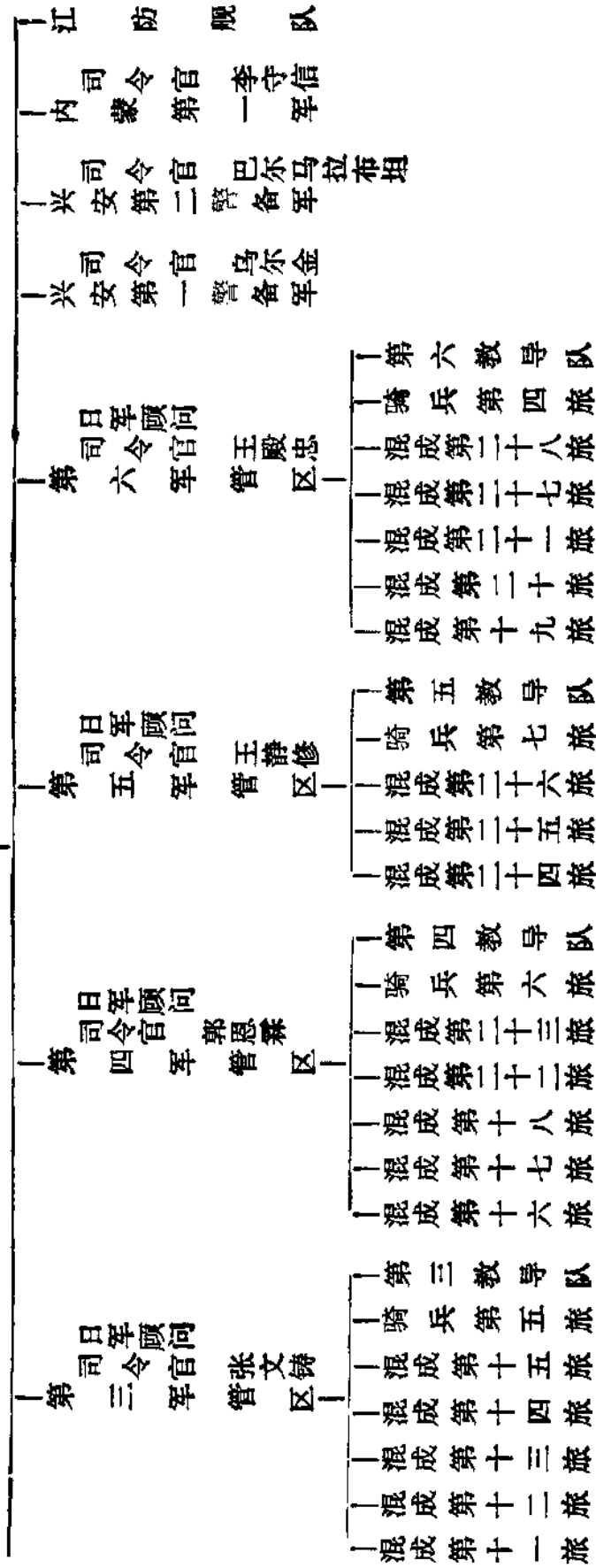
- 混成第一旅
- 混成第二旅
- 混成第三旅
- 混成第四旅
- 混成第五旅
- 混成第六旅
- 第一教导队

①②③第二、第四师团于1937年4月由日本国调来。第九师团于同年5月返回日本国。

附表7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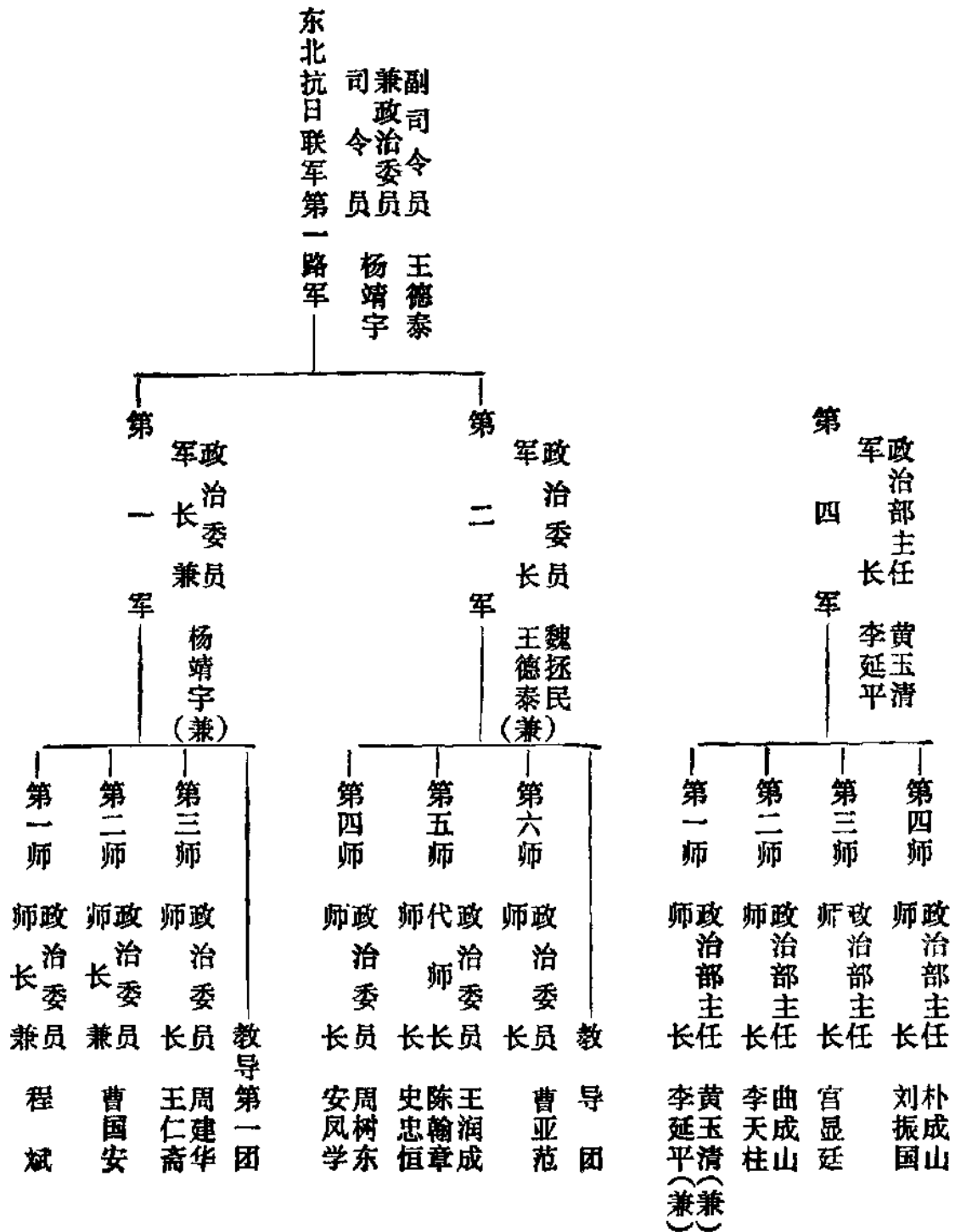
伪满洲国军政部

部长 张于佐  
日军顾问 惠山(后)  
景藏木到一



# 东北抗日联军序列表 附表72 (1)

(1936年1月——1937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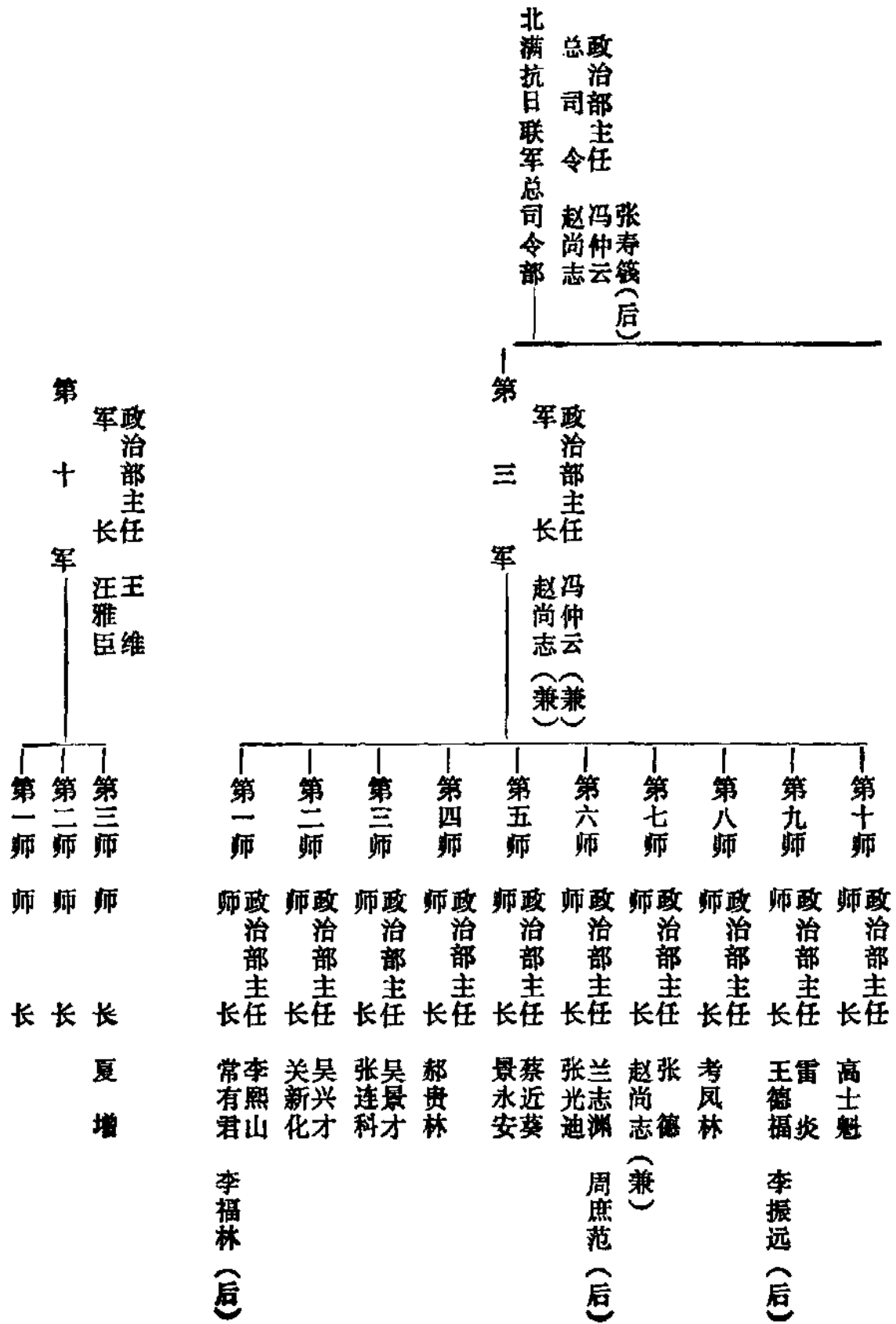


附表7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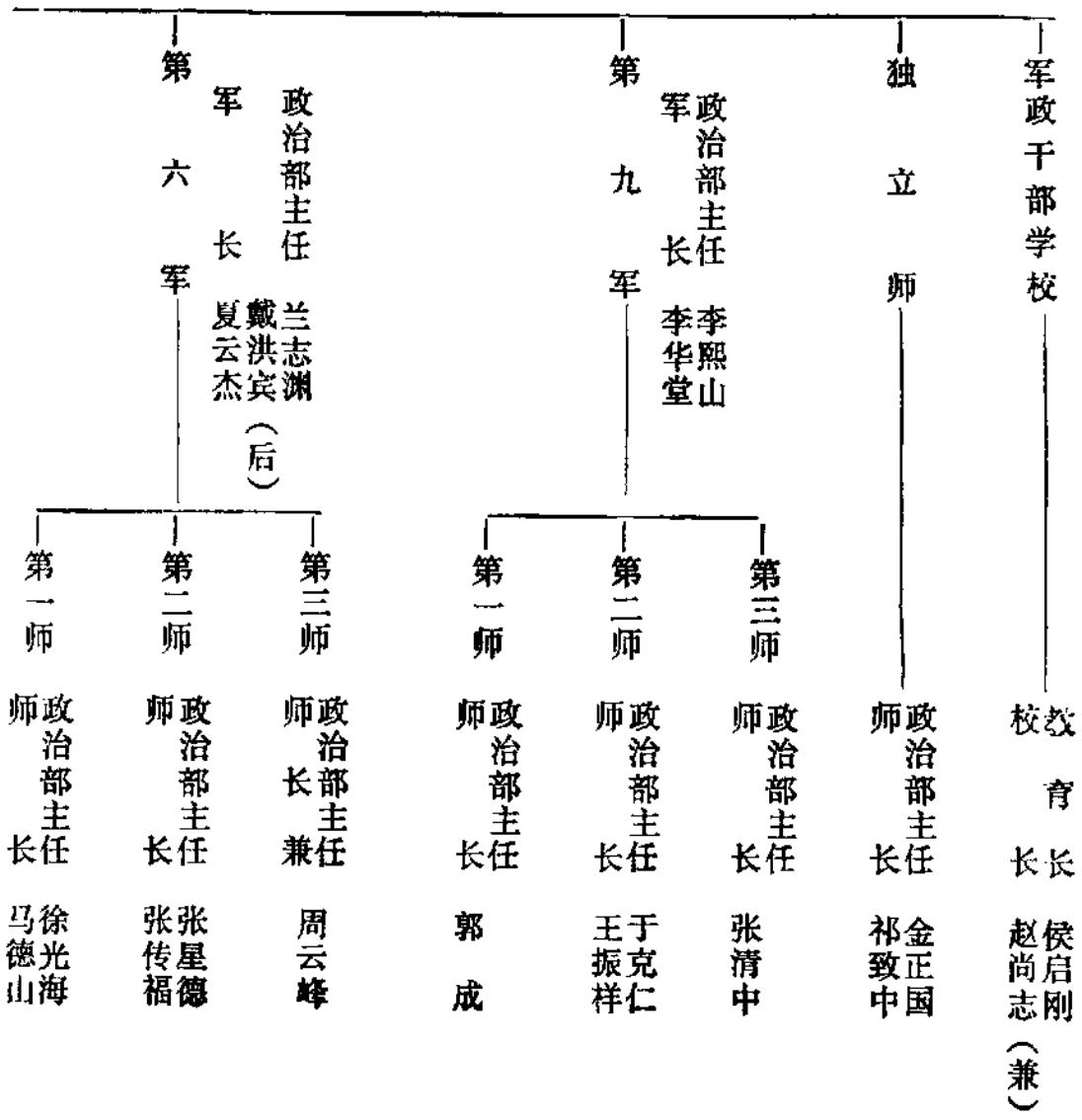
第五军			第七军			第八军																
政治部主任 长			政治部主任 长			政治部主任 长																
宋一夫 周保中			郑鲁岩 李学福 陈荣久 (后)			刘曙华 滕松柏 谢文东																
第一师	第二师	第三师	第一师	第二师	第三师	第一师	第二师	第三师	第四师	第五师	第六师	第七师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师政治部主任 长										
李荆璞	关书范	傅明显	刘曙华	李文彬	张振华	李学福	何可人	邹其昌	云鹤英	景乐亭	李一平	秦秀权	金根	关文吉	姜秀东	王自孚	柴阴轩	尤连升	董宪章	赵庆祥	刘廉汉	赫奎武
宋一夫 王光宇 (后兼)																						



附表72 (3)



附表72 (4)





# 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1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南昌起义	1927.8.1	江西省南昌市	第三、第九军留守部队、第六军第五三团	起义军第二〇军、第十一军第四师等部	占领南昌市，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枝(挺)，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
瑞金、会昌进攻战	1927.8.25—30	江西省瑞金、会昌县境	第八路军之右路军、中路军	南昌起义军第十二军第一师、第二四、第二五师，第二〇军	攻占瑞金、会昌城，歼敌6000余人，缴枪2500余枝(挺)。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9.11—17	湖南省平江、浏阳、醴陵、萍乡地区	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团，当地反动武装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攻占醴陵、浏阳城，歼灭白沙、东门市、老关、醴陵、浏阳等地守敌约2个营。
白石、流沙战斗	1927.9.28—10.3	广东省普宁县顺、境	东路军及潮梅警备队共12个团	南昌起义军第二〇军第一师、第二四师第十一军第二师，第二四师	在白石起以重创，在流沙地区起义军遭敌截击，大部溃散，第二四师余部退入海陆丰地区。
黄麻起义	1927.11.14	湖北省黄安县城	黄安警察队	黄安农军、麻城农军	攻占黄安城，歼敌40余人，缴枪30余枝，子弹90箱。
广州起义	1927.12.11—13	广东省广州市	第四军军部、第二师第三团、新编等部	第四军教导团，工人警卫队7个联队	占领广州市，歼敌1个炮兵团，缴枪1000枝(挺)，火炮25门。起义军余部撤往花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坪石进攻战斗	1928年1月底	广东省乐昌县境	独立第三师	南昌起义军第二五师余部	将敌击溃。
新城进攻战斗	1928.2.18	江西省宁冈县境	第二七师第七九团1个营	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	攻占新城，歼敌1个营，俘200余人。
海陆丰反“清剿”战斗	1928年2月下旬—4月底	广东省海丰、陆丰、惠来、普宁、惠来县境	第五、第十三个团，第九个营，海陆战队及3艘军舰	工农革命军第二、第四师	给敌以杀伤。工农革命军第二、第四师损失过半，余部转入丰顺、五华、揭阳县交界山区。
五斗江、永新进攻战斗	1928年4月下旬	江西省遂川、永新县境	第二七师第八一、第九团，第七九团1个营	红军第四军第二八、第二九团	攻占永新城，歼敌1个团大部，缴枪300余枝(挺)。
峰口袭击战斗	1928.5.20	湖北省沔阳县境	沔阳团防	鄂西地区红军游击大队	歼团防一部，缴枪30余枝。
草市垌遭遇战斗、永新进攻战斗	1928年5月中旬	江西省永新县境	第二七师第九部，第七九团，第九师第二七团1个营	红军第四军第二八团，第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个营	歼敌1个师部、1个团又1个营，缴枪300枝(挺)，迫击炮7门，山炮2门，银元20余担。
龙源口进攻战斗	1928.6.23	江西省永新县境	第二七、第九师	红军第四军	攻占永新城，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400枝，重机枪1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郴县进攻战斗	1928.7.23	湖南省郴 县城	第十六军第四 六师2个团	红军第四军第二 八、第二九团	攻占郴县城，击溃敌2个 团。红军第二九团大部失 散，第二九团余部、第二八 团转移桂东。
平江防御战斗	1928.7.29	湖南省平 江县城	第二军第六、立 第二三师，第二、第 第五师第二、第 三团	红军第五军	毙伤敌500余人。红军撤 出平江城。
黄洋界防御战斗	1928.8.30	江西省宁 冈县境	第八军第一师	红军第四军第三 一、第一营一部	将敌击溃。
遂川进攻战斗	1928.9.13	江西省遂 川县城	独立第七师	红军第四军第二 八团，第三一、二 团一部	攻占遂川城，俘敌200余 人，缴枪100余枝。
新城进攻战斗	1928.10.1	江西省宁 冈县新城	第十四旅第二 七团	红军第四军第二 八、第三一、二 团	攻占新城，俘敌100余人， 缴枪100余枝。
龙源口进攻战斗	1928.11.9	江西省永 新县境	第十四旅第二 七团	红军第四军第二 八、第三一、二 团	占领永新城，俘敌100余 人，缴枪10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长茅岭伏击战斗	1928.12	江西省弋阳、横峰县境	第十二师第三旅1个连	赣东北地区红军第二、第一、第二连	歼敌一部。
太平镇、卒洞湾进攻战斗	1929.1.8—11	湖北省鹤峰县境	鹤峰县团防	湘鄂边地区红军第四军	歼敌100余人。
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反“会剿”	1929年1月底	江西省井冈山地区	第五、第五、第五、第七旅、独立第一旅	红军第五军第一、第三纵队，第四军第三二团	击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八面山阵地失守，红五军主力突围，向赣南转移。
大柏地伏击战斗	1929.2.10—11	江西省瑞金县境	第五师第十五旅	红军第四军第二八、第三一八团	歼敌2个团大部，俘800余人，缴枪800余枝(挺)。
于都奔袭战斗	1929.3.7	江西省于都县城	第十五旅1个营，于都靖卫团、警备队	红军第五军主力	攻占于都城，全歼守敌，缴枪400余枝(挺)。
长岭寨进攻战斗	1929.3.13—14	福建省长汀县境	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	红军第四军第二八、第三一八团	占领长汀城，歼敌2个团大部，缴枪500余枝(挺)，迫击炮3门。
龙岩进攻战斗	1929.5.23	福建省龙岩县城	第一混成旅2个营	红军第四军第二八、第三一八团	攻占龙岩城，歼敌2个营大部，俘200余人，缴枪20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毛家口进攻战斗	1929.3	湖北省监利县境	第五〇师 2 个连	鄂西地区红军游击大队第二中队	歼敌 2 个连，缴枪 130 余枝。
白砂进攻战斗	1929.6.7	福建省上杭县境	第二混成旅 1 个团	红军第四军	歼敌 1 个团。
龙岩进攻战斗	1929.6.19	福建省龙岩县境	第一混成旅主力	红军第四军	攻占龙岩城，歼敌 2000 余人，缴长短枪 600 余枝，机枪 8 挺，迫击炮 4 门。
鄂豫边苏区第一次反“会剿”	1929年6月26日—7月上旬	湖北省黄安、麻城、山安、河南省光山、光山县边界地区	独立第四旅 2 个团，暂编第二旅 1 个营	鄂豫边地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一师	歼敌 100 余人，缴枪 40 余枝。
白沙关进攻战斗	1929.7.1	河南省光山	光山县民团	鄂豫边地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一师，地方武装	歼敌数百人。
南岔、赤溪反击战斗	1929年7月上旬—中旬	湖南省桑植县境	湖南警备第一军第三团等部	湘鄂边地区红军第四军	歼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枝(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石首反击战斗	1929.8	湖北省石首县境	第五〇师1个连	鄂西地区红军游击大队第二中队	歼敌1个连,缴枪70余枝。
鄂豫边苏区第二次反“会剿”战	1929年8月10日—9月下旬	湖北省黄安、麻城,河南省光山、商城地区	第十三师,第十五六师1个营	鄂豫边地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师,豫东南地区第二、三师	歼敌100余人,缴枪数十枝。
溪南、漳平进攻战	1929.8.29—30	福建省漳平县境	暂编第一师第一旅	红军第四军第二、第三纵队	攻占溪南、漳平,歼敌1个团又1个营。
赤石进攻战斗	1929.9.13	广东省海丰县	保安团	海陆丰地区红军	缴枪32枝。
上杭进攻战斗	1929.9.21	福建省上杭县城	第二混成旅	红军第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	攻占上杭县城,歼敌2000余人。
梅县进攻战斗	1929.10.25	广东省梅县城	第三师教导团一部	红军第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	攻占梅县城,守敌溃逃。
周坊进攻战斗	1929.10	江西省贵溪县境	第十八师1个连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歼敌约1个连,缴步枪60余枝,机枪1挺。
马家坪袭击战斗	1929.10	江苏省如皋县境	如皋自卫团	如皋红军大队	全歼自卫团,缴枪6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陵水袭击战斗	1929年秋	海南省陵水县境	民团一部	琼崖红军独立团	缴枪20余枝。
白羊庙袭击战斗	1929年11月初	四川省万源县境	第三路军第三团1个营	川东地区红军游击军第一路	毙敌数十人。
燕子河、长山冲进攻战斗	1929.11.19	安徽省霍山县境	霍山自卫团	豫东南地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二师	歼敌一部，缴枪50余枝。
小河口反击战斗	1929.11.24	湖北省石首县境	石首县团防、藕池商团	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总队第二大队	全歼敌团防、商团，俘敌200余人，缴枪100余枝。
三官店进攻战斗	1929.11	湖北省监利县境	新编第一师1个连	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总队第一、第三大队	歼敌1个连，缴枪100余枝。
商城袭击战斗	1929.12.25	河南省商城县城	商城民团	豫东南地区红军第十一军第三二师	攻占商城，歼敌300余人。
罗溪袭击战斗	1929.12	湖北省巴东县境	罗溪团防	巴兴归地区红军游击队	全歼守敌，缴枪30余枝。
隆安防御战斗	1930.2.6	广西省隆安县城	桂系军阀部队	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一部	歼敌一部，红军撤出隆安。
亭泗反击战斗	1930年2月中旬	广西省恩隆县境	桂系军阀部队	红军第七军第一、第二纵队	给敌以重创，敌军停止追击。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新沟阻进攻战斗	1930.2.14	湖北省监利县境	新编第五师1个连	鄂西地区红军第六军	歼敌1个连,缴枪30余枝。
水南、值夏进攻战斗	1930.2.24—25	江西省吉水、吉安水境	独立第十五旅	红军第四军,赣西南地区第六军一部	歼敌大部,俘1600余人。
黄茅、古港、献钟进攻战斗	1930.1—3	江西省万载、湖南省浏阳、平江地区	正规军、靖卫团各一部	红军第五军第二纵队	缴枪500余枝。
大冶、阳新等地进攻战斗	1930.1—4	湖北省大冶、阳新、通山县境	正规军、靖卫团各一部	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	缴枪200余枝。
安福进攻战斗	1930.3.7	江西省安福县城	正规军1个营,安福靖卫团	红军第五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	攻占安福县城,歼敌600余人,缴枪300余枝。
郝穴进攻战斗	1930.3.8	湖北省江陵县境	独立第十四旅2个营	鄂西地区红军第六军	歼敌2个营,俘80余人,缴枪160余枝。
分宜进攻战斗	1930.3.12	江西省分宜县城	靖卫团	红军第五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	缴枪10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四甲坝、四扬坝进攻战斗	1930.3.21	江苏省海门县境	海门县警察队	通海如泰地区红军第一支队	歼敌约300人,缴枪180余枝。
袁州进攻战斗	1930.3.29	江西省袁州(今宜春县)城	第十八师新兵团营、宜春靖卫团	红军第五军第三、第四纵队	歼敌1个营,缴枪300余枝。
光山南部进攻战斗	1930.3	河南省光山县境	光山县自卫团	鄂豫边地区红军第三一师,豫东一地区第三二师	缴枪200余枝。
梅岭关遭遇战斗	1930.4.1	江西省大余县境	粤军2个营	红军第四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	歼敌2个营。
潞口截击战斗	1930年4月上旬	江西省莲花县境	第十八师第五四旅后卫部队	红军第五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	歼敌一部,缴长短枪300余枝,机枪5挺,子弹50余担。
榕江进攻战斗	1930.4.30	贵州省榕江县城	贵州省军阀部队1个团	红军第七军第一、第二纵队	攻占榕江城,歼敌5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电台1部。
林招防御战斗	1930.4	广东省潮阳县境	第六二师第一二旅第二四五团	东江地区红军第四七、第四九团	缴枪4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梅林、安流进攻战斗	1930.4	广东省五华县境	五华县民团	东江地区红军第四六团	全歼民团。
土地垭反围攻战斗	1930.5	湖南省澧县境	石门县团防	湘鄂边苏区红军第四军	击溃石门团防，俘敌70余人，缴枪100余枝。
秧坂进攻战斗	1930.5.5	江西省乐平县境	正规军1个连，靖卫团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歼敌1个连，缴枪120余枝。
平江进攻战斗	1930.5.6	湖南省平江县城	第十九师1个团	红军第五军	攻占平江城，歼敌大部，缴长短枪700余枝，机枪11挺。
修水进攻战斗	1930.5.15	江西省修水县城	第五师独立团	红军第五军	攻占修水城，歼敌1个营，缴枪300余枝。
蔡阳铺袭击战斗	1930.5.12	湖北省枣阳县境	当地团防	鄂北地区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	歼团防一部，缴枪42枝，子弹1万余发。
汤家直进攻战斗	1930.5.20	江苏省南通县境	南通“白龙党”匪部	红军第十四军第一支队	歼敌60余人。
河口进攻战斗	1930.5	江西省铅山县境	靖卫团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缴枪5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万年进攻战斗	1930.5	江西省万年县城	靖卫团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缴枪55枝。
百色进攻战斗	1930年6月初	广西省百色县城	桂军1个团	红军第七军第一、第二纵队	攻占百色城，歼敌500余人，缴枪300余枝(挺)。
黄石港进攻战斗	1930.6.13	湖北省大冶县境	第二〇军1个团	红军第三军团	攻占黄石港，击溃敌1个团，缴长短枪300枝，机枪2挺。
六安、霍山地区进攻战斗	1930年6月中旬	安徽省六安、霍山县境	新编第五旅，当地反动武装	红军第一军第二、第三师	攻占霍山城，歼敌1700余人，缴机枪1挺，迫击炮1门及大量枪枝弹药。
杨平口伏击战斗	1930.6.29	湖北省孝感县境	第二〇军独立旅第一团	红军第一军第一师	歼敌1个团，共毙伤俘1000余人，缴枪800余枝(挺)。
百色进攻战斗	1930年6月下旬	广西省百色县城	滇军第一师	红军第七军第一、第二纵队	攻占百色城，毙伤敌约600人，缴枪300余枝(挺)，子弹2万余发。
岳阳进攻战斗	1930.7.4	湖南省岳阳县城	第四五旅	红军第三军团第五、第八军	攻占岳阳，击溃敌1个旅，歼敌2个营，缴长短枪500余枝，机枪18挺，弹药250余担。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大金铺进攻战斗	1930.7.13	安徽省英山县境	独立第二旅	红军第一军第二、第三师,英山县游击队	占领英山县城,歼敌1000余人。
长沙战役	1930.7.23—27	湖南省平江县境,长沙城	第四路军第十师,第十九师,第五、第九旅,教导团等部	红军第三军第五、第八、第十六军	攻占长沙,俘敌4000余人,缴长短枪约3000枝,机枪28挺,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弹药、物资一批。
樟树镇进攻战斗	1930.7.24	江西省清江县境	第十八师一部	红军第一军第四师	攻占樟树镇,击溃敌2个营,俘100余人,缴枪约200枝(挺)。
花园进攻战斗	1930.7.29	湖北省孝感县境	教导第三师第五团	红军第一军第一师	攻占花园车站,歼敌1个团,毙俘敌1400余人,缴长短枪800余枝,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
文家市进攻战斗	1930.8.20	湖南省浏阳县境	湘军第三纵队	红军第一军团	歼敌3个团又1个营,俘1000余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长短枪1500余枝,机枪37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长沙战役	1930.8.29 —9.12	湖南省长沙	第十五、第十、第九、第六、第七、第三、第七旅、新编第七师、独立第七师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	歼敌新编第三一师、补充第六团、特务营、工兵营等各一部共2个多团，俘1000余人。
江桥反击战斗	1930.9.4	江西省湖口县境	警备队1个团，南京警备团1个营，都保卫团、鄱阳卫团	红军第十军	毙敌团长以下500余人，俘200余人，缴长短枪300余枝，机枪2挺。
监利进攻战斗	1930.9.23	湖北省监利县城	新编第三师教导团，监利保安团	红军第二军团	攻占监利城，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迫击炮5门。
吉安进攻战斗	1930.10.4	江西省吉安县城	新编第三师一部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主力	攻占吉安城，歼敌一部。
新店进攻战斗	1930.10.7	江西省萍乡县境	第七七师1个营	湘东地区红军独立师	歼敌1个营，缴枪200余枝。
新洲奔袭战斗	1930.11.30	湖北省黄冈县境	第二六师第二混成旅	红军第一军第一、第二师	歼敌1个混成旅。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通城进攻战斗	1930.12.18	湖北省通城县城	第十师第一旅1个团，接户团	红军第十六军	攻占通城，歼敌1个团及接户团一部，俘1500余人，缴枪800余枝(挺)。
上饶进攻战斗	1930.12.18	江西省上饶饶县城	上饶、玉山、弋广丰、铅山、弋阳五县靖卫团	红军第十军	攻占上饶城，全歼靖卫团，俘敌50人，缴枪120余枝。
河口奔袭战斗	1930.12.22	江西省铅山县境	新编第十三师1个团	红军第十军	歼敌1个团，俘300余人，缴长短枪400余枝，机枪4挺，迫击炮4门。
五里坪战斗	1930.12.29	湖北省鹤峰县境	覃伯卿、甘占元等部	红军第二军团	收编敌3000余人。
金家寨、苏家埠进攻战斗	1930.12.14—18	安徽省六安皖县境	第四六师3个营，民团	红军第一军主力	歼敌3个营，缴枪1400余枝(挺)，迫击炮2门。
河口进攻战斗	1930.12.16	湖北省黄陂县(今大悟县)境	第四四师1个团	红军第十五军	歼敌一部。

第一次反「围剿」  
鄂豫皖苏区红军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第一次反「围剿」 鄂豫皖苏区红军 东、西香 火岭反击战 战斗	1930.12.30	安徽省六 安县境	第四师、警 备第二旅	红军第一军主力	歼敌3个团，击溃1个多 旅，毙俘3000余人，缴枪 1700余枝(挺)，迫击炮数门， 电台1部。
四顾墩进 攻战斗	1931.1.3	河南省商 城县境	第三〇师第八 九旅	红军第一军第 一、第二师	歼敌1个团，缴枪400余枝 (挺)，山炮1门。
龙冈反击 战斗	1930.12.30	江西省永 丰县境	第十八师第五 二、第五三旅	红军第一军团第 四、第十二 三、第三军团 军，	歼敌1个师部和2个旅约 1万人，缴各种武器9000余 件，俘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 张辉瓒。
东韶追击 战斗	1931.1.3	江西省宁 都县境	第五〇师第一 四、第一四九 旅，师特务营、 工兵营	红军第一军团第 三、第四、第十二 军，	歼敌1个多旅，缴各种武 器2000余件，电台1部。
华容地区 进攻战斗	1931年1月 上旬	湖南省华 容县境	新编第十一师 一部	红军独立团、江 右军	占领敌华容城，歼敌1个 营又2个连。
茅铺进 攻战斗	1931年2月 初	湖北省江 陵县境	第四八师第一 二旅一部，补 充第二二团	红军独立团、江 右军	歼敌一部，缴迫击炮2 门，重机枪2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酃县进攻战斗	1931.1.30	湖南省酃 县城	酃县保安团	湘东地区红军独 立师	攻占酃县城，歼敌1个保 安团。
新集进攻战斗	1931.2.10	河南省光 山县境	正规军一部	鄂豫皖苏区红军 第四军	攻占新集，歼敌1000余 人。
暖水进攻战斗	1931.2.25	江西省德 兴县境	第五五师1个 营	红军第十军	歼敌1个营。
双桥镇进攻战斗	1931.3.9	湖北省孝 感县境	第三四师	鄂豫皖苏区红军 第四军，罗山独立 团	歼敌1个师，俘师长岳维 峻以下5000余人，缴枪6000 余枝(挺)，迫击炮10门，山 炮4门。
金家铺、英山进 攻战斗	1931.3.11 —12	安徽省英 山县境	新编第五旅	鄂豫皖苏区红军 教导第二师	攻占英山城，歼敌1个旅 大部，俘800余人，缴枪660 枝(挺)，迫击炮1门。
鸡腰山战斗	1931年3月 中旬	江西省上 饶县境	第四师第十旅 1个团	红军第十军	歼敌2个连。
麻埠进攻战斗	1931.3.24	安徽省六 安县境	第四六师1个 团，民团	鄂豫皖苏区红军 教导第二师	俘敌700余人，缴长短枪 750余枝，重机枪2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二次反“围剿” 洪湖苏区红军第	朱河、峰 口进攻战斗	湖北省沔 阳县、监利 县境	新编第二、新 编第三旅各1个 团	红军独立团、江 左军	歼敌1个团大部又1个营。
	老新口进 攻战斗	湖北省监 利县境	新编第三旅	红军第三军第九 师	歼敌2个营，击溃2个团， 缴枪500余枝(挺)。
	沙岗、普 济观进攻战 斗	湖北省江 陵县境	第四师第一 旅第二旅一部	红军第三军第九 师	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 余枝(挺)。
贵溪、余江地区 进攻战斗	1931年4月 月上旬	江西省贵 溪、余江地 区	第十八师1个 团，余江保安团 第三大队	红军第十军	歼敌1个团，俘300余人， 缴枪200余枝(挺)。
野三关、三尖观 进攻战斗	1931.4.4	湖北省巴 东县境	正规军1个团	湘鄂西苏区红军 第三军第七、第八 两师	歼敌1个团。
廖塘桥、古田地 区伏击战斗	1931.4.15	江西省安 福县境	第五二师第一 旅第四旅	红军第七军，湘 东南地区独立师， 第二〇军第一七五 团	歼敌700余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第二次反“围剿” 鄂豫皖苏区红军	独山进攻 战斗	安徽省六安 安	第一师第一 旅1个团	红军第四军第十 一、第十二师，第 十师主力	攻占独山镇，歼敌1个 团，共毙伤俘2000余人，缴 枪1200余枝（挺）。
	洛湾反击 战斗	河南省光 山县	第五三师第一 五七旅	红军第四军主力	歼敌约1000人，击溃敌1 个旅。
	十里铺伏 击战斗	湖北省黄 安县	第四四师第一 三三旅	红军第四军主力	歼敌约2个团。
赤石街进攻战斗	1931.5.2	福建省崇 安县	海军陆战队一 部	红军第十军	歼敌一部。
第二次反“围剿” 红军第一方面军	富田反击 战斗	江西省吉 安县	第二八师，第 四七师1个旅	红军第一军团第 四、第十二军，第 六四师，第三军团， 第三五军	歼敌第二八师大部、第四 七旅一部，缴长短枪5000余 枝，机枪50余挺，迫击炮30 余门，山炮2门及无线电全 部器材。
	白沙进攻 战斗	江西省吉 水县	第四三师一 部，第四七师1 个旅残部	红军第一军团第 三、第四军，第三 军团	歼敌第四三师一部，第四 七师1个旅残部，缴枪4000 余枝，机枪30余挺，山炮2 门。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第二次反“围剿” 红军第一方面军	中村进攻 战斗	江西省永 丰县境	第二七师第八 一旅	红军第一军团第 四、第十二、第 三、第三军团	歼敌约1个旅，缴长短枪 3000余枝，机枪10余挺。
	广昌进攻 战斗	江西省广 昌县城	第五师4个团	红军第一军团第 四、第十二、第 三军团	攻占广昌城，歼敌一部。
	建宁进攻 战斗	福建省建 宁县城	第五六师	红军第三军团， 第一军团第十二 主力	攻占建宁城，歼敌3个多 团，俘3000余人，缴枪2500 余枝（挺）及大批药品。
均县进攻战斗	1931年5月 底	湖北省均 县城	第六九师1个 营	湘鄂西苏区红军 第三军主力	攻占均县城，歼敌1个营 大部。
通山进攻战斗	1931.6	湖北省通 山县城	新编第十师	红军第十六军第 七师，独立第 三师	歼敌1个团。
木石港进攻战斗	1931.7.14	湖北省阳 新县境	第二六师	红军第十六军第 七师，独立 第三师	收复木石港，击溃敌2个 团。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英山进攻战斗	1931.8.1	安徽省英山县城	第五七师1个团，地方反动武装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军主力	攻占英山城，歼敌1个多营，俘1800余人，缴长短枪1000余枝，重机枪18挺，迫击炮6门。
莲塘进攻战斗	1931.8.7	江西省兴国县境	第四七师第二旅	红军第一军第三二团，第三二团，第七军	歼敌第四七师1个旅及2个营、第五四师师部及3500余人，缴枪3100余枝，机枪40余挺，迫击炮14门，马200余匹，子弹30余万发，电台2部。
良村进攻战斗	1931.8.7	江西省兴国县境	第五四师2个旅	红军第一军第三二团，第七军	
黄陂进攻战斗	1931.8.11	江西省宁都县境	第八师2个团	红军第一军第四师，第二军第四师，第七军	歼敌约4个团，俘40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机枪30余挺，迫击炮11门，子弹40余万发，电台1部。
老营盘进攻战斗	1931.9.7	江西省泰和县境	第九师独立旅	红军第一军第五师	歼敌1个旅，俘2000余人，缴长短枪2000余枝，机关枪35挺，迫击炮10门，子弹60余万发，电台1部。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同 高兴圩进攻战斗	1931.9.7	江西省兴国县境	第六〇、第六一师	红军第三军团，第一军团第四军，第五师，第三五、第七军	毙伤敌2000余人。
上 方石岭追击战斗	1931.9.15	江西省兴国县境	第五二师，步九师炮兵团，步兵1个营	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	歼敌1个师、1个炮兵团又1个营，俘5000余人，缴长短枪4500余枝，机枪70余挺，子弹120余万发，马200匹。
沙洋进攻战斗	1931.8.17	湖北省荆门市境	新编第三旅旅部，第二团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第九师主力	歼敌1个旅部及1个团，
漕河镇进攻战斗	1931.8.19	湖北省蕲春(今浠水)县境	新编第八旅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军2个团	歼敌1个旅，俘敌1600余人，缴枪1200余枝(挺)，火炮14门。
洗马贩进攻战斗	1931.9.1	湖北省蕲春县境	第十军第一二、一四二旅各2个团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军主力	歼敌3个团大部。
永阳镇进攻战斗	1931.9.29	江西省吉安县境	第二八师1个团	湘赣苏区红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七团	歼敌1个团，俘敌约1000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仁和集进攻战斗	1931.10.3	河南省潢川县境	第十二师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军主力	歼敌2个团，缴长短枪1000余枝，机枪12挺。
洪湖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1931.9—10	湖南省华容县境	第十九师，新编第七旅 第十一师，新编第七旅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九师第二五团，东山游击队	毙俘敌200余人，缴枪100余枝（挺）。
后港、拾回桥战斗	1931年11月上旬	湖北省荆门市境	第二一军教导师2个旅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歼敌2个营，击溃敌2个旅。
黄安战役	1931.11.10—12.23	湖北省黄安县境	第三、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三师各部	红军第四军第十师，黄安第十一个独立团	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溃援敌5个旅，共毙伤敌5000余人，俘师长赵冠英以下约1万人，缴枪7000余枝（挺），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
商潢战役	1932.1.19—2.2	河南省商城、潢川地区	第二、第十二、第五、第七、第八、第九师，独立第三旅	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第七师	歼敌约5000人，击溃敌4个师又1个旅。
苏家埠战役	1932.3.22—5.8	安徽省六安、霍山地区	第四、第五、第七、第十二、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旅	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五军第二师，六安独立团	歼敌3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2万余人，缴长短枪1.2万余枝，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

第三次“围剿”计划  
红军第四方面军粉碎敌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同上	1932.6.12—16	河南省潢川、光山地区	第二〇路军第七五、第七六师，新编第二〇师	红军第四军，第二五军第七三师，少共国际团	歼敌8个团，共毙伤俘约1万人，缴枪7000余枝（挺）。
皂市进攻战斗	1931.11.12	湖北省天门县境	武汉保安团等部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歼敌一部，俘800人，缴800余枝（挺）。
澧田伏击战斗	1931年12月初	江西省永新县境	第十四师1个营，永新保安队	湘赣苏区红军独立第三师，河西教导队	歼敌1个营又1个保安队。
上达河进攻战斗	1931.12.29	湖北省房县境	兴安警备旅	鄂西北苏区红军第二五师	歼敌2个团，俘旅长以下900余人，缴枪1000余枝（挺）。
陈家河进攻战斗	1932年1月初	湖南省桑植县境	新编第三旅1个团	湘鄂边苏区红军独立团	击溃敌1个团，缴长短枪100余枝，机枪2挺，迫击炮4门。
六村源进攻战斗	1932.1.8	甘肃省合水县境	甘军暂编第十三师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歼敌2个连。
龙王集进攻战斗	1932.1.21—25	湖北省应城县境	第四师第十二旅，第十军特务团，第四八师工兵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第九师，汉川独立团	歼敌1个旅部、3个团，1个营大部，俘旅长以下约4000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机枪60余挺，迫击炮20余门。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赣州战役	1932.2.4 —3.7	江西省赣州地区	第十二师第三、第四旅，第十四师，赣南民团	红军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歼敌1个多团，俘敌300余人。红军伤亡较大，撤出战斗。
杨坡头伏击战	1932.2.16	陕西省柞水县境	陕军警卫团、地方民团各一部	陕甘地区红军游击队	歼敌1个营及民团一部，俘400余人，缴枪400余枝(挺)。
文家墩进攻战	1932.3.6 —7	湖北省天门县境	第四八师第四旅，第四师第一、三、四旅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师，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歼敌1个旅，击溃1个旅，俘旅长以下2000余人。
瓦庙集遭遇战	1932.3.30 —4.5	湖北省京山县境	第四四师2个旅，第四一、四八师各1个旅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歼敌2000余人，击落飞机1架。
漳州战役	1932.4.3 —4.20	福建省龙岩、漳州地区	第四九师，粤军一部	红军第一、第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攻占龙岩、漳州，歼敌2个旅大部，俘2300余人，缴枪5000余枝(挺)，火炮8门，飞机2架，筹款100余万元。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栉邑奔袭战斗	1932.4.20 —21	陕西省枸 邑县城	陕军警卫团、 地方民团各一部	陕甘地区红军游 击队	歼敌2个连及民团一部， 俘300余人，缴枪近400枝 (挺)，子弹1万余发。
陕甘边红军反 “进剿”作战	1932.5.15 —31	陕西省宜 君、洛川、境 宜川等县境	第八六师	陕甘地区红军游 击队	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 余枝(挺)，弹药2万余发， 军马数十匹。
张家场进攻战斗	1932.5.23 —30	湖北省天 门县境	第四四师，第 十军特务团	湘鄂西苏区红军 第三军	歼敌800余人。
集龙圩进攻战斗	1932.5.29 —30	湖南省汝 城县境	湘军第十五师	红军第三军团	歼敌300余人，俘敌1个 排。
新沟阻防御战斗	1932.6.13	湖北省监 利县境	川军第二、第 三、第四 师各一部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九 军第七、第九军学校 师，湘鄂西省军警学 队	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 余枝(挺)。
赣东北苏区红军 第二次入闽作战	1932.9.17 —20	福建省崇 安、浦城 县境	第五六师	红军第十军，闽 北独立团	攻占星村、赤石、浦城， 歼敌3个团，缴枪480余枝， 电台2部，筹款10万元。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鸡公山进攻战斗	1932.6.25	河南省信阳县境	第三五师	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	歼敌1个团。
第一次围攻麻城战斗	1932.7.8—26	湖北省麻城	第三〇、第三一师	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十二师、第五军第七三师	歼敌1个旅又1个团，俘2000余人，击溃敌2个旅，缴枪3300余枝（挺），山炮5门。
霍邱防御战	1932.7.7—12	安徽省霍邱县城	第四师	红军第二五军1个团	红军大部伤亡，霍邱县城失守。
第二次围攻麻城战斗	1932.8.8	湖北省麻城	第三一师	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	歼敌1个团。
冯寿二、冯秀驿阻击战斗	1932.8.10—13	湖北省黄安县境	第十、第八三、第八九师	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十二师、第五军第七三师，独立第一师	重创敌2个师，毙伤2000余人。红军主动转移，黄安县城被敌占领。
七里坪反击战斗	1932.8.15	湖北省黄安县境	第二、第三、第八〇师	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五军第七三师，独立第一师	歼敌4个团大部。

##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同 上	胡山寨阻击战	河南省光山县胡山寨(今属新县)	第三、第五、第八〇、第八三师	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十一、第十二师、第二五军第七三师	歼敌2000余人。
	河口遭遇战	湖北省黄陂县(今大悟)境	第一、第八八师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二五军	毙伤敌3000余人,缴机枪100余挺。
南雄、水口战役	1932.7.2—10	广东省南雄、江西南康、大余、信丰等县境	粤军第一、第五、第四、第三师,蒋二、独立第三旅,蒋独立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二、五师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第五、第六师,立闽西军区第十二军	击溃粤军15个团。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草市进攻战	湖北省江陵县境	川军第二一军一部	红军第三军第八师	歼敌500余人,缴枪数百枝。
	沙市进攻战	湖北省沙市、江陵县境	川军第二一军一部	红军第三军第七师	红军失利,撤出战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新沟咀、 杨林关防御 战斗	1932.8.24 —31	湖北省监 利县境	第三、第四、第八、 第十师，独立第三旅， 第七、第八旅，第十 新编第十军特务团	红军第三军第七 师	红军损失1个多团，撤出 战斗
乐安、宜黄战役	1932.8.16 —23	江西省乐 安、宜黄县 地区	第八、第十、第二、 第十、第十一、第二〇 第三、第四、第九〇 三、七、二师，骑兵第四师	红一方面军第五 军第三、第一、第二、第 团、第三、第四、第五、第 军江西第二、第四、第五、 第三、第六、第十二、第 七、第八师	攻占乐安、宜黄，占领南 丰、宁化，歼敌约3个旅，俘 5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 (挺)。
照金奇袭战斗	1932.9.12	陕西省耀 县境	富平、同官、 耀县民团	陕甘地区红军游 击队	歼敌400余人，缴枪300余 枝。
建黎泰战役	1932.10.16 —11.3	陕西省黎 江县，福建 省建宁、泰 宁等县境	第八、第二、第三、 第二、第四、第五、第 四、新编第四旅 第二师，新编第四旅 等部	红一方面军第五 军第三、第二、 第一、第三、第二、 第一师	占领建宁、黎川、泰宁、 邵武、光泽等城，歼敌1个 团，击溃敌4个师及1个旅各 一部。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新集反击战	1932.10.19—21	湖北省枣阳县境	第一、第十、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师，独立第三四旅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七师，少共国际团	毙伤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挺)，火炮5门，子弹100余箱。
	1932.10.22				
王曲镇、攻子午镇战斗	1932.11.28	陕西省长安以南地区	陕军第十七师一部，混成旅等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七三师	歼敌4个营，击溃陕军一部。
筱竹镇进攻战斗	1932.12.1	陕西省郿县(今户县)境	第一、第四、第四二、第四四、第四五、第四六、第四七师，陕军警备旅等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七三师	歼敌1个旅，俘敌数千人。
金资战役	1932.11.16—1933.1.9	江西省金溪县、资溪县地区	第八、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第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	占领金溪、资溪城，歼敌1个旅又1个团，多师，4000余人，击溃敌3个师，缴枪4000余枝(挺)。
武关阻击战	1932年11月下旬	陕西省商南县境	第六四师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歼敌1个营。

皖苏区向西转移的作战  
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通江城进攻战斗	1932.12.25	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川军第二九军第一师一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一、第十二师	占领通江城，歼敌2个营及民团一部。
恩歌咀、清江渡进攻战斗	1932年12月下旬—1933年1月		川军第二九军第三师、第一路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一、第十二师	占领巴中城，歼敌1个多团，另毙伤俘敌1600余人。
大河口遭遇战斗	1932年12月底		川军第二九军第二路一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七三师	歼敌1个多团，1933年2月1日占领南江城。
焦家坪奔袭战斗	1932.12.27	陕西省宜君县境	宜君县民团一部	红军第二六军第二团	全歼民团。
大昌镇阻击战斗	1932.12	四川省巫山县境	川军第二一军，保安团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歼敌1个营及保安团一部。
双河山进攻战斗	1933.2.5—6	河南省商河县双河山城(今属安徽省)	第七五师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八军	歼敌约1个团。
木门、长池阻击战斗	1933.2.18—28	四川省南江县境	第二九军第五师，第四、第五师，独立师	红军第十一、第七三师	歼敌5000余人。
红军反三路围攻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红军第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	八庙埡反击战	四川省南江县境	第二九军第一师	红军第十一、第七三师主力	歼敌1个团又1个营。
	南坎坡反击战	四川省巴中县境	第二九军一部	红军第十二师	歼敌1000余人。
	空山坝反击战	四川省通江县境	第二九军13个团	红军第十、第十二、第七一、第三师	收复通江、南江、巴中三城。歼敌7个团，击溃敌6个团，毙伤俘5000余人。
	旺苍坝追击战	四川省广元县境	第二九军一部	红军第七三师	歼敌1个旅大部。
	黄陂伏击战	1933.2.27—3.1	江西省宜黄县境	第五二、第五九、第五一师	红军第一、第三、第五二、第十二、第二二、第二三、第二四、第二五、第二六、第二七、第二八、第二九、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二、第三三、第三四、第三五、第三六、第三七、第三八、第三九、第四〇、第四一、第四二、第四三、第四四、第四五、第四六、第四七、第四八、第四九、第五〇、第五一、第五二、第五三、第五四、第五五、第五六、第五七、第五八、第五九、第六〇、第六一、第六二、第六三、第六四、第六五、第六六、第六七、第六八、第六九、第七〇、第七一、第七二、第七三、第七四、第七五、第七六、第七七、第七八、第七九、第八〇、第八一、第八二、第八三、第八四、第八五、第八六、第八七、第八八、第八九、第九〇、第九一、第九二、第九三、第九四、第九五、第九六、第九七、第九八、第九九、第一〇〇师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草台岗进攻战	1933.3.21	江西省宜黄县境	第十一师，第九、第五九师各部	歼敌近1个师，缴枪数千枝(挺)。

成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郭家河进攻战斗	1933.3.6	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今属新县)	第三五师第一〇三、第一〇四旅各1个团	红军第二五军第七四师, 军特务营	歼敌2个团, 俘敌2000余人, 缴枪2000余枝(挺), 火炮9门, 子弹10万余发, 马100余匹。
门坎山战斗	1933.3.28	河南省商城县境	第七五师第二二四旅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八军	毙伤敌数百人。
港口战斗	1933年4月初	江西省宜春县境	第七七师	红军第十六、第三十八军, 独立第三师	歼敌4个营, 缴长短枪660余枝, 机枪15挺。
株木桥战斗	1933年4月中旬	江西省万载县境	第十六师, 湖南保安队	红军第十六、第三十八军, 独立第三师	毙伤敌600余人。
季田打进攻战斗	1933.4.7	江西省遂川县境	第二八师1个加强营	红军第八军	歼敌1个加强营。
九渡冲击战斗	1933.5.6—7	江西省莲花县境	第六三师	红军第八军, 独立第十二师, 茶陵独立团	歼敌1500余人, 缴长短枪约1000枝, 机枪4挺。
棠市奔袭战斗	1933.5.29	江西省莲花县境	第十五师第四旅, 第十九师第三旅, 第五旅, 第六师第三师补充营	红军第八军, 独立第十二师	俘敌1000余人, 缴长短枪500余枝, 机枪4挺, 军衣1万余套。

第四次反“围剿”  
湘鄂赣苏区红军

第四次反“围剿”  
湘鄂赣苏区红军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潘家河进攻战斗	1933.4.15	湖北省黄安县境	第十三师	红军第二五军第七三、第七五师，独立第六师	歼敌1个多团。
七里坪战役	1933.5.2—6.13	湖北省黄安县境	第十三、第八九师	红军第二五军，独立第七师	红军减员数千，苏区受到严重损失。
渭南、华县地区战斗	1933年5月29日—6月上旬	陕西省渭南、华县、蓝田、雒南、蓝田等县境	陕军警备旅等部	红军第二六军第二团	红军大部被敌冲散，少数人员返回苏区。
归化、泉上进攻战斗	1933.7.9—19	福建省归化、宁化县境	新编第二师	红军东方军第五师	攻占归化、泉上，歼敌1个多团。
朋口进攻战斗	1933.7.30	福建省连城	第十九路军第七八师	红军东方军第四、第五、第十九、第三四师	歼敌近2个团。
水口、青州进攻战斗	1933.9.3—18	福建省古田、沙县县境	第十九路军第一〇六师、第六〇师、补充师，第五六师	红军东方军第四、第五、第十三、第十九、第二〇师	歼敌1个多团。
红军第一方面军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石、 陵牌石、 檀树岗防御 战斗	1933.7.17 —8.22	湖北省黄 安、光山县 省(今新县)境	第十三、第三 〇、第六五 师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1100余人。红军伤亡 1500余人，撤出战斗。
双河山、 汤家汇防御 战斗	1933.9.13 —23	安徽省六 安、舒城县 省商南境	第四五、第七 五师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一部。红军减员1000 余人，撤出战斗。
石门口遭 遇战斗	1933年11月 初	湖北省罗 田县境	独立第四〇旅	红军第二八军	歼敌1个团、俘1000余 人，缴枪800余枝(挺)， 迫击炮3门，大衣700余件。
古碑冲反 击战斗	1934.3.10	安徽省六 安县境	独立第五旅、 民团各一部	红军第二八军	击溃敌1个团，俘60余 人，缴长短枪100余枝，重 机枪2挺，迫击炮1门。
葛藤山反 击战斗	1934.3.12	河南省商 南、葛藤山 城(今安徽省 金寨县境)	第五四师第一 六一旅	红军第二八军	毙伤俘敌旅长以下1000余 人。

##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鄂豫皖苏反围剿第一军	高山寨伏击战斗	河南省光山县沙窝(今新县境)	第一〇九师2个营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2个营大部,缴枪100余枝。
	罗田奔袭战斗	湖北省罗田县城	第五四师一部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一部,缴骡马10匹,银元7000元及大批弹药、物资。
	彭新店遭遇战斗	河南省罗山县境	第四四师第一三二旅	红军第二五军	毙伤俘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枝(挺),火炮1门。
	长岭岗进攻战斗	河南省罗山县境	第一一五师	红军第二五军,地方武装	歼敌5个营,缴长短枪800余枝,轻机枪120余挺。
	太湖奔袭战斗	安徽省太湖县城	安徽省警备旅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一部,缴布匹、药品等大批物资。
五里坪、铁炉坪进攻战斗	1933年8月初	湖北省鹤峰县境	新编第三四师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歼1个营,击溃敌1个团。
仪陇、南部战役	1933.8.12—27	四川省仪陇、南部县境	第二九军一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〇、第三二军各一部	攻占仪陇城,歼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乌江进攻战斗	1933.8.31	江西省吉水县境	第八〇师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第三、第四师，独立第二团	歼敌3个团及师直属队。
背山、渠县战役	1933.9.22—10.6	四川省背山、渠县境	第二〇军第一、第二、第五、第六混成旅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第十、第十一师	攻占背山城，俘敌2000余人，缴枪2500余枝（挺）。
宣汉、达县战役	1933.10.17—27	四川省宣汉、达县境	川陕边防军13个团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五、第四、第三、第九军，第二、第四、第五师，第九军游击队	占领宣汉、达县、万源城，歼敌约6个团，俘4000余人，缴枪8000余枝（挺），火炮3门，子弹500余万发及大批军用物资。
飞鸢遭遇战斗	1933.10.6—7	江西省黎川县境	第五、第六师	红军第三军团，第十三、第十九、第二〇师	歼敌3个团。
硝石攻坚战斗	1933.10.9—13	江西省南城	第二四、第九、第十四、第十九、第四、第九四师	红军第三、第五军团，第十九、第二〇师	硝石未克，红军撤出战斗。
资溪桥攻坚战斗	1933.10.22—26	江西省黎川县境	第二四、第九、第十四、第十九、第四、第九四师	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第十九、第二〇师	资溪桥未克，红军撤出战斗。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游湾、八角亭进攻战斗	1933.11.11—12	江西省金溪县境	第四、第三六、第八五师	红军第三、第七军团	红军伤亡1100余人，撤出战斗。
云盖山、大雄关防御战斗	1933.11.17—19	江西省南丰县、宜黄县交界地区	第三、第九、第五九〇、第五十一、第六七、第九四、第九九、第九七师	红军第一、第九军团	红军撤出战斗，云盖山、大雄关失陷。
团村反击战斗	1933.12.12	江西省黎川县境	第五、第六、第九六师	红军第三、第五、第七军团各一部	击溃敌12个团。
丁毛山战斗	1933.12.25—1934.1.4	江西省永丰县境	第九三师，税警总团	红军第一军团，红军西方军	红军撤出战斗。
邱家隘、平寮反击战斗	1934.1.26	江西省黎川县境	第十一、第十四、第六七、第七九、第九四师	红军第一、第九军团，第三军团第四师	红军撤出战斗。
鸡公山阵地防御战斗	1934.2.9	江西省南丰县境	第十四、第九四师	红军第九军团	红军撤出战斗。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风翔峰阵地防御战斗	1934.2.15	江西省南丰县境	第六七、第七九师	红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军	红军撤出战斗。
三溪圩、三坑反战斗	1934.3.11—15	江西省南丰县境	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九、第四、第九、第七、第九、第八、第九、第八师	红军第一、第三、第九军第九团第十三师	红军伤亡2200余人，撤出战斗。
新桥反战斗	1934.3.25	福建省泰宁县境	第八八、第八九、第九、第十、第七九师	红军第一、第三军第九团第十三师	红军撤出战斗。
广昌保卫战斗	1934.4.10—27	江西省广昌县	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九、第四、第九、第七、第九、第八、第九、第八师	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第二师	广昌失陷，红军伤亡5500余人，撤出战斗。
建宁保卫战斗	1934年5月中旬	福建省建宁县城	第十、第八八、第九、第九六、第九八师	红军第一、第五、第七、第九军第九团	建宁失陷，红军撤出战斗。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红第五军第一次反「围剿」	古龙冈、银龙下反击战斗	江西省兴国县境	第九二、第九九师	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红军西方军	俘敌400余人，缴长短枪400枝，机枪10挺。
	大寨脑阵地防御战斗	江西省广昌县境	第八八、第八九、第四师	红军第十五、第三四师	红军撤出战斗。
第一方面军	高虎脑、驛前阵地防御战斗	江西省广昌县境	第十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四、第六、第十一、第九四、第十一师	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第五四、第五三军团	重创敌第八九师，红军伤亡2300余人，撤出战斗。
	温坊袭击战斗	福建省连城	第三师第八旅，第九师	红军第一、第九军团，第二四师	歼敌1个旅又1个团。
合水城袭击战斗	1933.10.17	甘肃省合水县城	陕军第十七师第四九旅1个连	陕甘边苏区红军第四团	歼敌1个连及民团一部，俘数十人，缴枪100余枝(挺)。
	梅花山阵地防御战斗	江西省莲花县境	第十五、第十、第六、第三师	红军第六军团、茶陵独立团	歼敌约1000人，击溃5个团。
	潞田阻击战斗	江西省万安县境	第七七师	红军第六军团	歼敌1个团。
湘赣苏区红军	1933.12.15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第五次反「围剿」 湘赣苏区红军	沙市伏击战	江西省永新县境	第十五师第四三旅	红军第六军团	歼敌1个营共2000余人，缴长短枪1000余枝，机枪24挺。
	华山、金山防御战 松斗	江西省永新县境	第十六、第五师三师，第六二师1个旅	红军第六军团	红军撤出战斗。
闽浙赣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罗桥、枫岭进攻战	江西省上饶饶县境	第八〇师	红军第十军	歼敌一部，缴获大批冬衣。
	姚盘山伏击战	江西省横峰县境	第二一师	红军第十军	歼敌2个团。
	谭家桥阻击战	安徽省太平县境	补充第一旅，第四九师，第七师第二一旅	红军第十军团	战斗失利。
	怀玉山突围战	江西省玉山山县境	第四九师，第七师第二一旅，补充第四三旅，立江保安纵队	红军第十军团主力	红军大部牺牲，余部突围。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第一期防御战斗(反总御敌攻)	1933年12月中旬—1934年1月中旬	四川省宣汉、达县、广元、苍溪、阆中县境	川军第二〇、第二三、第二八、第二九军,第三师,新编第六师等部	红军第四、第九、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三军	先在三河场、曾家山、雷音铺、仪陇、鸡山梁、三川寺、快活岭等地歼敌1万余人。后在马鞍山歼敌1个旅大部及3个团又2个营。
第二期防御战斗(反总御敌攻)	1934年3月4日—下旬	四川省宣汉、广元、巴中等县境	同第一期总攻	红军第四、第九、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三军	红军在西线击溃敌10余团,在东线歼敌5000余人。
第三期防御战斗(反总御敌攻)	1934年4月初—下旬	四川省万源、南江县境	同第一期总攻	红军第四、第九、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三军	红军在东线、西线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
第四期防御战斗(反总御敌攻)	1934.6.22—8.7	四川省万源、通江县境	同第一期总攻,另增第二一军2个师,第二三军1个师	红军第四、第九、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三军	红军在东线歼敌1万余人。
东、西线反攻战斗	1934.8.9—9.22	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苍溪、广元、阆中、仪陇等县境	同第四期总攻	红军第四、第九、第三〇、第三一、第三三军	收复南江、巴中、苍溪,阆中县城,东线歼敌3000余人,西线歼敌10余团,俘敌1万余人,缴枪7000余枝(挺),迫击炮40余门。
红军第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第五次反“围剿” 湘鄂赣苏区红军	1933.12.22	四川省黔江县城	边防军 1 个团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攻占黔江城, 歼敌 1 个团大部。
	1933.12.26	江西省新建县境	庐山教导队	红军第十六师	歼敌 2 个营, 缴枪 300 余枝 (挺)。
	1933.12.30	江西省宜春县境	第十八师	红军第十六师	击溃敌 4 个团, 缴长短枪 700 余枝, 机枪 4 挺。
	1934年6月上旬	江西省宜春、奉新县边境地区	第十八、第五〇师	红军第十六师主力	红军遭重大损失, 撤出战斗。
西华池进攻战斗	1934.4.11	甘肃省合水县境	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五团主力	陕甘边苏区红军第四二师, 游击队	歼敌 1 个团大部。
陕北红军反“围剿”	1934.8.18—26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 清涧等县境	第八六师第五一五团	红军第四二师第三团, 陕北苏区游击队	歼敌约 2 个连。
彭水奔袭战斗	1934.5.9	四川省彭水县城	川军第五师 1 个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三军	攻占彭水城, 歼敌 1 个营, 俘敌 400 余人, 缴枪 300 余枝 (挺)。
罗源进攻战斗	1934.8.14	福建省罗源县城	保安第十一团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攻占罗源城, 歼敌 1 个营, 缴枪 200 余枝 (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文市阻击战斗	1934.9.3—4	广西省灌阳县境	桂军第十九师, 湘军第十六师	红军第六军团	击溃敌8个团, 击落敌飞机1架。
新厂反击战斗	1934.9.19	湖南省靖县境	湘军补充第二总队2个团	红军第六军团	歼敌500余人, 缴枪300余枝。
突破石阡以南地区敌人封锁线	1934.10.7—24	贵州省石阡县境	湘军第十九师、独立第三旅、补充第一总队, 二部, 桂军第十九、四师, 黔军一部	红军第六军团	突破石阡以南地区敌人封锁线, 红军第五二团被截, 遭受损失。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1934.10.21—25	江西省赣县、信丰县境	粤军第一军	中央红军	歼敌1个团, 击溃敌2个师, 俘敌400余人, 缴枪数百枝(挺), 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1934.11.2—8	湖南省汝城县境	第六二师	中央红军	歼敌270余人, 红军通过敌人封锁线。
突破商城西南敌人封锁线	1934.11.6—7	河南省商城县境	第一〇九、第一〇七、第一〇八师各一部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4个连, 击溃敌2个团, 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斛山寨反击战斗	1934.11.8	河南省光山县城境	第一〇七、第一〇四、第六五师	红军第二五军	毙伤俘敌约4000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	1934.11.12—15	湖南省郴县、宜章地区	第六二师	中央红军	歼敌200余人,红军通过敌人封锁线。
龙家寨伏击战斗	1934.11.16—17	湖南省永顺县境	新编第三四师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占领永顺城,歼敌2个旅大部,击溃1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枪2200余枝,机枪10挺。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	1934.11.25—12.1	湖南省广西省边境道县、全州、湘江两岸	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路,桂军一部	中央红军	歼敌数千,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独树镇遭遇战斗	1934.11.26—28	河南省方城县境	第四〇军	红军第二五军	击溃敌1个旅又1个骑兵团。
三要司进攻战斗	1934.12.8	陕西省雒南县境	陕军第四二师第二四八团第三营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1个营。
庾家河反击战斗	1934.12.10	陕西省雒南县境	第六〇师	红军第二五军	毙伤敌800余人,击溃敌3个团。
沿溪河进攻战斗	1934.12.16—17	湖南省桃源县境	独立第三四旅	红军第二军团主力,第六军团一部	攻占桃源城,歼敌1个团又2个营,击溃敌1个团。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团溪、遵义进攻战斗	1935.1.6—7	贵州省遵义县境	黔军 4 个团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	占领遵义，歼敌约 300 人，击溃敌人 3 个团。
新站进攻战斗	1935.1.15	贵州省桐梓县境	黔军教导师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	俘敌约 100 人，缴枪约 100 枝，迫击炮 3 门。
松坎进攻战斗	1935.1.16	贵州省桐梓县境	川军、黔军各一部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	歼敌 300 余人，击溃敌 2 个团。
广元、昭化战役	1935.1.22—29	四川省广元县、昭化县境	第二八军一部，第一师 1 个旅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〇、第一军各主力，第四军各一部	歼敌约 1 个团，俘敌 800 余人，缴枪 600 余枝（挺）。
土城、青岗坡进攻战斗	1935.1.24—28	贵州省赤水县境	川军 4 个旅，黔军教导师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	攻占土城，击溃敌 1 个师。
蔡玉窑伏击战斗	1935.2.1	陕西省柞水县境	陕军第一二六旅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 1 个多营。
陕南战役	1935年2月3日—中旬	陕西省宁强县、沔县、略阳县境	陕军第十七师第四九旅，独立第一旅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〇军主力，第九军一部	歼敌 4 个多团，俘敌 4000 余人，缴长短枪 5000 余枝，轻重机枪 70 余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文公岭反击战斗	1935.2.5	陕西省蓝田县境	陕军第一二六旅第二四八、第二五二团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2个多营。
遵义战役	1935.2.26—28	贵州省遵义地区	第五九、第九个三师，黔军8个团	中央红军第一、第九军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干部团	占领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缴枪2000余枝（挺）。
苍溪、仪陇战役	1935年3月初—11月	四川省苍溪县、仪陇县境	第二九军，暂编第三三师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第三〇、第三二一军	攻占苍溪城，歼敌约5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枝（挺）。
石塔寺伏击战斗	1935.3.10	陕西省洋县境	陕军警备第二旅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200余人，击溃敌5个营，俘团长以下400余人。
鲁班场进攻战斗	1935.3.15	贵州省仁怀县境	第五、第十三、第九六师各一部	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干部团	歼敌约400人，击落敌机1架。
后坪进攻战斗	1935.3.20—21	湖南省大庸县境	第十九师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毙伤敌约500人。
强渡嘉陵江战役	1935.3.28—4.21	四川省昭化县、南部县、南充县、嘉陵江地区	川军第二八、第一二九军，第一师独立旅	红军第四方面军	攻占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九座城镇，歼敌12个多团共1万余人，俘敌3000余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老木孔进攻战斗	1935.4.4	贵州省黔西县境	黔军第一二一师	红军第九军团	歼敌2000余人，击溃敌5个团，缴枪1000余枝(挺)。
陈家河、桃子溪进攻战斗	1935.4.13—16	湖南省桑植县境	第五八师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收复桑植城，歼敌1个师部、2个旅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枝(挺)，火炮2门。
东川进攻战斗	1935.5.2	云南省东川县城	东川县民团	红军第九军团	攻占东川城，县民团1000余人投降。
抢渡金沙江战斗	1935.5.3—9	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	川康边防军暂编第七师一部	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军委纵队	歼敌一部，击溃敌2个团，俘600余人，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
茶陵坡进攻战斗	1935.5.7	湖南省永顺县境	第六二师第二营 第六七团第二营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各一部	歼敌1个营。
吴家寨、攻马家坪战斗	1935.5.7—9	陕西省安定县长县(今定长县)境	第八四师2个营	陕甘苏区红八军团、第八四师一部、抗日游击队、西北甘边、陕北苏区游击队	占领安定城，歼敌2个营又1个连，俘敌900余人，缴长短枪约1000余枝，机枪29挺，迫击炮2门。
延长进攻战斗	1935.5.30	陕西省延县长县城	第八四师1个连及民团		占领延长城，歼敌1个连及民团共400余人，缴枪400余枝(挺)，战马170余匹，电台1部。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陕甘边、陕北苏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陕甘边、陕北苏区	李家塌进攻战斗	陕西省安塞县境	安塞民团	陕甘苏区红八军第八师，抗日游击队，西北甘北苏区四四勇军，陕甘边、北苏区游击队	占领安塞，全歼民团，缴枪200余枝。
	靖边攻坚战	陕西省靖边县城	第八六师1个营，县警察队		攻占靖边城，歼敌1个营及县警察，缴枪500余枝（挺），火炮6门。
	老君殿追击战斗	陕西省绥德县（今子洲县）境	第八四师2个营		歼敌1个营，缴枪300余枝（挺）。
德昌进攻战斗	1935.5.17	西康省西昌县（今属四川省）	川康边防军暂编第七师一部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第五团	攻占德昌城，击溃敌1个旅，俘敌数百人，缴枪1000余枝（挺）。
越嵩进攻战斗	1935.5.22	西康省越嵩县（今属四川省）	川康边防军暂编第七师一部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五团	攻占越嵩城，歼敌1个营大部。
强渡大渡河战斗	1935.5.24--25	西康省冕宁县（今属四川省）	川军第二四师一部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团	歼敌2个连，击溃敌1个营，中央红军一部渡过大渡河。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袁家沟口伏击战斗	1935.7.2	陕西省山阳县境	陕军警备第一旅	红军第二五军第二二二团、第二三四路第二三、第三、第四路红军游击师	歼敌1个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旅长以下1400余人，缴枪1000余枝（挺）。
毛儿盖进攻战斗	1935.7.15—16	四川省松潘县境	第一师补充旅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八师第二六八团，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侦察连	歼敌1个营，缴长短枪200余枝，机枪19挺，电台1部，击落敌机1架。
招头寨阻击战斗	1935.7.28	湖南省龙山县境	第六二师	红军第六军团	毙伤敌约600人。
板栗园伏击战斗	1935.8.3	湖北省宣恩县境	第八五师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歼敌师部和2个团又1个营。
芭蕉坨阻击战斗	1935.8.8	湖南省龙山县境	第六二、第三四师 第六、新编第三四师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击溃敌10个团。
慕家堰进攻战斗	1935.8.10	陕西省吴堡县境	晋军第七一师第二〇六旅第四二团 第一二二团	红军第二六军，第二七军一部	歼敌4个连。
隆德进攻战斗	1935.8.17	甘肃省隆德县城（今属宁夏）	新编第一军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一营	红军第二五军	攻占隆德城，歼敌1个营大部。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打虎山反击战斗	1935.8.20	甘肃省平凉县境	第三五师第一〇五旅	红军第二五军	歼敌1个多营，击溃敌1个旅。
定仙塆进攻战斗	1935.8.18	陕西省绥德县境	晋军第三旅第六团	红军第二六、第二七军	歼敌1个团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长短枪1900余枝，机枪60余挺，迫击炮6门，骡马80余匹。
四坡村反击战斗	1935.8.21	甘肃省泾川县境	第三五师第一〇四旅第二〇八团	红军第二五军第二二、二三团	歼敌1000余人。
包座进攻战斗	1935.8.29—31	四川省松潘县境	第四九师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〇军，第四军第一一部	歼敌1个师，约毙伤俘敌5000人，缴枪1500余枝，机枪50余挺，电台1部。
龙房伏击战斗	1935.9.10	陕西省中部县境	第一一〇师	红军第二六军第三团，游击队	歼敌1个营，俘敌200人。
腊子口进攻战斗	1935.9.17	甘肃省岷县境	新编第十四师第一一部	红军陕甘支队第一一纵队第四团	攻占腊子口，击溃敌4个营，俘敌1个排，缴迫击炮3门。
劳山战役	1935.10.1	陕西省甘泉县境	第一一〇师主力	红军第十五军团	歼敌师部又2个团，俘敌2000余人，缴马300余匹和大批武器装备。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瓦窑堡追击战斗	1935.10.2	陕西省安定县境	第八四师	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八师第四团, 赤卫军	歼敌1个连。
白吉镇进攻战斗	1935年10月初	陕西省彬县境	当地民团	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八师第一团	俘敌120余人。
青石咀遭遇战斗	1935.10.7	甘肃省平凉县境	骑兵第七师第十九团	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第四、第五大队	歼敌2个连, 缴马100余匹。
白杨城伏击战斗	1935.10.8	甘肃省固原县境(今属宁夏)	地方武装两个团	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	歼敌1个团, 击溃敌1个团。
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	1935.10.8—20	四川省西部地区	川军第二〇、第二四军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第三〇、第三二、第三三、第三四、第三五军	攻占懋功、绥靖、丹巴、崇化城, 击溃敌6个旅, 毙俘敌3000余人。
吴起镇反击战斗	1935.10.21	陕西省保安县境	骑兵第六、第三五师	红军陕甘支队	歼敌1个团, 击溃敌3个团, 俘敌约700人, 缴马约1000匹。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1935.10.24 —11.25	四川省西部地区	川军第二〇、第二一军	红军第四方面军	毙伤俘敌2万余人，缴枪2000余枝，飞机50余架，击落敌机1架。红军伤亡1万余人。
榆林桥进攻战斗	1935.10.25 —26	陕西省甘泉县境	第一〇七师一部	红军第十五军团	歼敌4个营，俘团长以下1800余人。
突破敌人澧水封锁线	1935.11.20	湖南省大庸县境	第十九师一部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击溃敌1个团又1个营，红军突破敌澧水封锁线。
突破敌人沅江封锁线	1935.11.21	湖南省沅陵县洞庭溪	第十九师一部	红军第六军团	毙伤敌200余人，俘敌1个营又2个班，缴枪100余枝，红军突破敌沅江封锁线。
直罗镇战役	1935.11.20 —23	陕西省郿县境	第五七军，第六七军一一七师	红军第一方面军	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伤敌约1000人，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马300余匹。
田坪进攻战斗	1936.1.7	贵州省贵溪(今万山)县境	黔军一部	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	歼敌1个营。
平越反击战斗	1936.1.26	贵州省平越县境	第九九师一部	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第十八团	击溃敌1个营，俘60余人，缴枪100余枝。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扎佐进攻战斗	1936.1.31	贵州省修文县境	贵州省保安第一、第二团	红军第六军团，第五师	占领修文城，歼敌1个营，击溃敌2个团，俘敌300余人，缴枪300余枝(挺)。
鸭池河进攻战斗	1936.2.2	贵州省黔西县境	黔军一部	红军第二军团侦察大队，第六师一部	占领黔西城，歼敌1个连，红军渡过鸭池河。
将军山伏击战斗	1936.2.19	贵州省大定县境	第十三师一部	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	歼敌7个连，缴枪300余枝，机枪9挺。
东渡黄河战斗	1936.2.20—23	山西省中阳县、石楼县、黄河东岸地区	晋绥军第七一师第二〇七旅	红军第一方面军	突破晋绥军黄河防线，控制了辛关至三交、留誉、义牒等镇，攻占三交、留誉、义牒等镇，毙伤敌一部，俘敌约300人，缴枪250余枝(挺)。
石楼、隰县遭遇战斗	1936.2.25	山西省石楼、隰县境	晋绥军第七一师第二〇七旅、第二〇九师第二〇三旅各一部	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八师，第七五师主力	歼敌2个营，击溃敌1个营，俘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枝(挺)，迫击炮2门。
关上村进攻战斗	1936.2.26—27	山西省中阳县境	晋绥军独立第二旅	红军第一军团	歼敌旅部及2个团，俘敌约500人，缴枪约300枝(挺)，火炮6门。
红军第一方面军东征战役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克九峪反 击战斗	1936.3.10	山西省孝 义县境	晋绥军第二、 第三纵队	红军第一军团， 第十五军团主力	击溃敌2个纵队。
曹家坡遭 遇战斗	1936.3.31	山西省兴 县境	晋绥军第七一 师第二〇七旅	红军第十五军 团，第七八师，第 七五师主力	歼敌2个营、1个炮兵 连，俘敌200余人，缴枪200 余枝（挺），子弹35万发， 骡马80余匹。
襄陵城进 攻战斗	1936.4.1	山西省襄 陵县（今 襄陵镇）	襄陵县民团	红军第一军团第 二师	攻占襄陵县城，全歼民团，缴 俘敌县长以下100余人，缴 枪100余枝。
金罗镇进 攻战斗	1936.4.11	山西省离 石县境	晋绥军第四纵 队2个团	红军第十五军团 第七八师，第七五 师主力	击溃敌2个营，俘敌80余 人，缴枪90余枝。
师庄、三 角地区遭 遇战斗	1936.4.12	山西省中 阳县境	晋绥军第二纵 队第一九六旅	红军第十五军团 第七八师，第七五 师主力	歼敌1个团，俘敌团长以 下600余人。
吉县城进 攻战斗	1936.4.15	山西省吉 县境	吉县民团	红军第一军团	攻占吉县城，全歼民团，缴枪 俘敌县长以下300余人，缴枪 200余枝（挺）。
得章坝伏击战斗	1936.3.12	云南省镇 雄县境	第十三师	红军第二军团第 四、第六师	歼敌2个连，俘敌近200人， 缴长短枪近200枝，机枪8挺。

## 红军第一方面军东征战役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来宾铺反击战斗	1936.3.23	云南省宣威县境	滇军孙汝栋纵队，郭汝栋纵队	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歼敌2个连，击溃4个团，缴枪400余枝(挺)。
瞻化进攻战斗	1936.4.6	西康省瞻化县(今四川省新龙县)境	西康驻军一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	俘敌100余人，缴枪100余枝，电台1部。
六甲地区阻击战	1936.4.9	云南省嵩明县境	滇军孙汝栋纵队	红军第二军团	击溃敌2个旅。
宾川进攻战斗	1936.4.20	云南省宾川县境	宾县民团	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	攻占宾川城，毙敌100余人，俘敌300余人。
曲子镇进攻战斗	1936.6.1	甘肃省环县境	第三五师骑兵团一部，第一〇五旅特务连	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	毙敌40余人，俘旅长以下150余人，缴枪200余枝(挺)，迫击炮2门，骡马数十匹，骆驼10余峰。
马岭遭遇战	1936.6.1	甘肃省庆阳县境	第三五师第二〇九团1个营	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师	占领马岭、阜城，俘敌40余人，缴迫击炮1门，步枪30余枝，骆驼8峰。
阜城反击战斗	1936.6.3	甘肃省庆阳县境	第三五师2个步兵营，6个步兵营	红军第一军团主力	歼敌6个营，击溃敌2个骑兵团，俘敌1100余人，缴枪约1000枝(挺)。
红军第一方面军西征战役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红军第一方面军西征战役	定边袭击 战斗	陕西省定 边县城	新编第七师骑 兵约1个营	红军第十五军团 第七八师	攻占定边城，全歼守敌， 俘敌60余人，缴枪60余枝， 战马30余匹。
	盐池袭击 战斗	宁夏省盐 池县城	新编第七师骑 兵2个连，盐池 民团	红军第十五军团 第七八师，骑兵团	攻占盐池城，全歼守敌， 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枝， (挺)，战马200余匹，电 台1部。
	豫旺城进 攻战斗	宁夏省豫 旺县城(今 下马关)	新编第七师2 个骑兵连，民团	红军第十五军团 第七三、第七五师 各一部	攻占豫旺城，俘敌营长以 下280人，缴枪180枝，战马 150匹。
	红城水阻 击战斗	宁夏省同 旺县(今同 心县)境	新编第七师2 个营，第二、第三团 骑兵第一、第三团	红军第十五军团 直属队，第七五师	毙伤敌300余人，将敌击 溃。
岷州、洮州、西 固战役	1936.8.9 —9.7	甘肃省南 部地区	新编第十四师， 青海第一旅 预备第一旅	红军第四、第二 方面军	攻占漳县、临潭、渭源、 通渭四城，歼敌1000余人， 击溃敌1个旅，缴长短枪 1000余枝，机枪6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同心城、七营地区进攻战斗	1936.8.31 —9.7	宁夏省同心城、七营地区	第三五师、骑第六师	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	攻占同心城、七营等地，击溃敌1个多师。
挺进西兰公路战斗	1936年9月 9日—下旬	甘肃省海原、会宁、静宁县境	第三五师、第十师、第一师各部	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第二团，骑兵第一团	占领郑旗堡、兴隆镇、青江驿等城镇，将敌台石堡、单家集、界敌击溃。
韩府湾反击战斗	1936.9.15 —16	甘肃省固原（今宁夏）境	骑第六师，第三五师一部	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第五师，第七五团	歼敌骑兵2个团大部，击溃敌2个营，俘敌100余人，缴长短枪100余枝，机枪23挺，战马100余匹，电台1部，子弹约3万发。
会宁进攻战斗	1936.9.11 —10.2	甘肃省会宁县城	新编第一军第十旅各部	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三师1个团，骑兵第三团	攻占会宁城，俘敌50余人，缴枪约100枝（挺）。
甘南战役	1936.9.11 —19	甘肃省南部地区	第三军	红军第二方面军	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城，歼敌一部，俘敌数百人，缴枪300余枝（挺）。
静 宁、会 宁 战 役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何家堡遭遇战斗	1936.10.31	甘肃省海原(今宁夏)属宁县境	骑兵第六师第三五师一部	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 第十五军第七三师	俘敌1000余人, 缴枪1000余枝(挺), 战马1000余匹。
一条山、打拉牌战斗	1936.10.27—11.5	甘肃省景泰县境	骑兵第五师, 个新编第二团一部, 民团一部	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第三〇军	攻占一条山、打拉牌、锁罕堡、正路堡等地, 毙敌师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约2000人, 俘参战马, 共毙伤俘敌约2000人, 缴火炮3门。
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	1936年11月9日—12月上旬	甘肃省武威、山丹、永昌、浪水等县地区	新编第二师主力, 警备第一〇〇师, 南令第一、第二旅, 青海骑兵第一、第二师团约20个团	红军西路军直属部队, 第五、第九、第三〇军	攻占永昌、山丹等城镇, 毙伤敌约6000人, 敌1个营约350人投降, 击落敌飞机一架, 红军伤亡2000余人。
盐池、定边地区防御战斗	1936.11.16—22	宁夏省盐池、西定边、陕西县境	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八、第二九军, 骑兵第一团, 蒙古游击队	迟滞钳制了敌第一军左路的进攻, 保卫了定边、盐池, 配合了山城堡方向红军主力作战。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山城战役	1936.11.17—22	甘肃省环县、宁夏盐池县境	第一师第一旅、第六师第七旅、第八师第七旅、第十师第七旅	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歼敌第七八师1个多旅，击溃敌1个旅，俘敌约600人，毙伤敌团长以下600余人，缴枪600余枝（挺），击落飞机1架。
高台进攻战斗	1937.1.1—20	甘肃省高台附近地区	第一〇〇师，青令第一〇〇师第五警备骑兵团1个，海部所属5个部	红西路军第五军第四路军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攻占高台城，缴枪500余枝，敌人投降，后敌反攻，红军在高台失利，损失3000余人。
西洞堡反击战斗	1937年1月下旬	甘肃省张掖县境	第一〇〇师1个骑兵团	红西路军第三〇军	击溃敌一部，歼敌宪兵团，缴枪200余枝。
倪家营子防御战斗	1937.1.28—3.13	甘肃省张掖、临泽地区	第一〇〇师，青令第一〇〇师第五警备骑兵团6个，海部所属1个部	红西路军直属第三〇军第九、第十五、第二十一、第二十五、第三十一、第三十五、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五十五、第六十一、第六十五、第七十一、第七十五、第八十一、第八十五、第九十一、第九十五、第一百	给敌以重大杀伤，红军损失1万余人，余部约3000人退入祁连山区。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陕甘宁特区剿匪战斗	1937.5—6	陕西省定边、靖边、志丹、延安、延长、耀县、中部、甘境	土匪武装2600余人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九、独三〇军，陕北军，第一师一部，陕甘宁第三警区地方武装	歼灭、击溃土匪武装31股。
谢坊伏击战	1934.11.22	江西省瑞金县境	第三师1个旅	中央苏区红军第二四师，地方武装一部	歼敌1个团。
洋面山突围战斗	1935年春	福建省福安县境	新编第十师等部	闽东红军独立师	毙伤敌1000余人，击退敌之进攻。
桃岭伏击战	1935.4.20	安徽省潜山县境	第二五路军第二师第九五旅第二营	鄂豫皖边区红军第二八军	歼敌2个营，缴枪400余枝（挺）。
虹桥伏击战	1935.4	湖南省平江县境	第十九师1个旅	湘鄂赣边区红军第十六师	歼敌1个团，毙伤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400余枝（挺）。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重要战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斋郎伏击战	1935.4.23	浙江省景宁县(今云和县)境	浙江保安第一团, 福建保安第二团, 地主武装	红军挺进师	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 俘敌约200人, 瓦解地主武装约1000人。
榧坑头伏击战	1935.5	福建省福鼎县境	正规军1个连	闽东红军独立师第四团	歼敌1个连, 毙敌连长以下39人, 俘敌30余人, 缴枪70余枝。
乌径袭击战	1935年夏	广东省南雄县境	靖卫团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	摧毁敌区公所, 俘敌靖卫团长以下全部人员。
大溪袭击战	1935年夏	福建省平和县境	第八〇师兵站	闽西红军独立团	歼敌1个连, 缴枪50余枝及弹药、被服等物资一批。
云霄袭击战	1935.11	福建省云霄县城	交通银行	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一部	摧毁敌交通银行, 缴获现款1万余元。
甘溪镇伏击战	1935.11	江西省上饶县境	1个纵队	闽北红军独立师一部	歼敌200余人, 缴长短枪200余枝, 轻机枪4挺。
界首镇伏击战	1936.2	福建省建阳县境	新编第十一师	闽北红军独立师一部	歼敌500余人。
陈东坑、大河祠袭击战	1936.3	福建省连城、龙岩县境	第五二师一部	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一支队	歼敌1个营, 缴枪100余枝(挺)。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重要战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平氏镇袭击战斗	1936.3	河南省桐柏县境	保安队、地主武装各一部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将敌击溃，缴枪10余枝。
老山寨进攻战斗	1936.4.20	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境	第一〇二师1个团	鄂豫皖边区红军第二八军	歼敌1个营，毙伤俘敌500余人，缴枪约400枝。
沱川月岭伏击战斗	1936.7	江西省婺源县境	第四六旅2个连	皖浙赣边区红军独立团	毙伤敌大部，缴枪100余枝（挺）。
龟仔山伏击战斗	1936.10.11	福建省福鼎县境	浙江省保安第四团1个营	红军挺进师，浙南游击队	歼敌一部，缴枪80余枝，子弹15箱。
安福县城袭击战斗	1936年秋	江西省安福县城	民团一部	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	歼敌县长以下100余人。
德安、瑞昌伏击战斗	1936年秋	江西省德安、瑞昌县境	海军陆战队1个团	湘鄂赣边区红军第十六师	将敌击溃，毙敌团长，缴枪300余枝。
王通伏击战斗	1937.3.12	湖北省麻城县境	第三师第一九三团	鄂豫皖边区红军第二八军主力	歼敌2个营，毙伤敌团长以下军官9人，缴枪400余枝（挺）。
武阳袭击战斗	1937年夏	江西省瑞金县境	当地民团	闽赣边区汀瑞会红军游击队	歼敌30余人，缴枪60余枝。

##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争重要战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南满四次反“围攻”	1933.1—5	吉林省磐石县境	日军守备队，土匪武装	南满游击队	毙伤日、伪军100余人。
团山子、八棵树伏击战	1933.2.10	吉林省宁安县境	日军200余人，伪警备旅1个团	抗日救国游击军	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大甸子进攻战	1934.6	吉林省汪清县境	日、伪军各一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	歼日、伪军300余人，缴枪100余枝。
五常堡攻坚战	1934.8	吉林省五常县境（五常、龙常、黑龙、龙江省）	日、伪军各一部	哈东游击支队	攻克五常堡，毙伤日、伪军各一部，缴步枪80余枝。
山城镇袭击战	1934.8	辽宁省通化县山城（今属吉林省）	日军汽车队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部	毙日军大佐以下28人，缴枪7枝，轻机枪1挺。
大旺砬子伏击战	1935.1.29	吉林省饶河县、虎林地区（今属黑龙江省）	日军步骑兵“讨伐”队800余人	饶河游击队	毙伤日军100余名。

## 东北抗日联军重要战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青山沟进攻战斗	1935.2.6	吉林省勃利县境(青黑山沟今属黑龙江省)	伪满森林警察队	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主力	毙伤伪军17人,缴马近300匹。
石门子伏击战斗	1935.2	吉林省宁安县境	伪靖安军200余人	反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团	毙伪军20余人,俘多人,缴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枝。
哈尔巴岭伏击战斗	1935.5	吉林省敦化县境	日军火车一列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一部	毙日军30余人,俘15人,缴伪币数十万元及大批物资。
黑石头伏击战斗	1935.8	辽宁省柳河县境(黑吉两省)	日、伪军“讨伐”队300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团	毙伤俘日、伪军70余人,缴迫击炮1门,步枪40余枝。
猪蹄河伏击战斗	1936.1.4	吉林省方正县境(猪黑两省)	日、伪军“讨伐”队5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华堂部各一部	毙伤日、伪军80余人,缴重马车90辆,马300匹及大批军需物资。
寒葱沟伏击战斗	1936.4	吉林省敦化县境	日、伪军7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毙伤日、伪军260余人,俘270余人,缴大批武器弹药。

## 东北抗日联军重要战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赛马集伏击战斗	1936.6	辽宁省本溪县境	伪军15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师第一、第三师	毙伤日军顾问英俊及伪军邵本良以下3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追击炮2门及大批枪支弹药。
摩天岭伏击战斗	1936.7	辽宁省辽阳县境	日军今田中队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师	毙日军中队长今田以下80余名。
九站袭击战斗	1936.9.22	吉林省宁安县境	日军火车一列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教导队	毙伤日军130余人，缴大批军用物资。
代马沟伏击战斗	1936.9.12	吉林省穆稜县境	日军火车一列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第五军一部	毙伤日军120人，击毙战马60余匹。
孙灵阁山进攻战斗	1936.11	黑龙江省铁力县境	日军5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师第三军，第四军一部	毙日军80余人，缴轻机枪2挺，马30余匹。
西岗密营突围战斗	1936年冬	辽宁省抚顺县境	日、伪军“讨伐”队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师第二军军部，第四师	毙日、伪军150余人，突破敌人包围。
佛山城进攻战斗	1936.12	黑龙江省佛嘉阴县(今嘉荫县)	日、伪军2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五师	攻克佛山城，毙日军一部，中尉以下12人及伪军一部，俘伪县长。

东 北 抗 日 联 军 重 要 战 斗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冰蹄子突围战斗	1936年冬	黑龙江省海伦县境	日军“讨伐”队7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各部，第五、第六师各一部	毙伤日军300余人。
汤原城袭击战斗	1937.3.18	黑龙江省汤原县城	日、伪军各一部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留守团，地方武装	俘日本副县长，毙伤日、伪军警10余人，缴长短枪30余枝，轻机枪3挺，迫击炮3门，炮弹90余发，子弹3.5万发，马35匹。
依兰县攻坚战斗	1937.3.19	吉林省依兰县城（今属黑龙江省）	日、伪军各一部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军	毙伤俘日、伪军40余人，缴枪18枝。
西林子袭击战斗	1937.4	吉林省德惠县西林子（今属黑龙江省）	伪军1个连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毙敌20余人，缴步枪14枝。
间三峰伏击战斗	1937.6.30	辽宁省长白县境（间三峰今属吉林省）	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七四联队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四师，第六、第二师各一部	日军伤亡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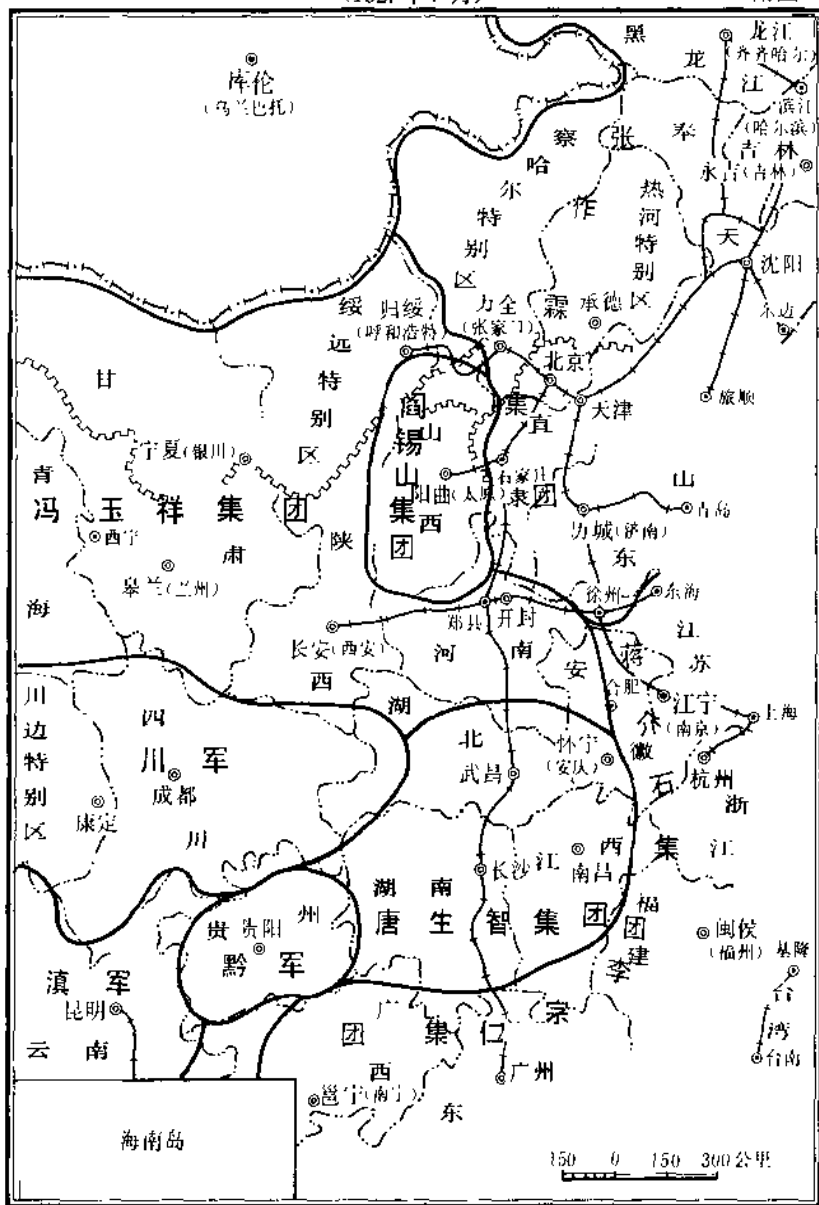
## 东北抗日联军重要战斗

### 三、重要战役战斗经过要图

# 军阀割据示意图

(1927年7月)

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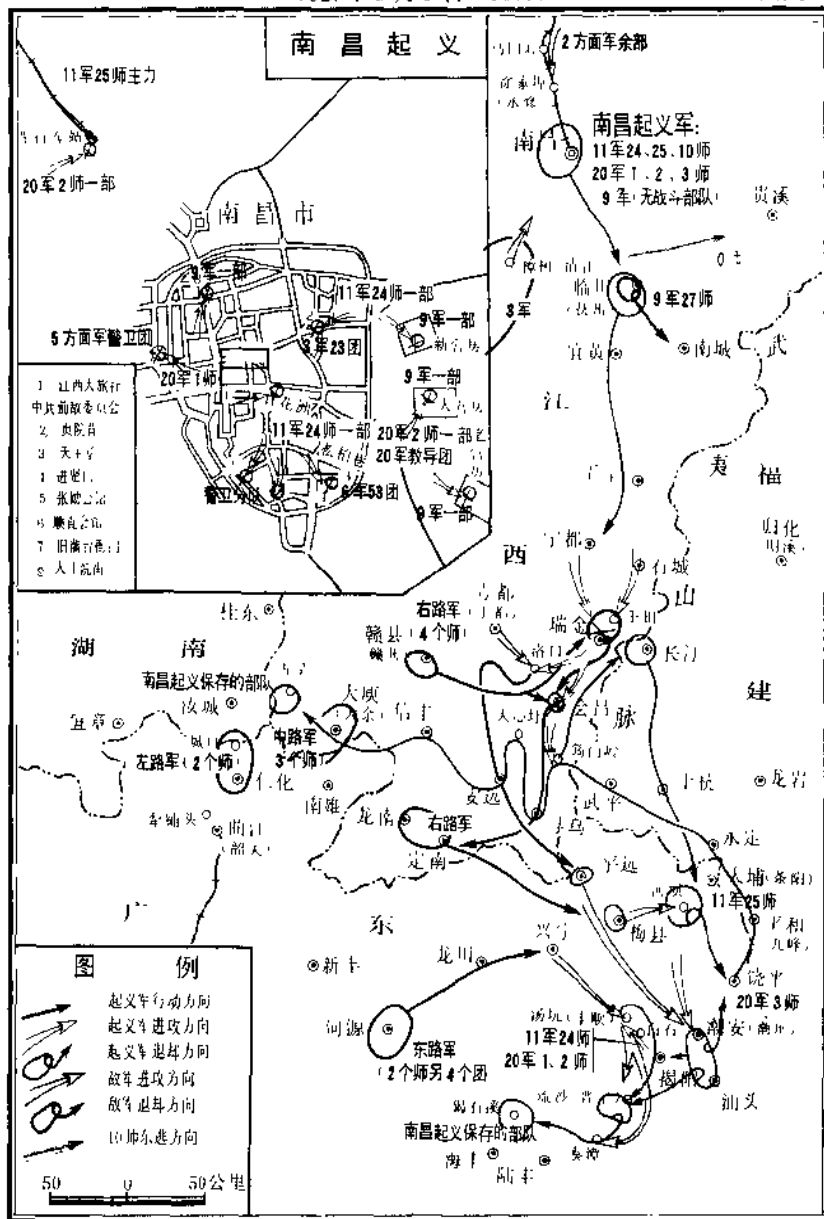




# 南昌起义和南昌起义军进军东江作战经过要图

(1927年8月1日—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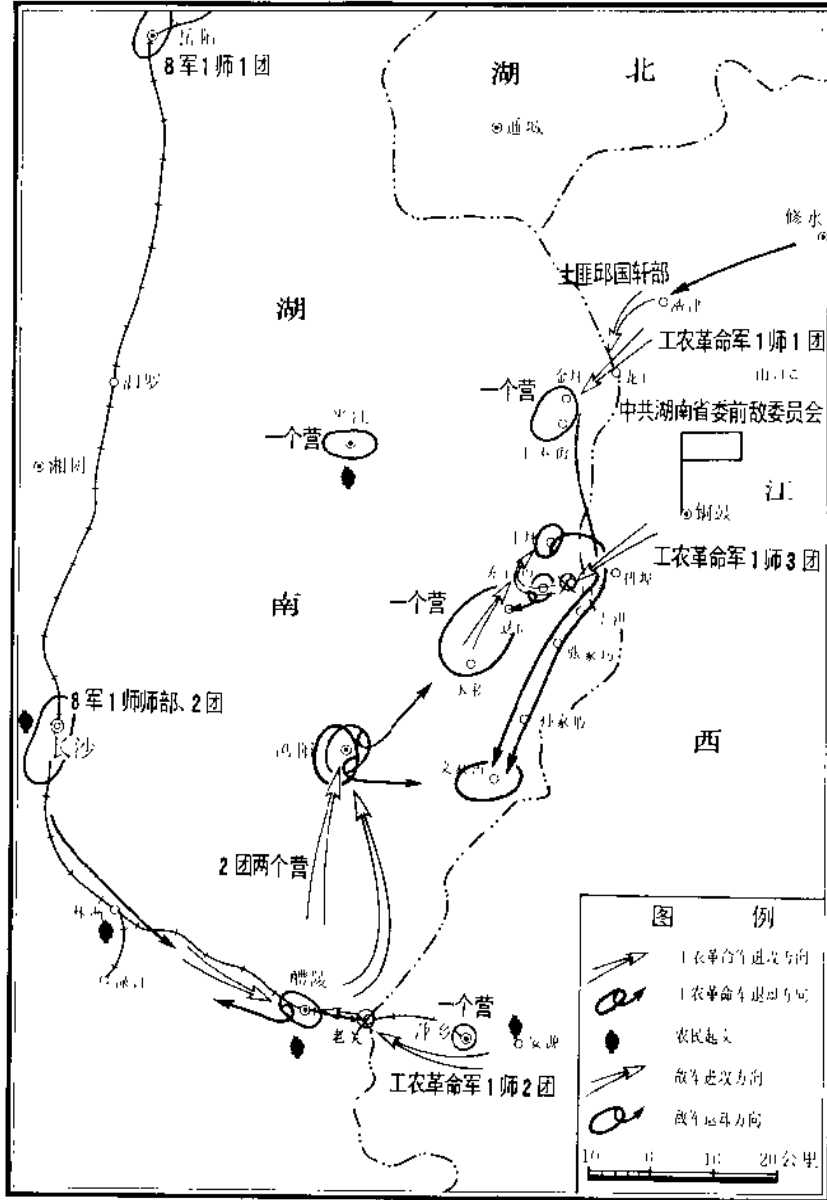
附图2



#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作战经过要图

(1927年9月11日 - 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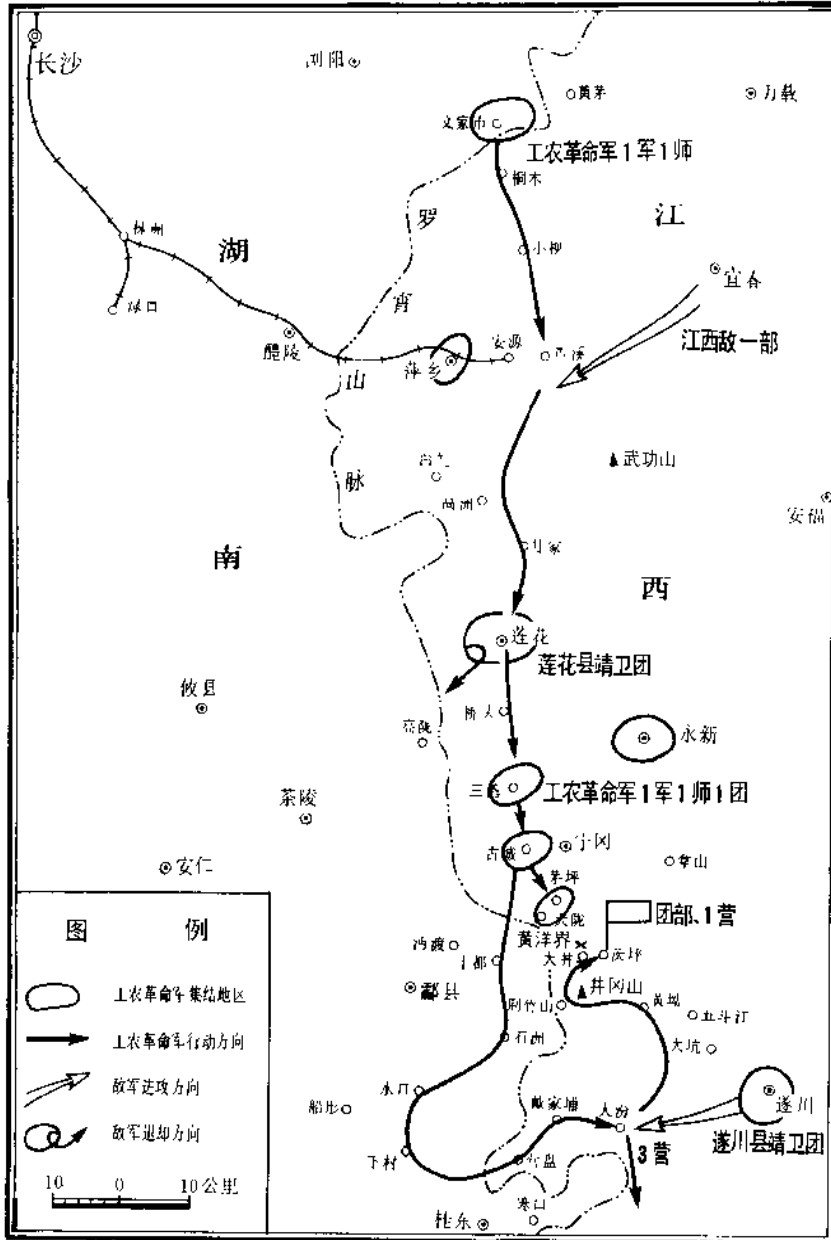
附图3



#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向井冈山转移示意图

(1927年9月20日—10月下旬)

附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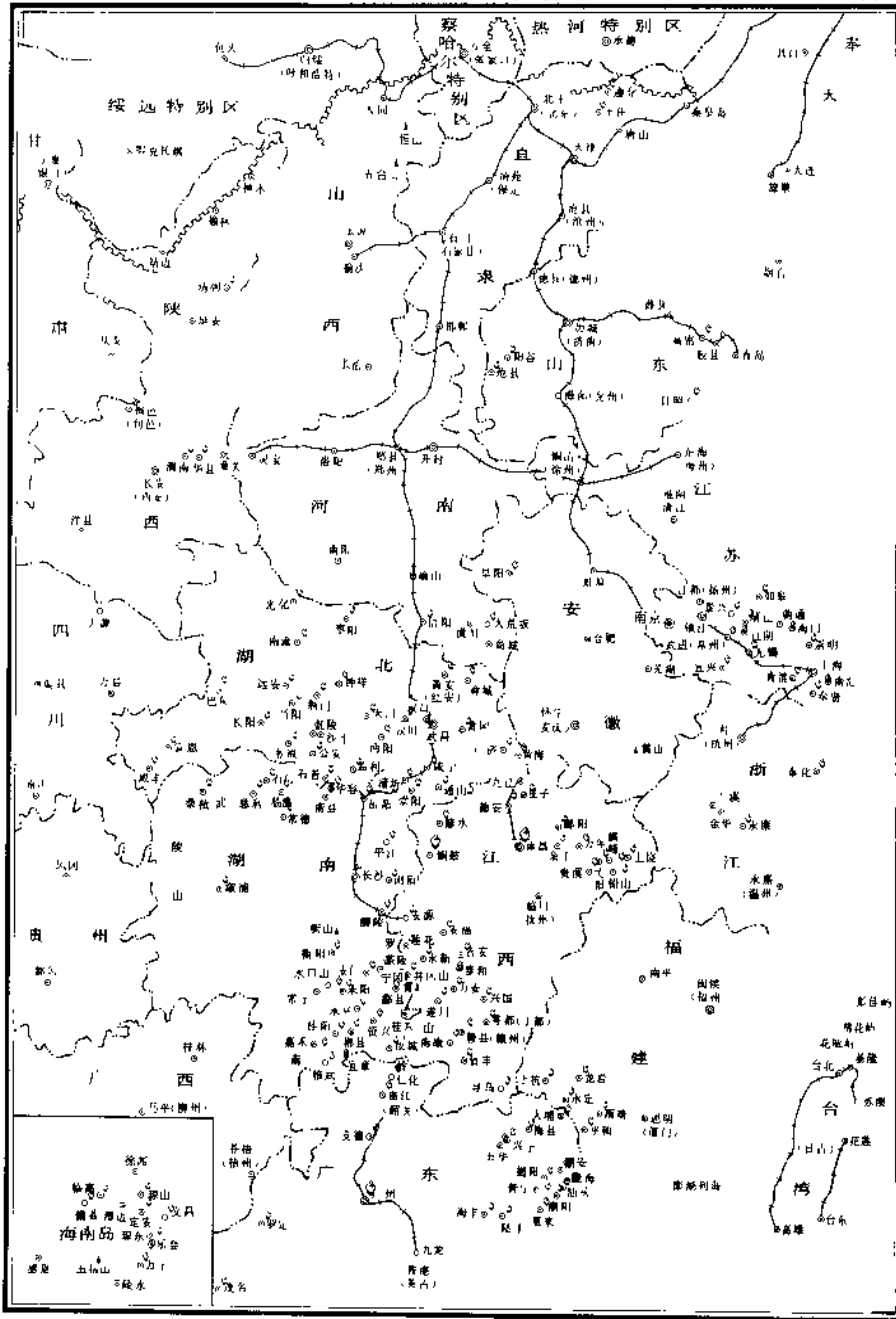




# 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示意图

(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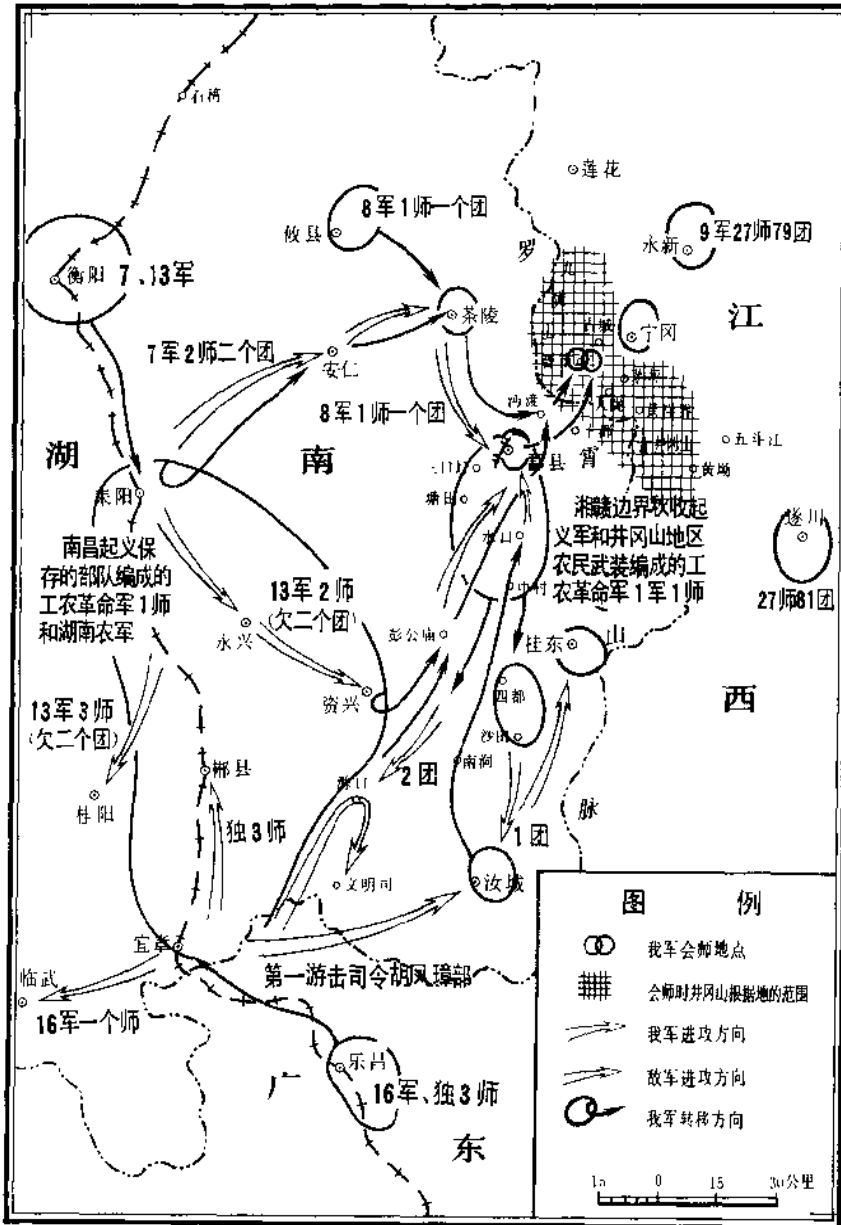
附图6



# 井冈山会师示意图

(1928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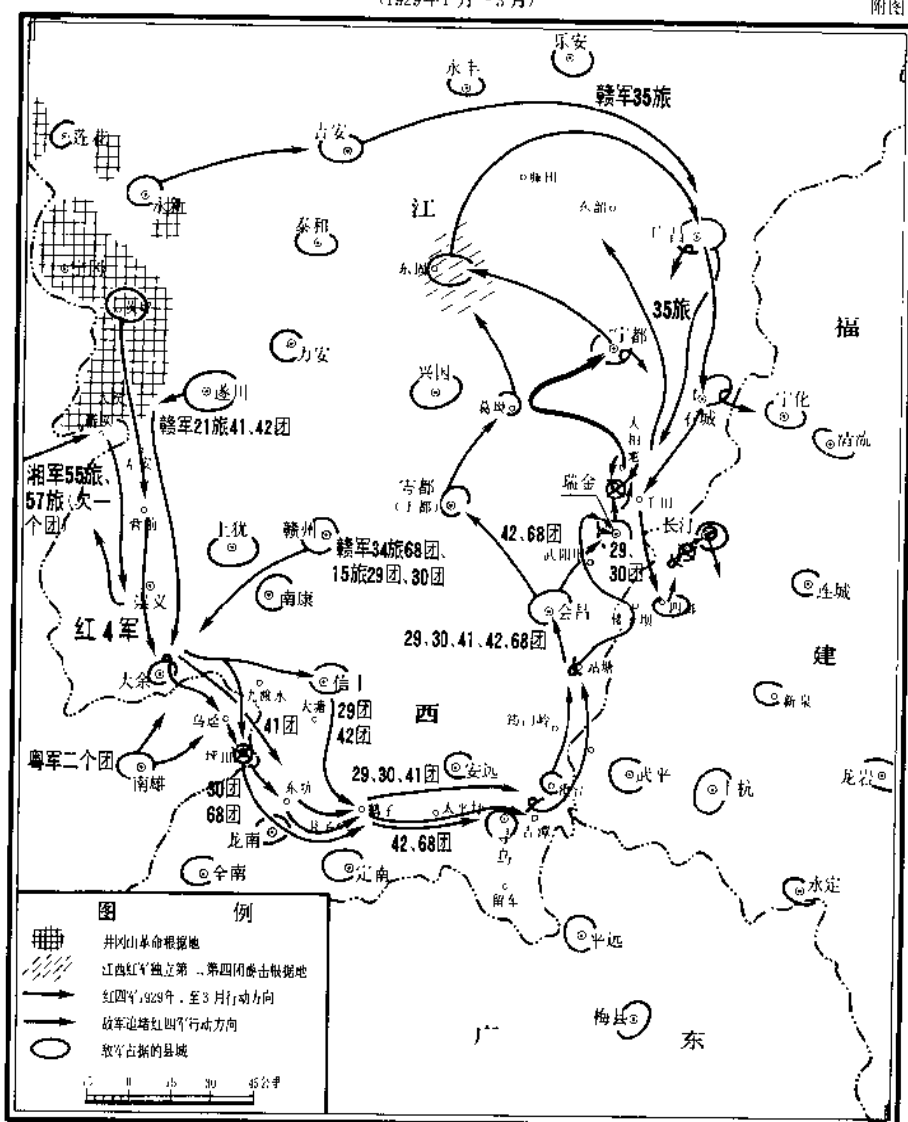
附图7



# 红四军创建赣西南、闽西苏区行动要图(一)

(1929年1月-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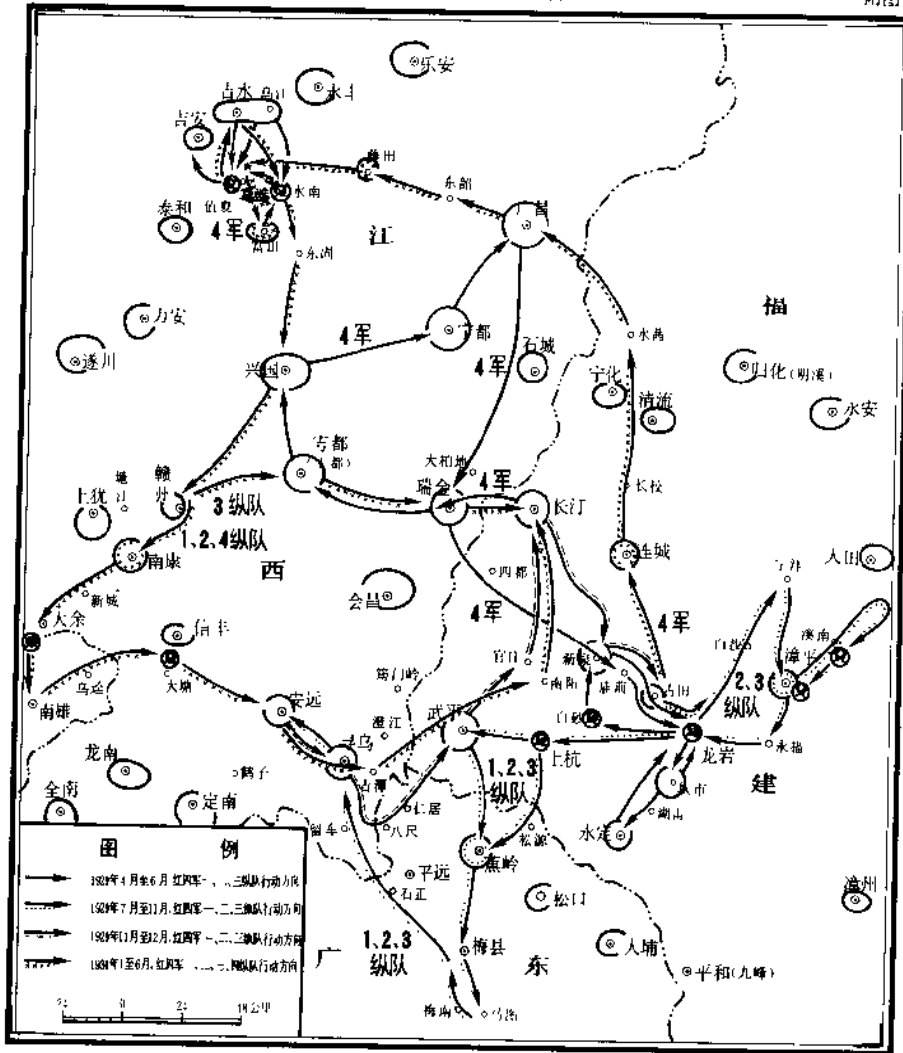
附图8



# 红四军创建赣西南、闽西苏区行动要图(二)

(1929年4月—1930年6月)

附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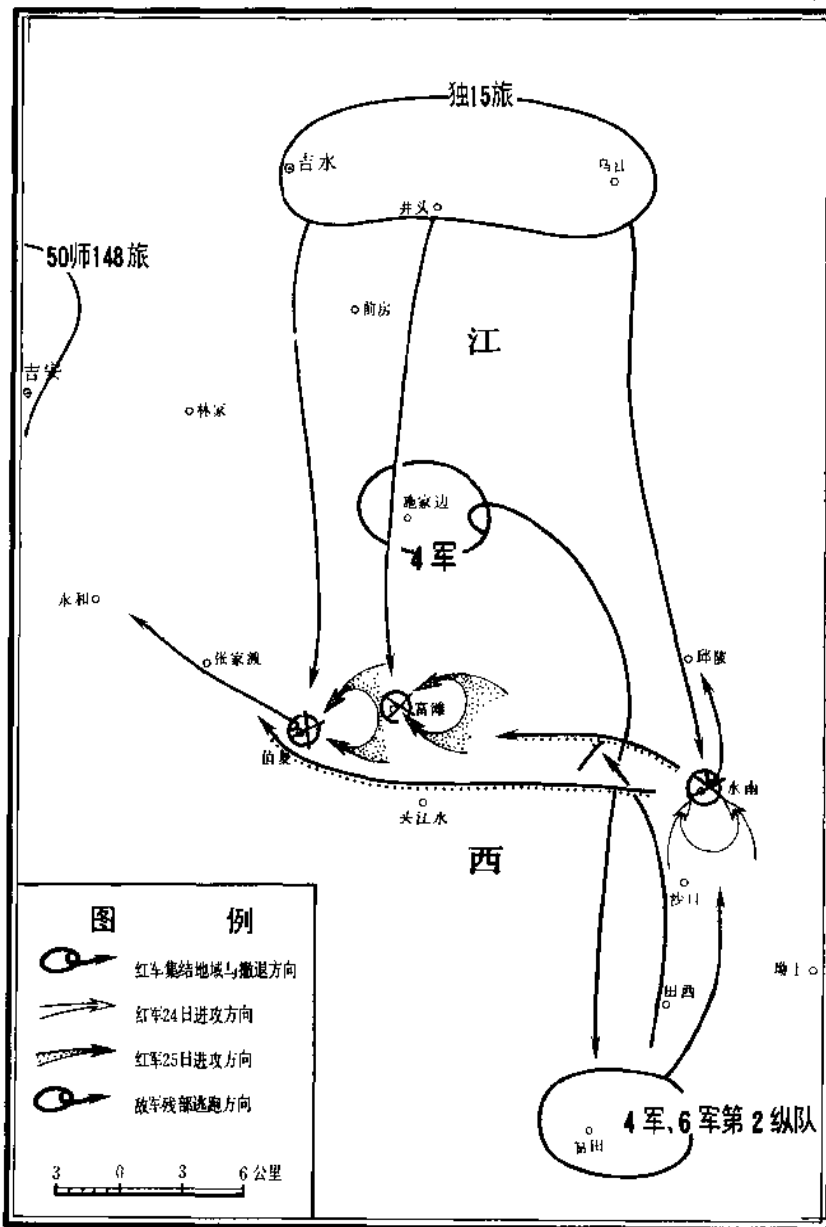




# 水南、富滩、值夏战斗经过示意图

(1930年2月24日—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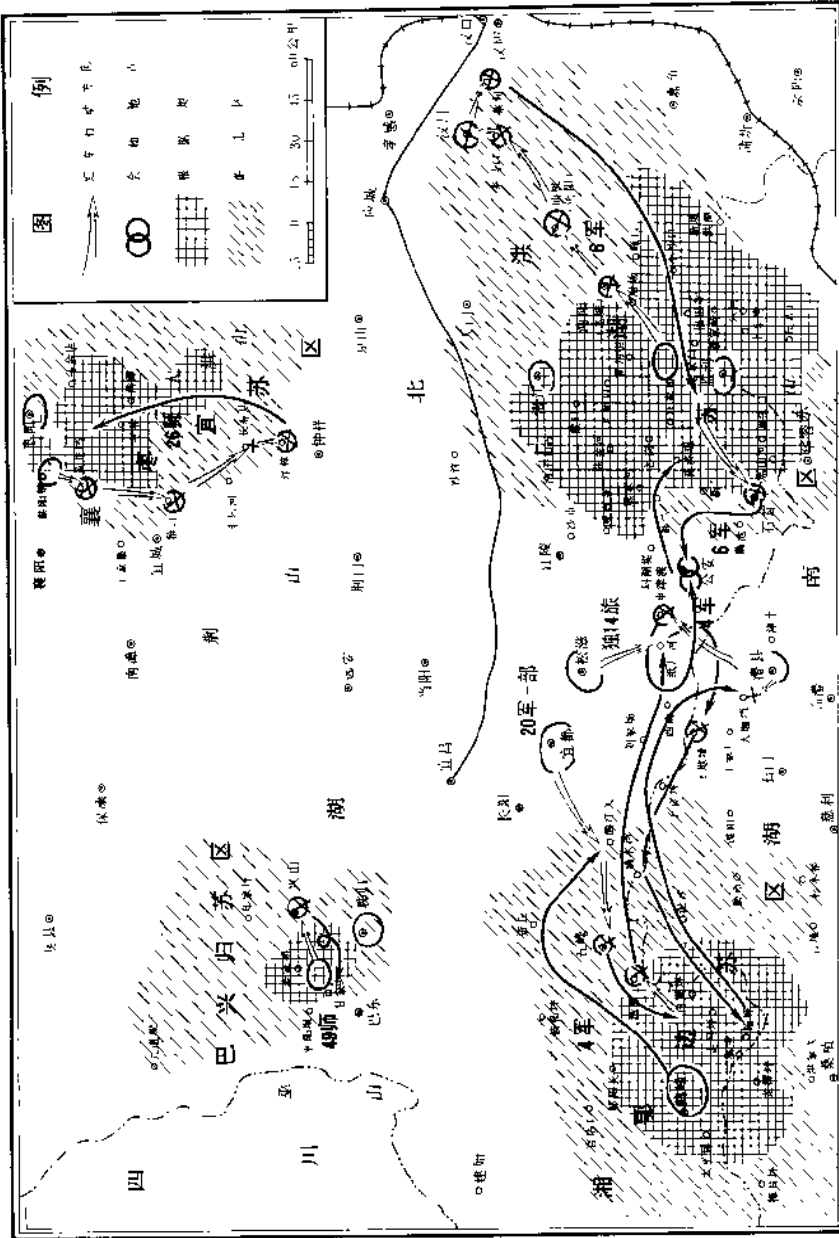
附图10



# 湘鄂西苏区创建及红四军、红六军会师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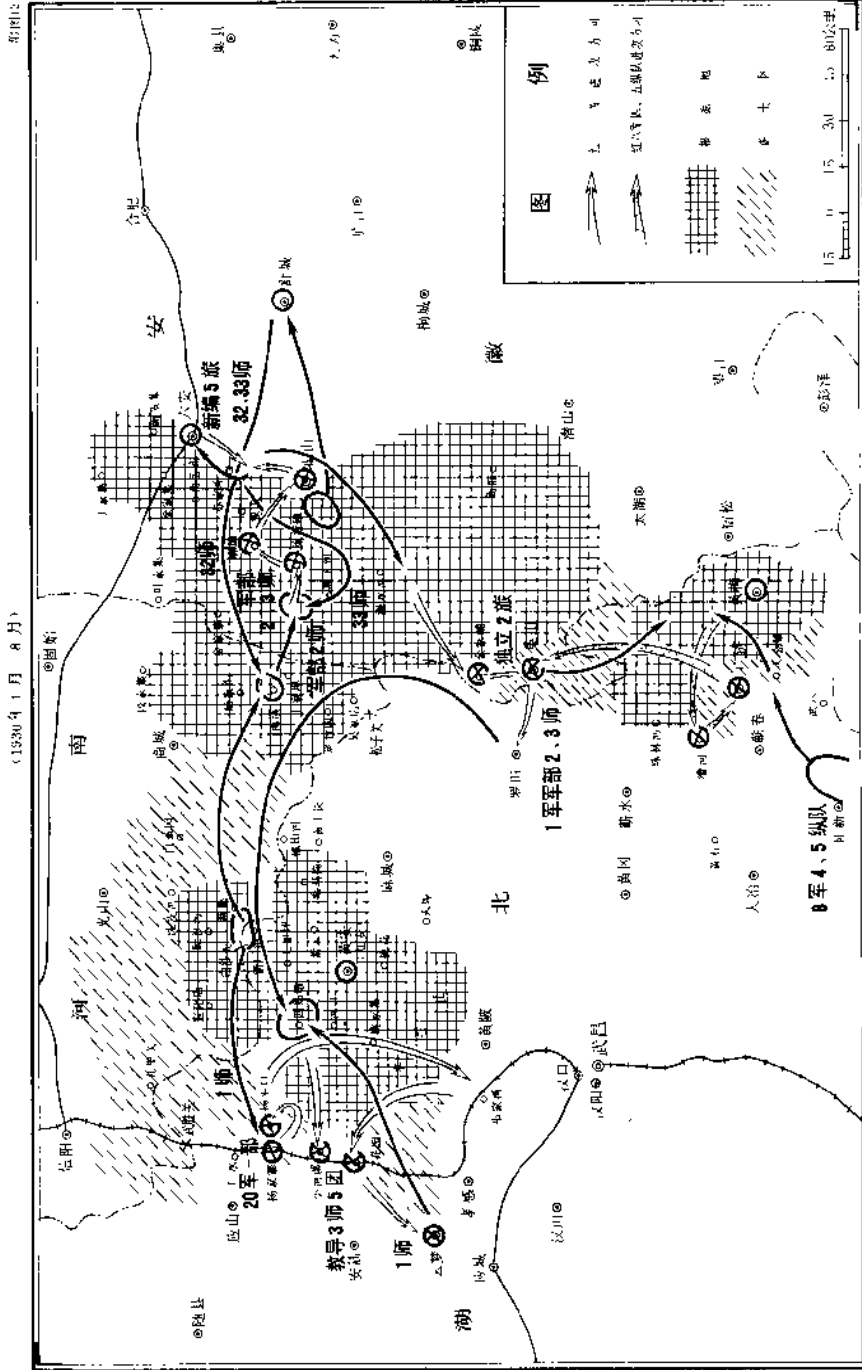
(1930年2月-7月)

21121



# 鄂豫皖苏区创建及红一军主要作战活动示意图

(1930年1月-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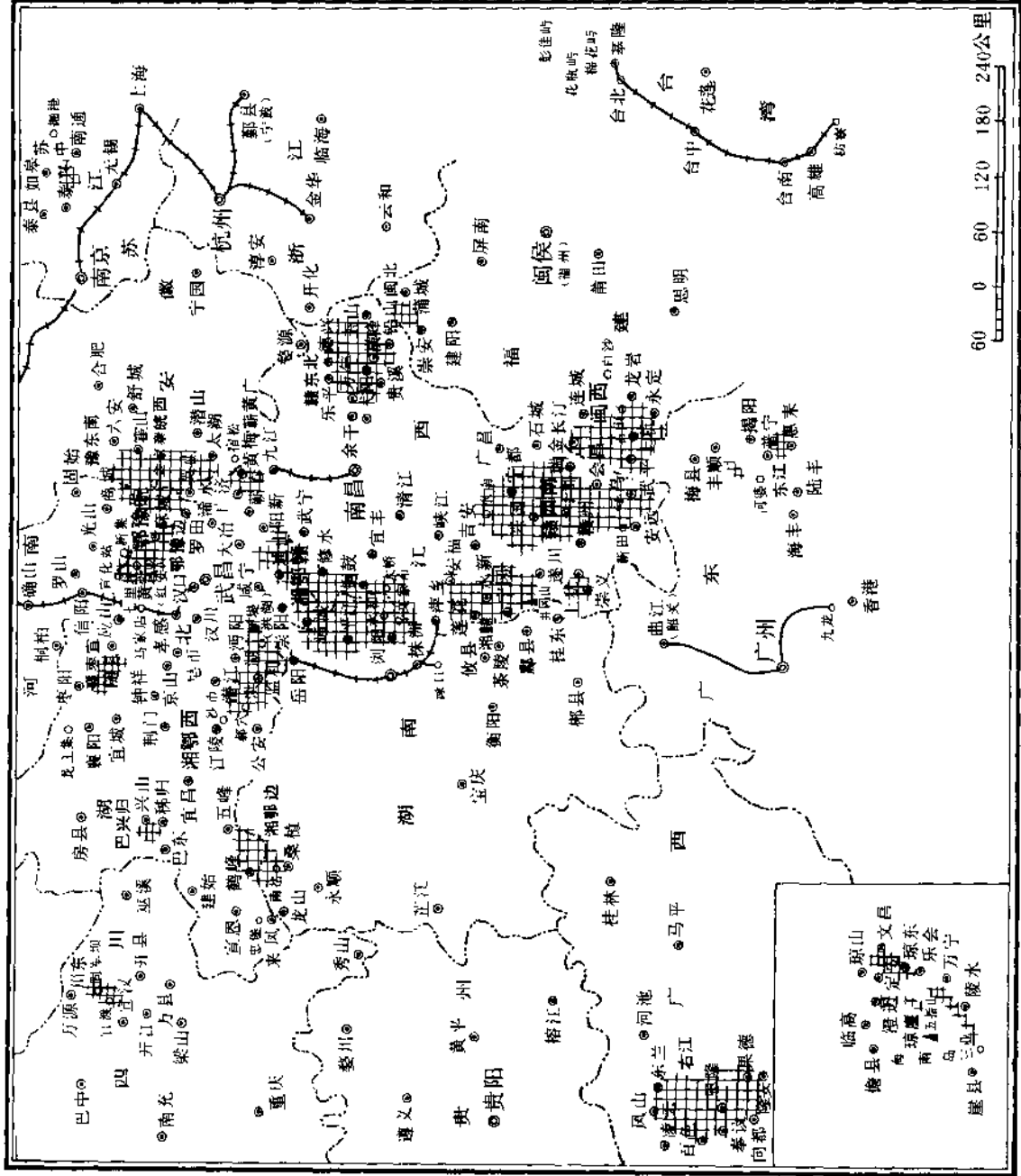


新图12

# 全国苏区形势图

(1930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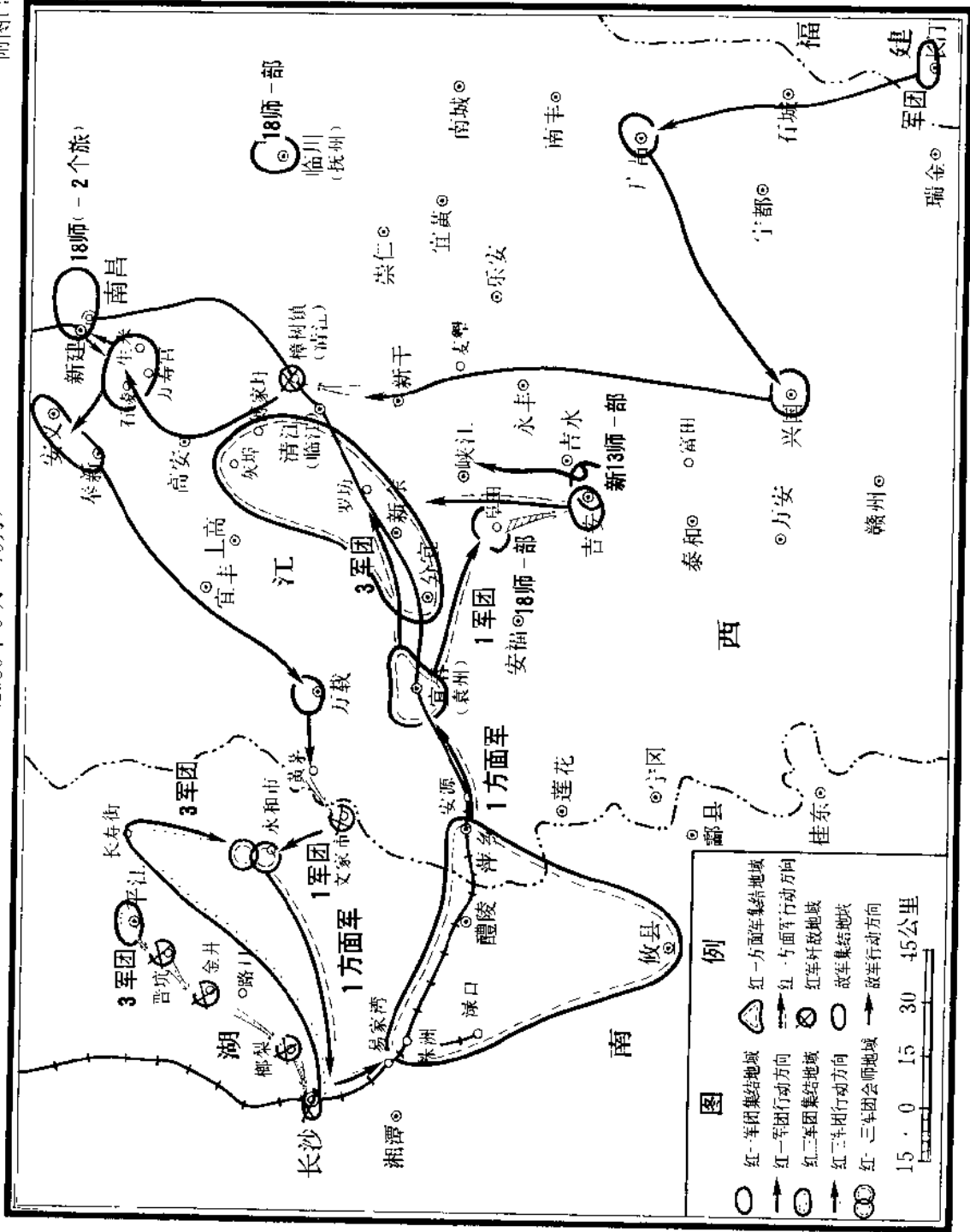
附图13



# 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行动路线示意图

(1930年6月—10月)

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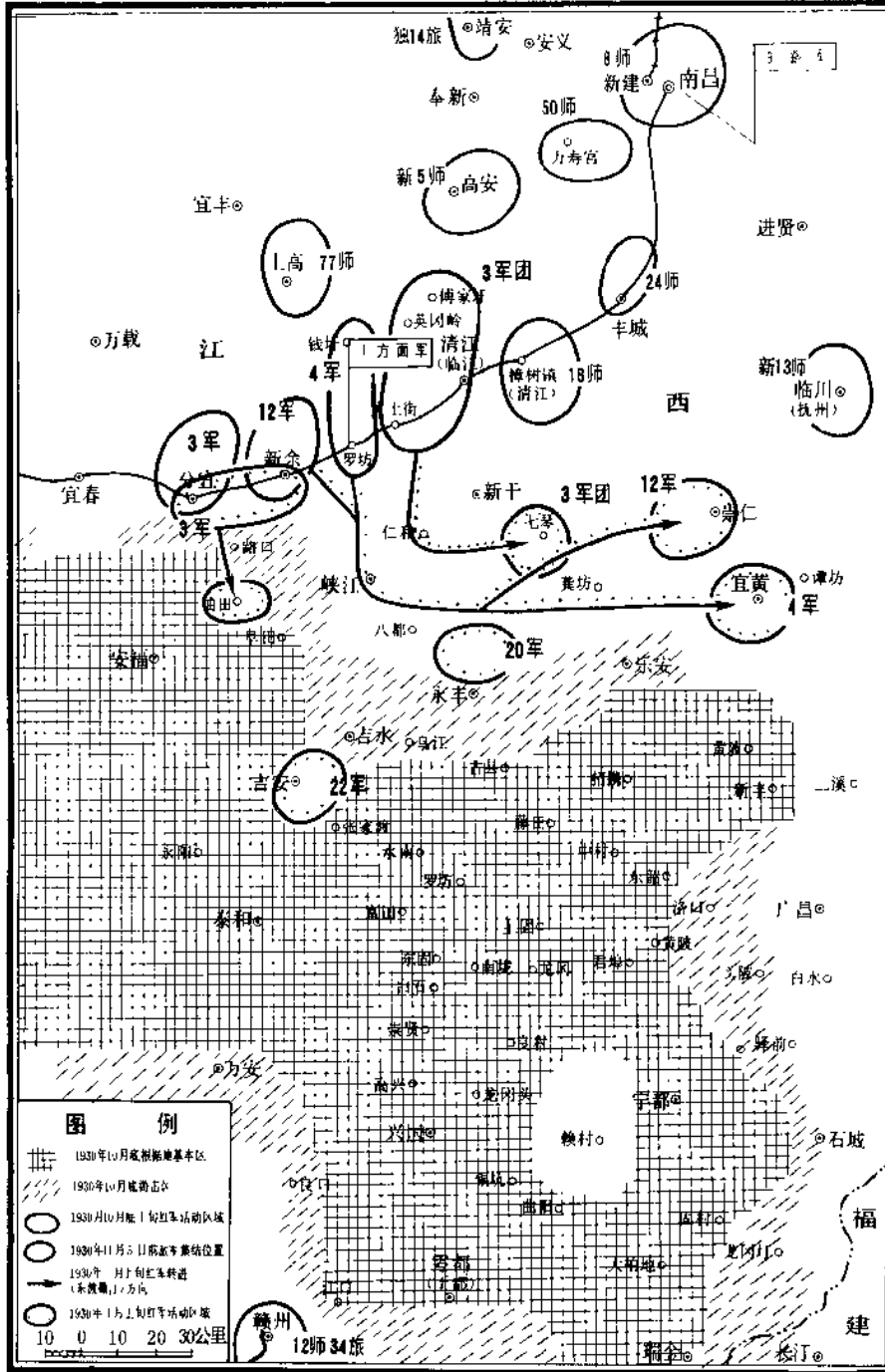
**图例**

- 红一方面军集结地域
- 红一方面军行动方向
- ⊗ 红一方面军歼敌地域
- ⊙ 红二方面军集结地域
- 红二方面军行动方向
- ⊙ 红三军团会师地域
- 红三军团行动方向

15 0 15 30 45公里

#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 战前敌我态势和红军东渡赣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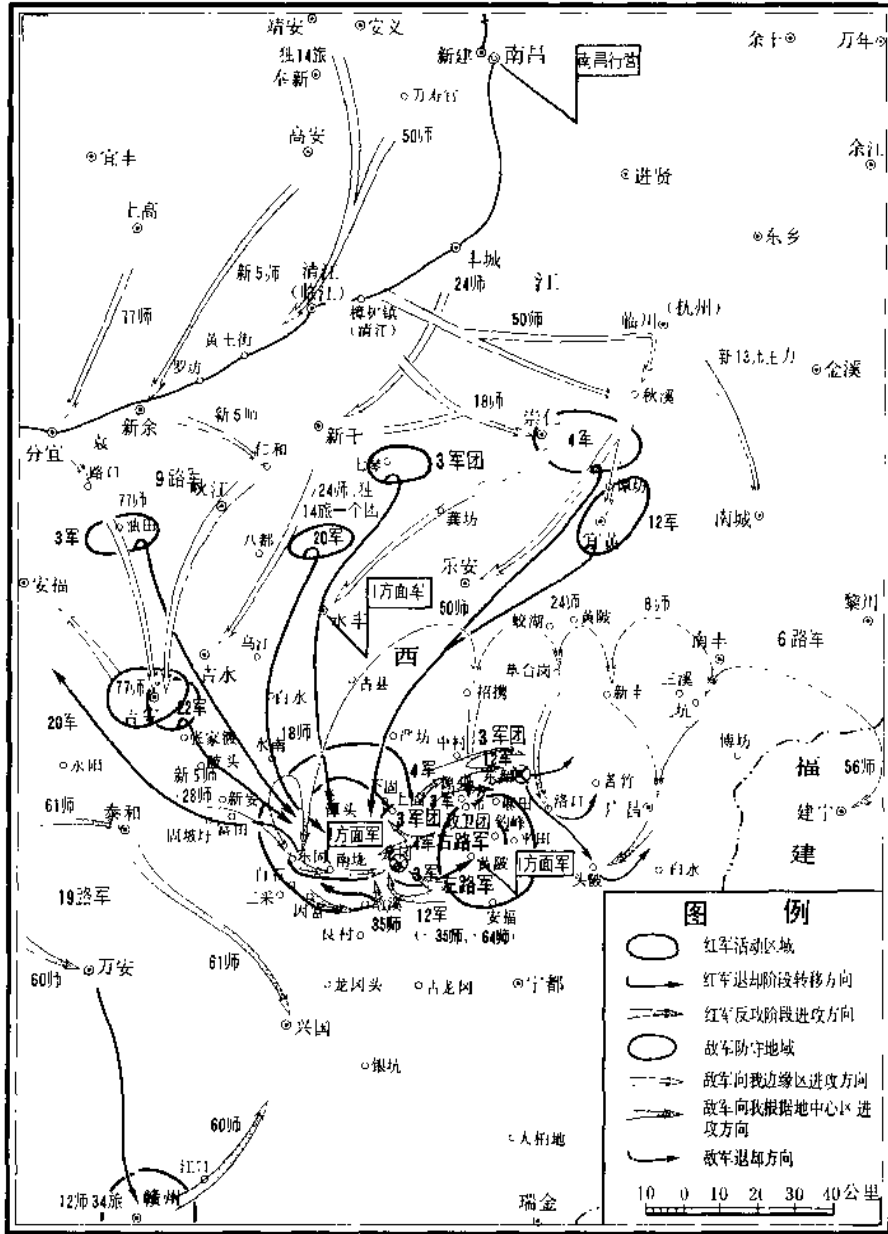
附图15



#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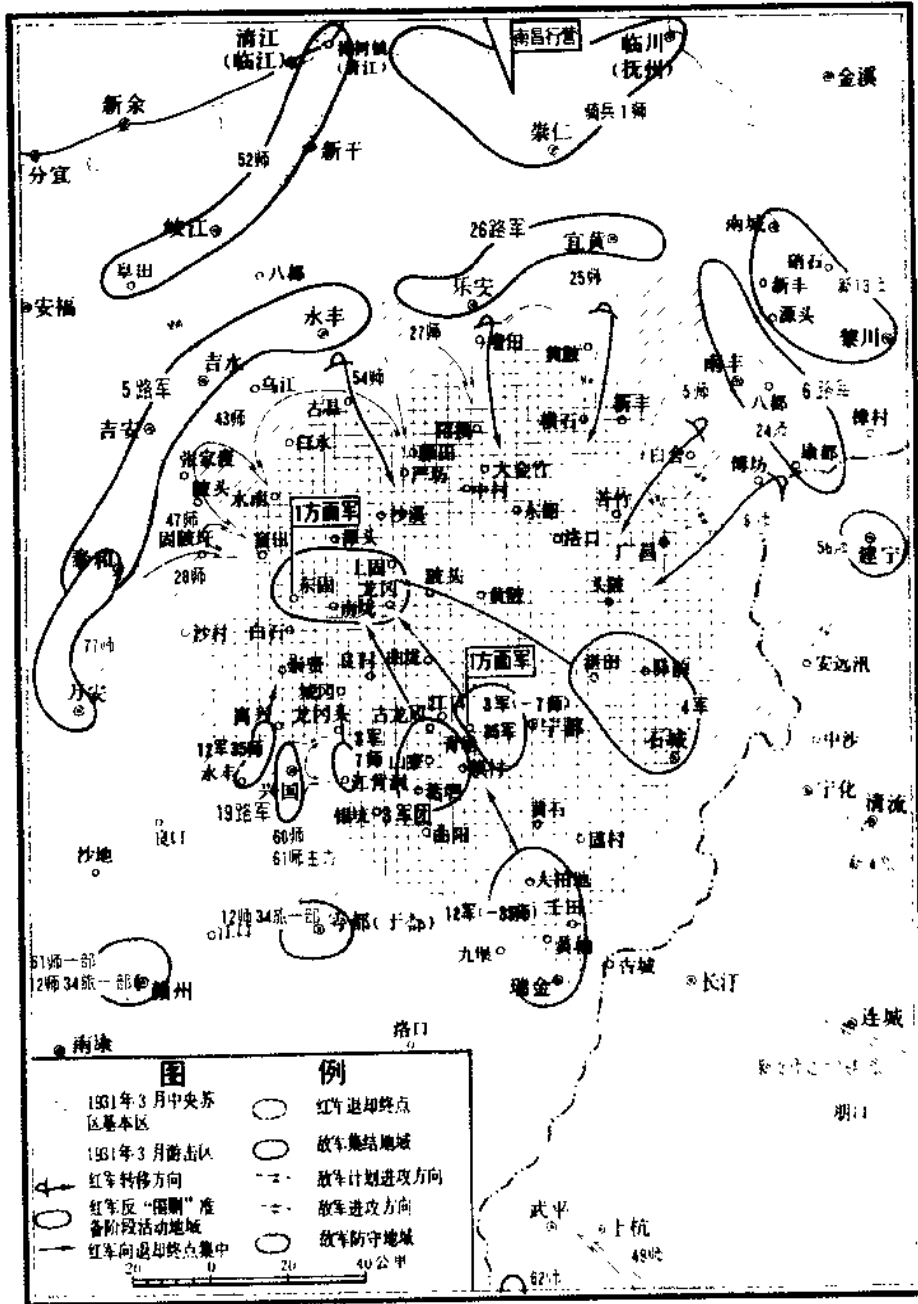
(1930年11月-1931年1月)

附图16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前准备和向退却终点集中示意图  
(1931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

附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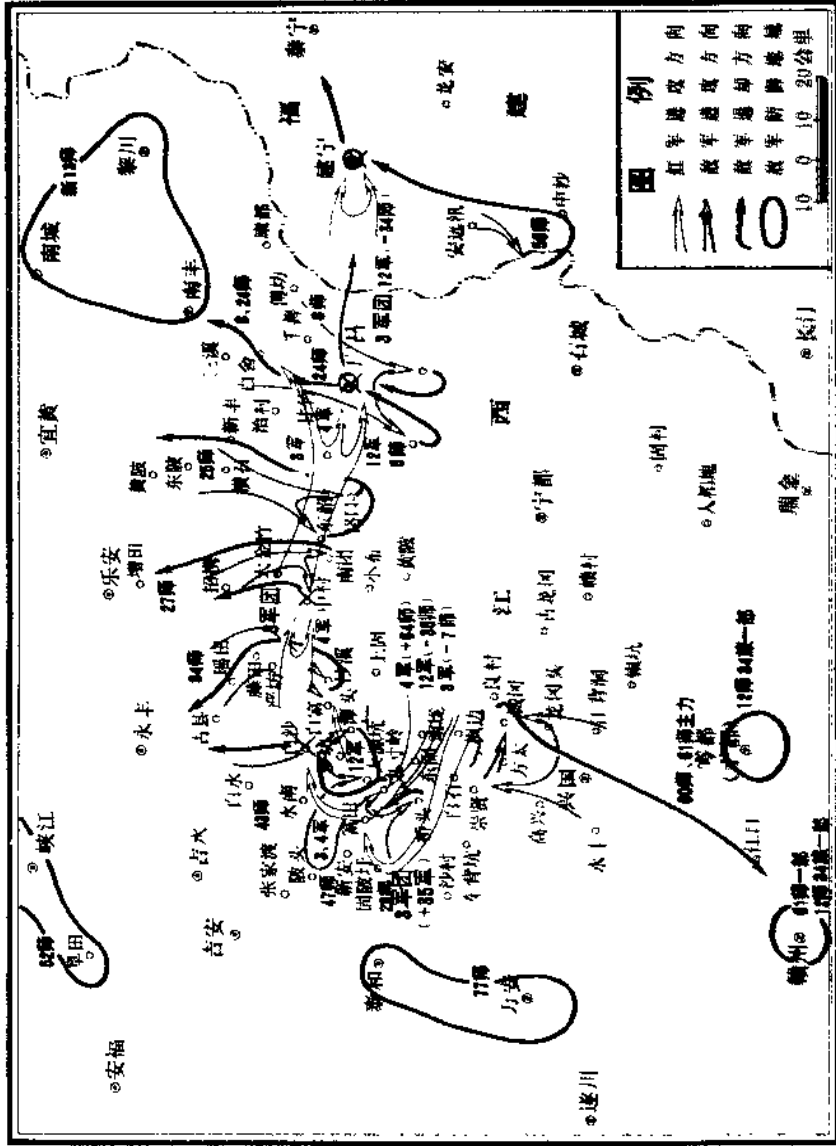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

(1931年5月16日—31日)

附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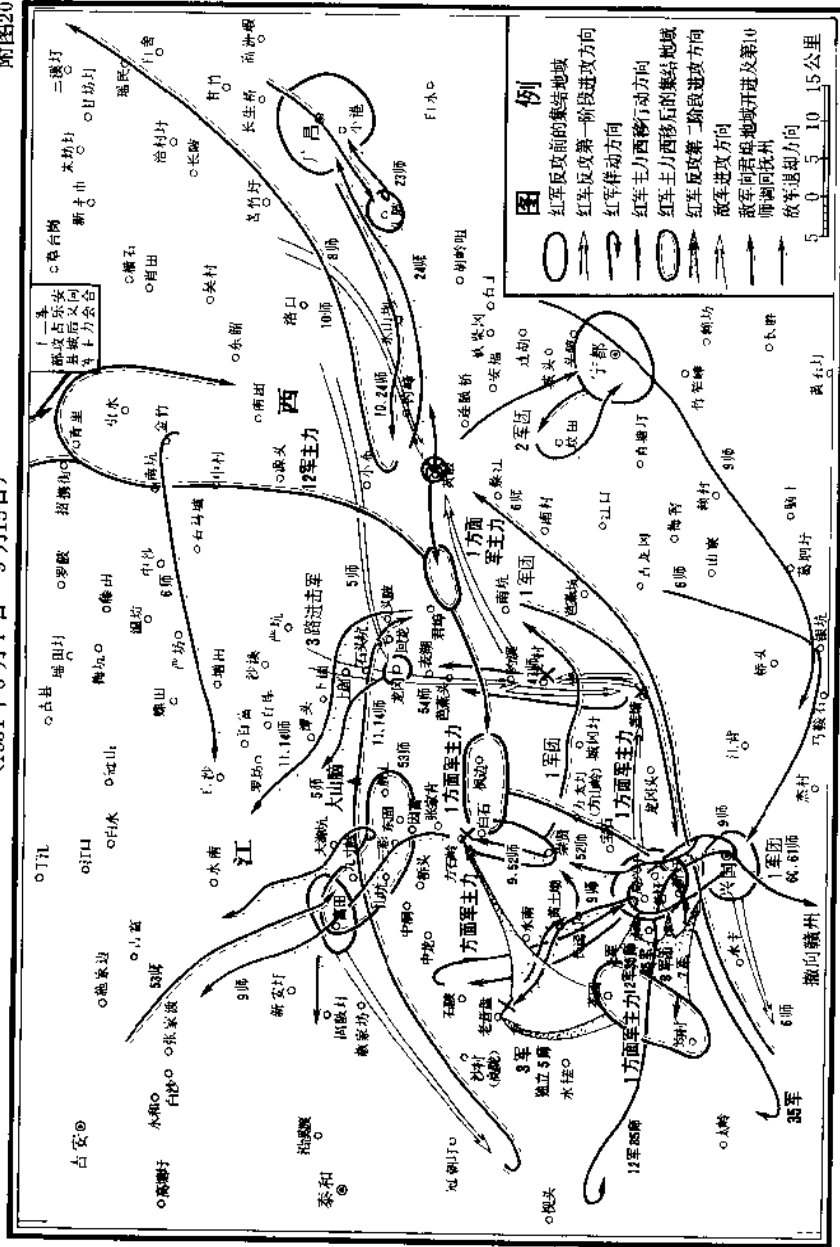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

(1931年8月1日—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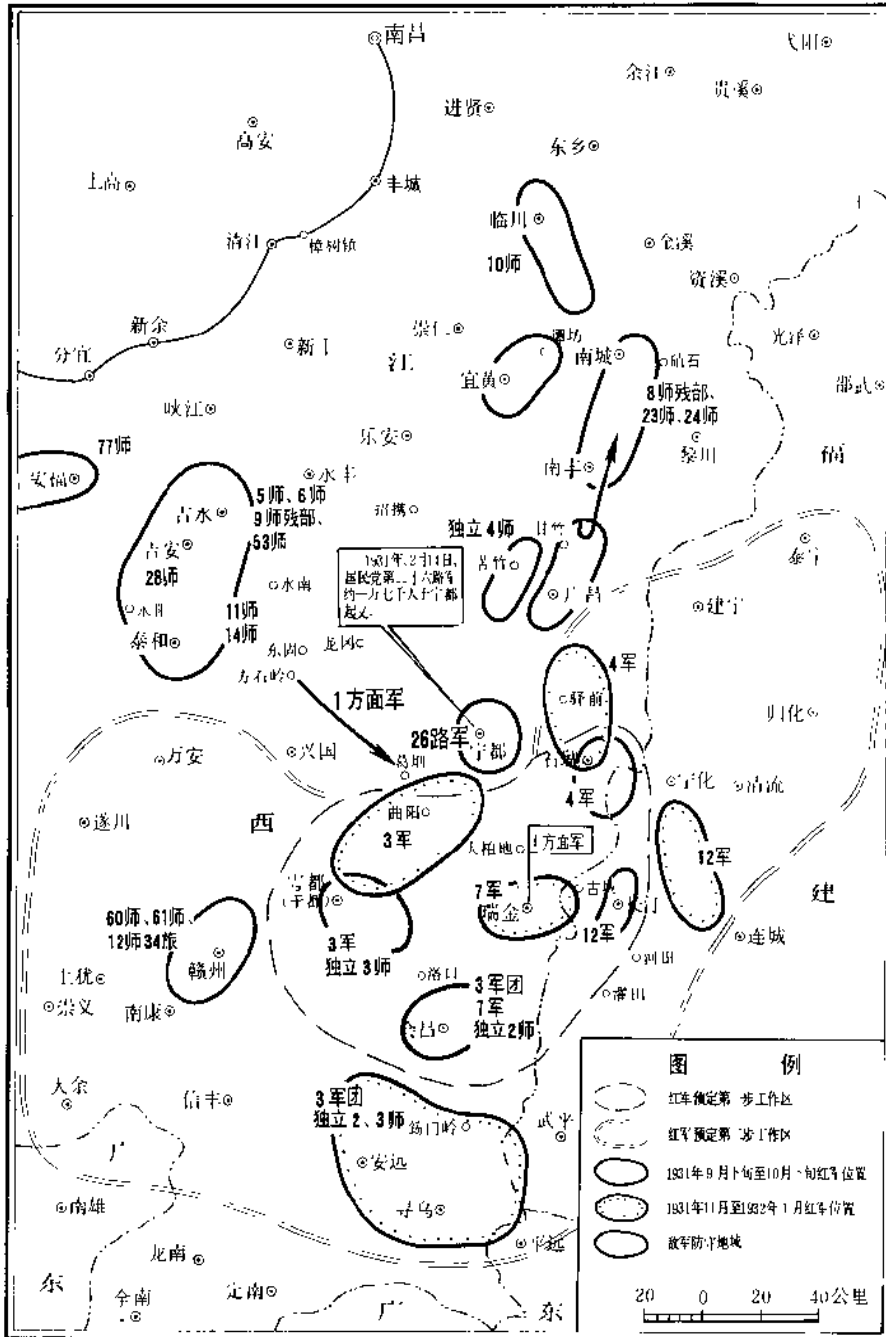
附图20



# 红一方面军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工作区域示意图

(1931年9月下旬—1932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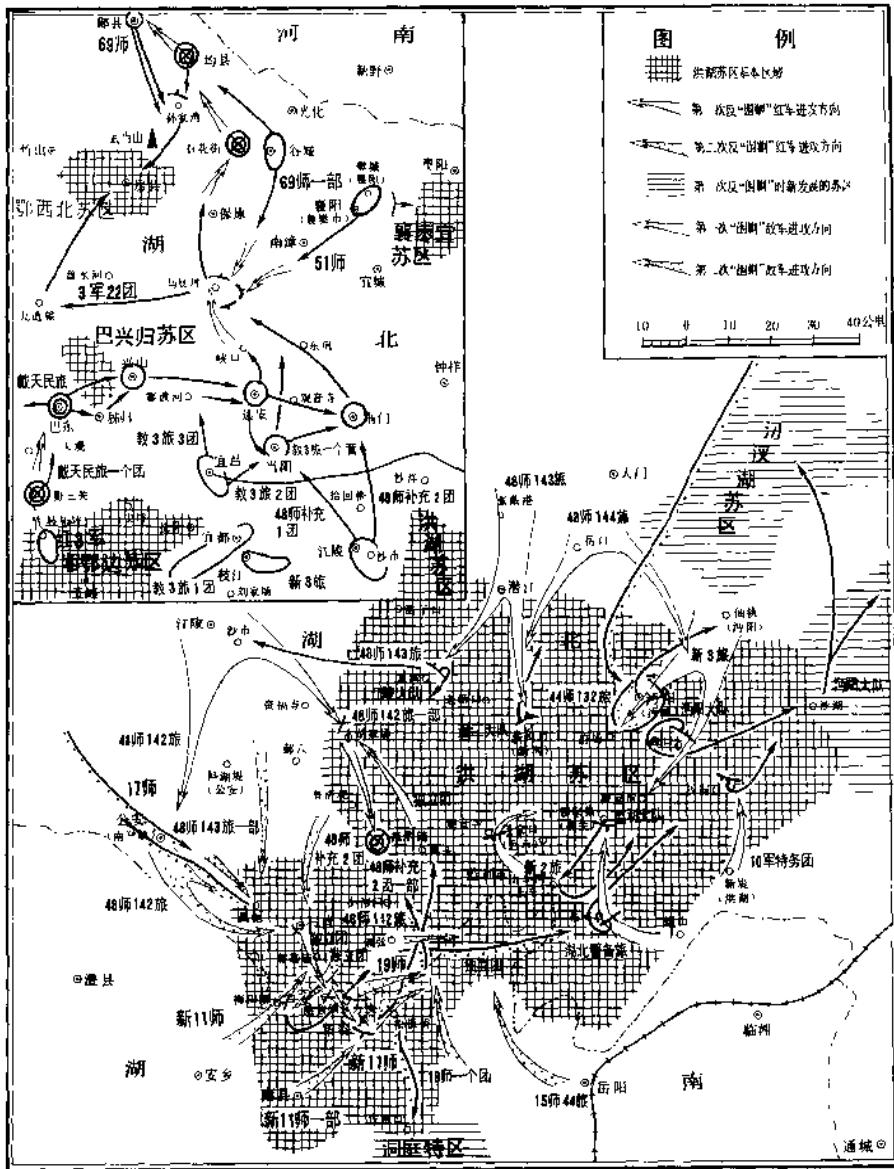
图2.21



## 洪湖苏区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作战 及红三军主力转战荆当远、鄂西北经过要图

(1931年1月—7月)

附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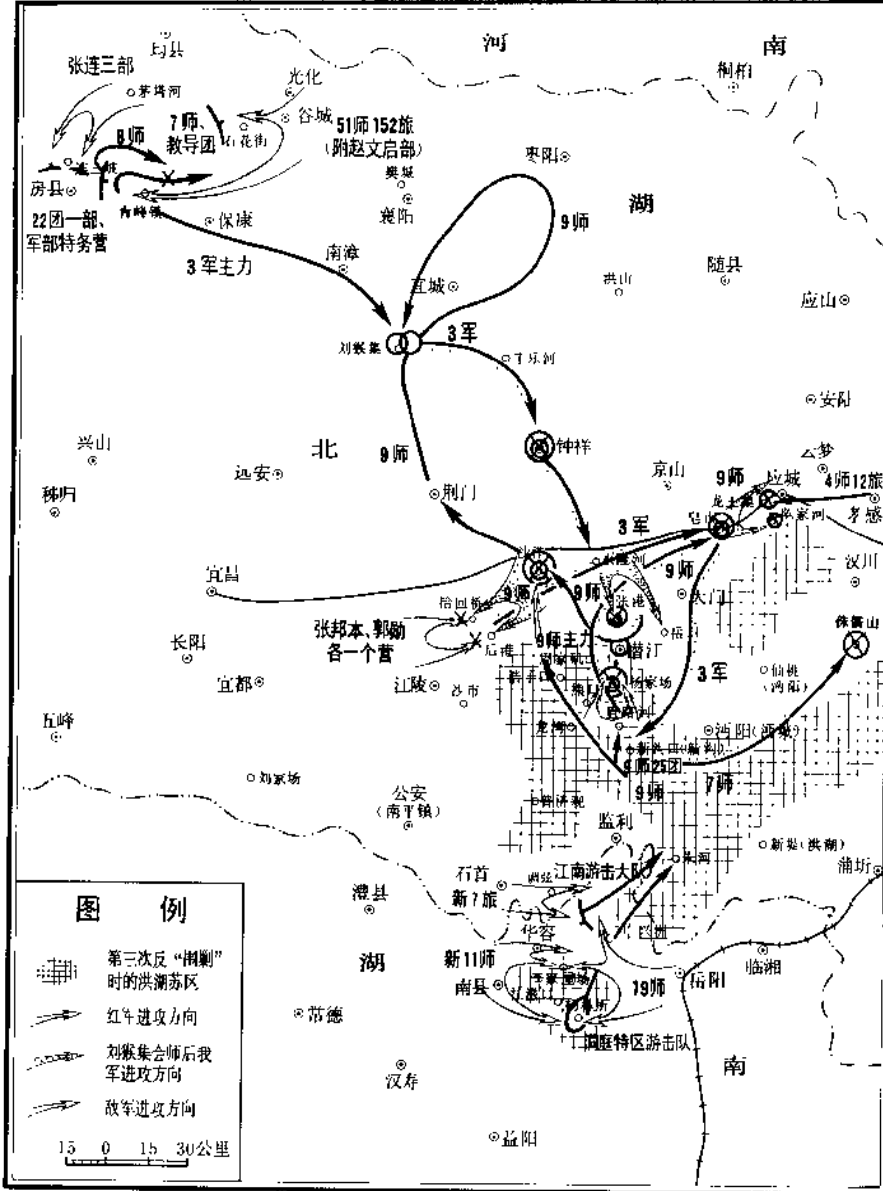


# 洪湖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经过要图

## 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和出击襄北

1931年8月—1932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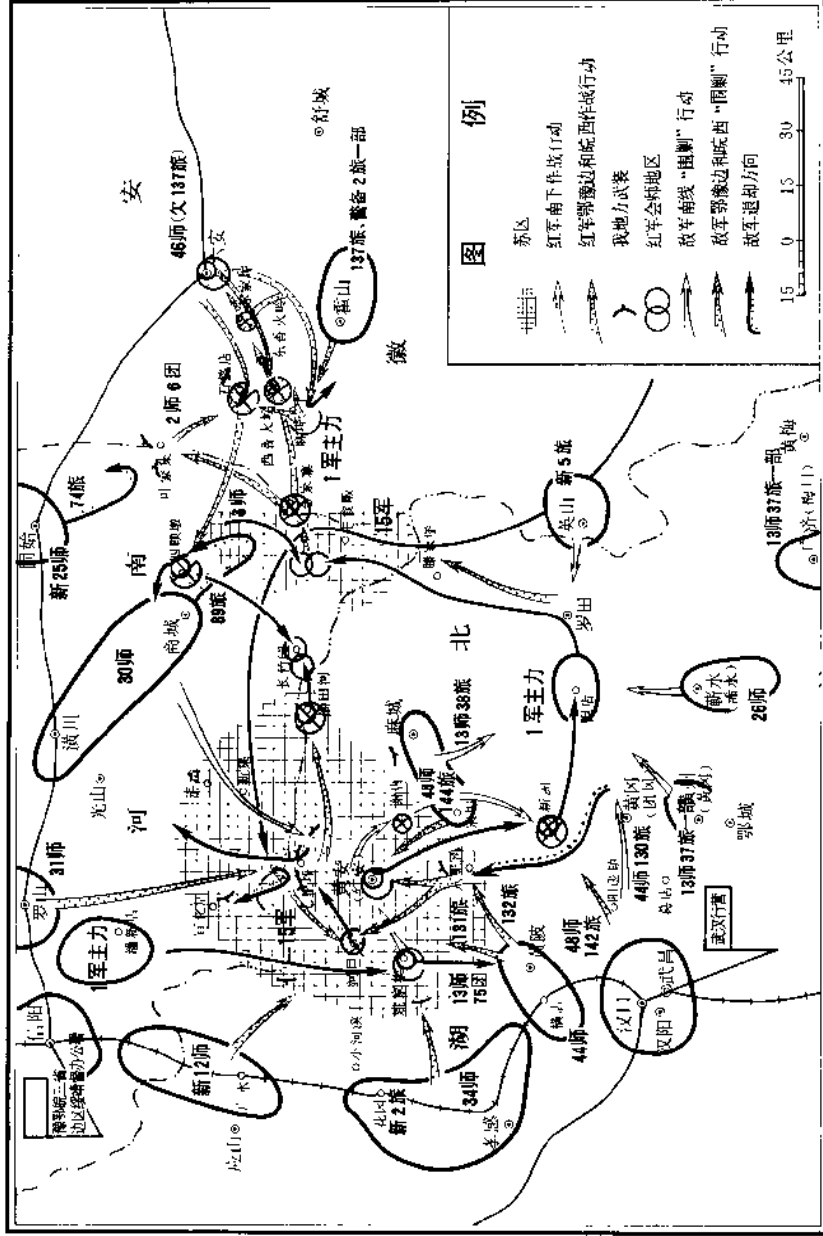
附图23



#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

(1930年11月—1931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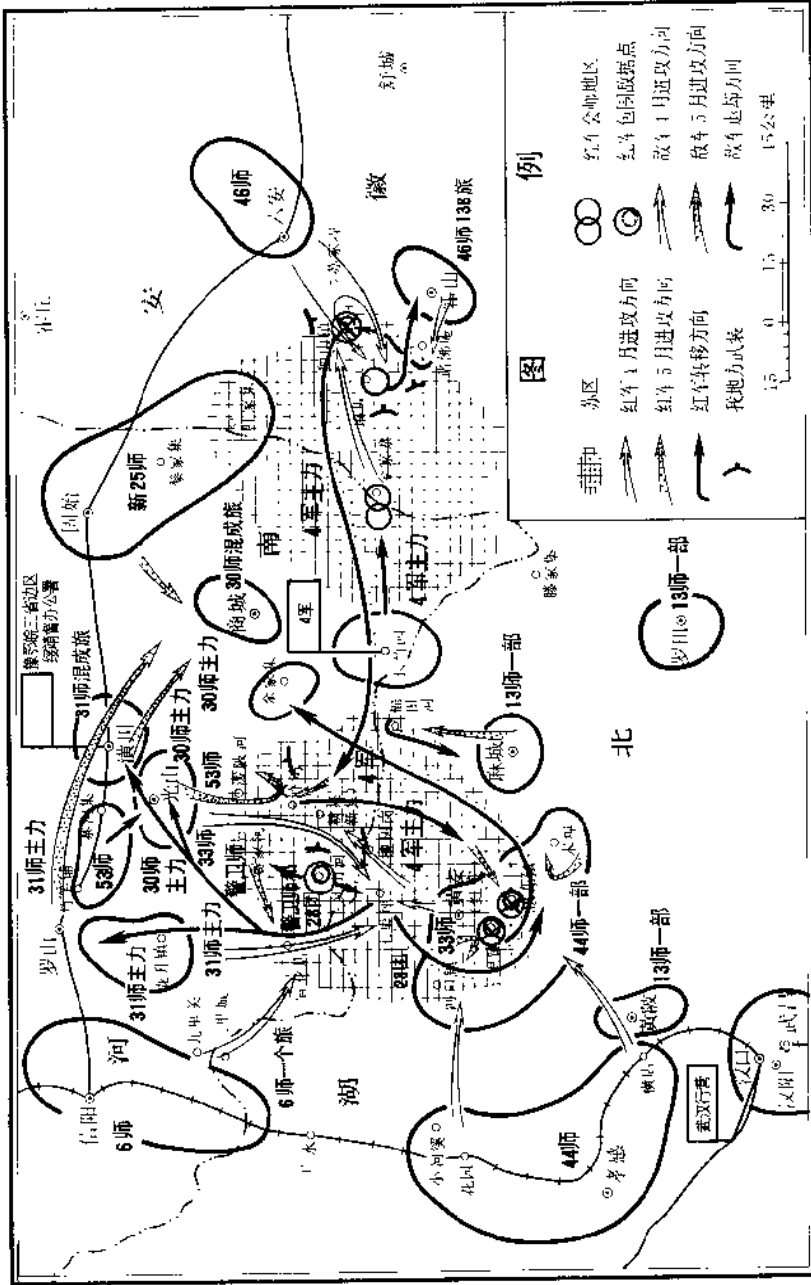
附图24



# 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

(1931年3月下旬—5月下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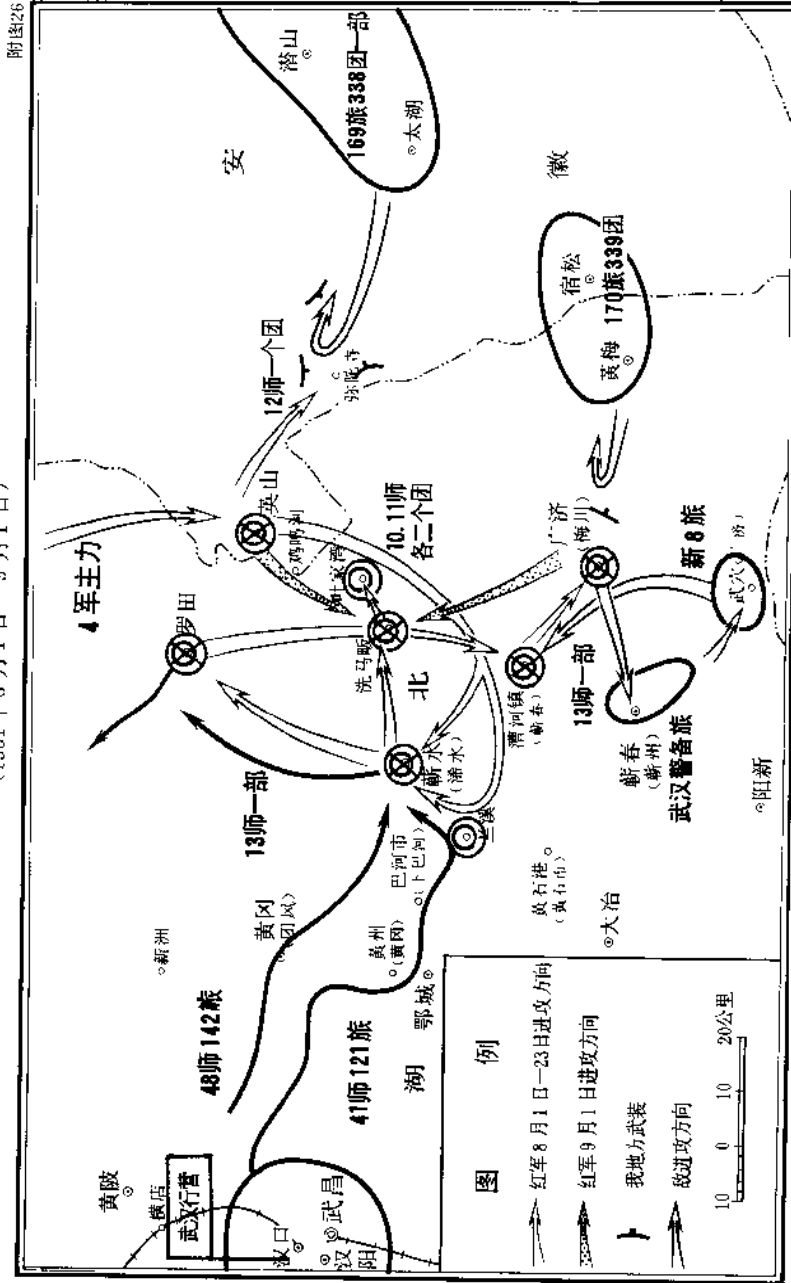
附图25





# 鄂豫皖苏区红四军南下蕲黄广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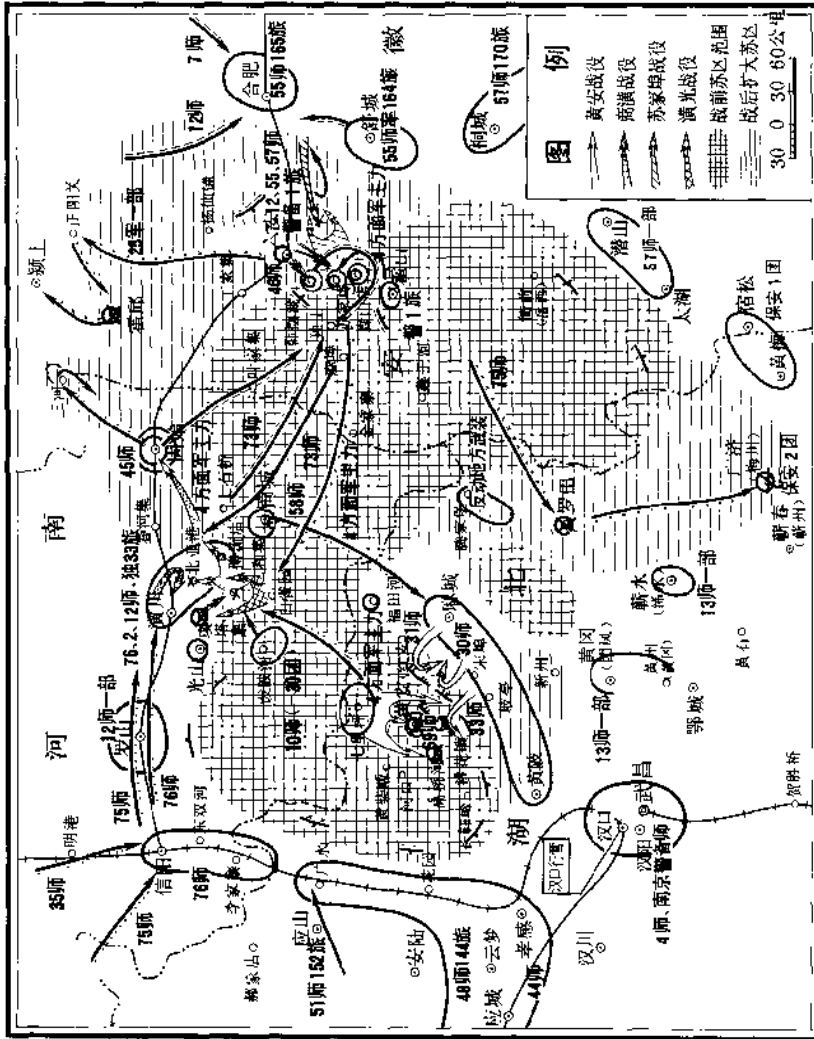
(1931年8月1日—9月1日)



# 红四方面军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计划的作战经过要图

(1931年11月10日—1932年6月19日)

附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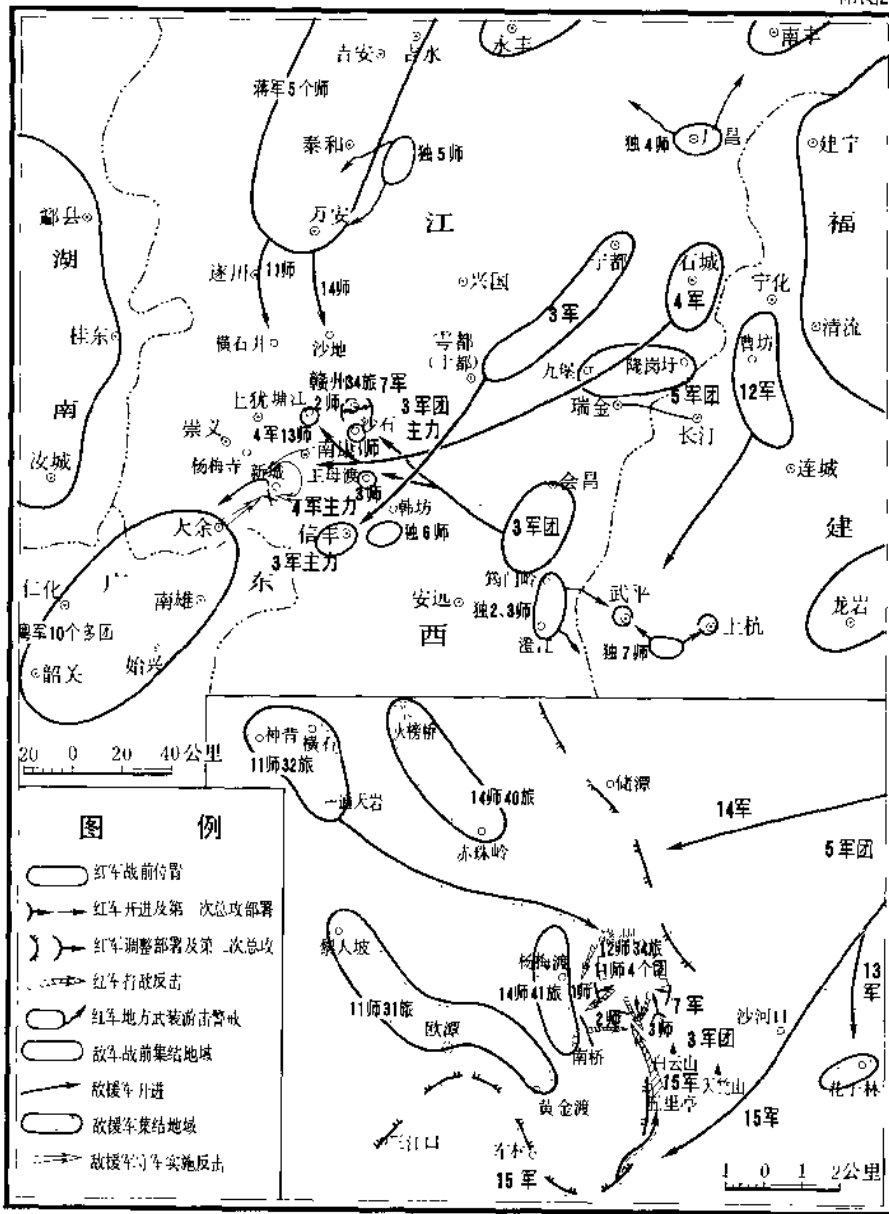




# 中央红军赣州战役要图

(1932年2月4日—3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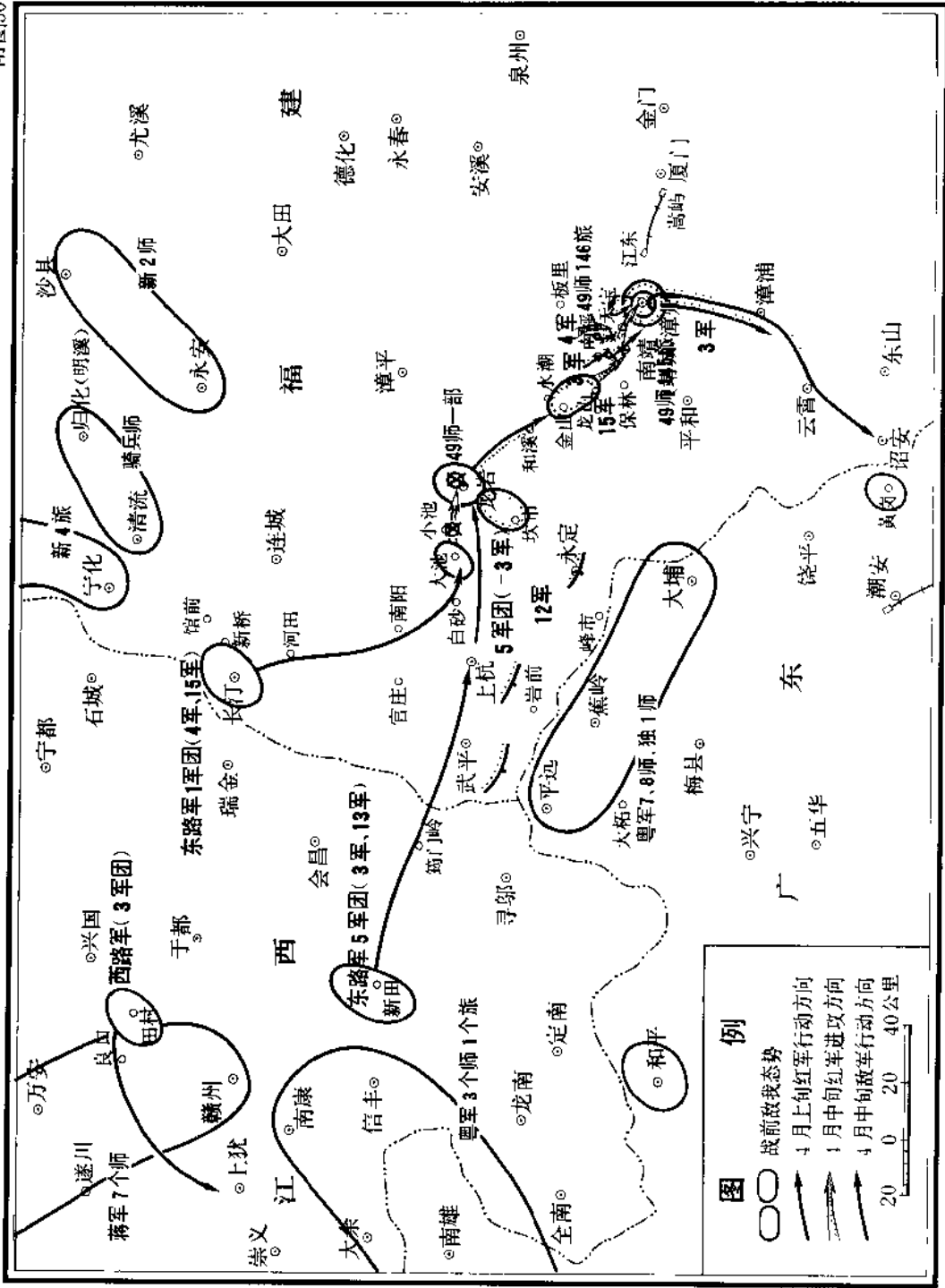
附图29



# 中央红军东路军漳州战役要图

(1932年4月3日—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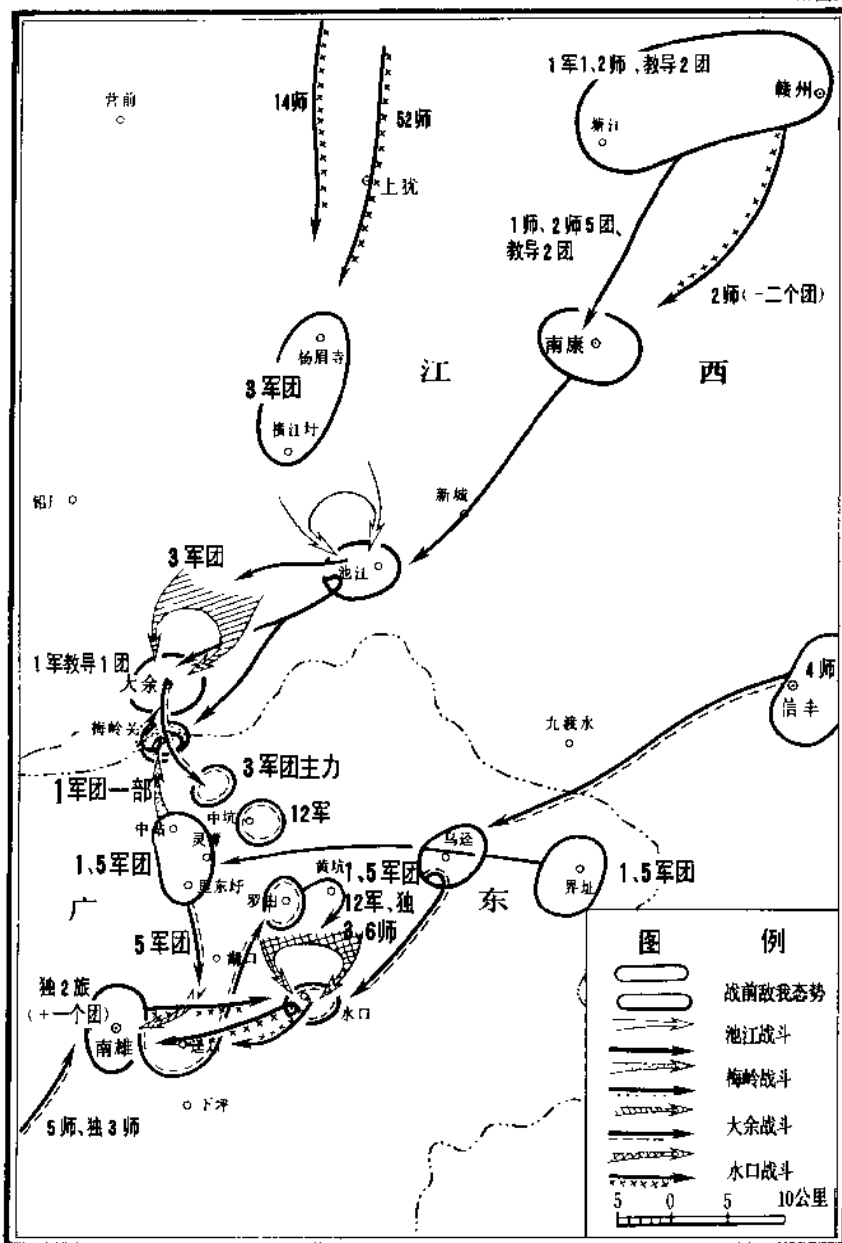
附图30



# 红一方面军南雄、水口战役要图

(1932年7月2日—7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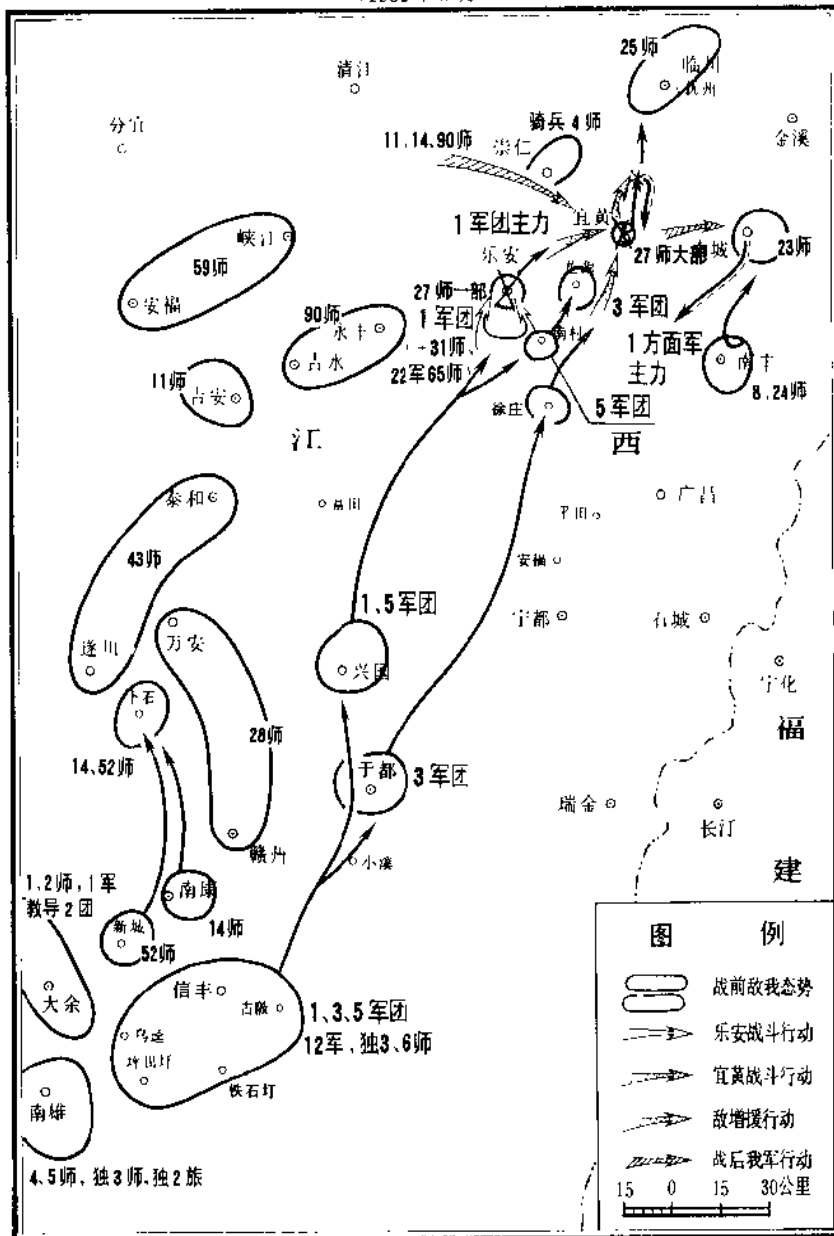
附图31



# 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要图

(1932年8月)

附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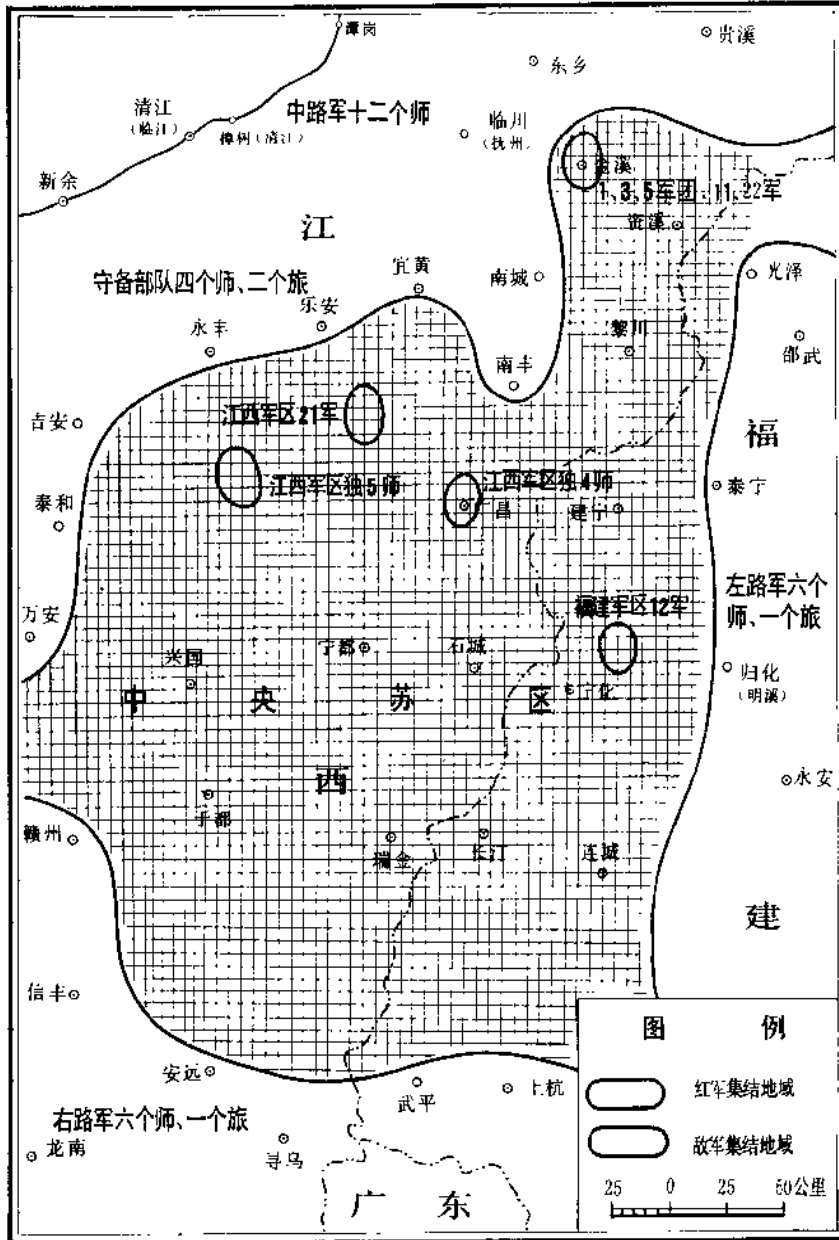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前敌我态势图  
(1933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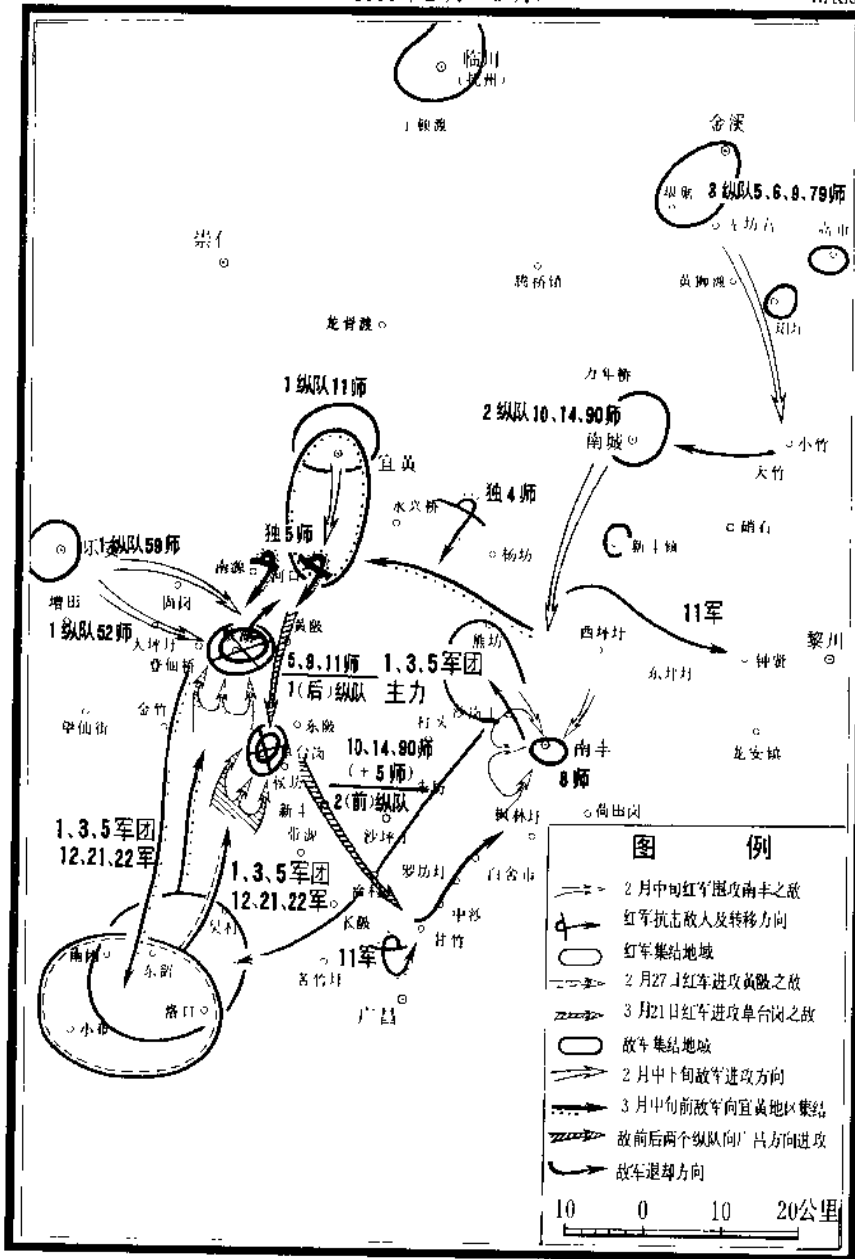
附图34



#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3年2月-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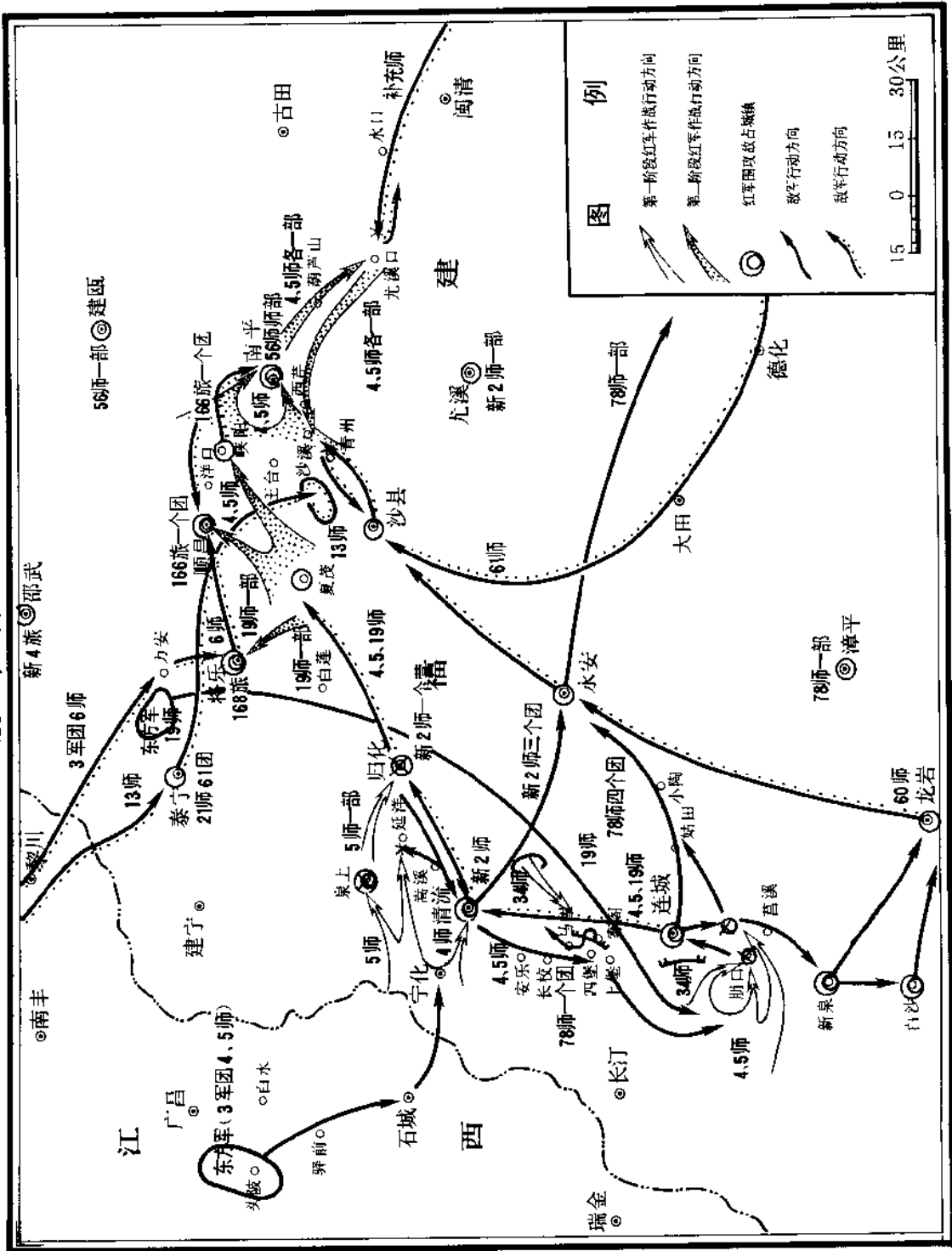
附图35



# 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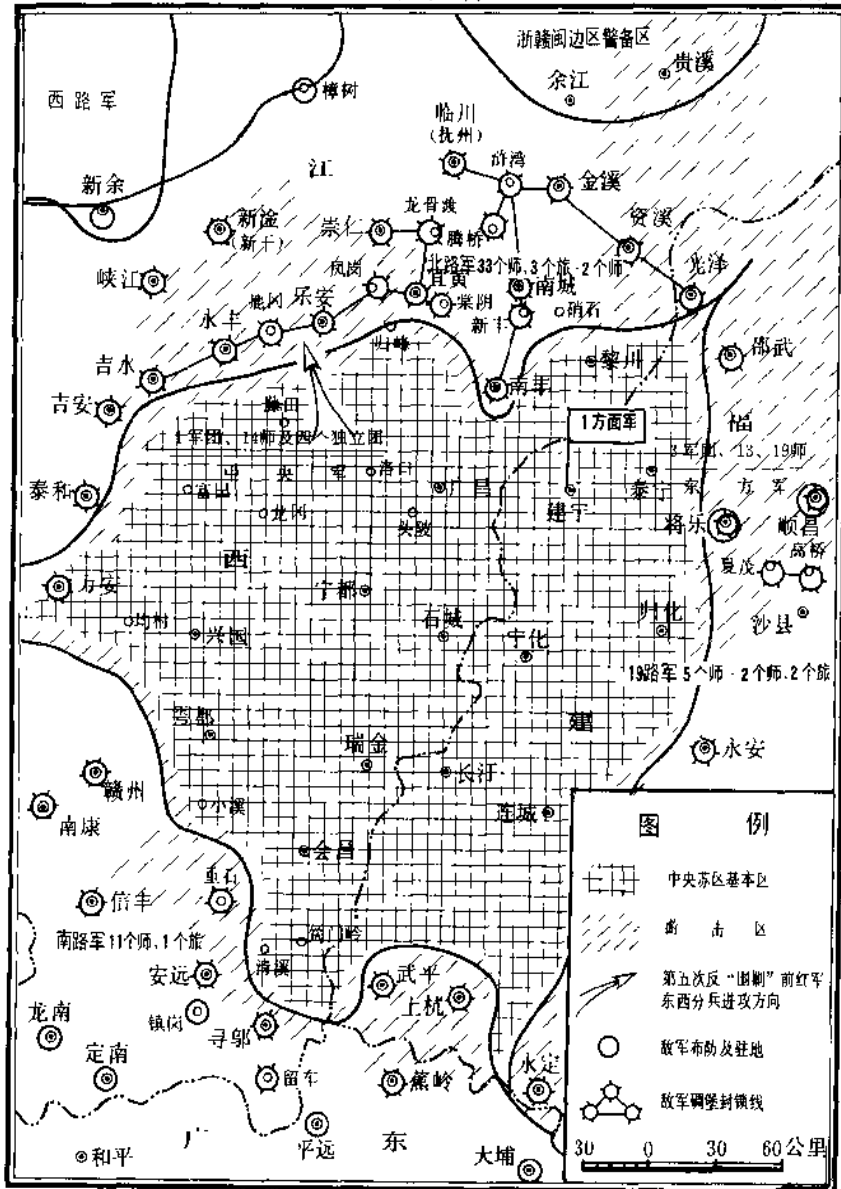
(1933年7月—9月)

附图36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前敌我态势图  
(1933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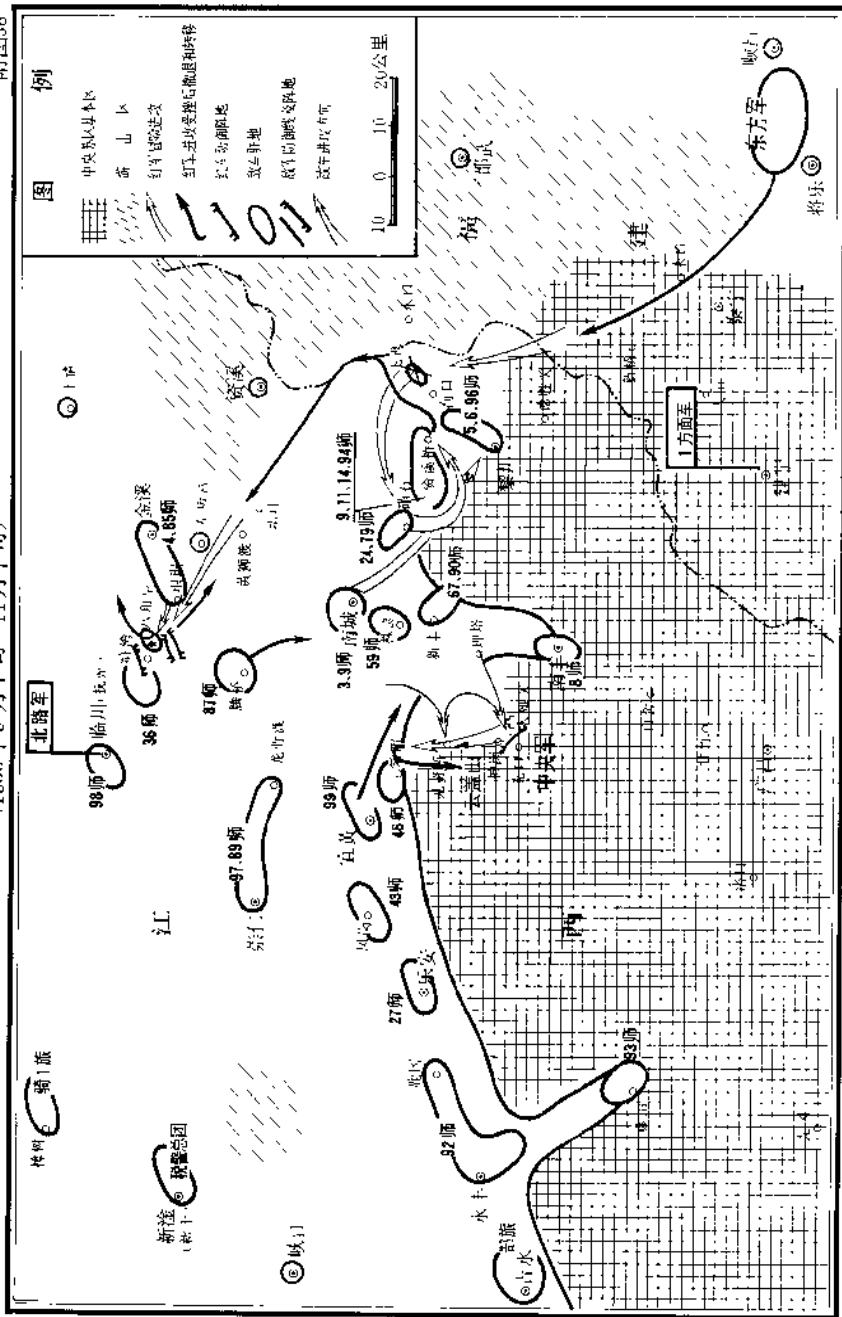
附图37



#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一)

(1933年9月下旬-11月中旬)

附图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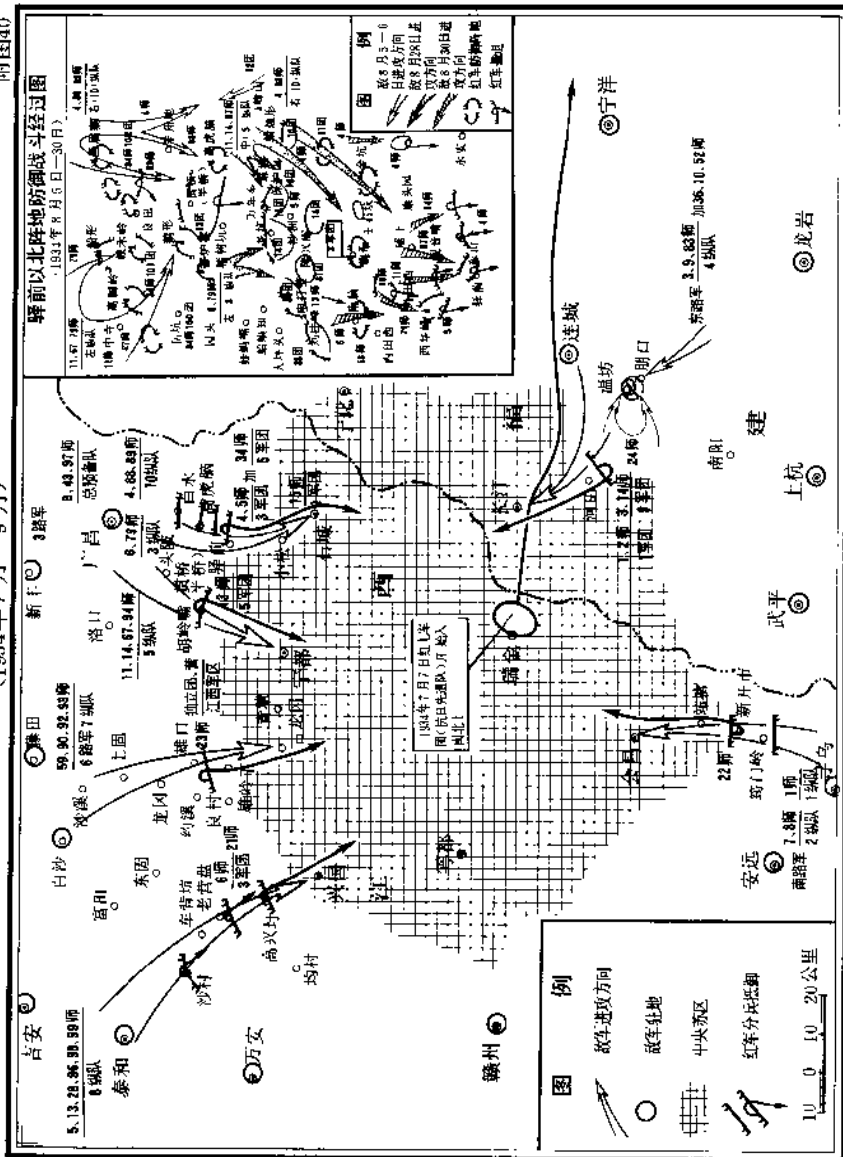




# 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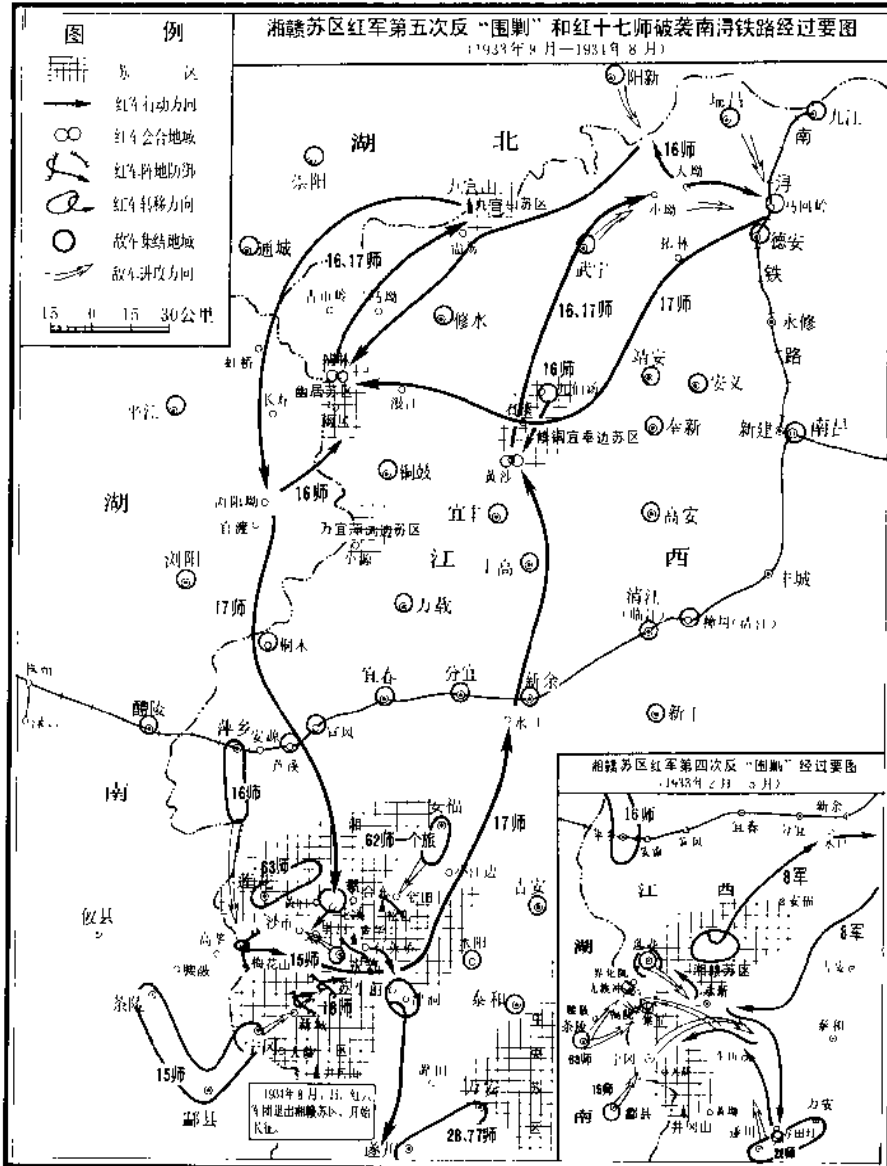
(1934年7月—9月)

附图40



# 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附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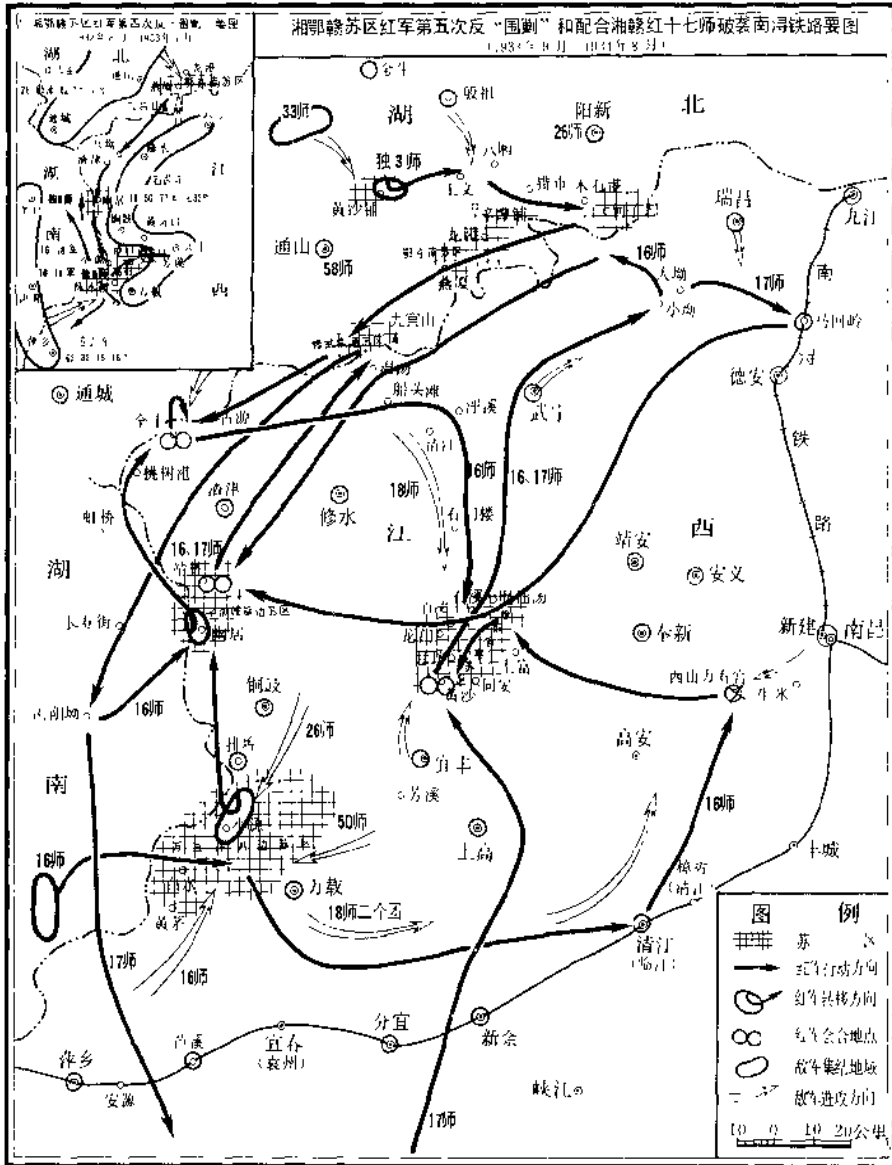




# 湘鄂赣苏区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2年8月—193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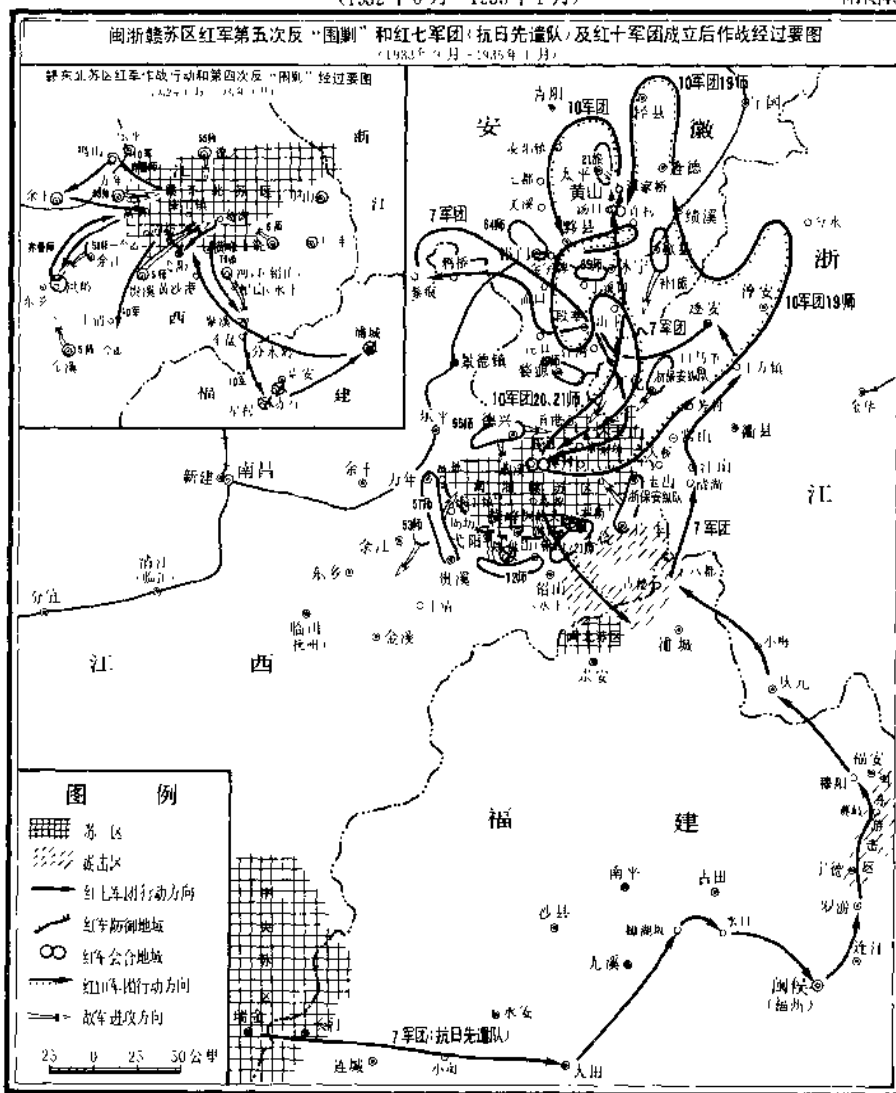
附图42



# 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2年6月—1935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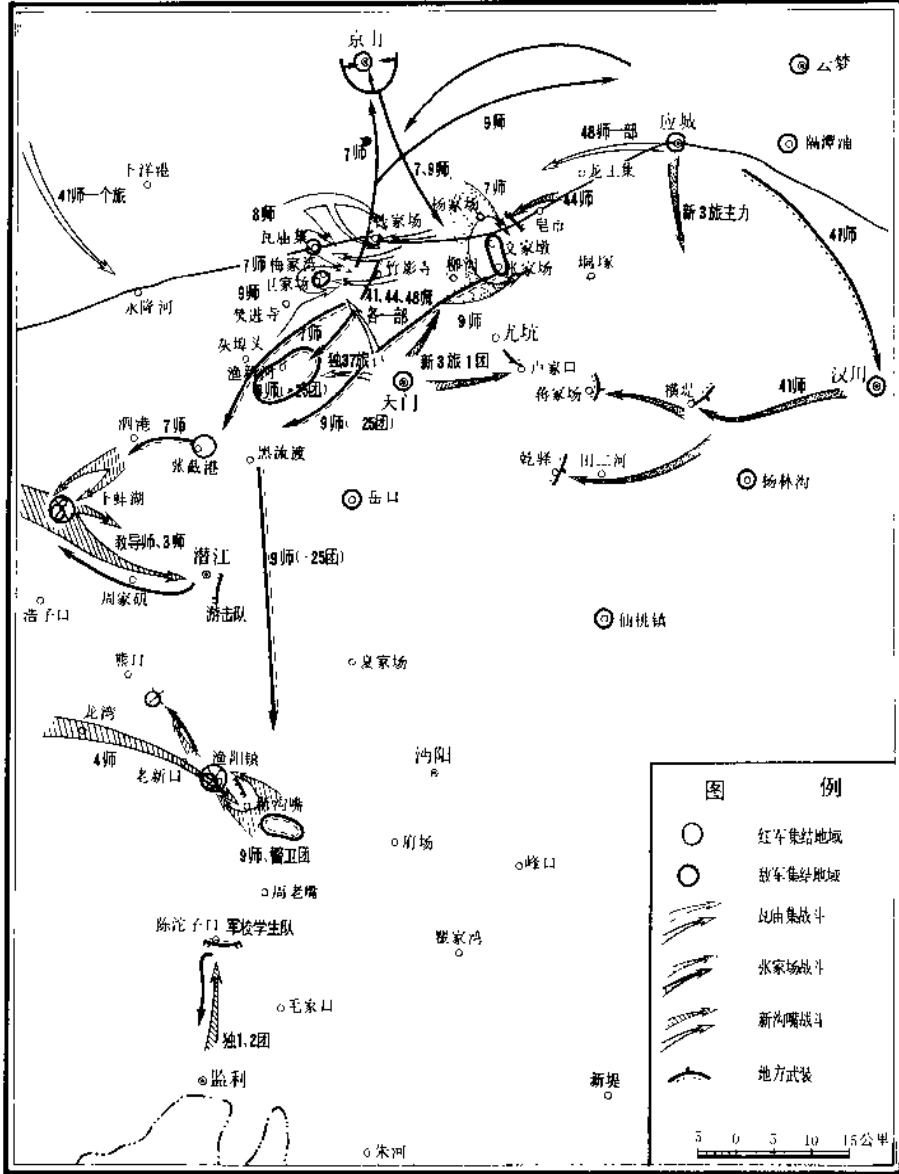
附图43



#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襄河北岸战斗经过要图

1932年3月30日 6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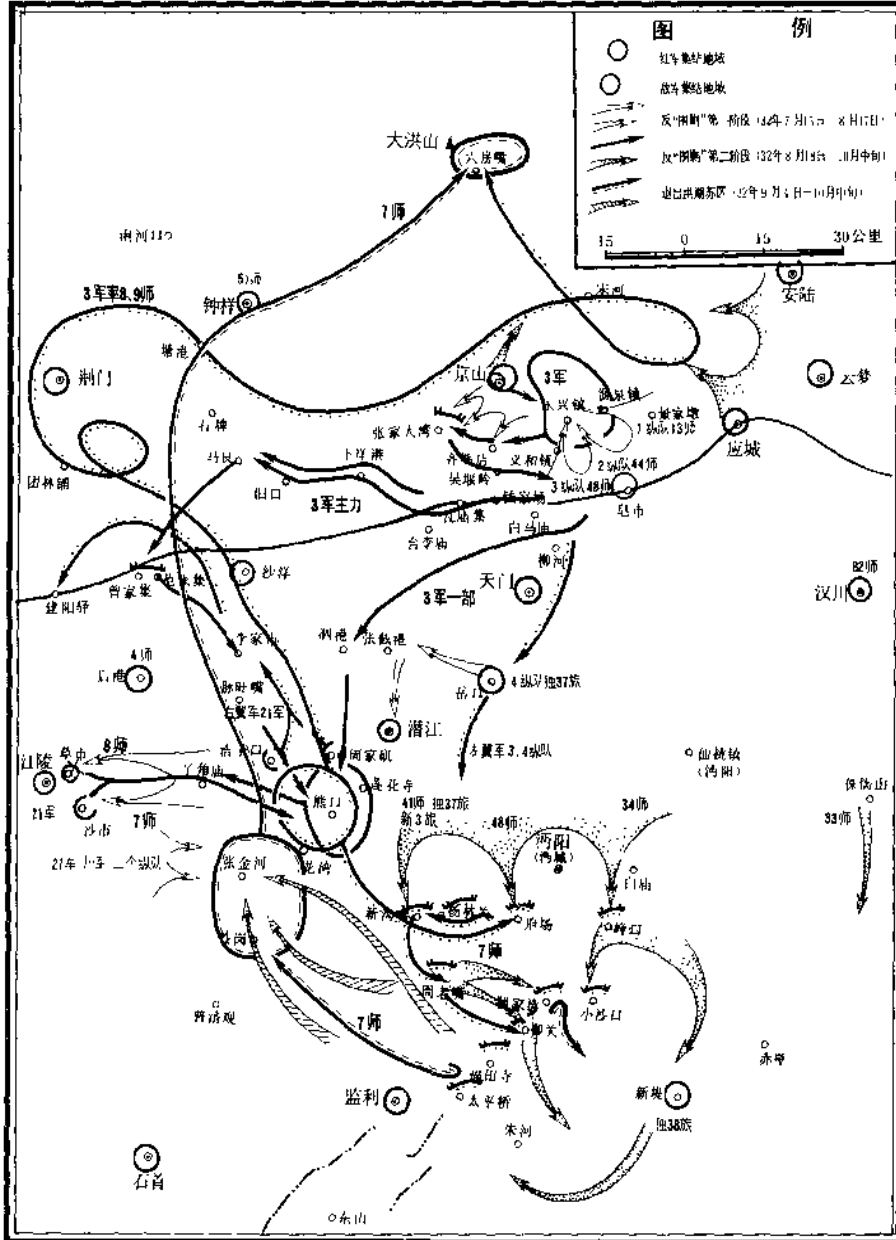
附图44



#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2年7月15日—10月中旬)

附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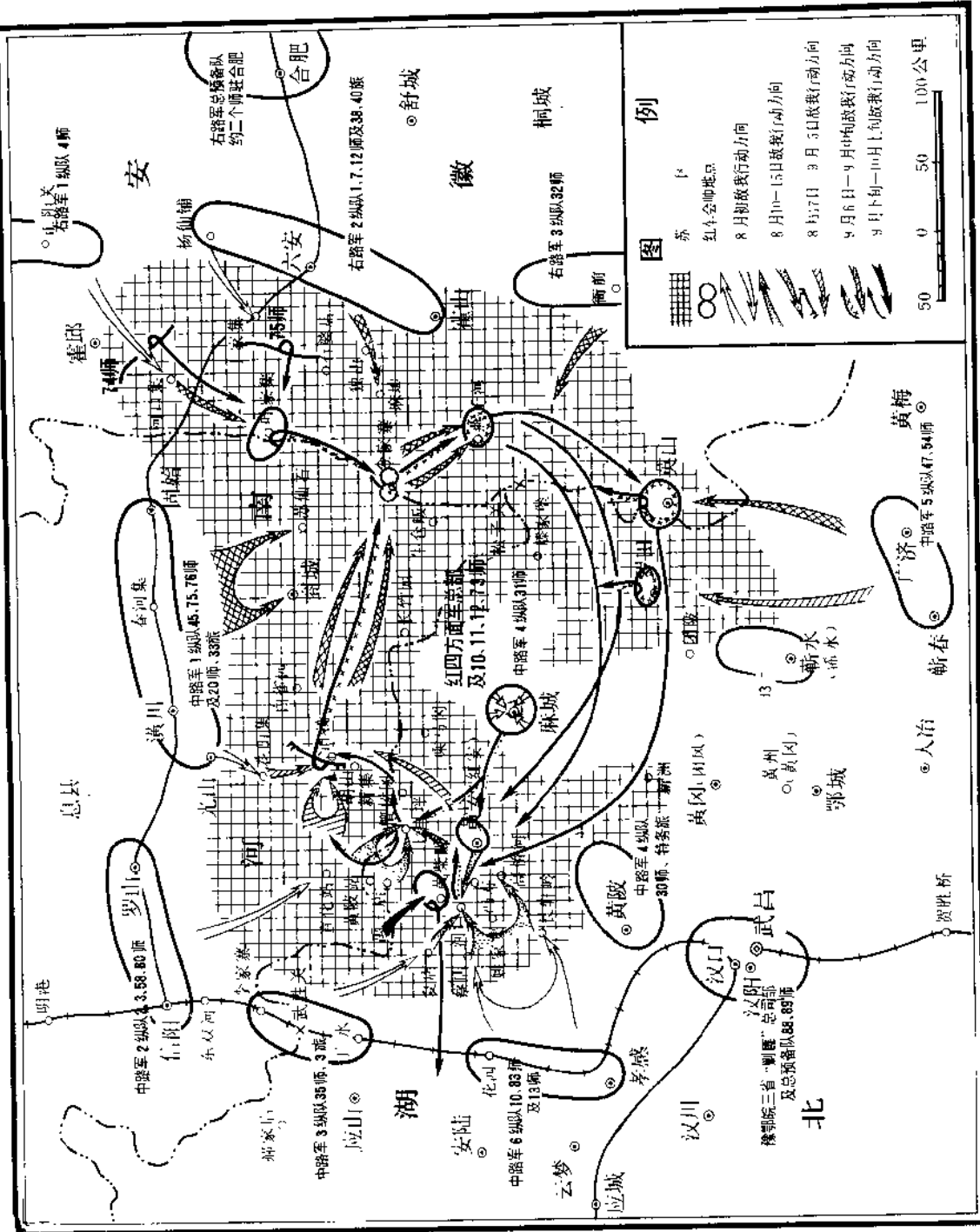




#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2年8月上旬—10月上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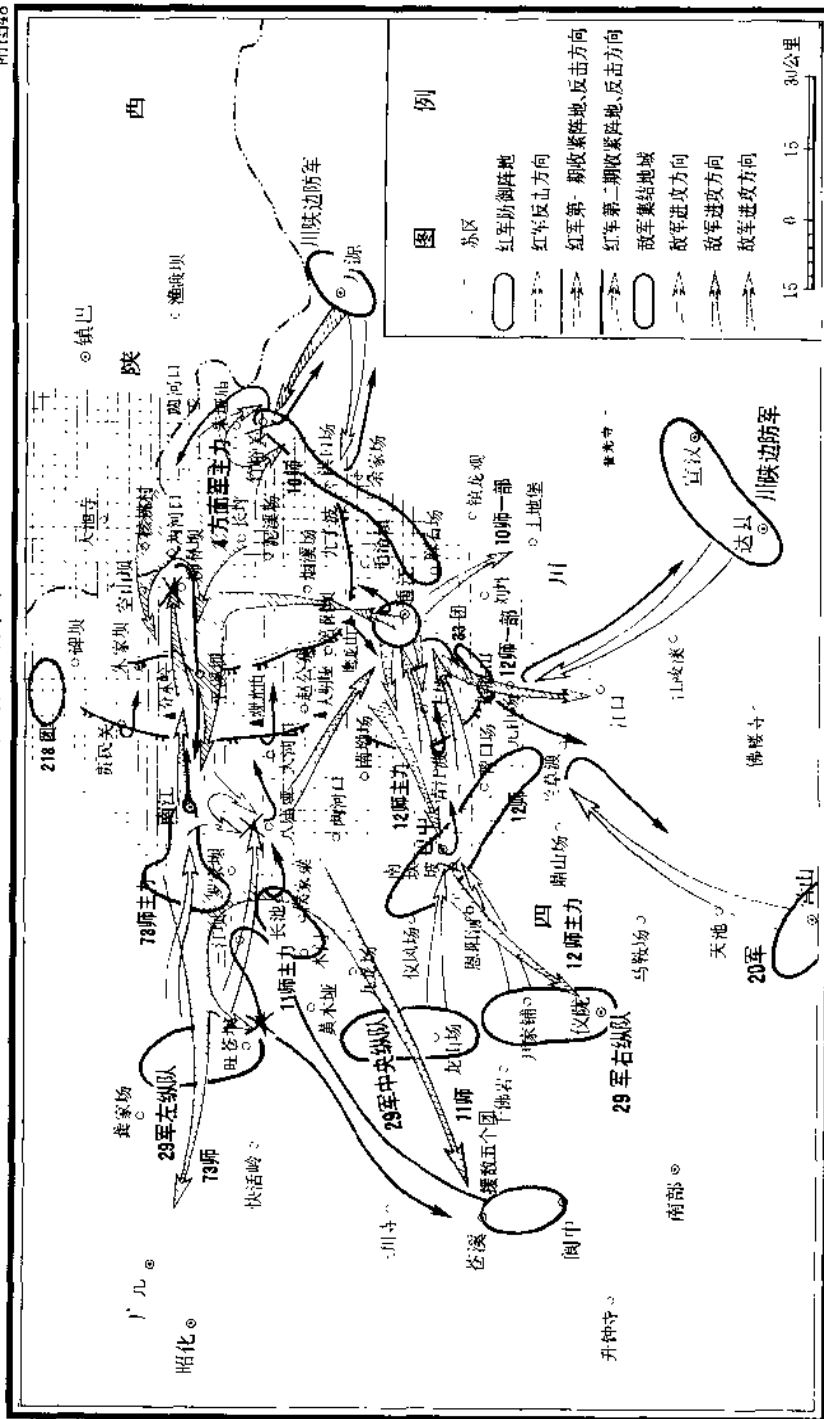
附图47



# 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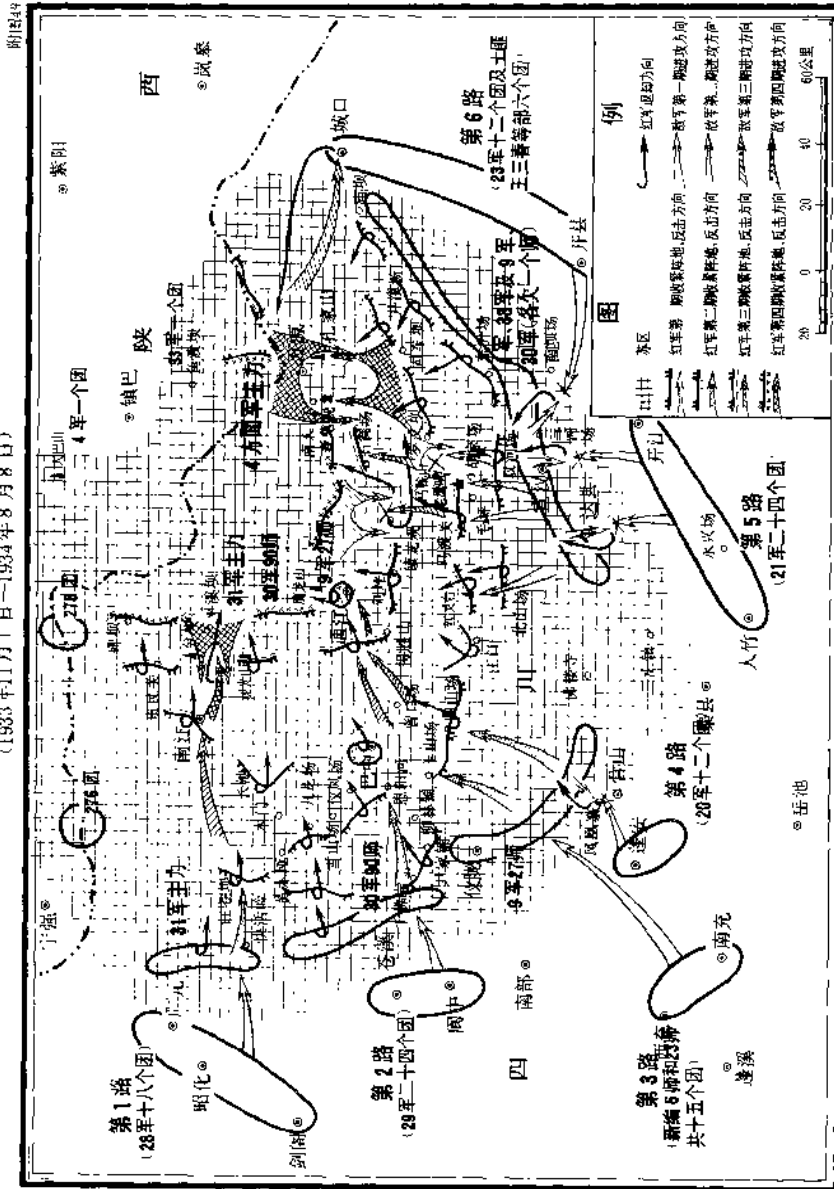
（1933年2月12日—6月中旬）

附图48



#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经过要图(一)

(1933年11月1日—1934年8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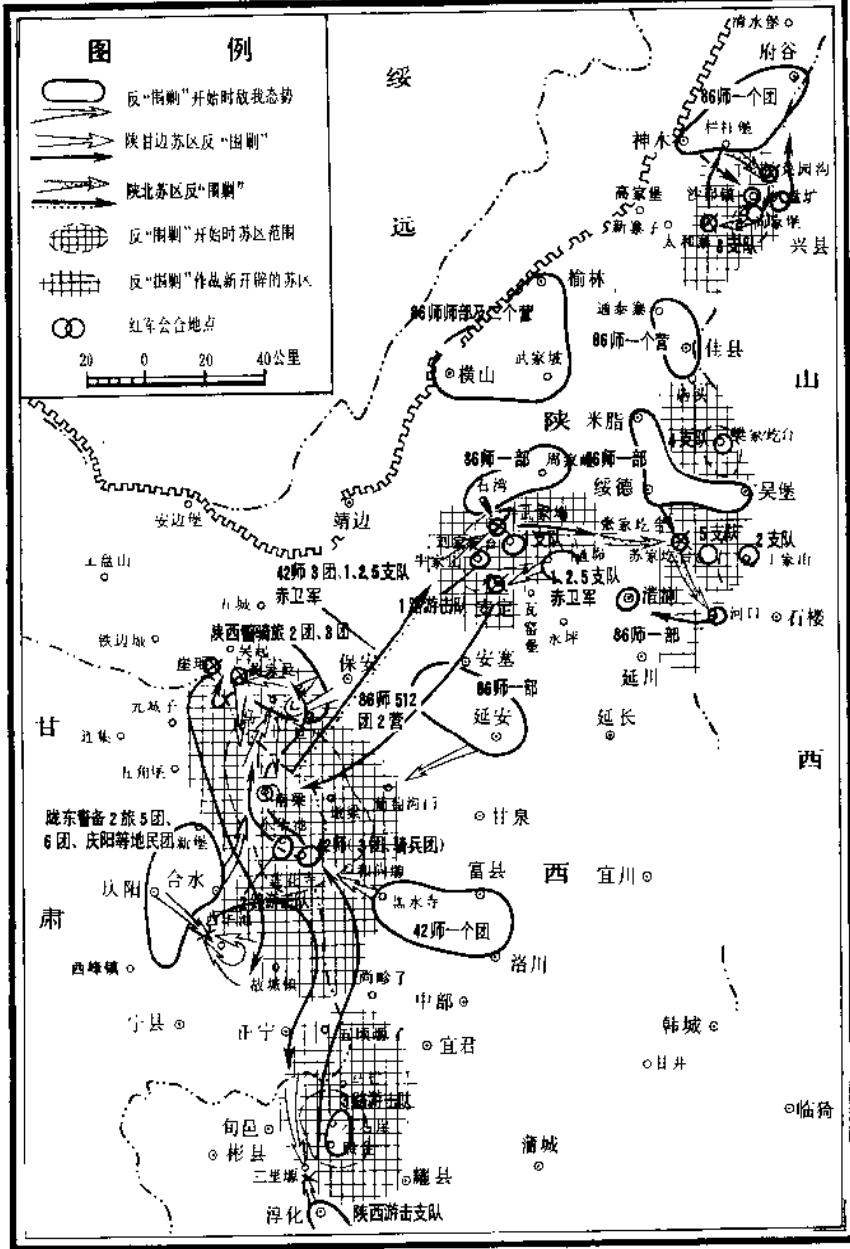




# 陕甘边、陕北苏区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4年2月 - 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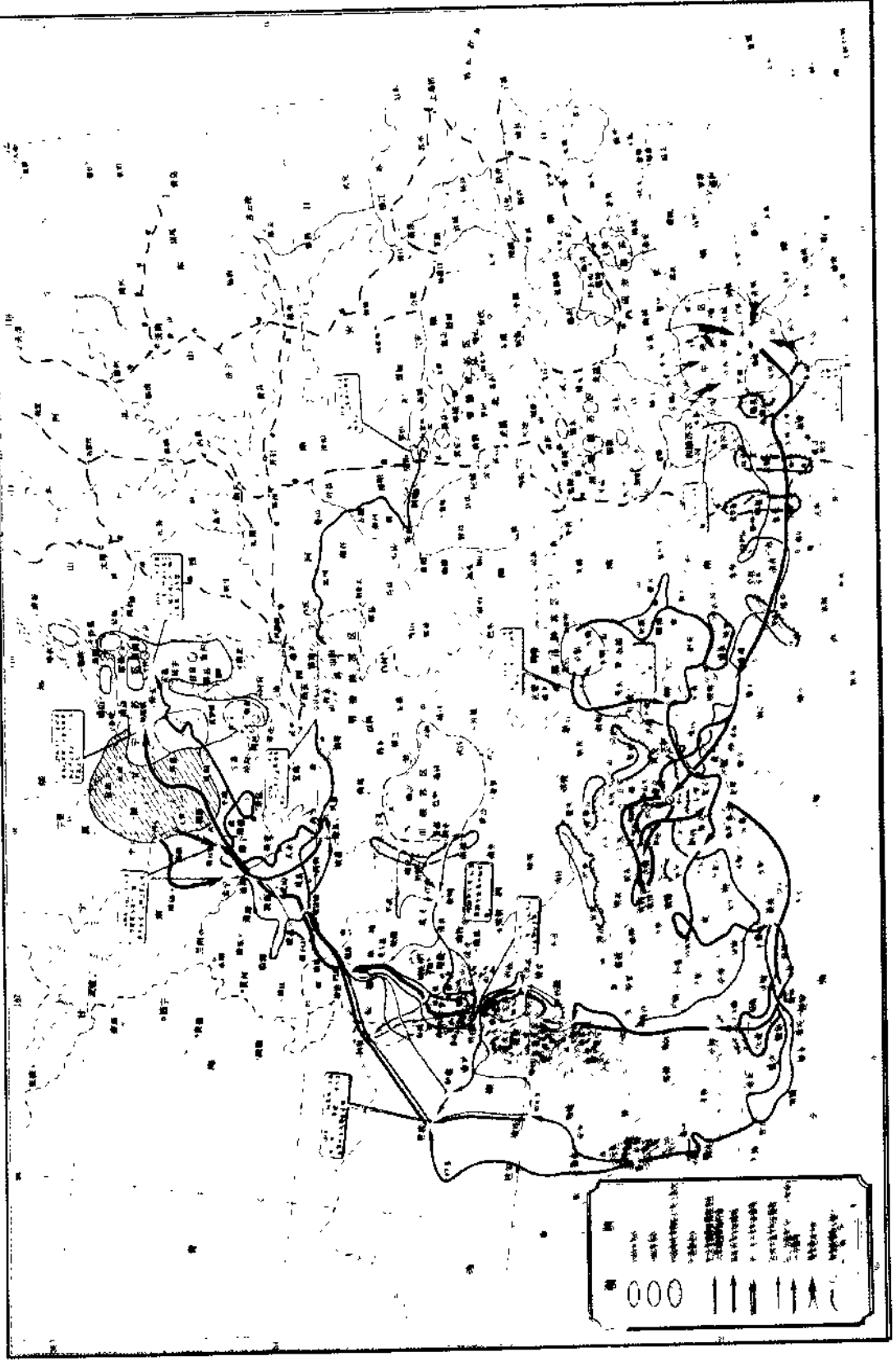
附图51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附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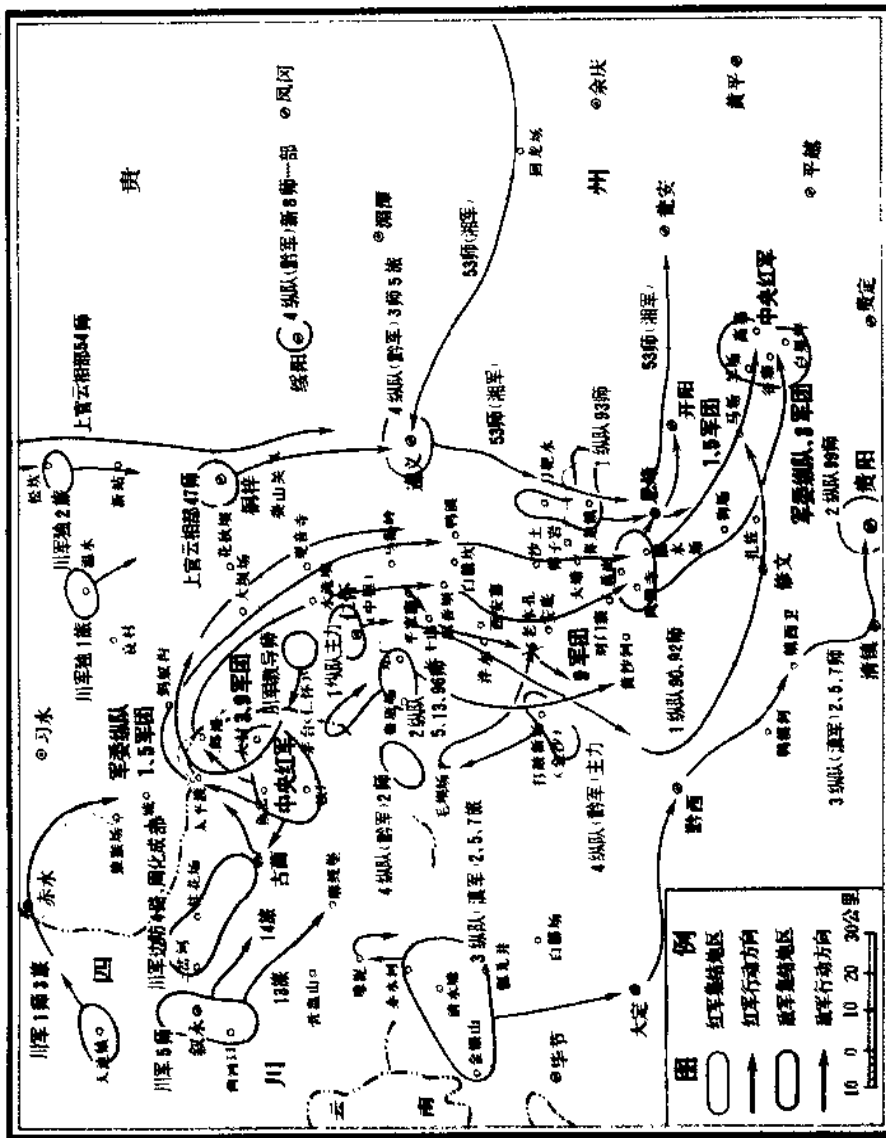




#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要图

(1935年3月20日—4月5日)

附图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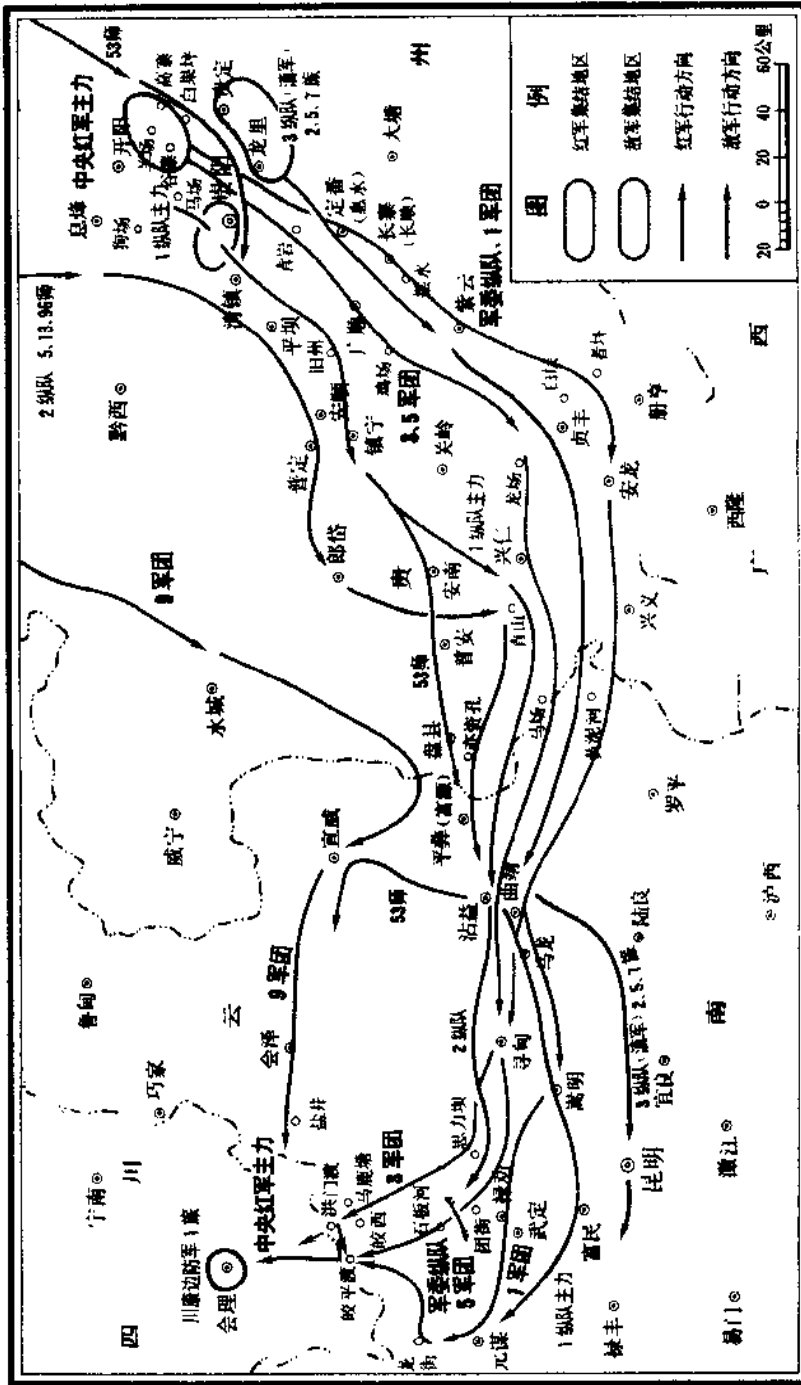




# 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要图

(1935年4月8日—5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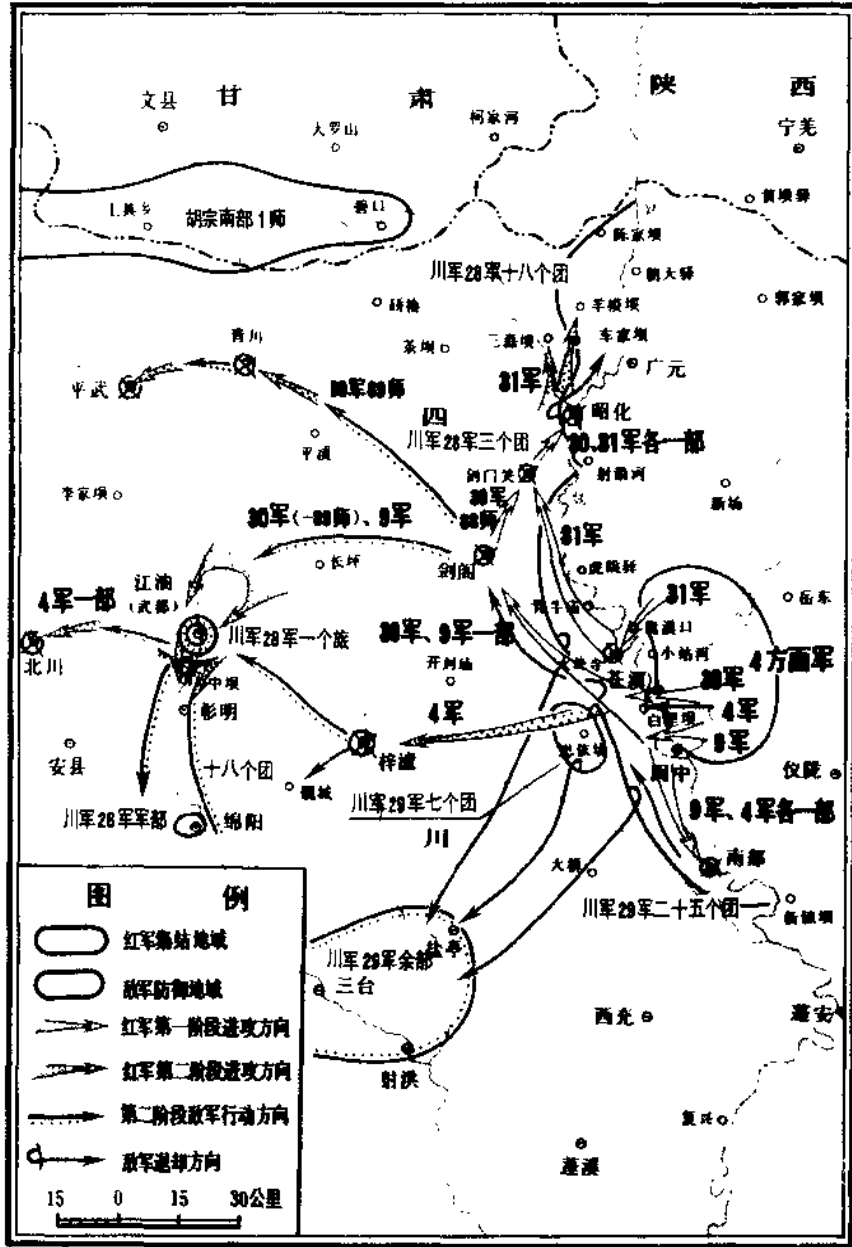
附图56



# 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经过要图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

附图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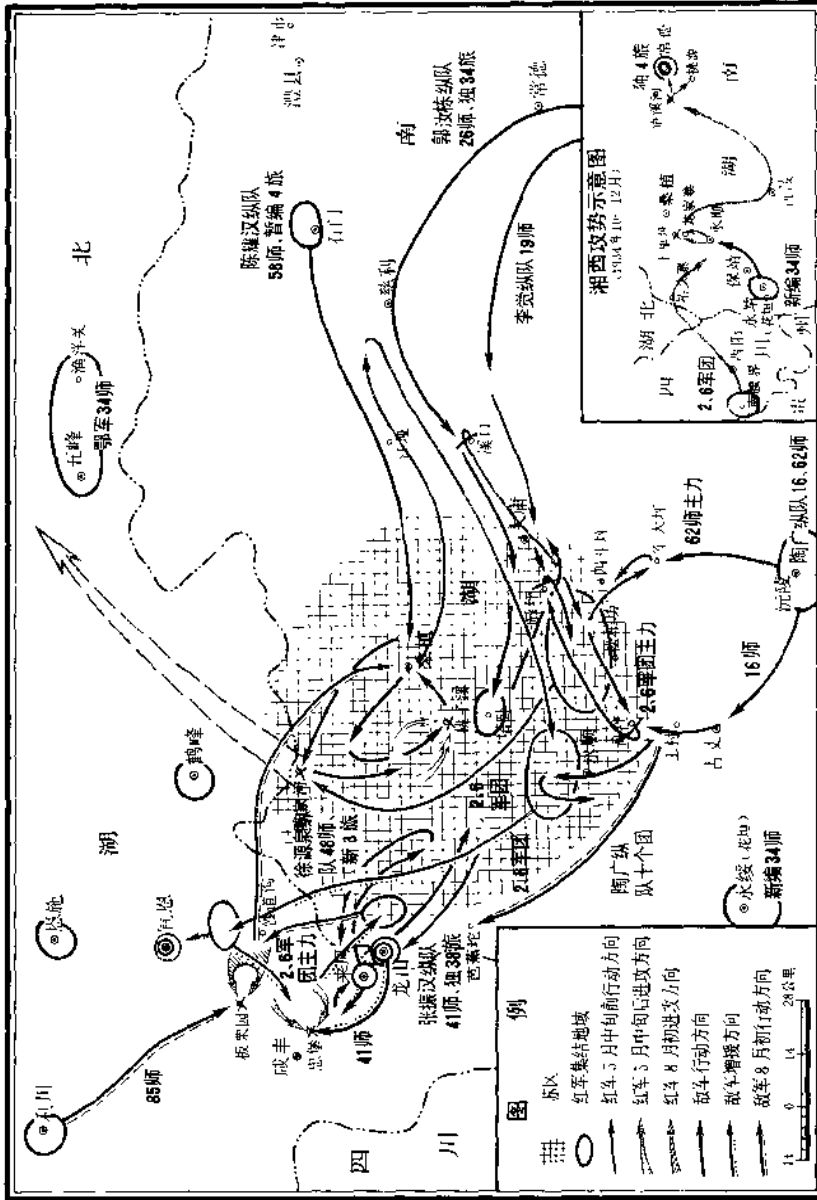




# 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

(1935年1月 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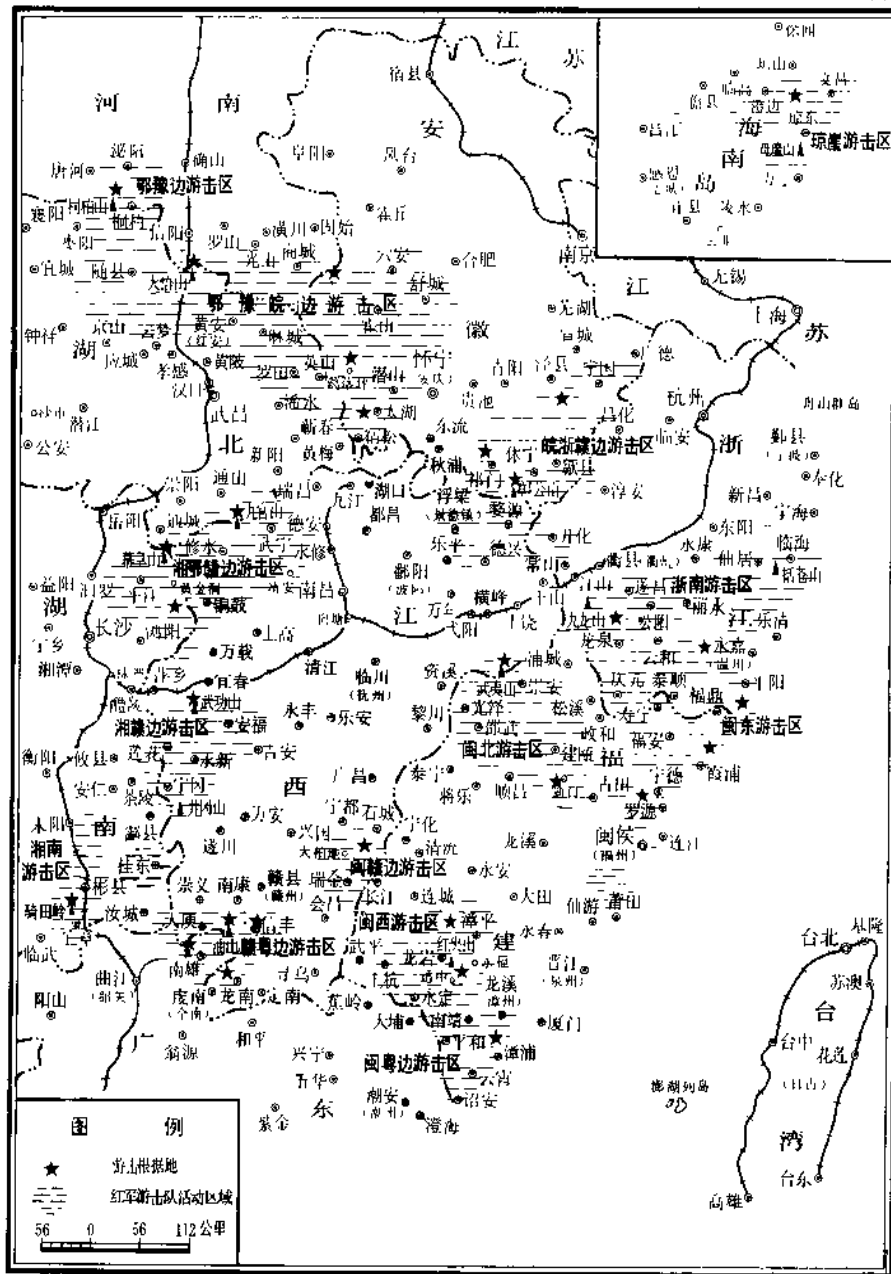
附图61



#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4年秋 - 1937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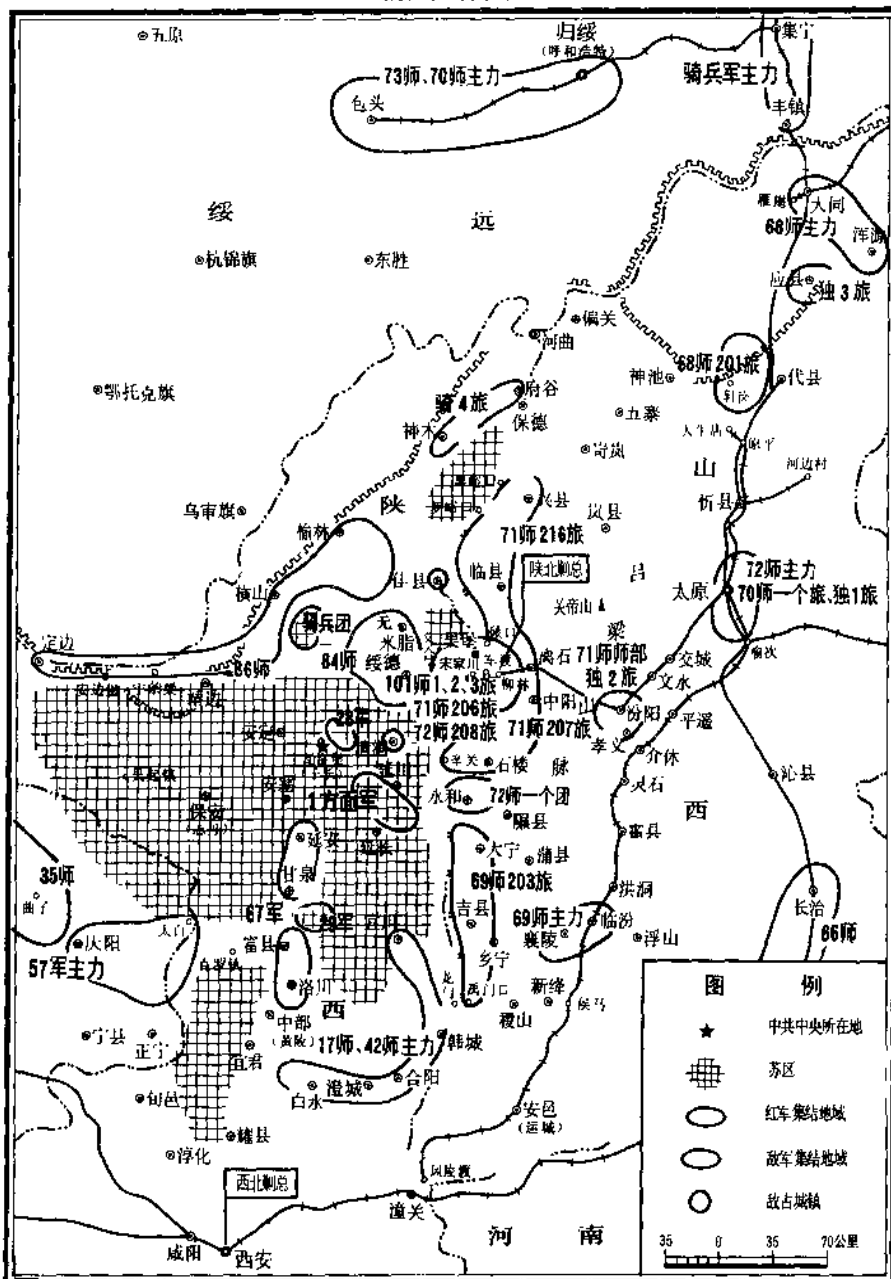
附图62



# 红一方面军东征前敌我态势图

(1936年2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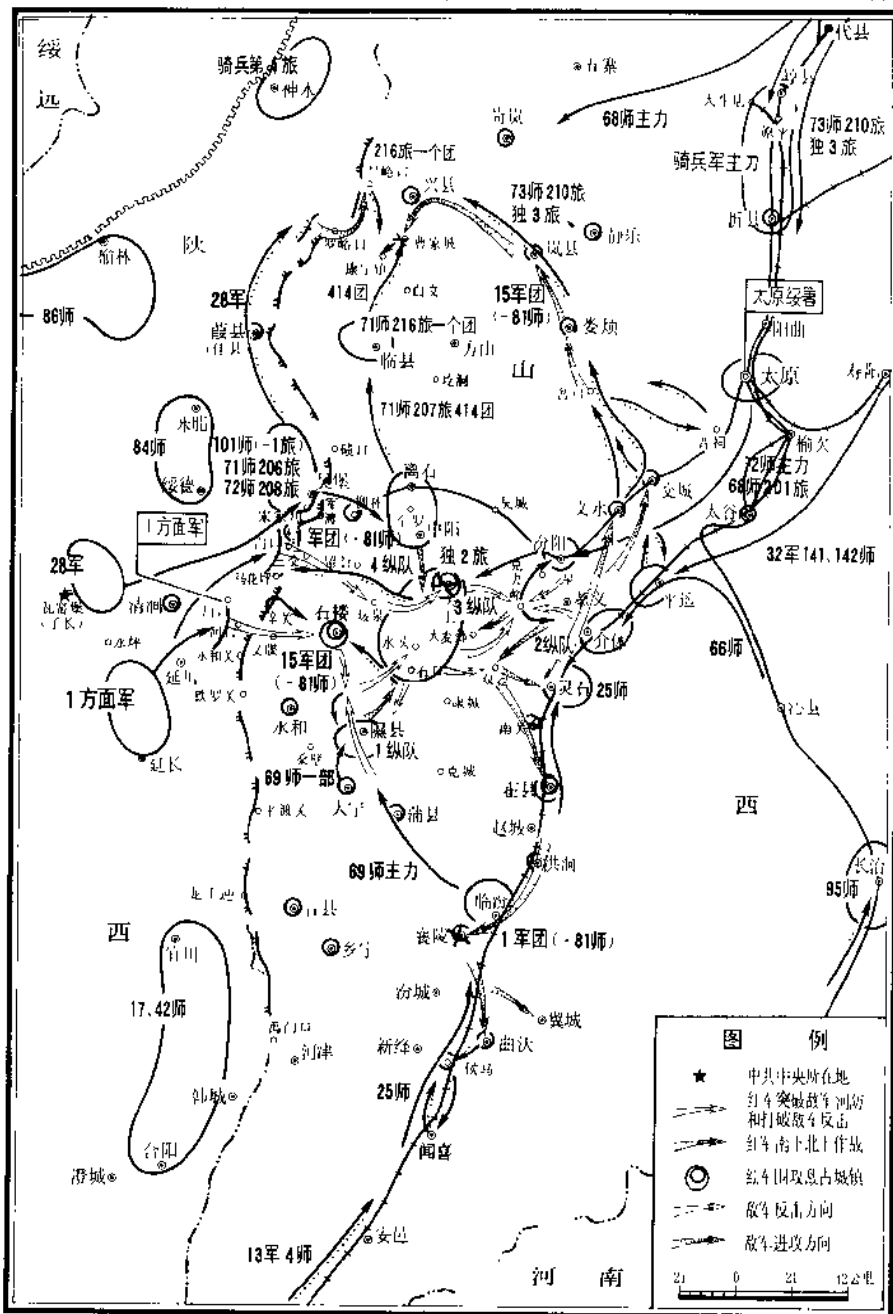
附图63



# 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经过要图（一）

（1930年2月中旬—3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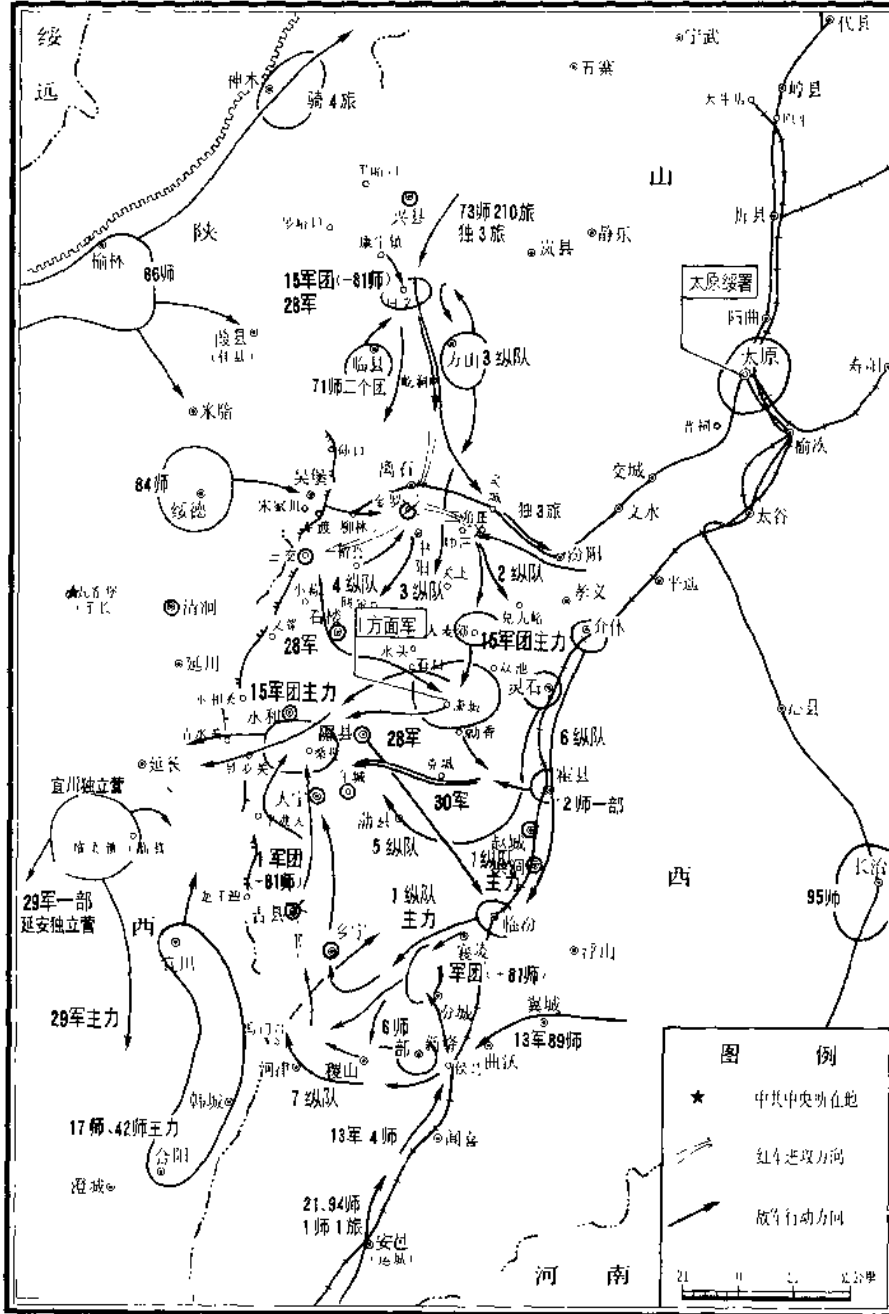
附图6-1



# 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经过要图（二）

（1936年4月1日—5月5日）

附图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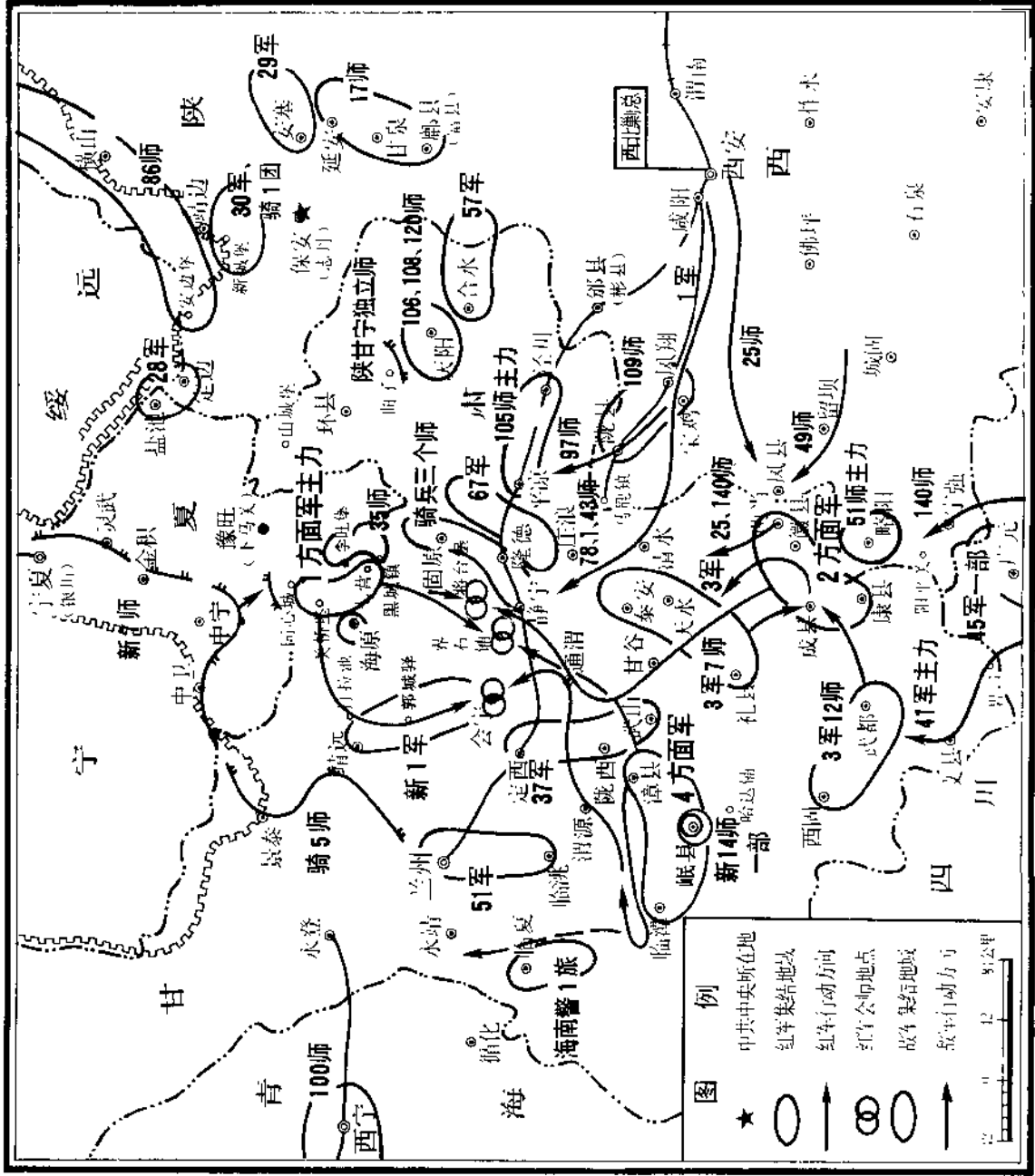




#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示意图

(193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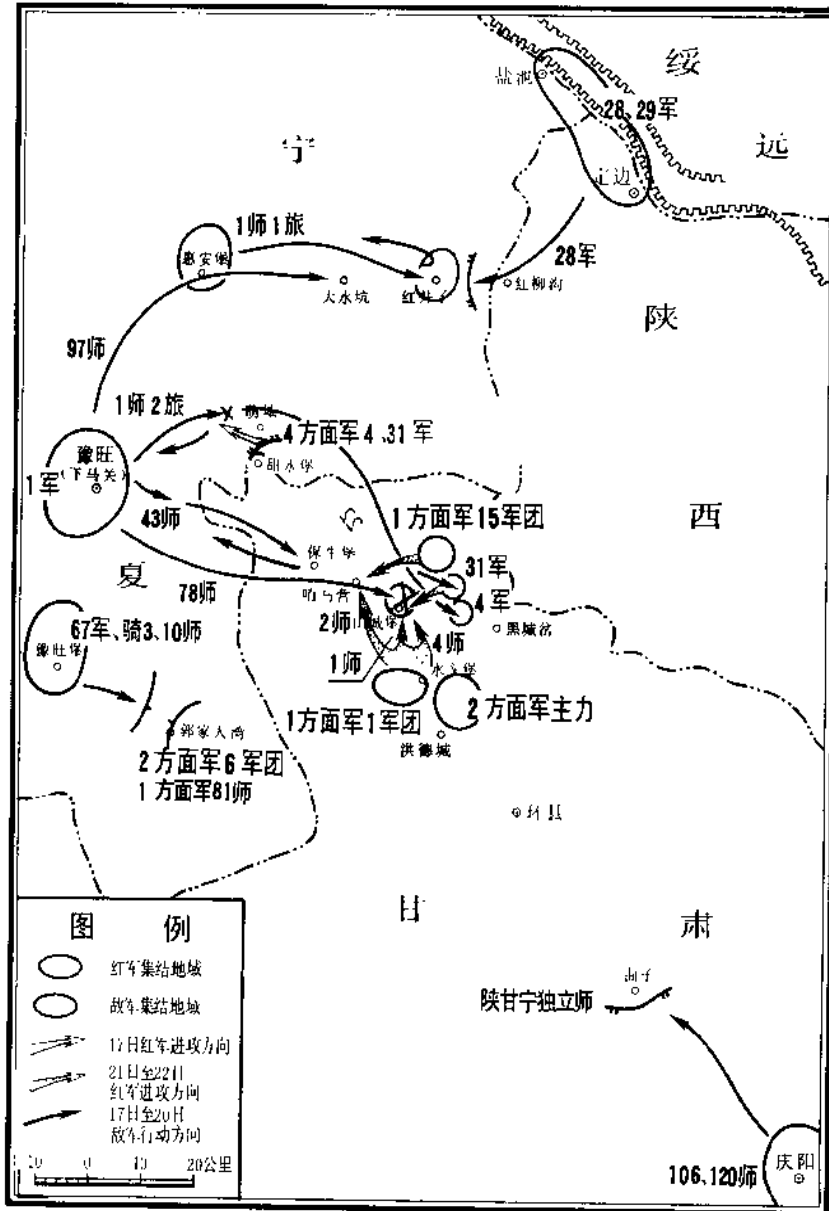
附图68



# 山城堡战役经过要图

(1936年11月17日—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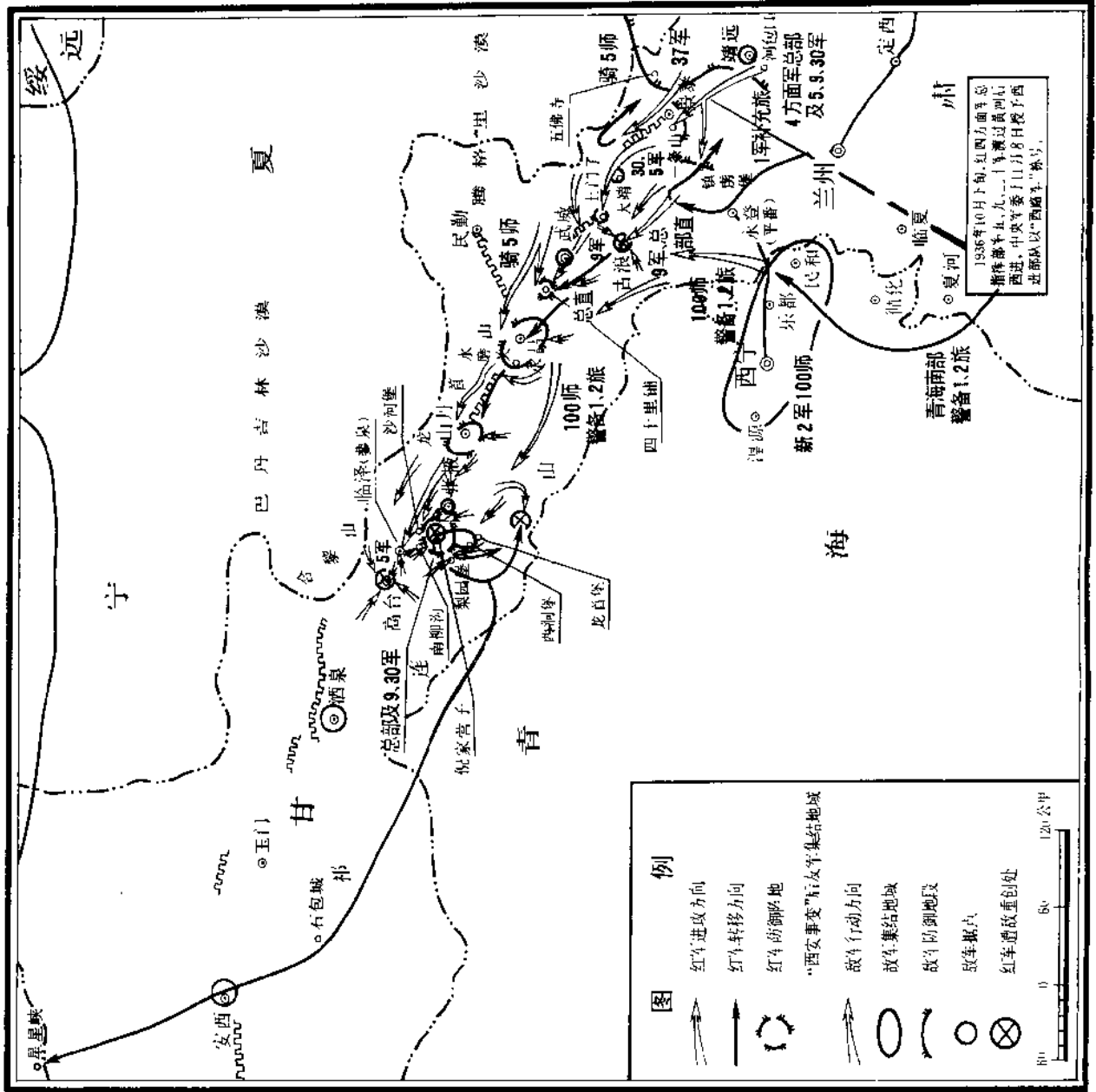
附图67



# 西路军西进行动示意图

(1936年10月下旬—1937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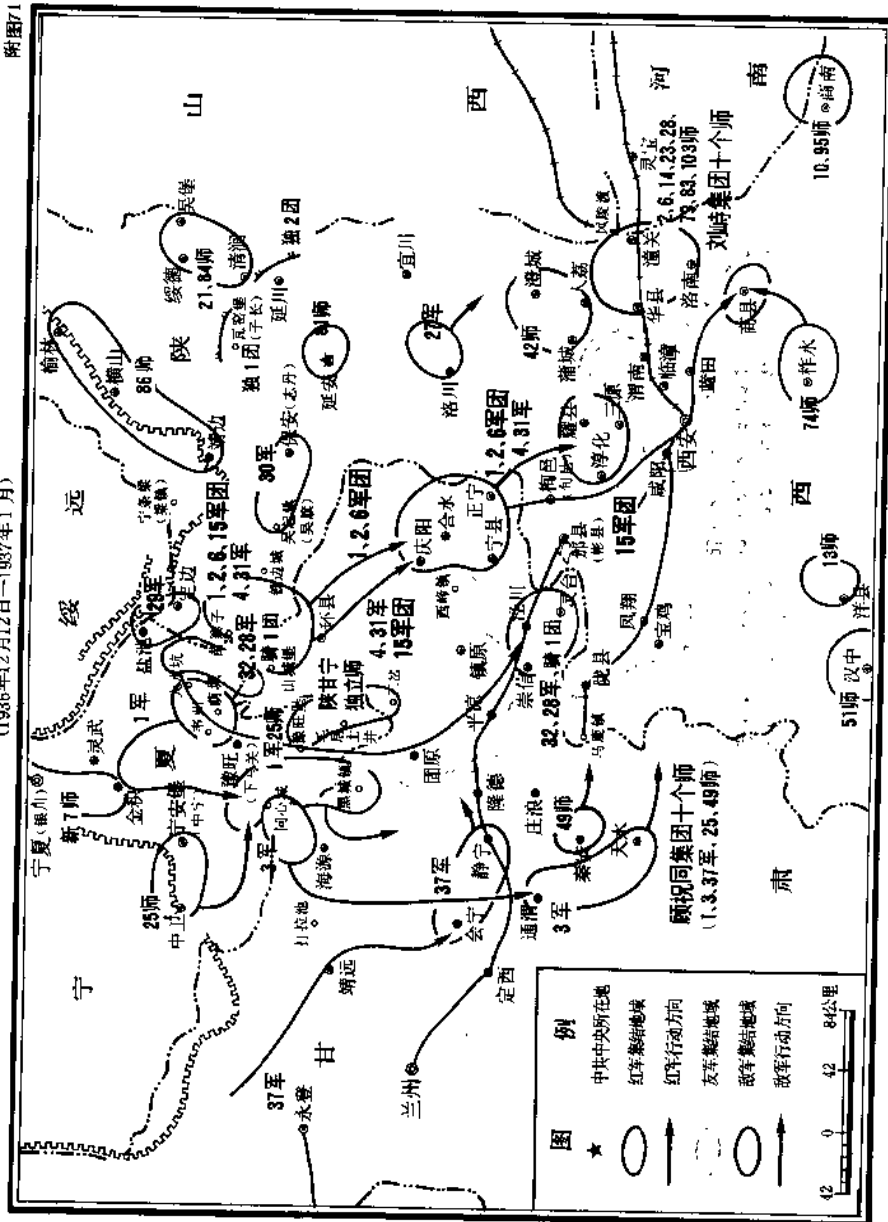
附图70



# “西安事变”后红军行动示意图

(1936年12月12日—1937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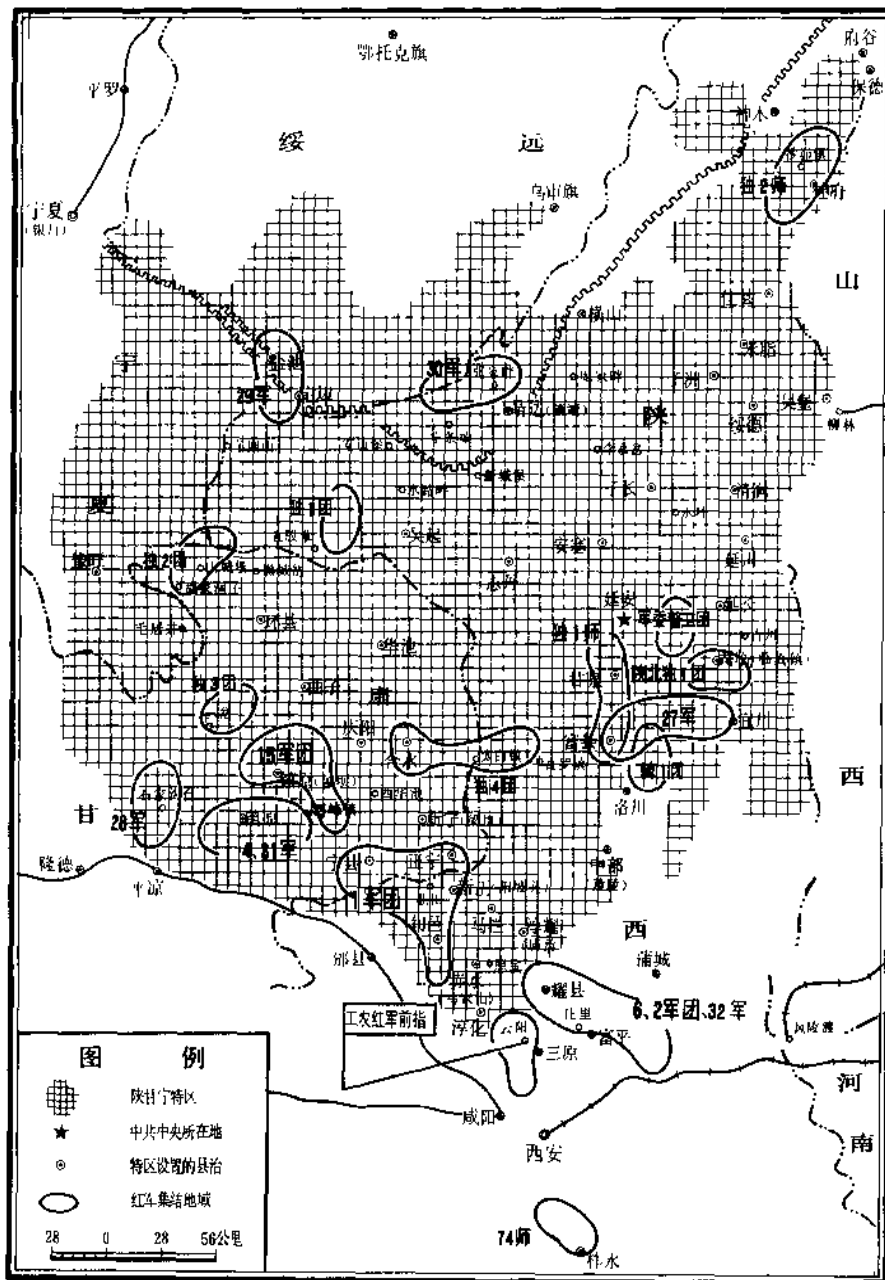
附图71



# 陕甘宁特区范围及红军部署图

(1937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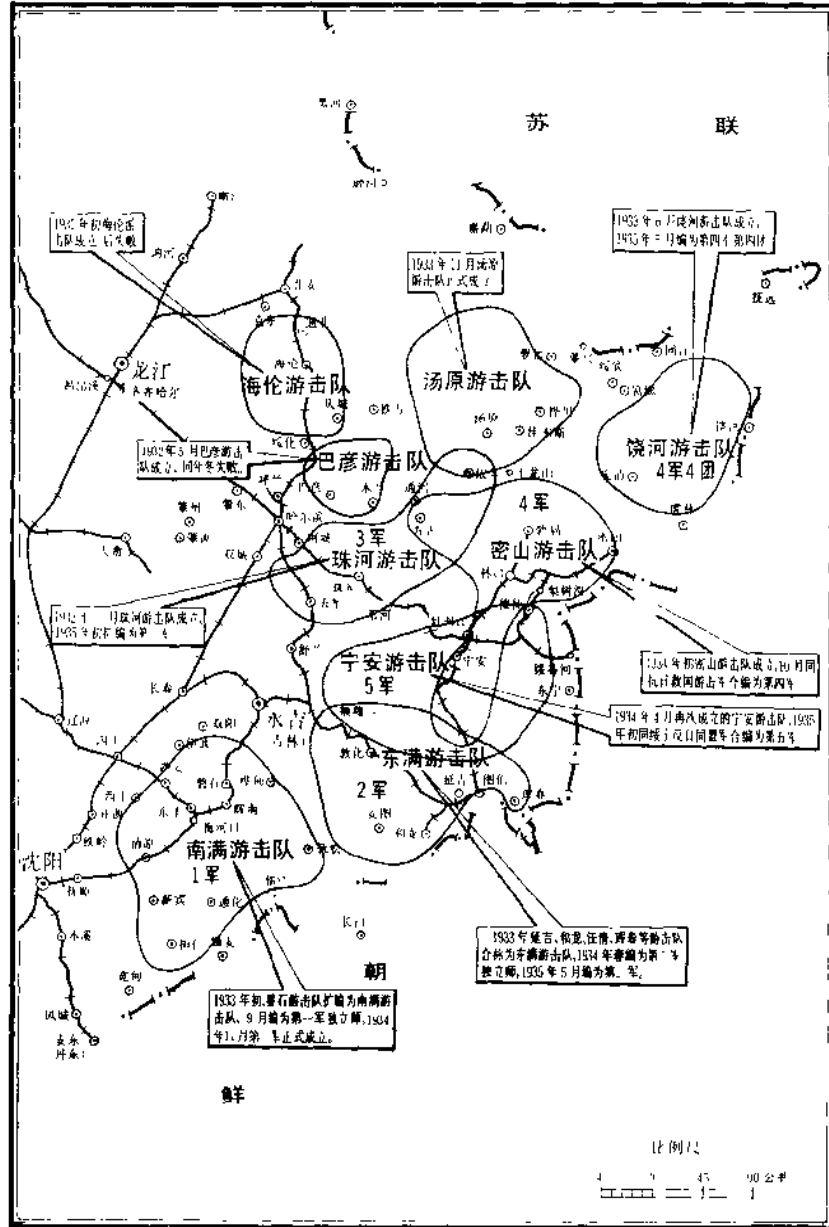
附图72



# 东北抗日红色游击队、人民革命军活动地区示意图

1932年—1935年

图例





# 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6年2月—1937年7月)

图74

